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
Publication Series: MOE Supported Projects of Key Research Institut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Universities
语言文学类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
总主编 邢福义

20 世纪中国词汇学

主 编 周 荐

编 委 (按音序排列)

高 颖	李红印	王吉辉
王瑞华	谢永芳	杨爱芬
杨世铁	张铁文	周 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词汇学/主编周荐.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成果丛书/20 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总主编邢福义)
ISBN 978-7-300-08751-1

- I. 2...
- II. 周...
- III. 汉语-词汇学-20 世纪
- IV. H1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2918 号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
Publication Series: MOE Supported Projects of Key Research Institut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Universities
语言文学类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
总主编 邢福义

20 世纪中国词汇学
主 编 周 荐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规 格	170mm×228mm 16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27.5 插页 2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46 000	定 价	49.80 元

绪 言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语言文字之学古已有之，只是由于当时其治学的目的并非专为探求语言文字的奥秘和规律，而更多的是为解读经书服务，因此古时的语言文字之学中的语言之学不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而被看作是语文学。目的和手段并非同一事物，这本是常识，然而却被不少人或有心或无意地混而为一了。中国古代的学者们治语言文字之学的方法是古代学者自己创造的方法，自难与现代中国学者吸收了西方的学术营养之后所形成的方法比肩，然而古人用自己的方法研究并解决了中国古代语言文字中的许许多多疑难问题，写出了以《说文》、《释名》、《切韵》为代表的卷帙浩繁的经典性的著作，这些著作成为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中的夺目篇章应是不争的事实。研究古代学者的著述，尤其是他们所用的方法，不能“从现在的标准来谈”，不能“从现在标准给他们定性”^[1]。以现代的标准来为古时的研究定性，自然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汉语词汇研究也已有了不短的历史。古代小学之一的训诂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词汇学，因为不仅仅训诂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词，即或是现代汉语词汇学的一些方法也可以追溯到训诂学；文字学中亦有词汇学的内容，只不过古代汉语的词一般都与负载它的汉字一样，是单音节性的，故而古人的文字学易与今人与今日的文字学画上等号，有人从而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字学与词汇学无涉。汉语词汇研究在先秦已经萌芽，至两汉已具较高的水平，到清代已毫无疑义地占据了显学的地位。两千余年的传统的积淀，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与东渐的现代西学发生猛烈的碰撞，自然而然地产生出耀眼的火花。20 世纪成为汉语词汇学大发展的时期，乃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的特色历来就是重描写而轻解释，重材料而轻理论的。中华文化情结较重的一些学者常将这一点视为朴学的特征，并颇为因此而自得。当然，唯理论的夸夸其谈是不足取的，而我们轻理论的倾向却也实在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它导致了我们的研究不大容易对以往

的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很好地进行检讨并迅速上升到一个较高的理论高度去认识和总结，从而阻碍我们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向前迈进。值得欣慰的是，20 世纪的几代中国学者中的不少人不仅继承了古代学者重材料的优良传统，而且吸纳了西学中重理论的养分，百年中书写出了汉语词汇学辉煌的一页。这既是生逢 20 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学者之幸，更是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学术之幸！

辉煌的造就，从来都要经历一个艰难的历程。在新旧时代衔接、东西文化碰撞的历史时期所铸造的辉煌，其夺目的光辉的显现尤其要经历一番磨难。这其中，观念的转化，认识的嬗变，思维的转型，方法的更替，无一不留下了学者们艰辛努力的汗水。在由传统意义上的汉语词汇学向现代意义上的词汇学转变的过程中，有两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值得关注：一个现象是，最先接受西方的新理论、新方法的是年轻一代的学者。然而斗转星移，当这些年轻学者因新生代的崛起而不再年轻时，这些不再年轻的学者中的一些人，或重新回归到传统的思维模式中，或不能再接纳更为新颖的理论和方法。百年间交替出现的新旧两代的思想交锋就成为了无可逃避的事实。另一个现象是，最先接受西方的新理论、新方法的是研究现代语言现象的年轻一代学者。原因之一是年轻学者中治新学者众治旧学者寡；原因之二是西方的新理论、新方法多是在对西方的活着的语言现象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当然较易对中国活着的语言现象作出解释；原因之三则是治旧学的一些学者总有各种各样的主客观理由排拒西方新理论、新方法的侵入而固守着传统的阵地。这两个现象导致古代汉语词汇学的总体水平低于现代汉语词汇学的总体水平，导致古代汉语词汇学在理论方法上常常借鉴自现代汉语词汇学，这也正是本书对现代汉语词汇学研究的历史着墨浓重而对古代汉语词汇学研究的历史着墨不多的根本缘由。

百年，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来说是漫长的，对于一个生命力旺盛而持久的学科来说则仅仅是一瞬。汉语词汇研究已有了两千余年的历史，今后还会有无数个两千年。如果每百年就需对汉语词汇研究进行一次总结的话，今后的总结性的著作更难以尽数。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生逢新旧时代交替的伟大时刻；我们又是不幸的，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是新旧时代交替所产生的无数的困惑。幸与不幸，都不仅属于我们自己，更属于时代，它们当然都会很快地成为历史。从历史的高度辩证地看，幸未尝不是不幸，不幸也未尝不是幸。当我们的子孙站在 21 世纪和 22 世纪

之交，回过头来总结 21 世纪的汉语词汇研究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在为自己生逢那一时代而骄傲和自豪的同时，为他们未能生在我们今天这一伟大的时代而生出些微淡淡的遗憾和怅惘。一个时代的人只能做一个时代的事，一个时代的人只要把属于他这个时代的事做好了也就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包括我们中的一些人在内的几代学者，在 20 世纪中为汉语词汇研究的画卷书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了无遗憾；我们这些活到 21 世纪而回过头来对 20 世纪进行总结的人，只需将发生过的一幕幕场景如实地记录下来交付给历史即无负重托。21 世纪的人们的生活一定比我们今天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21 世纪的汉语词汇研究也一定比我们今天的研究更加深入全面。他们不会因为我们今天的工作而苛责我们，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已经尽自己所能把发生于此一时代的方方面面的事件作了尽可能详尽的介绍和总结；他们会因为我们今天的工作而敬佩我们，因为他们知道正是由于有我们今天的工作才使得他们了解了百年前的今天的历史，才使得他们有了百年后的明天的新的辉煌。

注释：

[1] 孙良明：《中国古代语法学探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第一章 词汇的构成

第一节 词汇单位问题

对于词汇由什么样的单位组成这一问题，学界其实经历了一段认识过程。这从称呼词语汇集的术语的更替也能隐约看出个大概来。我国传统语文学界起先称呼词语的汇集为“字汇”，明代人梅膺祚还专门编著了14卷的《字汇》。“字汇”之获名，显然与将“字”看成词汇的组成单位有关。20世纪50年代初期，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被介绍到国内后，“词汇”的使用才逐渐推广开来。受斯大林“语言中所有的词构成所谓语言的词汇”^[1]观点的影响，当时国内的不少学者也据此只将语言中的“词”作为词汇的构成单位。孙常叙指出：“每种语言所蕴蓄的词的总汇叫做‘词汇’。”^[2]周祖谟也认为“‘词汇’是指语言中所有的词来说的，语言中所有的词构成为语言的词汇”^[3]。这些看法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不过，张世禄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它的成分当中，还有一种‘固定词组’，也是值得注意的。”并进一步分析了固定词组中的成语，认为成语“是一种现成的‘固定词组’”，“在语言中的功用是等于一个词的”^[4]。张氏提倡“值得注意”的固定词组，到了80年代，基本上已经得到词汇研究者的一致认可，并且还被提升到与词相等的地位来对待。张永言主张“词汇就是语言里的词和词的等价物（如固定词组）的总和”^[5]。符淮青指出：“词汇这个词可以指一种语言词语的总和（如汉语词汇，英语词汇）。 ”^[6]刘叔新更是明确地指出：“‘词汇’不好只从字面上来理解。各种语言除了具有大量的词，又都具有很多成语之类的词的固定组合体。”“因此，把词汇理解为一种语言（一个语言符号系统）全部词语的总和，方才合理。”^[7]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有些学者对词汇的构成单位问题重新进行了思索。徐通锵在《语言论》的自序中指出：“‘字’首先是说的，其次才是‘写’的……这就是说，字是汉语社团中具有心理现实性的结构单位，仅仅把它看成一种书写的符号，实在有点儿本末倒置。我坚信

这一观察的正确性,认为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进行语言理论的建设就得以‘字’为结构本位去探索前进的道路。”^[8]他竭力主张“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9]。徐氏的观点石破天惊,是对现今语言认识基本问题的巨大反动,所提出的问题是需要研究者去作出进一步思考的。徐国庆的《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除了“词”和“固定词组”之外,还将“语素”纳入词汇的构成单位中来,指出“语素是语言的词汇系统中构词词汇层的构成要素,是最小的词汇成分”^[10]。“语素作为最小的词汇单位,也是最小的词汇成分。”^[11]认为“语素”是构成其更上一层单位的词汇成分,这似乎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把它与“词”和“固定词组”并列而都当成词汇的单位,看来是有问题的,不同层次上的“语素”、“词”和“固定词组”并置在一起,至少逻辑上很难行得通。

第二节 现代汉语词汇构成的研究

一、基本词汇

最早使用“基本词汇”的是孙伏园,他于1947年发表《基本词汇研究述要》[《四川教育通讯》,1947(28)],主张日常生活和常用性是基本词汇的主要特点。孙氏分析说,基本词汇是那些受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懂的词,受过教育的人能听、能说、能读、能写;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虽然能听、能说,但是不能读、不能写。孙氏观察到了词汇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同地位和不同作用,初步涉及词汇的全民性问题。只是孙氏文中所论“基本词汇”同后人常提及的“常用词汇”十分类似,而与真正意义上的“基本词汇”同名而已。尽管这样,作者拓荒性的独立研究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

20世纪50年代初,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其中提到了基本词汇问题,认为:“语言的词汇中的主要东西就是基本词汇,其中也包括成为它的核心的全部根词。基本词汇比语言的词汇窄小得多,可是它的生命却长久得多,它在千百年的长时期中生存着,并且为构成新词提供基础。”^[12]斯大林关于“基本词汇”的学说虽然晚出于孙伏园,但因其对基本词汇的性质和它在整个词汇体系中的地位作了扼要的阐释,所以对中国词汇学界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由于斯大林的论述极为简明,在该学说被介绍到国内后,学者们对此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还引发了一些争论。下面就基本词汇研究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一简要回顾。

（一）“基本词汇”与“基本字汇”

我国语言学者中，最早运用斯大林基本词汇学说来谈汉语问题的学者是李荣。1952年，他发表《汉语的基本字汇》[《科学通报》，1952，3（7）]，强调应该结合汉语的特点进行研究。在李荣看来，汉语的特点是：在日常生活中，以单音字词为主体，任何一个方言区的人谈话，都以单音字为主。他因此把基本词汇改称为基本字汇。陶坤积极响应，并且更为明确地提出：“我们祖国语言的基本词汇，一般说来，就是单字。作为基本词汇的单字，一音一义，在组成新词时确是严格、丰富而灵活。”^[13]翌年，李向真对李荣等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决不能把斯大林所说的‘词汇’，理解成或是随便更改成‘字汇’。汉语和俄语一样是用丰富的词汇作为语言的建筑材料的。这一点对于汉语研究特别重要。我们必须以词作本位而不能以字作本位来研究汉语”^[14]。而后，李荣又以《字汇和词汇——答李向真先生》[《中国语文》，1953（5）]为题作了答辩，不过，正像伯韩指出的：“李荣先生的第二篇文章只是作了一些不重要的辩解，对于第一篇文章改译基本词汇作为基本字汇的主张，没有继续加以发挥，可是也没有给以批判，究竟他目前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怎样的，表现得不很明确。”伯韩接着谈了他自己的看法：“汉字和一般的词不一致，这一点，两位李先生没有不同的见解。问题在于李荣先生对汉语基本词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基本词就是最小的意义单位，它是单字词或双字词等的词根（包括兼作单字词的词根和不单独用的词根），也就等于单音节的汉字。”“造成李荣先生改译基本词汇为基本字汇的根本原因当然是他没有分清汉语中字和词的界限。由于汉字的特殊性，汉字和汉语之间是有矛盾的，因此语言学者研究语法的时候，才撇开了‘字’的名称，另拿‘词’的名称来代表语言的基本单位；这个事实指明了‘字’和‘词’不是一回事，是不可忽视的。平常人说话所用的名称不一定精密，是不能作为科学根据的。由于字词不分清，他又把词根和词的界限弄模糊了，许多单音节的最小意义单位不过是词根，他把它们一律看作基本词。”^[15]伯韩的评述结束了“基本词汇”与“基本字汇”的争论，后人再未提及过这样的问题。

（二）基本词汇的特点

斯大林所说的基本词汇具有哪些方面的具体特点，他自己并没有明确地指出来。李荣率先根据斯大林有关论述将基本词汇的特点归结成三点：“（1）基本词汇是日常用字。（2）基本词汇生命长久。（3）基本词

汇是语言构成新词的基础。”^[16]李荣将“日常用字”确定为基本词汇的一个特点，此观点响应者寥寥。而林焘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刚好同李荣相反，主张基本词汇和常用词汇不容混淆，“纵使汉语虚词的性质比较特殊，也不能就此认为汉语的基本词汇等于常用词汇。”^[17]张世禄此后论述到基本词汇的特点时，也没有将“日常用字”当作其特点来对待，张氏“根据语言里词汇发展和形成的历史”而把基本词汇的特点依次归纳为：“第一是它的稳固性”，“第二是它的极强的构词能力”，“第三是它的全民性”^[18]。张氏关于基本词汇特点的论述被广为接受。自此之后，把“全民性（普遍性）、稳固性、能产性”看作基本词汇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几乎成了学术界的一致认识，尽管不同学者具体表述上未必完全相同。

尽管这样，一些学者还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基本词汇的性质特点进行了重新审视。孙常叙认为：“基本词汇的问题不是每个词的自身问题，而是一个词和词之间的词汇关系和地位问题，换句话说，不是单个词的问题，而是一个词汇问题。基本词的辨认必须放在词汇里来考虑。”^[19]因此，作者在肯定基本词汇的三个基本特性之外，还补充了一个“不依存性”的条件，认为“在现代汉语词汇里，不依存于其他现代汉语词的词是基本词”^[20]。作者对“不依存性”作了解释，指出：“有些词是不依存于其他现代汉语词而独自存在的；这类词，用以成词的造词材料，有的是现时已经失掉独立概括能力的，有的是构词之后不同于它独自成词的词义。这类词是不可离析的。拆开它，是不可能依照现代汉语语法关系支配它的材料原词，说明它们在构词组织上所概括的原义的。这类词在现代汉语词汇里是占据着不可缺少的决定性的地位的。例如：‘水银’，拆开之后是‘水’和‘银’，不能再依语法关系说明那一矿物。有了它，就能使我们反映出那一客观存在和依靠它而构成的一系列的更多的新词。例如：水银灯，水银柱，水银软膏。没有它，这一些主要的事物就不易说出，使语言贫乏甚至瘫痪，乃至于失掉交际能力。”^[21]孙氏虽然强调“词汇的内部关系主要是依存和被依存的关系”^[22]，但从上述对“不依存性”的有关表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不依存性”的关系其实仅仅是词内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而已。把它作为基本词汇的特征之一来看待，显然不妥当。因此，孙氏很快便招致了谢晓安的批评，谢指出：“基本词是以独立不依存于其他词为其特点，一般的词也不例外，那末，这二者还有什么分别？退一步说，基本词是独立不依存的，那末

非基本词当然是（非）依存的了，只有这样，基本词和非基本词才有个分别，真是这样的话，一切非基本词都成了词与词之间的组合或复合——词组了，词和词组又成了个什么样的关系呢？”^[23] 孙常叙之后对基本词汇作出重新思考的是刘叔新。他在《论词汇体系问题》[《中国语文》，1964（3）]中明确地指出，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之间“存在着的是它们在历史长短上和使用是否普遍上的差别”。对基本词汇的能产性问题，刘氏认为：“基本词汇只是从总的情况来看是构造新词的基础；不见得基本词汇所有的单位都被用来派生新词，而一般词汇也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筑在基本词汇的基础上。”到了90年代，刘氏更是鲜明地提出，“有无能产性，不应看成区分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的一个依据”^[24]。80年代中期，周荐具体分析了“全民性（普遍性）、稳固性和能产性”在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区分中存在的大量相互交叉现象，认为：“表面看来，这三个标准似乎并行不悖，相为表里，但细加推究，却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相当一部分词语并不同时具有上述三个方面的特性。换言之，某个词语表现出一个或两个方面的特性，并不必然也表现出另外的特性。”而后，作者以相当丰富的语言事实支持了刘叔新“历史是否悠久、使用范围是否广泛”的区分标准。^[25]

如何理解和具体把握基本词汇表现出来的这些特性，学者们提出了不少有启发性的意见。张世禄指出稳固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意思；有些极稳定的事物，而也在历史上逐渐变更了它们的名称”，至于全民性，“更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26]。刘叔新也十分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并且就判断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的“历史悠久”和“社会普遍使用”这两个标准作出了进一步的阐释。他主张，“历史悠久，应该有一个尺度”，认为“依据汉族人民的社会历史情况并参考中国历史分期的通行处理方式，一个词语能将其存在史追溯到近代和现代交替的年代，便应当算有较长久的历史而充分显出稳固性。这就是说，只要存在至今大致有七八十年，即民国初年‘五四’时期便存在而现今仍沿用的词语，便可以认为具备了历史悠久的特征”。“至于社会普遍使用这一条件，也不能绝对化地理解。只要在当代大多数阶层和社会集团里通用，其余阶层、集团也能够了解，就算是用得普遍。”^[27]

如何看待基本词汇表现出来的这些特征在基本词汇确定中的地位，大家的意见并不一致。谢晓安认为，“词的有无构词能力是判断一个词是不是基本的先决条件”^[28]。符淮青将“构词能力”看作基本词汇另两

个特征——“普遍性、稳固性”的基础，明确地指出：“构词能力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有很强的构词能力，说明它是稳固的，因为它构成那么多词，要在一个长时期中才能陆续完成。构词能力强，有稳固性，往往又能显示它的普遍性。”^[29]王勤、武占坤在《现代汉语词汇》中也指出，“判定汉语基本词汇时首先要抓住历史稳固性、全民性两个特征”，因为“基本词的构词能力的强弱是由于该词所代表的事物与新生的事物在性质、状态、来路、功用各方面的瓜葛大小决定的”^[30]，所以要把“构词能力的特征放在基本词汇整体之上”^[31]。后来，作者又进一步强化了全民性的重要性，认为“全民性”这一点“是灵魂，是核心。因为它是决定基本词汇的存在的根本依据”^[32]。支持这一观点的还有葛本仪，她认为“有个别的基本词如‘你’‘谁’等，在构词能力方面的确比较弱，但是因为它们具备了普遍性和稳固性的特点，所以仍然是基本词”^[33]。此外，张世禄则是将“稳固性”置于“构词能力”和“全民性”之前的。^[34]这一问题至今还没有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三）基本词汇的范围

林焘认为，“虚词和一般‘语法构造’一样，它的生命比一般词汇要长久，变化也比一般词汇要慢，但是它很少给语言构成新词的基础。虚词自然最常用，但是只能在‘语法构造’的范围内来研究，不能归入基本词汇”，道理在于：虚词在句子中只起辅助作用，没有实在意义；虚词是纯粹的语法成分，尽管它可能很常用、很稳定。^[35]针对林焘的观点，赵振铎指出：“虚词不仅具有词的形式，也有词的内容。它是词，能不能归入基本词汇要看它是否具备基本词汇的条件，如果条件具备了而不把它列进去，那是不公正的。”接着，赵氏举诸如“才、就、也、再”等来说明“它们的全民性和稳定性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它们的构词能力差，或者根本没有构词能力。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某些词只符合两个标准而不符合另一个标准，不考虑它的原因就把它排斥到基本词汇之外去”^[36]。赵文条分缕析，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证，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人都可以接受的。

李向真建议不要“把基本词汇和词根混为一谈”，认为“基本词汇是限于曾经用来构成现行词汇的基础的那些词的，若干新词也有可能转成基本词汇”^[37]。作者呼吁不要把基本词汇和词根混为一谈，这无疑很可取，同时也给基本词汇的成员定下了范围——专注于其中的“词”

的部分。这之后，学者们便似乎只限于“词”的范围内来做有关基本词汇的文章。谢晓安指出，“基本词首先是一个词”^[38]。葛本仪认为，“基本词汇是语言中基本词的总汇”^[39]。80年代后期，周荐从语言事实出发，认为像“安步当车、等量齐观、诸如此类、碰钉子、虎头蛇尾、挂羊头卖狗肉”等“历史较久，也为人们广泛使用，尽管它们不具能产性，却也应当视作语言词汇的基本方面。如果必须符合稳固性、全民性和能产性三条标准的才算基本词汇的成员，那么，这所谓的基本词汇不仅不能包括语感上认为是基本的词，也无法包括语言词汇中的任何固定语”^[40]。周氏据实分析，把与词等价的固定语纳入观察的视野，并且将部分“语”列入基本词汇。这样，基本词汇的研究也就更为全面了。

基本词汇内容所覆盖的面，不同学者的概括不完全相同。下面分别是张世禄、潘允中、符淮青和刘叔新各自所认定的基本词汇的内容类别。

张世禄：许多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的名称，人体部分的名称，亲属关系的名称，劳动和防卫工具的名称，关于事物的一般性质和通常行动的词语，关于时间和方位的词语，以及一些指称词，数量词，代表各种关系的概念的虚词等。^[41]

潘允中：（1）关于自然现象、自然物的名称；（2）关于方位的名称；（3）关于人和人体部分的名称；（4）关于近亲的名称；（5）关于生产劳动（渔猎、畜牧、农业、工业）的词汇；（6）关于物质文化（宫室、衣服、家具）的词汇；（7）关于行为的词汇；（8）关于事物的性状的词汇。^[42]

符淮青：（1）表示人们最熟悉的自然界现象和事物的一些词；（2）表示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一些词；（3）表示时令和方位概念的一些词；（4）表示最基本的性质状态的一些词；（5）表示最基本的动作变化的一些词；（6）表示人体部位器官的一些词；（7）表示数量的一些词；（8）表示人称和指代关系的一些词。^[43]

刘叔新：（1）标示常见的自然现象、普通的动植物、人体及其各主要组成部分、亲属及有社会联系的人、宅舍场院、基本的劳动工具及生产设备、基本的劳动对象、基本的交通工具、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等的词语；（2）标示事物现象基本性质的词语；（3）标示基本活动行为的词语；（4）标示精神文化活动和政治经济活动的基本范畴、基本方式和基本成果的词语；（5）标示基数、序数、月份、一月内和一周内的日序以

及节日、节气的词语；(6) 各种副词和无文言色彩的代词。^[44]

较之于张氏，潘氏没有将“指称词”、“数量词”、“代表各种关系的概念的虚词”列进基本词汇中去，而符淮青虽列入了“指称词”和“数量词”，但没有将“亲属关系的名称”、“代表各种关系的概念的虚词”等列入。刘叔新所概括的基本词汇类别最广，不只涵盖了上述各家中的内容，而且还增加一项，即“标示精神文化活动和政治经济活动的基本范畴、基本方式和基本成果的词语”。总的来看，学者们还是倾向于在词汇内容的各个领域中来认定基本词汇，使得基本词汇的范围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基本词汇研究除主要集中在上述诸方面之外，苏新春根据汉语基本词汇的构成特点，对基本词汇划分的方法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具体划分的四种方法，即“字根分析法”、“训释词分析法”、“构词能力鉴定法”和“词频统计法”，并且认为“前两种更具汉语的特点”^[45]。应该看到，以往的研究对基本词汇的认定大都是举例性的，还没有进行过定量的分析，作者“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说明汉语基本词汇是可以做出较为有形的圈定”，无疑，这种研究本身有着相当的价值。问题在于，不只是“四种方法在取材上没做到严格的一致，词语的覆盖面会有一定出入”，更突出的是，没有明确用四种方法确定基本词汇出现出入甚或矛盾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取舍。看来，这方面的研究还仅仅是开始，其中的不少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二、外来词

(一) 外来词的资格认定

外来词（也称外来语或借词）研究中始终受到关注的是外来词的资格认定问题。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对于音译外族语言从而在语音上带有外来标志的音译词，学术界几乎异口同声地主张应该归属于外来词。形成歧见而多有争论的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意译词、借形词和字母词上。

1. 意译词

一般认为，意译词是用本族语言的现成材料和结构方式来指称从其他民族中引进的概念的词，比如“火车”（译自 train）、“飞机”（译自 plane）、“民主”（译自 democracy）、“科学”（译自 science）等。一种意见认为，意译词是外来词中的一类。罗常培指出：“当许多中国旧来没有的观念初从外国借来时，翻译的人不能把他们和旧观念印证，只好

把原来的语词逐字直译下来，这就是所谓借译。”^[46]是将“借译词”当作外来词中的一类对待的。王勤、武占坤也指出：“如果严格地说，意译词可以不算做外来语词。因为仅仅这些词所代表的意义是外来的，词的构造方法以及词的读音和汉语自己创造的词没有区别。不过从其来源或从这些词所以能够被创造出来是外来的，和外来语有密切的关系。把它放在外来语里还是妥当的。”^[47]葛本仪把“借鉴于外语词所表示的意义，然后用汉语的词素和组词规则形成新词”这一类看作是“受外族语言影响而产生的外来词”^[48]。另一种意见则与此相反，不同意将它们当作汉语中的外来词对待。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上卷）中明确指出：“译意的词，因为利用原语言里固有的词或词根去凑合，应归入合义复词，而且也不能算是严格的外来语。”^[49]孙常叙认为：“按照造词的性质来说，全译的和附注的译词都不算外来词，因为除了词所概括的概念是外来的之外，词的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全是汉语自己的——是用汉语自己的造词材料和造词方法创造成的地道的汉语词。一定要强调它的来源，顶多也只能说它是受外来影响的汉语自造新词。”^[50]张世禄 1957 年出版的《普通话词汇》一书在谈到“意译的外来词”时说“这就是运用汉语的构词成分和方法造出一些新词，来代表其他民族语的词或词组所代表的概念。意译的方法当中，有一种是所谓‘直译’，把其他民族语的词或词组里每个成分，用适当的汉语材料代表出来”，“还有一种是纯粹的‘意译’，只采取原词或词组所代表的概念而完全用汉语材料和形式来构成一些新词……这些可以当作汉语自己造出来的新词。严格说起来，这样纯粹意译的词或词组，可以不必认为是真正的外来词”^[51]。高名凯、刘正琰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一书的“前记”中指出：“我们也没有把一般人所谓的‘意译的外来词’搜集在内，因为我们认为这些数量浩繁的‘意译’的词并不是外来词。”而只有“把外语中具有非本语言所有的意义的词连音带义搬到本语言里来，这种词才是外来词”^[52]。1959 年，周祖谟在《汉语词汇讲话》中同样也认定：“有两类词不是外来词。一类是词形和读音是汉语固有的，只是增加了新义或转变了原义的词。例如‘教授’是汉语里早就有的词，现在所说的‘教授、助教’跟唐宋时代所说的‘教授、助教’不同，但不是外来词。另外一类是根据外国词的意思，按照汉语的构词方式，用汉语的构词成分所创造出来的新词，也不能算是外来词。例如‘面包、番茄、电话、马力、生产力、唯物论’等等。”^[53]一时间，意译

词不在外来词范围之内几乎成为学界共识，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也没人重提该问题。

没人重提并不等于没人在研究、在关注。意译词中牵涉到的“外”来因素总是吸引着研究者的兴趣。贺文照曾撰文《汉语意译外来词归属问题探讨》[《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0（6）]，对意译词的归属问题从文化的角度给予了重新审视。贺氏指出，根据“意译词实际上是用汉语词给外语所说的概念重新命名”这一点不能推导出“意译词是汉语固有词汇的结论”，“一般命名是基于一个社会自身的文化进步而产生的‘定名空缺’，其结果是本族语固有词汇的更新；翻译命名是由于两种文化接触、交流而产生‘定名空缺’，结果产生外来词。在命名过程中，一般命名具有内化和外化两个过程；而翻译命名只是用一种符号代替另一种符号，并没有一个认识和概念的内化过程……因此，无论是音译还是意译命名，它们都有相同的地方，都有来自外国语言和外国文化的影响，只不过受影响的程度不同而已。忽略意译外来词和本族语词汇之间的差别，把它们与汉语固有词汇等同，是一种简单粗略的做法”。针对根据意译词“在词的形式上没有半点儿外民族词特点”来推断它就是汉语固有词汇的观点，贺氏提出了如下意见：“的确，从所用的语言材料和构词法上来看，意译外来词和一般的构词是十分相似的……但是，对于语言研究者却不能满足于两类词在形式上的和谐统一，而应该透过形式，看到它们各自在文化内涵上的差异，构词理据上的不同。一般的构词以本族语和本族历史文化为理据，构词过程中，更多的是反映本族人认识世界的方式和积累本族文化的成果。而意译外来词的理据则是相应的外国语和外国文化。这是意译外来词词义的依据和基础。”贺氏最后认为，“将汉语中所有意译外语词完全排除在外来词之外，作为汉语固有词汇，忽略了其语意内涵中的文化因素”，“可取的做法是从文化入手，对意译词进行文化阐释，从原有的‘汉语固有词汇’中区别出意译外来词。在实际操作时要对意译词作细致的个案分析，对那些与外语词确实有较为密切关系、对它们的理解又必须依赖相应的外语词词义和外国文化渊源的意译词，宜把它们划为外来词”。贺氏结合凝聚在意译词中的文化因素来比较它们与汉语固有词汇的差别，从而得出应该将它们和汉语固有词汇区别对待的看法，这种分析本身无疑很在理。问题在于，文化上的差异是不是区分它们是汉语的还是外来的的一个标准？再者，既然“意译外来词的理据则是相应的外国语和外国文化”，那么为

何只是“对那些与外语词确实有较为密切关系、对它们的理解又必须依赖相应的外语词词义和外国文化渊源的意译词”划为外来词？

2. 借形词

借形词归类的争论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出现了。1958 年，王立达在《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中国语文》，1958（2）] 里具体列出了八类借形词：本为日本音译“外来语”的汉字写法，而被借用到汉语中来的，如“瓦斯”、“混凝土”等；虽用汉字书写，而只有“训读”，没有“音读”的日语词，如“人口”、“手续”等；由日本人用“意译法”译出来的外国语词汇，在汉字读法上只有“音读”，不用“训读”的，如“绝对”、“行政”等；本为日语词汇，而在借用为汉语词汇后，意义与原义不同者，如“劳动者”、“物语”等；本为古汉语词汇，后来被日本人借用作为西方近代术语的意译语，而现在又被中国人从日本借用过来，变成与古义不同的现代汉语词汇者，如“索引”、“组织”等；汉字的字形和词义都是由日本人创造的，而为中国所沿用者，如“腺”、“吨”等；中国人翻译日文时创造出来的，如“基于”、“认为”等；在 20 世纪初曾经一度借用，而现在已经不用的日语词汇，如“劳动组合”、“劳农政府”等。作者进一步指出，“由于这些词汇的输入和流行，不仅使汉语的词汇更加丰富，同时也给我们在接受近代科学技术时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与王文同期刊出的郑奠的《谈现代汉语中的“日语词汇”》，在肯定王文“内容基本上是对的”之后着力指出，“一种语言的每一个词的创制权属于哪一个人或是哪一个民族，要考察得明明白白，本来是很不容易的。对于现代汉语中间吸收和融化了的这一大批日译汉语新词，要弄清楚它们的全部以至个别词的来龙去脉，更是十分困难”。作者在粗线条勾画出中日两国翻译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著作的大体历史后指出：“其实中日关系，从远的说来，中国历代古籍和汉译佛经的流传日本，给日本学者使用汉语汉字不少的凭借和启发；从近的方面说来，同文馆翻译馆等的各科译著，对于日译新词也有过一定的影响。如果没有大量的古汉语词汇（固有的和翻译佛经所发生的）作为依据，同时，这大批有潜在力量的汉语词汇如果得不到中外学者们（包括东方的和西方的学者）继续不断的共同发掘和利用，这对于丰富汉语词汇以适应近代文化的需要，将会发生困难。所以，我们认为这批汉语词汇的文化遗产，是应该属于中外古今学人的共同业绩，是民族性与国际性相结合的产物。说它是日本人借用汉语汉字所创制或继承的日语词汇

也好，说它是中国人借用日本学者创制或继承出来的汉语词汇也未始不可。”张应德在同年《中国语文》第6期上发表的《现代汉语中能有这么多日语借词吗》对王氏所论“不敢苟同”，认为“除了（1）本为日本音译‘外来语’的汉字写法，而被借用到汉语中来的；（2）汉字的字形和词义都是由日本人创造，而为我国所沿用者，是真正的日语借词；（3）虽用汉字书写，而只有‘训读’没有‘音读’中的某些词（例如，味之素、借方、贷方等）可以算是日语借词以外，其余的类型都不能算为从日语借来的词”。王文所论诚如张氏所言，未免失之于宽，但其实张氏的一些批评意见，例如，他认为“本为古汉语词汇，后来被日本人借用作为西方近代术语的意译语，而现在又被我国人从日本借用过来，变成与古义不同的”这部分单位，“充其量也不过是‘完璧归赵’，是旧词新义而已”，就并不十分合理。王力提出了与上述各家不同的意见。他在《汉语史稿》（下册）（科学出版社，1958）中认为“译词不应该算做外来词”，而“利用日本的译名”也“不应该认为是汉语向日本語‘借’词。这些词并不是日本語所固有的，它也不过是向西洋吸收过来的”，“我们只是利用日本现成的翻译，省得另起炉灶罢了”。至于像“取缔”、“手续”这类日本自创的词借入中国，“严格说来，这还不算纯粹的借词，因为没有借用它的原音”^[54]。

不过，此后的学者大多趋向于认为借形词是汉语中的外来词，只是一般将它们当作区别于普通音译的外来词来处理。史有为指出：“进入汉语后理应认为是一种借用，不过主要是借形借义，因此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外来词，与其他借音借义的外来词不完全相同。”^[55]这就是“‘准外来词’或日源汉字词”^[56]。借形词研究方面，刘叔新的观点值得我们注意，他认为这些源自日语的词汇是“纯音译外来词”，因为它们从日语中搬取回来的过程中，“并非原封不动地移用过来，而也须作一定的音译，即把词语的日语语音形式改造为符合现代汉语语音习惯的形式。这就是说，‘搬取回来’是把一个日语词汇成员改造为现代汉语词汇成员，使它成为现代汉语的纯音译外来词”。刘氏还指出，“如果一个从日语音译来的词语，和在文字符号上一致的古代汉语相应单位有基本相同或非常接近的意义，那就宜于看作汉语一个固有的词语单位在日语启发下的新发展，不必列入外来词的范围”^[57]。刘氏分析观察细致，发掘了前人未曾谈到的现象。

3. 字母词

书面上直接写成字母或夹有字母的词语是字母词语。字母词语虽然早在 20 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但引起广泛关注还只是 90 年代之后的事。其中,字母词语的性质尤为社会所关注。冯建文、毛莉认为它们是汉语中的“英汉夹杂现象”,将这类词语中的字母部分当作外语词语来看待。^[58]王吉辉在《字母词语的外来词语性质分析》[《汉语学习》,1999(5)]中,根据词语性质的分析应抓住其音和义的方面而指出,“字母词语中字母部分的意义由各自字母原先所代表的部分予以提供并由它们决定”,即字母的意义就是源出语言中的意义,书面上的不同写法(汉字式写法或字母式写法)影响不到意义内容的这种理解,因此,判定它们是不是汉语中的词语,关键就看它们的具体音读是不是合乎汉语的语音系统。如果字母部分的音读经改造已符合于我们民族的语音习惯,那么这些单位就应当属于汉语词汇中的成员,是汉语中的外来词语而不是外语词语。字母词语在汉语社会中的音读方式不外乎三种。它们分别是照着字母按字母音来读、按照拼读音来读和借读法。据分析,在采用第一种音读方式时,由于有些字母的音读音汉语中不存在,汉语社会对它们也没有加以改造,像 F、H、L、M、Q、S、W、X 等,由它们构成的纯字母词语只能是外语的,不过现实中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外语音读的字母更常见到的,是与能读成汉语音节的字母或汉字结合在一起,比如像“MTV”中的 M、“SVCD”中的 S、“LT 贸易”中的 L 等。对此,假如因为其中存在外语音读而就此认定它们是外语词语,恐怕失之片面;可反过来,把它们未作区分地视同于能用汉语音节组成的字母词语,好像又不太妥当。考虑到社会的使用以及该类同相邻词语之间的关系,可称这一类为准汉语词语。字母词语在其他情况下基本上都能用汉语普通话语音系统中的语音把它们念出来,无疑都是汉语中的词语。王吉辉强调指出,有些由汉语社会自己一手创造的字母词语像 HSK(汉语水平考试)、GB(国家标准)等,“都只能看成是汉语固有词语。因为非常显然,它们不是从外语中引入的,字母词语意义的形成也不是由某个外语词语来提供”。

由于对意译词、借形词和字母词语等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导致语言研究难以在外来词的范围上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于是,不少学者开始跳出外来词范围确定上的思维定势,另辟蹊径,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1)《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外来概念词词库”总说明》指出：“‘外来词’或‘外来语’常给人一种错觉，以为这种词的形、音、义均为外来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将汉语中那些形、义和音、义外来的词称作外来词是比较合理的（前者如源自日语的外来词，后者如音译词），因为它们的形、音、义三者中有一半以上是外来的。但对只是‘义’为外来的词（意译词），也称‘外来词’就有点勉强了，因为这类词的形、音、义三者中已有一半以上是中式了，这种词只能称其为‘外来概念词’，而‘事物概念为外来的’这一特点又是这三种词所共有的。所以我们认为，用包容性更广的‘外来概念词’来取代‘外来词’这一名称，那是更趋合理的。”考虑到有些词虽是外来的，可外来的却并非概念，比如“妈咪”、“拜拜”等，于是黄河清又提出所谓的“汉语外来影响词”，用“外来概念词”或用“汉语外来影响词”替代原来的“外来词”或“外来语”。^[59]这虽然较传统名称有更大的包容性，但并不能消除人们对哪些是汉语成员哪些不是汉语成员的争论，也不会给这种争论的消除提供什么有益的线索或帮助。

(2)史有为在《外来词：两种语言文化的融合》[《汉语学习》，1991（6）]中，从两种语言文化的观点出发，“不再拘泥于初始意义的传统范围，不再理会传统的论题，而把注意的重点从‘哪些算外来词’转到‘在一个新的集合中，外来语言文化因素有多少，或两种语言文化因素各有多少’这一新论题上”。作者“按外来因素从少到多的程度，参考汉语固有因素从多到少的程度”，并分别就内容部分、形式部分和文字部分而予以量化分析，最终得出下表（见表1—1）：

表 1—1 词语的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量化分析表

类号	例句	词义 (2)	词音 (5)	词式 (1)	词形 (1)	字形 (1)	总分 (10)
1	墨水	外 2	0	0	0	0	外 2
		固 2	5	1	0	1	固 9
2	革命	外 2	0	0	0.5	0	外 2.5
		固 1.5	5	1	1	1	固 9.5
3	足球	外 2	0	1	0	0	外 3
		固 2	5	1	0	1	固 9
4	柔道	外 2	0	0.5	1	0	外 3.5
		固 2	5	1	0	1	固 9

续前表

类号	例句	词义 (2)	词音 (5)	词式 (1)	词形 (1)	字形 (1)	总分 (10)
5	腺	外 2 固 1	0 5	0 0	1 0	1 0.5	外 4 固 6.5
6	卡车	外 2 固 1	2 5	0 1	0.5 0	0 1	外 4.5 固 8
7	霓虹灯	外 2 固 1.5	2 5	0.5 1	0.5 0	0 1	外 5 固 8.5
8	摩托车	外 2 固 1	2 5	0.5 1	0.5 0	0 1	外 5 固 8
9	雷达	外 2 固 1.5	4 5	1 0	1 0	0 1	外 8 固 7.5
10	滴滴涕	外 2 固 1	4 5	0 0.5	1 0	0 1	外 7 固 7.5
11	补心	外 2 固 0	4 5	0 1	1 0	0 1	外 7 固 7
12	臭纶	外 2 固 0.5	4 5	0 0	1 0	0 1	外 7 固 6.5
13	沙发	外 2 固 0	4 5	0 0	1 0	0 1	外 7 固 6
14	瓦斯	外 2 固 0	4 5	0 0	1 0	1 1	外 8 固 6
15	吨	外 2 固 0	4 5	0 0	1 0	1 0.5	外 8 固 5.5
16	O. K	外 0 固 0	4 5	1 0	1 0	1 0	外 7 固 5

作者在此基础上指出：“根据这张量化表，我们愿意给‘外来词’下什么定义都是允许的，或者限定为 6~16 类，或者限定为 4~16 类，甚至限定为 2~16 类，或 1~16 类。从本文的角度看来，这都不是实质性的，都只是一种相对的处理。”

(3) 吴传飞在《论汉语外来词分类的层级性》[《语文建设》，1999 (4)] 中尝试用认知心理学的原型理论来考察汉语外来词的分类，作者

首先将“音译词”、“音译加注词”、“半音译半意译词”、“意译词”、“借形词”等归为三个层面：“A. [+外来词音层面]，B. [+外来词音层面+汉语词音层面]，C. [+汉语词音层面]。自然，这三个层面比较起来，有较好的样本与较差的样本之分。很清楚，其中[+外来词音层面]的音译词是外来词的‘较好的清楚的样本’，它最具有外来色彩，我们可把它称为原型，即原型外来词。”“非原型外来词是外来词的非典型成员，在外来词中视其与典型成员（原型外来词）的相似程度而与原型外来词保持不同的距离。在非原型外来词中，音译加注词、半音译半意译词都有一半的外来词音层面，这与典型外来词（音译词）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具有原型外来词的一定的属性特征，更靠近原型外来词，故把它们归为同一个层级，取名为特征外来词。而意译词、借形词在词音层面上的相似性与原型外来词相差甚远，远离原型外来词，故把它们归为另一个层级，取名为边缘外来词。”史有为和吴传飞意识到了借入的外来成分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集合，彼此之间难以做出非此即彼式的切分，因此，在外来词的类别处理上采用柔性的方法，承认并允许切分中存在着某种临界或过渡的状态。这较以前是一明显的突破和进步。但问题在于，这种研究并没有很好地回答哪些情况下的外来成分可以算是汉语词汇中的成员。

（二）外来词与文化交流、社会接触

外来词是文化交流和社会接触的产物。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同时又是文化交流和社会接触的历史见证人。通过外来词的研究有可能把握中外文化交流的途径和程度，正如罗常培在《语言与文化》中所指出的：“对于这些交互借字仔细加以研究，很可以给文化的历史找出些有趣解释。中国和其他民族间的文化关系几乎可以从交互借字的范围广狭估计出个大概来。”^[60]罗氏本人即通过一般外来词、地名外来词和姓名外来词三个方面具体探讨了民族间的文化交往、民族的迁徙、民族的来源与宗教信仰等。高名凯、刘正琰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首先分析了汉语中外来词的历史和现状，说明了近百年来汉语大量吸收外来词的情况，然后从两个角度对汉语中的外来词作了分类：一是语言分类，以揭示汉语外来词的主要源头；二是按所反映的外来事物、概念分类，以揭示汉语吸收外来词的文化内涵。通过分析，作者指出：“反映外来事物或概念的外来词在现代汉语中的广泛分布，反映了汉族人民在文化历史的发展上，已经由以往的‘故步自封’的局面迅速地走上与世界文化合

流的道路”^[61]，“汉族人民已经进入世界的范围，使文化现代化了”^[62]。《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虽然研究的是现代汉语外来词，但事实上也从一般意义上阐述了外来词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意义。史有为则将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来对待，从外来词对汉语语词的整合模式上所产生的影响去观察文化交流。他在《外来词：两种语言文化的融合》中指出：“词汇中存在着两种‘语言文化’的因素。纯粹的固有词是一种‘固有语言文化’的反映。而外来词则由于其来源的独特，则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外来语言文化’的因素，同时，由于外来词当前所处的语言环境，又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固有语言文化’的因素。这些因素不仅表现在内容（词义）上，而且也表现在形式上。”作者结合文化来研究外来词，并著有《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一书，该书表现出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从文化的角度探讨语言现象，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化现象。

此外，还有些学者通过对方言区内外来词的考察，试图发掘出一些与区域性亚文化有关的有趣信息。这方面的研究有陈泽平的《福州话中的外来词》[《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4（2）]等，拓宽了揭示与外来词相关的文化线索的研究领域。

文化交流、社会接触带来了外来词，与此同时，外来词又受到输入方民族文化的改造、融化。陈榴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分析了外来词汉化的过程和结果，他在《汉语外来语与汉民族文化心理》[《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0（5）]中指出，在“历史文化背景下观照汉语外来语，同样可以发现汉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刻影响，汉民族文化心理的封闭性、选择性和适应性，使汉语外来语独具一格”。作者接下来分析道：“大量的汉语外来语是经由书面记录和传播的，用表意文字去转写表音文字，势必造成词所表达的概念与词的书写形式的分离。”“实际上，言意之间、名实之间是一种既相依存、又相矛盾的辩证关系。‘言不尽意’和‘名不符实’是普遍存在的，这种矛盾性促使语言形式不断调整和完善，从而使言意之间、名实之间不断在新的层面上达到新的平衡。汉语外来语在名实之间存在的矛盾性，迫使人们去寻求调适的方法，以调整外来语的形意关系。”有鉴于此，汉语外来语在接收方式上做了不少的调整，比如“增添意符提示词义”、“音意兼顾”、“半音半意”、“音译附加汉语类名”等方式。张彩霞在《汉语外来词与汉民族文化心理探索》[《社科纵横》，1997（2）]中，具体分析了外来词受汉民族文化心理影响的种种

表现,指出:汉民族的审慎心理和要求名实相符的心理制约着汉语外来词的数量;汉民族善于联想的文化心理使汉语外来词别具特色;汉民族求简、从众的心理使汉语外来词形式简洁、单一;趋新求异的心理是新时期外来词增多的主要原因,而追求广告效应则是新时期外来词最重要的特征。类似研究还有吴礼权《汉语外来词音译的特点及其文化心态探究》[《复旦大学学报》,1994(3)]、卢卓群《“望文生义”的语言心理和汉语音译外来词》[《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4)]等。

(三) 地域外来词研究

20世纪90年代后,一些学者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对某一个点、某一个局部的外来词研究上,其中又以港澳台地区为研究的重点。谭海生在《大陆粤方言区与香港地区使用外来词之区别》[《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4(1)]中具体分析了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别,指出:流传途径上,香港地区一般是“自上而下”,而大陆地区一般是“自下而上”。所用词语上,“从总体说来,香港地区所用借词远远多于大陆粤方言区。在大陆粤方言区通用的借词,除极少数外,基本上都能在香港地区通用,而香港地区通用的借词却有很大一部分大陆粤方言区不通用或尚未通用”。在借词使用范围上,由于大陆和香港“两地社会背景和语言环境差别较大,不少两地都通用的借词在使用时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有的在甲地使用时代含义项多一些,在乙地则少一些,有的在乙地适用范围宽一些,在甲地则窄一些”。在借词与相对应汉语词关系上,大陆粤方言区大多数外来词的适用场合要比相对应的汉语词少,使用频率要比汉语词低,而且多数借词只通行于口语,“书面化”程度相当低。而在香港地区,多数借词适用场合比相对应的汉语词多,使用频率比汉语词高,而且有相当大一部分借词经常出现在文章著作、报刊广告、商品包装等书面信息载体中,“书面化”程度明显高于大陆粤方言区。在借词常用搭配词语上,有些两地通用的借词,其常用的搭配词语各有不同。朱永锴专门探讨了香港粤语里的外来词,他在《香港粤语里的外来词》[《语文研究》,1995(2)]中将该地区接收外来词的方式概括为以下几种:直接用香港粤语音译的外来词,如“巴士”、“的士”等;用粤语音来读日语汉字的词,如“物语”、“便当”等;按照意义来译外来词,如“白领”、“做爱”等;巧妙地音兼意译,如“迷你”、“托福”等;音译加意译,如“蛇果”、“桑那浴”等;直接用外语的单词加在句子里(一般照原文读),如“call机”、“阿sir”等;夹用缩略语,如

“A 友”、“AA 制”等；其他如“番鬼打臣”等。谢之君的《香港接受外来语的几点启示》[《语文建设》，1998（7）]虽不是专门描写香港方言中外来词的接收特点，但也涉及了大陆与香港借词的比较。作者认为：“与普通话比较，粤语在使用英语借词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在方法上，不但有意译、音译，还有外来词的直接进入；在标准上，采取音译意译并重，形成了音译词多、直接形式进入多的特点，这就使得粤语更加‘洋化’。”史有为结合语言社群类型探讨了台湾地区的外来词，他在《语言社群类型与台湾的外来词》[《语言文字应用》，1999（2）]中分析道：“外来词可以从语言社群类型去观察、研究”，“词汇是最能直接反映社会变动和社会关系的，因此，语言社群类型在包括外来词在内的词汇层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这种表现是宏观上的，即以不同特征类别的词语在数量上显现出来的。从这方面看，语言社群也就是外来词的借入社群、使用社群的社会类型。”接着，作者指出：“台湾和香港无疑是一种特殊的地方社群，对于母社群和子社群而言它带有某种一时的中介性质，但由于时间未久或地域接近、联系尚多，因此仍未脱离母社群的范畴。这种特殊的地方社群从历史高度看是不稳定的，它必然随着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一般来说，它们在没有特殊外力的介入下是不会离开母社群的，而且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它们必然会发展得更靠拢通常的母社群，成为一种不过于特殊的地方社群。”作者据此指出，“在外来词上也就具有边缘混合着中心的特殊色彩”，“台湾外来词语的边缘性已是明显可见”。而后，作者分门别类地具体分析了这种边缘性质。就“日语来源外来词”而言，其中“大部分是日本的汉字词。这些词在大陆一般是未引进或不使用的。由于台湾同日本的联系在光复前以及在光复后的民间层上大大多于大陆，因此，从日语引进外来词也必然多于大陆”。就“英语来源的外来概念词”来说，台湾在引进过程中有如下倾向：音译词，台湾在音译这些词时也常常喜欢用谐意音译的方法；有少数同大陆的音译类型相反，采取意译方式。对于“专名外来词”，台湾方面的特点是：在专名方面，台湾比大陆更喜欢使用谐意音译的方法；在人名方面比较喜欢让外国人名中国化，即首字汉姓化和音节短缩化，保持在三音节以内；似乎台湾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译名最长不超过四个字，这倒比较符合汉语的习惯；个别的有音译和意译、是否加义标的不同；个别有根据古今不同的外语词而选择了不同的译名；在国家简称上也有个别不同之处；等等。对于“罗马字母形式”，台湾“也显得比

大陆更为大胆”，“除此之外，台湾大都是借用原来的英语书面形式”。史有为将台湾放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来进行探讨，切入的视角相当新颖，分析独到。

邵敬敏则将香港方言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来进行多维的比较研究，他在《香港方言外来词比较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00（3）]一文中，首先把上海方言和香港方言中的外来词作了纵向的比较，指出彼此不同之处有三点：音译时由于方言的语音系统不同，所用汉字不完全相同；上海方言外来词有强烈的政治、经济色彩，而香港方言外来词则更富于生活色彩；外来词多数是名词，动词极少，当年上海方言里也有一部分动词外来词，主要是打球时的用语，而香港方言现在常用的动词外来词只有极少数跟上海方言是相同的，例如“开麦拉”，大多数则不同。其次，又将香港方言和普通话的外来词作了横向比较，认为它们之间的异同有以下几点：有些词语，普通话用的是意译词，而香港方言用的是音译词；普通话和香港方言用的都是音译外来词，同义但不同形；普通话和香港方言也有相当一部分外来词是同义同形的。文章最后进一步指出：“跟普通话和中国其他方言相比较，香港外来词的数量特别多，使用频率特别高，品种也特别全。除此之外，香港方言的外来词在使用过程中，还显示出其他一些重要特点。”它们是：外来词的派生能力和组合能力都特别强；在引进过程中，尽量加以“汉语化”；汉语中直接插入英语词语，这在科技文章里最为明显；此外，双音节化和多音节化，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向。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吴建中《汉语外来词的地域差异分析》[《语文建设》，1987（4）]、路广正《港台地区外来语译名问题浅探》[《文史哲》，1996（4）]、吴慧坚《试析广州话中的英语外来词》[《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7（3）]、谭海生《en 与广州方言外来词》[《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9（6）]等。

（四）外来词源流考察

外来词源流的考察并不占据外来词研究的中心位置，也没有引起人们特别是语言学工作者太大的注意和兴趣，目前所见到的有关外来词源流的研究尤其是早期的这种考证研究，“大多因史地、博物、民族研究的需要而附带进行”^[63]。根据史有为《外来词研究之回顾与思考》一文总结，1949年前，较为专注于外来词考证的学者“有陈垣、冯承钧、冯家升、韩儒林、向达、季羨林、岑仲勉、郭沫若等。如冯家升在《匈奴民族及其文化》（1937）中对匈奴语来源的外来词的考证，徐复在

《阙氏音读考》(1945) 中对匈奴皇后(或君主正妻)名号的读音考证,岑仲勉在《冒顿之语源及其音读》(1948)中对汉初匈奴单于冒顿其名的考源,韩儒林在《突厥官号研究》(1940)中对早期突厥官名词源之考证,冯承钧《西域地名》(1980年再版,朱峻岭增订)中对西域地名的考证与汇释”。新中国成立以后,外来词源流的考证仍然未见勃兴,表现在发表的论文数量少,研究不全面、不系统。当然,就论文研究本身所涉及的内容来说,也还是获得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成果。张清常对汉语中的一些蒙语借词进行了考证,他在《漫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中国语文》,1978(3)]中指出,像元曲中的“大辣酥、打刺孙、答刺孙”等其实是蒙语[taras](黄酒),元曲里“赛娘”其实是简化蒙语[sain](好)而来,车站的“站”是借蒙语[tcam](路)而来等。胡增益在《满语的bai和早期白话作品“白”的词义研究》[《中国语文》,1989(5)]一文中对《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中副词“白”的某些用法和意义做了考察,认为是满语bai/baibi的借用。朱庆之在《汉语外来词二例》[《语言教学与研究》,1994(1)]中分析了“爹爹(大大)”和“疙瘩”的来源,指出它们都源于古印度梵语,前者对应于梵语中的tāta,后者对应于梵语中的Grath(grantha/grathana/grahita/granthi)。

值得指出的是,意大利学者马西尼专门撰写了《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黄河清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对不少外来词,从其最初产生到后来的具体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分析了1840年至1898年发生的历史、政治、社会事件及对现代汉语词汇形成的影响,说明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不仅仅是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语言试验的成果,而且也是在白话文向国语的地位进化过程中,受西方语言文化影响的结果。其影响主要从两个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加速了白话文向国语地位过渡的进程;大量的借词、译词、新词的引进与创造影响了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64]。它填补了外来词研究在该历史时期的一个空白,是外来词研究中的突破和闪亮之处。

(五) 外来词的规范

外来词自产生以来,有关对其进行规范的讨论时断时续,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高名凯、刘正琰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便列专章论述了外来词规范的原则问题,提出了“三一”原则和“二并原则”。前者是指“一词一音一字”的原则,包括“通行原则”、“语音原则”、“简易原则”、“历史原则”、“语义原则”、“语法原

则”等；后者是指“异形并存”原则和“异格并用”原则等。80年代后期起，外来词规范研究的视野得到进一步的拓宽，所论外来词的规范，已经不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大陆，而是谈到了大陆、台湾、港澳和其他地区的华人社会之间外来词的统一问题。李乐毅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的统一问题》[《语文建设》，1990（2）]中，首先指出了外来词在地区上的种种不统一性和使用上的地区性，比如像“卡曲”、“沙展”等仅在港澳地区使用，像“组屋”、“罗地”等只在新马地区使用，像“柏文”、“布斐”等只在美加地区使用等，然后，作者从过去已经基本统一或规范化的大量的汉语外来词的实例中总结出了汉语外来词发展变化趋势：音译的往往让位于意译的；音节多的往往让位于音节少的；不合汉语构词法的往往让位于符合汉语构词法的；不能“意会”或“联想”的往往让位于能够“意会”或“联想”的；生僻难懂的往往让位于浅显易懂的；不能获得权威部门承认的往往让位于能够获得这种承认的。作者据此认定：“总起来说，外来词统一的主要规律是‘约定俗成’；统一的过程也必须而且只能通过‘约定俗成’才能达到。”最后作者提出：为了促进外来词的统一和规范，我们应该尽量不去用那些已经或者逐渐被淘汰的旧译名；应该对那些生搬硬造的和洋泾浜式的译名加以整理和淘汰；是否可以采取一些步骤，逐步统一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人使用的那些尚未统一的外来词译名。周定国在《谈汉语音译外来词规范化》[《语文建设》，1994（10）]一文中对商品、公司的译名规范进行了专门的探讨，他首先分析了现今商品译名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绝大多数商品外来词译名出自操闽、粤方言的人士包括港台籍人士，译名所用汉字读音多据闽粤方音”，“一些来源于外国人名地名的商品译名与国内流行的人名地名的译法不一致”，“在汉语外来词缩略方面也需要予以规范”等。此外，作者还对日语专名的汉译处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作者主张国家有关部门应成立专门的机构来对外来词命名的公司、商品名称进行审批，作者提出，商品、公司名称的翻译应遵循这么几条原则：译名用字原则上应参考中国地名委员会制定的50种外国语译音表汉字；外国人名地名的译名原则上应与中国地名委员会颁布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的译名、新华社编纂的《外国人名译名手册》的译名一致；考虑到商品译名用字的特殊性，首音节在音准前提下可选择同音字替代，尾音节在需要时可选择音近的汉字译名；日语商品名称原则上采用汉字转抄，不宜采用音译。史有为在外来词规范

上有比较深入的思考，所做的研究力求从根本上来解决悬而未决的老大难问题。他在《外来词对接诸问题》[《语言文字应用》，1996（1）]中分别就人名地名和文化词的对接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作者主张，“‘名从主人’从来都是相对的。同是使用罗马字母的不同语言之间的人名地名对接都不能完全的只从主人之音或只从主人之形。对于现阶段的汉语也必然如此，在音和形两方面都不能完全单一依从其中之一，而需要在二者之间保持一定的弹性和张力。而且我们绝对不能从根本上放弃‘从义’（意译）。因此，在对‘从义’做出暂时限制和保留后，仍然需要为‘从音——从形’的类型提出新的对接模式”。这就是或者“汉字转写”，或者“拼音转写”。作者认为，拼音转写是个弹性较大的方案，需要配备具体的转写转读规定。其建议可拟订这样的对接或转写原则：“外来人名地名转写为汉语罗马字形式应在适合中国人发音的前提下，在‘从音’与‘从形’二者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基本能保持原音，而且汉语又能接纳的条件下，尽可能地移用原形或国际标准罗马形式，即基本上‘形从主人’；当‘形’难以在汉语中转读或转读后距离原音过大时，则尽量靠拢原音，即用‘音从主人’加以适当约束。”对于汉字文化圈内其他语言的人地名，作者主张应维持原有对接方式不动，即基本上仍使用以“从义”为主的方式。文化词中的科技术语，“应以世界大多数语言认可的形式作为对接的基础，但又必须适应本族语言的语音语法特点，照顾固有的习惯，也就是既要尽可能的国际化，又要适当的本土化，在这二者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这样，“对于基本单位的术语，凡汉语固有且使用已久的或早已根植于日常汉语的，不必强求进一步国际化”，“基本单位中凡主要限于科技的新造汉字术语，尤其是稀土元素、放射元素，一般可参照新拉丁文或英文形式，在除去构词的类别词缀外按人名地名办法拼写”，“对于合成物质，如化合物，基本上遵照汉语中现行构成方式调整术语”。作者认为，“对于各个社会特有的一般文化词，不必强求对接，可以顺其自然，音译、意译任意选择，因为这原是民族性很强的，并不要求世界都接受它们，它们也并不都能融入各个语言”。作者指出：“在某种情况下，‘无为而治’是最恰当的方法，就是说，在语言规范化方面也宜乎采取‘柔性’方针，只是对待一般用语要比对待术语需要更多一点柔性。”

此外，还有学者对外来词的结构进行了分析。这方面的文章有：沙平《同形替代法与汉语外来词的语素构成分析》[《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

校学报》，2000（1）]、张绍麒《现代汉语外来词中流俗词源现象初探》[《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7（2）]、周洪波《外来词译音成分的语素化》[《语言文字应用》，1995（4）]、倪立民《鲁迅著作中的外来词研究》[《杭州大学学报》，1997（3）]、王艾录等《外来词的内部形式化倾向》[《世界汉语教学》，1998（3）]。

三、新词语、旧词语、古词语

（一）新词语

20 世纪新词语的产生大体上表现为三个高潮，“是以三‘新’为三个高潮的起点：一‘新’，是新文化运动（1919 年五四运动）；二‘新’，是新中国建立（1949 年）；三‘新’，是新时期开端（1978 年）”^[65]。但对新词语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却并没有形成相应的三个高潮。新词语产生高潮的第一个时期，针对它们而进行的研究目前所见到的文章基本没有。王了一《新字义的产生》[《国文杂志》，1942，1（2）]虽冠以“新字义”并刊发在这一时期，但作者实际上只是结合词汇史来分析词语意义的演变情况，与新词语的讨论并不相关。此后的一个时期，对新词语的关注有所增强，表现在一方面，新词语材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已经有了起色，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编著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商务印书馆，1959）中专门辟出“五四以来汉语词汇的发展”，将新词语一一列出；《新词语》（文字改革出版社，1962）一书，更是将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的词语以及一些固定的句子千余条悉数列出；另一方面，针对新词语而展开的研究也已开始。向超在《关于新词和新义》[《语文学学习》，1952（1）]中明确指出：“新词语并不单指新造的词”，也指“有了新的意义和新的用法”的旧词。认为新词有四种构成方式：以旧词作为基础，孳生出来新词；赋予旧词以新的意义和新的用法；以自己的语言规律为基础，借用别种语言的词；以旧词为基础，另造新词。这种分析、观察相当仔细，基本上概括了新词语产生的各类方式，这在当时应该说相当不容易。王勤、武占坤谈到创造新词时指出，“首先，要符合现代汉语的构词规律”，“其次，新词的意义力求明确，妥帖”^[66]。今天看来，这些观点对指导新词的创造仍然有积极的作用。此外，武占坤还撰文就新词创造过程中的“偶发词”现象进行了分析，将倪宝元认定的“临时性的字的组合”^[67]看作是“词”，“只是它不是一般的词，而是在说话过程中，根据修辞需要，临

时创造的‘偶发词’”^[68]。

不过，总体上，新词语产生的前两个高潮时期并没有带动新词语研究走向高潮。真正对新词语展开大规模集中研究应算是改革开放之后的80年代，特别是在吕叔湘于《辞书研究》[1984（1）]上呼吁“大家来关心新词新义”之后。自此而后，学者们便就新词语涉及的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观察和分析，“研究呈现出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和立体化的趋势”^[69]，并且，研究的深度和理论性等也有不同程度的加强。关于新词语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上。

1. 新词语的界定及其范围

自新词语提出以来，围绕如何界定它而费尽了思量，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出现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

一是什么样的词语算是“新”的。在这方面，根据王铁昆〔《新词语的判定标准与新词语词典编纂的原则》，《语言文字应用》，1992（4）〕的归纳，就有四种意见：（1）是否具有普遍性，如“新创造的但还没有被普遍接受的新的词或短语”。（2）是否具有“新鲜感”，“新词语的个性就是‘新鲜性’”^[70]。（3）词语所指称的事物或概念是否新，如“为表示新事物或表示新概念而创造的词”。符淮青认为，“新词就是新创造的词。它或者指示的对象是新的，或者代表的概念是新的，同时它的形式也是新的”^[71]。（4）词典是否收录，如“所谓新词新义，是指现有的语文词典未收的词目或义项”。王铁昆认为：“新词语是指一个新创造的或从其他语言中新借用过来的词语，也指一个产生了新语义的固有词语。这里的‘新’是个相对概念，有一定的时限性在起作用。其中，‘新创造的’既包括代表新事物、新概念的词或短语，也包括不表示新事物、新概念的词语的新构成。”^[72]此外，还有些学者并不纠缠于如何界定新词语上，而直接以某一时限作为标准，比如张家太和赵世开在各自的《汉语新词语琐议》〔《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8（2）〕和《当前汉语中的变异现象》〔《语文建设》，1988（1）〕中都以1979年为起准线，而赵克勤则在《论新词语》〔《语文研究》，1988（2）〕中将新词语的起点划在“新中国成立后”，葛本仪认定，“所谓新词就是指刚产生的词，或者是产生后使用的时间还不长久的词”^[73]。与“新”的理解紧密相关联的是，新词语中的“新”能永远保持下去吗？陈原就曾这样指出过，新语条在进入通用语条库甚至进入常用或基础语条库后，“新语条就不是‘新’的了”^[74]。赵克勤也指出：“‘新’与‘旧’是相对的，而

不是绝对的。‘五四’以后进入现代汉语的词语，对于‘五四’以前来说是‘新’的，然而与现在的新词相比，则是‘旧’的了。”死而复活的古语，“我们认为也应该算”新词语，“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不同的语言环境里使用这些古语，使它们有了新的生命、新的面貌，有些还产生了新的意义，当然应该把它们列入新词语”^[75]。刘叔新更是给新词语划定了一个大概的时限，认为新词语“存在超过一定的时期，比如说15~20年左右，大家都很熟识了，新鲜的性质消失净尽，它就退出新词语的范围，转为普通的词语”^[76]。

二是词语的新义、新用法等是否应该定义在新词语的范围之内。不少学者主张将新词语和词语的新义分开来，并以新词、新语、新义来并称，比如赵金铭等。也有些学者则将凡是新出现的包括意义和用法等统统纳入到新词语的范围中来，如赵克勤等，认为“新词语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新词形，也应包括旧词形所包含的新意义”^[77]，沈孟璆所说的新词语，“一般指反映新事物、新现象、新概念的新词、新语和新义”^[78]。她还分析道：“固有词语赋新义新用法，虽然没有增加汉语词汇总量，但是却使词汇的质上发生了变异，其价值并不亚于新造出的词语，这也是一般新词语研究者把新义新用法也包含在新词语范围之内的缘由。”^[79]王铁昆主张新含义、新用法包括在新词新语中^[80]，符淮青在该问题上针对旧有词语增添新义的不同情况而做了不同的处理：“形式是旧的，有了新义，新义和旧义有明显的联系，这样的词不是新词”；“有些词代表新概念，在形式上同历史上曾出现的词相同，但意义毫无联系，这种词应算新词”^[81]。

三是新词语指称的是刚刚出现的所有新单位还是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已经具有一定稳定性的新单位。陈原指出，如果导入的新语条符合四个条件，就是“它确实是必需的，无法代替；它的构造符合语言规范和社会习惯；它能准确地表达这种新的思想或概念；它容易上口，能很快被人接受”，那么，“这个新出现的语条就会‘传’开去，也就是所谓‘流行’。经过一定时间的应用，有时在特殊语境中经过权威机构的认可，这个新语条就进入通用语条库，甚至进入常用或基础语条库。到了这时，新语条就不是‘新’的了”^[82]。显然，陈氏这儿的“新语条”其实是有所限制的，而非囊括新出现的一切单位。陈氏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后来不少学者的响应。葛本仪认定，“新词应当是虽产生不久但已被社会公认和使用的词，那些新产生的未被社会公认的生造词，不能算作新

词”^[83]。武占坤、王勤二位将新词语与偶发词语相对立来提，其实质也是将新词语限定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认为“新词是适应社会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经过运用的鉴定，为语言所接受的”^[84]。赵克勤认为，“不能把所有新产生的词语都认为是新词语，这就是说，确定现代汉语新词语应该有一定的标准，一定的原则”。作者主张，首先要看其是否具有规范性，即是否得到了整个社会的承认，进入了普通话；其次，要看其是否具有稳定性。新词语只有经过相对的稳定才有得到全社会承认的可能。因此，那些昙花一现似的词语，也不能算做现代汉语新词语。^[85]刘叔新也指出：“一般一个词语不仅从无到有地出现，而且得到人们普遍认可，广泛地使用了开来，在语言词汇中立稳了脚跟，就可以认为是新的。”“新词语，总是经过一定时间的考验，在人们的使用中具备了稳定的复呈单位的性质，才成其为新词语的。因此所有新词语，都能取得现代词汇成员的资格。”^[86]作者主张：“不能把刚在个别人的言辞话语中冒出来的新的称说单位同新词语混为一谈。”^[87]与此同时，另有一些学者则没有将新词语区分成不同情况来对待。赵金铭指出，“近年来，报纸、广播中出现了大量的新词语，既是新出现的，就要经受社会生活的考验。所以，有些新词语还不太稳定；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要求词语立刻反映它，而有些新词语的概念，也需要这些变化相对稳定后才能确定”^[88]。在新词语界定目前尚未形成统一意见的情况下，张志毅、张庆云干脆将新词语分为“广义的新词语”和“狭义的新词语（进入民族共同语的、具有稳定性和规范性的）”^[89]两类来说。

关于新词语的界定，需要站在语言的基点上，通过挖掘它们在语言方面表现出来的种种性质来确定，这样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新词语的定义问题。

2. 新词语的概貌

重视新词语语言事实并对它们做出描写，这是新词语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青睐。朱永锴、林伦伦在《二十年来现代汉语新词语的特点及其产生渠道》[《语言文字应用》，1999（2）]中将改革开放20年来产生的成千上万的新词语做了一个粗略的分类，把它们分成“人物名称、事物名称、动作行为、时事政策、法律制度、科学技术、生产建设、经济贸易、商业服务、社会生活、教育学习、观念心理、衣食住行、文体娱乐、卫生保健、婚姻家庭、其他”17类，基本上反映出了新词语在社会生活中的大致面貌。

全面反映社会生活的新词语，它们表现出来的特点十分突出。张家太在《汉语新词语琐议》中就曾分析了汉语新词语的形式标志：双音节合成词是新词语的主要形式；派生词大量涌现；三字格词语日益增多；四字格短语有转化为成语的趋势。季恒铨等在《试论新时期的新词语》[《语文研究》，1989（4）]中指出新词语呈现出来的特点和趋势是：有些语素的构词能力，有逐渐增强的趋势；词语的搭配，较以前更加灵活了；整个词汇系统更加精密化，呈现出一种系列性趋势。这里指出的“系列性趋势”，在以后的词汇发展中得到了强有力的验证，为此，欧阳俊鹏撰文对此词汇现象进行了专门的分析，并指出词群体现了相似性原则、类的思想和语言内部的约束功能等。^[90]张志毅、张庆云对新词语表现出来的特点做了这样的归纳：术语增多和普通化的趋势；缩略语的增多的大潮；外来词语增多的趋势。^[91]赵克勤认为新词语表现出的特点有：简略语所占的比重较大；多音节词语增多了；比任何时代的词语更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92]朱永锴、林伦伦总结出的有关特点则更为全面、细致，他们指出，“大量新词语的出现，从构词到产生的过程都有各种各样的特点”，并具体罗列出了各种特点达9种，主要是：音节趋向多音化；多简缩形式；容易出现仿造词语；夹用外文字母或全部使用外文的词语越来越多；口语性和形象性；单义性；新词一旦作为单音节语素使用，其构词能力极强；新词语中有一部分属于委婉词语；新词语的生疏性较大。^[93]李振杰在《台湾新词语管窥》[《语言教学与研究》，1990（1）]中具体分析了台湾地区新词语的产生情况，并指出它们与大陆新词语的不同特点，作者认为：（1）用数字组成的新词语台湾很少，而大陆却很多；（2）新词语中的四字格和成语，台湾很少，而大陆却很多；（3）新词语中的外来词语台湾多于大陆，其中音译的比较多；等等。

新词语的意义也是新词语概貌描写中的重要部分。这方面，沈孟璿做了不少研究。她发表在《文史哲》[1986（6）]上的《新词语词义之概貌》和《语言文字应用》[1995（4）]上的《关于新词语词义表面化倾向的考察》较有代表性。前者从新词语重视“词面义”这一角度来揭示新词语的内涵、固有词语衍生新义的途径等，后者则从新词特别是联合型新词、外来词的“汉化”“意化”过程、新四字格与成语的相异性以及固有词义发展等方面考察，认为“现阶段相当数量的新词语有通过词语表面义揭示整个词语的倾向”。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前后发

表的两篇论文中都列举不少实例（主要是固有词语意义上的发展变化）说明，在词汇这个统一的聚合体内，“词汇是一个有机整体，词在词汇里不是分散、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着，一旦出现新词新义就导致词义内部调整”。沈氏抓住了新词语在意义表现上的特点，得出的结论很令人信服。周洪波则从词语的新义入手，深入观察了新义出现的基础和来源，认为潜义的显义化是新义产生的一种重要方式。^[94]周氏的研究表明，新义其实并不如一般所想象的那样完全是意义的重新创造，而恰恰是对潜义的一次再发掘和再利用。而且，由于潜义存在一定的语言现实基础，由它而显现出来的显义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同。新义的这种产生方式相信会为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越来越多地利用。

新词语的构成方式总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内容。沈孟璿在其《新词语构成特点纵览》[《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4）]中专门讨论了新词语构成的方式。她指出，新词语的构造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新词仍以句法构词为构词主要手段，其中偏正、动宾、联合型的合成词最多；（2）新外来词有音译、半音译半意译两大类，并有从香港传入按广东音读的新外来词；（3）出现有广泛构词潜力的新的词缀化现象；（4）新词的语音形式双音化仍占优势，三音化日益增多；（5）简缩法造词发展；（6）以三字格为主体的新惯用语增长迅速；（7）某些新四字格在语言中逐渐定型；（8）十年动乱产生的所谓“新的历史词语”在构成上以对比式造词、突发性词缀化和简缩法盛行为突出特点。王海棻在《汉语新词结构方式试析》[《语言教学与研究》，1990（4）]中，对新词语中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结构方式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名词的各种结构方式中，偏正式占主导地位，并列式、重叠式、附加式屈指可数”。不过，更多的学者还是从词语产生的角度来探讨。沈孟璿在《修辞方式的渗入与新词语的创造》[《山东大学学报》，1988（3）]中把通过各类修辞方式而产生的新词语归纳为比喻、借代、仿拟、婉曲、夸张、移用、转类、节缩、摹声、双关等类别加以分析，并认为“现阶段通过修辞方式的渗入创造的新词语，对汉语词汇的影响作用其实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词义的客观存在；优化了民族语言的表现力，增添了语言的艺术美感；能鲜明地反映社会的风貌和人们的心态，其中还具体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就是语言文明、讲究效率和语言趣味性等。季恒铨等探讨了由比喻、借代等修辞格形成的新词语，并顺便分析了该类词语的时代特色、词义的模糊性和这类词语的

“寿命”问题。作者经过初步考察后认为，由修辞格形成的新词语，它们的“寿命”是长是短，主要取决于人们使用这种说法的情况，即“约定俗成”的程度。作者认为，“这类词语总体上说具有相当的临时性，很难，或者说只有少部分词语能进入一般语词行列，保持较长期的稳定性”。作者指出其原因有三点：（1）这类词语所要表达、反映的客观事物本身，有相当多数属临时或短期性的社会事物、现象。（2）从语言发展的自身规律来看，汉语发展到今天，它的基本词汇很固定，一般词语也已相对稳定，一个新词语若要流传开来，稳定下来，成为汉语词汇中一员，必须有客观表达的需要，为其他表达方式所不能代替。而比喻和借代形成的词语中，不少词语词义带有相当的模糊性，表达上也可能用其他方式代替，流传使用中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受社会不同群体文化层次的限制），这样，就使它们转化为一般词语的可能性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加之这类词语“表情”色彩较浓，往往多用于口语，也就不大容易进入正式公文、科学论文等文体。（3）比喻和借代形成的词语里有不少表达种种复杂的情感，而人们的情感往往受各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又因人因时而异，个人成分占很大作用。这样，也使这类词语的传播受到一定的局限，转化为一般词语的可能性受到影响。^[95] 胡中文的《试析比喻构造汉语新词语》[《语文研究》，1999（4）] 则从词的内部形式着手，对比喻式汉语新词语进行了分析，认为“运用明喻手段构造出的复合词和固定短语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本体和喻体语义关联比较明晰。复合词或固定短语的字面意义通过这种比喻式的关联，能大致体现出这个词和固定短语的实际意义，表明它的实际所指对象”。“而运用借喻构造出的词和固定短语则大不一样。它们都是以一个整体形式作为喻体的，本体不出现，因此，词或固定短语的内部形式不太明晰，字面意义与实际意义的比喻关联比较曲折，不能直接地反映所指对象的内容。”岳长顺还对类推创造新词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类推造词可以区分为修辞式和非修辞式，并认为，“通过研究类推造词，我们发现，类推词与原型词可以形成一个聚合”，“从类推的角度研究新词在词汇中的地位，这样纷繁的新词就显得有条理了，词汇发展的脉络就会更加清楚”^[96]。

这一时期，对方言区新词语的研究也有探讨的文章。王健伦、梁道洁在《穗港新词试析》[《中国语文》，1992（2）] 中，详细讨论了穗港新词在造词方式上的灵活多样性，具体列出的达10种，分别是：形象比喻法、引申推延法、幽默借代法、美好音译法、中西结合法、直接修

饰法、简练缩写法、强调法、委婉表述法和其他。邓景滨的《港澳新词语构造八法》[《暨南学报》，1996(4)]指出，“港澳新词的构成方式灵活多样：既有汉语中的常规构词法，如单纯词以及合成词中的联合式、偏正式、支配式、述说式、重叠式等；也有别具创意、能产量大的另一些构词方法”，它们主要是：谐译法、合璧法、仿译法、派生法、类化法、修辞法、缩略法和翻新法等。该文与王健伦、梁道洁文互为参照，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粤港澳在新词上的构成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根元主持的“新词新语新用法”研究课题组从1991年起按年份将当年出现的新词语收集、分析、整理、归纳，这对人们更好地把握新词语的时代性极为有益。

3. 新词语与社会、文化、民族心理等

用美国学者布赖特提出的“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理论来分析社会和新词语的关系，这是新词语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这方面研究较早的是陈原。他在《关于新语条的出现及其社会意义》中指出：“任何新语条的生成（出现）都必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无论是社会因素的变化（例如社会结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风俗习惯等等），还是科技因素的变化（科学和技术发展中的新发现、新发明、新工艺、新突破等等），都必然反映到作为交际信息系统的语言，特别是最敏感地反映到语条中。”“社会语言学家对新语条的出现应当给予极大的关心。即使出现了将来肯定被淘汰的新语条，社会语言学家们仍然要付出足够的精力去搜集、比较和分析，并评定它们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赵金铭的《新词新义与社会情貌》一文分“新词”和“新义”两部分探讨了它们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新词”部分作者以“一般新词”、“意译新词”、“专业新词”、“新缩略语”、“转化而来的新词语”以及“复苏词”分别展开论述，“新义”部分又分“新的引申义”、“新的褒贬义”和“新的比喻义”来进行阐述。这里以“专业新词”为例简单说明作者是如何阐明它们与社会情貌的关系的。作者指出：“从科技部门或某种职业的特殊用语中借用词语，充实一般词汇，是存在于各种语言之中的普遍现象，但借用哪些词则跟这种语言使用的社会环境有关。”并举例说，“近年来风沙比以前大了，河里的鱼虾比以前少了，人口却增加了不少，于是一些专业词语，如‘生态’‘植被’‘绿化带’‘优生’‘噪声’‘分贝’，一般人也使用起来了”。作者以相当丰富的新词语材料实现了文章的写作目的：“从词汇的发展及词义的变迁中，窥测社会生活

和人们思想的变化。”张家太在《汉语新词语琐议》中，从与新词语产生相关的五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它们与社会生活的共变关系。作者指出：

(1)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与社会各个方面直接发生联系。社会上出现了新事物、新概念，要求用新词语来表达，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人们交际的需要，所以人们就利用原有词的材料，创造许多新词语。

(2) 词语是客观对象在头脑中的概括反映，是假定性的符号。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人的思维能力不断提高，对原有的客观对象由不认识到认识，由肤浅到深刻，于是创造一些新词语或改换旧的名称。

(3) 新词语的产生，不仅表现在它的数量上，而且还表现在它的质量上。我们衡量词语质量的好坏，主要是看它负载义项的多少，使用频率的大小等。在原有旧词的基础上，增加新的义项，这是社会急剧发展的需要，也是语言交际要求尽量简洁经济的需要。

(4)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国策，与其他国家交往日益频繁，引进了许多新事物、新概念，需要用相应的新词语来表达；我国经济实行对内搞活的政策之后，国内地区之间各个方面交往日益增多，方言区人民与内地人员接触频繁，一些富有表现力的方言词进入普通话词汇，为全社会成员所普遍运用。吸收外来词、方言词是创造新词语的途径之一。

(5) 当代社会是知识爆炸、信息倍增的社会。人们珍惜时间，讲究效率，要求用少量的词语表达丰富、周密的思想。为适应这一社会需要，大批的缩略语应运而生。陈建民先后发表的《口语里的新词新语与社会生活》[《语文建设》，1991(9)]和《汉语新词语与社会生活》[《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8(2)]也就新词语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探索，而且还有不少新的发现。他在前一篇文章中指出，“有一部分新词新语的出现主要是社会生活变化的结果”。接着作者具体举出了其中的四类：“第一种是由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改变，一些已经消失了的老词一个个地复活起来，以新词的姿态出现”，如“老板”、“小姐”等；“第二种是近几年来，随着香港经济的繁荣、大陆对香港向往意识的增强，香港的一些词语悄悄地进入了普通话，成为汉语口语的新词语”，如“度假村”、“发廊”等；“第三种是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有些口语词出现了新义新用法，有的由贬义变褒义……有的由褒义变贬义”，如“竞争”、“大锅饭”等；“第四种是新造的词”，如“理顺”、“倒挂”等。他在后一篇文章里的分析更为细致和广泛，他指出，从不断涌现出来的新词语里可以观察到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政治生活面貌、经济发展形势及新旧之间的矛盾等。

作者观察细致，分析的社会现象较为独特。比如，作者举“老”为例，比较了新加坡和中国在该词理解和用法上的差异，指出新加坡人怕“老”而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特有新词“乐龄”，以“乐”代“老”，含有“安乐、快乐、享乐”的意思，而且衍生出一组新词语“乐龄村、乐龄周、乐龄中心、乐龄大学、乐龄俱乐部”，而在中国则老老实实以“老”相称，于是而有“老龄化、老龄社会、老龄大学、老龄委、老年公寓、老年迪斯科”等新词语——以此说明不同华语社区特有的汉语新词语所反映的各地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很具有说服力。这方面的讨论文章还有季恒铨等的《试论新时期的新词语》等。

4. 新词语的规范

新词语和生造词语都以“新”的面貌出现，这使得生造出的词语可能鱼目混珠，因此，新词语的规范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学者们为之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讨。侯敏在《关于新词和生造词的判定标准问题》[《语文建设》，1988（2）]中明确提出，应该将社会是否确实需要作为衡量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标准，而这种需要表现在或语义的需要或经济的需要或修辞的需要；词语自身如何（表义明晰准确、构词合乎规律、语音上没有混淆的可能）则是第二条新词语的判定标准。作者特别强调，这两条标准并非处于同一层次上，“社会交际是否需要这一标准是第一层次上的”。王铁昆的《新词语的规范与社会、心理》一文，首先结合社会发展而提出了新词语规范应该遵循的“必要性”、“明确性”、“高效率”等原则，并指出这三条原则不应偏废，而应全面衡量。此外，作者从民族心理对词语制约作用的角度，讨论了当代人在词语的创新和使用上的几种倾向：趋新、趋雅和趋和谐。王氏的观点，给词语的规范提出了一种新的视角，值得重视。姚汉铭在《试论新词语与规范化》[《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1）]中提出的新词语规范的原则包括“填空性原则”、“明确性原则”、“效率性原则”、“互补性原则”等，并一再强调这些原则之间是平等的，彼此间是选择的关系。此外，有些学者则主张从众和需要是规范的根本原则，认为凡是为语言交际所需要的词语，都有其存在的价值。^[97]张志毅、张庆云的观点则更为明确，所谓规范，“就是合乎规范的选择过程和选择结果”，提出“词竞众择，适者生存”^[98]。

周洪波发表在《语文建设》[1996（2）]上的《新词语的预测》，从预测科学的角度分析了哪些单位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可能由潜词或词语的

潜义转化为现实的显词和显义。作者在新词语预测上采取的策略是，“根据已经显现的词语来反推那些尚未出现的新词语”，并具体列出了其中的三种：仿造、简缩和合力。比如，作者根据“人”和“命”组成“人命”、“狗”和“命”形成“狗命”的情况预测道，大凡表示动物类的词语总是可能与“命”有缘的，因此，像“鸭命”、“鱼命”、“马命”、“鸟命”等都会有出现的可能性，他甚至指出，表示植物类的词语也是有可能跟“命”组合的，诸如“树命”、“花命”、“草命”、“苹果命”、“香蕉命”、“橄榄命”等。在对新义的预测上，作者着眼于语素义之间的排列组合，认为很多潜义是由于显词中有一个多义语素引起的，比如“评模”和“名模”，其中的“模”既可以是“劳动模范”的简缩，又可以是“时装模特儿”的简缩，由此而可以预测，“评模”也可能有“评选时装模特儿”这一潜义，“名模”也可能有“著名的劳动模范”的潜义。周氏对新词语预测的研究很有意义。新词语的预测由于有一定的策略作基础，因此，预测出的新词语自然同现实存在的词语有广泛的心理联想的基础，一旦由潜词而转化为显词，被社会接受的可能性很大。也就是说，新词语的预测研究工作，为新词语的规范工作开辟了一种新的思路，变通常的“事后追认”为“提前干预”，为更好地发挥语言研究者在新词语规范上的作用提供了可能，使其可以更好地为语言规范服务。

（二）古词语、旧词语

1. 古词语

古词语是现代汉语共时层面上提出来的一个术语。20世纪50年代，张世禄认为它们“不但不属于现代语的基本词汇，而且也不属于现代语的一般词汇”^[99]，对此，卢绪元撰文指出应该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就文言与白话的区别来谈文言词的特点；另一种是就作为普通话词汇组成部分之一来谈文言词的特点，并认为现在所讨论的是属于后者。^[100]卢氏的这种意见后来被证明是对的，现在已经广为社会所接受。

古词语的性质照张世禄看来，有三个方面：历史性的、陈旧的和书面性的。^[101]很显然，作者这里所指称的古词语其实性质较为杂陈，实际上它还包括了通常所说到的历史词语等。比较而言，卢绪元的认识更合理些，他认为：“所谓文言词，是指那些由古代传下来而为现代普通话所吸收的具有文言的特点和风格的有生气的词，一般多用于书面，有些在口头上也很习用。”^[102]王勤则从汉语古今传承的角度，分析了古代汉

语词汇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不同情况，指出了那些“保留古代汉语词的某些特点，但仍有一定的生命力和表现力，能够满足现代人的交际需要而进入到现代汉语词汇队伍中来”的单位是古语词，并指明因保留古代汉语特点而还“带有一定的‘古’的色彩”^[103]。这与葛本仪的认识不同。葛氏认为古语词包括三类：一种类型是反映着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事物的词，如“状元”、“宰相”等；另一种类型是古代神话传说中出现的一些词语，如“天庭”、“仙女”等；第三种类型是一些在古代汉语中曾经运用过的词，现在已经不用或很少应用了，但是有时由于某种需要，或者为了达到某种修辞目的，人们又选来重新加以运用，如“乌纱帽”、“茶博士”等。^[104]作者将历史词语纳入到古语词的范围中来，这与人们对古词语的通行认识不一致。虽然武占坤将历史词汇和文言词汇分别成不同的类别来看待，但作者将历史词汇当作是现代汉语词汇中的一部分这一点，倒是和葛氏的意见一样，认为“现代汉语里历史词语的总汇，就是历史词汇”。既然“表达的事物，和人们现实生活联系极少”，“只有表述这些历史事物或达到一定修辞目的时才用”^[105]，这就很难说它们也还能算做现代汉语词汇中的成员，即便是其中的一般词汇。这一点上，符淮青的观点值得重视，虽然他也将“历史词语”和“文言词语”并列提出，不过，作者在对待历史词语的态度上同武占坤不同，他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包括神话传说中出现的人、事、物的名称，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仍有作用，仍为大家所熟悉，就不应叫历史词语。”^[106]很显然，作者是将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词语排除在现代汉语词汇成员之外的。

刘叔新认为，“古词语是产生、流行于古代而只在现代书面语中沿用下来的词语”，并说明，“古词语除了许多都是古代文言所使用的词语，还包含一些在古代白话著作或白话作品里出现过而后来一直用在白话文书面当中的单位”^[107]。刘氏的看法有两点值得重视：一点是将白话作品里的一些单位纳入到古词语的范围中；另一点是将固定语引入古词语中来。其实，把固定语纳入古词语来考虑，刘氏并非第一人。周祖谟早在《汉语词汇讲话》中就指出：“在现代汉语里还有很多由古代传下来的文言成语，这也是文言词语的一部分。”^[108]但对此着力予以阐明并大加推广的要算是刘叔新。王吉辉结合刘叔新的有关论述，紧紧抓住语言自身的性质特点，认为古词语表现出来的本质特征是它们所具有的书面语色彩和带有“古代”的背景色彩，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古词语确

定的两个前提性条件，分别是共时性原则和使用性原则。这种研究为古词语的确定与划分找到了标准，较之以前显然是一种进步。

2. 旧词语

旧词语的提法最早见于《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前言”部分。而刘叔新则是对此较早做出研究的学者，他把“一些曾是现代早些时候流行”，后来“很少再为人们使用，甚至被人们摒弃”的词语归为旧词语，指出“之所以称它们为‘旧词语’，就因为本是现代存在过的，不同于古代消亡了的词语”^[109]。而在《汉语描写词汇学》中，他还谈到了旧词语的复活现象，举出像“明星”、“学分”、“小姐”、“时装”等，“重被社会各阶层的人所接受和使用”。刘氏强调，“旧词语还不算死亡了的词语，还是现代词汇的成员”^[110]。王吉辉从如何判定旧词语的角度讨论问题，指出了旧词语的上限时间可以限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将原来较为模糊的时间上限进一步具体化。与此同时，他还分析了旧词语内容上的特点，指出它们因为内容上或使用上的各种原因而带给自身社会成员某种可以感觉到的生疏感，并认为结合上述两者而可以准确地鉴别出旧词语的基本范围。此外，作者还就词语变旧的方法与途径进行了探讨，列出的主要途径有“自然消亡、替代法、遴选法”等。^[111]

四、方言词语

对方言词语的理解和使用存在分歧。孙常叙认为：“汉语方言词汇有广狭两义：广义的方言词汇是指着一个方言区域所使用的词汇的全部来说的，狭义的则专指着词汇中地方性造词的部分而说的。”^[112]周祖谟的观点同孙氏的狭义理解类似，认为应把“这种只在某一方言区域内流行的词”称为“方言词”。^[113]很明显，孙、周二位是将它当作对立于是普通话的方言系统中的概念来理解的，而这种理解与所讨论的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方言词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正如葛本仪明确指出的那样：“这种方言词是指来源于地域方言的词，它们是普通话词汇中的成员，和存在于各地域方言中的方言词是完全不同的。”^[114]也即，通常所指的方言词其实是就来源于方言区并为普通话所吸收的这部分成员来说的。刘叔新因此而把它们称作“方源词”^[115]，这样的方便之处是，可以把它们很好地同一般意义上的方言词区分开来。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普通话如何吸收方言区的词汇，或者说，方言区的哪些词汇可以吸收进普通话中来成为方源词？周祖谟指出了方言词

进入全民共同语的一些情况,认为“有些是基础方言内部的一些特殊词,有些是基础方言以外的一些方言词,因为了解的人多了,应用得普遍起来,就变成为普通话词汇里面的一部分了”。“另外还有一些词是普通话里已经有的,不过在个别方言里常常有某一种特殊的用法而是普通话里原来所没有的,这种特殊用法随着方言也渗透到普通话里来。”^[116]武占坤、王勤提出的吸收原则是:不吸收与全民性词的意义、色彩完全相同的方言词;不吸收对丰富全民性词汇不起积极作用的方言词;方言区所特有的事物,随着它逐渐被全民采用,代表该事物的词也就吸收到全民性词汇中来,不能排斥。^[117]符淮青在分析普通话对方言词吸收的原则时,着重谈到了对基础方言词汇的吸收问题。作者提出的原则包括:(1)基础方言中方言色彩很浓的词,只在某些个别地区运用,有完全同义而比较普通的词代替,这种词可不看作普通话词汇。(2)北方话中说法不一致的,用比较普通的作为标准。(3)基础方言中同名异实的,涵义以北京话为准。^[118]刘叔新指出:“要具体确定一个词只归属方言还是成了普通话中的方源词,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存在着技术上的困难,却并非不能确定若干使鉴别做到正确合理的原则。”它们首先“要看使用的普遍性如何”,“凡一个词是官话地区内普遍使用的,或者虽本属于某个南方方言,但已越出该方言地区的使用范围而在汉族人民整个活动领域内或社会主要区域内使用开来的,就应是普通话词汇的成员,即现代汉语的方源词”;“另一个起补充作用的鉴别原则:要看是否用于现代权威性的报刊或典范著作和是否表意新颖独特”^[119]。

总的来说,方源词研究比较薄弱,基本上还多是粗线条的,研究上未见有明显的突破,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五、专名词语和专门用语

1. 专名词语

表示独特个体名称的词语,是一般意义上的专名词语。“专名词语的对象总是个别的人、地方、国家、建筑,个别的政党、团体、机构、企业或某一具体的书文、报刊、作品。因此,词语意义所体现的概念,不是一般的概括一类事物现象的种类概念,而是只反映个别具体对象的特殊个体概念。”^[120]在专名词语与共同语词汇的关系问题上,刘叔新认为“这类词语的问题比较大”^[121],接着对它们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他指出,人名不能都看作普通话中的成员,但同时也不能全部排除进入普

通话词汇的可能性,“大体上说,古今中外的伟人、杰出人物、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或家喻户晓的人物,其姓名(包括使用汉姓的汉名和非汉族人士的汉译名)可以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的成员”^[122]。对于地名,刘氏分不同情况作了分析,认为较大的地名为全民族所共知和常用,应是现代汉语词汇的成员:县名,重要的城镇名,不很小的山名、河流名、湖泊名、港湾名,成为著名风景胜地名称的山名、湖名、泉名、岛名、半岛名、水湾名及园林名等,都或已成为汉族人民所共知和共用,或者是大家随时需要和可能熟悉的,因而也应列入现代汉语共同语词汇的范围。作者认为,“楼阁亭台名、堂殿名、塔名、寺庙名、陵寝名、桥名等建筑名称至为纷繁。只有所指的建筑确实遐迩闻名的或成为胜迹的名称,才具有现代汉语词汇成员的资格。”“各地景色的许多专名,只有那些给人以强烈魅力或美感、使人难忘或广为人们所知闻的……才能是现代汉语词汇的固定语。”对于政党社团名、机关名、企业名、校名以及书文报刊名和作品名,作者指出:“可以说,国内各政党和国外一些大国主要政党的名称(后者为汉译),国内全国性的大社团、国家党政领导机构和省市级大机关的名称,享有盛誉的大企业的名称,国内重点高校和国际上著名高等学府的名称(后者为汉译),经典和不朽著作名,杰出的诗文和其他作品名,国内国家级的或享有全国性声誉的报刊的名称,以及世界著名大报刊的名称(汉译),都应承认取得了现代汉语词汇成员的资格。”“至于国名,由于总共只是一百六七十个,而且是大家所熟知或至少随时需要知悉和运用的,都处于现代汉语词汇范围之内不会有什么疑问。”胡中文在《试析专名词语同一般词语的联系》[《汉语学习》,1997(3)]中详细分析了专名词语同一般词语相互关联、相互转化的种种情况,指出“专名词语可增加泛指义位或转化为一般词语”,比如“长城”、“泰山”等;“一般词语也可增加专指义位或转化为专名词语”,比如,“大陆”,本是一般词语中的通名,泛指广大陆地,现在却增加了一个专指义位,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含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的领域。胡氏这方面的研究还有《专名词语的界定》(见《语言学论辑》,第2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和《专名词语的条件限制》[《语文新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等。

2. 专门用语

专门用语的研究在50年代就已经开始,不少学者发表了他们的意见。孙常叙用“专业词汇”来概括语言中的这类现象,认为“专业词

汇，也有叫职业词汇的，是指着从事某种专门职业或某种专门技术的人们在他们生产劳动中所用的具有专门性的词汇而说的。其中有某一专门技术工人所用的词汇，有各种专门学术的脑力劳动者所用的词汇，有各种专门事物的词汇”^[123]。孙氏将“专业词汇”视同于“职业词汇”，看来只是抓住了二者相同的那一面。张世禄具体分析了术语、行业语的性质，指出它们都不是地方性的；都依附于民族共同语；都是专门的，每一个词都有它的特定的意义，作者因此断言“专门术语和行业语有相同的性质”^[124]。应该看到，作者这里比较两者的性质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它们的确存在相似之处。问题是，两者之间存在着的重要差别没有被注意到，而这恰恰是二者所以能分别开来的重要方面。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势必会模糊混淆这两者。比较而言，周祖谟的看法就合理得多，他在《汉语词汇讲话》中同样注意到了“专门术语”和“行业语”之间的相似处，并用“专门用语”加以统括，但周氏然后将它们之间的不同点明确地提了出来：“在不同的科学部门里都有一些专门术语。……这些术语虽然属于专门知识的范围，但随着科学的普及，术语就变成全民语言内的东西了。”而“行业语是社会中某一行业应用的词汇”^[125]。刘涌泉从使用范围的角度来把握术语的性质，认为“术语可以是词，也可以是词组；它们是用来正确标记生产技术、科学、艺术、社会生产等各个专门领域中的事物、现象、特性关系和过程的”^[126]。单纯从使用范围的角度来定义术语，存在的一个明显不足就是不能有效地将术语同行业词语（职业词语）区分开，或者说，刘氏这里的“术语”是放大的了，是将职业词语包括在里面了的，同周祖谟的专门用语相当。张旺喜等在《现代汉语行业语初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2）]中指出：“所谓行业语，是指各行各业所使用的、与本行业密切相关的专门的词和语”，并认定它们“具有很强的专业技术性”。作者指称的“行业语”不只包括像酿酒行业中的“倒桶”、“破碎”等，电影行业中的“导演”、“道具”等，还包括像化学中的“水”，法律中的“母法”、“追认”、“柔性宪法”等。显然，他们的“行业语”相当于周祖谟的“专门用语”。“术语”和“行业语”有它们各自的专门指称范围，用它们当中的任一个来作为上位的概念，看来效果并不十分理想。90年代初，刘叔新还是采用周祖谟的说法，用专门用语来统称术语和行业词语（职业词语），只是在对术语和行业词语具体理解上有自己的表述，指出：“术语是各个学科和技术部门表示专业内的科学概念的”，而职业词语“反映着某

种职业范围内特有的事物，为从事该职业的人所熟悉和运用”^[127]。刘氏的主张点出了术语和职业词语的根本区别，因而较为合理和可取。

术语与科学技术紧密相连，因此术语问题长期以来受到了相当的重视。20 世纪初，当时的政府就成立了科学名词编订馆（1909 年），致力于科技术语的整理、规范和统一工作，这是我国第一个审定科技术语的专门机构。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0 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下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医药卫生、时事文学、艺术五个组。1956 年，国务院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交给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名词编订室。1985 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关于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报告，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同时创办不定期会刊《自然科学术语研究》。除了成立解决术语问题的专门组织机构之外，还对术语进行了不少专门的研究。50 年代，曾昭伦就在《科学名词中的造字问题》[《中国语文》，1953（8）] 中讨论了翻译和制定科学名词时创造新字的问题，提出不能说造新字完全没有必要，但今后应着重反对滥造新字。刘泽先《从科学新名词的翻译看汉字的缺点》一文 [《中国语文》，1953（8）] 主张科学名词应该国际化，汉字妨碍名词的国际化，主张用拼音字母写外来语，使学术名词逐渐统一。《自然科学术语研究》创刊后，有关研究和讨论更趋热烈。比如，伍铁平在《关于科学术语的一些想法》[《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2）] 一文中强调制定科学术语时“必须考虑到语言和文字的未来发展”，考虑到“理据性、双音节性、系统性、简洁性”等。再比如，梁际翔从科技术语命名的角度指出术语应体现“科学性、系统性、单义性、简明性、中文特性和国际性；在审定科技术语时，还要考虑其现实性”^[128]。不过，以上讨论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把术语作为术语学的单位来进行研究，“是从术语的含义出发，即从概念的内涵出发来研究概念的称谓（名称）问题”^[129]。

实际上，术语还可以作为词汇学和语义学的研究对象，“其研究方法是从词语出发，研究词语的含义”^[130]。下面，就语言学界对术语、行业语同共同语词汇关系的有关论述作一简要回顾。

专门用语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或行业性，有其专门的使用领域，整体上而言，同汉民族共同语词汇之间存在许多较为明显的差别。与此同时应该看到，术语总是依附于一定语言的。一方面，术语不能自成独立的语言系统，它没有自己的语音系统、基本词汇和语法规则，而仅仅是一

些词和语，而这些词和语的构成又必然受汉语共同语在语音、词汇和语法诸方面规律的制约；另一方面，各专业学科内部的交际更脱离不了汉民族共同语，单凭术语本身是根本不可能完成交际任务的。术语与民族共同语之间自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各种联系。周祖谟指出：“术语虽然属于专门知识的范围，但随着科学的普及，术语就变成全民语言内的东西了。”“行业语虽然在社会中某一些人中间使用，但是它也有丰富全民共同语的作用。”作者举出像“车间”、“高炉”等工业用语，像“排版”、“纸型”等印刷用语等“已经成为全民共同语词汇中的一部分了”^[131]。刘叔新从使用范围是否广泛的角度来探讨它们同全民共同语词汇的各种关系，认为使用广泛的术语，由于已经被全社会各阶层的人所理解和运用，学科的专业色彩已相当微弱或已经消磨掉，因而进入了民族共同语词汇是不争的事实。对于使用范围狭窄的术语，“它们是一种词语现象。但是若把它们置于民族共同语之内，理论上势必动摇语言的全民性质。从实际出发，狭窄的专门词语既同民族共同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不可能是民族共同语当中的单位，那么事实上它们就处在民族共同语词汇的外围，围绕着、依靠着词汇而存在。”^[132]葛本仪指出：“行业语虽然是某个行业集团的专门用语，但是有时由于科学文化的发展，或者词语本身的发展和变化，某些行业语也会程度不同地扩大其使用范围。”“还有一部分行业语，由于人们认识上所产生的某些联系，在使用过程中，也会由单义词逐渐发展成多义词，某些义项的全民性，也会使得这些词语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起来。”^[133]张旺喜等在《现代汉语行业语初探》中具体分析了术语与民族共同语词汇之间相互借用的种种情况，认为行业语借用全民共同语的具体途径有两种，一种是全盘借用，“就是使用一些在全民共同语中早已存在的词语来表达行业中的概念，成为行业语”，作者举“眼”、“耳”、“鼻”等来进行具体说明；另一种则是改造借用，“它是把全民共同语中使用的一些词语的意义加以改造而运用到相应的行业中，成为与共同语词语有一定联系但又有很大差异的行业语”，并举出“储存”、“破碎”、“调配”等来说明。而行业语进入全民共同语，据作者们分析同样表现为“全盘进入”和“改造进入”这样两种方式。张旺喜等的分析实际上否定了把“要由原来特有的单义派生出变义，取得多义性特点”^[134]作为术语进入共同语条件这一观点。王吉辉从《现代汉语词典》所收术语的抽样统计中得出结论：“把术语是否取得多义作为其能否进入共同语词汇的条件的观点，明显有悖于语

言事实，因而是不正确的。”^[135] 不过，王氏也指出，术语体现了科学概念，它是对客观事物现象全部本质特征的反映，而共同语词汇大多以其区别性特征为人们所认识和理解。这就是说，从共同语词汇中借用的词语单位，只有在其意义经过深化并达到了对客观对象全部本质特征的反映之后，方才可以成为术语。深化了的词语单位自然不同于深化前的同一词语单位。可见，全盘借用共同语词汇用作术语的看法，在理论上难以说得通。鉴于此，作者提出“改造借用才是共同语词汇进入术语的唯一方式”^[136]。

正如伍铁平所指出的，“术语是属于语言研究的领域，术语学是语言学中的一门学科。但是非常遗憾，我国社会学界，包括语言学界，很少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现在反倒由自然科学家走在前面，带头从事自然科学术语的规范化和术语学的研究。社会科学家在这方面应该向自然科学家学习，迎头赶上”^[137]。这早在1984年的一席话用在今天其实也恰如其分。

六、隐语

孙常叙称这类现象为同行语，指出“汉语的同行词汇有两种：一种是阶级的，一种是行帮的”^[138]。而秘密语即是其中的一种。作者把汉语中形形色色的秘密语归成两类，一类是用掩饰法造成的词语，一类是用替换方法造成的词语。作者认为掩饰的方法和形式不少，其列出的有：歇后语式、拆字法、夹字法、变音法、反切法等；而作者所说的替换法其实就是用另一个单位来替代所用表达的单位，比如将“姑娘”说成“玲琅”，把“妇人”说成“果什”等。武占坤、王勤认为，隐语不同于行业词语，“行业语词不为行外理解，不是内行人故意制造，而是由于不同的工作岗位，不同的劳动对象决定的，它没有隐秘性”^[139]。而隐语“从语言作为全民的交际工具来观察，它是词汇中的不健康的部分”，还谈到了隐语的出路问题，一部分不能为全民服务的隐语词被清洗了，少数的隐语词因失去了秘密性而被全民性词汇吸收，如“挂彩”、“挂花”等^[140]。曹聪孙在《汉语隐语说略》[《中国语文》，1992（1）]中指出：“隐语不是行业语、科技用语、新词语、阶级习惯语、外号和缩写词。现代汉语的‘隐语’不是古代汉语的‘隐语’（廋辞、谜）。”它“是一种具有明显的封闭性质的词的秘密语。其中为一定的社会集团，例如帮会、黑社会、罪犯、吸毒者、色情行业等内部使用的话，可称为‘黑

话’”。作者指出,“隐语在现代汉语中的主要形式有词的秘密语(包括黑话)和音的秘密语(反切语)”。对于黑话的构词,作者列出的方式主要有:借喻,如用“饼子”指“洋钱”、用“避风”指“逃走”等;借代,如用“气筒子”指“鼻子”、用“桃花”指“脸”等;释义,如用“矮倒”指“跪下”等;截尾,如用“牛头马”指“面”、用“金童玉”指“女”等;析字,如用“川大丁首”指“顺天行道”等。此外,作者还对音的秘密语即反切语作了分析。曹氏的分析廓清了隐语问题上的一些模糊认识,有助于人们对隐语的进一步了解。薛理勇在《上海俗语切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的“前言”中认为:“切口是一种‘隐语’,是一种特别的行话,一般可以把社会黑道中的行话称之为‘切口’或‘黑话’。”作者指出:“由于切口和俗语主要产生和流传于社会的下层,其所隐指的内容又比较多地集中在非正道中,新中国成立后,在语言中夹杂切口会被人误解为流氓习气,解释和研究切口也会被人视作‘歪门邪道’而鲜少有人敢于问津。事实上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语言都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风俗民情,而切口和俗语更能反映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社会下层的特征,因此,研究切口俗语之形成和流变应该是研究社会风俗史之门径。”将切口纳入到一个地方社会风俗的研究中来,这种认识值得引起注意。

第三节 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词汇构成的研究

从事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研究的学者,在涉及词汇部分时似乎都不曾明确提及过词汇的构成问题,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词汇的构成面貌到底是什么样的,它们中都包含哪些部分,应该说还不十分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更谈不上对共时阶段词汇中的各词语类集进行专门的探索。下面所论,只是研究者研究较为集中的部分词语类集。

一、复音词

复音词是古代汉语词汇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不少学者在该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意见。赵克勤将古代汉语中的复音词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并列复音词,由同义词、近义词或反义词并列构成;第二种是主从复音词,两个词素之间有修饰、补充、动宾等各种关系;第三种是单纯复音词,包括联绵字和叠音词。作者指出,并列复音词最初一般是两

个单音词的临时组合，后来才逐渐形成复音词的，并指出，“从单音词的临时组合到凝固成一个复音词，常会产生意义的变化”，如“春秋”，原指“季节”，在凝固成复音词后就变为泛指“时间”。对于主从复音词，作者提及的情况有以下几种：（1）有些主从复音词是由动宾词组形成的。动宾词组在使用过程中，逐渐结合紧密，凝固成一个词，表示一个意义，不少变为指人的名词，如“将军”原指“率领军队”，后来成为领兵者官职的名称。（2）有些主从复音词是由泛指的词组变为特指的名词，如“中国”原指“处于中心的国家”，后来指我国整个地区。（3）有些词组变为主从复音词，意义向相关的事物转化，如“东宫”原指“东边的宫殿”，后转指“太子”。（4）有些主从复音词的形成，与某种修辞手法有密切的关系，这包括有代称和用典两种情况。^[141]赵克勤这里所论实际上是通论性质的。

更多的学者则从圈定的范围中选取语料，用统计的方法来研究复音词问题。研究复音词首先需要解决好复音词的界定。马真《先秦复音词初探》[《北京大学学报》，1980（5）；1981（1）]根据结合是否紧密，是否具有新的完整的词汇意义这两点，把划定复合词的标准具体化为几条：（1）两个成分结合后，构成新义，各成分的原义融化在新的整体意义中，这样的复音组合是词，不是词组，如“先生”、“京师”等。（2）两个同义或近义成分结合后，意义互补，凝结成一个更概括的意义，这样的复音组合是词，不是词组，如“道路”、“恭敬”等。（3）两个成分结合后，其中一个的意义消失了，只保留一个成分的意义，这样的复音组合是词，不是词组，如“市井”、“场圃”等。（4）重迭的复音组合，如果重迭不是原义的简单重复，而是在原义的基础上增加某种附加意义，这样的重迭式是词，不是词组，如“滔滔”、“冥冥”等。（5）两个结合的成分，其中一个是没有具体词汇意义的附加成分，这样的复音组合是词，不是词组，如“率尔”、“有比”等。张万起认同了马真的观点，认为：“这些标准虽然是针对先秦复音词的情况提出来的，但对我们确定《世说新语》中的复音词，也是有参考价值的。”不过，张万起强调：“在处理语言材料时，还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既不要掌握标准过严，把一些复音词漏掉，也不要掌握标准过宽，把许多并列式、偏正式、支配式、补充式的自由词组划入复音词，使复音词的数量大大膨胀起来。总之，我们要尽力尊重语言事实，重视语言形式本身所呈现的特征，它是我们判定复音词的主要依据。”^[142]程湘清在《先秦双

音词研究》(见《先秦汉语研究》,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2) 中详细考察了《尚书·周书》、《诗经》、《论语》、《韩非子》等书中的复合词。作者确定复合词的标准是, 从语法结构上看: 两个音节结合紧, 不能拆开或随意扩展的是复合词, 若在同一语言环境中能拆开单用, 则大体证明它是词组。从词汇意义上看: 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 双音组合成共同表示一个新概念的是复合词, 如“社稷”等; 表示相同(或基本相同) 概念的单音词合成表示一个意义相关而又增强了交际职能的新概念的是复合词, 如“战斗”等。此外, 还要考虑修辞特点和频率。朱广祁在《〈诗经〉双音词论稿》(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中规定了词组与复合词区别的总的原则: 两个单音词结合在一起, 只要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概念, 人们不再把它们看成明显的两件事物, 这种双音组合就可以看作一个复合词了, 并具体分析了联合式和偏正式的复合词情况。关于联合式的复合词, 作者提出: (1) 两类具有共同性质的概念合成一个同一的概念, 应该看作复合词, 如“子孙”、“雌雄”等; (2) 两个单音词组合在一起后, 意义发生了转化的应该看作复合词, 如“跋涉”、“腹心”等; (3) 两个单音词组合在一起后, 意义有偏指, 或者偏指的方面是固定的, 或者偏指的方面是不固定的, 应该看作复合词, 如“兄弟”、“刳菟”等; (4) 两个单音词组合在一起后, 不仅包含两个单音词的意义, 还兼指同类的或有关联的其他事物, 这种情况应看作复合词, 如“稼穡”等。对于偏正式复合词, 作者列举了以下几种不同的情形: (1) 偏正式双音组合的修饰成分虚化, 或者不很必要, 这样的双音组合就应看作复合词而不能看作词组, 如“庶士”、“桑扈”等; (2) 偏正式组合中已有了修饰成分, 这种组合在句中又受意义相近的形容词修饰, 这种情况应该看作双音复合词, 如“淑女”、“昊天”等; (3) 偏正式组合的修饰成分, 其意义有所引申的应看作复合词, 如“小人”、“公子”等; (4) 修饰成分为事物名称, 被修饰成分为此类事物总称的应看作复合词, 如“羔羊”、“黄鸟”等; (5) 偏正式组合的修饰成分有明显区别作用的应看作复合词, 如“男子”、“宗室”等。作者指出, “双音组合出现的频率, 也是区分词组与复合词的参照标准之一。一般说来, 出现次数多的, 表明它的形式比较固定, 应该算做复合词。” 尽管这样, 作者还是强调, “要找出词组与复合词的绝对界限是很困难的, 我们只能有一个总的原则, 对各种具体情况还要做细致的分析。” 张双棣指出, 意义标准在确定《吕氏春秋》中复合词的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至于拆

开、插入等方法则难以采用。除此，他主张还应参考出现频率以及同时代其他文献的使用情况。他认为，复合词的特点在于它的意义是统一的，它的意义不等于构成它的词素义的简单相加，可能是构成新义、构成概括义、构成特指义或者构成偏指义等。^[143]

对讨论范围中复音词的具体存在情况做出详尽描写分析，是研究者的又一大兴趣。王绍新描写了甲骨文中的单音词、双音词情况，指出甲骨文以单音词为主，同时也有少量双音词，它们主要是干支名、官职名、人名和地名等。^[144]程湘清在《先秦双音词研究》中详细考察了《尚书·周书》、《诗经》、《论语》、《韩非子》等书中的复合词，并着重探讨了先秦双音词的结构方式及其发展阶段，认为先秦双音词的结构方式经历了语音造词阶段、语音造词向语法造词过渡阶段和语法造词阶段。程氏的《〈论衡〉中联合式复音词的语义构成》[《中国语文》，1983（5）]中对复音词中联合式的语义构成进行了专门的统计分析，作者从构成联合式复音词的两个语素所贡献的意义分量将它们区别为两大类，“一是意义分量大体相当的平等联合词，二是意义分量有所差异的不平等联合词”。他认为平等联合词又可以分为相同意义联合、相类意义联合和相反意义联合三种。关于相同意义联合词，作者指出了两点。“首先，要辩证地看，注意从大同中辨析小异。所谓相同意义联合，主要指构成复音词两个语素的基本意义是相同的，至于附属意义诸如应用范围、意义轻重、行为情态、事物表象、感情色彩、方俗习惯等方面则存在细微差别。”“其次，要历史地看，注意从应用中把握发展。这里有两种情形：一是构成复音词的两个语素，原来是异义的，到《论衡》时代变成同义了；二是两个语素原来是一对同义词，即基本意义相同，附属意义有别，而到《论衡》中这些具有微小差别的同义词变成了等义词。”对于相类意义联合的复音词，作者指出了它们的两个特点，一是概括性，构成这类词的两个语素，原来义位不同，各代表一个概念；合成后则融合为一个义位，代表一个更加概括的概念；二是形象性，这类复音词中不少是取两个语素合成后的比喻义或代替义构成的，因而常带有形象修辞的特点。关于不平等联合式复音词，作者提出两点：“第一，这类复音词大都是由基本词汇中的单音词同一般词汇中的单音词联合构成的。”“第二，从语义的深层分析，可以看出这类复音词两个义位的具体构成是不相同的，通常其中一个义位（基本词汇的义位）往往能够囊括另一个义位（一般词汇的义位），这是它们语义不平等的根源。”最后，作者

指出,“从《论衡》联合式复音词的语义构成,我们可以看出汉语联合式复音词的两个语素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之间有彼此融合的一面,这就是说复音词的词义决不是两个单音语素意义的简单相加;另一方面又有相互制约的一面,即把双方的意义制约在一定的义位上。这是因为语言的发展,既要求词义的丰富性、多样性,又要求表达的单一性、明确性。很显然,一个单音词同时具有几个义位,在人们的交际中难免会发生歧义。为解决这一矛盾,在单音词义不断发展、丰富的基础上,能够使语义表达更为单纯明确且容量更大、更能满足交际需要的联合式复音词就应运而生。由此可见,《论衡》中联合式复音词的大量出现,同上古汉语词汇意义的发展、演变有直接的关系。”程氏的《〈世说新语〉复音词研究》(见《魏晋南北朝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对其中的2128个复音词的结构特点、发展趋势作了说明,指出:(1)联合式复音词数量上位居首位,有926个,保持着构成复音词的单音词同该复合词词性一致的特点。其词性不一致的情况,由《论衡》中的6种发展到12种之多,同素异序现象大大减少,这类词中80%以上流传后世。(2)偏正式复音词位居第二,有571个。从词义构成看,正语素由前世主要表人或表事物发展到也表示动作行为、性质状态,这类词有一半以上流传至今。(3)综合式复音词包括三音词、四音词,从先秦两汉以专词、次专词为主发展到以普通名词和专词、次专词并重,标志着汉语复音化走上一个新阶段。王延栋对《尚书》中的双音词进行了分析,认为“除去人名、地名、职官等专有名词外,一般语词有1331个,其中有单纯词、叠音词、合成词。合成词又可分为派生词和复合词”。作者指出:“《尚书》中的双音词基本上符合上古汉语双音词发展的总趋势。由于该书内容所致,单纯词和派生词的数量略显少些,而复合词的数量占绝对优势。在复合词中偏正式又占一半多,是联合式的一倍,和《诗经》的情况相同;支配式复合词的数量也比较多,这是因为这类词中有相当一部分还带有词组的性质,只是后世演变成双音词了。”^[145]

二、新词语的产生

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中的新词语研究不能抽象地加以讨论,总需要与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考虑。王力用不同时期出现的一些有特点的词来说明它们与社会之间的共变关系。他指出,原始社会中,表天文气象的

词如“日、月、风、云”等是当时词汇中的重要部分；到了渔猎时代则产生了许多表渔猎的词，如表示打鱼的“渔”，表示打猎的“田”等；农牧时代就出现了表示农作物名称和表示农耕的一些词，像“禾、黍、稷、麦”等；奴隶社会就出现了许多表示奴隶名称的词，诸如“臣、妾、童、仆”等；封建社会中出现了许多表示道德等抽象概念的词，像“忠、孝、仁、义”等。并认为，上古汉语里汉语词汇已经相当完备，社会发展、新事物不断产生，也就不断产生新词。^[146]此外，作者还就词义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说明。何九盈和蒋绍愚从词汇史的角度谈了古汉语新词语问题：“古汉语新词的增加，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是一大关键。在此以前，有关生产活动及日常生活的词汇占很大比重，抽象名词、概括性的词汇，特别是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词汇，比重较小，而春秋战国时期，这一类词汇大大增加。另外，甲骨文时期，虚词还不怎么发达，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古汉语中的虚词基本上都产生了……春秋战国时期，新词的增加以单音节为主。唐宋以后就不完全是这样了，而是以增加双音节词为主。”^[147]

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语词汇承上启下，发展迅速，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新词新义的大量产生，适应了语言表达的需要，丰富了词汇宝库。殷正林以《世说新语》为蓝本，具体分析了魏晋时期的新词、新义。作者首先介绍了新词语的确定过程，指出参照《说文》、《尔雅》、《辞源》、《联绵字典》、《中华大字典》、《中文大字典》等诸种工具书，从《世说新语》中选出3 000多个词，继而检阅了《诗经》、《论语》、《孟子》、《春秋三传》、《荀子》、《墨子》几部先秦重要典籍和《汉书》、《论衡》等几部东汉著作以及汉乐府诗，发现其中有365个新词和118项引申义未见于这些著作。作者指出，《世说新语》中新出现的单音词共有27个，比如“假（‘假期’义）”、“过（‘经过’义）”、“妨（‘妨害’义）”、“贴（‘安顺’义）”等。新生的复音词有338个，其中单纯复音词9个，如“磊落”、“铮铮”等；合成词321个，其中包括复合式如“躯体”、“装束”、“鼓吹”等和附加式如“阿翁”、“阿奴”、“有官”等；重叠式如“了了（‘聪敏’义）”。并对复合式和附加式当中的不同情况又都作了更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作者总结了新生词的一些特点，主要有：复音词占绝大多数；复音词构词法渐臻于完善（复合式复音词五种基本构词形式已具备；附加式构词方式剧烈变化）；构成复音词的词素意义关系松散，大批新生复音词的构成词素既非同义、近义，又非反

义，只是一种平行关系；名词、动词、形容词是《世说新语》新生词中最主要的词类。作者而后对产生的新义进行了分析，指出新生的引申义包括词义扩大，如“嫌”，本“厌恶”义，引申为“不满意”义；词义缩小，如“末”，本“树梢”义，引申为“细小”义；词义对立，如“投”，本“投掷”义，引申为“投奔”义。作者总结道：“新生的引申义中，单音词多于复音词；新生的引申义中，单音词与复音词的数量差，主要是在动词；单音词与复音词引申义所分布的词类相同。”作者最后指出，《世说新语》的新词，基本上属于一般词汇，从词汇意义上看，有一些比较突出的特点，如与品评人物、佛教和玄学有关的，表清谈的词汇，受士族、门阀制度影响而产生的各种称谓词就相当集中。这种词义上的特点，取决于《世说新语》一书的内容，但是，不能说《世说新语》已反映了魏晋时期汉语词汇发展的全面情况，因为研究某一部著作的词汇不可能全面反映该时期的词汇面貌。词汇因各书内容的不同，范围也有相当大的出入。要想了解某一时期词汇比较完整的面貌，还必须对同时期多种著作的词汇进行研究。^[148] 骆晓平在《魏晋六朝汉语词汇双音化倾向三题》[《古汉语研究》，1990（4）]中指出：“到了魏晋六朝时期，新生词大多由双音节组成，单音节词则退居极为次要的地位。”作者对照 14 部先秦两汉重要典籍并查考现有的语文辞书，检得出现于《搜神记》（20 卷本）一书中的魏晋新词 81 个，其中单音词只有 9 个，而双音节新词则多达 72 个。

三、外来词语

王力的《汉语史稿》（下册）认为借词和译词都是受别的语言的影响而产生的新词，但只有借词——把别的语言中的词连音带义都接受过来才是外来语。作者指出，汉语的借词和译词都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来自国内各民族的；另一种是来自国外的。然后作者对来自国外的借词和译词，分不同来源分别作了分析。来自西域的比如“葡萄、安石榴”等；来自佛教的有“佛、塔、僧、世界、现在”等；来自西洋的有“鸦片、公司、火轮车”等。作者认为，佛教借词和译词同西域借词和译词有些不同：“按时代的先后来说，西域借词和译词的时代要早得多（大约早五百年），虽然后代也有一些；按影响的大小来说，佛教借词和译词的影响要大得多。”^[149] 此外，王力对鸦片战争以后的外来词语作了专节的分析。潘允中在《汉语词汇史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中

区分借词和译词,“如果连词和音搬过来(如‘师比’)是借词,要是仅以汉字翻译原来的词义的(如‘胡琴’)那就算是译词了”^[150],而后将鸦片战争之前的借词和译词分成不同的部分来专门探讨。上古时期的汉语借词范围很广,其中以西域语占最大部分,匈奴语次之。其他借词就很少了。如果就借词流入的时期先后来说,那么,匈奴语是较早于西域语的,但这不是每个借词都这样。匈奴语借词包括胡语和北狄语在内,绝大多数都是音译的,如“骆驼”、“猩猩”、“琵琶”等;西域语借词包括大宛、西戎、安息、希腊、身毒(古代印度)等语在内,几乎全是音译的,如“吹鞭”、“膜拜”、“葡萄”等。上古时期的借词以佛教梵语占最主要地位,借入方式大抵“可以分为音译、意译和半音半意译三种,以意译占最多数”^[151]。音译类的有“佛”、“塔”、“阎罗”等;意译类的如“现在”、“方便”、“圆满”等;半音半意译类的如“彼岸”、“尼姑”、“忏悔”等。近古时期借词的最大特点是在明末清初之际从西洋初步传入了一些科学名词术语,如“螺丝”、“机车”、“比例”、“文法”、“关系”等。作者最后得出汉语借词的一些特点:(1)外来语对于丰富汉语词汇,加强汉语的表现力,起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佛教借词深入人心。(2)意译比音译更能符合汉语的习惯,因而更能巩固下来。(3)汉语有巨大的抵抗力,对于外来语不得不用音译的总是极力使它汉化,然后吸收进来。汉化是采取下列三种方式:第一是字形上的,如将“颇黎”改做“玻璃”等;第二是音节上的,采用双音节形式,如“壁流离”变为“琉璃”等;第三是用音加义的方式,如“苹果”等。(4)汉语吸收外来语,还有一种很特殊的方法,即在通名前面加上“胡”字为记,如“胡椒”等。这一类的词只能说是汉语特创的新词,用以消化外来的新事物的。(5)外来语经过长期的充当交际工具,它不但可以成为全民语言,而且也可以进入基本词汇,如“过去”、“毕竟”、“因果”等。骆晓平在《魏晋六朝汉语词汇双音化倾向三题》中指出,魏晋六朝时期的外来词,主要是随佛典的翻译介绍过来的梵语和巴利语等域外语言的成分,“不管是音译还是意译,汉语在吸收这些外来词时一般都采取双音节的形式”,意译的比如“布施”、“世界”、“因果”、“法宝”等。音译外来词的双音倾向表现在:原本是两个音节的就译成双音节的,如“夜叉”、“摩尼”等;原是多音节的,虽照音节译出,但常省称为两个音节,如“提婆达多”省作“提婆”等;再就是在多音节的音译形式外另给以双音节意译,如 Kimnara 音译为“紧那罗”,又意译为“非人”

等。蒋冀骋、吴福祥在《近代汉语纲要》中指出，近代汉语吸收了大量的外来语。“外来语可分为外国语和兄弟民族语。近代汉语期间，外国语词的吸收主要在明代，语种主要是英、法、日。兄弟民族语主要有：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和满语。”^[152]来自契丹语的如“朝定（朋友）”、“曳刺（兵卒）”等；来自女真语的如“阿妈（父）”、“阿者（母亲）”等；来自蒙古语的如“哈刺（杀死）”、“牙不（走）”等；来自其他的还有如“佛郎机（炮名，源于法语）”、“火不思（一种拨弦乐器，源于突厥语）”、“先陀婆（聪明者，源于梵文）”等。

四、基本词汇

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基本词汇的研究大多是从词汇史的角度来进行的。

王力是较早运用基本词汇理论对古代汉语中的基本词汇现状作出分析的一位。他在《汉语史稿》（下册）中具体分析了汉语基本词汇的形成和发展情况。作者指出，在奴隶时代以前的远古时期，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差别的。在甲骨文时代，这二者之间的界限也还是不大的。作者认为，基本词汇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里的一部分词和代词、数词、联结词等，并指出，名词中的基本词大致说来，应该包括：（1）自然现象的名称；（2）肢体的名称；（3）方位和时令的名称；（4）亲属的名称；（5）关于生产（渔猎、畜牧、农业）的词；（6）关于物质文化（宫室、衣服、家具）的词^[153]。作者在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一些结论：第一，汉语的基本词汇是富于稳固性的；多数的基本词有了几千年（或者是几百年）的寿命。第二，基本词汇虽然稳定，变化还是可能的。第三，古代没有，而后代产生的东西，当然需要产生新词。第四，一般词汇的词可以转变为基本词汇的词，反过来，基本词汇的词也可以转变为一般词汇的词。第五，阶级习惯语和行业语也可以转变为基本词汇。^[154]潘允中在《汉语基本词汇的发展》〔《中山大学学报》，1959（1、2）〕中，根据基本词汇的“历史稳固性”、“全民性”、“有构词能力”特征来圈定基本词汇的范围，它们按其性质可以分为八大类：“（1）关于自然现象、自然物的名称；（2）关于方位的名称；（3）关于人和人体部分的名称；（4）关于近亲的名称；（5）关于生产劳动（如渔猎、畜牧、农业、工业等）的词汇；（6）关于物质文化（如宫室、衣服、家具等）的词汇；（7）关于行为的词汇；（8）关于事物的性状的词

汇。”潘氏经过分析得出了关于基本词汇的几点结论，它们是：（1）汉语词汇从古到今是一脉相承的，其中基本词汇在上古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大部分，这是因为汉语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发展的语言，这些基本词已历时3 000年左右，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在这里充分显示了它的历史稳固性。（2）一般词汇也可以转入基本词汇。（3）基本词汇的发展，是和社会的发展密切联系着的。（4）古代基本词汇，以单音节占优势，而且双音节的基本词，一般来说缺乏构词能力。这种情况，在现代有了变化，双音节的基本词渐渐多了，而且还具有构词能力。（5）在汉语词汇向复音节发展中，基本词汇起了促进的作用。现在大部分古代沿用下来的基本词都成为现代汉语的根词，并积极地构造多种多样的复音词，使汉语词汇大大地丰富起来。

此外，方言词、俗词语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只是研究的重点放在对它们意义的考释上，如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商务印书馆，1956）将“精细”释为“苏醒”、将“摩古”释为“糊涂”等。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量存在于语词解释的专书或相关的书籍当中，主要有：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中华书局，1953）、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商务印书馆，1956）、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顾学颉和王学奇《元曲释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郭在贻《训诂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王璞《诗词曲语辞例释》（中华书局，1986）、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语文出版社，1986）、蔡镜浩《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王锺《唐宋笔记语辞汇释》（中华书局，1990）、李申《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刘百顺《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考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王云路和方一新《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等。

本章小结

词汇构成研究在20世纪取得了可喜的进步，表现在：

（1）词汇构成特别是现代汉语词汇构成的具体面貌已经基本上清楚了，而且，当中的各类词语类集都有研究成果发表。

（2）在研究方法上，较传统而有很大的改变，社会语言学、文化语

言学、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定量统计、数值分析等已经借鉴过来，并被具体运用到词汇构成的具体研究中。这突出地表现在外来词语的研究成果中。

词汇构成研究存在的问题也还不少，有待加强和改进的地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贯通古今，加强历史层次的研究考察

学者们在主张基本词汇具有稳固性的同时还承认它们也在缓慢地变化着，但这种缓慢变化具体到什么程度却没有能做出更进一步的说明。——若要使之得到解释说明，必须在对不同历史阶段基本词汇的细致考察后才能实现。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词汇不完全一致，哪些是历史上继承下来的，哪些又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新增列的，没有断代的具体研究，恐怕谁也没有把握说清楚。再比如，外来词语研究同样也需要历史层面上的研究支持。张永言的意见值得重视，他指出：“过去关于外来词的一些研究在方法上往往带有片面性和形式主义的倾向，即是说，只注意外来词的来源和传入的时间，顶多也不过再探讨一下借用的原因和条件而已。自然，这种研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们不能以此为满足。我们不仅要研究一个外来词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时候传来的，为什么传来的和怎样传来的，而且要研究它是怎样被同化的，也就是说它是怎样服从或适应借方的语音系统（包括音节构造）和语法结构（包括构词法）的，它的意义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它的出现引起了借方词汇里的哪些变化，等等。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外来词的研究阐明语言词汇发展的规律性，说明词汇中发生的现象及其原因，揭示个别词语的历史、语言的历史和人民的历史三者之间的关系。”^[155]

(2) 定量统计研究应该得到加强

对于基本词汇的研究，一直以来，“关于什么是基本词汇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替它勾勒出一个明确的范围”^[156]，这其实不仅是指古代汉语的基本词汇研究，它同样适用于现代汉语基本词汇的研究现状。研究者在涉及该问题时通常的做法是举例。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一个遗憾。史有为在分析外来词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时也提到了统计：“所谓统计就是从语言的动态和静态两方面对外来词进行统计，前者是使用频度统计，后者是集合构成统计，其中又可以按语源、按借入方式、按内容类别、按历史层次等多种标准统计。而直到目前为止，除了1958年高名凯、刘正琰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对一千多个外来词作了内容方

面的初步统计外，三十多年过去了，还未见第二份统计。而没有统计，我们就很难从量上说明质的问题。”^[157]史有为的这一席话虽是十余年前谈的，但于今天来说未必就已经过时。

(3) 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词汇的构成研究有待加强

古代汉语、近代汉语同现代汉语在词汇特点上存在差别，因此词汇构成所包括的具体部分会有特定时代的特征，不能完全用现代汉语词汇的各构成部分直接套用到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词汇构成的研究当中去。那么，古代汉语、近代汉语在各自词汇构成上都有哪些部分，无疑还需要做出深入的探索。再者，词汇构成各部分的研究目前看来非常不平衡，研究者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复音词、外来词和基本词汇上，词汇构成的其他类集探讨文章极少见到。

注释：

[1]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 孙常叙：《汉语词汇》，161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56。

[3] 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

[4] 张世禄：《普通话词汇》，54页，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7。

[5] 张永言：《词汇学简论》，1页，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

[6] 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7]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15~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8] 徐通锵：《语言论·自序》，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9] 同上书，265页。

[10] 徐国庆：《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6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1] 同上书，66页。

[12]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21页。

[13] 陶坤：《词汇的发展与学术名词的制订问题》，载《光明日报》，1952-12-26。

[14] 李向真：《关于汉语的基本词汇》，载《中国语文》，1953（4）。

[15] 伯韩：《李荣、李向真两位先生关于基本词汇的论文读后感》，载《中国语文》，1953（7）。

[16] 李荣：《汉语的基本字汇》，载《科学通报》，1952，3（7）。

[17] 林焘：《汉语基本词汇的几个问题》，载《中国语文》，1954（7）。

[18] 张世禄：《基本词汇的性质和范围》，载《语文知识》，1956（8）。

[19] 孙常叙：《汉语词汇》，325页。

[20] 同上书，325页。

[21] 同上书，326~327页。

[22] 同上书，326页。

- [23] 谢晓安：《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载《人文杂志》，1958（1）。
- [24] 刘叔新：《论词汇体系问题——兼与黄景欣同志商榷》，载《中国语文》，1964（3）。
- [25] 参见周荐：《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划分刍议》，载《南开学报》，1987（3）。
- [26] 张世禄：《基本词汇的性质和范围》。
- [27]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233 页。
- [28] 谢晓安：《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
- [29] 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160 页。
- [30] 王勤、武占坤：《现代汉语词汇》，92 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
- [31] 同上书，96 页。
- [32] 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198 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 [33] 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29 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 [34] 参见张世禄：《基本词汇的性质和范围》。
- [35] 参见林焘：《汉语基本词汇的几个问题》。
- [36] 赵振铎：《虚词不能归入基本词汇吗》，载《人文杂志》，1959（3）。
- [37] 李向真：《关于汉语的基本词汇》。
- [38] 谢晓安：《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
- [39] 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28 页。
- [40] 周荐：《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划分刍议》。
- [41] 参见张世禄：《基本词汇的性质和范围》。
- [42] 参见潘允中：《汉语基本词汇的形成及其发展》，载《中山大学学报》，1958（1）。
- [43] 参见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
- [44] 参见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
- [45] 苏新春：《如何划分汉语的基本词汇》，载《广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4）。
- [46]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31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50。
- [47] 王勤、武占坤：《现代汉语词汇》，128 页。
- [48] 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34 页。
- [49] 吕叔湘：《中国文坛要略》（上卷），12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42。
- [50] 孙常叙：《汉语词汇》，316 页。
- [51] 张世禄：《普通话词汇》，40～41 页。
- [52] 高名凯、刘正琰《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8 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 [53] 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66 页。
- [54] 王力：《汉语史稿》（下册），55～56 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 [55] 史有为：《外来词研究之回顾与思考》，载《语文建设》，1991（11）。

- [56] 史有为：《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 [57]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240 页。
- [58] 参见冯建文、毛莉：《外来词的基本译法》，载《社科纵横》，1998（4）。
- [59] 参见黄河清：《汉语外来影响词》，载《词库建设通讯》，1995（7）。
- [60]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18~19 页。
- [61] 高名凯，刘正琰：《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140 页。
- [62] 同上书，139 页。
- [63] 史有为：《外来词研究之回顾与思考》。
- [64] 赵艳芳：《西方语言文化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影响》，载《国外语言学》，1996（1）。
- [65] 张志毅、张庆云：《新时期新词语的趋势与选择》，载《语文建设》，1997（3）。
- [66] 王勤：武占坤：《现代汉语词汇》，116~117 页。
- [67] 参见倪宝元：《“组字”和“析词”》，载《中国语文》，1960（12）。
- [68] 武占坤：《谈一种“偶发词”》，载《中国语文》，1961（4）。
- [69] 王铁昆：《10 年来的汉语新词语研究》，载《语文建设》，1991（4）。
- [70] 韩品夫：《新词语的性质和范围》，见《词汇学新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1995。
- [71] 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169 页。
- [72] 王铁昆：《10 年来的汉语新词语研究》。
- [73] 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30 页。
- [74] 陈原：《关于新语条的出现及其社会意义》，载《语言研究》，1984（2）。
- [75] 赵克勤：《论新词语》，载《语文研究》，1988（2）。
- [76]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249 页。
- [77] 赵克勤：《论新词语》。
- [78] 沈孟璎：《新词语构成特点纵览》，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4）。
- [79] 沈孟璎：《关于新词语词义表面化倾向的考察》，载《语言文字应用》，1995（4）。
- [80] 参见王铁昆：《新词语的规范与社会、心理》，载《语文建设》，1988（1）。
- [81] 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169 页。
- [82] 陈原：《关于新语条的出现及其社会意义》。
- [83] 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30 页。
- [84] 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171 页。
- [85] 参见赵克勤：《论新词语》。
- [86]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267 页。
- [87] 同上书，268 页。
- [88] 赵金铭：《新词新义与社会情貌》，载《语文研究》，1985（4）。

- [89] 张志毅、张庆云：《新时期新词语的趋势和选择》。
- [90] 参见欧阳俊鹏：《新词语中的词群现象》，载《语文建设》，1998（9）。
- [91] 参见张志毅、张庆云：《新时期新词语的趋势和选择》。
- [92] 参见赵克勤：《论新词语》。
- [93] 参见朱永锴、林伦伦：《二十年来现代汉语新词语的特点及其产生渠道》，载《语言文字应用》，1999（2）。
- [94] 参见周洪波：《新词语中潜义的显义化》，载《汉语学习》，1996（1）。
- [95] 参见季恒铨、亓艳萍：《比喻、借代与新词语新用法》，载《语文建设》，1989（4）。
- [96] 岳长顺：《论类推创造新词》，载《世界汉语教学》，1993（2）。
- [97] 参见杨琳：《词汇规范应以从众和需要为根本原则》，载《语文建设》，1997（5）。
- [98] 张志毅、张庆云：《新时期新词语的趋势与选择》。
- [99] 张世禄：《汉语知识讲话》，北京，新知识出版社，1957。
- [100] 卢绪元：《究竟什么是文言词》，载《中国语文》，1961（3）。
- [101] 参见张世禄：《现代语里的古语词》，载《语文知识》，1956（10）。
- [102] 卢绪元：《究竟什么是文言词》。
- [103] 参见王勤：《略论现代汉语中的古语词》，载《湘潭大学学报》，1981（1）。
- [104] 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30～31页。
- [105] 武占坤：《词汇》，95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
- [106] 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166页。
- [107]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247页。
- [108] 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64页。
- [109] 参见刘叔新：《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63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 [110]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251页。
- [111] 参见王吉辉：《论旧词语》，载《学术研究》，1999（7）。
- [112] 孙常叙：《汉语词汇》，273页。
- [113] 参见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67页。
- [114] 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32页。
- [115]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237页。
- [116] 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68页。
- [117] 参见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228页。
- [118] 参见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180页。
- [119]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268页。
- [120]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255页。
- [121] 同上书，272页。

- [122] 同上。
- [123] 孙常叙：《汉语词汇》，291 页。
- [124] 张世禄：《普通话词汇》，51 页。
- [125] 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68 页。
- [126] 刘涌泉：《略论我国的术语工作》，载《中国语文》，1984（1）。
- [127]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251~252 页。
- [128] 梁际翔：《谈谈术语和术语特性问题》，载《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8（1）。
- [129] 石立坚：《有关术语的几个问题》，载《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9（2）。
- [130] 同上。
- [131] 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69 页。
- [132] 刘叔新：《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61 页。
- [133] 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35 页。
- [134] 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230 页。
- [135] 王吉辉：《论术语与汉民族共同语词汇的关系》，见《语言学论辑》第 2 辑，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
- [136] 同上。
- [137] 伍铁平：《关于科学术语的一些想法》，载《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2）。
- [138] 孙常叙：《汉语词汇》，297 页。
- [139] 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233 页。
- [140] 同上书，233 页。
- [141] 参见赵克勤：《古汉语词汇问题》，9~19 页，郑州，中州书画社，1981。
- [142] 张万起：《〈世说新语〉复音词问题》，见王云路、方一新编：《中古汉语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143] 参见张双棣：《〈吕氏春秋〉词汇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
- [144] 参见王绍新：《甲骨刻辞时代的词汇》，见《先秦汉语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
- [145] 王延栋：《〈尚书〉的双音词》，见《纪念马汉麟先生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 [146] 参见王力：《汉语词汇史》，1~18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 [147] 何九盈、蒋绍愚：《古汉语词汇讲话》，10 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 [148] 参见殷正林：《〈世说新语〉中所反映的魏晋时期的新词和新义》，见《语言学论丛》，第 12 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149] 王力：《汉语史稿》（下册），519 页。
- [150] 潘允中：《汉语词汇史概要》，120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51] 同上书，129 页。
- [152] 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194 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 [153] 参见王力：《汉语史稿》（下册），494 页。

[154] 同上书，514 页。

[155] 张永言：《词汇学简论》，94 页。

[156] 史存直：《汉语词汇史纲要》，2 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157] 史有为：《外来词研究之回顾与思考》。

第二章 词汇的形式和意义

第一节 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形式和意义的研究

一、对现代汉语词汇形式的研究

从 20 世纪初开始，许多学者借鉴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摒弃传统文字学只重视词义训诂、忽视词语形式研究的做法，开始从现代意义上对词语的形式方面进行探讨。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语言学界对于现代汉语词汇形式的研究逐渐趋于深入、细致，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理论认识也逐渐趋于全面、明晰、科学。以下择其主要方面进行简要介绍。

（一）对于词的构成方式的描写

关于词的构成方式的描写，在现代汉语词汇学“萌芽时期”（五四运动前后—40 年代）与“草创和初步发展时期”（50 年代初—60 年代中叶）^[1]，很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 五四运动前后—40 年代对词的结构方式的描写

1919 年薛祥绥《中国言语文字说略》[《国故》，1919（4）]一文对汉语词的形式方面的研究起了开创作用。薛祥绥对汉语的双音词做了全面系统的描写，他把汉语的双音节词称作“复合之例”，把双音词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与梵文“六合释”相对应的，又分叠语、连语、限定、假借、带数五小类；第二类是不与“六合释”相对应的，又分“译音之字”、“表声之字”、“虚助之字”、“随文异义之字”四小类；第三类是随文创造的，又分“合名为词”、“截名为词”、“破字为词”、“隐语为词”、“歇后为词”五小类。薛氏还提出了“语根”（词根）和“语系”（词缀）的概念。

尽管薛氏的认识在今天看来有许多不科学的地方，比如把联绵词也叫做复合词，但他“最早对汉语词的形式方面作系统的研究”^[2]，开创之功不可没。

薛祥绥之后,1921年出版的《黎锦熙的国语讲坛》(中华书局)一书的附录“词类连书条例”把“复字名词”(即双音节词)分列为六类:合成的、并行的、联属的、对待的、叠用的、带语尾的。除了“合成的”,其余五类之下又再分小类,如把“并行的”一类细分为“名与名合”、“形与形合”、“动与动合”三小类;把“联属的”一类细分为“两名相合”、“形名相合”、“动名相合”、“动形相合”四小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黎锦熙已经注意到了词内构成成分的语法性质。1923年,黎锦熙又列出“复音词类构成表”^[3],对双音节词的结构形式的认识更为全面、细致。虽缺失之处有很多,但对后世的研究很有启发意义。

刘复的《中国文法通论》(群益书社,1920),认为汉语中有“合音字、合义字、分体字、复合字”四种字。这代表了当时一些学者对于“字”和“词”的区分尚没有清晰的理论认识。但当时的研究也有很多的闪光点,为后世研究打下了基础。比如刘复在同文中曾提到,若把“琥珀”、“囫圇”分成“琥”、“珀”,“圇”、“圇”四个字,就全无意义,这与《黎锦熙的国语讲坛》里把“蜘蛛、玫瑰”单列为一类“合成的:两个字拆开独立,就没有意义了”^[4],同样显示了当时的人们在对单纯词认识上的进步,表明在他们的观念中已初步萌生了对语素的认识。1940年汪馥泉在《语汇试论》[《学术杂志》,1940(2)]中谈及离合词问题、派生词问题,指出派生词“有前附及后附两类”,并且指出“语尾”(即词缀)是“一个不能独立成语的语素”,这也是对词的构成方式认识上的深入。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42—1944)把词分为单纯的词和复合的词两类,“单纯的词同时兼为意义单位和表现单位,复合的词只是最小表现单位,不是最小的意义单位”,吕氏在此显露了对语素和词的不同性质、作用的认识。吕氏还提到“简称”问题。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1943)探讨了单音字、词和双音词的关系问题,并且谈了把双音词与词组划分开的方法,也就是插入法。1948年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开明书店,1948)注意到了汉语的字和词的不同,说“我们的一个‘字’并不能代表一个‘词’”,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

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学者们对词的构成方式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今天看来有很多不成熟、不科学的地方,比如对构成方式的分析层次不够清晰,以字代词等等,但这一时期的研究为后世研究者在这

一领域的不断开拓奠定了基础。

2. 50 年代对词的结构方式的描写

50 年代，对于词的构成方式的描写更为完备、科学，在某些具体认识上也有了很大进步。

50 年代初期学者们的工作主要是对汉语的结构形式做静态的描写，如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52）、张志公《汉语语法常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等，都对汉语词的构成方式进行了描写。其中张志公首次提出“纸张”、“布匹”这类“名+量”的构成方式，之后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语文学习》，1955（4）～1957（10）]对现代汉语词的构造进行了描写。50 年代中期，《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问世，张寿康在《关于汉语构词法》（见《语法与语法教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一文中阐述了构词法体系。与前代各家的分析相比较，这一体系更为完善、论述更充分。崔复爱《现代汉语构词法例解》（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比较全面系统地讲述了作者对于现代汉语构词法的认识。书的开头列出现代汉语构词法体系表，表格后分章叙述对表格的解释。更为可贵的是，崔氏的《现代汉语构词法例解》编述了“各家构词法的异同”一节，对 1957 年以前重要著作中各家学者关于构词法的见解作了比较，为我们日后研究了解各家的观点提供了方便。

50 年代人们在某些具体认识上取得了进步。第一，这一时期的描写开始引入“词素”概念，并且开始根据词素的组合来划分词的结构。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指出单纯词“只包括一个词素，不能再拆成更小的单位”，虽然作者在其书中还未完全区分开作为书写单位的“字”和作为语言最小单位的“词素”，但“词素”概念的引入，对后人科学分析词的结构形式起着重要作用。《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中概括的汉语构词法主要就是根据词素的组合来分析词的结构。暂拟语法系统把合成词分为“不包含辅助成分的”和“包含辅助成分的”两类，把词素分为实词素和虚词素，使得构词类型的分析更细致。第二，崔复爱《现代汉语构词法例解》一书有一些详尽而见解独到的论述值得注意。首先，书中强调了“词根”与“根词”的不同，根词是具有构词能力的词；而词根是构词成分。同时，书中还指出多语素分析的层次性，例如“土地法”的结构分析应为：“土地”首先是联合式构词，“土地”又和“法”在同一层次上形成偏正关系，书中对此作了表式示意。诚然，书

中对于“瓜子儿”、“苦头儿”的论述有偏差之处（关于这一内容，周荐《汉语词汇研究史纲》有详细论述，在此不赘述），但作者在当时能注意到语素分析的层次性，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另外，在“结构和意义”一节中，探讨了合成词结构和意义的联系。这是关于词的形式研究领域的发展和深入。第三，洪笃仁在《词是什么》（新知识出版社，1957）一书中注意到了“简称”的形式，并且认为简称必须以全称的并行作为前提；张寿康在《略论汉语构词法》[《中国语文》，1957（6）]中提出了“独用词素”、“非独用词素”、“离合动词”的说法，这些都表现出语言学界在词的形式问题上认识的进步。

3. 50年代后对词的结构方式的描写

从50年代开始，已经有很多学者在探讨词的结构方式的理论问题，50年代以后，大部分学者已经不满足于对词的结构方式做简单描写，而转向更为深入的理论探讨。

八九十年代，一些学者开始对词的结构学科属性有了新的认识，“复合词乃至各种词的结构方式以及构造新词的各种方法，都是词汇学的研究对象。构词法只是其派生词结构和派生法能由语法学去研究。”^[5]认识上的进步带动了具体描写方面的变化，在《汉语描写词汇学》一书中，为避免雷同于语法学术语，刘叔新以新的词汇学术语来称说汉语的结构方式。他把词的结构方式称为“词式”，词式首先分为“单项式”和“合成式”，合成式中包括“复合式”和“派生式”，复合式又分为“质限格”、“态饰格”、“支配格”、“陈说格”、“重述格”、“表单位格”、“杂合格”等；派生式依词缀的位置分为“前衍格”、“后衍格”。这对以往借用句法术语称说词的结构方式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变革。黎良军《汉语词汇语义学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也不认为合成词的构词方式和句法是一回事，而把汉语合成词内语素与语素之间的关系按语义结构归纳为十种类型：虚素融入式、同义互限式、反义概括式、类式互足式、分别提示式、因果式、物动式、时间顺序式、短语词化式、截取古语式等。分类的结果或许还可商榷，但角度和思路却是新的。

（二）对于构词法和构形法的认识

1. 50年代对此问题的认识

50年代学者对构词法和构形法的区别已有所认识，1956年，邢公畹发表《现代汉语的构形法和构词法》[《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版），1956（2）]，他把构形法和构词法区别开来，并用这一理论来解决现代

汉语的实际问题。

但是,当时学者对于构词法和构形法的认识,仍然存在着误区。在岑麒祥的《关于汉语构词法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1956(12)]中,提出有形态学构词法和造句法构词法两种方法。陆志韦《构词法的对象和手续》[《中国语文》,1956(12)],用句法比附词法,认为“一个类型,单就它的各部分的意义上的关系来说,可以是构词法和造句法所共有的”。这样的论述就把词法平面和句法平面相混淆,是不妥当的。直到60年代,一些学者对此问题仍存在模糊的认识,如丁声树等合著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等等。在50年代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洪笃仁在《词是什么》一书中针对某些人把构词法和构形法混同的做法,指出“应该把构词的附加法和词形变化加以区别”;张寿康《略论汉语构词法》提出“词素在词中不会有语法上的类”。这在当时是构词法认识方面的一个亮点。

2. 80年代对此问题的认识

80年代,学者们对于构词法和构形法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更明确的说法。1981年张寿康出版了《构词法和构形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一书,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作者的主张:应该区分开构词法和构形法。书中单辟一章谈“各类实词的构词法和构形法”,介绍现代汉语中各类实词的构词法,同时介绍各类实词中的构形法,指出其与构词法的不同。1986年宋玉柱《应该把构词法与构形法区别开来》[《逻辑与语言学习》,1986(5)]一文针对《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中的一些提法提出批评,指出“构词法与构形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创造新词”,并在其著作《现代汉语语法十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中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

构词法和构形法是两个不同概念,构词法是词语内部结构的方式,构形法是词形变化方法。经过学者们的分析与论争,这一问题已非常明朗。

(三) 关于造词法

从50年代末开始,已有学者认识到造词法和构词法的不同。1956年,孙常叙在《汉语词汇》中提出“造词法”,并且列出了一个细致的“汉语造词方法系统表”,但是他并未论述他所说的造词法与一般所说的构词法的异同,没有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1959年,王勤、武占坤《现代汉语词汇》认为对词的形式进行静止的分析是关于词的构造、构

成的研究，而构词方法是词的构造方法，或创造新词的方法，二者是不同的。作者在这里所说的“构词方法”，实际与孙常叙所说的“造词法”所指相同。

80 年代初，任学良出版了《汉语造词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一书，对汉语造词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此书，各家学者有不同意见。任学良认为，“造词法和构词法是纲和目的关系，在语法学造词法、句法学造词法里，造词法是纲、构词法是目”。刘叔新在其著作《汉语描写词汇学》和论文《复合词结构的词汇属性——兼论语法学、词汇学同构词法的关系》[《中国语文》，1990（4）]一文中，对以上观点进行了批评。周荐《汉语词汇研究史纲》中对《汉语造词法》颇多“可商榷的问题”提出批评，并进行了理论分析。许威汉《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书海出版社，2000）在承认《汉语造词法》一书某些地方有欠严密的同时，认为“它拓展的层面宽、举例丰富，而且涉及与造词有关的各个学科领域”，“提供同行学者进一步探讨”。该书能够大胆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有其新颖的一面，但对于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和阐释还是要求科学性，所以在阅读此书时要细加甄别。

（四）关于词的结构中重要的一类——复合结构的讨论和研究

1. 关于构词法学科性质的讨论

关于 90 年代以前汉语构词法属于语法现象还是词汇现象的讨论状况，周荐《汉语词汇研究史纲》中有清晰的论述，这里简要转述如下：

早在 1957 年，林裕文即在《词汇、语法、修辞》（新知识出版社）一书中提出了自己关于构词法的学科性质的看法，认为构词法“兼属语法学和词汇学是比较妥当的”。然而在当时的语言学界，这只是一个非常微弱的声音，大部分学者还是把构词法视为语法的内容。这在许多教材中表现明显，如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的《语言学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杨欣安、李运益、赵荣璇、林序达编著的《现代汉语》（重庆人民出版社，1957），叶蜚声、徐通锵编著的《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而吕叔湘和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郎峻章《汉语语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55）、洪心衡《汉语词法句法阐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更把词内部结构和词组结构看成是一回事。

80 年代初期，一些学者开始提出把构词法不只视为语法的内容，而且也把它看作词汇学的一项内容。何世达、郭明玖、柴世森合

编的《现代汉语》(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提出: “构词法可以在词汇学部分来研究, 也可以在语法学部分来研究”。戚雨村主编的《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5) 指出“语言的构词系统与词汇和语法都有紧密的联系。语言中词汇的充实和丰富主要靠构词法, 而且新构成的词及相应的构词手段, 又可以从各种词汇以及语义分类的角度加以研究”。上述两部教材尽管已接触到了问题, 但是还未具体指明属于语法学的构词法和属于词汇学的构词法所辖的范围, 因而给人语焉不详之感。

80 年代末, 丁全《也谈词的构成》[《南都学刊》, 1987 (3)] 和戴昭铭《现代汉语合成词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功能的关系》[《语文研究》, 1988 (4)] 的论述将此问题推向深入。丁文认为“词的构成自有它自身的规律”, 并根据词根义与词义的关系、词根义之间的关系, 对合成词结构形式重新进行了分析。“丁氏的观点冲破了对合成词分析的传统套数, 格外新颖, 不失为一家之言; 尤其是他反对用句法的模式去套词的结构方式, 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6] 戴文指出汉语中普遍存在同构异类(以相同的结构方式组合而成的合成词词性不同) 和同类异构(同一种词性的合成词不是一种结构) 现象, 批评了陆稼祥等“词的本身结构方式(包括形态标志) 可以决定词的性能”的观点。^[7] 戴文更指出“构词和造句毕竟不是一回事, 词法结构和句法结构势必具有各自的内在本质”, 并用大量的语言事实证明“句法中有而词法中无的组合类型, 是难以尽述的。相反, 也有一些组合类型只在词法中而不在句法中出现”, 并且“词法结构和句法结构的不完全对应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的根源在于词具有区别于词组和句子的本质特征”。“戴昭铭对词法结构有别于句法结构的认识, 突破了数十年来在词的结构方式问题上的定见, 饶有新意; 而且, 分析深入, 材料可靠, 确能以理服人。戴、丁二氏的分析, 对把词的结构的研究引向深入, 有着重要的意义。”^[8]

90 年代, 刘叔新发表《复合词结构的词汇属性——兼论语法学、词汇学同构词法的关系》一文, 论点鲜明地指出“复合词乃至各种词的结构方式以及构造新词的各种方法, 都是词汇学的研究对象。构词法只是其派生词结构和派生法能由语法学去研究”。在其著作《汉语描写词汇学》中, 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刘氏的理论主要从几个方面反驳了“复合词的结构是语法性质”的观点。简述如下: 首先, 复合词的结构不是句法现象, 从逻辑上讲, 在一个词的内部存在着词与词的句法关

系，这是说不通的，复合词的结构成分是词素，不是词，词素之间的结构关联当然不能是句法现象。另外，从语言的结构实质看，复合词的结构与短语的句法结构完全不同；同样，复合词两个词素之间也不存在词法关系。在复合词中，没有词缀，没有任何可以表示词性的语法成分，两个词素的顺序并不是一定词性的标志或表现手段，复合词两词素联结不存在词法的表现手段和语法意义。最后，复合词的词素序和句法上的词序是完全不同的。不同的复合词词素序不能在表示词性和某些意义关系上互相区别，不是显示不同语法意义的语法形式，而这种词素序所表现的词素之间的关系，既不可能是句法的组合，又不可能是词法上的语法意义、语法范畴，而只是词素意义彼此之间不很明晰的结合所形成的关系类型。

关于复合词的结构是否具有语法性质的问题，一部分学者是从语言史的角度来看的。汉语词汇经历了从单音词到复音词的发展过程，在复音词产生的过程中，“单音节有规则地搭配而成复音词和凝固性词组，语音造词逐渐被语法造词所取代”^[9]。这一点程湘清在《先秦双音词研究》一文中有详细阐释。王力认为：“汉语双音词的发展，是汉语语法发展的一大特点。”^[10]所以有学者据此认为现代汉语的复合词结构应具有语法属性。关于这一问题刘叔新在《复合词结构的词汇属性——兼论语法学、词汇学同构词法的关系》一文中也有所论及，他指出：“复合词结构在性质上与句法结构迥异，并不等于说它们相互间没有关联，很多复合词是古代词与词的句法组合逐渐词化的结果。”“在利用两个词或词根，使它们结合为复合词时，也往往会模仿或参照短语的结构模式，”“由于人们很熟悉，并经常运用着句法格式，在创造复合词时，自然很容易模仿其组合形式。这种格式近似的模仿，在词序作用突出的语言里比较多见，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复合词结构由句法结构转化而来的也好，由模仿句法结构的组合形式而建立起来也好，只要成了词的内部结构，它就具有和句法结构大不一样的性质。”“可以说，复合词结构只是在其相当大一部分中存在句法结构的投影。而投影并不能是物像本身。”

刘叔新从理论和语言事实方面，观点鲜明地指出“复合词结构只是词汇的现象，具有词汇属性”，反映了词汇学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的自觉意识，对词的结构方式的研究影响巨大。

2. 关于复合词的构成方式的具体研究

“文化大革命”之前，关于复合词结构的分析论述“大多限于分类

概说,不能深入结构的实质,难有说服力”^[11]。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人们对复合词的结构有了更为细致的观察。

(1) 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并列式词语内部顺序的研究。1979年陈爱文、于平发表《并列式双音词的字序》[《中国语文》,1979(4)]一文,把注意力放在并列式双音词的内部顺序问题上,认为决定并列双音词的字序的因素有两个:意义和声调。但文章只“着重分析说明了声调决定字序的情况及其生理原因,对意义决定字序的情况却一笔带过”^[12]是一个缺憾。但关于并列式双音词内部顺序问题的提出,很具有探索性。之后,词汇学界很多人对这一问题产生了兴趣,并且展开了讨论。1989年程家枢、张云徽发表文章对并列式双音复合名词意义决定字序的情况及其社会历史原因作了一些探讨^[13],这是对前人论述的一个补充。不过文章只对名词进行了分析,其他词类没有涉及。蒋文钦、陈爱文80年代初撰文对并列结构固定词语的内部次序进行讨论,扩大了讨论范围。^[14]嗣后,周荐发表《并列结构内词语的顺序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6(5)],吸收了前人的一些成果,结合语音、语义两个方面,对并列结构的各个小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2) 对于复合词结构认识的不断深化。80年代初,一些学者观察到现代汉语里存在着一些特殊结构类型的复合词,并对此进行了讨论。李行健的文章《从“救火”谈释词》[《辞书研究》,1981(4)]、《汉语构词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关于“养病”、“救火”、“打抱不平”等词语的结构》[《语文研究》,1982(2)],对“救火”、“养病”、“打抱不平”等结构特殊的词语进行分析,启发人们对于词语结构的解释不应仅以现代的意义来理解,而应联系古义。这是对词语结构研究方法的拓展。戴昭铭发表了《一种特殊结构的名词》[《复旦学报》,1982(6)],对现代汉语中沿用的文言词中偶尔出现的正一偏关系的名词进行分析。刘云泉在《现代汉语构词法中的前正后偏式》[《杭州大学学报》,1984(14)增刊]中认为“帽舌”、“雪花”等是用“舌”比喻“帽”,用“花”比喻“雪”,也是前正后偏结构。这几篇文章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汉语复合词构词法和造句法不是简单的平行关系。90年代仍有学者对特殊结构类型的复合词进行挖掘,如周荐《语素逆序的现代汉语复合词》[《逻辑与语言学习》,1991(2)]、周荐《几种特殊结构类型的复合词》[《世界汉语教学》,1992(2)]、彭迎春《几种新拟设立的汉语复合词结构类型》[《清华大学学报》,1995(2)]等,证明传统上所说的复

合词的格式实际上不能把汉语所有复合词的情况概括净尽。

80 年代,一些学者还对三字格、四字格结构方式进行了分析。主要论文如俞扬《汉语并列四字组合成词问题初探》[《宁波师院学报》,1986 (2)],马国凡《四字格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7 (3)~(4)],王承彦《现代汉语三音词剖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9 (4)],陈毓仑《谈同义词素构成的成语》[《中学语文教学》,1980 (1)],吴越《成语的复杂结构》[见《语文知识丛刊》(3),地震出版社,1982],曲成阅《并列结构成语的对仗特点》(同上)等。这一时期还注意到了缩略语的问题,马庆株《关于缩略语及其构成方式》(见《语言研究论丛》,第五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对缩略语的结构做了细致的分析。

90 年代,一些学者对于复合词的结构做了更深层次的分析、研究。周荐是其中卓有成就的一位,他发表了一系列这方面的论文:《复合词词素间的意义结构关系》(见《语言研究论丛》,第六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复合词构成的语素选择》[见《中国语言学报》,语文出版社,1995 (7)]等。其中《复合词词素间的意义结构关系》一文首次对现代汉语中的全部的双音节复合词词素间的意义结构关系进行了穷尽式的分类研究,为人们更全面清晰地认识研究复合词的结构形式提供了牢固的基石。而《复合词构成的语素选择》一文从句法结构规律、语义、语音、风格、习惯几个方面谈汉语复合词构成时对语素的选择问题,扩展了研究视野,论述了很多前人鲜有触及的现象。1999 年周荐发表的《双字组合与词典收条》[《中国语文》,1999 (2)]一文也从语素义角度谈到复合词的结构问题。

这一阶段还有一些学者对复合词构成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如彭永昭《研究构词法必须重视语义平面》[《重庆师院学报》,1990 (3)],强调构词法分析要重视语义;王政红《名形语素构词格分析——复合词构成格式研究之一》[《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 (4)]、饶勤《从句法结构看复合词中的一种新的构词方式——连动式构词》[《汉语学习》,1993 (6)]、高健平《从北京流行的新语汇说到“肌肉运动感觉+心理感觉”构词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2 (5)]分别选取一种构词方式进行探讨,问题虽小,但角度很新。

90 年代还有一些学者继续对三字格、四字格结构方式及缩略语结构进行研究。如:李赓均《三语素合成词说略》[《中国语文》,1992

(2)], 王吉辉《形容词性 ABB 式研究二题》(见《汉语言文化研究》, 第五辑,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5), 卞成林《现代汉语三音节复合词结构分析》, [《汉语学习》, 1998 (4)], 卢卓群《四字格成语的有形断裂及其作用》[《世界汉语教学》, 1992 (4)], 国怀林《关于合称及其构成方式》[《逻辑与语言学习》, 1991 (3)]。90 年代后半期, 周荐也将研究视野扩展到由三个语素及更多语素构成的复杂复合结构, 发表了《论四字语和三字语》[《语文研究》, 1997 (4)] 和《三字格结构分析》(见《词汇学问题》,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8)。在《三字格结构分析》一文中, 周荐以《现代汉语词典》所收的全部三音节单位为考察对象, 从节律、语素构成数量、结构方式以及构成方式几个方面对三字格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二、对现代汉语词汇意义的研究

对词汇意义的研究是 20 世纪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重头戏。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 现代汉语词汇意义方面的研究对语言事实的认识逐渐深化、明晰, 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对于 20 世纪现代汉语词汇意义的研究, 本书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叙述。

(一) 同义现象的研究

关于同义现象的研究, 周荐在 1991 年的《同义词语的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 一书中作了很好的梳理总结。在此将其中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的论争过程作一简要论述。

1. 什么是同义词及同义词与近义词的区分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 同义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 但是那时对词语同义现象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 既没有固定的术语, 也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 对语言词汇同义单位成系统的研究, 始于 50 年代初叶”^[15]。

关于什么是同义词, 50 年代经历了“义近说”(同义词就是意义相近的词)、“义同说”(同义词就是等义词)、“义等义近说”(同义词=等义词+近义词)。其中, “义等义近说”支持者很多。这些认识基本停留于对意义的近似性进行表面性的讨论, 对同义的根本性质还没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孙常叙 1956 年在《汉语词汇》一书中提出“近义词”的概念。认为“判别同义词, 唯一的依据就是它们是不是概括同一对象”, 而近义

词是“事物在现象上有表面的近似或共同的地方”而形成的有近义关系的词，词义之间的近似，“因为没可凭借的社会条件和语言条件，不能发生交搭关系以表达同一对象”，所以近义词是同义词之外的。这一观点否定了同义词的所谓近义性质。50年代末到60年代，张志毅、王理嘉、侯学超等学者继续对“义等义近说”中的“近义”提出不同意见。^[16]1975年，李行健、刘叔新在《怎样使用词语》（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一书中更明确地提出：“同义词是声音不同而意义相同或只有细微差别的词”，“两个词，若意义相差不远，却并非反映同样事物对象……并不存在同义关系，它们是近义词，不能看作同义词。”1980年刘叔新又在《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划分》（见《语言研究论丛》，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一文中把50年代孙常叙的观点进一步深化，指出：“所指事物对象的同一，是词与词能成为同义词的决定因素”，“划分同义词和近义词的依据，无疑只能是两者在词和词的意义关联上的不同特点。这不同特点的根本表现，就是指前者指同一事物对象，而后者各指不同而接近的事物对象。同义词由于指同一对象，因而是意义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而存在细微差别的词……近义词由于各指不同而相近的对象，只能是意义基本上不同而有些接近的词……因此，是否指同一的事物对象，成为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区别标志和划分准绳。”同时，又从词汇的结构组织高度，把同义词语纳入了聚合的系统：“同义词是词汇组织性的一种表现”，“同义词组是词汇中的结构组织”，而“近义词并非词汇的一种组织结构”，“近义词及词与词的近义关联，不是词汇学的描写对象。”这就从词汇意义结构的角度把同义单位和近义现象作了质的界定和划分，澄清了以往人们对同义现象的模糊认识，为同义词语的研究开拓了新路。

从60年代开始，经过王理嘉、侯学超、张志毅、刘叔新等学者的论述，同义词语单位的性质已很明确：同义词语不同于近义词语，它是因所指事物对象相同而在意义上相等或基本相同却略呈差异的一组词语。

虽然80年代还有一些学者坚持“义等义近说”，但因立论本身的偏差，并不具有说服力，且用其来分析语言现象时往往出现模糊不清、纠缠不分的情况。而另一些学者则对刘叔新等的观点予以支持，如田野的《同义词的性质》[《盐城师专学报》，1988（4）]。周荐更是把前人的研究成果做为立论的依据，分析了同义词语中的等义单位^[17]，研究了与

同义词语绝不同质的近义词的问题^[18]。

2. 语法属性不一致的词语能否建构同义聚合

关于这一问题的论争从 50 年代下半叶开始一直到 90 年代上半叶，持续了几乎半个世纪的时间。坚持“语法属性不一致的词语能构成同义聚合”的学者在论争的整个过程中只守住一个基点：词汇上意义的分析和语法上的区分词类并不是一回事，同义词的同义，指的是词汇意义相同，而不是语法意义相同。这些学者几乎都没有做更多理论上的说明。对此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注意到了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潜在关系，从理论和语言事实两个方面做了有利的阐述和论证。关于具体论争过程，周荐在《同义词语的研究》和《汉语词汇研究史纲》中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只将这一论争当中的某些论述择其一二摘录如下：

词与词之间的同义关系并非单纯的词汇意义比照，它还牵涉到词的用法和句法功能；词性也不单纯表现于语法领域，而是跨进了词汇中来，在个别的词上落实词类的划分，同词的含义很难说没有瓜葛。词性就是语法借以影响词的意义，进而渗入词汇的一种因素。[刘叔新：《同义词词典怎样处理词性》，载《辞书研究》，1983（3）]

词的词汇意义，主要是对某种对象的反映；而词类范畴则规定了从什么角度或以何种方式来反映这对象，就词的整个含义来说，显然成为一种有重大影响作用的因素。再从具体的语句组织的面上来说，就是词的句法功能和搭配特点等词类范畴借以体现的现象，成为词的含义所反映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个方面如若不同，反映对象的角度、方式也就不同，而这必然意味着两个词各有不同的反映内容，即各自的含义反映的对象有不一样的表现，即使在两个词的词汇意义反映同样的事物时也如此。两词的含义反映的对象表现不同，彼此间的差别就当然是不小的，它使得两个词之间不能有同义关系。（同上）

语法功能同词义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人对客观事物从怎样的角度去抽象概括便会形成怎样的概念，用词来表示，概念便表现为词义，而不同的抽象概括的角度实际上便已约束了一个词同其他词的搭配能力以及它能够充当句子成分的范围。[柯仪：《同义词反义词对照词典编纂研究》，载《辞书研究》，1986（3）]

同义词必须属于同一个语义场，既然词性不同的词已在抽象意

义上区别为两类，自然不应再属同一个语义场，因而也构不成同义关系。[邢向东：《关于确定同义词范围的几个问题》，载《语言文学》，1985（2）]

词的词汇意义指称事物现象、性质状态，还是动作行为由词的语法属性规定；规定的不同，自然会导致词的词汇意义的所指有异。[周荐：《同义词语聚合是否须语法属性一致》，载《固原师专学报》，1994（2）]

3. 关于确定同义单位的“同概念”说和“替换法”

50年代下半叶一些学者受苏联语言学家观点的影响，把是否同概念作为鉴别不同的词语有无同义关系的标准，提出了“同概念”说。崔复爰《现代汉语词义讲话》（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提出：“同义词是在同一概念内具有细微差别的词。”石安石在《关于词义和概念》[《中国语文》，1961（8）]一文中提出：“同义词，正确地说，应该是概念相同但词义有所不同的词。同义词间意义的差别，不能大到概念的差别，只能是在同一概念的情况下的细微差别，或所谓‘补充意味的差别’。”

“同概念”说提出后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如王理嘉、侯学超《怎样确定同义词》、张志毅《确定同义词的几个基本观点》、刘叔新《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划分》先后对此提出了批评。侯、王的文章举例指出，如果用是否同概念作为确定同义单位的标准，同义词的范围同样会随着各人对概念的不同理解而有所不同。张志毅认为“确定同义词时，用逻辑标准代替语言标准，用概念代替词义是不对的”，“把‘同一概念’作为确定同义词的唯一根据，实际上就是用概念代替了词义”，“逻辑仅仅是同义词存在的基础之一，而不是主要的基础，更不是唯一的基础；同义词存在的主要基础是词义的共同性”。刘叔新指出了“同概念”说两点根本性的弊病：第一，“可以从任何意义相近的实词概括出一个共同表现的概念”，这样一来，“所有的近义词，都可以是同义的，实际上取消了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区别”。第二，“虚词是不体现概念的，因为它直接表示词语组合的语法关系，这一语法意义的抽象内容并不充当判断的概念项，而是构成判断的诸概念组合关系的体现者。因此概念的标准势必把虚词排除出同义词的范围，而这是不合理的，因为虚词也可以有同义词”，“可见，依概念是否相同来确定同义词的提法，实践上、理论上都不适当”。

真理越辩越明，经过诸位学者的批评与分析，近年来已很少有人再

赞成“同概念”说。

从 50 年代起就有学者提出以替换的方法看词与词的意义是否相同。高名凯在《普通语言学》(东方书店, 1954) 中提出, 有些词“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互相替代, 而保持其同一的意义”。之后, 这一观点被孙常叙的《汉语词汇》、何霭人的《普通话词义》(新知识出版社, 1957)、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教研室编的《语言学基础》所吸收和发挥。50 年代另外一些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 但并未引发争论。如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八) [《语文学习》, 1956 (2)]、洪梦湘《同义词的差别》[《语文学习》, 1957 (7)] 都举出语言中的实例, 指出同义词可以互换是有一定限制的, 并不是所有的同义词都可替换。到 60 年代, 关于“替换法”产生了激烈的争论。1963 年王理嘉、侯学超的《怎样确定同义词》, 进一步把替换性看作是词与词之间有同义关系的最重要的依据。他们认为“词可以在一定的上下文中互换代用, 这是构成同义性的一个必要条件”, 同时又认为“撇开意义不管而只根据是否可以在言语中互换, 同样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词之间含义上的共同性和使用上的可替换性是确定同义词的两个共同的必要条件”。之后, 很多学者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张志毅在《确定同义词的几个基本观点》[《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1965 (1)] 一文中指出, “同义词的附带意义或根本意义的一小部分是不同的, 这种细微差别又决定了互相替换是有局限性的”, “同义词的替换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同义词的不可替换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替换并不是同义词的本质特征”。刘叔新在《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划分》一文中抓住王、侯二位观点的矛盾, 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指出: 替换和意义共同性两个标准并不是完全统一的, “有着意义上的共同性, 并不必然同时可以相互替换,” “可以相互替换并不必然也有意义上的共同性。”周荐在《同义词语的研究》一书中也犀利地指出了侯、王文章的自相矛盾之处, 指出“能够彼此替换的词语, 未必就‘意义非常地近似’, 意义不相近的词语也不能排除有相互替换的可能。这样看起来, 这两个‘必要条件’是不大可能处处相吻合的”。刘叔新的文章还进一步指明同义词不能随意互换的原因和任意替换的结果, 并且深刻地指出, “能互相替换和不能互相替换, 都出现于同义词和近义词之中, 能否替换根本上不取决于是同义词还是近义词, 而要看是否不走失原意。以替换性来确定同义词, 显然不合理也必然行不通”。张志毅和刘叔新的文章发表后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支持和赞同。学术界

的意见基本趋向一致,说明替换作为一种方法,在同义词语的确定中是不足取的。

关于同义词语的辨析方法,80年代还有“义素分析法”和“同形结合法”。“义素分析法”将在下文论及,“同形结合法”1980年由刘叔新在论文《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划分》中提出,具体内容和评述参考刘氏论文和周荐《同义词语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述。

关于同义词语研究史的研究,需要重点介绍的是周荐《同义词语的研究》一书。此书对国内50年代到90年代同义词研究工作做了系统而细致的梳理总结,对同义词语研究的现状和得失分专题进行介绍和点评,梳理脉络,指引方向,使人们对现代汉语同义现象研究的历史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作者在书中还敢于依据语言事实阐发自己的观点,对前人时贤的学术观点品评得失,有许多真知灼见。近年来,池昌海连续发表《五十年汉语同义词研究焦点概述与认识》[《杭州大学学报》,1998(2)]、《对汉语同义词研究重要分歧的再认识》[《浙江大学学报》,1999(1)]两篇文章,也对同义词的重要理论分歧问题进行分析、点评,在同义词、近义词区分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同意见,如认为“坚持‘近义词’不是‘同义词’的说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操作中都没有充足的理由,纯属名词之争”。他试图对同义词的定义提出新说,但“与他所非否的刘叔新、周荐诸先生之说实质并无大异”^[19]。

学术是在不断论争中发展的,问题被提出来才有可能得到解决。随着分歧的产生、论辩、消除,同义词的研究也将越来越深入。

(二) 反义现象的研究

对于反义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反义关系性质的认定和构成反义关系的单位范围的划定上,下面分别论之。

1. 关于什么是反义词的认识不断深入

50年代末,已有学者注意到反义词问题。如魏建功《同义词和反义词》[《语文学习》,1956(9)~(11)]从概念角度简单谈了反义词的性质:“反义词就是表现一个概念相对的两方面的词。”例如:大、小,上、下,多、少,生、死,等等。比较来说,孙常叙《汉语词汇》中的定义就更明晰:“彼此涵义相反或相对的词是反义词……它们两方都是属于同一类概念的外延的。例如,‘长、短’都是属于长度的,‘宽阔、狭窄’都是属于广度的。”孙常叙还在书中把反义词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逆用的”,肯定是甲必否定是乙,肯定是乙必否定是甲,否

定是甲必肯定是乙，否定是乙必肯定是甲。举例如“直一曲”、“完整一残缺”；二是“不可逆用的”，肯定是甲必否定是乙，肯定是乙必否定是甲，但否定是甲并不肯定是乙，否定是乙并不肯定是甲，举例如“肥一瘦”、“开头一结尾”。周荐指出，“孙常叙为反义词的这种分类，有着开创性的意义，后人把反义词分作‘绝对反义词’和‘相对反义词’，其理论就源出于孙氏的主张”^[20]。之后，1957年，何霭人提出“反义词也有绝对反义词和相对反义词的区分”^[21]，“绝对反义词”、“相对反义词”其实就是孙常叙所说的“可以逆用的”、“不可逆用的”两类反义词的新称谓。孙良明1958年也有类似的论述，“从词所表达的概念的内涵来看，反义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没有中间概念的，是完全互相排斥的，例如‘活一死’；一种是有中间概念的，不是完全互相排斥的，如‘黑一白’。”^[22]这是从概念的角度来分析的。

此后关于反义词性质的认识没有太大的推进，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的80年代，关于反义词的认识才有了长足的进步，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83年，石安石、詹人凤发表《反义词聚的共性、类别及不平衡性》（见《语言学论丛》，第十辑，商务印书馆，1983），提出“反义词聚”的概念，“通常说，某词与某词是反义词，严格地说，应称反义词聚，”指出反义词聚的共性有两条：“第一，两项词义间的关系必须是逻辑学概念间的可比较关系中的不相合关系。”如“真一假”、“老师一学生”，其关系是“是A则非B，是B则非A”。“第二，两项词义必须在某一个语义成分上相反，而且只在某一个语义成分上相反，如长、短都指长度，在程度上高低相反。”这一论点的提出，比前人有了很大进步，文章具体分析了“长、短”、“真、假”这两类反义词的对立情况，认为“长一短”，“两项词义间具有极性对立关系。一般地说，两个词处于同一轴线的两极，两极之间存在着某种中间状态”。“不处于轴线的两极，但处于与轴线中心等距离的两侧的两个词……并不形成对立，从而也不形成反义词聚”。而“真一假”，“两项词义间具有互补对立关系，即逻辑学中的矛盾关系。否定此一方即意味着肯定另一方”。“这类反义词聚的特点在于不存在一个非A非B或不A不B的中间状态，尽管有时候对立面间的界限是模糊的……”这一论述是在50年代的学术基础上提出来的，但更为透彻、明晰。文章还提出了“反向对立的反义词聚”。反向对立的反义词聚分为如下三小类：（1）“表现为方位和时间的反向对立”；（2）“表现为社会关系上的反向对立”；（3）“表现

为行为活动的进程上的反向对立”。这一分析反映了作者对反义关系的认识比前人更为细致深入。

1988年,刘叔新《论反义聚合的条件和范围》(见《语言研究论丛》,第五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继续对反义聚合进行探讨,指出“语义的相反只是反义聚合的基本条件,并不等于聚合的全部条件或充分条件”。“互为前提地彼此制约,也是反义关系的一个决定因素,是反义聚合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刘叔新在同年发表的《汉语反义词语的类别和特点》[《世界汉语教学》,1988(3)]一文中概括了汉语反义词语赖以成立的六个条件,在专著《汉语描写词汇学》中,又把这六个条件简化为五个,并进行了细致的说明:“(一)不同的词语单位之间在语义上相反。这语义相反的一个比较通俗、贴切的解释,是互不相容”;“(二)除了彼此相反,语义上必须互为存在的前提。就是若不存在A,便无所谓B,不存在B,也无所谓A”;“(三)不同词语的理性意义只在某个方面上相反,其他方面须彼此一致。理性意义不止一个方面上彼此相反的词语,是不能互为反义词语的”;“(四)语义相反而互为前提的单位,须能共同出现在某种语体、某种风格中。只有存在这样的条件,人们才是把相应的不同词语单位看作互相联系的,才会在它们之间建立起相反对照和互为前提的联想和关系”;“(五)词与词之间要确立反义关系,要求两个词的词性相同;如果固定语进入反义组,也要求它在语法功能上同意义相反的单位(词或固定语)一致,如都相当于形容词的作用或动词的作用、名词的作用等”。至此,关于反义词语的确定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并且有了明确的参考标准。这对于反义词语的分析研究、结束以往反义词语与非反义词语纠缠不清的状况,具有重要的意义。

80年代,提出“言语反义词”的问题,是对于反义词认识的又一进步。符淮青1981年发表《言语反义词》[见《语文知识丛刊》(2),地震出版社,1981]一文,提出了言语反义词现象。文中说:“有不少非语言反义词,在一定的上下文中,在一定条件下,表示了相反的意义,构成了反义关系。我们把这种情况叫言语反义词。”比如,“不作风前的杨柳,要作岩上的青松”中的“杨柳”和“青松”等等。他还分析了言语反义词的成因,认为“常见的有三种情况”:“(一)词的比喻用法使相关的词成了言语反义词”;“(二)词的借代用法,使相关的词成了言语反义词”;“(三)相关的词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尖锐对立的双方,成了言语反义词”。总之,言语反义词都是在一定语境中,一定条件下

产生的。在《现代汉语词汇》中符淮青进一步指出：语言反义词、肯定否定式和言语反义词，都属于“反义表述”，“而言语反义词的运用更是大量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是语言研究者所面临的第一个岔路口，区分开语言问题和言语问题对于我们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而言语反义词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提高人们对反义词的认识也大有帮助，“不仅把以往被一些学者搞混的语言反义现象和言语反义现象区别了开来，而且拓宽了反义现象研究的视野，对于人们从更宽广的角度上认识和研究反义现象是有裨益的。”^[23]

80年代反义词研究的另一个创获是提出了“对义词”的概念，它最早是由朱星等学者提出来的^[24]。在《汉语词义简析》（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中朱星所说的“对义词”是就对联上下两联中相对的字而言的，他说：“上联是‘天’，下联就用对义词‘地’，上联是‘天上’，下联就用对义词‘地下’……”，他指出“对义词一般与反义词相混，其实稍有别：对义词义可并存，反义词义相克不能并存。如天和地，日和月，是对义词；生和死，好和坏，大和小，是反义词”。李兆同、徐思益在其主编的《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一书中则从语言的角度更为具体深入地探究了“对义词”这类词义组织关系。他们指出“对义词是一些处于平等平列的词。它们经常出现在一些联合性的短语里，在意义上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对义词的意义并不互相矛盾，但彼此之间的界限是分明的，例如‘男人—女人’，‘父亲—母亲’，‘买—卖’，‘收—发’等”。1985年，贺彬在《反义词三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5（1）〕中认为“‘对’是表示客观事物彼此相互对待的两端，这种相互对待的两端事物反映在词汇里就是‘对义词’……对义词就是‘具有对立联想意义的一对词项’。所谓‘对立联想’，就是在人们的意识中往往由甲事物而自然联想到与之相对立的乙事物，有甲的存在，也就有乙的存在……这里所说的‘对立联想’，不是任意的，它必须具有逻辑上对立的必然性”。但是作者认为“‘对’的实质还是‘反’”，“反义词和对义词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一般所说的反义词，既包括意义相反的，也包括意义相对的”。可以看出文章对对义词问题的探讨虽有颇多可取之处，但在作者的观念上并没有把对义词和反义词很清楚地区分开。1988年刘叔新《论反义聚合的条件和范围》没有用“对义词”概念，但是却对“对立”和“相反”的关系进行论述：“相反是对立，但是不少的对立并非相反。”“对立和相反并不相等，或者说，

对立并不必然意味着相反。”

90 年代，关于对义词和反义词的区分问题，刘叔新有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在《汉语描写词汇学》一书中，作者“是在论反义词语时兼论对比词语，在论对比词语时兼论反义词语，在相互比较中阐述这两类词语的区别和联系的”^[25]。作者在论述确定反义词的五个条件之后提出：“要确定反义组，其实主要就是将反义组同对比组划分开来”；“不同的词语若意义上互为对立面而彼此对比，但或者未构成意义相反，或者构成相反关系而并不互为前提，或者不止一个主要理性意义成分，或者虽只有一个主要理性意义成分相反而其余主要理性意义成分却不一致，就构成对比组。”“对比组总是反义组前三个必要条件上有某部分的欠缺或完全欠缺，因而互有对比关系的词语只是在意义对立面上互相对照、映衬，并非彼此有反义关系强烈地在相反方面上互相对照和制约。”“对比组也是具有反义组的第四、第五两条件的，即其成员能出现于同样的语体和风格，在词性上或语法功能上一致”，“对比组和反义组的区别，就表现在反义组前三个条件是不全具备、不具备还是完全具备上。根据这三个条件，可以把对比组和反义组区分开来；而根据部分或完全欠缺这三个条件的情况以及必须具备反义组合两个条件的要求，则可以把对比组确定下来。”这样的论述明白清晰，有使人豁然开朗的感觉，而且书中把对比词语作为词汇的一种结构组织来考察，是理论高度的提升。在《词语对比的聚合以及反义聚合的比较》[《语文研究》，1991(3)]一文中，刘叔新仍旧从对比的聚合和反义聚合的比较来谈对比组的性质，并对对比组的结构以及对比词的修辞作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2. 关于什么样的单位可以构成反义关系的认识不断修正

50 年代，学者们对关于什么样的词可以构成反义关系的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比如关于反义词是否应词性一致的问题，认识比较一致，那就是有反义关系的词一定要词性一致。但是某些学者对于反义关系的单位问题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张拱贵在《反义词及其在构词上和修辞上的作用》[《中国语文》，1957(8)]中把“‘好’和‘不好’，‘聪明’和‘不聪明’等看作反义词中的一类——‘带不字的反义词’”。高庆赐《同义词和反义词》(新知识出版社，1957)也持相同看法。

崔复爰《现代汉语词义讲话》一书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好—不好’‘干净—不干净’不是反义词，因为‘不’是表示否定的副词，加‘不’也能表示对比的意思，但着重的是肯定、否定的对比。反义词不

是用否定的形式表示出来的，不是加否定副词所表示的简单对比。加‘不’已经不是词而是词组了。”之后，孙良明在《反义词》、盛守谋在《有关意义相反的词的几个问题》[《语言文学》，1958（3）]、周祖谟在《汉语词汇讲话》中都发表了与崔复爱类似的想法。今天看来，这一问题已经非常简单，但在当时人们还是经过了一番思考的。没有前辈学者探路性的思索，也就没有我们今天学科的发展。

在孙良明的《反义词》一文中，作者提出：“从形式来看，有单音词和单音词成为反义词的”，“有单音词和双音词成为反义词的”，“有双音词和双音词成为反义词的。”这反映了作者对反义词的形式问题的看法。到了80年代，在关于反义的词是否要形式一致的问题上出现了争论。钱倚云《反义词定义的刍议》[《语文学习》，1982（11）]认为：“词汇意义相反或相对、内部结构和语音形式相一致的词是反义词。”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认为：“反义词间在音节、结构方面，也要求一定的对应性。”许多学者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如石安石、詹人凤《反义词聚的共性、类别及不均衡性》指出：“汉语中词的音节的多少与词的风格特点有密切联系，因此，组成反义词聚的，往往是单音节词对单音节词，双音节词对双音节词。这体现了风格上一致这一要求。但也不能认为在汉语中只有音节数相同的词才能组成反义词聚。”郭良夫《词汇》（商务印书馆，1985），周荐《略谈反义词语的几个问题》[《逻辑与语言学习》，1985（5）]也都认为音节数量、是单纯词还是复合词不是判断是否构成反义词的标准。周荐指出：“只有那些文字色彩极重的单音节词，才要求音节数量必须一致”，“非此类的词语，其是否对等，似不是它们能否成对使用的先决条件。”

孙良明虽然认为单音词和双音词可以构成反义词，但在词和词组能否构成反义关系的问题上，界定却比较苛刻，认为“一个词和词组，即使表示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概念，也不能看作反义词，如‘乱’和‘井井有条’，‘麻痹’和‘提高警惕’”。词组里包括自由词组和固定词组。固定词组和词都是语言的词汇单位，因此它和词是可以构成反义关系的。60年代，刘叔新在《论词汇体系问题——兼与黄景欣同志商榷》一文中站在组织结构的高度来谈反义关系。他说：“同一语言的两个词汇单位，不论是词或固定词组，只要它们的意义相互间体现了概念的相反关系，就有资格成为反义的组织结构。”“当然词和固定词组构成反义关系，就不能再叫做‘反义词’”。周荐《略谈反义词语的几个问题》把

“意义相反的一对或一组词语”叫做“反义词语”，他认为，“反义词语是人们对客观世界中矛盾、对立的事物现象认识并加以对举而后形成的。与词有矛盾、对立的关系并可以对举使用的不见得只能是一个词，也可以是诸个词，甚至可能会包括一些固定语……那种认为反义关系只能是单个词项对待的观点，显然是不妥当的”。这种认识是基于对反义关系本质的更深层次的审视和把握。

（三）词的多义性和词义的发展变化的研究

多义词是一个词有多个意义，而且这些意义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五四运动之后，我国学者已经开始用词义“扩大”、“缩小”、“转移”来讨论词义的发展变化。许威汉《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一书记述了此术语的来历和当时的研究状况：

自从德国保罗·赫尔曼从逻辑语义学那里借用来的语义扩大、缩小、转移说法传到中国，三四十年代我国学者用以说明汉语词义的演变。较早的是张世禄 1943 年在《文学期刊》第一卷第一期《言语演变的原则》一文中谈到，王力 1936 年至 1937 年在燕京大学讲课中谈到（讲稿收入《中国语文概论》一书），后来汪馥泉 1940 年在《学术杂志》二辑发表《语汇试论》一文也袭用了张、王等的说法。王力 1947 年发表《新训诂学》，其中谈到词义扩大、缩小、转移说的来历和影响；张清常 1948 年在《辞义演变与文言文》一文〔《周刊》6 卷（似为 1 卷误——编者按）118 期〕中谈到词义演变问题，基本上同意张、王、汪等的见解。

50 年代，有许多专著和论文论及多义词问题，如孙常叙的《汉语词汇》，周祖谟的《汉语词汇讲话》，崔复爰《现代汉语词义讲话》，何霭人《普通话词义》，张世禄《词汇讲话》〔《语文知识》，1956（1）～（6）〕、王勤和武占坤《现代汉语词汇》以及论文《关于多义词的几个问题》〔《语文学习》，1957（5）〕和《略谈多义词和反义词的关系》〔《语文学习》，1958（1）〕、刘镜芙《对现代汉语词的多义现象的观察》〔《语言学论丛》，第 2 辑，新知识出版社，1958〕、孙良明《词的多义性跟词的演变的关系和区别》〔《中国语文》，1958（5）〕、肖文《词的引申义和比喻义》〔《语文学习》，1959（2）〕等等。这一时期人们对多义词的普遍认识是：多义词是一个词而有几个意义，而且这几个意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多义词的诸个意义中有基本义和转义之分，转义包括引申出来的引申义和比喻形成的比喻义。

六七十年代,研究多义现象的文章不多,如孙良明《汉语同音词、多义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62(1)]、高庆赐《试论汉语一词多义的内部联系》[《中国语文》,1978(3)]、张启成《关于一词多义》[《中国语文通讯》,1979(6)],在理论上没有太大突破。

80年代,关于词的多义性的研究有了新的收获。武占坤、王勤在《现代汉语词汇概要》中探讨了“多义词的常用意义和非常用意义”、“多义词的自由意义和非自由意义”问题,并且指出“多义词的变义之间,还可能存在派生与派生者的关系”。

符淮青的词汇研究以深入分析词语单位内部的意义要素见长,这也体现在他对多义词的分析当中。在《现代汉语词汇》一书中他提出:“为了分析多义词不同义项的意义,要能分辨词义和词素义。”“多义词可以根据它包含的词义义项、词素义义项的情况来分类”:“(1)全部义项是词义的多义词”;“(2)一个义项是词义,其余都是词素义的多义词”;“(3)词义义项多,又带词素义的多义词”;“(4)多义词素的多义词”。

关于多义词义项产生的原因和手段,五六十年代的学者一般认为有比喻和引申两种。70年代李行健、刘叔新在《怎样使用词语》一书中指出词义暂时改变有五种方式:“特指”、“引申”、“比喻”、“代替”、“承受”。葛本仪在《汉语词汇研究》中也提出了“代位法”和“特指法”。孙锡钧在《论词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4)]一文中指出词义引申的规律有五条:“(1)从具体到抽象”;“(2)从个别到一般”;“(3)由部分到全体”;“(4)由笼统到具体”;“(5)由实词到虚词”。角度与前人不太一样,论述更为细致具体。讨论多义词义项产生的原因,其实就已经和讨论词义的发展变化联系在一起了。

50年代,有一些学者谈到词义的历史变化问题,论文如玄常《词义的变迁》[《语文学习》,1953(4)]、孙良明《词义演变的原因》[《语文学习》,1959(3)],专著如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崔复爱《现代汉语词义讲话》等等。他们的论述中常常提到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但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又往往说得不清楚。“文化大革命”之后,义素分析法的引入为解决这一问题创造了条件,蒋绍愚1985年发表《词义的发展和变化》[《语文研究》,1985(2)],指出“中心义素不变,限定义素减少,就是词义的扩大”,“中心义素不变,限定义素增加,就是词义的缩小”,“保留原有的若干义素,但中心义素

改变，就是词义的转移”。这一论述使我们的认识豁然明朗。

80 年代末，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学者们开始对多义词的本义和基本义的区别提出自己的意见。黄荣发、汪长林在《也谈现代汉语词的本义与基本义》[《安庆师院学报》，1988（4）] 中认为，“讲词的本义是从词的历史发展这个纵向角度看问题，而讲词的基本义则是从词义的应用频率这个横向联系看问题”。此时期王政红《略论现代汉语多义词的语义体系》[《苏州大学学报》，1989（2）～（3）] 则试图用组合、聚合的理论对多义词的语义体系进行分析，这是新方法、新理论的引入为多义词研究提供的新思路。

90 年代有学者认为“引申义”、“比喻义”之说不妥，并做了新的划分。如卢丹慈《汉语多义词词义派生类型的重新划分》[《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0（2）]、曲烜《现代汉语词义的派生方式新论》[《河池师专学报》，1992（2）]，但他们的划分也不尽如人意。90 年代前后，文化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也对多义词研究产生了影响。这一时期，一些学者从文化背景方面讨论词义。邢福义主编的《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从文化影响角度谈了词产生新义的主要原因，指出“有一些词义之所以会发生变化现象确实是社会文化影响的结果”。苏新春《汉语词义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也从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谈了词义演变，而且书中结合汉语谈词义演变，有许多新收获。另外，此阶段朱景松《现代汉语中义项平行的多义复合词》[《语文建设》，1992（1）]、徐志成《义素分析与多义词释义》[《安徽大学学报》，1990（3）]、张联荣《词义引申中的遗传义素》[《北京大学学报》，1992（4）] 等也都从新的角度对多义现象进行了探讨。

（四）关于词语的表达色彩的研究

1. 关于表达色彩性质的认识

对于词语的表达色彩，展开分析最早同时研究也最多的是感情色彩和形象色彩问题，但是早期研究关于表达色彩性质的认识还比较模糊。60 年代，高名凯、石安石《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63 年）指出：“词义中还可以有附加于理性意义之上的某种色彩，即一般所说的形象色彩、感情色彩、风格色彩等。”70 年代李行健、刘叔新的认识更为深入：“不少词义除了事物对象的抽象反映之外，还含有感情意味和形象性等成分……这些意义成分都是依附于抽象意义的表达色彩，它们是感性的（——感觉的），而不是理性的（——抽象认识的）。”“词义都必然

有对事物对象的抽象反映，却不一定有表达色彩……抽象地反映事物对象的理性意义，对词义来说，是根本性东西；表达色彩作为感性的意义成分，相对来说较为次要，它依存于理性意义。”^[26]李、刘二位对表达色彩和理性意义的关系、表达色彩在词语意义中的地位作了清晰的论述。刘叔新在《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划分》中又对此问题作了进一步阐释。1980年徐志民也在文章中阐述了对感情色彩和词义的关系的认识：“词的感情色彩正是伴随着某种词义产生的一种补充方式。”^[27]80年代初，义素分析法的引入使人们对词与表达色彩的认识上升了一个台阶。1982年刘叔新在《论同义词典的编纂原则》[《辞书研究》，1982（1）]一文中对义素进行了细致的分类，认为“义素分理性义素和感性义素两大类；理性义素又分主要的、次要的两种。两个词义，只要有一个主要的理性义素不同，就说明在外延和内涵上都不一致，即各反映不同的对象。次要理性义素是‘意味’的成分，只反映事物的一般特点，不造成外延的差异。感性义素就是表达色彩，与意义的内涵外延无关”。这一论述，使人们得以从更本质的层面上了解词语的表达色彩。1985年符淮青在《现代汉语词汇》中对于词的色彩的论述也切中要害：“词的各种附属色彩，也叫词的附属义。应该指出，‘附属义’的‘义’同‘概念义’的‘义’意思不同。概念义的‘义’是：（1）词所标志的客观事物的一般本质特点的反映，各个词的概念义有千差万别的内容；（2）有特定的语音形式同它联系。附属义的‘义’：（1）反映的不是词标志的客观事物的一般本质特点，只是表明运用者的主观态度感情或词运用的交际场合（不考虑形象色彩），词的附属义只分几个重要类型；（2）它附着于概念义从而同一定的语音形式联系，附属义本身一般没有特定的语音形式同它联系。”有些学者对表达色彩的地位认识存在偏颇。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一书，认为词的意义包括词的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和色彩意义三个部分，“色彩意义”就是一般所说的表达色彩。这样表达色彩就被当作与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同等地位的概念看待。书中还提出“语言中的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的色彩意义”。周荐《词的表达色彩的性质和类别》[《天津社会科学》，1993（6）]一文批评了这种观点。他认为，语言中词的意义，从其功能上看可以分为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从其在语义系统中所处的地位等方面看，又可分为理性意义和感性意义。笼而统之地把词义分为词的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和色彩意义三个部分，易使人们把从不同的角度为词义划出的类别搞混。并且“表达色彩

自身不构成义位和词位”，“词反映客观对象主要是凭借理性意义，表达色彩只是随附性的意义成分，至于说这随附性的意义成分是有还是无，或者是哪一种，则由语言社会视需要而定”。在《词语表达色彩的性质和显映方式》（见《词汇学新研究——首届全国现代汉语词汇学术讨论会选集》，语文出版社，1995）一文中，周荐对表达色彩的显映方式做了研究，认为表达色彩有三种显映方式：自显式、对显式、从显式。这是对表达色彩的形式特征进行的挖掘，这样的研究比以往只凭语感来主观判断表达色彩问题更为科学、严密。杨振兰 90 年代在词语表达色彩方面的研究也值得注意，她发表了多篇论文，《色彩意义的语用分析》（见《词汇学新研究——首届全国现代汉语词汇学术讨论会选集》）、《色彩意义的类型、特点和作用》（见《汉语词汇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和一部专著《现代汉语词彩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在论述中她同意葛本仪关于“色彩意义”的观点，但是在具体论述时却运用了其他学者的理论，比如刘叔新关于形象色彩分类、形象色彩和同义词关系理论等，其所举实例也未遵循每个词都有色彩的原则。其具体论述中亦有很多可重视的方面，比如《汉语词彩学》一书注重从语境、语用角度对词的色彩进行分析，言之有物，很有参考价值。

2. 对某些具体种类的表达色彩的研究

80 年代开始，人们对表达色彩问题越来越关注，提出了众多的表达色彩种类，有感情色彩、形象色彩、语体色彩、风格色彩、时代色彩、地方色彩、态度色彩等等。对一些色彩，各家的说法和称名还不尽一致，这其中研究最多、争论最多，取得成果最大的是词语的感情色彩和形象色彩问题。

（1）关于感情色彩。五六十年代，关于词语的感情色彩，许多学者都是从褒贬角度来谈的。吕叔湘、朱德熙在《语文学习》1953 年 10 月号上发表的《词义》中有“词义褒贬”一节。汪同薰《谈谈词义褒贬》[《语文学习》，1955（3）]谈到词义褒贬的辨别问题。之后的学者如蓝仲文[《词的感情色彩》，《语文学习》，1959（2）]、白文[《如何理解词义含褒贬》，《语文知识》，1960（4）]、袁晖[《浅论词的感情色彩》，《学语文》，1960（6）]、窦光宇[《试论词的感情色彩》，载《学语文》，1960（7）]等都对感情色彩问题有所论述，但进展不大。到了 80 年代，对于感情色彩的认识逐渐深入。1980 年徐志民发表的《关于词的感情色彩的几个问题》对于感情色彩和词的理性意义关系的认识值得重视，

同时他还指出：“词所带有的感情色彩并非临时获得的，而是它们所固有的。这是一种词汇现象。而词在特殊言语环境下才具有的感情色彩是临时获得的，是一种修辞现象。”许威汉在《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中谈及这一问题时指出，分析词的感情色彩，要注意历史变化的一面，还要重视地域因素，这一意见是非常正确的。在同一语言系统共时平面上对感情色彩的研究，区分开词汇现象与修辞现象也是至为重要的。徐志民还认识到词的感情色彩是多种多样的，“细分起来，词的感情色彩有亲切、赞许、礼貌、庄重、崇敬、讽刺、嘲笑、厌恶、贬斥、蔑视等许多种……”这一认识改变了只简单地把感情色彩分为褒、贬、中三国的做法，对感情色彩的认识更为细致、深刻。

之后，章炎《浅谈词语的感情色彩》[《辽宁大学学报》，1983(5)]、周荐《试论词的感情色彩及其构成方式》[《天津社会科学》，1985(3)]、邢向东《词义褒贬新探》[《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5)]都对词的“褒贬”说提出不同意见。其中周荐对把具有感情色彩的词只分作褒义词、贬义词两类的做法提出三条讨论意见。第一，“人们对客观现象的感情评价不是用褒贬两类就可以概括净尽的，这其中不只有褒扬和贬抑，而还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种类”；同时褒贬说“把语言中那些既无褒赞意义又无贬损意义的词统统定为中性词，这‘中性’词其实就不能同所谓的褒义词、贬义词中的相当一部分形成对立，即不成为‘中性’”。第二，“所谓褒义词、贬义词其概念本身就是模糊的。词义所具有的感情特点何种程度为褒，何种程度为贬，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尺度和准确的界说”。第三，“无论是词的理性意义还是感性意义，都有褒贬之分，‘褒义’‘贬义’都可以指词的理性意义或感性意义。如果把‘褒义’‘贬义’仅理解成色彩的分类，就会使一些只是理性意义有褒贬的词在性质上模糊起来，仿佛成了感情色彩上的褒贬的词，从而造成认识上的混乱。”最后一点意见提醒人们要区别理性意义上的褒贬和感情色彩上的褒贬，这最为重要。邢向东《词义褒贬新探》中发表类似意见：“褒贬决不仅仅是附加于基本词义之上的‘色彩’而已。”之后，又有学者从其他角度来谈感情色彩，比如甘玉龙《词语褒贬色彩的历史演变》[《中国语文天地》，1987(2)]以历史的眼光谈了词语意义的褒贬变化。

(2) 关于形象色彩。1963年高名凯、石安石主编的《语言学概论》就提到形象色彩问题，但对形象色彩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还是从80

年代开始的。1980 年刘叔新发表《词语的形象色彩及其功能》[《中国语文》，1980 (2)]，指出：“很多词语，除代表一定的对象这种理性意义之外，还同时含有关于该对象的某种形象感，这就是形象色彩。称为‘色彩’，能够表明在词语意义中的次要性质和依附于理性意义的地位。”提出词语的形象感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动觉等形象感觉，以视觉居多。文章重点分析了形象色彩主要分布的词语类型和产生的基本来源（八个大类），并分析了词语的形象色彩所具有的功能（三个方面）。刘氏的文章对形象色彩各个方面的细致分析、梳理是前人所不及的，也为后人在词语的微观意义方面的研究开拓了一片天地。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学者们对形象色彩问题的注意。1981 年孙维张发表《略论词义的形象色彩》[《吉林大学学报》，1981 (5)]，其观点与刘叔新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当人们听到或看到一个词时，人的大脑除了理解它的基本意义之外，还经常伴随有词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形象出现”，“我们把词的这种‘形象意义’称为词义的形象色彩”，“客观事物的形象作用于我们的感官，在我们的头脑里所产生的心理印象……都是由客观事物的名称，即词语唤起的，因而都是词义的形象色彩。”他认为“牛”、“人”、“山”、“海洋”、“大”、“小”、“来”、“去”这些词，都具有形象色彩。周荐 1992 年发表《也谈词语的形象色彩问题》[《南开大学学报》，1992 (5)]，对刘、孙二位的观点进行了分析，批评了孙氏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以及对刘文的曲解。周文指出：“孙先生在这里断定具体事物自身的形象和词语的形象色彩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而且明显地把词语本身的形象色彩与人的意识中对于具体事物的表象混同了起来。”周文指出这是孙氏文章中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进一步指出：“表象所提供的感性形象，有的能被词语接受、反映出来，成为形象色彩，有的不能被词语接受、反映出来，形成不了形象色彩。表象呈现形象所凭藉的是人的思维，词语呈现形象色彩靠的是语言形式”，“客观事物有形象，反映该事物的词语不见得就有形象色彩；客观事物貌似没有形象的，反映这种事物的词语不一定就没有形象色彩”，“词语有没有形象色彩是词语意义系统发展、变化、调节的结果，是语言社会决定的，词语的形象色彩和客观事物的形象之间也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后来，在《汉语词汇研究史纲》中周荐进一步对孙维张的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言之有据的批驳，很有说服力。1993 年，陆述生提出“形象意义”的说法^[28]。这里的“形象意义”是放在和理性意义同等的地位看待的。文中以颜色词

“红”为例，说明词的形象意义的获得方式。从其表述来看，“形象意义”与孙维张所说的“形象色彩”都是指具体事物在人的意识中所形成的表象，“形象意义”不应该算作严格的语言学术语，应该把它与形象色彩区分开来。90年代有学者继续对形象色彩的具体问题进行探讨，论文主要有：李瑞群《简论词语的形象色彩》[《固原师专学报》，1994(1)]，程荣《形象词语及其释义》（见《词汇学新研究——首届全国现代汉语词汇学术讨论会选集》）。

（五）词义分析方法的借鉴与研究角度的创新

1. 义素分析法的引进

中国语言学传统的词义分析方法有形训法、声训法、同义词相训法、互文见义法、界说法、辨义法、语义搭配法、构词鉴定法等等，这些分析方法在分析过程中又综合运用（参见苏新春《汉语词义学》）。70年代末义素分析法的引进，为词义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对汉语词义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义素分析法是语义分析的一种方法，最先为美国人类学家发明，后为语义学派用于语义的分析和研究。1978年周绍珩《欧美语义学的某些理论与研究方法》[《语言学动态》，1978(4)]把义素分析法介绍到中国。义素分析法把语言的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再分解成若干个意义成素，用作语言分析比较的最小单位。运用义素分析可以使人们更为明晰地观察词语意义构成。这一方法的引入，为汉语词义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and 新的途径，尤其是对同义词语、反义词语、词义的变化发展及词语的表达色彩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使之有所推进。这一点前面的论述中已有所提及。

首先是同义词研究方面，刘叔新把义素分析法用于对词汇同义现象的研究，在《论同义词词典的编纂原则》中他进一步对义素进行细致的分类，并且对“行为”、“行径”、“行动”和“英勇”、“神勇”两组词内各个词相互间在义素上的异同作了具体分析。在专著《汉语描写词汇学》中，刘叔新则借用义素分析法来区别同义词语和近义词语：“有同义关系的词语，其主要理性义素或主要理性意义成分必定相同，也必须相同；意味方面，某个主要的理性义素或理性成分是否强调，以及表达色彩方面等，则可以不同；有近义词关系的词语，彼此必在某个或某些主要的理性义素或理性意义成分上不一样。”“从意义成分的异同情况方面作观察和分析，正可以鉴定不同的词语所指的对象是否同一，从而分

辨同义和近义。”又举了“一样”、“同样”、“旗鼓相当”、“伯仲之间”这一组词语进行分析。

在反义词语的研究问题上，直接用“义素”这一术语的论述不多，但是受义素分析法的影响，关于反义词语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有了很大的拓展。比如石安石、詹人凤强调反义单位“必须在某一个语义成分上相反，而且只是在某一个语义成分上相反”（《反义词聚的共性、类别及不均衡性》）。刘叔新指出反义词赖以成立的条件之一是：“理性意义的一方面彼此相反，而其他方面（其余理性意义成分）都一致。”（《汉语反义词语的类别和特点》）这些认识都离不开对词语内部意义成素的精微认识。

关于词义的变化和发展，如前文所述，蒋绍愚在《词义的发展和变化》中运用“义素”概念，对词义“扩大”、“缩小”、“转移”的阐述尤为精彩，武占坤《词汇》一书也运用“义素”概念说明词义的演变。

在表达色彩的研究方面，如前文所述，1982年刘叔新《论同义词典的编纂原则》一文把义素分为理性义素和感性义素两类，理性义素又分主要的、次要的两种，主要理性义素涵盖意义的外延和内涵，次要理性义素只反映事物一般特点，不造成外延的差异。感性义素与意义的内涵、外延无关，而感性义素就是表达色彩。“义素”的引入使得人们对表达色彩在词汇意义中所处的地位有了更明晰的认识。

义素分析法的引入给汉语词语意义研究带来方法上的创新，但义素分析法本身有它的弊端和局限性，学者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刘叔新看到义素分析法“只能展现意义的构成，可以一般地从意义本身来揭示意义相同或相近的情形，却不能直接地、往往不能确切地表明事物反映在意义中的外延。更为不足的是义素分析法完全建立在个人对词义的了解和剖析的基础上，有一定的主观性，并不是验证式的，因此它不可能给检验提供客观的、形式的标准”^[29]。杨升初认为，义素分析法“对于印欧语来说，也许是适用的，但是对于汉语来说，就不那么适用了”^[30]，并根据汉语的语言特点，提出了关于现代汉语词语意义分析的见解。杨氏的观点未必科学严密，但表明了在学习新方法时紧密结合汉语实际的审慎态度。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运用义素分析法来谈古汉语词汇问题，他指出：“义素分析法还是一种不成熟的方法，迄今为止，它使用的范围还是很有限的”，对于虚词、实词中一些表示抽象概念的词，甚至是表示一些很具体的事物的

词都很难作义素分析。但他同时又指出,“不过至少在一定范围之内,义素分析还是有效的”。周荐 1991 年在《同义词语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义素分析法归根结蒂还是从意义本身找意义、分意义,仍没有形式上的标志可资依据,主观性的弊病依然难免”,对义素分析法的缺点和局限分析得更为直接和明白。

义素分析法有其优长之处,也有不足之处。当代词汇学研究者对于这一点的清醒认识,有利于将义素分析法和汉语实际特点以及传统的意义分析方法相结合,推进词语意义的研究。

2. “语义场”理论的借鉴和词群研究

我国传统的分析语义的方法,多是以一两个词为中心,或者探究词的意义的历史发展,或者分析几个词之间的意义关系,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在研究某些问题时,则显得视野较窄。借鉴语义场理论对词群进行研究,则开拓了词义研究的新领域。

符淮青的研究以语素义、词素义的细致分析见长。1983 年他发表《语素“红”结合能力分析》[《语文研究》,1983(2)],研究了语素“红”的构词能力;1985 年又发表《“打”义分析》(见《词典和词典编纂的学问》,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分析了语素“打”在构词中意义模糊、消失的现象。符淮青的研究“不囿于现代汉语的范围,而把视野扩展到汉语方言和古代汉语,把普通话和方言、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比较着进行研究”^[31],使研究得到深化。

80 年代后期,符淮青借鉴国外词汇场、语义场的理论,对于汉语词群进行的研究颇引人关注。1988 年符淮青对汉语表“红”的颜色的词群作了分析、探索^[32],指出古汉语表“红”颜色的词义可分为四类:甲类词如“瑕、霞”,“词义着重于对事物进行概括,红的属性的意义附着在事物的意义上,不能分割开”,“甲类词是表名物的词,其意义内容可从所属事物类别(类)和特征(种差)两方面去分析”;乙类词如“绯、红”,“词义着重在对于红的(或含红的)属性进行概括”;丙类词如“朱、丹”,“一般来说指物的意义较早,指红属性的意义在后,表现为词义的分解”;丁类词如“赤、赫”,“词义纯粹是对事物红的属性的概括反映”。并指出,“乙、丙、丁类词是表性状的词,总的说来,虽然都表示红(或含红)的色彩,但在表示色彩的浓淡、亮度,是纯色还是多色,有无其他内容(表色彩以外的内容),有无适用对象的限制方面,是不同的”。符淮青同时从构成上、意义内容上、意义关系上、上

下位关系上、语法性质上分析了现代汉语中表“红”的颜色词群同古代汉语的很大的不同。“符淮青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词义研究的方法——联系古今；把词放到词群中去比较鉴别；对词的构成、意义内容、意义关系和语法性质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这种研究可以更深入、全面地揭示词的内容及其在‘场’中的地位、作用，具有着崭新的方法论意义和广泛的应用前景。”^[33]符淮青关于颜色词群的研究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他们继续对颜色词群进行探讨。刘丹青《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的数量及序列》[《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3）]从多种角度得出汉语的八个基本颜色词及其序列，并以之验证基本颜色词普遍性理论是否能解释汉语；石毓智《现代汉语颜色词的用法》[《汉语学习》，1990（3）]把词义和语法研究结合起来，探讨词的语义范围大小和句法活动能力强弱之间的关系。李淑芬《论语言中的颜色与颜色词》[《湖南大学学报》，1991（5）]则从颜色词的分类及特点入手，重点研究其国际共性、民族个性以及它在文学作品中的修辞作用。1995年，符淮青《普通话与方言间的词群对比探讨》（见《词汇学新研究——首届全国现代汉语词汇学术讨论会选集》）以普通话和闽南方言文昌话为材料，先分析了一组动词、形容词的意义和用法，又集中对普通话和文昌话表人的头部各部位名称的词群作比。这是作者根据“场”的理论对不同词汇系统的词所作的共时的比较。同年，符淮青发表《汉语表眼睛活动的词群》[《中国语言学报》，1995（6）]，用“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分析说明了汉语中表眼睛活动的词群中各成员的意义。1996年符淮青《词义的分析 and 描写》（语文出版社，1996）一书出版，书中从词群的角度论述了表动作行为的词、表名物的词、表性状的词的意义分析方法，重点介绍“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并对词义分析、描写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总结和探索。

3. 从广阔的文化背景角度对词语意义的研究

四五十年代，罗常培注意到了文化与语言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先后撰写了多篇探讨语言和文化关系的文章，1950年写成《语言与文化》一书，旨在“从语词的涵义讨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但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这一著作未引起重视。直到八九十年代，学术研究思想不断开拓、创新，关于“语言与文化”的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热点，《语言与文化》这部书才被重视起来，并于1989年由语文出版社重新出版。全书从六个方面来讨论：“第一，从语词的词源和演变推溯过去文化的痕迹；

第二,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第三,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第四,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第五,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第六,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34]此后,很多学者都从文化角度对词语意义进行研究,论文、专著颇多,例如:90年代,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一书,讨论了文化对词义的影响;苏新春《汉语词义学》一书对汉语词汇文化内涵进行多角度研究,并对词义人文研究状况作了介绍和分析;梁晓虹《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讨论佛教文化对汉语词汇的影响,重点讨论佛教词语的构造以及佛教词语对汉语词汇内容的丰富和发展;常敬宇《汉语词汇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用翔实材料对汉语词语的文化意义进行了多方面的挖掘和阐释;杨琳《汉语词汇与华夏文化》(语文出版社,1996)分“方位词的文化蕴涵”、“词义的文化阐释”、“词汇发展的文化动因”几部分从文化角度探讨了汉语词汇的词义内涵和词义发展问题。从文化背景角度对汉语的词语意义进行研究是研究思想的开拓,把词语文化意义的考察融入到汉语词语意义的研究当中,可以发现一些新的现象,总结新的规律。但文化词汇学仍在初步发展的进程中,有许多问题尚待讨论和研究。

第二节 对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词汇形式和意义的研究

一、对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词汇形式的研究

传统训诂学旨在说解古书、指导阅读,因此往往更注重词义的解释、考据、分析,而很少注意到词的形式问题。即使有所涉及,也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20世纪初,一些学者开始了对汉语构词法的研究,如本章第一节中提到薛祥绥的《中国言语文字说略》,对汉语复词(双音节词)结构第一次有了一个系统的认识。当时的学者研究汉语形式问题,观察视角多在白话方面,对于古代汉语形式的探讨,集中在叠字、联绵字、对举字等问题上。五六十年代出现了研究古代汉语词汇形式某些具体问题的单篇论文,如郑奠《古汉语中字序对换的双音词》[《中国语文》,1964(6)],王显《〈诗经〉中跟重言作用相当的有字式、其字式、斯字式和思字式》[《语言研究》,1959(4)]等。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学者们对于词汇形式问题的研究愈加重视,某些词汇学专

著中以专门章节讨论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词义结构形式的状况与发展，而研究词汇形式的论文也愈见其多，且讨论深度、广度也大大超乎前代学者。综观古代汉语、近代汉语关于词汇形式方面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介绍。

（一）关于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词汇形式的总体概括及词的结构形式发展变化的论述

1978 年张世禄的《古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中第三章第一节“词的形式和构造”对古汉语词语的结构形式作了论说：“汉语里的词，就其声音的形式来说，可以分成‘单音词’和‘多音词’两大类。古汉语里单音词占据大多数，但也有不少的多音词，特别是包含两个音节的双音词。”联绵词和迭音词是“纯粹的双音词”。“纯粹的双音词，由于声音的发展变化而形成，所以内中只包含一个词素，不能把它拆开来解。”“至于由意义上的结合而构成的‘复合词’，就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素。‘词素’是语言上最小的表义单位，但不是词，它一定要构成了词，才可以独立运用，在语言上才可以代表一个概念。”“古典作品里的复合词，以偏正式或联合式两种最为常见。”书中还提到了偏义复词现象：“有些联合式的复合词，虽然其中包含的并列词素，本来意义上是相对相反的，而实际应用这个复合词却拿来表示单方面的意义，这叫做‘偏义复词’之例。”张氏对古汉语词的形式特点有了一个总体的清晰的概括和描写。

80 年代以后，出版了一批关于古代汉语词汇的专著，其中有很多著作涉及词汇的形式问题。

何九盈、蒋绍愚《古汉语词汇讲话》第三章“词的构成”也对古汉语词的结构特点作了概括的描写，可以总结如下（见图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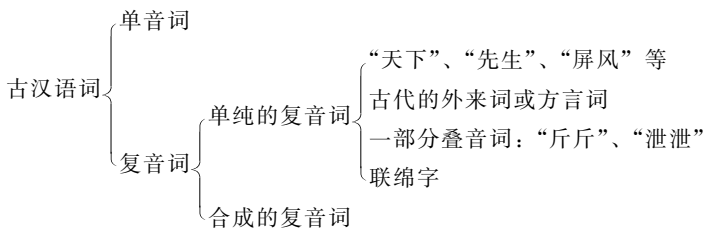


图 2—1 何九盈、蒋绍愚古汉语词结构图

书中对于单纯的复音词分析较细致，但认为“天下、先生、屏风”这些词“都不能拆开讲，所以和合成的复音词不同”，未免偏颇。书中

还论及偏义复词及古代汉语里的词头（如“有”、“其”、“于”等）、词尾（如“然”、“焉”、“尔”、“如”等）问题。

王力《汉语史稿》第三章“语法的发展”谈到构词法的发展，勾勒了汉语构词法发展的大致轮廓：上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到了中古时期，双音词逐渐增加。鸦片战争以后，复音词在汉语中占了压倒优势。

史存直《汉语词汇史纲要》第四章为“构词法的发展”，探讨构词法的发展历史问题。史氏先说明汉语构词法的发展过程：甲骨文中的词基本上是单音词，发展到一定阶段，开始用“变音别义”的方法来创造新词。西周开始出现双音词，其中有双音单纯词（联绵词），也有复合词。两汉以后，复合词、添缀词逐渐成了主要的造词方法。接着史氏分节详细论述变音别义造词法、双音单纯词的产生和发展、复合词的产生和发展、添缀词的产生和发展。作者认为：变音别义现象不应看作词义的引申，应看作产生了新词。西周金文中的双音单纯词有三种格式：“叠音的”，“双声叠韵的”，“非双声叠韵的”。三音节、更多音节的单纯词在古汉语中极其少见；先秦已产生复合词，主要是联合式、偏正式两类，支配式、表述式很少，补充式还未产生。西汉以后复合词大量增加，构词方式上，除了联合式、偏正式外，支配式、表述式的词也明显增多，也出现了补充式的词。隋唐宋时期，联合式、偏正式继续发展，支配式、补充式、表述式也成为常见的构词方式。元明清时代，复合词突破了双音词的限制，也产生了三音、四音的复合词。史氏对词头、词尾的划分采取了严格的态度，他认为真正的词头词尾是在汉代以后才产生的，认为对先秦文献中“有”、“思”、“如”、“然”等一般被当作词头词尾的成分的性质应重新考虑。史氏关于汉语构词法发展状况的分析理清了历史脉络，且分析细致，例证丰富，并且他关于一些具体问题的思考颇有深度，是前人之所不及的。

同年潘允中出版了《汉语词汇史概要》。该书第一章“汉语词汇史概貌”，介绍汉语词汇各个时期发展的特点，涉及一些形式问题，如指出上古词汇是由简约向繁复铺张发展的，甲骨文、金文里有一部分合体文字，比如“允雨”、“下雨”写在一起，潘氏认为，不妨把它们“看作是认识复合词结构的初级状态”。第二章“汉语构词法的发展”分上古、中古、近代至现代来说明汉语构词法的发展状况。他指出，上古复音词有三个特点：复合词的两个词素，仍保持它们的独立性，可以单独使用；语素次序不很稳定；复音单纯词有时可以单个字出现。近代至现代

的构词法有如下特点：(1) 单纯词多音化，“而且构词法也突破了双音叠韵的老方式，变为以汉字记音为主”；(2) 复合词多音化；(3) 附加法多音化，产生了好多新的结构。作者在论述中古期附加法发展时，追溯了词缀的产生年代。如指出前缀“阿”，最早见于东汉。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在论述近代汉语研究方法时，讲到了构词法的研究。蒋氏指出，汉语的几种基本的构词法，在先秦都已大致具备，但从汉代到明清，构词法仍在不断地发展。书中介绍了近代汉语构词法的一些明显的特点：(1) 复音词大量增加，而且语素的位置逐渐趋于稳定。作者援引瑞典 Gerry Kallgran 和日本香坂顺一的论述来说明这一问题。(2) ABB 式大量使用，ABC、AABB、ABCD 式的词开始出现。作者还追溯了这几种构词方式的历史，“ABB 式的词最早见于《淮南子·叙》所引的民歌：‘一尺缯，好童童；一升粟，饱蓬蓬。’到唐代就相当多了”，“在元曲中，这种构词方式极为常见”；“元曲中又有 ABC 式”；“AABB 式始见于唐代”，“元曲中更多”；“ABCD 式大量见于元曲”。作者还都举例作了考证。

1987 年赵克勤《古汉语词汇概要》(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一书出版，全面地介绍了古汉语词汇知识。1994 年赵克勤《古代汉语词汇学》出版(商务印书馆，1994)，书中“某些内容，取自《古汉语词汇概要》，但都作了较大的补充和修改；大部分内容是新加的”(见该书后记)，在《古代汉语词汇学》第二章“单音词”、第三章“复音词”中作者讨论了古汉语中单音词、复音词的特点，简要介绍如下：(1) 关于单音词。在“单音词概况”一节中，作者对《孟子》一书中的单音词和复音词的使用情况作了统计，结果是，全书共用单音词 1 565 个，复音词 713 个，除去人名、地名、书名等专有名词，普通词语只有 500 个左右，复音词的数量似乎不算太少，但使用频率远没有单音词高，还援引向熹《〈诗经〉里的复音词》的统计数字作为佐证。作者就古代汉语单音词占优势的原因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其一，“是古汉语词汇与作为表意符号的汉字的单音节、表意性、独立性等特点相适应的必然结果”；其二，“是由社会条件决定的”，因为书写条件困难，所以要求文字越简单越好；其三，“跟书面语与口语的分离有关”。作者说明了古汉语单音词的特点，表现为多义性、灵活性、词义关系的复杂性。(2) 关于复音词。作者认为古代汉语复音词有与现代汉语复音词不同的特点。所以古汉语复音词应该有不同的分类原则。书中列表表示对古代

汉语复音词的分类，如图 2—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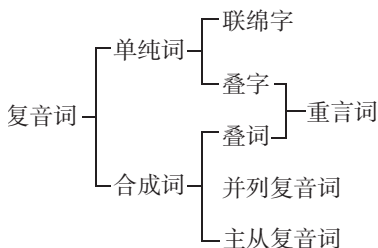


图 2—2 赵克勤对古代汉语复音词的分类

并列复音词，根据语素的意义、性质又可分为：同义复音词、近义复音词、反义复音词、同性复音词四类。主从复音词从结构方式角度加以分析，大致又可分为四类：偏正式、述宾式、述补式、附加式。书中对各类复音词进行了分析，许多观点很有启发意义。作者认为，并列复音词最初一般是两个单音节词的临时组合，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一个词。主从复音词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些现象值得注意：（1）“有些复音词在发展过程中改变了词性，由动词性词组变为指人或物的名词”；（2）“有些词组，在凝固成复音词的过程中产生了概念的外延缩小或扩大的变化。外延缩小就变为特指，外延扩大就变为泛指”；（3）“有些词组凝固成复音词，意义或转为抽象，或转为具体”；（4）“有些词组凝固成复音词，意义向相关的事物转化”。重言词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三种格式：其一，“重言词加词缀”；其二，“重言词作形容词或不及物动词的后缀，构成三字格形容语”；其三“重言词的重叠式”。重言词可以分为“多义重言词”、“同音重言词”、“同义重言词”和“同源重言词”。接下来该书谈了复音词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作者认为促成复音词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同义单音词的连用、反义单音词或意义相关的单音词的连用，以及其他结构（如偏正、动宾等）词组的固定化等，书中主要谈了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古代书面语的变化与发展是促使复音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二，“古汉语复音词的发展是不断吸收口语的结果”；其三，“古代汉语某些复音词的形成，往往跟修辞手法的运用有关”；其四，“复音词的发展还与古汉语外来语的增多有密切关系”。《古代汉语词汇学》关于词的结构形式的描写，吸收了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内容相当丰富，且运用了充足的语言资料，并且把词的形式描写与意义分析、语法分析、修辞方面的分析结合起来，视野开阔，论证

充分。

向熹《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中编“汉语词汇史”论述了上古汉语单音词、复音词的发展,中古汉语单音词、复音词的发展,近代汉语复音词的发展问题。该书总结并吸收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材料颇丰,尤其是对于近代汉语复音词发展的论述举出大量例证,分析更为详细。

袁宾《近代汉语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中都有对近代汉语构词法概况的介绍。其中《近代汉语概论》指出近代汉语词汇中有“模式词语”、“倒序词语”、“倒反词语”、“偏义词语”等几种特殊类型,论述颇有新意。

在单篇论文中,还有一些对某个历史断代的构词法及其发展变化情况进行探讨。如黄志强《西周、春秋时代汉语构词概论》[《求是学刊》,1986(3)]考察了西周、春秋时代汉语复音词的构词法的基本面貌,指出“汉语构词法的基本格局在这一时代已经形成,并且涌现了一两千个代表汉语词汇发展方向、富有生命力的双音词”。欧阳国泰《〈论语〉〈孟子〉构词法比较》[《厦门大学学报》,1994(2)]对《论语》、《孟子》两部书在构词法上存在的差异分“一般双音词”、“叠音词”、“数词”、“几个双音结构的比较”几个方面进行细致的分析,得出结论说:“《孟子》双音词的比例比《论语》高,用语法手段造的词所占的比例明显增大,词类的比例分配更为合理,某些格式的语法意义有所增加,某些重要的表达形式也是《论语》所没有的。”文章从这种微观比较的角度来说明历史的发展变化,饶有趣味且颇有说服力。郭锡良《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见《第一届国际先秦汉语语法研讨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4)用定量统计的方法对殷商甲骨卜辞、西周铜器铭文、《诗经》以及战国诸子著述中的复音组合进行考察,对先秦各阶段构词法的状况和发展作了总结,得出的结论清晰、明确,令人信服。

(二) 对词的结构形式中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

这主要集中在单篇学术论文上。如郑奠《古汉语中字序对换的双音词》[《中国语文》,1964(6)]、张永绵《近代汉语中字序对换的双音词》[《中国语文》,1980(3)]、韩陈其《〈史记〉中字序对换的双音词》[《中国语文》,1983(3)]都对汉语中字序对换的双音词进行了研究。郑奠的文章“把前代文献中所见到的双音词字序对换的一些例子按使用情况分别排列”,文章根据这些词语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的使用情

况，共分为五大类，列出 64 对，记录了丰富的语言资料；张永绵的文章主要讨论近代汉语中字序对换的双音词，按发展和使用情况分类排列，共举出 84 对，指出“这些定义相同或相近的成对词，一部分是从古汉语继承下来的，一部分是新产生的。这是汉语词汇由单音节向双音节发展中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韩陈其的文章专门对《史记》中字序对换的双音词进行分析，共举出 62 例进行分析，指出这类词绝大部分是并列式的，也有少数非并列式的。这类双音词出现在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中。作者指出，“《史记》的成书时代正是双音词急剧增加的时期，《史记》中的大量字序对换的双音词，既反映了汉语词汇复音化的一个重要侧面，又显示了《史记》词汇的一个显著特点”。韩陈其专门对《史记》书中的字序对换的双音词进行分析，更能揭示汉语在某个具体发展阶段的词汇特点。

再比如关于迭音词、重言词的研究，有王显《〈诗经〉中跟重言作用相当的有字式、其字式、斯字式和思字式》、《〈诗经〉叠字》（见《语言学论丛》，第六辑，商务印书馆，1980），曹先擢《〈诗经〉叠词》（见《词汇学论文汇编》，商务印书馆，1989），赵建功《元杂剧中的重迭词试探》[《郑州大学学报》，1982（1）]，张庆凯《〈诗经〉迭音词初探》[《河南大学学报》，1985（5）]，杨鼎夫《古汉语迭音词的产生及其发展》[《暨南大学学报》，1991（3）]等等。杨鼎夫的文章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论述了迭音词产生、演变的过程。文章认为，“音乐、诗歌、舞蹈三位一体的唱和形式是产生迭音词的直接原因”；“《诗经》等文献中的词头、词尾就是迭音词形成的过渡”（这一点在王显、曹先擢的文章中都已提到）；“拟声法和绘景法对迭音词的大量产生起了重要作用”。由迭音词进一步分化出双声叠韵等形式的联绵字，这种分化与迭音词在语流音变下的变调以及声母、韵母的变化有关。但是“先秦以后产生的双声、迭韵字就不完全是由迭音字演变而来了”。文章还以图示说明了迭音词的演变过程，最后谈了迭音词词形的发展，文中举出的词形有 AA 式、AAB 式、ABB 式、AABB 式、ABAB 式，并论述了后四种词形的产生年代和使用情况。其中 AAB 式在现代汉语里不多见，其余形式均沿用至今。

关于单音词向复音词转化的问题是词的形式研究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复音词问题的主要论文有：马真《先秦复音词初探》[《北京大学学报》，1980（5）、1981（1）]，向熹《〈诗经〉里的复音词》（见《语

言学论丛》，第六辑），祝敏彻《从〈史记〉〈汉书〉〈论衡〉看汉代复音词的构词法》（见《语言学论丛》，第八辑），周生亚《〈世说新语〉中的复音词问题》[《吉林大学学报》，1982（2）]，盛九畴《汉语由单音词渐变为复音词的发展规律》[《学术论坛》，1983（3）]，程湘清《〈论衡〉复音词研究》（见《两汉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先秦双音词研究》及《变文复音词研究》（见《隋唐五代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骆晓平《魏晋六朝汉语词汇双音化倾向三题》，梁晓红《汉魏六朝译经对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影响》[《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2）]，朱庆之《试论佛典翻译对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若干影响》[《中国语文》，1992（4）]，何耿鏞《古代汉语单音词发展为复音词的转化组合》[《厦门大学学报》，1992（1）]等。这些论文一方面对各个历史阶段的专书文献中的复音词构成、分类、演变等状况作了详尽的分析，一方面对复音词的成因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

关于汉语由单音词渐变为复音词的原因，王力认为：“汉语复音化有两个主要因素：第一是语音的简化；第二是外语的吸收。”同时又认为：“即使语音不简化，也不吸收外来语，汉语也会逐渐走上复音化的道路的，因为这是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之一。不过，由于有了这两个重要因素，汉语复音化的发展速度更快了。”^[35]程湘清在《先秦的双音词研究》中提出了新的观点：“正是词语的双音节化才导致了语音系统的简化”，而不是语音简化才使得汉语词语走向双音节化。文中指出，汉语最早“主要依靠单音节内部的曲折变化，即采用改变一个音节内部声、韵、调某要素的方法孳生新词，这种主要诉诸语音特点的构词法，我们叫它语音造词”。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的思维能力的提高，“单音节这种词的物质结构（交际手段）就不再能有效地承担新的交际任务了”，“单音节的形式开始被突破了，从而转向利用语法特点——词序和虚词——把单音节有规律地搭配起来而构成双音节词和双音词组（也包括一小部分三音节词和四字成语）。这种诉诸语法特点的产生新词的方法，我们叫它语法造词”。“当语音造词逐渐被语法造词所取代，音节内部的形态功能逐渐被词序和虚词所取代的时候，为适应语音造词而存在的繁杂音素就成为多余的了”，汉语词汇突破单音节，走向双音化，对语音产生的重大影响就是语音系统的简化。程氏的分析深入透彻，论证有力，匡正了人们认识上的误区，对于正确认识汉语词汇双音化问题有重要意义。盛九畴《汉语由单音词逐渐变为复音词的发展规律》接续王

力《汉语史稿》未能进一步说明的汉语构词的复音化的内在根据问题进行论述,认为复音化是上古汉语单音节孤立语这一本质特点决定的。还有一些学者从语言的外部因素来探讨汉语词汇的双音化问题,如梁晓红《汉魏六朝译经对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影响》和朱庆之《试论佛典翻译对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若干影响》都讨论了佛典翻译对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影响。朱庆之指出,“佛典的强烈双音化实际上加快了整个汉语尤其是书面语词汇双音化的进程”。梁晓红在《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一书中论述了相同观点。骆晓平《魏晋六朝汉语词汇双音化倾向三题》则认为,“词汇的双音化是语言内外部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对于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词汇结构形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对上古、中古、近代汉语中词的结构形式有了概略的认识和描写,对于某些具体问题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词汇与语音、语法的结合,有利于问题的深入,同时许多学者采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对古代文献资料中的语言现象进行定量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且使得论证颇具说服力。如程湘清等关于历代文献中复音词使用情况所作的统计。值得重视的还有张双棣的《〈吕氏春秋〉词汇研究》,此书对《吕氏春秋》词汇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对复音词也进行了探讨。作者对所研究的材料多做穷尽性的分析,在各个研究方面都提供了具体数据。正如何九盈在该书“代序”中所说:“严格的定量分析使本书许多结论都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有强大的说服力。”

但是,从总体来看,关于词的形式研究仍然是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二、对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词汇意义的研究

从传统训诂学到现代意义上的词汇学,关于词汇意义问题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方面。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词汇学对古代汉语、近代汉语意义的研究多是零散的论述。真正成规模、成系统地对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词汇意义进行研究,也是从50年代前后开始的。下面从几个方面对研究状况作简要叙述。

(一)继承了传统训诂学的优良传统,对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的词语意义进行考辨,出版了诸多语词考释著作以及一些专书词典。

其中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词语的研究成果如:杨伯峻、徐提《春秋

左传词典》(中华书局, 1985), 向熹《诗经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语文出版社, 1986), 董治安、王世舜、万祥桢《诗经词典》(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9), 蔡镜浩《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 方一新、王云路《中古汉语词语例释》(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2), 吴金华《世说新语考释》(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 吴金华《三国志校诂》(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等。近代汉语方面的著作如: 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 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王锺《诗词曲语辞例释》, 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戏曲词语汇释》, 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 袁宾《禅宗著作词语汇释》(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以及周汝昌主编《红楼梦词典》(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7)、王利器主编《金瓶梅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白维国《金瓶梅词典》(中华书局, 1990)等等。这方面著述颇丰。

此外还陆续出版了多部近代汉语断代语言词典, 如龙潜庵《宋元语言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7), 袁宾、段晓华、徐时仪、曹澄明《宋语言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李崇兴等《元语言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这些词典的出版, 反映了词语意义方面的研究成果, 对于了解近代汉语某一断代时期的词汇面貌以及把握近代汉语的总体面貌具有重要意义。90年代还出版了两部近代汉语词典, 分别是高文达主编《近代汉语词典》(知识出版社, 1992)、许少峰主编《近代汉语词典》(团结出版社, 1997)。

(二) 出版了论述词义问题的专书, 许多有关古汉语词汇的概论性著作对词汇的意义问题也有重点论述。

1. 关于词义问题的专书

洪成玉《古汉语词义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 主要系统地论述古汉语词汇的词义分析问题。该书分“从字形分析意义”、“从语音分析意义”、“从本义分析他义”三章介绍了词义分析的一般方法, 还从词的词汇属性和词的语法属性两个方面分析了同义词辨别的方法。作者认为分析词义时, 应注意结合语法分析, 并且从几个方面说明了语法分析对词义的影响。该书最后说明了对疑难词义进行综合探求和考证的方法。该书对词义分析的方法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和阐述, 清楚而具体, 且有许多理论问题的探讨, 是了解古汉语词义的一本好书。

苏宝荣、宋永培《古汉语词义简论》(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7), 论

述了古汉语词义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该书就汉语的词义与音形、词义的系统性、词义的两重性、词义演变的规律性、词义与词的结构方式等五个问题进行探讨。该书从汉语的民族特征出发,吸收了许多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又融入了自己的新见解,其中一些观点很值得重视,比如关于词义与音、形关系,词义的两重性,词义双音化对词义影响的论述都很有启发意义。

高守纲《古代汉语词义通论》(语文出版社,1994)对古代汉语中一词多义和词义引申、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词义与语境、词义演变等一些主要问题进行了论述。该书在阐述古代汉语词义的一般理论知识时吸收了现代语义学的观点和方法,力图揭示古汉语词汇语义的系统性,这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2. 古汉语词汇通论、概论性著作中对词汇意义问题的论述

王力的《汉语史稿》第四章“词汇的发展”,是我国第一篇论述汉语词汇史的专论,此章中有“古今词义的异同”、“词是怎样变了意义的”、“概念是怎样变了名称的”几个小节,谈到了词义的发展变化问题。

何九盈、蒋绍愚《古汉语词汇讲话》中谈到词的本义、引申义、同义词、反义词、同源词等问题。在分析反义词时,作者统计出《诗经》、《论语》、《老子》、《荀子》、《韩非子》五部著作中的反义词共有216对,指出它们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语音上往往“义反音也反”。这一论述以数量统计分析为基础,很有说服力。

潘允中《汉语词汇史概要》谈到“同义词的发展变化”和“词义的历史发展规律”问题。作者在谈同义词的发展变化时,分析了大量同义现象,概括出不同类型的同义词,指出了内部变化的规律,这一点是前人很少论及的。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论述的重点在古汉语的词义和词汇系统性方面。该书力图“在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中努力把传统训诂学的成果和现代语义学的理论结合起来”(见该书前言),运用现代语义学的义位、义素、词汇场等理论分析词义现象,“在宏观方面,把词义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在微观方面,对词义再进行深入的分析”(见该书前言),在很多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研究角度,有新的突破和进展。

赵克勤《古代汉语词汇学》对古代汉语词的本义、引申义、古义与今义、词义的演变、同义词、反义词问题多有论述。史存直《汉语词汇

史纲要》谈及词义的演变问题。许威汉《汉语词汇学引论》(商务印书馆, 1992) 也对词义问题进行多方面的探讨, 并提出词汇体系问题。

还有学者对某些专书中的词汇意义现象进行研究, 取得了很多收获。王绍新《甲骨刻辞时代的词汇》对已辨识的千余个甲骨文的词汇内容进行描写, 论述了甲骨文词义所包含的社会内容, 分析了甲骨文词义演变和一词多义现象产生的规律, 指出一些词的词义演变与社会发展、人与人关系的变化有关; 另一些词义的演变, 是伴随词的兼类现象产生的; 还有一些词义的演变是由于一些有关的具体物的名称后来借用表示抽象概念。张双棣《〈吕氏春秋〉词汇研究》对《吕氏春秋》中的多义词、同义词、反义词做了穷尽性的分析, 得出了很多令人信服的结论。如通过统计资料表明, 先秦单音同义词有音近义同的显著特点, 单音反义词语音上有相同的联系和对立的联系。并且反义词的相同联系与对立联系所占比例, 正好与同义词的情况相反。这说明, 意义相同或相近, 读音上相同联系少一些; 意义相对, 语音上对立联系就多些。类似这样对某一专书或某一时期某个具体问题专门研究的, 还有一些单篇论文, 如方文一《〈诗经〉中的同义词研究》[《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1986(3)]、陈伟武《甲骨文反义词研究》[《中山大学学报》, 1996(3)] 等。

(三) 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的借鉴、更新和词汇系统观念的建立

古代汉语词汇意义问题的研究, 继承了我国传统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同时也不断地借鉴新的理论和方法。比如 20 世纪初的学者借鉴西方传统语义学的理论, 用词义的“扩大”、“缩小”、“转移”来概括汉语词义演变的规律。再如上文所述《〈吕氏春秋〉词汇研究》中用精确的统计数字来说明词义的发展变化问题、同义词、反义词问题, 这都是理论、方法上的进步。而现代语义学中语义场、义素分析理论和方法的借鉴更为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正如本章第一节中所述, 70 年代末现代语义学中义素分析理论的引入对中国语言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词汇研究领域也是如此。很多词汇学研究者纷纷在自己的研究中引入了语义学的观点和方法, 从全新的角度来审视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的词汇现象。在这一方面, 蒋绍愚的研究尤其令人瞩目。如前文所述, 1985 年蒋绍愚《词义的发展和变化》一文运用“义素”等概念探讨了词义发展变化的规律, 清晰透彻地阐明了前人一直纠缠不清的词义“扩大”、“缩小”、

“转移”、“易位”概念。而在其专著《古汉语词汇纲要》中，蒋绍愚更是运用现代语义学的义位、义素、词汇场等理论，对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的词义、词汇现象作了全面的分析。作者首先介绍了语义场理论、“义位”和“义素”的概念及“义素分析法”。之后运用义位义素理论对古代汉语词义进行分析，认为分析词义要以“义位”为单位，而不能笼统地以词为单位；义位有义位变体；义素是词的语义特征。作者介绍了对名词、动词、形容词进行义素分析的方法。接下来作者运用义位、义素的观念论述了词义的发展变化问题、同义词问题、反义词问题等。

高守纲《古代汉语词义通论》也在研究中引入了义位、义素观念和现代语义学的分析方法。作者在该书后记中说：“体现在本书中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吸收了两方面的成果，一是普通词汇学和现代语义学；二是我国传统训诂学。”在80年代之后的许多论文和著作中，有很多学者用到义位、义素、语义场、语义系统这样的概念，用到义素分析、语义场的理论，使得研究更为深入。如张联荣《词义引申中的遗传义素》[《北京大学学报》，1992（4）]用义素分析法探索多义词的本义与引申义之间的内在关系，提出“遗传义素”的概念。再如洪成玉《词的义层》[《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6（1）]、宋永培《〈说文〉与先秦文献词义》[《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2）]等也都有对现代语义学理论的应用。

现代语义学把词汇和词义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提出“语义场”的理论，把词放在与其他词的各种联系之中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理论影响到汉语的词汇研究，关于汉语词汇尤其是词义的系统观念在学者们的头脑中越来越稳固。许威汉《论汉语词汇体系》[《古汉语研究》，1989（4）]认为汉语词汇是有体系的，“它的体系可以从词的内部形式、外部形式及构成形式进行观察”。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则主要从词汇语义角度来谈汉语词汇的系统问题。在该书的最后一章，作者指出，要研究一种语言的词汇系统，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考察：“（1）在这种语言系统中，义位是怎样结合成词的；（2）这种语言系统中的词在语义场中构成什么样的关系（包括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3）这种语言系统中的旧词和新词之间是什么关系。”然后该书从“义位的结合关系”、“词在语义场中的关系”、“词的亲属关系”三个方面对汉语词汇系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和论证。

词汇系统性观念的建立反映了汉语词汇意义研究观念上的发展，同

时也对词汇意义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本章小结

20 世纪汉语词汇学关于形式和意义的研究走过了一段逐渐发展的进程。研究者在借鉴传统语言研究成果的同时，不断吸纳新方法、新理论，并结合汉语实际加以运用、发展，使得研究工作在不断修正的过程中发展进步。到 20 世纪末，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词汇的形式和意义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主要表现在：（1）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宽，在某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在研究中能够运用多种方法，力求研究工作更具科学性、准确性；（3）确立了系统观念，不是孤立地研究词汇的意义或者形式，而是把二者结合起来，不是孤立地去看某个词语某个历史时期的特点，而是把它放在词汇系统中，从它与其他词汇单位的关系，从其发展历史来考察。关于词汇的形式和意义的研究，现代汉语方面的成就更突出，而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的研究工作就相对薄弱一些。由于古代汉语、近代汉语时间跨度大、材料搜集整理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所以对于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资料性的描写工作多，深入细致的理论探讨少。但是古代汉语、近代汉语方面的研究也有优点，那就是习惯于把古代词汇现象和现代词汇现象结合起来分析，看其发展特点与发展脉络。而现代汉语词汇方面的研究则往往对词汇现象的历史来源方面不很重视，这是现代汉语研究方面的不足。

注释：

[1] 研究历史分期参考周荐：《汉语词汇研究史纲》，北京，语文出版社，1995。

[2] 周荐：《汉语词汇研究史纲》，15 页。

[3] 参见黎锦熙：《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载《国语月刊》，1923，“汉字改革号”特刊。

[4] 参见周荐：《汉语词汇研究史纲》，16 页。

[5] 刘叔新：《复合词结构的词汇属性——兼论语法学、词汇学同构词法的关系》，载《中国语文》，1990（4）。

[6] 周荐：《汉语词汇研究史纲》，166 页。

[7] 参见戴昭铭：《汉语词类划分标准试探》，载《浙江师院学报》，1981（2）。

[8] 周荐：《汉语词汇研究史纲》，168 页。

- [9] 许威汉：《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太原，书海出版社，2000。
- [10] 《王力文集》第11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 [11] 刘叔新：《复合词结构的词汇属性——兼论语法学、词汇学同构词法的关系》。
- [12] 程家枢、张云徽：《并列式双音复合词的字序规律新探》，载《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9（1）。
- [13] 同上。
- [14] 参见蒋文钦、陈爱文：《并列结构固定词语的内部次序》，载《中国语文》，1982（4）。
- [15] 周荐：《同义词语的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 [16] 参见张志毅：《同义词在语法上的一些区别》，载《语文学习》，1958（12）；王理嘉、侯学超：《怎样确定同义词》，见《语言学论丛》，第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张志毅：《确定同义词的几个基本观点》，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65（1）。
- [17] 参见周荐：《等义词语的性质和类别》，载《天津大学学报》，1988（5）。
- [18] 参见周荐：《近义词说略》，载《天津教育学院学报》，1990（4）。
- [19] 黄金贵：《论同义词之“同”》，载《浙江大学学报》，2000（4）。
- [20] 周荐：《汉语词汇研究史纲》，38页。
- [21] 何霭人：《普通话词义》，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7。
- [22] 孙良明：《反义词》，载《语文学习》，1958（1）。
- [23] 周荐：《汉语词汇研究史纲》，106页。
- [24] 参见上书，106页。
- [25] 同上书，196页。
- [26] 李行健、刘叔新：《怎样使用词语》，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
- [27] 徐志民：《关于词的感情色彩的几个问题》，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0（3）。
- [28] 参见陆述生：《词的理性意义与形象意义》，载《河北师范学报》，1993（3）。
- [29] 刘叔新：《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划分》，见《语言研究论丛》，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
- [30] 杨开初：《现代汉语的义素分析问题》，载《湘潭大学学报》，1982（3）。
- [31] 周荐：《近二十年来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概况》，载《理论与现代化》，1997（12）。
- [32] 符淮青：《汉语表“红”的颜色词群分析》，载《语文研究》，1988（3）、1989（1）。
- [33] 周荐：《汉语词汇研究史纲》，163页。
- [34]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一章“引言”。
- [35] 王力：《汉语史稿》（中册），3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第三章 构词法和造词法

汉语构词法的研究最早是由语法学来进行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词汇学的建立与发展，开始有部分学者从词汇学角度研究构词法。造词法的研究是另一种情况，由于出现较晚，所以自产生以来一直被看作词汇学的研究内容。即使如此，造词法和构词法一样，是汉语研究中分歧最大的问题之一。

就目前来看，构词法与造词法的研究中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术语使用不一。同是对词语结构的分析，有的叫“造词法”，如李荣编译的《北京口语语法》（开明书店，1952），有的叫“构词法”，如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有的叫“词的构成”，如张志公《汉语语法常识》。

第二，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不同。任学良（《汉语造词法》）认为造词法包括构词法，二者是纲和目的关系；刘叔新（《复合词结构的词汇属性——兼论语法学和词汇学同构词法的关系》）和潘文国等〔《汉语构词法的历史研究——〈汉语的构词法研究：1898—1990〉绪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3（5）〕认为构词法包括造词法^[1]；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和陈光磊（《汉语词法论》，学林出版社，1994）认为构词法和造词法不同，应该严加区别。

第三，对学科归属的认识不同。张寿康早期认为构词法属于语法学的范畴，后来又认为它介乎语法学和词汇学之间（参见《构词法和构形法》）；陈光磊认为构词法是语法学的研究对象，造词法是词汇学的研究内容（参见《汉语词法论》）；刘叔新认为词的结构方式属于词汇学研究的范围，派生法和派生词结构则属于语法学范围。^[2]

总之，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的研究还存在很多问题，本章将从以下五个方面对20世纪的研究情况作些介绍^[3]：（1）构词法和造词法概念的提出；（2）20世纪后期现代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的研究情况；

(3) 20世纪后期古代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的研究情况；(4) 对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的理论探讨。(5) 关于“词缀”。

第一节 构词法和造词法概念的提出

——20 世纪前 50 年的研究情况

汉语传统训诂学多注重词语意义的研究，词语形式并不受重视，因此，以形式研究为主的构词法和造词法在训诂学中几乎是一个空白。这种情况直到汉语语法学诞生以后才有所改变。

一、构词法概念的提出

词语的结构问题作为语法学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很早就被学者们注意到了。

1907 年，章世钊在《中等国文典》（商务印书馆，1907）中按词类讲词的用法，有些地方对词的结构方式作了分析。例如，他在“名词的种类（二）”中把名词分为“单字名词”和“合字名词”两类，“合字名词”又分为“双字同义名词”、“双字相待名词”、“连字名词”和“名词短语”四类。把词按照音节数目和构成成分的语义特点分成若干类，这种做法与后来的“构词法”研究有一致的地方。

对汉语的词作结构分析，因中国传统训诂学没有先例可循，学者们不得不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胡以鲁和薛祥绥就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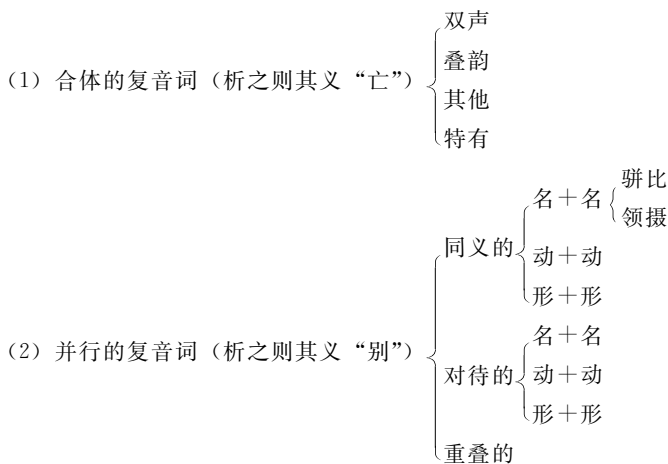
1913 年，胡以鲁在《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13）中，根据梵文的六合释分析了汉语词的结构方式。他指出：“梵语所谓六合释者，吾国语皆具有。曰带数释，如‘四海’‘十方’，以数目状词与实词之复合，别成一实词以为大地之意。曰有财释，如‘苍头’‘方丈’‘近视’，状以特点以称其人。曰限定释，则于限定状词之外，更假复合词为表位之关系……曰重复法，其用尤广，其义尤多。如‘来来往往’……其他曰连置释。连置释中有并立、对立二法，要皆复合二语为一语也。并立者，合同义之语及所谓俚语者为一语词。又如‘溪谷’，《广雅》释为‘山’；或合意义相近之二语为一语，别成一义。又如‘典章’‘制度’等。并立法亦然，‘上下’‘尊卑’，言序也；‘长短’‘轻重’，言度量也；‘缓急’，言告急之时；‘存亡’，言将亡之际也。”胡以鲁借梵语的六合释对汉语的词所作的结构分析，

比他以前的学者显然要细致得多。

在胡以鲁之后，薛祥绥也从同一角度进行了研究。1919年，薛祥绥在《国故》第4期上发表《中国言语文字说略》一文^[4]，在批驳西方人错误地看待中国“文字”的基础上，分析了汉字和汉语的特点。他认为有些汉字包括“语根”、“语系”两部分，汉语的词可以仿照梵语的六合释分为若干类型。不过作者根据六合释分析得到的词的结构类型，有的是根据结构划分出来的，如“叠语”、“连语”、“限定”、“带数”；有的是根据词的来源划分出来的，如“假借”、“合名为词”、“截名为词”、“破字为词”、“隐语为词”、“歇后为词”；还有的用其他标准，如“随文异义之字”。用不同的标准给词分类，是早期词的结构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20年代以后，学者们开始逐渐改变先前那种零散而不成系统的研究方式，注意把问题集中起来讨论，而且分析上更加细致。能体现这一特点的当推黎锦熙的“复音词类构成表”。

1921年，《黎锦熙的国语讲坛》的附录“词类连书条例”中把复字名词分为“合成的”、“并行的”、“联属的”、“对待的”、“叠用的”、“带语尾的”六类；1923年，在此基础上列成“复音词类构成表”^[5]，他把汉语双音节词分为三大类若干小类（见图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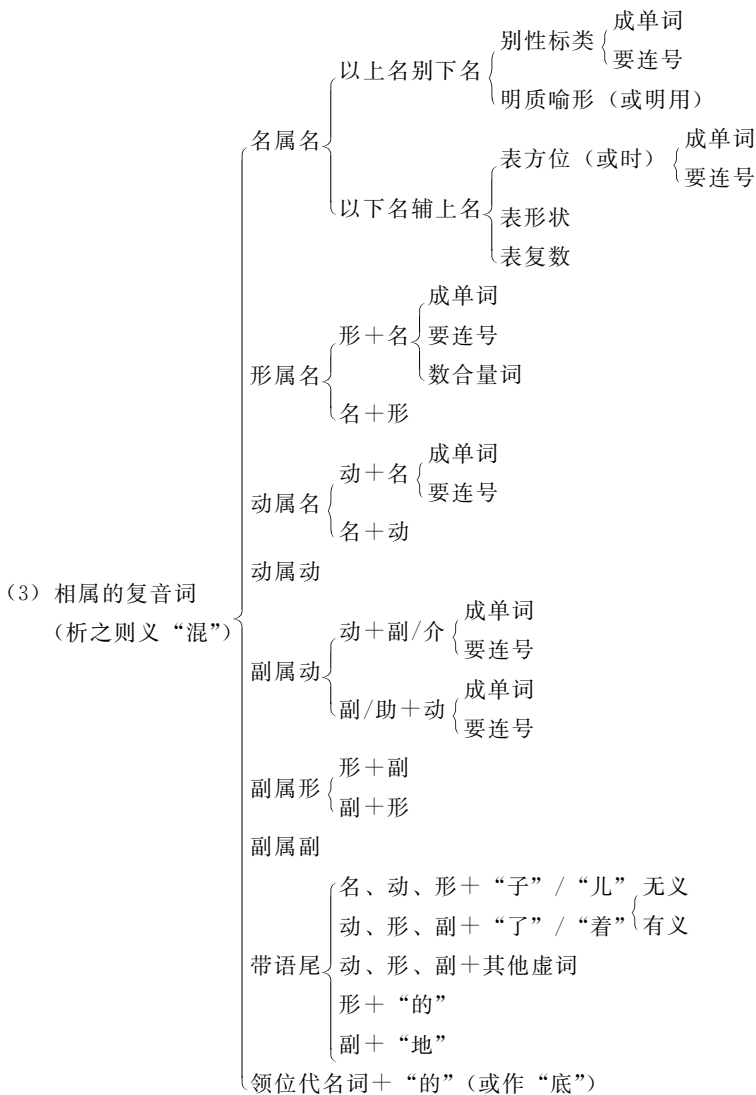


图 3—1 黎锦熙的“复音词类构成表”

黎氏的“复音词类构成表”代表了 20 世纪早期汉语构词研究的最高成就。可惜的是，作者在分类时仍然没有使用一致的标准。例如，三大类的再分类，作者或按构成成分的音节，或按构成成分的意义关系，或按构成成分的词性特征，或按语素性质。分类时不采用统一标准，往往造成各小类之间的交叉，或者因考虑不周而有所遗漏。

进入 40 年代以后，吕叔湘出版了《中国语法要略》，在该书中，作者对词作了两个方面的分类。他首先指出词有单字（单音缀）和复字

(复音缀)的区别,并把复音缀词细分为:(1)“联绵(衍声复词)”,包括双声的、叠韵的和非双声叠韵的三类;(2)“叠字”,包括“不叠不能用的”和“不叠也能用的”两类;(3)加“词尾”的;(4)外来词,包括意译的、译音的和部分译音的三类;(5)合义复词,包括“联合式”和“组合式”两类;(6)简称,如“北大”、“校委会”。此外,吕叔湘还指出,“词有单纯性和复合性两种:单纯的词同时兼为意义单位和表现单位,复合的词只是表现单位,不是意义单位。”后面这种分类谈得很少,显示出作者审慎的态度。此外,胡附、文炼也认为只有后一种分类才与构词法有关,前面从“音缀”角度所作的划分不是构词法上的分类。^[6]这种意见比较接近西方语法学中构词法的含义,然而照目前通行的看法,吕叔湘提到的两种分类都属于构词法的研究。

经过前人几十年的研究实践,人们对词的结构的认识日渐成熟,到40年代中期,王力提出了构词法的概念。他在《中国语法理论》(商务印书馆,1944—1945)中指出,“语法学上有所谓‘构词法’,我们不想特立一章来讨论它;但上文第二十节的‘记号’,第二十一节的‘情貌’和本节的‘叠字、叠词、对立语’,下节的‘并合语、化合语’,都是和构词法有关的。”这是我们见到的最早使用“构词法”概念的语法著作。

王力虽然提出了“构词法”概念,却没有集中分析。较早系统研究构词法并给出定义的是高名凯。1948年,他在《汉语语法论》(开明书店,1948)中单用一篇讨论汉语构词法,指出“构词法是研究构造新词的学问”。高氏认为,汉语的声调变化、辅音变化、附加成分的增添和元辅音的替换都属于构词法上的内部形态。在该书第三章中,他还讲到了词的结构:(1)并列结构的复合词构词法,如“大小”、“快乐”、“人物”;(2)规定结构的复合词构词法,如“红花”、“手杖”、“黑板”;(3)引导结构的复合词构词法,如“扶手”、“管家”、“枕头”;(4)复综式的复合词构词法,如“红绿灯”、“少年宫”、“夹竹桃”;(5)成语式的复合词构词法,如“风花雪月”、“羞手羞脚”、“望梅止渴”;(6)句子形式的复合词构词法,如“龙虎斗”“心心相印”。从高氏给构词法下的定义和对复合词的分析来看,他把构词法看成构造新词的方式,这与前人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毕竟开了系统研究汉语构词法的先河。

对构词法研究的这段历史,黎锦熙做过这样总结:“‘五四’前后有初期的‘文字改革运动’,开始研究‘词类连书’(即‘词儿连写’)的条例,渐次演进为‘复合词’(包括‘联绵字’)的研究,渐次合流于一

般语言学上的‘构词’和‘构形’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十年间，渐次展开讨论，定名为‘汉语构词法’。”^[7]不过黎氏所说不太准确，“构词法”这个概念并非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提出来的。

二、造词法概念的提出

20 世纪早期，由于词的概念并不明确，直接谈词的产生的学者并不多，即使偶尔谈到，也多是和“构词法”纠缠在一起。

最早涉及汉语造词方法的当数廖庶谦。1946 年，他在《口语文法》（读书出版社，1946）第十节“复音词类的发生和发展”中提到了“造词的方法”。他认为，汉语造词的方法可以分作三个阶段来讲，第一个阶段是从声音上自然发展得来的，如“糟蹋”、“蜘蛛”、“走走”、“妈妈”；第二个阶段是从语言上自然发展得来的，如“行走”、“门户”、“买卖”、“东西”；第三个阶段是依据词类在句子里面的先后次序创造出来的，也可以说，这原先都是一些短语，一到大家都用惯了以后，就变成复音词类了，如“追认”、“长城”。廖氏的《口语文法》是较早从复音词产生的角度讲“造词”的语法著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李荣根据赵元任的《国语入门》^[8]编译的《北京口语语法》中，最早使用了“造词法”这一概念。该书把汉语的“造词法”分为三种来讨论：字的重叠和变读、附加成分、复合词。作者认为“字”的重叠形式、词的组合形式，甚至词或短语后带“了”、“着”、“得（的）”的单位，都是“造词”手段。其实，从内容上来看，上面这些所谓的“造词法”与以前人们讲的构词法并没有实质区别，不过换了个名称而已。但是，这一概念的出现为后来人们从词汇学角度研究造词法打下了基础。

第二节 现代汉语的构词法和造词法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由于构词法和造词法的概念提了出来，于是人们开始了在前人基础上的系统研究，并注意分清研究对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其中，现代汉语的构词法成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现代汉语构词法的研究

（一）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汉语构词法的全面描写

50 年代初期，构词法的概念虽然已经提出，但是人们对这个概念

并不习惯，仍然有学者把它叫做“词的构成”，张志公就是一位。

1953年，他在《汉语语法常识》中单列“词的构成”一节，对汉语多音词的构成情况作了探讨。张氏首先把多音词分为“多音的单词”和“复词”两类，然后对每一类又作了细分。多音的单词包括四种：

- (1) 纯粹的单词，如“蜘蛛”、“伶俐”、“和尚”；
- (2) 加词头或词尾的单词，如“老虎”、“木头”、“剪子”；
- (3) 叠字单词，如“爸爸”、“姐姐”、“蝻蝻儿”；
- (4) 外来语音译单词，如“坦克”、“咖啡”、“盘尼西林”。

复词包括五种：

- (1) 结合式，如“东西”、“来往”、“大小”、“三四”；
- (2) 联合式，如“城市”、“战斗”、“正常”；
- (3) 组合式，如“鼓掌”、“说明”、“茶杯”、“纸张”；
- (4) 叠词，如“家家”、“圆圆”、“干干净净”、“看看”、“水汪汪”；
- (5) 简称，如“政协”、“土改”、“军属”。

张氏的分类方式与吕叔湘的比较接近，只是他强调只有多音词才有“构成”问题，单音词不能作词的构成的分析。此外，张志公所谓的“单词”和“复词”跟我们今天的理解并不一样，他的“单词”和“复词”是根据词表示的概念是单纯的还是复杂的划分出来的。

1955年，胡附、文炼在具体分析了吕叔湘、王力、赵元任、黎锦熙、张志公等五家的看法之后，以16个词为例，提出了自己的意见^[9]，如图3—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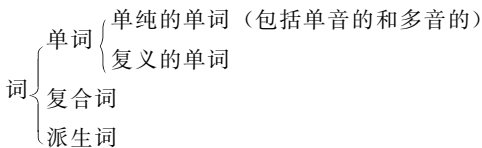


图 3—2 胡附、文炼的构词法

上述分类虽然简略，但作者却有详细的说明。他们认为“单纯的单词”包括所有的单音词、双音的单纯词以及不能拆开的迭音词（如“猩猩”）；“复义的单词”指以下两类单位：一是组成的各部分都是不能独立运用的根词，如“严厉”、“武器”、“发言”；二是整个词的意义不是由它的组成部分生出来的词，如“东西”、“毛病”。复合词指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词：（1）组成的各部分必须是能够独立运用的根词；（2）整个词的意义是由它的组成部分所生出来的，如“铁路”、“电话”。派生词就是

带有特定标记（词头、词尾）的词，如“桌子”、“苦头”、“老师”、“第一”。

胡附、文炼根据词的构成成分是否都能独立使用、构成成分的意义和词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把复合词分成了“复义的单词”和“复合词”两类，这在当时颇有新意。

1957年，崔复爰从方便教学的角度出发，以当时的《汉语》教材为蓝本，“杂采诸家”，写成《现代汉语构词法例解》一书。他指出，“构词法指的是不同的词的构成、不同词的结构关系。”在这本小册子里，他对汉语构词法作了详细的分类和讲解：

（1）纯词（非派生词），包含一个有意义的成分，包括八类：

- 1) 单音词，如“人”、“唱”
- 2) 叠字词，如“猩猩”、“纷纷”
- 3) 双声词，如“嘹亮”、“仿佛”
- 4) 叠韵词，如“从容”、“徘徊”
- 5) 联字词，如“芙蓉”、“蝴蝶”
- 6) 象声词，如“乒乓”、“哗啦”
- 7) 人名词，如“屈原”、“宋江”
- 8) 译音词，如“雪茄”、“沙发”

（2）合成词（派生词），包含两个有意义的成分。也包括八类：

- 1) 缀合式，如“老师”、“花儿”
- 2) 联合式，如“矛盾”、“三十三”、“架次”、“讲演”
- 3) 偏正式，如“铁路”、“人口”
- 4) 动宾式，如“动员”、“主席”
- 5) 动补式，如“推动”、“提高”
- 6) 主谓式，如“民主”、“月亮”
- 7) 重叠式，如“人人”、“笑笑”、“打扫打扫”、“干干净净”、“雄赳赳”、“古里古怪”
- 8) 简略式，如“土改”、“教职员”、“闽”、“三反”

（3）固定词组，包括两类：

- 1) 成语，如“聚精会神”、“推陈出新”、“五花八门”、“锦上添花”
- 2) 专名，如“中国共产党”、“民族共同语”

（4）兼词，如“啥”、“俩”。

崔复爰把所有的词汇单位都拿来作构词法分析，讨论非常全面，但

他把人名看作单纯词并不恰当，因为“姓”和“名”都有一定的意义，可以单用，例如“姓”前可以加“老”、“小”，“姓”后可以加“先生”、“同志”或职务。另外，成语、专名虽然也是词汇单位，但毕竟不是“词”，把它们放在构词法当中讨论也不合理。

张寿康对构词法的研究给予了较多的关注。50年代，他发表了《关于汉语构词法》和《略论汉语构词法》两篇文章，全面阐述了有关汉语构词法的一系列问题。作者在重新划分语素的基础上，勾勒出汉语构词法的轮廓。他认为，“按词所包含的意义成分和结构来分类可以把词分成单纯词和合成词”，这种分类方式才是构词法要研究的内容。作者的这一思想后来集中体现在《构词法和构形法》一书当中。下面是张寿康对构词法所作的具体分类：

(1) 单纯词。

1) 单音的单纯词，如“火”、“天”

2) 多音的单纯词（五种），如“蜘蛛”、“葡萄”、“坦克”、“鸳鸯”、“寥寥”

(2) 合成词，分两类：

1) 实词素与实词素合成的，又细分为四类：

A. 联合式

同义联合，如“语言”、“游泳”、“懈怠”

意义对待，如“矛盾”、“尺寸”、“兄弟”

B. 偏正式

前偏后正式，如“国旗”、“前进”

前正后偏式，如“纸张”、“看见”

C. 支配式，如“裹腿”、“招手”

D. 述说式，如“眼红”、“地震”

2) 实词素与虚词素合成的，分两类：

A. 标志式，如“椅子”、“棍儿”、“石头”

B. 变词式，如“刷子”、“画儿”、“看头”

张寿康注意把构词法和构形法区别开来，在讲构词法时强调应该“按词中包含的意义成分和结构来给词分类”，而不是按照构词成分的语法关系分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注意。

50年代，对汉语构词法研究投入精力最多、取得成就最大的当数陆志韦等人。^[10]他们在《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当中以

北京口语为研究对象，以为汉语拼音文字的正字法提供意见和为规范化词典收词提供参考为目的，搜集分析了大量语料，把得到的4万多条小片段按类型归类，得到以下主要结构类型：

- (1) 多音的根词，如“玻璃”、“凡士林”、“噼里啪啦”
- (2) 并立，如“弟兄”、“工农兵”、“横七竖八”
- (3) 重叠，如“哥哥”、“明明（儿）”、“想想”、“思想思想”、“思思想想”
- (4) 向心（修饰），如“羊肉”、“飞船”、“通红”、“快走”、“开路神”、“红绿眼镜儿”
- (5) 后补，如“红透”、“吓坏”、“走出来”、“来不及”
- (6) 动宾，如“写字”、“鞠躬”、“盖火”、“打哈哈”、“红脸”
- (7) 主谓，如“心焦”、“老头儿乐”、“驴打滚儿”
- (8) 前置成分，如“老黄”、“第三”
- (9) 后置成分，如“桌子”、“看头儿”、“说着”、“看了”、“美得”

以上只是作者归纳得到的一些大的结构类型，这些类型下面大多又分成若干小类，“例如偏正格的‘中心’可以是名字、形容字、动字等等。同是名字，前面的修饰成分又可以是名字、形容字、动字、并列格、动宾格等等。”陆志韦等人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使用的资料非常丰富（考察了4万余条例子），分析相当细致（全书用六章讨论偏正格的名词），这样的研究结果是——“新词里并不发现新的结构类型，这就是说新词都是按着旧词的结构形式造成的”。像这样大规模的细致的研究连后人也很难做到。第二，他们完全从语法角度来研究，分类时一概不涉及词义问题。他们曾经指出，本书虽然把“并列格叙述得比一般更加详细一点，但是仍然避免讨论词汇学的问题，例如同义的联接和反义的联结”^[11]。第三，由于是从语法角度研究的，又是针对拼音连写问题的，这就使作者把一些大于“词”的单位和词的重叠形式，如“听起来”、“看上去”、“桌子上”、“半路途中”、“想想”、“认识认识”，当成了构词法的描写对象。换句话说，作者并不区分构词和构形两种情况。

黎锦熙是较早从事构词法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和刘世儒继续开展汉语构词法研究，其成果主要体现在“汉语构词法—多音词（复合词）表”上。该表1955年被收入《中国语法教材》（五十年代出版社，1955）“附编”，后来经过修订被收入1957年出版的

《汉语语法教材》(第二编)(商务印书馆,1957)。1959年,又以《汉语构词法和词表研究》为题以黎锦熙的名义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5、6期上。在《汉语的构词法和词表研究》(上、下)当中,作者以复合词作为构词法的描写对象,但在实际操作中,把复音的单纯词也收列进来,因为他们认为,“理论上,既不是‘合成词’就不必列入构词法;但在汉语可不能这么说,尤其是在现阶段还在使用汉字书写词形的时候,尽管它只是个双音节的单纯词(不是两个词素),究竟是用两个汉字写成的,不是一个汉字读成两个音节;汉语构词法中既能包括‘构形法’,又怎么不能包括‘构音法’呢?”这样说来,作者是从音节入手考虑到书写形式方面来研究构词法的。黎锦熙把自己的构词法分类叫作“三类六型”,“三类六型”包括:

(1) 成分结构,又叫句法构词法。包括四种类型:

1) 联合式(又叫“并立格”),如“弟兄”、“建设”。

2) 附加式(又叫“偏正格”、“向心式”、“主从式”)。

形名型,如“大众”、“教师”;

副动型,如“互助”、“提出”;

副形型,如“恰好”、“红透”。

3) 支配式(又叫“动宾格”),如“动员”、“出版”。

4) 述说式(又叫“主谓格”),如“民主”、“自治”。

(2) 形态结构,又叫形态构词法。如“桌子”、“阿Q”、“人们”、“人人”、“学着”、“变了”、“红的”、“马里马虎”、“活泼泼地”。

(3) 语音结构,又叫语音构词法。如“蜘蛛”、“参差”、“窈窕”、“爸爸”、“关关”、“什么”、“胡同”。

黎氏的研究与他人相比,也有自己的特点:第一,他以词的书写形式为标准确定分析的对象,这样就把许多用多个汉字记录的单纯词也看成了“复合词”。第二,他的研究是为将来“词类连书”(即正字法)打基础的,受此目的的影响,把许多本来不是词却适合连写的单位,如“工作着”、“死了”、“笑起来”、“举行过”、“什么的”、“一块一块”,也看作构词法上的问题。第三,他看到了汉语构词法和西洋语构词法的不同,提出不能拿西洋的构词法来比附汉语的构词法,“汉语构词法在语言研究上是该掌握固有的大量资源而又必须创造出适应汉语的特殊的构词体系的,是不能跟西洋屈折语构词法和构形法的性质混同起来的:它们是‘说文解字’(‘文’比词根;‘字’比形态变化和词干结合);我们

乃是‘说字解词’（‘字’就是单个儿的汉字；‘词’就指双音节为主的复合词）。因此构词法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都不能跟它们的完全一样。”这种说法虽然失之偏颇，但是他看到汉语与西方语言的不同之处，并强调要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汉语构词法体系，这倒是合理的。第四，他一方面指出复合词和短语的结构类型基本相同，“尽管短语和复合词，其内部结构的松和紧、离合的自由和不自由、以及涵义的显直和深曲，都有不同，但这都不影响它们结构类型的基本相同。”另一方面又指出句法构词法是不存在的，“语言里纯粹的‘结构学’（即句法）构词法是不存在的，因为在词的复合里，我们谈的并不是存在于句法中的词的组合，而是词的‘词干’组合。”“汉语的合成词虽然并不避免跟句法打通来进行分析，但纯粹的句法构词法也是不存在的。”^[12]这说明汉语复合词成分之间结构关系非常复杂。可惜的是，上述认识并没有贯彻到实际分析中去，他对“成分结构”所作的四种类型的划分模糊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为后来的关于复合词内部结构性质的讨论埋下了伏笔。

60年代初，高名凯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对汉语构词法做了探讨，在《语法理论》（商务印书馆，1960）中他构建了自己的“造词学”和“构词法”的理论，从理论上阐明造词学与构词法的区别和联系。他认为，“造词学”包括“词素分析法”和“构词法”两个部分。词素分析法的目的在于分析一般的词或词的变体的结构，“一个词或词的变体可以有许多词素，一个词或词的变体可以由许多词素组合而成”。据此他把词素分为“词根”、“词缀”和“词尾”三类。“构词法的任务在于研究从同一个词根构成不同的词的方法，不仅是词或词的变体的结构的分析。”就是说，构词法重在研究如何由同一个词根构成不同的词，这种构词的方法有两类，一类是词法结合的构词法，一类是句法结合的构词法。前者在词的范围内构成新词，又叫形态构词法；后者是句法结合的构词法，又叫词序构词法。他把复合词分为限定结构复合词、支配结构复合词、并列结构复合词和句子形式的复合词四种。

高氏着重理论建设，又是从普通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的，很多提法与前人不同，分类上也不如前人细致，但是他把构词法分为词法结合的和句法结合的两类，这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一些影响，此后有不少学者按照这种划分方式研究构词法，任学良就是其中一位（具体介绍详见后文）。

丁声树等8位学者从1952年7月开始到1953年11月，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17次

“语法讲话”，这些“讲话”1961年修订后以《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加进“构词法”一章。他们认为，“构词法主要是讲可以分析的复音词的构成方式”，对并列式、偏正式、动宾式、动补式、主谓式、附加式、重叠式等常见的结构作了介绍。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讲附加式和重叠式时注意讲它们的用法。比如说，作者在谈到词尾“一儿”时说，“‘儿’尾本来是指小的，比如说‘刀儿’就比‘刀’小些。但是在现代汉语里附加‘儿’尾常有把别类词变为名词的作用。‘吃儿’是动词‘吃’加‘儿’造成的名词，‘黄儿’是形容词‘黄’加‘儿’尾造成的名词。有时候一个名词‘儿’化之后意义也大不同了。比如说，‘起一个头儿’，‘你们头儿’，这两个‘头儿’和‘头’很有分别。”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作者把许多属于构形范围的问题也放到构词法中来讨论，如“意味着”、“个个”、“好好儿”、“听听”。

如果说以上学者是从语法学角度来研究汉语构词法的，那么，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武占坤、王勤、葛本仪、刘叔新等学者开始把构词法看作词汇学的内容，并从词汇学角度进行了研究。^[13]

1983年，武占坤和王勤合作出版了《现代汉语词汇概要》，在第三章“构词法”当中指出，“构词法是利用构词材料，按照构词规律，构造新词的方式方法。”从他们的定义来看，“构词法”指的是造词的方法（造词法），但从他们的分析来看，除个别内容讲造词的方法（如“语音构词”中的“拟声格”、“迭音格”和“语义构词”）以外，大部分内容都在讲词的结构。以下是他们作的构词法分类。

（1）形态构词。是在词根前后添加虚词素（前缀或后缀）构词的方法。

1）词根前附加虚词素（即前缀），如“阿～”、“初～”、“非～”、“可～”、“老～”、“打～”、“本～”、“超～”。

2）词根后附加虚词素（即后缀），如“～者”、“～头”、“～性”、“～化”、“～心”、“～气”、“～员”、“～手”、“～然”、“～派”、“～师”。

（2）语音构词。以语音的因素为手段构成新词。

1）拟声格：用客观事物发出的声音来指称该事物而构成新词的方法。如“蝈蝈儿”、“扑通”、“哈哈”。

2）双声格：通过具有双声关系的两个音节结合成词。如：“枇杷”、“吩咐”、“玲珑”。

3) 迭韵格: 通过具有迭韵关系的两个音节构成新词。如: “玫瑰”、“徘徊”、“荒唐”。

4) 迭音格: 通过音节的重迭而构成的新词。如: “人人”、“个个”、“看看”。

(3) 语义构词。以词义的分化为构词手段构成的新词。“语义构词是以词义的发展、演变为条件。有些词最初是单义, 随着语言的发展逐渐分化为多义。随着时间的推移, 交际的需要, 多义的几个意义之间逐渐丧失了联系, 于是成了几个同时并用、意义毫无关系的同音异义词。”

(4) 句法构词。以造句法的格式为构词手段进行的构词。

1) 修饰格: 词素与词素通过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结合起来构成新词的方法。如“电灯”、“寒暑表”、“自行车”、“半殖民地”。

2) 支配格: 有动作意义的词素与接受动作的词素结合构成新词的方法。如“提议”、“干事”、“安心”。

3) 并列格: 词素与词素并列结合起来构成新词的方法。包括“义同义近互注并列格”、“义反并列格”和“其他类型”, 如“牙齿”、“早晚”、“江山”。

4) 因果格: 几个词素通过意念上的因果关系结合起来构成新词的方法。如“推翻”、“拉长”。

5) 注释格: 词素与词素通过注释和被注释的关系结合起来构成新词的方法。如“韭菜”、“马匹”。

6) 说明格: 词素与词素通过被说明和说明的关系结合起来构词的方法。如“主顾”、“性急”、“齿冷”。

武、王二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但是理论上和实践上并没有区分构词法和造词法, 致使这两部分内容扯在一起。在词缀的认识上, 作者坚持了从宽的标准, 把“法”、“本”、“员”等都看作词缀, 这样, 词缀的范围未免太大了。

1985年, 葛本仪在专著《汉语词汇研究》中对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作了系统研究。与武、王二位不同的是, 她注意区分构词法和造词法, 并把它们看作词汇学的研究内容而加以描写。在该书中葛氏指出, 构词法可以从词的语音形式、包含词素的多少、词素的性质及组合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见图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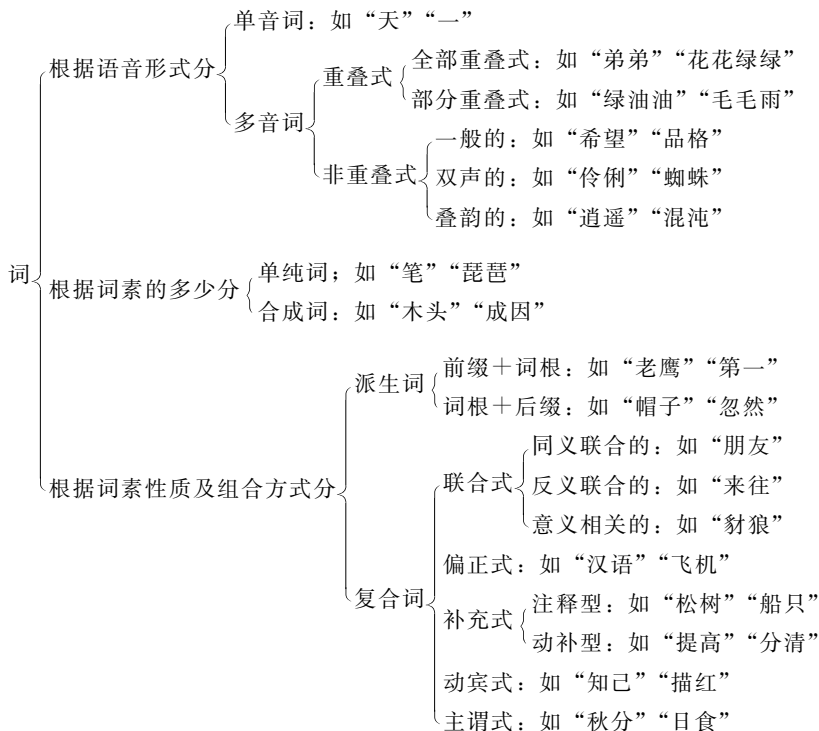


图 3—3 葛本仪的构词法分类

葛氏同时从不同角度给词分类，并认为这些分类方式都属于构词法上的分类，这与前人不同。因为在此之前，有人虽然也认为这些都是构词法上的分类，但是，却把它们放在一起作不同层次上的划分（如崔复爰）；有人虽然注意到了词可以从不同角度分类，但并不认为这些都是构词法上的分类。^[14]

90 年代初期，刘叔新也系统地研究了现代汉语构词法。1990 年，他在《汉语描写词汇学》中构建了富有自己特色的构词法体系，既描写了“词的基本结构方式”，又描写了“词的特殊结构方式”，读后令人耳目一新（见图 3—4）。

上述研究过程表明，20 世纪后半期（特别是 80 年代以后）现代汉语构词法的研究极富个性，人们不再满足于人云亦云式的分析，开始结合自己感兴趣的学科，或从语法学角度或从词汇学角度构建自己的体系，从而使构词法研究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也说明了汉语构词法的研究还不够成熟，人们的认识还很不一致，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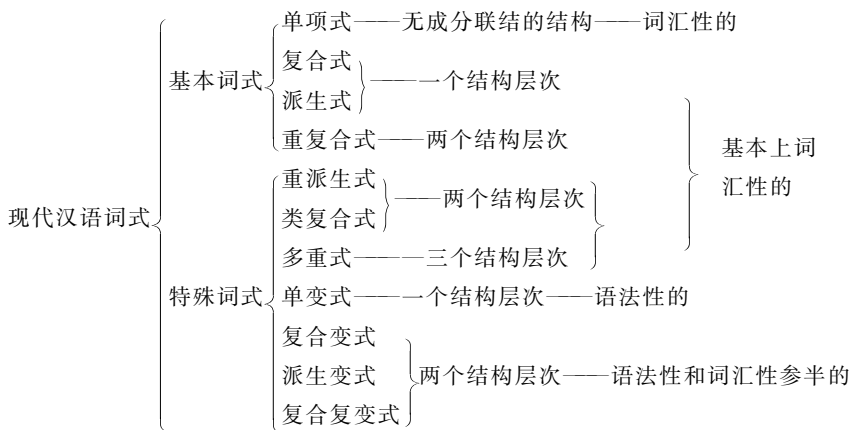


图 3—4 刘叔新的构词法体系

（二）对个别构词法的研究

在上述学者作系统研究的同时，另外一些学者从微观角度对构词法研究中的个别情况进行了分析，指出应该设立的新的复合词的类型，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有：

1954 年，张拱贵在《两种新结构的复合词》[《语文学习》，1954 (6)] 中分析了由“名词+量词”（如“马匹”、“车辆”）和“量词+量词”（如“架次”、“人次”）形成的两类复合词，并指出前类复合词过去虽有，但用得不多，后面这类复合词则是新兴的构词法。

1982 年，李行健在《汉语构词法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关于“养病”“救火”“打抱不平”等词语的结构》中指出应该设立动状结构形式，以说明汉语复合词中的“养病”、“救火”、“打抱不平”、“打拳”这类特殊词语的结构形式。

1984 年，刘云泉对前正后偏式复合词构成成分的类型、种类以及成词后的性质（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谈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前正后偏式应该成为构词法中的一种独立格式，并说明了把“车辆”、“马匹”、“船只”、“纸张”之类的单位看作前正后偏式的理由。^[15]

1992 年，周荐在全面考察了汉语复合词的结构特点之后指出，汉语复合词中存在着一些结构关系较为特殊的类型，如递续式复合词（“查办”、“教练”）、意合式复合词（“木耳”、“弱冠”）和逆序式复合词（“宅院”、“卧病”），弄清这些复合词的结构特点，对汉语构词学研究的深化有着重要的意义。^[16] 同年，王明华在《论 AABB 式重叠构词法》[《杭州大学学报》，1992 (4)] 一文中列举了现代汉语中的一些 AABB

式的复合词，如“偷偷摸摸”、“形形色色”、“满满当当”，指出它们与“歇歇走走”、“跑跑停停”等短语的区别，分析了它们成词的原因及语法功能，并提出在五种常见的构词法之外，应该再加上“重叠式构词法”，即AABB式。

1993年，饶勤具体分析了汉语中两个语素之间表现出一种连动关系的复合动词（如“验收”、“离休”、“认领”、“撤换”），指出这些词结构上的特点是两个语素都是动词性的，“如果用 V_1 和 V_2 分别代替这两个动词性语素，则 V_1 先于 V_2 发生， V_2 是 V_1 的后续动作”，由此说明这类词属于连动式构词。^[17]

此外，周荐还对现代汉语中某些词的结构类型做出了细致分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复合词词素间的意义结构关系》（见《语言研究论丛》，第六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和《三字格结构分析》。前者采用定性定量的分析方法，对《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全部双音节复合词作了穷尽式的分类研究。作者根据复合词的两个词素之间的意义结构关系，把《现代汉语词典》中的32346个双音节复合词分为“定中格”、“状中格”、“支配格”、“递续格”、“补充格”、“陈述格”、“重叠格”、“并列格”和“其他的”9个一级类，其中，前8个一级类又细分为30个二级类，如“定中格”分为“ $n+x$ ”类（如“自身”、“王后”）、“ $v+x$ ”类（如“猎人”、“睡衣”）、“ $a+x$ ”类（如“黑人”、“香肠”）、“逆序类”（如“车辆”、“羊羔”）；个别的二级类又作了三级类的划分，有些三级类又分为若干四级类，这样，得到大小共255个结构类。后者对现代汉语中能进行汉语语素分析的且由三个语素构成的三字格单位作结构类型上的描写。经过细致的分析，作者得到了三字格的16种结构类型：（1）“（词根+语缀）+词根”，如“印子钱”；（2）“词根+（词根+语缀）”，如“搭架子”；（3）“（词根+语缀）+语缀”，如“刽子手”；（4）“语缀+（词根+语缀）”，如“老油子”；（5）“（语缀+词根）+词根”，如“可怜虫”；（6）“词根+（语缀+词根）”，如“纸老虎”；（7）“（语缀+词根）+语缀”，如“第一手”；（8）“语缀+（语缀+词根）”，如“左不过”；（9）“（词根+词根）+词根”，如“八斗才”；（10）“词根+（词根+词根）”，如“把兄弟”；（11）“（词根+词根）+语缀”，如“悻悻然”；（12）“语缀+（词根+词根）”，如“非常设”；（13）“（语缀+语缀）+词根”，如“蒙蒙亮”；（14）“词根+（语缀+语缀）”，如“活生生”；（15）“词根+词根+词根”，如“短平快”；（16）“词根+语缀+词根”，如“稀巴烂”。对上述16种结构类型的三字格，

周氏还进行了性质上的认定、定量的分析和形成方式的描写。总之，周氏的研究不拘成说，从意义结构关系出发来探讨汉语复合词的构成，这对于人们从宏观上把握复合词的结构类型、从微观上认识每一类复合词的结构方式大有帮助，特别是后文的研究方法，更是对汉语词汇学的贡献。

20 世纪后期汉语构词法的研究，既有宏观上的，也有微观上的。宏观上的研究注重结合具体学科来进行，注意构建自己的体系；微观上的研究多针对宏观研究中的遗漏现象进行分析，提出一些需要引起注意的特殊类型。

二、现代汉语造词法的研究

造词法，顾名思义，是指创造新词的方法。汉语造词时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人们对汉语造词法的研究起步较晚，开始又多和构词法纠缠在一起。真正撇开词的结构问题来谈造词方法的研究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从现有的成果来看，造词法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造词法体系

汉语创造新词的方法有哪些，这些方法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否成体系，这些问题从 50 年代开始不断有学者加以研究，几种富有特色的造词法体系先后被提出。

1. 孙常叙的造词法体系

1956 年，孙常叙的《汉语词汇》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词汇学著作。在该书当中，作者首次系统地讲述了汉语的造词法。

孙常叙认为，研究造词法要区分造词结构和造词方法，“结构是就造词的素材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来说的。按词素的性质分作有词根的造词结构和没有词根的造词结构两类。按词素的关系分作主从、并列、重叠等结构形式。所有这些分析都是已经成词的解剖，是对已成的对象作分析研究的结果。并没有涉及词是如何在已有的语言基础上创造出来的。”“造词方法是使用具体词汇组织成词的方式和方法。在造词方法的研究中，要考虑造词时使用词素的哪些特点，采取什么方式，使用什么办法，如何把词素搭配起来或给予部分改变。”“造词的素材和方法可以决定词的结构。可是词的结构却不能完全反映造词方法。因为不同的造词方法是可以产生相同的结构关系和形式的。”例如，“‘聪明’和‘桥梁’在结构上都不是以词根造词的，词素之间‘聪’和‘明’，‘桥’和‘梁’都是并列

的。可是在造词方法上它们相差很远。‘聪明’是把两个词素概括起来，从耳目感官的锐敏提炼到思考能力的尖锐、明快、深入和正确，是把两个词素融合成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词。而‘桥梁’就不是这样的了。它是用一对古今同义词，以相互注解的关系配成的。‘桥’是古语所说的‘梁’，‘梁’是现今所说的‘桥’。这只是已有词汇中的词的形式改变。改造旧词使它成为新词，和从头创造新词在方法上是不大相同的。如果以结构关系，把‘聪明’和‘桥梁’归成一类，假定说是‘并列造词法’，是不够合适的。”据上述认识，作者认为研究造词法应该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词素的使用特点，即造词时，词素的内容和形式并重还是只侧重其中的一个方面；第二，造词词素是直接使用，还是用来打比方，或只用作标记；第三，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词素组织起来的。由此，作者把汉语的造词法首先分为三大类：语音造词、语义造词和结构造词：“语音造词方法是以词素的音节作基础，只取声音的。”“语义造词方法是以词素的意义作基础，从它的变通和运用以造成新词的。”前者侧重词素的形式，后者侧重词素的意义。结构造词方法“是以词素的整体——语音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体作为基础，依照它们在造词中的必要关系组织、结构以进行造词的”。其中，完全使用具有词汇意义的词素造词的，属于词汇—结构造词法；使用有词汇意义的词素与没有词汇意义的词素相结合，或者是只把具有词汇意义的词素在语音形式上加以变化的，属于形态—结构造词法（见图 3—5）。

孙常叙的研究有如下特点：第一，既注意联系汉语史的材料（如“附缀造词”部分），又注意区分“旧质”和“新质”。这比后来有些学者把不同时期的造词法混在一起笼统地来讲要高明些。第二，既区别造词结构和造词方法（见上），又区别造词法和语法。“造词法虽然和语法有联系，但是它有它自己的结构特点，不能用语法来代替。假如用语法结构完全代替造词法，那就相对地取消了一部分造词结构。”第三，区分重叠造词和重叠用词（构形）。“重叠用词是一种语法结构，它是在不改变词的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关系下，用叠用的方式表示一种语法作用和意义。”如“事事”、“走走”、“改改”。重叠造词是用重叠同一词素的方法为一个新概念命名的造词活动，如“嚷嚷”、“往往”、“妈妈”。第四，作者研究造词法注意明确各种造词方法的历史性质，注意弄清哪种结构已经僵死，哪种结构还富有生气，还在不断地生产新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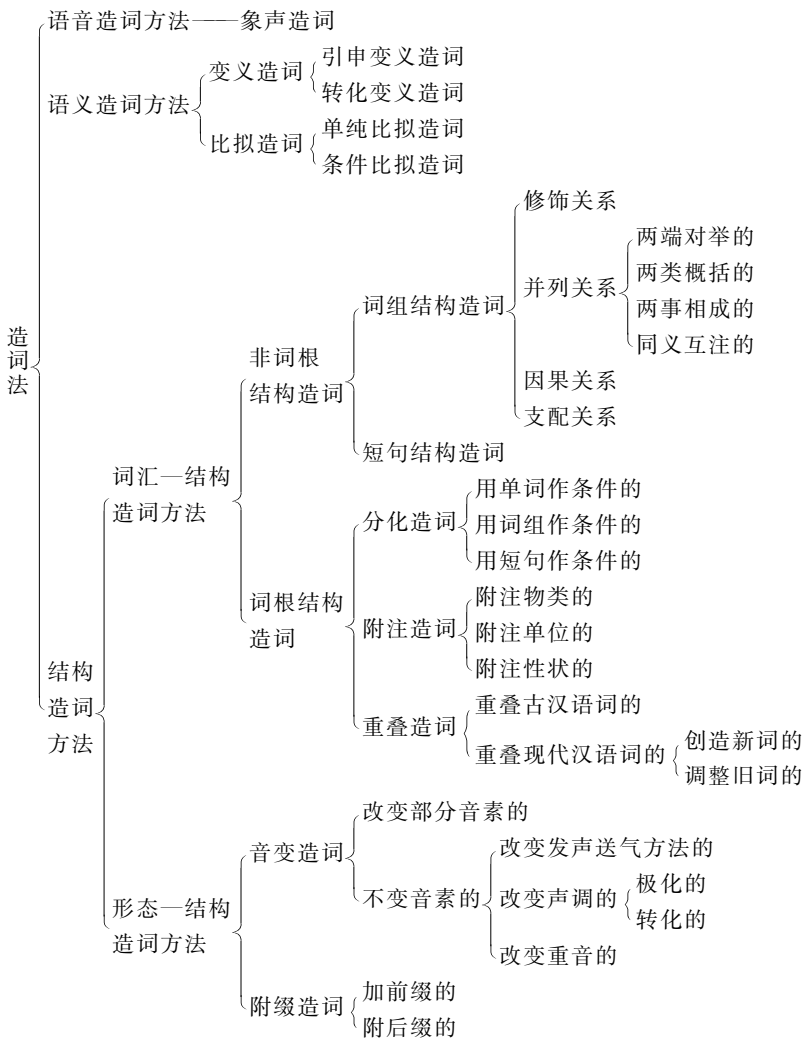


图 3—5 孙常叙的汉语造词方法系统

不过，孙常叙的研究也有些问题。他虽然明确指出造词结构不同于造词方法，但在实际分析过程中，有时也把“造词结构”当成了造词方法（见“非词根结构造词”的“词组结构造词”部分）。此外，变义现象虽然使一个词产生了新义，却没有造成新词，把它也看作造词法并不合适。再有，“老太太乐”、“大姑娘挽袖”这类单位是否是词，能否放在造词法中加以说明，还值得商榷。

2. 任学良的造词法体系

1981年，任学良在其专著《汉语造词法》当中全面分析了汉语的

造词法，构建了自己的造词法体系。

作者在谈到前人研究情况时指出，“传统的汉语构词法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以构词法代替造词法，认识片面，直到现在对词的构造的认识仍然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二是造词类型不完备。一般的构词法书只讲‘附加式’、‘重叠式’、‘偏正式’、‘并列式’、‘动宾式’、‘主谓式’等方式；个别著作提到双声、叠韵。根据我们的研究，汉语的造词法并不是只有这些类型，我们在第一节所说的修辞学造词法、语音学造词法里别的类型以及综合式造词法都没有人提到。三是没有理论说明，只有现象罗列。各种著作讲到上面几种形式时也是让它们各自分离，互不相干，没有指出它们的统属，没有阐明汉语的构词法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在本书中作者以建立造词法体系为主，同时注意理论上的阐释。他认为，“汉族人民极其巧妙地运用汉语各种因素及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手段和方法创造新词，形成了完整的造词法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五大方法：词法学造词法、句法学造词法（二者可统称为‘语法学造词法’，但因各有特点，仍以并列为宜）、修辞学造词法、语音学造词法、综合式造词法。”具体讲，他的造词法体系可概括如下。

（1）词法学造词法。是运用词法学中的手段和变化形式创造新词的方法。包括：

1）附加式，即词干加上词头（前缀）、词尾（后缀）、词嵌（中缀）构成新词的方法。

词头，如“老～”、“阿～”、“小～”、“可～”。

词尾，如“～子”、“～头”、“～众”、“～尔”、“～了”、“～着”。

多重词尾，如“～主义者”、“～主义分子”、“～娘家”、“～子汉”。

加量词的，如“布匹”、“船只”、“车辆”、“物件”、“牲口”、“房间”、“花朵”、“米粒”。

加词嵌的，如“黑不溜秋”、“叽里咕噜”、“乱七八糟”、“七上八下”、“低三下四”。

2）重叠式，即重叠词素造成新词的方法。分全部重叠和部分重叠两种。

全部重叠式，如“星星”（AA式）、“星星点点”（AABB式）。

部分重叠式，如“雄赳赳”（ABB式）、“蒙蒙亮”（AAB式）。

3）音变式，即通过改变语音的方法来创造新词的方法。改变语音

的方法包括改变声调和改变音节结构两种。

(2) 句法学造词法。是用词做原料,用造句的方法创造新词的方法。包括:

- 1) 主谓式,如“春分”、“花生”、“年轻”、“心疼”、“马上”。
- 2) 谓宾式,如“主席”、“动员”、“进步”、“异常”、“因此”。
- 3) 补充式,如“跳高”、“说明”、“凑巧”、“除了”。
- 4) 并列式,如“人民”、“生产”、“伟大”、“彼此”、“反正”。
- 5) 主从式,如“皮鞋”、“回顾”、“必须”、“崭新”、“其一”。
- 6) 其他的格式。包括:
 - 1) 承接式,如“查封”、“投靠”、“割让”。
 - 2) 兼语式,如“讨厌”、“召见”、“诱降”。
 - 3) 代替式,如“代办”、“代表”、“摄行”。
 - 4) “以……为”式,如“以为”、“认为”、“认作”。
 - 5) 变序式,如“代替—替代”“寻找—找寻”。

(3) 修辞学造词法。是运用修辞手法创造新词的方法。包括:

- 1) 比喻式,如“猴头”、“落汤鸡”、“挂帅”、“开倒车”。
- 2) 借代式,如“红领巾”、“丹青”、“茅台”、“请缨”。
- 3) 夸张式,如“什锦”、“飞毛腿”、“全家福”、“千古”。
- 4) 敬称式,如“府上”、“令堂”、“大作”、“光临”、“您”。
- 5) 谦称式,如“鄙人”、“家严”、“刍议”、“承乏”。
- 6) 婉言式,如“口条”、“百年”、“挂彩”、“归天”。
- 7) 对比式,如“天—地”、“乾—坤”、“男—女”、“主子—奴才”、“高—下”、“真—伪”、“聪明—愚蠢”、“胜利—失败”、“表扬—批评”、“防御—进攻”、“积极—消极”、“生—死”。
- 8) 仿词式,如“冷门”、“热门”,“功劳”、“苦劳”,“促进派”、“促退派”,“知难而进”、“知难而退”。

(4) 语音学造词法。是造词时取声的造词方法。包括:

- 1) 取声命名式,即用事物自身发出的声音来命名的方法。如“精卫”、“知了”、“乒乓”。
- 2) 取声表情式,即通过声音表达人的情绪的方法。如“啊”、“哎”、“哎呀”、“呸”、“哈哈”。
- 3) 单纯拟声式,既不命名又不表示感情色彩,仅仅模拟客观事物的声音的方法。如“吧嗒”、“嘎吱”、“扑通”、“叮当”、“沙沙”、“啜

唧”、“噤里啪啦”。

4) 双声式,即用两个同声母的词素构成一个词的方法。如“蜘蛛”、“犹豫”、“含混”。

5) 叠韵式,即用两个同韵母的词素造成新词的方法。如“骆驼”、“蹉跎”、“从容”、“陆续”。

6) 合音式,即把两个单音词的语音拼合在一起造成一个词的方法。如“不+用—甬”、“你+心—您”、“之+乎—诸”、“何+不—盍”。

7) 音译式,即翻译外语词完全按照译音的方式造成新词的方法。如“刹那”、“吉普”、“康拜因”。

(5) 综合式造词法。是运用两种或更多的构词(造词)形式造成新词的方法。包括:

1) 词法内部综合式,即各种形式的词法学造词法的综合。如,“反革命派”(头尾附加式)、“飘飘然”(重叠—后附式)。

2) 句法内部综合式,即句法学内部各种形式的综合。如“人造丝”(主谓—主从式)、“卖国贼”(谓宾—主从式)、“太阳能”(主从—主从式)、“无产阶级”(谓宾、并列—主从式)。

3) 词法—句法综合式,即把词法学造词法、句法学造词法的形式综合在一起造成新词的方法。如“急性子”(主从—加词尾)、“捻捻转儿”(重叠—主从式)、“打破碗花花”(谓宾、重叠—主从式)。

4) 语音—句法综合式,即把语音学造词法、句法学造词法的形式综合起来造成新词的方法。如“哈哈镜”(拟声—主从式)、“西葫芦”(主从—叠韵式)、“逻辑学”(音译—主从式)。

5) 修辞—句法综合式,即把修辞学造词法、句法学造词法的形式综合在一起造成新词的方法。如“人熊”(比喻—主从式)、“绝技”(夸张—主从式)、“螃蟹”(借代—主从式)。

任学良在构建造词法体系时,不满足现成的构词法结论,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因此,该书出版以后,很快引起人们的注意,不少学者也提出了批评意见。1982年,唐发铨在《关于〈汉语造词法〉的若干问题》[《中国语文通讯》,1982(1)]中指出了该书存在的几个问题:错用术语、分类不当、取名混乱和界限模糊。次年,张寿康在《构词法说略》(见《汉语学习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中又指出:(1)构词法和造词法属于两种不同的研究角度,不能说构词法不能包括造词法。(2)认为用修辞手段、语音手段造出来的词没有结构问题是不正确

的,“不管什么手段造出来的词都有结构”。(3)“不能有一个综合式造词法。”李荣嵩则反对任氏把“反”看作词头[《“反”是词头吗——与〈汉语造词法〉作者商榷》,《天津师大学报》,1983(6)]。后来,谭达人[《造词法和构词法的两个问题——和任学良先生商榷》,《逻辑与语言学习》,1989(6)]和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谭氏指出,作者虽然强调要区分构词法和造词法,然而,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作者都混淆了二者的界限;另外,任学良认为有些词没有构词法的看法也值得商榷。刘氏认为把汉语造词法一举分为词法学、句法学、修辞学、语音学和综合式五类,是按多个标准划分出来的,“同时用不同的准则来一次分类,必然导致各类互相交叉叠合,分不清界线”。这些意见都是中肯的。任氏的造词法体系确有不少问题,这里可以再举几点:

第一,有些语素是否为词缀值得商榷,如“而~”、“~众”、“~尔”、“~豪”等,这些单位构词能力很低,也不具有类化作用,如果把它看作词缀的话,汉语词缀的数量将会大大地增多,这是不符合汉语实际情况的。

第二,在讲到比喻式造词法时,作者虽然强调“比喻造词不是用词的问题”,但由于没有区分二者的标准,在具体的分析过程当中,往往把用词的问题也看作造词问题。

第三,作者把“天—地”、“乾—坤”、“主子—奴才”、“聪明—愚蠢”、“表扬—批评”这类具有对义或反义的单位看作是用对比式造词法造出来的。这样一来,绝大多数词就都可以看作是用这种方法造出来的,因为汉语中有很多词都能找到与之相对的词,包括作者在其他造词法中列举的那些。即使我们同意作者的意见,当有人问道:这具有对比关系的词是同时造出来的,还是有一个先用别的方法造出来,然后再用对比式造出另一个?我们也很难回答。可见,把对比式看作造词法很成问题。变序式造词法也是这样。

《汉语造词法》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它作为我国第一部研究造词法的专著,在汉语词汇研究史上仍然占有一定的地位。它对后来人们的研究的确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3. 葛本仪的造词法体系

1985年,葛本仪的《汉语词汇研究》出版,在该书中,她系统研究了汉语的构词法和造词法,提出了自己的造词法体系。与他人的研究不同,她的体系比较简明,没有太多的层次,概括如下。

(1) 音义任意结合法。即用某种声音任意为某种事物命名的方法。如：“人”、“窈窕”、“钠”。

(2) 摹声法。即利用语音形式模拟改造某种声音创造新词的方法。

模仿自然界事物发出的声音造词，如“喵”、“哇”、“啊”。

模仿外族语言中某些词的声音造词，如“咖啡”、“巴黎”。

(3) 音变法。即通过改变已有的词的语音形式造词的方法。如“盖(gài) — 盖儿(gàir)”、“黄(huáng) — 黄儿(huángēr)”、“好(hǎo) — 好(hào)”。

(4) 说明法。即通过对事物加以说明来创造新词的方法。如“国营”、“方桌”、“雨衣”、“豆芽”、“红旗”、“菊花”、“静悄悄”、“聋子”、“想头”、“黑乎乎”。

(5) 比拟法。即用现有的语言材料，通过比拟、比喻等手段创造新词的方法。

整个词就是一个完整的比喻的，如“龙头”、“雀斑”。

新词中只有部分是比喻成分的，如“木耳”、“火热”、“蜂窝煤”。

(6) 引申法。即用现有的语言材料，通过意义的引申创造新词的方法。如“开关”、“领袖”、“江山”、“笔墨”。

(7) 双音法。即通过双音化产生新词的方法。有四种情况：

1) 在单音词的基础上，用重言的形式造成双音化的词，新词的意义与原单音节词意义完全一样或基本相同。如“妈妈”、“星星”、“茫茫”、“蠢蠢”。

2) 在单音词的基础上，用重言的形式造成双音化的词，新词的意义和原单音词的意义完全不同，如“爷爷”、“往往”、“斤斤”。

3) 将原有意义相同、相近或相关的单音词联合成双音化的词，新词的意义与原单音词的意义相同或相近，如“道路”、“英雄”、“更改”、“寒冷”。

4) 在原有单音词的基础上，附加上语言中习用的虚化成分造成双音化的词，新词的意义和原单音词的意义完全相同，如“石头”、“桌子”、“尾巴”、“突然”、“阿姨”。

(8) 简缩法。即通过简缩把词组改变成词的造词方法。如“土改”、“民警”、“青少年”、“人代会”、“双亲”、“四化”。

最后，作者指出，“汉语的造词方法丰富多彩，以上只是简要地谈了几种常见的方法。”看来，作者的研究带有列举性质，汉语造词除了

使用上面八种方法以外，还有不常用的方法。

从上面作者提到的这些造词法来看，葛氏把汉语不同时期创造新词的方法放在一起，而又不加以说明，这就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认为这些方法都是今天造词时使用的，其实不然。^[18]作者把音译词看成摹声法，认为是模仿外语词的声音造出来的，这是作者的“首创”，这样处理并不好。因为汉语借词时，除使用音译法，还用意译法、半音译半意译等方式，如果把音译法看成摹声法，把意译法和其他借词法看作别的方法，就会破坏原有的“借词法”系统。再有，引申法是不是造词法，也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4. 刘叔新的造词法体系

1990年，刘叔新在《汉语描写词汇学》中从共时角度对汉语造词法作了描写。他说，造词法“虽然实现在新词形成的动态上，却属于汉语的共时范畴，并非历时现象”。“描写现代汉语的造词法，不应违反共时研究的原则。一方面须要揭示，造词法中哪些种类是新兴的或者具有较高使用频率的，哪些种类从古代承传下来而现代已没有多大生命力。另一方面，不能只根据汉语在古代产生的词（或只列出这样的词作为实例），来说明现代存在一种相应的造词法；这样做，固然完全不能证明相应的造词法现代还用来造词，而且把历史上的东西塞进现代共时的现象中，也违背和破坏共时研究的原则。”针对前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他提出了自己的分类准则：造词法的第一个分类标准是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材料来造新词，第二个分类准则是如何处理所用的材料而使它形成新词，即运用材料造成新词的方式、途径。依据这两条准则，刘氏把现代汉语的造词法作了分类（见图3—6）。

对作者的分类，徐通锵指出：“刘叔新放弃了述宾式、主谓式之类的概念，代之以结合法、叠连法、改造法、转化法等造词法，对汉语构辞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这种研究有助于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是有意义的。”但是，把复合词的构成成分看作词汇性的结构关系，并“据此列出的词素意义的相互关系的类型（质限格、态饰格、支配格、陈说格、重述格等），也还没有摆脱偏正式、支配式、陈述式等语法概念的羁绊，因而还需要进一步推敲”^[19]。

诚如徐通锵所说，刘叔新的造词法体系是从新的角度提出来的，有不少创见。比如，他强调研究造词法要从动态角度进行，而且要作共时研究；他还指出，从方言中吸收过来的一些词，“是方言社会所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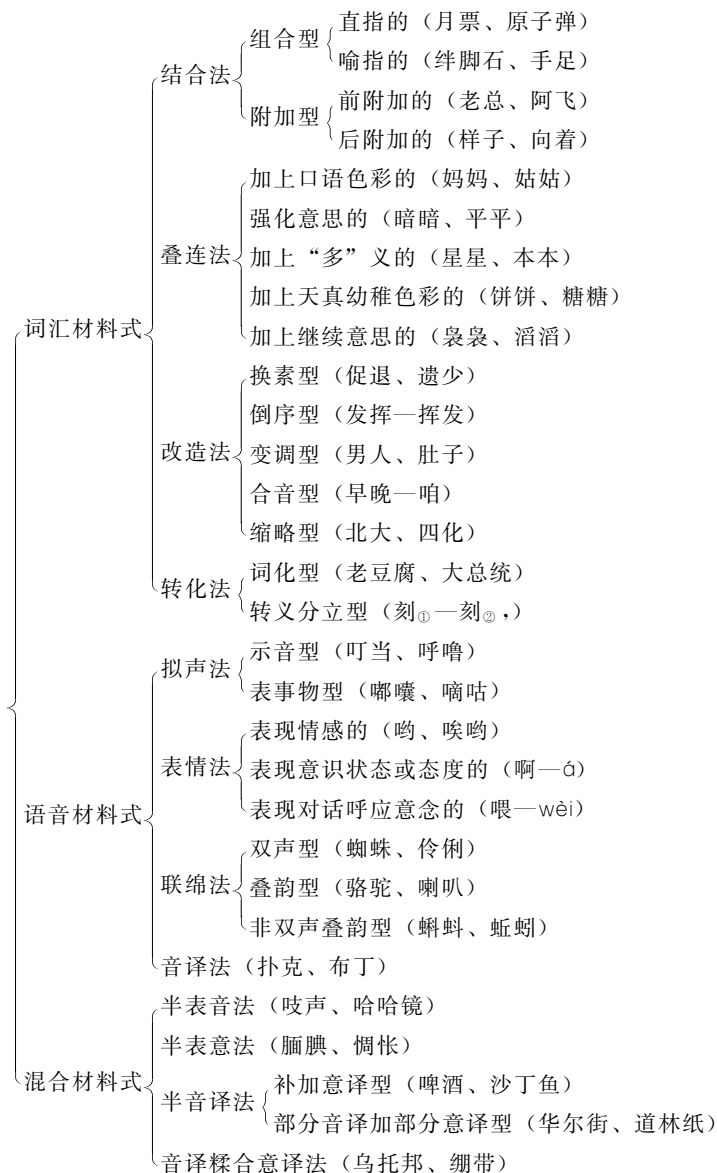


图 3—6 刘叔新的造词法体系

本是方言的词，普通话只是把这现成单位的发音略加改变而搬过来，并非在普通话的材料基础上重新造一个词”。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这个造词法体系也有需要我们思考的地方，作者提到的这些“方法”，是否真是造词时使用的方法，还值得讨论，因为方法都是具体的，具有操作性，作者提到的这些方法很难说都具备这

样的特点。再有，既然作者认为来自方言的词不是普通话新造的，那么来自外语的“借词”自然也不应该看作普通话自造的，把这部分词放在造词法当中描写也不合适。^[20]

比较上述四家的造词法体系可以发现，学者们提出来的造词法，彼此之间异大于同，这说明人们对造词法的认识还很不一致，其中难免包含构词法的内容，还需要进一步区分构词法和造词法。

（二）对个别造词法的研究

在上述学者系统研究汉语造词法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汉语创造新词的某一类造词法展开了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包括：

1. 修辞造词

利用修辞手段创造新词是汉语造词法的一大特点，对此学者们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其中，杨星荧〔《谈比喻造词》，《广州师院学报》，1982（2）〕、张守作〔《谈汉语造词法中的比喻式造词》，《研究生学刊》，1986（1）〕、史锡尧〔《名词比喻造词》，《中国语文》，1996（6）〕等人都对现代汉语的比喻造词进行了研究。杨文讨论了“什么是比喻造词”、“比喻词的种类”、“比喻词的形成和条件”、“比喻词的作用”、“比喻词的消长”等问题，把用比喻方式造成的词分为六类，并列举了大量的例子。其中第四类“喻体在前，喻解在后”举例精当，分析中肯。张文把比喻式造词分为完全比喻式和部分比喻式两种，并区别比喻式造词与词义的比喻引申两种情况，这一看法值得人们重视。史文专门对名词的比喻造词现象进行分析，他把名词的比喻造词分为“明喻造名词”和“借喻造名词”两大类，底下又分若干细类（见图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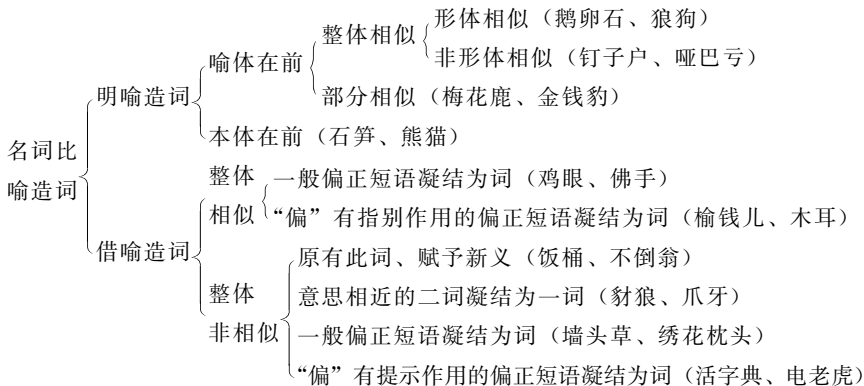


图 3—7 史锡尧的名词比喻造词表

以上三篇文章虽然都讨论比喻造词现象，但各有侧重，也都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不过，史文发表以后，有些学者就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1997年，胡华和程志兵分别在《中国语文》第5期上发表文章《〈名词比喻造词〉疑点》和《〈名词比喻造词〉辨正》，对史文不分“比喻造词”和“比喻义”提出质疑。此外，胡华还指出，“短语词化不等于即造新词”，第五种（“鸡眼”、“佛手”类）、第九种（“墙头草”、“绣花枕头”类）都属于“短语词化”，而短语词化不同于比喻造词；程志兵还对一些词例属于明喻造词还是暗喻造词进行分析。总的说来，胡、程二氏的批评意见是合理的。

修辞造词中的借代造词同样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89年，牟家骥、郭校在《试谈借代造词》[《德州师专学报》，1989（1）]中探讨了借代造词和修辞学上的借代辞格以及词的借代引申义之间的关系，把借代造词按借代方式归为六类。1994年，史锡尧在《借代手法造词探索》[《修辞学习》，1994（5）]中把借代造词分为两种：因借代产生新义的词和因借代而产生的新词，并重点分析了第二种情况，认为借代造词有特征代、工具代、部分整体互代、个别一般互代和有关事物代几种类型。

人们在研究修辞造词法时注意分清词义引申和造新词两类情况，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前者属于词语运用的问题，是在旧词的基础上通过修辞而产生新义，新义的产生并没有产生新的词位，所以不属于造词法的研究范围；后者通过修辞造成了新的词形的产生，修辞造词法正是要研究新词是如何通过修辞手段造出新词的。

2. 类推造词或仿造造词

仿照已有的词的结构方式创造新词的方法叫“类推造词”或“仿造造词”。岳长顺、程国煜等对汉语的这类造词现象分别作了研究。

1993年，岳长顺（《论类推创造新词》）考察了部分新词产生的过程，指出类推在创造新词中的作用。他认为，类推造词就是“以某个词为原型，通过替换其中的某个词素的方式创造新词的过程或结果”。比如，由“文盲”类推造出“科盲”，由“人格”类推造出“国格”。作者把作为类推依据的词叫“原型词”，并指出，如果一个新词在语言中找不到原型词，肯定不是类推词。需要注意的是，文章中有很多例子是否成词颇成问题，如“就业难”、“考大学难”。

1997年，程国煜在《仿造造词说略》[《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

(2)] 中指出,仿造造词是“人们仿照原有的词,根据新事物新现象与原有的词相关、相对、相近、相反等各种语义关系,更换原有词的一两个语素,来造出一个新词”。例如,由“文盲”仿造出“科盲”、“法盲”,再仿造出“商盲”、“经盲”、“股盲”、“电脑盲”、“卫生盲”等等。

以上两人的研究,虽然角度不同,结论却基本一致。

3. 缩略造词

汉语词语的缩略现象,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少学者都有论及,只是有人看作构词问题,有人看作造词问题。把缩略看作造词法并专文加以探讨的是郭伏良。1998年,他在《试论新中国成立后汉语简缩造词的类型与特点》[《汉字文化》,1998(4)]中指出,“简缩造词是把词组的形式通过简缩而改造成词的方法”。作者认为缩略造词有三种:(1)提字简缩法,即从原语的词中提取有代表性的字组合成新词的方法,如“社科”、“北图”、“民警”、“建交”、“少先队”、“立交桥”、“农转非”;(2)合字简缩法,即从两个并列的双音节词中并掉一个相同的字,简缩成一个三音节词,如“进出口”、“海内外”;(3)数字简缩法,即用数字概括并列成分的项数,然后加上共有的成分,从而形成新词的方法,如“三废”、“三靠”、“三害”。作者看到现代汉语中大量存在的由简缩而来的新词并详加描写,这种意见是值得人们重视的。不过,对于缩略法为什么是造词法而不是构词法这一问题,似乎还需要加以论证。

4. 合力构词

周洪波在《合力构词》(见《语法研究和探索》,第八辑,商务印书馆,1997)中提到了一种新的造词法——合力构词。他认为,汉语造词的手段往往不是单一的,有的综合了几方面的力。比如,他认为在下面这句话“他家乡那儿没考上大学的不叫‘知青’,也不叫‘待青’,叫‘大学漏’,刺激味够大的了”[《昆仑》,1982(2)]当中,“待青”是由“待业青年”的简缩和“知青”(知识青年)的仿造两股力一起构成的,其中仿造的力起主要作用。

作者所谓的合力构词,跟任学良的“综合式造词法”并没有实质区别,不过是换了个名称而已。另外,与其他人提到的造词法相比,周氏观察问题的角度略有不同:其他学者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的,周洪波则同时考虑了几个角度。

现代汉语造词法研究自一开始就被置于词汇学当中,只是由于它常

常和构词法纠缠在一起，再加上还有好多基本问题没搞清楚，这就造成了不同的人对造词法有不同的认识（几乎一个人一套体系）。今后的造词法研究应该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研究汉语富有特色的造词法，而不以构建新的造词法体系为主，这样才能使研究深入下去。

第三节 古代汉语的构词法和造词法^[21]

20 世纪人们对古代汉语的构词法和造词法的研究，是以现代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研究实践为基础的，因此，有关研究成果出现的时间较晚，而且研究的方式和方法受现代汉语研究的影响。

一、古代汉语构词法的研究

对复音词结构的分析和描写是古汉语构词法研究的主要内容。这方面的研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某部著作或某个时期的研究，二是史的研究。

1. 具体的构词法研究

学者们在研究古汉语复音词时，或者以某部专书为主，或者以某个时期为主。其中专书的构词法研究又集中在魏晋以前，这是由于当时文献资料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弄清一部书的构词法就等于弄清了该时代的构词法的面貌。

对先秦散文所作的构词法分析是古汉语词汇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很多文章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代表性的有刘诚的《〈韩非子〉构词法初探——兼论“单音词在上古汉语里占优势”的问题》[《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2）]，陈丹红的《试论〈孟子〉合成词的构造及其类别》（《论文论丛》，第4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和严志君的《〈荀子〉构词法初探》[《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2）]。

80 年代中期，刘诚对《韩非子》一书的构词法作了描写，他首先把构词法分为语音构词法和语法构词法两类，然后又把语音构词法分为声调变换和音素变换两种，语法构词法分为词法和句法两种。文章把变调和音变看作构词法，这是少有的观点，他说，“单音词的构词法主要通过破读和音转体现出来。破读是通过声调变换体现词形变化，用来区别词类和词义，其中以去声和非去声的变换为主要形式”；“音转是通过音素变换并涉及声调，体现词性变化，用来构成同义词；从历史发展的

角度看,叫做‘同源词’,其中以阴声、阳声、入声的转换为主要形式。”其实,变调和音变这类现象人们早就看到了,只是并没有人像作者一样把它看作构词法。这类现象到底算不算构词法,人们还有不同的认识。

陈丹红的文章讲了两个问题:《孟子》中双音词的形成方式和结构方式。作者认为,《孟子》双音词的形成方式有四种:语音构词(包括双声叠韵联绵字和叠音的联绵字)、语法构词(包括重叠构词和词缀构词)、词组凝固化构词和由虚语素结合成双音虚词。对《孟子》双音词的结构方式,作者根据“从形式入手,结合意义来考虑”的原则,分作7大类35小类,并作了统计。作者讲到的双音词的形成方式,实际上属于造词法的研究范围,后者才是构词法研究的内容。

严志君在他的文章当中既给《荀子》中的1356个复音词分了类,又对复音词的使用情况作了统计,并通过与《诗经》、《左传》、《孟子》、《韩非子》四部书的构词法加以比较,总结出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他说,《荀子》一书以单音词为主,复合词中重言词和联绵词比例较小;联合式和偏正式是最能产的两种构词方式;跟其他著作相比,动宾式呈明显上升趋势;主谓式、动补式的构词能力有限。严文采用定性定量的分析方式,注意以事实说话,结论比较稳妥。不过,他在分析构词法时把双音节单纯词也列进来,这与他文章前面提到的构词法是“指语素组合成词的方式方法”的说法产生了矛盾,说明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清楚。

在上述学者开展专书构词法研究的同时,有些人用比较的方式分析了早期汉语构词法的情况。其中,欧阳国泰的《〈论语〉、〈孟子〉构词法比较》[《厦门大学学报》,1994(2)]、李智泽的《〈孟子〉、〈孟子章句〉复音词构词法比较》[《中国语文》,1988(5)]两篇文章具有代表性。前者通过比较《论语》和《孟子》两书的构词法,指出《孟子》的“一般双音词”(指人名、地名、官名及叠音词以外的双音词)比《论语》翻了将近一番;《论语》的偏正式双音词多,《孟子》的并列式双音词多;《孟子》的叠音词出现了单音节名词重叠表示“每一”的用法,基数词出现了不含“有”的用法,还出现了分数的表达格式,如“十一”、“什六七”。在文章当中,作者把构词法和造词法两个术语混在一起使用而不加区别,这说明,在作者看来,构词法和造词法是一回事。^[22]李智泽的文章在分析统计了《孟子》与《孟子章句》中复音词的

构词法之后指出：第一，《孟子章句》比《孟子》新增了大量合成词，其中最多的是联合式合成词；第二，《孟子章句》中附加式合成词“词根+词尾”构成方式已趋向单一，词尾只保存“然”、“子”两种，《孟子》当中的有些词尾如“如”、“焉”、“尔”已消失；第三，《孟子章句》中新出了动补式合成词；第四，《孟子》和《孟子章句》中都未出现主谓式合成词；第五，二书中都有一些还没定型的联合式合成词，这表现为构词词素结合不紧，位置可以颠倒。

闵祥顺〔《〈朱子语类辑略〉中复音词的构词法》，《兰州大学学报》，1987（4）〕在分析《朱子语类辑略》中复音词的构词法时，以该书中出现的、目前仍在使用的复音词作为考察对象，把合成词分为联合式、偏正式、补充式、动宾式、主谓式、附加前缀式、附加后缀式七类。在文章当中，作者多处提到“XX方式”在上古没有或很少见，由于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显得主观性较强，缺乏说服力。例如，作者说主谓式合成词在先秦文献中还未发现，然而据其他学者的研究，先秦文献中不仅有主谓式合成词，而且数量不少：陈丹红指出《孟子》中有6例；严志君指出《左传》中有5例，《孟子》中有2例，《荀子》中有16例，《韩非子》中有14例，等等。这些数字虽然不一定准确，却能说明先秦时期已经有主谓式合成词这样一个事实。类似问题闵文还有不少。出现这种问题可能是人们确定合成词的标准不同造成的。

1981年，徐德庵〔《汉语早期构词法——以〈尔雅〉〈方言〉同郭注的对照为例》，《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1（4）〕通过对比《尔雅》、《方言》的原释词（单音词）和郭璞的注解（双音词），分析了两汉时期构词法的特点和类型。作者认为，作为注解的双音词在意义上无论与原单音词相同、相近还是相反，都包含原单音词，“这在客观上已经证明被训释的单音词的出现前，训解它的双音词的形成在后，并且无形中表现出了该单、双音词之间在发展演变上的有机联系”。文章把郭注中的839条双音词注解按构词方式分为并列式（571条）、偏正式（152条）、联绵式（65条）、重迭式（26条）、附缀式（25条）五种类型，并全部予以列举，这给后人进一步研究带来了方便，同时也有助于读者验证作者的结论。只是作者把所有包含原单音词的双音节单位都看成双音词，这还存在问题。

对专书或某个时期构词法的研究注重定量分析，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由于复音词这类单位的确定还没有一致的标准，这就直接影响了人

们的认识。比如，一部书当中到底有多少复音词，是否存在某类结构方式，等等。看来，要想把问题解决，今后应该在复音词确定标准上下点工夫。

2. 构词法发展史的研究

因为人们对构词法所属学科的认识不同，所以，讲构词法的发展史的时候角度也不一样，有人放在语法史部分讲，有人在词汇史部分讲。

1980年，王力在《汉语史稿》（中册）（中华书局，1980）语法史部分简要分析了构词法的发展过程——汉语是如何由单音词演变为双音词的。他把汉语史分为三个时期来讨论：上古、中古和鸦片战争以后。他认为汉语复音词由三种情况构成：联绵字，词根加词头、词尾，短语凝固化。由于他把构词法看作语法研究的内容，在谈到联绵字的变化时强调，这“只是词汇方面的变化，而不是语法的变化”，因此，这一部分并没过多涉及。王力的分析是粗略的，除列举了较多的例子之外，并没有多少理论方面的阐述。

在王力之后，史存直和潘允中也讲到了构词法的发展，他们是在词汇史中讲的，分析上也比王力细致一些。

在《汉语词汇史纲要》当中，史存直论述了汉语构词法的各种类型、产生的原因及发展过程。他说，“若从造词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应该注意到，人们制造新词并不是一开始就采用‘复合’和‘添缀’方法的。在未有‘复合词’和‘添缀词’之前，必须先有‘单纯词’。”“就汉语词汇发展的整个过程来说，单音词的创造应该是最早的。甲骨文中的词基本上都是单音词。单音词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人们就开始感到要创造更多的单音词不大了，于是遂开始采用‘变音别义’的方法来制造新词，或制造双音词及多音词。双音词的出现，是从西周开始的。在开始制造双音词的最初一段时间内，既制造了不少双音复合词，也创造了不少双音单纯词——即所谓‘联绵字’。但是独立创造新词究竟不如在旧词的基础上制造新词来的容易，所以到了两汉以后，独立创造新词的现象就日渐减少，复合词和添缀词遂成了主要的造词方法。”复合词在西周的金文中已出现，到春秋时代，开始多起来。“先秦时期所产生的复合词，主要是联合式和偏正式两类；支配式和表述式虽然有，但不多；至于补充式，则尚未产生。”“如果说‘支配式’、‘补充式’和‘表述式’在汉魏六朝时期仍不甚发达的话，那么，这三种方式到了隋唐时期就更加成为常用的造词方式了。”他还说，“在汉语中，真正的

词头词尾是到汉以后才有的。”

作者上面的论述，看起来更像是讲汉语造词法的发展。确实，在作者看来，构词法和造词法虽然是不同的，但是二者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可以从下面这句话中看出来：“如果我们能想清楚，这种一字两读的现象，从本质上说来也是一种造词的方法，那么，当我们研究构词法发展的时候，就应该把这种一字两读的现象同时加以考虑了。为什么呢？因为从汉语史的角度来研究构词法，实际上也就是研究从古到今在制造新词时采用了哪种构词方式。”

作者在讲造词法和构词法的发展过程时，比较注重理论上的分析，很少作事实说明，但由于论证谨慎，结论也较为稳妥。

与史存直偏重理论分析不同的是，潘允中则更侧重于事实说明。他在《汉语词汇史概要》中把汉语构词法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并作了细致分析，他指出，上古汉语的词汇既有非派生词也有派生词。上古非派生词，单音的没有构词标志，双音的单纯词有三种构词方式：（1）词根重叠，“即古人所谓‘重言’，今称叠音词。这种词应该认为是单纯词的一种，因为在重叠以后已经和单字的意义完全不同”。（2）双声叠韵词，“这是上古复音词的主要构词法。由此产生的单纯词，它的两个音节的古声母或古韵母必定相同或相近，而且紧密结合，不可分析。双声叠韵词在上古复音词中占很大比例，并在后世很有发展”。（3）非双声叠韵类的上古复音单纯词，“这种词并非双声，也非叠韵，但它和双声、叠韵单纯词性质是一样的，是不可分析的”。上古的合成词，绝大部分是以词根复合法产生的，少数用附加法。最早的复合法，可追溯到殷商和西周时代卜辞、金文里的“合文”，不过，“大量的复合词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诗经》里就有了不少；《楚辞》里的复合词更加丰富。看来，复合法已是当时新词产生的重要方式。这种构词法，以同义或近义联合的最多，偏正式次之，动宾式较少，主谓式只有少数例子”。此外，上古汉语构词法中还有一种特殊的现象，有些词由于经常在一块使用，结果造成音节的融合，使原来的双音节词变为单音节词，如“丁宁一钲”“扶摇一飏”；甚至有些本来不相干的两个音节，也变成另一个单音节词，如“之乎一诸”、“何以一奚”。作者认为上古汉语复合词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复合词的两个词素仍保持相对独立性，既可以作为构词成分也可以单独使用；二是复合词的词素序不很稳定；三是某些偏正式、动宾式之类的词还处在词组阶段。“中古复合词的发展，不仅

表现在数量上，同时也表现在这种构词法的内涵的扩展上。例如主谓式在上古还罕见，本期‘席卷’‘囊括’之类的词便多了起来。”又如动补式复合词，上古还少见，这一期逐渐产生了。这一期还增加了“复词偏义”一类构词法；而且附加法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前缀“阿”和后缀“子”“头”“儿”。总之，“中古汉语构词法的发展，以复合法为主要形式，其次是新兴的附加法。”“近代以来，汉语词汇发生了两个显著的变化，这就是复音词的大量产生，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期，不仅复合法如此，其他附加法以至单纯词，都有很大的发展。由于复音词大量发展的结果，使得汉语从过去单音词占优势变成复音词占压倒优势的局面。”在汉语词汇走向复音化的过程中，构词法表现出以下特点：单纯词多音化、复合词多音化和附加法多音化。

潘氏对构词法发展过程的分析既全面又细致，有不少独到之处。不过，他把双音节单纯词的第一类叫“词根重叠”，这不恰当，因为既然是“词根”重叠，重叠后必然包含两个词根，有两个词根的词不可能是单纯词。此外，作者还提到，上古非派生词，单音节的没有构词标志。言外之意，双音节的有构词标志，双音节的构词标志是什么呢？从作者给双音节词所作的分类可以看出，他把音节上双声、叠韵这类语音特征看作标志（即构词法）了，他说：“原来双声叠韵是上古单纯词的主要构词法，但这一构词法在后期的发展、运用却不限于单纯词，连同义词或近义词也有不少是利用双声叠韵组成为复合词的。”词根据音节的特点来分类，未尝不可，但是，如果认为这种分类就是构词法，却值得讨论。

除上面三位学者全面研究了构词法在古代的发展外，1994年，郭锡良还勾勒出先秦时期构词法发展的大致轮廓。他在《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一文中指出，“从西周开始历代复音词都有增加，构词的方式也由单音造词向复音造词转变。周代就是汉语构词法发生这种重大转变的时期。”该文重点分析了殷商时代和周代的构词法的情况：“殷商时代语言的词汇系统本质上是单音节的，少数复音结构应该是词组而不是词。”“殷商时代的构词方式有二：一是通过词义引申分化出新词，即词义构词法；二是通过音节内部音素变化构造新词，即单音节的音变构词法。”到了周代，复音化趋势十分明显，复音化的构词方式有两大类，一是多种形式的双音词的音变构词，二是多种形式的结构构词。“复音词的各种构词法萌芽于

西周早期，完备于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时期复音词的数量增加很大，成为汉语复音化迅速发展的第一个时期，此后结构构词成了汉语构词的主要方式。”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还谈到了古汉语复音词和词组的区别，他说：“复合词同词组不容易区分，尤其是对古代语言，很难用扩展法、转换法来鉴别，更无语音识别条件，我们只能以意义为主结合词语搭配、出现频率等多方面因素来确定它是不是词，因此必须十分谨慎，宁严勿滥。”作者的这一认识对于我们研究古汉语词汇，特别是构词法，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古代汉语造词法的研究

王宁在自己的研究当中多次提到汉语早期造词法的发展情况，她说，“汉语词汇的发展经历过三个造词阶段，即原生造词、派生造词与合成造词”^[23]，而且“这三个阶段之间没有绝然分清的时代界限，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各以一种造词方式为主要方式”^[24]。

“汉语和世界其他任何语言一样，有过一段为时很长的原生造词时期。这是汉语词汇的原始积累时期。”“原生词的音义结合不能从语言内部寻找理据，它们遵循的原则一言以蔽之，即所谓‘约定俗成’。”^[25]

“派生阶段是汉语词汇积累最重要的阶段。在原生阶段的晚期，就已经产生了少量的派生造词。而当词汇的原始积累接近完成时，派生造词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造词方式。这一阶段，汉语由已有的旧词大量派生出单音节的新词，并促进了汉字的迅速累增。周秦时代是汉语词汇派生的高峰，在纷繁的派生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同源词。”^[26]“例如‘超’，《说文》训‘跳也’，本义是超越，古音‘透’母‘豪’韵。引申为高远，另造‘卓’字，音变为‘端’母‘沃’韵。‘卓’是‘超’的派生词。也有的音虽无变，字分数形，遂为异语。例如，跳舞的动作叫‘舞’，以舞祝神的人叫‘巫’，舞蹈的步伐叫‘武’，古音虽都为‘明’母、‘模’韵，但字分三形，这标志着三个相关的意义已经分化为三个同源词。”^[27]

“合成阶段的到来是汉语词汇发展的必要结果。汉语词汇在原生与派生造词阶段都是以单音节为主的。由于音节数是有限的，区别同音词的手段必然非常贫乏。而且，派生造词阶段正是古汉语文献大量产生的时期，在书面汉语里，孳乳造字伴随派生造词，成为区别同源词与同音

词的一种措施。这便使汉字的造字速度也极快增长。词与字的增长一旦超越了人的记忆可能有的负荷，凭借音变与字变而进行的派生造词便不能符合词汇继续增长的需要。恰好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汉语的构词元素积累到了一个足够的数量，为合成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于是，在两汉以后，合成造词取代了派生造词，成为汉语主要的造词方式。随之而来的，是汉语由单音节为主逐渐转变为双音词为主。”^[28]

王宁的研究属于历时的研究。她对汉语早期造词法发展经过所作的说明，给我们今后的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她指出，在造词的第二个阶段，造新字是新词产生的标志，这一看法颇有见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不作分期地、在任何时候都把“新字”当作新词的标志。新字作为新词的标志只适用于“派生造词”阶段。另外，对“字”和“词”关系的理解也不能太机械，更不能把“字”看作“词”，它们毕竟属于不同的系统。王氏对“派生”的理解与我们今天说的派生也不是一个概念，我们说的派生是指“词根”和“词缀”结合的派生，是构词法里面的问题，而王宁所谓的“派生”实际上讲的是“孳生”，是一种造词的方法。

下面，我们介绍几种学界已达成共识的汉语造词法。

1. 修辞造词

利用修辞手段创造新词是汉语很有特点的一种造词方式，不少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

1988年，张学贤对古汉语中的修辞造词现象（作者叫“构词”）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他在《修辞构词法与古汉语词汇丰富发展的关系》[《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8（1）]中提到了七种修辞造词法：（1）比喻，如“席卷”、“云集”；（2）借代，如“口舌”、“丹青”；（3）委婉，如“陛下”、“出恭”；（4）夸张，如“发指”、“锱铢”；（5）割裂，如“弱冠”、“友于”；（6）节缩，如“沧桑”、“衣簪”；（7）摹状，如“潺潺”、“冉冉”。

90年代中期，李禄兴专门探讨了古汉语中的借代造词法。在《试论古汉语借代造词法》[《佳木斯师专学报》，1995（2）]当中，他对古汉语中的借代造词法的种类、特征、产生的原因以及对语言发展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借代造词法就是把借代辞格用于造词，就是“借用相关事物的名称来代替事物的本名，固定在词中”，如“骨肉”、“桑梓”、“巾幗”、“手足”。此外，文章还探讨了借代造词法与借代修辞

方式的关系。由于李文只对借代造词法加以讨论，因而在细致程度上超过了张学贤的文章。

研究修辞造词法，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应该区别两类现象：一是在言语中用修辞手段创造出一个新的单位；一是在言语中用修辞手段赋予已有的某个单位以新的含义。后者是词义的发展问题，前者才是造词法的研究对象。

2. 词源造词

刘禾的《谈古代汉语几种词源造词法》[《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8（4）]着眼于成词的理据，从命名的角度来分析造词法。他提出的四种词源造词法是：

（1）物证造词法，是“着眼于事物的某一特征或属性，以既有的语素为构件的造词方法”，用这种造词方法造出来的词如“鼎立”、“车右”、“鸦”、“韭”。

（2）义化造词法，包括词义的分化和词义的孳乳，前者如“雁一鹅”，后者如“亡一忘”。

（3）音转造词法，包括音节内的音转和音的分合，前者如“狗一羔”、“子一崽”，后者如“蒺藜一茨”、“葫芦一壶”。

（4）组合造词法，这里特指“由两个义同、义对的词素组合创造新词的方法”。包括三种情况：一是由两个同义的词素组合而成，新词以两个词素共同的语义作词义，如“笪豆”、“粮食”；二是由两个对义词素组成，两词素融为一体，以原词素义为基础，进一步引申，曲折地表现新词的意思，如“春秋”、“聪明”；三是由两个对义词素组成，其中一个词素是陪衬，新词的词义仅寄于另一词素中，如“褒贬”、“作息”。

刘禾着眼于词的命名方式分析词的创造问题，这是一个新的认识角度，前人从这个方面研究的不多。只是他提到的这些方法并非都是从“词的成因”和“命名的角度”讲的，比如“组合造词法”。

3. 同源词的造词法

徐通锵对古汉语同源词的形成作了专门研究。他在《汉语的同源词和构词法》[《湖北大学学报》，2000（9）]中把汉语的同源词分为音同的和音近的两类，指出，音同的同源词是由词义构词法造成的；“音近同源词是由音变构词法形成的。在单音的格局中，要创造新词，除了通过引申分化出新词外，还可以通过音节中的因素变化构造意义有联系的新词，也就是音近同源词。”他还对这两种构词法使用的时期及发展趋

势谈了自己的看法：“词义构词和单音节的音变构词始终是先秦重要的构词方式，同源词也大都产生在这个时期。汉代以后单音构词方式明显衰落，结构构词法逐渐成为造词法的主流，新的同源词日益稀少。”以前人们研究造词法，多偏重于多音节词，单音节词往往重视不够，徐氏的研究对于全面开展汉语造词法的研究，特别是注意殷商以后汉语单音词的形成，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4. 伪语凝固成新词

王力在其著作中不止一次提到，现代汉语的复音词多是由“伪语”凝固形成的。^[29]所谓伪语，“就是两个或更多的词的组合，而未能成为句子者”^[30]。例如“‘马车’是两个字，同时也是两个词，它们合成一个伪语。‘车子’是两个字，但它们只算是合成一个词，不能合成一个伪语。咱们有一个标准，可以分清楚词和伪语的界限：凡两个字的中间还可以插得进别的字者，就是伪语，否则只是一个单词。‘马车’是伪语，因为它是‘马拉的车’；‘车子’是单词，因为它不是‘车的儿子’”。“根据上面说的那个标准，咱们可以明白：‘老人’是伪语，因为它是‘老的人’的意思；‘老虎’是单词，因为它不是‘老的虎’的意思。‘说话’和‘走路’都是伪语，因为可以有‘说大话’和‘走小路’等等说法；甚至‘打仗’、‘睡觉’、‘害病’之类也可以认为伪语，因为可以有‘打了一仗’、‘睡了一觉’、‘害了一场大病’等等说法。‘挖苦’却只是单词，因为咱们只能说‘挖苦他’，不能说‘挖他的苦’。”“孟子书里说‘兄弟妻子离散’，‘兄弟’‘妻子’都是伪语，因为是‘兄和弟’、‘妻和子’的意思。假如咱们说，‘某人家里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兄弟，一个妻子，一个女儿’，这里的‘兄弟’和‘妻子’就都只是一个单词。”这样看来，王力所谓的伪语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词组。现代汉语的复音词多是由“伪语”凝固形成的，对此，我们应该历史地去看，倘若不考虑作者得出结论的时代，以今律古，可能就会轻易否定作者的结论，事实上，王力的认识是完全符合汉语实际情况的。

王力虽然指出了伪语凝固成词这种现象，至于怎样凝固形成的，并没作解释。后来，陈丹红解释说：“这种词组凝固化构词是古今汉语的词汇形成的主要方式。往往由两个有实义的单音节成分作为词组连用而形成。这两个词素的结合较为紧密，有的词素结合后构成新义，原来成分的意义融化于新义中，如‘司寇’由动宾式的意义转变为一种官名，‘先生’由先出生之义变成指老师；有的词素结合后，两个同义或近义

的成分互相补充，凝固成一个更概括、更完整的意义，如‘土地’‘布帛’；有的词素结合后，其中一个的意义消失了，只保留一个成分的意义，如‘市朝’‘是非’。这些词的每一个词素往往又可作为词单独使用，所以我们把这种情况看作两个词作为词组结合使用，产生了新的组合意义，它们结合后关系密切，经常使用，逐渐成为词。如‘天下’原义是天底下，本是一个词组……后来‘天下’逐渐成为一个整体，表示整个领土。《孟子》中有‘今天下地丑德齐’‘斯天下之民至焉’等句，‘天下’作为完整的意义用了 172 次，说明这时‘天下’已由词组凝固成双音词了。”^[31]

总之，20 世纪后期人们对古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的研究呈现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力量多集中在上古汉语上，中古汉语的研究相对薄弱，近代汉语几乎还是一个空白。第二，古汉语构词法研究以复音词为主，单音词不受重视。第三，方法上注意作定性定量的分析，专书的研究趋向于穷尽式探讨。第四，术语不统一，构词法和造词法两个概念常常混而不分。第五，理论研究不够，特别是古汉语词的确切问题。

第四节 构词法和造词法的理论探讨

20 世纪人们对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的研究以描写为主，专门的理论阐释不多。即使涉及理论方面的研究，也大多是在分析具体问题时附带论及的，因此，20 世纪有关构词法和造词法理论的研究并不系统。这种零星的理论探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构词法和构形法的区别

早期人们在分析词的结构时，很多学者不分构词和构形，把词的重叠形式、动词后加“了”“着”“过”以及名词后加“们”等都看作构词法予以描写。针对这种做法，有人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构词法和构形法不是一回事，应该加以区分。其中，较早论及这一问题的是邢公畹。

1956 年，邢公畹在讲汉语词类问题时，对现代汉语的构形法和构词法进行了分析。他在《现代汉语的构形法和构词法》中指出，“事实上，‘子’、‘头’跟一部分‘儿’之类的成分和‘了’、‘着’之类的成分的确是不一样的。前者主要用来制造新词，后者用来改变词形。前者属于构词法，后者属于构形法。”“具体到汉语里，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凡词干形态单位跟附加形态单位相加的，既可以是构形法（如‘吃了’）也可以是构词法（如‘桌子’）；凡词干形态单位跟词干形态单位相加，标志了一种新的概念内容、新的联想方式的，是构词法（如‘香蕉’、‘希奇’）；但词干形态单位重叠，表示了一种语法意义的，是构形法，不是构词法。”这里，邢氏强调要区分构词法和构形法，这个意见是对的，只是他把构词法看作“制造新词”的方法，这与后来的认识不同。

邢氏的文章发表以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仍有人把属于构形法的内容放在构词法里讲。后来葛本仪、宋玉柱等人再次谈到了这个问题。

1985年，葛本仪在《汉语的造词与构词》[《文史哲》，1985（4）]中指出构词法和构形法是不一样的，因为“构词法研究的对象是一个个独立的词，通过对一个词的词干的分析和研究，从而了解该词的结构规律及与此有密切关联的词汇总义。构形法研究的对象则是一个个词的不同变化形式，这些变化形式都是依附于某个独立的词而存在的，构形法通过对这些变化形式的分析和研究，从而了解该词在不同形式下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语法意义和附带的词汇意义”。要区别构词法和构形法，可从两个方面进行：从意义方面看，凡词形变化后，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都未改变或完全改变者，都是构词问题；凡是词形变化后，词汇意义基本不变，只改变了语法意义和增加了附带的词汇意义者，是构形问题。从形式方面看，“因为构形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形式的变化，所以它的基础形式都是词。构词却不相同。因为词是由词素组成的，所以构词的基础形式有时是词，有时却不是词”。葛本仪从词汇学角度谈构词法和构形法的区别，分析简明扼要。

宋玉柱则从语法学角度强调构词法和构形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指称和研究的对象不同。他说，构词法是“构造新词的方法，即构成新词的结构方式”，构形法指的是同一个词由于语法意义的变化而在词形上发生的变化，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创造新词。^[32]宋玉柱的观点和邢公畹是一致的，两人都从语法角度分析问题，而且都把构词法当作造词法。

二、构词法和造词法的区别

由于造词法的概念提出较晚，专门研究的人又少，所以前期偶有涉及，也大多是放在构词法当中，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模糊认识，认为构词

法既研究创造新词的方法，又研究词形成以后的结构方式^[33]。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学者谈了两者的区别。

1981年，任学良在《汉语造词法》中指出，“大部分的词既有造词法又有构词法的问题，其余的词只有造词法没有构词法的问题，因此应当区别对待，不能一刀切。”“研究用什么原料和方法创造新词，这是造词法的问题。”“研究词的内部结构形式，这是构词法的问题。”作者强调区别构词法和造词法，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在实际操作当中，他并没有合理地区别二者，他说，“修辞学造词法、语音学造词法却不存在构词法的问题，因为那些词的内部或者不必分析结构形式（修辞学造词法），或者分不出结构形式（语音学造词法）。”既然认为构词法是研究词的内部结构形式的，那么，凡是能分出结构的词，都应看作构词法的描写对象，不能去做主观上规定，认为有的词要分析结构，有的词“不必”分析结构，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至于造词法和构词法的关系，任学良认为，造词法统率构词法，二者之间是纲和目的关系。对于一种理论，我们觉得，只要能自圆其说，且不违背逻辑，就是可接受的。但任氏的理论并不周密，前面强调二者是纲和目的关系，后面又说，“在词法学、句法学造词法里……总的章叫造词法，各节叫构词法，以表示出纲和目的关系。修辞学、语音学造词法里，没有构词法问题，所以章和节都称为造词法。综合式造词法里情况复杂，许多都有构词法的问题，但有的却没有，那就根据综合的情况定名好了。”既然造词法统率构词法，二者是纲和目的关系，就应该把这种认识贯彻到底，可是，从该书的章节安排来看，造词法下面有时叫构词法，有时叫造词法，很不清楚。这说明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模糊的。

最早的、能够清楚地解释二者关系的算是葛本仪。1985年，她在专著《汉语词汇研究》和论文《汉语的造词与构词》中对造词法和构词法作了严格的区分。葛氏指出，“‘造词’和‘构词’从性质到内容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它们虽然都是对词的形成进行分析和研究，但两者观察分析的角度却不一样，因此，研究的内容也毫不相同。”“所谓‘造词’就是指创造新词，它是解决一个词从无到有的问题。”“所谓构词就是指词的内部结构问题，它的研究对象是已经存在的词。”相应的，“造词法指的就是创制新词的方法，也就是给客观事物命名从而产生新词的方法。”“构词法指的是词的内部结构规律的情况，也就是语素组合

的方式和方法。”为方便人们理解，她还举了一些例子：

例词	造词法	构词法
人	音义任意结合法	单音词、单纯词
甜头	说明法	双音词、合成词、词根加后缀型
骨肉	引申法	双音词、合成词、意义相关联合式
眼睁睁	说明法	多音词、合成词、部分重叠式、注释补充式

葛本仪的论述给人一种清晰的认识，并且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后来，刘叔新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汉语描写词汇学》中指出，“在词汇中，‘构词法’观念上的模糊、混乱的现象，是应该消除的。”“词的结构方式，是纯就词的结构平面来观察其结构组合的项以及项与项之间的联结形式和层次；而新词的构造方法，自然只是要看造出或发展新词都有哪些途径。两者显然不是一回事。只不过，构造新词采取某种方式的结果，会造出有某种结构方式的词来罢了。因此，词的结构方式与构造新词的方法虽然有一定的关联，却毕竟是不同平面上的现象，不同角度上的问题。为了避免在‘构词法’这一术语下混淆两者，词的结构方式可称为词式，而构造新词的方法可称之为造词法。”他用“词式”替代构词法，强调应该放在词汇学中来研究，并认为造词法从属于构词法。^[34]刘氏的认识新颖独特，只是影响不大。

90年代以后，潘文国等人对此又有了新的看法。他们在《汉语构词法的历史研究——〈汉语的构词法研究：1898—1990〉绪论》一文中认为，汉语构词法至少包括五个方面：“析词法”、“造词法”、“分词法”、“用词法”和“借词法”，这五个方面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格局。在该文中，他们指出，析词法“研究的实际上只是既成词的结构，并不涉及新词的创造问题”；造词法“关心的不是成词后的结构分析，而是造成词时采用的手段”；分词法是从言语中划分出词这类单位的方法；用词法则“讨论词语运用过程中的分合变化情况”；借词法研究“汉语译借外语，创造汉语新词的方式”。作者提出汉语词汇研究应该包括“析词法”、“造词法”、“分词法”、“用词法”和“借词法”五个方面，确是一种创见，应该引起词汇学者的重视。不过，这五个方面是否应该处于同一层次上而且从属于构词法，还需要探讨。

三、复合词内部结构关系的性质

早期人们给复合词分类时，主要是根据构成成分的意义关系，后来

有人使用了句法术语，于是人们认为复合词内部构成成分之间是语法关系。对此，张寿康、刘叔新等学者先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1957年，张寿康在《略论汉语构词法》中指出，“所谓‘联合式’等等都是就词素的意义关系说的，‘人民’、‘语言’是联合关系，‘飞机’、‘冰凉’是偏正关系，‘出席’、‘讨好’是支配关系，‘心疼’、‘眼红’是述说关系……词具有语法的外部形式，具有词类的特点，而词素在词中就没有什么外部形式，因此只能从意义看关系，不能确定词素的语法的类。”他还说，“联合式”、“偏正式”等等“是就词的内部的意义的关系说的，这种意义上的关系也是造句法上词的组合的主要意义关系……构词法以词素为单位，词素虽然是历史形式的，但是不能说词素在词内有什么外部形式，只是从意义来看内部结构，因此词中的词素间的关系是从意义上看的。”张氏的意见是以前人研究实践作为根据的。

1990年，刘叔新再次论证了复合词内部结构的性质，明确指出复合词内部没有语法属性。他在《复合词结构的词汇属性——兼论语法学、词汇学同构词法的关系》中说，复合词的结构与短语的句法结构虽有相近之处，但是一方面，由于复合词词内语素之间没有停顿的语音形式，也不能插入别的成分，其中任何一项又都不单独与别的成分发生组合关系，而且不可能有形态变化的词法特点，也没有句法方面的功能特点；另一方面，现代汉语中存在着的大量的同素逆序同义词（如“熊猫”与“猫熊”、“泉源”与“源泉”）、词素序与现代汉语句法偏正关系相反的复合词（如“饼干”、“肉松”、“石膏”）和与现代动宾结构正常词序不一致的复合词（如“要冲”、“海拔”、“物产”），还有“记账式”的复合词（如“车辆”、“船只”、“马匹”）、很多不符合句法习惯的复合词（如“法办”、“耳语”、“报纸”）以及与任何一种词序无关的复合词（如“蚕蚁”、“肉桂”、“木耳”），这些都说明了复合词内部没有句法关系。因此，“采用句法结构的术语‘主谓式’、‘动宾式’、‘动补式’、‘偏正式’等来指说复合词的结构类型，无疑是不妥当的”。刘氏认为复合词的构成成分之间完全是词汇性的。

刘叔新的文章发表以后，王政红提出相反的意见。他在《复合词结构的语法属性问题》[《苏州大学学报》，1998（2）]当中分析了形名结构复合词的三组六种类型：

A. 主谓结构

a. $n+a=N$

b. $n+a=A$

B. 偏正结构

a. $n+a=N$

b. $n+a=A$

C. 偏正结构

a. $a+n=N$

b. $a+n=A$

作者认为：第一，“C组偏正结构的a类 $a+n=N$ 格式的词素a与n能自由组合，是形名结构复合词的最主要格式，极大多数形名结构的复合词是以这种格式形成的。这种格式组合的词是名词，与汉语中‘形+名’组成的短语是名词性的性质一致”。第二，词类与句法成分之间不可能达到一一对应，当然，词素类与合成词词类的关系之间也不可能完全一一对应，游离现象甚至比词类与句法成分之间更加复杂。第三，汉语中复合词结构的词素序与短语结构中的词序既有相同又有不一致的地方，不一致的地方表现在现代汉语词序中不具有某些词素序。而“这种现代汉语词序中没有的词素序，恰恰是一种构词手段，有很强的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最后作者指出，“复合词词素的类与合成词词性的类有较整齐的因应规律，只是受语义制约、词类漂移、词义引申、词类转化的影响，复合词结构中的词素类才与合成词词类有游离的现象”。鉴于以上几种情况，所以说，“复合词结构中有一定的语法属性”。

作者对复合词结构有语法属性的论述，让人觉得还不够充分，原因可能是“例外”太多。另外，他说复合词结构中有“一定”的语法属性，我们不知道“一定”应该怎样来理解。

四、构词法研究中须重视语义

从形式方面入手分析词的结构是汉语构词法研究的传统，这种研究方式很难再为人们提供任何新的东西，于是有人提出，构词法研究中应该重视语义因素，彭永昭就是其中一位。

1990年，他在《研究构词法必须重视语义层面》当中认为，研究构词法不能只从语法层面上来研究，“从语法层面对构词法的研究，实际上只是概括了合成词的结构类型，而结构类型远不能完全解释词是怎样构成的”，尤其是以下问题无法解决：第一，无法区分词与非词。第二，根据语法规则，在语义允许的条件下，人们可以自由地造出无限的

词组或句子，但不能自由地造出词来。这说明在构词法里，语法的能量远不如在句法层面上大。第三，把构词法局限在语法层面上，只能涵盖有结构关系的合成词，单音词以及单纯词因为没有语法性质的结构关系，往往被人们忽略了。基于上述认识，作者从语义角度入手，对汉语构词法作了新的分类。他首先把词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两类，然后把“单纯词”分为“初生词”和“滋生词”，把合成词分为“句型结构”和“词法型结构”两种。这种分类方式，表面上与一般的分类没有实质区别，但由于作者加上了语义解释，读后给人一种新的感觉。他说，初生词的语义和语音的联系是任意的，而且不创造新词；滋生词是通过在原词的基础上改变声调或声母、韵母而发生构词性音变，而且它的语义是在原词的基础上引申、分化、凝固形成的，并造成新词；合成词，从语义层面上看，通过构词成分的语义模糊（或至少有一个成分的语义变得模糊），造成了成分间的语义融合、凝固，从而产生了不同于原词的新义。

如果说彭永昭从语义层面对构词法的分析还只是尝试性的，那么徐通锵的“语义构辞法”就带有很强的理论色彩了。徐氏把构词法的分析建立在他的“字本位”理论基础上，并试图通过这样的具体研究来验证自己的理论。

1997年，徐通锵在《核心字和汉语的语义构辞法》〔《语文研究》，1997（3）〕中指出，汉语里字是最重要、最常见的现象，以前人们的研究多受印欧语语法规律的影响，用句法术语来分析汉语的构词法，其实这是汉语构词法研究中的一个误区。他说，“以字为本位的辞是一种字组，特别是其中的固定性二字组，不是一般所说的词。辞与词在汉语中原来是相通的，但在我们语义句法的体系里，二者的含义不同，前者指字组，后者指 word，相互有原则的区别。^[35]字组中字与字之间的语义关系的规律就是语义构辞法。”作者认为，汉语中同一个字大多是既可以居后作向心辞的核心，也可以居前作离心辞的核心，因此，他以核心字为基础，抓住向心和离心两种结构形式来研究汉语的构辞法，并据此把构辞法分为向心构辞法和离心构辞法两类。徐氏以“字本位”理论为指导，指出了传统构词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核心字”入手结合语义研究“构词法”，这种做法很有新意。

五、构词法和造词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956年，张寿康在《关于汉语构词法》中指出了构词法研究中需

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研究构词法应当弄清它与造句法之间的关系，“如果把构词法的类型与造句法混同起来，这种看法的必然结论就是用造句法的框子来控制构词法，不从语言事实出发而从框子出发，这样就取消了构词法的特点，从而也就取消了构词法。”第二，研究构词法应该有历史主义观点。“为了比较深入地理解某词现在的构词性质，更好地理解某一个词的意义，适当地进行语源分析是可以的，但是语源分析只是帮助我们去理解词的结构类型，目的在说明现代汉语中词的构词面貌。”第三，“研究构词法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到能产的构词类型上，应当区分哪些类型是能产的，哪些类型是次能产的，哪些类型是不能产的。”

1988年，唐超群〔《汉语构词法》，《大学文科园地》，1988（1）〕在对80年代汉语构词法研究进行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1）现有的各家构词法系统无法把一些由姓名变成的、表示其他事物的普通名词或专有名词纳入其中，如“刘海儿”、“杜康”，也无法深入分析一些含有姓名的词语，如“岳王坟”、“关公蟹”。（2）有些汉字表示的是词根还是词缀，或者是词还是别的什么，如“敢于”、“属于”、“生于”中的“于”，“了得”是什么构词方式等等，都需要构词法加以说明。（3）有些构词方式概括得不够科学和周备。如“动宾式”（又叫“支配式”）就不能概括其中所包含的各种情况，因为动作关涉的事物或情状包括多种，有“受事”、“施事”、“时间”、“方位”、“原因”、“结果”、“依凭”等，只用一个“动宾式”不能解决问题。作者提出的这些问题有一定的合理性，这说明我们的构词法研究还不够细致。

1997年，杨世铁对造词法研究中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在《汉语造词法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中指出，要把构词法和造词法区分开来，不能从语法学的角度来研究造词法，更不能就把语法学的构词法当作是造词法，“语法学的句法和词法都是抽象的规则，而造词法属于一种具体的方法，具有可操作性”；要坚持共时原则，不能历时共时不分；要结合意义研究造词法，不能只从形式方面入手。此外，还应该弄清描写对象，不要混而不分地把所有的词都拿来一并分析，更不能把借词、方言词和属于“用词”现象的词也当作造词法的描写对象。作者提到的这几个方面是否合理，还有待于用实践来验证。

六、对构词法所属学科的认识

构词法是语法学者提出来的，而且整个 20 世纪一直有人从语法角度来研究，词汇学诞生之后，有学者认为构词法应该是词汇学研究的内容。构词法到底属于语法学，还是属于词汇学？

1957 年，张寿康在《略论汉语构词法》中认为，“构词法是语法中词法的一部分，它与语音学、词汇学、构形法、造句法有极密切的关系”。后来，在《构词法和构形法》当中又说，“构词法是语法中‘词法’的一部分。构词法研究词的构成，它又是词汇学的一部分。因此，构词法是介乎语法学和词汇学之间的一门学问。”

与张寿康后来的观点一致的还有崔复爰和武占坤、王勤。

1957 年崔复爰指出，“构词法指的是不同词的构成、不同词的结构关系，在结构意义上应该属于‘词汇学’的范围，如‘铁路’是偏正式的结构，是用前一个意义修饰后一个意义的。但是词的构成也关系着它的用法和特点，如‘剪’加辅助成分‘子’就变成名词，‘热闹’重叠‘热热闹闹’就作动词用；这又与语法中的词法有密切的联系，所以也有人把它放在‘语法学’里来讲。构词法所以说是词汇学与语法学分界线上的一个部门。”^[36]崔氏把构形法的内容也看作是构词法，由此而得出构词法是词汇学和语法学分界线上的一个部门，这并不足怪。

武占坤、王勤在《现代汉语词汇概要》中指出，构词法既属词汇现象，又属语法现象，它和词汇、语法的关系都很密切。“构词法与词汇、语法两个科学领域的关系如此密切的纽带是‘词’。因为词本身是既属于词汇范畴，又属于语法范畴。那么，在语言体系中的构词法便处于词汇和语法两者之间。在词汇学与语法的分界处也自然就有构词法这一部门。但是，我们却不能认为构词法可以随便归于哪一部分。从整个语言体系看，构词法是研究创造新词的方法，而不是探讨词的语法功能变化的，所以，构词法与词汇中的各个要素的关系更为密切。它在词汇学里所处的重要地位超过了它在语法学领域的地位。”

1987 年，张静在《汉语语法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中认为，“构词法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素构成新词的规则”，它纯粹是语法范畴的东西，因此，语义学构词法、语音构词法不是构词法，是词汇学的问题；单纯词不是构词法的研究对象，构词法也不应研究成语结构和简称。从作者给构词法下的定义及其分析来看，他把很多内容从

构词法当中排除出去，这样把剩下的内容看作构词法，认为是语法研究的对象。这样认识未尝不可，只是为什么要排除这些内容，并没有多少道理可说，也不符合人们的研究实际。因此，这种规定式的意见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明确指出构词法是语法学研究对象的是陈光磊，他在《汉语词法论》中说，“从学科领域的归属看，构词法可以是语法学的一个研究对象，造词法则可以是词汇学的一个研究内容。”

刘叔新在《复合词结构的词汇属性——兼论语法学、词汇学同构词法的关系》中认为，既然构词法是语法学提出来的，现在应该把它还交给语法学。不过，语法学研究构词法只研究派生法和派生词结构，其他词的结构（包括变异形式）应该由词汇学来研究，“词汇学可以用‘词式’和‘造词法’来替换‘构词法’。词汇学研究构词法，概括来说，就是一方面描写各种词的结构方式（词式），另一方面研究造出新词的种种方法（造词法）”。从上面作者的论述来看，他说的构词法已经和一般人头脑中的构词法不同了，他把人们常说的构词法分成了两个部分。

总之，20 世纪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研究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意见，尝试着做了理论上的探讨，虽然不一定是合理的，却可以引导我们去作进一步的思考。

第五节 关于“词缀”

词缀与构词有关。构词既是词汇学研究的对象，又是语法学词法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样，词缀问题就成为词汇学者和语法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由于词缀概念出现得较晚，20 世纪对词缀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中后期。

一、词缀研究中的认识分歧

词缀虽然是最小的语言单位，但由它带来的问题一点儿也不少，“在现代汉语各级语法单位中，认识分歧之大、术语分歧之大都莫过于词缀”^[37]。人们对词缀的认识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词缀”的概念

词缀包括前缀、后缀、中缀。吕叔湘觉得词缀不能概括所有的用

法,建议使用“语缀”^[38]这个名称。^[39]最早的时候,黎锦熙把后缀叫“语尾”^[40],而且影响到后来的汪馥泉等人。张志公早先把前缀、后缀叫词头、词尾^[41],后来又统称为构词的辅助成分^[42]。王力把词缀叫做“记号”,包括前附的和后附的两种。^[43]词缀的概念如此复杂,这种情况郭良夫和马庆株都有过分析,郭良夫在《现代汉语的前缀与后缀》[《中国语文》,1983(4)]一文中指出,“前缀,在词的前头,是词的一部分,也叫词头;后缀,在词的末尾,是词的一部分,也叫词尾。但是有时候,前缀在词组的前头,是词组的一部分,叫词头不如叫前缀;后缀在词组的末尾,是词组的一部分,叫词尾不如叫后缀。前缀、后缀合起来总称词缀,当然不能概括这个语言事实,因之叫词缀也就不如叫语缀”。

词缀的叫法虽然多样,但目前人们已倾向于使用“词缀”这个概念。这是因为词头、词尾多是早期的叫法,而且多数用来指称古汉语。因此,不管是从古今汉语沟通的角度说,还是从使用的普遍性来看,叫前缀和后缀比叫词头、词尾好一些。另外,词头、词尾作为词缀的下位概念也不如前缀、后缀好。“构词的辅助成分”和“记号”已经成为历史上的叫法,可以存而不用。

至于“语缀”,我们认为,科学概念都有固定的含义,不能“顾名思义”,很少有人只根据概念的字面含义来理解它们,因而,词缀虽然有时加在词素前后,有时也加在短语前后,但是既然已经被人们认可,就没有必要再用一个新术语来替换它。“语缀”不如“词缀”好用。

2. 确定词缀的标准问题

什么是词缀?用什么标准来判断词缀?这是每一位研究者都很关心的问题。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差不多所有的论著都提到这个问题,由于各家标准不同,最后得到的词缀也大不一样。在词缀判定上,人们提到的标准有意义方面的,也有形式方面的;形式标准又包括读音和位置两方面。单纯只从一个方面来判定词缀的人很少^[44],人们总是或多或少地考虑几个方面。下面按标准选择几家有代表性的略作说明。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1979)在认定词缀时强调意义方面,他把虚语素叫做“词缀”,不过他又指出,“虚素和实素的区别是程度问题”。根据他的观点,词缀分典型的和一般的。一般的词缀

就是“复合词中有广泛结合力的成分”，作者虽然把这结合广泛的成分叫做“词缀”，实际上并不把它当词缀看待。这个部分可以存而不论。在典型的词缀中，又有新兴的和严格意义上的两种。从他举的例子来看，“严格意义上的词缀”表义确实是很虚的，而“新兴的词缀”总含有一定的意义（详见表 3—1 “有代表性的各家词缀列表”）。其实，在他的标准当中，还同时包括了“位置”方面。

曾晓鹰在自己的论文中提出了判断词缀的四条标准，其中一条是意义方面的，“词缀本身没有任何实在的意义，只是一种附加在其他词语上的辅助成分，表示的是某种抽象的附加意义”^[45]。据此，他把很多人提到的词缀都排除在自己的词缀范围之外。比如“初～”、“～家”、“～手”、“打～”、“～性”、“～化”、“～度”。曾晓鹰用自己的标准确定下来的词缀只有 8 个，可以说是最少的一家（见表 3—1）。其实，正如赵元任所说，“虚素和实素的区别是程度问题”，如果过分看重意义的虚实而不加以限制的话，这条标准是很难掌握的。史存直对此深有体会：“如果说词根有实义，词缀没有实义，有时我们会碰到一些构词成分似乎有实义又似乎没有实义，就把我们难住了。例如‘党性’这个词，‘党’有实义是没有问题的，‘性’到底有没有实义呢，就很难说。”^[46]这段话说明了词义的虚实不好直接用来作为词缀的标准。

朱德熙完全从位置方面着眼。他说，“词缀都是定位语素”^[47]。根据这一点，“所有的不定位语素，我们都不把它看成是词缀”，例如“酸性”的“性”、“手提式”的“式”、“自发”的“自”；另外，凡是两个成分之间存在着意义上的关系的，而非只有位置上关系的，也都不含有词缀，“真正的词缀只能粘附在词根成分上头，它跟词根成分只有位置上的关系，没有意义上的关系。”对朱氏的意见，我们先不说结果，单就标准来讲，非常明确。他据此确定的“词缀”没有例外。这是其他词缀论者不大容易做到的。

吕叔湘也是根据位置定词缀的主张者。他说，语素当中，“不单用，但是活动能力较强，结合面较宽，有单向性，即只位于别的语素之前，或别的语素之后，或两个语素中间。这是所谓‘前缀’‘后缀’‘中缀’，可以总的称为‘词缀’或‘语缀’”^[48]。另外，在他的词缀体系当中，还有类词缀（见表 3—3）。类词缀就是还差一点儿不够词缀的资格，“因为它们在语义上还没有完全虚化，有时候还以词根的面貌出现”。作

者先提出了词缀，在确定类词缀的时候，才参考了意义的标准。

朱亚军在讲到词缀的性质时，把“语音的弱化性”看作一个标准。他指出，“由于词缀原来的主要词汇意义的消失，它的读音自然受到一定的影响。汉语中绝大多数词缀已不能构成重读音节了，其读音或多或少地弱化了。”“尽管音节的弱化性不是汉语词缀的主要的、基本的特征，但它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识别和确认汉语典型后缀时，语音特征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条件，有时还可以帮助我们区别同形同音的词缀和实义词素。”^[49]

马庆株对现代汉语词缀作了全面研究，他认为：（1）词缀并不都是定位不成词的，有些相对定位的成词语素也可以是词缀，如“给以”的“以”、“觉得”的“得”；（2）词缀的意义有虚有实；（3）词缀也并不都标示词性。在此基础上，他考察了词缀与多音节单纯词中的音节、虚词、实义词根语素、构形成分等的区别，并讨论了语素的同一性问题，最后，提出了自己对现代汉语词缀的看法。^[50]

另外，在认定汉语词缀上，孙艳和王希杰都反对用屈折语的眼光看待汉语的词缀问题。由于“我们一贯是以屈折语的词缀语素的特征为标准衡量汉语词缀的，这样一来不少新词缀就被看作不够标准的‘类词缀’或‘准词缀’了。我们以为完全没有必要在汉语词缀问题上过于谨慎，更没有必要为本来就不多的词缀冠之以各类的名称，更何况什么是真正的词缀，什么是类词缀或准词缀是不易绝对地加以区分的，尤其在汉语中加以区分，难度更大”^[51]。“对于汉语词缀，我们不能套用西方语言中的词缀的标准。”^[52]

总之，在确定词缀的标准方面，慎重的有之^[53]，大胆的也有之（如孙艳）；采用简单标准的有之，采用复杂标准的也有之。由于采用的标准不同，最后得到的词缀的数量也不一样（见表3—1）。

表 3—1 有代表性的各家词缀列表

作 者	论 著	词 缀
孙常叙	《汉语词汇》	阿、老、第、初、者、家、儿
赵元任 李荣 (编译)	《北京口语语法》	第、初、老；儿、子、头、巴、么、们、了、着、得
张志公	《汉语知识》	子、儿、头、者、家、员、性、化

续前表

作 者	论 著	词 缀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	阿、老、第、初；、儿、子、头、巴、们、了、着、起来、过、下去、法（子）、么、家/价、个、乎、的慌、不唧的、唏唏（的）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阿、初、老、小；子、头、儿、巴、们、着、然；得、不
朱德熙	《语法讲义》	初、第、老；子、儿、头、们、了、着、过、的、得
郭良夫	《词汇》	老、第、初；者、儿、子、头、们、零后缀；
刘叔新	《汉语描写词汇学》	老、阿、第、初、小、见；、子、头、家、价、着、乎、得、儿、者、家、员、士、手、生、性、化、然、其、地
陈光磊	《汉语词法论》	阿、初、老；子、儿、头、巴、于、然；里、得、不
马庆株	《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范围和分类》	列举了 130 多个（略）
曾晓鹰	《说“词缀”》	阿、老；子、头、里、巴、然

在确定词缀的标准上，我们的意见是，不能过于谨慎，特别是不能忽视汉语词汇近年来发展的事实。研究词缀的时候，应该有共时的观念，要看到不同时期汉语词缀变化的事实，不能用 20 世纪中期或早期的眼光看 20 世纪后期的汉语词缀。应当看到，20 世纪中期的一些学者关于词缀的观点是适合于当时汉语词汇面貌的，今天我们在研究汉语词缀的时候，应当借鉴他们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结论。另外，在确定词缀的时候，标准宜简不宜繁。标准越多，例外越多，最终越易导致捉襟见肘、难以弥合的矛盾。在典型的语法论著中，学者们（如李荣、赵元任、丁声树、朱德熙）提到的词缀几乎都有“了”、“着”、“过”、“的”、“得”。这些单位不承认它们是“词缀”不行，因为它们完全符合论者自己所定的“词缀”标准。但是在词汇学者看来，“看了”、“关着”、“去过”、“长得（漂亮）”等根本不是词。既然不是词，后面的成分就不可能是词缀。这一点，崔复爰和周祖谟都有过说明。崔复爰指出，“无论前缀、后缀，都是构词成分；与语法书上所讲的‘助词’性

质作用不同，如‘笑着’的‘着’、‘吃了饭’的‘了’、‘听过’的‘过’、‘穿得’的‘得’等等，都不包括在这种结构之内。这是应当加以区别的”^[54]。周祖谟说得更明确，他认为“走着”、“来了”、“看见过”中的“着”、“了”、“过”属于词形变化的附加成分，不同于一般所说的词缀。^[55]看来，在研究词缀的时候，还应该采取吕叔湘的意见，把“词汇词”和“语法词”分开来^[56]，换句话说，把“构词词缀”和“构形词缀”分开来，这样才不至于因为角度不同而产生无意义的争论。

至于“意义虚化”，虽然很多人都依此为标准，但各人的理解并不一样。比如北京大学中文系主编的《现代汉语》（商务印书馆，1993）指出，多少有些意义的语素可以看作词缀，如“第”；有实在意义的不是词缀，如“～式”、“～性”、“～师”、“～手”。什么叫“多少有些意义”？什么叫“实在意义”？二者如何区分？我们觉得，像这种模糊性的标准实际上等于没有标准。再比如曾晓鹰认为“‘作家、专家’的‘家’，虽然与‘家庭、回家’的‘家’在语素意义上不同，但并未完全虚化，仍有‘具备……专长的人’的语素意义……可见，它并非附着在其他语素上，表示‘抽象的附加意义’”^[57]，由此断定“家”不是词缀。郭良夫则认为，“用‘家’来造新词是相当自由的，同时也可以看出它确实是日益虚化了，虚化成了一个指人的名词后缀”^[58]。在词缀意义的虚化问题上，赵元任曾经指出，即使严格意义上的前缀，“除‘阿’外，都可能作为实素在别处出现”^[59]。可见，意义虚实的标准宽严不同，得到的结果也不相同。

3. 词缀的作用

语法中的构形词缀是用来表达语法意义的，这一点不成问题。本节主要讨论构词词缀的作用。

词缀的作用与词缀的标准有密切关系，使用不同的标准划分得到的词缀的作用也不一样。可以说，有多少种标准，就有多少种词缀的作用。从目前我们看到的研究来看，人们提到的词缀的作用有如下几种：

第一，词缀只有语法作用。

任学良、郭良夫和王振昆等持此观点。

任学良认为，词头（前缀）和词尾（后缀）都没有词汇意义，不能作造句的材料，只能作构词成分；其作用就是“主要表示词的各种附加意义”，“主要是确定词性，使词干具备名词或别种词的性质”^[60]。郭良夫说，“有的语素，既是实的，又是虚的……当前缀、后缀用的时候，它是虚语

素,只表示语法功能,不表示具体的词汇意义”^[61]。

与他们观点相同的还有王振昆、谢文庆和刘振铎主编的《语言学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3)。该书讲的虽然是普通语言学的问题,但是比较侧重于汉语,书中所举的例子更是针对汉语的。该书指出,词缀是指构词中的粘着语素,“它的基本特点是可以标明词的范畴意义,并将词划分出词类。如‘老’‘阿’‘初’‘子’‘儿’‘头’‘巴’‘者’‘们’是名词的形态标志,‘化’一般是动词的形态标志,‘然’是副词、形容词的形态标志”。

第二,强调词缀具有词汇意义。

严戎庚指出,“词缀主要表示语法意义,但大多数同时还可表示很抽象概括的、泛化了的理性意义及感性意义,并时有使词完整化的作用”^[62]。周一民说得更加明确,“从理论上讲,后缀属于虚语素,即没有词汇意义,而只有附加意义、类别意义和构词作用。但是实际上实语素与虚语素的界限有时并不是那么分明的,特别是表示类别义的后缀,往往带有一定的实义而没有完全虚化”^[63]。

第三,词缀既改变概念意义又有语法作用。

刘伶等主编的《语言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说,词缀“或者给词根增加附加性的词汇意义,或者表达某种语法意义”。周荐在《汉语词汇新讲》(语文出版社,2000)中强调,“现代汉语中的词缀,都是既主要表示语法意义,同时也表示一定的词汇意义的语言成分”。

陈光磊(《汉语词法论》)在明确指出词缀没有实义的同时,又说词缀有两个作用,一是“标明一个词的语义类型”,一是“表征一个词的语法功能(显示词类)”。事实上,不是所有的词缀都能够表征词的语法功能^[64]。陈光磊的观点难免以偏概全。

张静《汉语语法问题》指出,“词缀在构成新词时,一方面起语法作用——表示抽象的语法意义,确定整个词属于某一词类等,一方面也起一定的限制和补充词根意义的作用——表示比词根更为抽象的词汇意义”。

第四,在起语法作用的同时,主要是用来补足音节的。

钱乃荣主编的《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一方面认为词缀主要是起语法作用的,另一方面又指出词缀主要是用来补足音节的。书中指出,“汉语的词缀与英语相比性质上很不相同。英语以词根

为中心，可以通过加‘前缀’、‘后缀’形成一群群词族，词缀使词根附加上不同的意义，改变词性。汉语中加词缀而派生的词有限；有些词缀拿掉后，剩余部分的基本意义、词性仍然不变，它们的附加，更多的是为了词的双音化节律关系，凑上一个音节”。编者从英汉对比的角度来认识汉语的词缀，这样更能看清汉语词缀的特点。

第五，不同的词缀有不同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

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认为，有的词缀只表示词汇意义，如“可笑”的“可”、“反革命”的“反”、“非常”的“非”；有的只表示语法意义，如“老”、“阿”、“子”、“儿”、“头”；有的既表示词汇意义又表示语法意义，如“一员”、“一者”、“一性”、“一化”。赞同这种观点的还有刘叔新。他在《汉语描写词汇学》中指出，汉语的词缀有三类，一类是起改变词根概念意义的作用，如“者”、“家（jiā）”、“员”、“手”、“家（jiā）”、“士”、“生”、“阿”；一类是起标明词性的作用，如“子”、“价（jié）”、“其”、“性”、“儿”、“着（zhe）”、“地”；另一类是既对词根的概念意义有较明显的改变作用，又能够标明词性，如“老”、“见”、“化”、“第”、“初”、“小”、“头”、“然”、“得（de）”。

词缀是用来构词的，在构词时词缀起什么作用，如上所述，人们的看法很不一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单一作用论”肯定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持单一作用观点的人，如果全面考察一下词缀在词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会发现有些问题是不好回答的。当然，正像前面提到的，词缀的作用和词缀划分的标准有关系，使用不同的标准划分出的词缀多少不同，范围越大，词缀在构词时起的作用越复杂。因此，我们认为，要想弄清词缀的作用，还得从解决词缀的划分标准上入手。这个根本的问题不解决，意见永远不可能达成一致。

4. 有无中缀（词嵌）的问题

很多学者认为汉语有中缀。情况大致如表 3—2 所示：

表 3—2 几家有代表性的中缀列表

作 者	论著及发表时间	中 缀	举 例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979	乎其、得、不	神乎其神、看得出、看不出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1979	里、不 ¹ 、 得、不 ²	糊里糊涂、酸不溜溜 看得见、看不见

续前表

作 者	论著及发表时间	中 缀	举 例
任学良	《汉语造词法》，1981	不、里、 七八、三四	黑不溜秋、叽里咕噜 乌七八糟、低三下四
胡裕树	《现代汉语》，1981	里、得、 不	傻里傻气、吃得消 吃不消
钱乃荣	《现代汉语》，1990	里、不、 得、不、乎	土里土气、黑不溜秋 吃不消、对得起 神乎其神

从上表来看，各家对中缀的看法也不尽相同^[65]。上述学者虽然都谈到了中缀而且举了一些例子，却没有就此展开分析。对中缀问题讨论比较多的是李荣嵩和祝克懿。李荣嵩认为中缀是构词现象，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必须由一个单词作中缀的词根；其次，插入中缀后原词（词根）的意义或词性发生变化。”根据这样两个标准，他分析了一些被人们看作中缀的语言成分，如“黑不溜秋”的“不”、“叽里咕噜”的“里”，认为“不”、“里”这样的单位不具备中缀的特点，把它们看作中缀是不妥当的。他认为，汉语中“只有‘得’‘不’这两种成分才是中缀。例如‘打得倒’‘打不倒’‘看得见’‘看不见’‘想得到’‘想不到’中的‘得’‘不’，换言之，只有补充结构式的合成词像‘打倒’‘看见’之类才可以作为中缀的词根。上述这些词根由于加入中缀‘得’‘不’就显示出一种动作的语气范畴，即表示动作结果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就改变了单词的意义（但不改变词性），从而派生出新词。这就是汉语的构词中缀”。不过，下列三种情况下的“得”、“不”不能看作中缀：第一，“吃得消”、“对不起”、“来得及”、“吃不开”等三音节的固定格式；第二，“v得”、“v不得”中的“得”、“不”；第三，属于自由词组的、能无限扩展的“站稳”、“写好”中插入的“得”和“不”。总之，“汉语中缀的特点，可以归纳成两点：一是补充式动词中，只有一部分可使用中缀，有些动词如‘改善’‘夸大’‘加剧’‘集合’‘拒绝’等不能插入中缀；二是中缀‘得’‘不’由于表示可能与否的语气范畴，因此常常是以成对的形式出现，即‘×得×’，‘×不×’”^[66]。

祝克懿也承认汉语有中缀，他判定中缀的标准有三条：第一，它是构成新词的必有成分，这种中加成分是与前后语素共现构成新词的必有

成分。没有中加成分，前后语素组合不成词。即使成词，表达的也是另一种词汇意义。第二，它是定位的不自由语素。构词时，这种中加成分位置居中，后附着前语素，前附着后语素，把前后语素连接为一个整体，表达一个明确的概念意义。中加成分与前后语素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加合关系，而是融合关系。第三，它表示的不是具体的基本的词汇意义，而是抽象的附加的意义。^[67]按照自己对中缀的认识，祝氏考察了《现代汉语词典》和《实用汉语词通》中所有的三、四音节单位，认为汉语三音节的中缀派生词有102个、四音节的9个。这9个含中缀的派生词是：“白不吡咧”、“黑不溜秋”、“红不棱登”、“花不棱登”、“滑不唧溜”、“灰不溜丢”、“酸不溜丢”、“黑咕隆咚”、“花里胡哨”。三音节的中缀派生词中缀比较单纯，只有“得”、“不”。只用“不”作中缀的词如：“保不齐”、“备不住”、“差不多”、“吃不上”、“扶不住”、“顾不上”、“忍不住”、“担不起”、“了不起”、“抹不开”、“憋不住”、“赔不起”、“拗不过”。既用“得”又用“不”作中缀的词如：“吃得（不）开”、“处得（不）来”、“对得（不）起”、“犯得（不）着”、“搁得（不）住”、“赶得（不）上”、“划得（不）来”、“架得（不）住”。

祝氏确定“得”、“不”为中缀的依据有三：（1）整个的三音节单位必须结构定型，意义凝固，具有熟语性，去掉“得”、“不”后，或者不成词，或者虽然成词但表达的却是不同的词汇意义。（2）“得”、“不”读轻声，位置居中。（3）“得”、“不”表示抽象的可能性意义。

在中缀的问题上，李荣嵩和祝克懿二人除了对“里”（花里胡哨）、“不”（黑不溜秋）有不同的意见外，对“得”、“不”的看法更是大相径庭，其中一个认为整个的结构不能是固定结构，一个认为必须“结构定型，意义凝固，具有熟语性”。看来，中缀问题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还需要下大力气研究。

与上述学者的看法不同，刘叔新、孙艳认为汉语没有中缀。

孙艳指出，“有人认为汉语有中缀，如‘胡里胡涂’‘黑不溜秋’‘来得及’‘吃不消’‘神乎其神’中的‘里’‘得’‘不’‘乎’是中缀，我们认为不妥。像‘黑不溜秋’这样的词至少应分析为词根加三音节的后缀‘不溜秋’”^[68]。她只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没有阐述理由，而且这种意见跟马庆株的比较接近。马庆株在他的文章当中，绕开了“中缀”问题，只肯定了“黑不溜秋”的“不溜秋”、“酸不溜溜”的“不溜溜”等是后缀。

此外，严戎庚在他的文章当中也谈到了中缀问题，他同意胡裕树

《现代汉语》的看法，认为只有“吃不/得消”中的“不/得”才是中缀，“(贫)了呱唧”、“(白)不吡咧”、“(黑)咕隆咚”、“(血)丝胡拉”、“(花)里胡哨”是后缀。另外，应当把“傻里傻气”、“马里马虎”、“糊里糊涂”、“疙里疙瘩”、“啰里啰唆”中的“里”和它前面的那个音节合起来解释为前缀。^[69]

刘叔新对“里”的性质解释得最详细，他说，如果把“里”看作中缀，“被它嵌进去的那个单位就应是不同于（不加‘里’的）原单位的另一个词，即‘胡里糊涂’和‘胡糊涂’，‘马里马糊（虎）’和‘马马糊（虎）’……都是不同的词。可是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胡糊涂’‘马马糊（虎）’这类形式的单位。如果说，‘胡里糊涂’‘马里马糊（虎）’等就是‘糊涂’‘马糊（虎）’等分别加词缀‘里’所产生的另一个词，却又无法解释重叠成分‘一胡一’，‘一马一’等的性质和作用。须知‘一胡一’，‘一马一’等重叠成分标明了词的一种构形变化，使词的重叠形式在意思程度上——语法‘级’的含义上——区别于不重叠的‘糊涂’‘马糊（虎）’等原式。因此，不能把‘胡里糊涂’‘马里马糊（虎）’等分别看作不同于‘糊涂’‘马糊（虎）’等的另一个词，也就是不能把‘里’看作中缀。汉语很难说存在这种位置特殊的词缀”。^[70]总之，“根据‘里’所起的作用以及它本身不存在概念意义的情况，把它看作重叠成分的伴随物，看作性质上更接近于构形法形态的特殊形态，是比较合理的”^[71]。刘叔新还认为，嵌入这种结构中的“里”有两种作用，一是衬音，成为语法重叠的标志；二是增强了语气及贬义色彩。

看来，中缀的数量不多，问题却不少。关于中缀，需要思考这么几个问题：（1）中缀既然是词缀，那么它跟前缀、后缀是否具有相同的性质？如果性质不同，中缀的提法就值得重新考虑。（2）词缀是用来附着在词根上构词的，中缀也不例外。如果把“里”、“不”、“得”等成分看作中缀，那么被它插入的那个单位是不是一个完整的语言单位？是不是词根？不是的话，中缀的说法也不能成立。（3）即使第二个条件成立的话，还要看插入后的整个单位是不是成词，如果是短语的话，插入的成分至多算是“构形中缀”。如果承认是构形中缀，这已经是句法上的问题了，不应该属于构词法的讨论范围。马庆株在讨论词缀问题时，区分构词平面和造句平面，是很有道理的。

5. “类词缀”问题

赵元任在他的《汉语口语语法》中把后来人们说的“类词缀”叫作

“新兴前缀”、“新兴后缀”（后来郭良夫仍然这样叫）。可见，这个时候还没有“类词缀”的概念。自从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使用了“类前缀”、“类后缀”的概念之后，人们才开始使用“类词缀”或“准词缀”这样的术语，并尝试着做了些分析^[72]。

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情况来看，人们对“类词缀”的理解有三点是共同的，一是对“类词缀”性质的认识，即类词缀是指多少具备词缀的特点、却还算不上词缀的那样一些单位；二是类词缀的数量要比词缀的数量大^[73]；三是类词缀的意义要比词缀的意义实在些。但从各家的分析来看，人们对类词缀的认识也还有些差距：首先是数量多少不等，例如，赵元任和郭良夫列了 22 个，吕叔湘列了 41 个，陈光磊列了 75 个^[74]；其次是对具体的某些单位的认识不同（见表 3—3）。这大概是由于各家对词缀标准的认识不同造成的。

表 3—3 各家类词缀列表

作 者	论 著	名 称	举 例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	新兴的词缀	不、多、单、泛、准、唯、无、非、亲、反；化、的、性、论、观、率、法、界、炎、学、家、员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类语缀	可、好、难、准、类、亚、次、超、半、单、多、不、无、非、反、自、前、代；员、家、人、民、界、物、品、具、件、子、种、类、别、度、率、法、学、体、质、力、气、性、化
郭良夫	《词汇》	新兴的词缀	不、多、半、单、超、非、无、反、亲、自、次；家、品、观、界、率、性、化；种、着、了、过
陈光磊	《汉语词法论》	类词缀/副词缀/预备词缀	半、超、次、打、大、单、反、泛、非、好、可、类、前、全、伪、小、亚、有、准、总；夫、家、匠、师、生、士、员、长、手、汉、翁、馆、工、星、迷、族、佬、鬼、棍、蛋、虫、观、论、学、派、界、度、类、气、率、品、种、件、具、子、化、性、法、是、来、角、型、式、牌、号、热、业、科、处、局、厅、店、部、组

续前表

作 者	论 著	名 称	举 例
马庆株	《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范围和分类》	准词缀	分、棍、家、界、迷、师、总

当然，也有反对“类词缀”的提法的。“‘类词缀’的观点似欠审慎。如果不审慎，那么诸如‘观（人生观）、表（统计表）、式（老式）、党、阶级、主义’等等都要类推为‘类词缀’了。”设立类词缀，“很可能导致词缀扩大化”^[75]。

在对待类词缀的问题上，我们认为，如果用从严的眼光看，汉语中只有词缀，没有类词缀（所谓的类词缀就是词根）；若用发展的眼光看，设立“类词缀”，说明汉语中有些语素正在取得词缀的资格^[76]；若用超前的眼光看，现有的、人们提出来的很多类词缀都可以看成词缀。第一种做法比较谨慎，看不到汉语词汇发展的事实；第三种情况虽然具有合理性，但也不完全符合汉语实际，毕竟“半一”、“超一”、“次一”、“一星”、“一迷”、“一观”、“一论”、“一学”等与“阿一”“老一”“一子”、“一头”、“一儿”的性质不完全一样。如果把它们都看成词缀，那么词缀内部就包含着性质不尽相同的小类，与其如此，还不如采取第二种做法——设立类词缀。

二、20 世纪 90 年代后词缀研究的新趋势

20 世纪后期特别是 90 年代以后，汉语词缀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势，由以前泛化式的研究向深入细致、具体的方向发展，可以说，这大致代表了今后词缀研究的方向。像这样的研究有代表性的当推陈汝立的《谈词缀“性”》[《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6（2）]、曹小云的《〈西游记〉中的人称代词前缀“是”》[《古汉语研究》，1996（4）]、白平的《“其”非词头辨》[《山西大学学报》，1996（2）]、周一民的《汉语构词后缀的识别和规范》[《语文建设》，1998（11）]和黄树先的《试论古代汉语* A—前缀》[《语言研究》，2000（2）]。

陈汝立着重分析词缀“性”与词根“性”的区别，他说，“语义上比较实在，比较具体的……就是词根”；“语义正在虚化的，或者说还没有完全虚化的……就是词缀。”曹小云的文章考察了《西游记》中人称代词前面出现的“是”的用法，用汉语史和方言的资料论证支持了刘坚

的“是”为词缀说，丰富了人们对汉语史上词缀的认识。

白平分析了“其”在古书和《诗经》中的用法（作“极、甚”讲），从而否定了“其”是词头的看法。他指出，“笔者认为人们把古书中一些含义不易确定的字轻易地指为无义的语助或‘词头’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如果‘其’‘有’‘薄’‘言’‘于’等字真是‘词头’，它们就应该有在不同的语境中反复出现，以资验证的例子，主张‘词头’说的人们总是举一些《诗经》、《尚书》中的例子，似乎《诗经》、《尚书》使用的是一套和其他上古典籍不同的词汇系统，在《诗经》中俯拾皆是‘词头’，到了其他文献中就荡然无存了。这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我们认为，汉语中存在着‘词头’的说法根本经不起推敲”。作者对“其”字的分析具有合理性，但是因为“其”不是词头，就得出古汉语中没有词头的结论，这是很片面的做法。

周一民着重就一些实语素（词根）和虚语素（词缀）的区分、表示同一词缀的不同书写形式的认同等问题列举性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文章虽不是系统分析讨论，但有些地方颇有启发性。比如，作者指出要分清“儿音节后缀”和“儿化后缀”，“儿音节后缀与儿化后缀从历时看有同源关系，但是从共时看是两个形式和作用存在区别的后缀”；名词后缀“们儿”不同于表复数的约略助词“们”，前者是词缀，后者不是；“某些动词的后位语素为虚词，如‘显得、记得、懂得、觉得’的‘得’，‘忠于、苦于、乐于、甘于’的‘于’，‘关乎、在乎、合乎、近乎’的‘乎’，应该都是后缀”；“双音节的词，如果意义一实一虚，那么虚语素自然是后缀，如‘等于、显得’；如果两个都是虚语素，那么后字不应看作后缀，如‘然而、虽则、与其’”。周氏的分析揭示了汉语词缀的复杂性，对人们正确地认识汉语后缀有启发性，同时也告诉人们词根和词缀的界限并不是截然分开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否则，很容易把不是词缀的成分当作词缀，而把真正是词缀的成分排除在词缀之外。

黄树先的文章利用汉藏语和历史语言学的有关研究成果，摆脱了汉字字形的束缚，以词为单位，全面分析了汉语中的* A—前缀。他认为，汉语中的* A—前缀，除了我们熟知的“阿”字外，还有“乌”、“於”、“于”、“亚”等，由此解决了* A—前缀长期以来由于受书写形式影响而没有被人们认识清楚的问题。

总而言之，上述几位学者的文章都是为着解决某一问题而作的，因而对问题的分析都比较深入具体，有着很强的针对性，这种研究问题的

方法和角度值得我们借鉴。

纵观 20 世纪汉语词缀的研究，大致表现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 世纪前半期。学者们在分析认识词的构成的时候，发现了附着在词根上的位置比较固定、表义比较虚的构词成分——语尾。

第二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后至 80 年代初期。随着国外语言学理论的传入和普及^[77]，人们开始从理论的角度认识思考词缀问题。各种普通语言学教材和《现代汉语》教材都或多或少地涉及词缀问题，而且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为 20 世纪后期人们对词缀问题的深入探讨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对词缀的研究带有通论、介绍普及性质，深入的研究不多。

第三个阶段：80 年代以后。详细、全面探讨词缀问题的文章多起来，有些甚至针对着个别问题或某类词缀进行分析，虽然方法上还存在一些问题，重复性研究也比较多，但总体来看，成果和质量要超过以前的任何一个时期。这个阶段可以看作是带有总结性的、继往开来的一个时期。

今后，词缀研究在加强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同时，应该从小问题着手，向深处细处开掘。词缀研究宜细不宜粗。太粗了，就会停留在表面上，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

本章小结

一、20 世纪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研究的特点

近百年的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第一，构词法研究从早期从属于语法学领域渐渐向词汇学领域过渡，现在已经成为语法学者和词汇学者共同关注的一项内容。

第二，造词法研究从构词法当中分离出来，成为词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第三，宏观研究（构词法和造词法体系的研究）和微观研究（个别构词法和造词法的研究）相结合，而且开始注意理论方面的探讨。

第四，研究范围逐步扩大。人们不再满足于共同语的研究，开始对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中的构词现象和造词方法进行分析，且取得了不少成果。^[78]

第五，方法上不仅仅是描写，还有定性定量的分析，特别是古汉语专书的研究，更趋向于作穷尽式探讨。

二、值得注意的一些观点

第一，构词法不同于构形法^[79]，也不同于造词法^[80]。

第二，“构词法”要从静态角度研究词的结构方式，造词法要从动态角度考察新词产生的方法或途径；造词的过程虽然是动态的，但却属于汉语的共时范畴，并非历时现象，因此，研究造词法不能违反共时原则。^[81]

第三，构词法研究中，既要研究既成词的结构（析词法），又要研究造成词时采用的手段（造词法），还要研究从言语中划分出词的方法（分词法）、研究词语运用过程中的分合变化情况（用词法）以及汉语译借外语创造新词的方式（借词法）。^[82]

第四，研究构词问题，不仅要考虑到语法层面，还要考虑语义层面和语音层面。应该重视语义在构词（造词）中的作用。^[83]

第五，以字为本位的辞是一种字组，汉语的辞的构造最重要的是语义问题，必须紧密联系汉语社团思维方式的特点考察字义、辞义的结构规律（语义构辞法）。换句话说，以核心字为基础，从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入手，来考察字组的结构规则和理据。^[84]

第六，研究造词法必须结合意义进行分析，而且要把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不能只看其中一个方面。^[85]

第七，复合词内词素间的结构关系，无论意义方面和形式方面，都没有被语法加以概括，因而不存在现实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不属于句法或词法范畴，不是语法性的。相反，复合词结构只是词汇的现象，具有词汇属性。^[86]

第八，研究词缀问题时，不能先入为主去作人为的规定，“规定为不成词语素，规定为虚化语素，规定为标示词性的成分，规定为多少个”等等，而要有一个经过论证的标准。另外，还要注意语素的同一性问题。^[87]

第九，汉语的词缀系统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不够稳定的系统。词缀数目增多，构词能力增强，适应范围扩大，词缀发展的趋势是上升的。^[88]

三、20 世纪构词法和造词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第一,从实质上讲,汉语构词法是在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因此,20 世纪的汉语构词法研究多多少少地都带有模仿的痕迹,正如徐通锵指出的:“一谈起构辞法,人们就会想到述宾式、述补式、主谓式、联合式、偏正式这些名称,认为它是语法结构的一部分。这是仿效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来研究汉语而得出来的一种结论,实在是张冠李戴,可以说是汉语构辞研究中的一个误区。”这样的构词法“不是根据汉语实际语言材料的研究而提炼出来的假设,而是根据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来套裁汉语事实的结果,而且还是一种间接的套裁,即:先根据印欧语的语法框架分析汉语的句法结构,而后再用这种句法规则建立汉语的构词法”^[89]。徐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汉语构词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深思。如果我们冷静思考一下构词法研究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越到后来越带有模仿的痕迹。这说明印欧语构词法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汉语词汇富有民族特色,这一点人们都会承认,但是我们的构词法研究之所以变得缺乏个性,就是因为忽视了汉语特点,拿外语来比附汉语。今后的汉语构词法研究应当在认识汉语特点的基础上,以深入分析某类构词方式为重点,向细致化方向发展,淡化构词法体系的研究,同时加强汉语与外语的对比研究。

第二,术语不统一。术语不统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同一现象的分析,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叫法。比如,同是分析词的结构,有的叫构词法,有的叫造词法,有的叫“词的构造”或者“词的构成”、“词的结构”。二是相同的术语,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例如“构词法”,有人认为是创造新词的方法,有人认为指词的结构方式,还有人认为既指创造新词的方法又指词的结构方式;就是在认为构词法是指词的结构方式的学者中间,人们的意见也不完全相同,其中有的认为构词法只分析复合词的结构,有的认为构词法要分析复音词的结构,有的认为所有的词都需要分析,还有的把固定语的结构也放在构词法当中。类似的问题,“词缀”、“造词法”也同样存在。

术语不统一是人们认识不同的表现,研究过程当中使用不同内涵的同一术语往往造成“你说你的,我谈我的”、彼此毫不相干的被动局面。21 世纪的研究应该从解决术语分歧入手,明确构词法和造词法的含义,

合理地确定描写对象，并避免滥造新的术语。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人们有可以讨论的基础，才能规范研究的内容，才能保证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的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第三，重复性研究多、目的性不强。20 世纪有关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研究的文章不少，但是有新意、有创见的文章不多。其中，有不少文章在重复前人论调，还有不少文章没有明确的研究目的。这样的文章，白白浪费了不少人力物力。

今后，应该加强研究工作的目的性，或者是解决理论上的问题，或者是为新词创造、词语运用、词语教学等实践活动提供事实依据；要注意对现有的研究成果及时总结，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加强讨论与合作，避免低水平的重复性研究。

第四，研究力量薄弱且分布不均。跟语法学相比，全国专门从事汉语词汇学研究的人很少，专门从事构词法和造词法研究的人更少，因此，现有的构词法和造词法方面的文章多数是“副产品”，真正关心这个问题并下大力气研究的学者很少。从已经发表的文章来看，研究共同语的比研究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多，研究现代汉语的比研究古代汉语的多，研究上古汉语的比研究中古汉语的多，近代汉语的研究几乎还是一个空白。此外，研究整个体系的多，研究个别方法的少；研究具体问题的多，研究理论问题的少。这种极不平衡的研究状况阻碍了研究的发展。

第五，论辩性太强，逻辑思维不够。词汇学作为一门学科，不受人们重视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太讲究研究的方法，大多数论文论辩性太强，分析不够，确实能够说服读者的很少。这个问题表现在词缀研究上，是多主观上的规定，少客观的分析描写。

21 世纪，不仅要在构词法和造词法的研究力量方面有所加强，而且还要合理分工，集中攻关，积极开展对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的研究、构词法和造词法发展史的研究，以及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的研究，并且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如“用词法”），争取拿出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来。

注释：

- [1] 细究起来，两人的看法并不一样：刘叔新认为构词法包括“词式”（词的结构方式）和“造词法”两个方面；潘文国等认为构词法包括“析词法”、“造词法”、“分词法”、“用词法”和“借词法”五个方面。

- [2] 参见刘叔新：《复合词结构的词汇属性——兼论语法学和词汇学同构词法的关系》。
- [3] 本章暂且按以下标准区分构词法和造词法：从静态角度分析词的结构方式的是构词法，从动态角度描写词如何被创造出来的是造词法。
- [4] 潘文国等认为最早系统研究汉语构词法的是薛祥绥，参见潘文国等：《汉语构词法研究的先驱薛祥绥》，载《中国语文》，1993（1）。其实，单从与梵语六合释相比较研究汉语词的结构来讲，胡以鲁的研究就比他早了六年。
- [5] 参见黎锦熙：《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
- [6] 参见胡附、文炼：《构词法》，见《现代汉语语法探索》，上海，东方书店，1955。
- [7] 参见黎锦熙：《汉语构词法和词表研究》（上），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9（5）。
- [8] 原书名为 Mandarin Primer, An Intensive Course in Spoken Chinese, 哈佛大学出版社，1948。
- [9] 参见胡附、文炼：《构词法》。
- [10] 参加这一工作的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饶秉才、王福庭、许树智。
- [11] 见陆志韦等：《汉语的构词法》（修订本），11页注①，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 [12] 黎锦熙认为复合词构成成分之间没有句法关系，后来，张寿康、刘叔新等又作了分析。详见后文。
- [13] 准确地说，武占坤、王勤把构词法看作语法学和词汇学之间的一门学科。参见《现代汉语词汇概要》，72~80页。
- [14] 参见张寿康：《关于汉语构词》第三部分“词的不同角度的分类”，见《语法和语法教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另见胡附、文炼《现代汉语语法探索》65页作者对吕叔湘分类的看法，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
- [15] 参见刘云泉：《现代汉语构词法中的前正后偏式》，载《杭州大学学报》，1984（14）增刊。
- [16] 参见周荐：《几种特殊结构类型的复合词》，载《世界汉语教学》，1992（2）。
- [17] 参见饶勤：《从句法结构看复合词中的一种新的结构方式——连动式构词》，载《汉语学习》，1993（6）。
- [18] 参见王宁：《先秦汉语实词的词汇意义与语法分类——训诂学与语法学之二》、《汉语词源的探求与阐释》。二文均见王宁：《训诂学原理》，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
- [19] 徐通锵：《核心字和汉语的语义构辞法》，载《语文研究》，1997（3）。
- [20] 可以放在“借词法”当中加以描写，让借词法和造词法并列。参见杨世铁：《汉语造词法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载《天津教育学院学报》，1997（2）。

- [21] 由于近代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的研究成果不多，暂归入本节讨论。
- [22] 张学贤对构词和造词也不做区分。参见《修辞构词法与古汉语词汇丰富发展的关系》，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8（1）。
- [23] 王宁：《先秦汉语实词的词汇意义与语法分类——训诂学与语法学之二》。
- [24] 王宁：《汉语词源的探求与阐释》。
- [25] 同上。
- [26] 同上。
- [27] 王宁：《浅论传统字源学》，见《训诂学原理》。
- [28] 王宁：《汉语词源的探求与阐释》。
- [29] 参见王力：《中国语法纲要》，上海，开明书店，1946；《汉语史稿》（中册）。
- [30] 王力：《中国语法纲要》，第三章，见《王力文集》，第3卷，171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 [31] 陈丹红：《试论〈孟子〉合成词的构造及其类别》，见《语文论丛》第4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
- [32] 参见宋玉柱：《应该把构词法与构形法区别开来》，载《逻辑与语言学习》，1986（5）。
- [33] 高名凯、武占坤和王勤、邢公畹、宋玉柱等学者都这样认为。
- [34] 参见刘叔新：《复合词结构的词汇属性——兼论语法学、词汇学同构词法的关系》。
- [35] 辞与词的区别详见徐通锵：《语义句法刍议》，见《徐通锵自选集》，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徐通锵：《“字”和汉语的句法结构》，载《世界汉语教学》，1994（2）。
- [36] 崔复爰：《现代汉语构词法例解》，56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
- [37] 马庆株：《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范围和分类》，见《中国语言学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6）。
- [38] 钱乃荣主编的《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中说，“汉语的有些词缀，不仅能附着在词根和词上，还可以附着在短语上，如‘先生女士们’‘组织纪律性’‘第五十五章’，所以也可称它们为语缀”（169页）。另外，周荐也使用“语缀”的概念，参见其《三字格结构分析》。
- [39] 参见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40] 参见陆衣言编：《黎锦熙的国语讲坛》，上海，中华书局，1921。
- [41] 参见张志公：《汉语语法常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
- [42] 参见张志公：《汉语知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另周祖谟、丁声树等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分别把词缀叫做“辅助成分”和“类似词头、词尾的附加成分”。这大概是用印欧语的眼光看汉语的结果。参见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丁声树：《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43] 参见王力：《中国现代语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

- [44] 朱德熙是其中一位，他使用的是单标准。参见其《语法讲义》，28～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 [45] 曾晓鹰：《说“词缀”》，载《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6（1）。
- [46] 史存直：《汉语词汇史纲要》，9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 [47] 朱德熙：《语法讲义》，28页。
- [48]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着重号为编者所加，下同。
- [49] 朱亚军：《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及其分类研究》，载《汉语学习》，2001（4）。
- [50] 参见马庆株：《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范围和分类》。
- [51] 孙艳：《现代汉语词缀问题探讨》，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3）。
- [52] 转引自罗湘英：《亲属称谓的词缀化现象》，载《汉语学习》，2000（4）。
- [53] 史存直在讲到汉语词缀问题时说：“汉语本来就有好多地方和印欧语不同，因而处理汉语的问题就不能照印欧语死搬硬套。在两种说法都可以成立的时候，我认为宁可采取慎重的态度，多考虑传统的说法。”见史存直：《汉语词汇史纲要》，96页。
- [54] 崔复爰：《现代汉语构词法例解》，57页。
- [55] 参见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9页。
- [56] “一般人心目中的词是不太长不太复杂的语音语义单位，大致跟词典里的词目差不多。这可以叫做‘词汇的词’，以区别于‘语法的词’。咱们不能忘了，词这个东西，不光是语法单位，也是词汇单位。二者有时候一致，有时候不一致，因为所用标准不同。”见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21页。
- [57] 曾晓鹰：《说“词缀”》。
- [58] 郭良夫：《现代汉语的前缀与后缀》，载《中国语文》，1983（4）。
- [59]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1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60] 任学良：《汉语造词法》，33页。
- [61] 郭良夫：《现代汉语的前缀和后缀》。另见郭良夫：《词汇》，13～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62] 严戎庚：《论现代汉语词缀及其与助词的区别》，载《新疆大学学报》，1996（4）。
- [63] 周一民：《汉语构词后缀的识别和规范》，载《语文建设》，1998（11）。
- [64] 参见云汉、峻霞：《再议带后缀“化”的词》，载《汉语学习》，1994（1）。
- [65] 周荐在其《三字格结构分析》一文中列出了“词根+词缀+词根”一类，如“稀巴烂”、“中不溜”，其中的“巴”、“不”是中缀。见《词汇学问题》，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 [66] 参见李荣嵩：《中缀试探》，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6（2）。
- [67] 参见祝克懿：《中缀说略》，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4（4）。
- [68] 孙艳：《现代汉语词缀问题探讨》。
- [69] 参见严戎庚：《论现代汉语词缀及其与助词的区别》。

- [70]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87～88 页。
- [71] 同上。
- [72] 参见陈光磊：《汉语词法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马庆株：《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范围和分类》；周一民：《汉语构词后缀的识别和规范》。
- [73] 马庆株所列的准词缀，数量要远远地少于词缀。这跟一般人的认识不同。参见《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范围和分类》。
- [74] 当然，这里的数字并不一定完全表示在某位学者看来只有这些类词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说明不同学者对类词缀数量的看法是不同的。
- [75] 严戎庚：《论现代汉语词缀及其与助词的区别》。
- [76] 崔复爰指出，“在现代汉语中，作为前缀后缀的辅助成分，可以发现很多，而且还有很多正在逐渐的形成中，它们的数量是会日益增加的。这种语言发展的事实值得我们特别注意。”见《现代汉语构词法例解》。
- [77] 这方面的情况可参考邵敬敏、方经民：《中国理论语言学史》第三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 [78] 限于篇幅，这一部分本书没有分析。有关研究的重要文献见附录。
- [79] 参见邢公畹：《现代汉语的构形法和构词法》，载《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版），1956（2）。
- [80] 参见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
- [81] 参见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
- [82] 参见潘文国：《汉语构词法的历史研究——〈汉语的构词法研究：1898—1990〉绪论》，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3（5）。
- [83] 参见彭永昭：《研究构词法必须重视语义层面》，载《重庆师院学报》，1990（3）。
- [84] 参见徐通锵：《核心字和汉语的语义构辞法》。
- [85] 参见杨世铁：《汉语造词法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 [86] 参见刘叔新：《复合词结构的词汇属性——兼论语法学、词汇学同构词法的关系》。
- [87] 参见马庆株：《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范围和分类》。
- [88] 参见孙艳：《现代汉语词缀问题探讨》。
- [89] 徐通锵：《核心字和汉语的语义构辞法》。

第四章 词汇系统^[1]研究

第一节 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研究

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研究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周祖谟、孙常叙、吕叔湘等在他们各自综论性的词汇学文章或专著中均明确指出词汇是一个系统,孙常叙还指出方言“还有它的词汇系统”^[2]。不过,本阶段的研究比较肤浅粗疏,除周祖谟曾经两次简明扼要举例对词汇系统性做说明具有奠定基础的意义外,其余各位只是用一两句话表明观点,没有必要的论证。

60 年代“文化大革命”前,从事词汇系统研究的学者、发表的文章极其有限,仅三位三篇,但整个研究详细深入,研究范围有所拓展,发表不同意见有理有据,具有理论深度。1961 年黄景欣发表的《试论词汇学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1961(3)]是第一篇专门讨论词汇系统的文章。黄氏对词汇系统存在的明确肯定和具体推导,对词汇系统具体面貌的揭示,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思考。1963 年高名凯在其具有普通语言学性质的论汉语的著作《语言论》(科学出版社,1963)中,专门列一章揭示词汇系统的结构,阐述词汇系统的发展演变。1964 年刘叔新《论词汇体系问题——兼与黄景欣同志商榷》对当时包括黄景欣在内的所有肯定词汇系统的推导及证明提出质疑。基于对系统的严格理解及对词汇单位作为语言建筑材料单位本质属性的准确把握,刘氏提出证明词汇系统的新途径。在一番认真仔细的考察后,刘氏得出“不可以说词汇是系统”的结论。刘氏的文章发表后,未见学界任何反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切学术活动被迫中断,词汇系统研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80 年代,词汇系统研究和描写词汇学其他问题的研究一样,重新热烈开展起来。前半期,张永言、武占坤和王勤在他们初次出版或修订旧作出版的综论性词汇学专著中专门列出章节揭示说明词汇系统或系统性,确定了词汇系统问题在描写词汇学知识体系中作为一个研究课题的

位置。后半期,年轻学者周国光先后两次单独著文、一次与陈庆祐合作著文就词汇系统和概念系统、词汇系统和耗散结构、词汇系统的地位作用构成等问题进行阐论。三篇文章都有所针对,其中两篇是针对20年前刘叔新文中的某些观点,另一篇是针对老一辈学者邢公畹1983年在为刘叔新《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写的序中运用耗散结构理论得出的词汇不是系统的结论。与此同时,“词汇系统”的说法频繁出现在各种《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类教材中,如刘伶等主编、武占坤主编、葛本仪主编教材均比较详细地述及词汇系统的构成、词汇系统性的表现、词汇系统的演变发展。词汇系统问题进入汉语词汇教学体系,一方面显示了大家对词汇系统的肯定和其研究的重视,另一方面为词汇系统研究的普及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较之60年代,本期研究在人员和成果的数量上增加不少。大家态度积极,思维活跃,主动借鉴社会科学界的某些理论,争先对同一问题发表不同意见,勇于对前辈时贤提出批评,各抒己见的情景和整个时代风气相一致。不过由于对有关系统的理论注意不够,加之词汇问题的相关研究刚刚展开,有待深入,虽意见多样,但普遍地深入程度不够,具有本质区别的很少。

90年代,继续词汇系统本体构成的研究,开展词汇系统的史学研究,是这一时期词汇系统研究的主要特点。初期,刘叔新在自己60年代有关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几十年研究成果,最终证明词汇是系统,并就词汇系统的具体结构、特征、词汇系统在语言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徐国庆积极吸收当代词汇学研究成果,借鉴系统论理论,继1992年起陆续在学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后,1999年出版了第一部专论词汇系统的专著《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着重讨论了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本体构成、共时范围内的运动发展变化。从9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出版的周荐、符淮青、许威汉等人的词汇学史专著以及侯新华的论文《建国后的词汇体系研究述评》[《高校社科信息》,1997(2)]从史学研究的角度对汉语词汇系统的研究情况进行回顾总结,有的侧重于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研究,有的包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词汇系统研究,对词汇系统研究的继往开来起了有益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这一时期新出或修订出版的《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类教材纷纷设章立节揭示词汇系统或系统性,说明词汇系统的性质特征、发展变化。教材的具体论述多吸收词汇学界关于词汇系统研究的某些成果,不再像80年代那样各抒己见。在大家对词汇是系统的一致肯定中,张素英、林杏光二位于

1991年、1999年一前一后提出不必说词汇是系统也不必说词汇不是系统的主张，这一意见新则新矣，但等于取消词汇系统研究，未被大家注意。

在半个世纪的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研究中，学者们曾在词汇是否成系统这个问题上有过争论，在词汇系统或系统性的具体揭示上各自发表了不同看法；此外，还就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性质特征、发展变化、词汇系统在语言系统中的地位作用、词汇系统的功能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对历来词汇系统研究情况也有总结回顾述评。下面对一些研究得比较多的问题分别加以叙述。

一、词汇是不是系统

对此问题有四种回答。

（一）词汇必然是系统

词汇为什么必然是系统，大家的推导有以下五种：

1. 由语言系统推导词汇系统

吕叔湘在《语言和语言学》（下）[《语文学学习》，1958（3）]中说：“近代语言学的更重要的收获是对于一条根本原则的认识，——语言的系统性。每个语言自成一个独特的体系，语音、语法、语汇都是如此。”黄景欣更明确地指出：“应该承认分析词汇体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因为语言的体系性这一特征已为大家所公认，而这一特征必然也体现在语言的词汇这一构成要素上。”^[3]

刘叔新不赞成由语言系统推导词汇系统。他针对黄景欣的上述观点说：“体系内部的构成要素未必因为处于一个体系之内而本身也是一个体系；这当中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同样，语言体系的存在也不能保证词汇体系的存在。语言具有体系性，显然不是在逻辑上必须以词汇具有体系性为前提。”^[4]

对系统的构成来说，构成系统的要素、要素和要素相互联系构成系统的具体情况（包括联系方式，联系时有无层次等）是必不可少的，至于构成系统的要素是否是系统，并不必要。有的系统的构成要素是系统，有的系统的构成要素未必是系统。如元音系统、辅音系统、声调系统，其构成要素是一个个元音、辅音、声调。每一个元音、辅音、声调由一系列语音区别特征构成，不好说是系统。可见，由系统推导系统的构成要素是否是系统，结果是或然而非必然。

2. 由语音系统、语法系统推导词汇系统

长期以来,对语言内部结构的认识,一般认为由语音、词汇、语法三大要素构成。语音、语法的系统性易被证明而且已被证明,剩下的词汇,自然易被人认为也是成系统的。周祖谟在《汉语词汇讲话》(一)[《语文学学习》,1955(3)]中说:“词汇和语法构造一样,也是成体系的。”洪成玉的《词义的系统特征》[《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7(4)]主要探讨古汉语词汇系统问题,在这之前他肯定词汇是系统时说:“从系统整体性的观点来看,组成语言的三大要素中,认为语音、语法都成系统,而反映语言本质特点的词汇是一盘散沙,这是令人不可思议的。”这里洪氏有个注释:“语言中不仅存在语音系统、语法系统和词汇系统,而且三者还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离开这个观点,有许多语音或语法现象的发展变化就不可能得到完全合理的解释。”紧接着,洪氏又说:“语言符号的能指,是语音形式或文字形式;所指,是语音或文字形式所表示的语法意义和词汇意义。语言符号的能指,作为一种载体,主要的,而且大量的,是容纳词汇意义。如果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部分是成系统的,而所指部分,有一部分是成系统的,大部分是不成系统的,同样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文字形式是否是语言符号的能指,语音系统是否等于语言符号的能指(语音形式)构成的系统,语法系统是否是语言符号所指中容纳的语法意义构成的系统,暂且不管这些观点的正误,洪氏从能指所指的角度,本质上还是由语音语法系统类推词汇系统。

由语音系统、语法系统推导词汇系统,和上面由语言系统推导词汇系统是一回事,只不过后者是直接推导,前者借助构成语言的其他要素类推。从逻辑上说,类推的结果是或然而不是必然,即或者是系统,或者不是系统。是否是系统,不能仅仅依靠类推。

3. 由客观事物整体推导词汇系统

黄景欣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客观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认为“客观事物的这种本质,使它们构成了一个大的客观世界的完整的整体,同时也使各类相近的客观事物构成较小的、或更小的整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体系”,“作为一种客观事物,语言的词汇不可能不是一个由许多相互联系、相互矛盾制约的要素构成的完整体系,实际上,它正是以一个这样完整的体系来反映客观世界的体系”^[5]。

刘叔新不赞成黄氏的上述观点,他认为事物整体与系统是“二而一的东西”,“成体系的事物是以其内部构成单位之间规律性的联系——对

应关系而区别于非体系的一般事物的”，“因为词汇是客观事物而就断定它是体系，这等于认为，词汇之成体系无需通过对词汇本身的分析来确定”^[6]。

时隔 30 年，徐国庆又对刘叔新上述“整体未必就是系统”的看法提出批评：“系统是普遍存在的，这是因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在这种普遍联系之中，整个世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系统是无所不在的，万物皆成系统，大到整个宇宙，小到一粒沙子，看得见的如世间万物，看不见的如思想观点，只要是一个整体，无不各成系统。”^[7]

“系统就是整体，整体就是系统”、“万物皆成系统”、“联系构成系统”，黄景欣、徐国庆二位的观点具有很大的代表性，词汇学界的绝大多数学者就是这么理解系统的。刘叔新及之前的高名凯、之后的林杏光区分系统和非体系的一般整体，属于对系统的严格理解（具体论述见本章节第二部分）。

4. 由概念系统推导词汇系统

周国光在《概念体系和词汇体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6(1)] 中论述到：“概念体系必须通过词汇表现出来，词汇也必然反映概念的体系性。词汇中的各种语义关系，无不都是概念体系中各种关系的反映和表现。因此我们说：如果说概念体系中存在着‘类别—层级’结构，词汇中也必然存在着‘类别—层级’结构；如果说概念体系具有体系性，词汇也一定具有体系性。”

由概念系统推导词汇系统，源于词语是客观事物、现象的反映和思维概念的表现。周国光说：“作为客观事物、现象的反映和思维概念的表现，词语在表示它们的同时也必然反映出它们的体系性。”“客观世界具有体系性，因而反映客观世界的事物、现象的概念也具有体系性，反映客观事物、现象和表现概念体系的词汇同样也具有体系性。”可见，由概念系统推导词汇系统，实际上就是由客观事物整体推导词汇系统。

刘叔新不赞成由概念系统推导词汇系统。早在 60 年代，刘氏就指出不能用逻辑概念的“义族”以及逻辑概念间的从属、交叉、矛盾等关系证明词汇系统。周国光的上述观点正是针对刘氏的这一主张提出的。90 年代，刘氏再次对从概念逻辑关联寻找证明词汇系统途径的做法，如主题义族、上下位属义关系、对称系列等进行了分析：“依凭类似的在概念逻辑关系上的词语联结及其他非词汇共时现实的关联，都不可能发现和描写出现代汉语词汇本身的体系，都理所当然地提供不出词汇体系性真正因素或线索。”^[8]

直接对周国光由概念系统推导词汇系统的做法表示反对的是周荐。90年代中期,其《汉语词汇研究史纲》在评述80年代后半叶现代汉语词汇学界“对词汇体系的再探讨”情况时,在详细分析了概念和词语的意义之间的种种不同后,周氏指出:“既然概念与词语的意义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么,概念作为逻辑思维的形式之有体系性,并不能推导出词汇也有体系性的必然结论”,“由概念成体系率然推导出词汇也必然成体系的做法,是需要重新考虑的。”^[9]

5. 由词汇的社会功能推导词汇系统

武占坤主编的《现代汉语》(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第三章第一节“三、词汇的体系性”中说:“词汇的体系性,是由词汇的社会功能的本质决定的。词汇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的建筑材料,如果杂乱无章,人们也就无法学习掌握,无法成系统地用于造句。”

词汇是否成系统属于词汇内在结构问题。根据自然科学的一般原理,在内在结构和外在功能之间,外在功能一般不能决定内在结构,相反往往是内在结构决定外在功能。词汇是否是系统,应该通过对词汇单位及其内在联系的分析来确定,正如对语音系统的确定是通过对语音单位及其内在联系的确定、对语法系统的确定是通过对语法单位及其内在联系的确定一样。

(二) 词汇是不是系统需要通过对词汇本身的具体分析来确定

持这一观点的是刘叔新。在1964年发表的《论词汇体系问题——兼与黄景欣同志商榷》中,刘氏既不赞成由语言系统直推出词汇系统,也不赞成由客观事物整体推导词汇系统。刘氏认为词汇成系统需要通过对词汇本身的分析来确定。刘氏分析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证明词汇系统的做法和看法,认为均不是探索词汇系统的有效途径。基于对系统的严格理解以及对词汇单位作为语言建筑材料单位本质属性的把握,刘氏提出,“要探明词汇究竟成不成一种体系,就需要弄清词汇内部所有组成单位是否都处于相互对应的结构关联中”。而当时所能看出的词汇内部的组织关联——同义组、反义组、分割对象组、特定搭配组、词族等,综合起来并不能把所有词汇单位组织起来,还无法证明词汇系统,因此,“不可以认为词汇是一个体系”。

1990年《汉语描写词汇学》出版。刘叔新一如既往地坚持认为应该用词汇单位之间的结构组织关联来证明词汇系统,舍此之外的其他途径方法都是徒劳无功的。书中用整整三章的篇幅详尽论述词语单位之间

的 11 种结构关联——其中 5 种是 1964 年文中提出的，其余 6 种是在随后十几年时间里相继发掘出的。在考察了所有 11 种结构组织能够把全部词语都容纳进去、各结构组织彼此这样那样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层次位于全部词语的上层之后，刘氏说：“可以认为，现代汉语词汇形成一个体系。”^[10]

徐国庆不赞成 60 年代刘氏提出的“目前的词汇研究尚不足以说明词汇的体系性，因而不能断言有词汇体系的存在”的主张，对此他有专门批评：“不能因为人们对词汇系统的内部缺乏研究，而不承认词汇系统的存在。系统是客观存在的，系统并不取决于对系统内部结构的认识而普遍存在的。即使词汇系统的组织层次并不清楚，也不应该否认词汇系统的存在。如果说词汇系统的研究未能得到肯定的解决以前断言词汇系统的存在是缺乏科学依据的，那么，在词汇系统的研究未能得到肯定解决以前，断言‘不可以认为词汇是一个体系’，同样也是缺乏科学依据的。”^[11]

徐、刘二位的分歧在于对系统普遍性的认识不同。徐氏主张“万物皆成系统”，词汇是物，故词汇是系统，词汇系统绝对客观存在，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到。刘氏不这样看，而是认为万物未必都是系统，事物是否是系统，需要证明。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系统，就说是系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就不能说是系统。什么时候找到证据能够充分证明是系统，就什么时候说是系统。

（三）词汇是不是系统，不必做是或者不是的回答

90 年代初，张素英在《对词汇是否成体系问题的刍议》[《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3）]一文中表示了这一看法。张氏首先回顾到当时为止学术界关于词汇是否成系统问题的大致研究情况，指出肯定词汇系统和否定词汇系统研究各自所遇到的困难。有鉴于此，张氏觉得“对词汇是否成体系的分析研究，除了需要找到恰当的途径外，更新观念尤为重要”。受史有为语言柔性观念的启发，张氏最后提出研究词汇是否成系统问题的新观念：“我们觉得完全可以不再囿于是否成体系的问题上，完全可以不再总用非 A 即 B 的二值逻辑状态进行抉择。”

90 年代末，林杏光《词汇语义和计算语言学》出版。在第七章“词汇的系统性”结语部分的最后一段，林氏介绍了张素英“更新观念”的主张。在转述完史有为《语言研究中的柔性观念》中的部分观点后，林氏像张氏一样指出：“以后的词汇系统性的研究不必拘泥于是否成系

统的问题上，完全可以不再用非 A 即 B 的二值逻辑状态进行抉择。”^[12]

张、林二位主张的不用“非 A 即 B”来判断词汇是否成系统，无疑等于取消词汇系统的研究。在系统观念深入语言学各部门研究的方方面面，“词汇系统”已成为汉语描写词汇学、汉语历史词汇学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的 90 年代，这样的主张恐难为大家接受。张素英的文章倒是被把词汇系统研究列作专题的词汇学史著作提及，如周荐的《汉语词汇研究史纲》、许威汉的《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但也是因为其文中对邢公畹主张词汇不是系统观点表示不同意。至于张氏上述关于词汇不必说是系统也不必说不是系统的见解，大家只字未提，林氏是唯一对张氏的见解做出回应的学者。

（四）词汇不是系统

邢公畹在为刘叔新《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写的序中，运用耗散结构理论分析语言、语法、词汇，从而否认词汇是一个系统。邢氏认为，语言是一种在物质与能量的消散中才能维持生命的有序结构，即耗散结构。语法是这一“有序结构”的模式，语法结构需要在言语中不断地表达出各种各样的“意思”来，词汇“不过是把‘物质’和‘能量’供给语言这一有序结构的东西而已，本身说不上‘体系’”。

对老一辈学者借鉴系统论中的耗散结构理论分析词汇是否成系统的做法，以周国光为首的年轻学者纷纷肯定其“新的角度”、“深入了一步”、“值得重视”，但对邢氏的具体阐述以及最后据以得出的词汇不是系统的结论，却表示反对。周国光在为此专门写的《词汇系统和耗散结构》[《汉语学习》，1989（5）]中，从介绍耗散结构理论及分析语言内部结构入手，指出邢氏的阐述和结论于这二者都不符。耗散结构不停地和外部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词汇包括在语言内部，“如果说，语言系统是依靠消耗词汇来维持自己的‘生命’的话，那就如同一个人吃自己的身体组成部分来维持生命一样”，这不符合耗散结构理论。如果承认词汇把物质、能量和信息提供给语言，无疑等于承认词汇属于语言之外。周国光认为，是客观世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等系统为语言、词汇提供物质、能量和信息。词汇本身就是一种不断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耗散结构系统。

此外，张素英也用一句话表示不赞成邢氏的观点：“即使词汇仅供给语言以‘物质’和‘能量’的作用，也没有充足的理由断定词汇算不上体系的问题。”^[13]张氏的不赞成表达得过于简单，反倒显得“没有充

足的理由”。相比之下，周国光的批评则理由比较充足。词汇是系统，已成大家的共识。

二、词汇系统或系统性的揭示

揭示词汇系统或系统性，即说明词汇系统的存在、构成，这是词汇系统研究中最核心和最基础的问题。从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研究的一开始，大家就用心最多。从事词汇系统研究的学者，大都将此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研究对象。

（一）50 年代的研究

周祖谟先后两次举例说明词汇的系统性。1955 年，周氏根据斯大林关于基本词汇的学说，认为基本词汇是构成新词的基础，由此形成用基本词汇中的词构成的“词族”，如，胜：胜利、战胜、名胜、形胜等。词汇的系统性就表现在“词族”中“基本词汇与词汇间的内在联系上，不但构词方面有其体系，就是词义方面也有一定的关联”^[14]。

1958 年，在第一次说明的基础上，周氏在《词汇和词汇学》[《语文学学习》，1958（9）、（11）]中另外补充了词汇系统性三个方面的表现：从构词方法上来看，汉语构词法的类型是词根复合和附加法，“类型既然很清楚，词虽多，也可以分出词群来。所以词汇本身就是一个体系”。“词汇的系统性当然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例如词义的发展、词与词在意义方面的关系等等都可以看出词汇是统一的整体”。周氏说的“词义的发展”，指引申义、比喻义在基本义基础上的产生发展。“词与词在意义方面的关系”，指同义关系、反义关系。

第二次对词汇系统性的说明距离第一次说明时间并不久，但内容上有不少补充，反映了周氏对词汇系统问题的关注和不停的思考探索。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研究中，周祖谟是最早的耕耘者，上述大部分观点多被后学继承发扬。因是最早，免不了粗疏，如“词义的发展”属于一个词内的问题，不是词与词的问题，与需要考察不同词汇单位之间联系的词汇系统研究并不直接相关。

（二）60 年代的研究

1. 黄景欣

其发表于 1961 年的《试论词汇学中的几个问题》是第一篇专门论“词汇系统中几个问题”的文章。所论包括：固定语也是构成词汇系统的单位、词汇为什么是系统、词汇系统的具体面貌、如何理解词汇构成

黄氏认为，一种语言的词汇是由该种语言的一系列具有一定形式、意义和功能特征的互相对立、互相制约的词汇单位（包括词以及和词具有同等功能的固定词组）构成的完整体系。黄氏揭示的词汇系统，可概括如下（见图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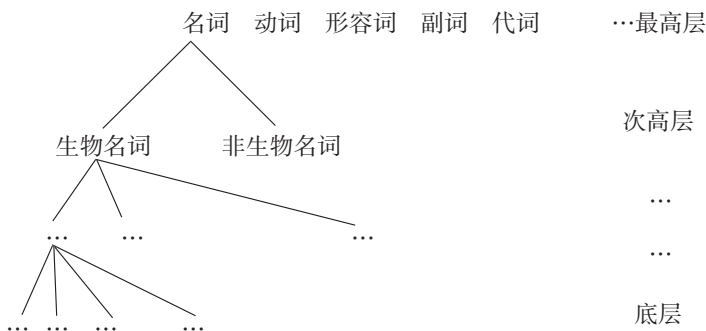


图 4—1 黄景欣的词汇系统图

2. 高名凯

其 1963 年出版的《语言论》第二部分第四章“语言中词汇系统的结构及其演变”共四节：“一、词与词汇”；“二、词位与词素”；“三、词位与词汇系统”；“四、词汇系统的演变”。

高氏认为词汇系统极其复杂,“它可以依照各种不同的结构关系把各词位以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方式联合起来,组成各自的类聚,而这些不同的类聚之间又可以彼此交叉,互相制约,互相影响”^[15]。高氏分析的“词位类聚”有:(1)同族词类聚;(2)同音词类聚、同义词和反义词类聚;(3)根据词义中包含的表感情、表形象、表修辞、表风格的义素,分别组成相应的类聚;(4)根据词所指明的客观事物的类别(如表国别、表谷类)组成类聚;(5)依照某些词的来源及这种来源所保留下来的某种意义色彩组成类聚,如地方方言来源的词、社团方言来源的词、外语来源的词、古语来源的词、国际词等类聚;(6)依照词的不同

的全民实用性的程度、历史稳固性的程度、构词能力的程度而组成根词、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等类聚。^[16]

3. 刘叔新

于1964年发表的《论词汇体系问题——兼与黄景欣同志商榷》长达15 000字左右，文章不仅仅与黄景欣商榷，可以说是与当时国内国外所有证明词汇系统的途径方法进行商榷。刘氏强调，揭示词汇系统，应该从词汇自身的组织特点出发，看词汇内部所有单位是否都处于相互对应的结构联系中。通过考察当时所能看出的词汇内部的组织关联，由于“它们的每一种以及它们的综合都网罗不了全部词汇单位”，刘氏得出“不可说词汇是系统”的结论。

（三）80年代的研究

1. 张永言

在1982年出版的《词汇学简论》第四章“词汇体系中词的类别”中，张氏提出，制定合理的词的分类原则，以克服词的分散性，“显示出隐藏在外表的纷乱背后的系统”^[17]。词的分类原则有很多，张氏认为，在词汇领域，词与词的联系主要是语义上的联系，因此，“要把一种语言的词汇当作一个体系来研究，首先就得按照词的语义联系进行分门别类的工作”^[18]。

主题分类是最普通的一种词的语义分类，即按词的词汇意义所表现的概念类别而对词分类，如动物、植物、人体各部分、自然现象的名称、亲属称谓等等。它包括联用分类（因有联系而常用在一起构成的类）和逻辑分类（按词所表现的概念的种属关系分类）^[19]。张氏对逻辑分类的说明，可用图4—2表示。

2. 武占坤、王勤

《现代汉语词汇概要》系二位于50年代末出版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于1983年出版，有关词汇系统方面的内容（第一章第二节“词汇的体系性”）是新增加的。

二位认为词汇系统性表现在：（1）词素层是构成词层的基础，词层是构成熟语层的基础，“词汇成分之间，这种层递的联系性，是词汇体系性的一个重要侧面。”（2）新的词汇成分加入词汇这个“集体”时，必然要受整体的总规律、总特点制约，如对外来词汇成分的“民族化”改造。（3）词汇成分间存在历史发展演变上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联系。如词间语义界限的调整、语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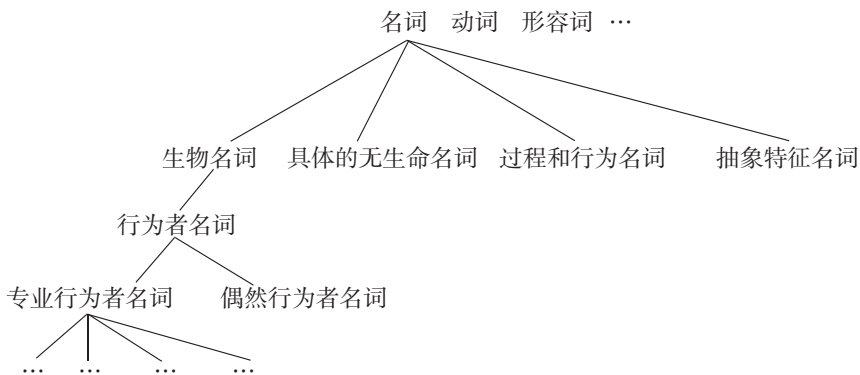


图 4—2 张永言的词汇系统逻辑分类图

的同化（类化）异化等。（4）一定的词语类聚为一定的词汇组系，小的词汇组系又进一步类聚为大的组系，如此上下逐级隶属。由词的称谓功能所确定的词汇组系，是词汇系统中的根本现象，如图 4—3 所示，可概括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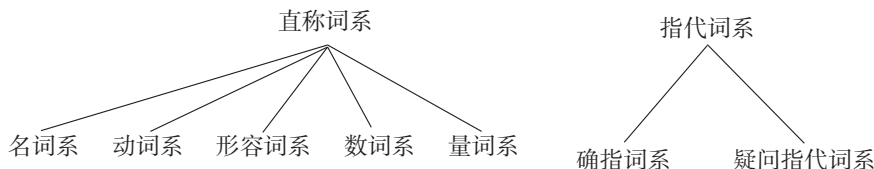


图 4—3 武占坤、王勤的词汇组系图

对此组系，式、王二位用注释特别指出不是语法分类：“也许有人要问，‘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不是词的‘语法属性’的组系分类吗？我们认为也是也不是。因为从词的语法功能着眼，固然有所谓‘名’‘动’‘形’等组系之分；反之，从词的词汇意义、词义的性质着眼，也同样可以把某些组系名以‘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其实所谓‘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等命名的着眼点，与其说是根据词的语法特点而来的，倒不如说是根据词的词汇意义、逻辑内容来的更确切些——就汉语来说。”^[20]

3. 周国光

在 1986 年发表的《概念体系和词汇体系》中，周氏“从词汇同概念体系之间的同构关系入手，对词汇的系统性做一探讨”。

周氏首先分析不同概念间的各种关系及形成的不同层级系列：类义

概念及关系（包括同义、反义、近义、对义）、上下义概念及关系、整体一部分概念及关系、集合一元素概念及关系，它们构成概念系统。然后，对应着上述概念类别、概念间关系、层级系列，周氏逐一举例说明语言中存在的类义词项及关系（包括同义、反义、近义、对义）、上下义词项及关系、整体一部分词项及关系、集合一元素词项及关系，它们构成语言的词汇系统。

4. 陈庆祜、周国光

《词汇的性质、地位及其构成》发表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第三部分专门讨论“词汇体系的构成”。陈、周二位认为，词语（语素、词、熟语的合称）分别在形式、意义、结构、功能四个方面聚合，构成形式系统、意义系统、结构系统、功能系统。其下分别有形式构成要素系统、意义构成要素系统、结构区别特征系统、功能区别特征系统。所有这些系统构成现代汉语词汇系统。

各系统的构成具体如下：（1）形式系统，由同音，同首音节、同尾音节，同声、同韵，同声、同部，同韵尾等等聚合逐层、交叉排列构成。形式要素系统包括音节、声母、韵母、音位、音位区别特征系统。（2）意义系统由类义关系（包括同义、反义、近义、对义等）、上下义关系、整体一部分语义关系、集合一元素语义关系、语义组配关系（如事物—性状、性状—变动、变动—数量等）、联想关系等词语关系类别聚合构成。意义要素系统包括义素系统、义项系统、义位系统等。（3）结构系统由同构（结构方式相同）聚合、同素（具有共同词素）聚合逐层排列联系构成。结构区别特征系统包括：+单纯、+单音、+复音、+双声、+叠韵、+合成、+派生等等。（4）功能系统即通常说的名词、动词等词类系统。功能区别特征系统包括：+句子成分、+受数量词修饰、+后加“着、了、过、得”等等。

周国光于1986年在《概念体系和词汇体系》中描写的对应于概念系统的词汇系统，仅仅是这篇文章所揭示的词汇系统中意义子系统的一部分。

5. 《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类教材系列

（1）刘伶、黄智显、陈秀珠主编《语言学概要》。在上编第四章第三节“词汇的构成”中，刘伶等指出：“研究词汇体系，也就是研究如何把词汇划分为若干个词的类聚。”刘伶等划分词的类聚来自七个不同的角度，具体是：基本词汇、一般词汇；通用词、专用词；表情词、非

表情词；固有词、外来词；旧词、新词、古今通用词；全民词、非全民词；地方方言词、社会方言词；常用词、非常用词。

(2) 武占坤主编《现代汉语》。在第三章第一节“三、词汇的体系性”中，武氏指出：“词汇成分由音、义、结构、功能作用等几种要素构成，词汇的体系性，就具体表现为各种成分间在这些要素上相互统一而又相互对立、相互制约、互为界线的联系上。”

词汇成分如何在音、义、结构、功能作用等要素上互相联系，教材举“母亲、父亲”、“你、您”以及“水”构成的同族词群来说明。如上所述，陈庆祜、周国光也是从词语在音（形式）、义、结构、功能四方面的联系入手来揭示词汇系统，与本教材不同，陈、周二位归纳出形式、意义、结构、功能四个子系统以及其下的要素特征系统。

(四) 90 年代的研究

1. 刘叔新

1990 年出版的《汉语描写词汇学》继续用“词汇结构组织”来证明词汇系统。在逐一剖析了国内国外学者提出的语法的、逻辑概念的等几乎所有证明词汇系统的途径方法后，在详尽分析了 11 种词汇结构组织、考察了它们能把所有的词汇单位都网罗了之后，刘氏说“可以说词汇是一个系统”，并勾勒了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大致轮廓：全部词语形成词汇最低的一个层次，11 种词语结构组织位于其上，“由于种类不同的词语结构组织之间的关联极其复杂多样，形成一种什么样的错合交连的具体状态尚难弄清，因而它之作为一个层次，还不那么明显，与全部词语之间存在的高低层次的关系并不很明晰”。因此，严格地说，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不是完善的体系。

2. 徐国庆

从 1992 年起，徐氏陆续在学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它们是：《略论现代汉语词汇层》、《再论现代汉语词汇层》、《试论现代汉语潜在词汇层》、《试论词汇体系研究的三个平面》、《关于汉语词汇层的研究》，这些文章的内容成为 1999 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第一编第一章中的一部分。《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是第一部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部以词汇系统研究为专题的专著。全书共三编：一、本体论；二、构成论；三、动态论，分别论述词汇系统本体构成、词汇系统的构成成分、共时范围内词汇系统的运动发展变化。

徐国庆认为，词汇是一种语言特定发展阶段上由处于特定聚合网络

中具有备用性特征和复现性特征的语言建筑材料——语素、词、固定词组所构成的层级组织系统。^[21]词汇系统包括三个平面：要素平面、聚合平面、层级平面。语素、词、固定词组构成词汇系统的要素平面。以某一词汇成分为中心，将其在语音、语义、词汇、语法、文字等五方面与其他词汇成分的聚合关系辐射开去，形成一个“辐射聚合”。处于辐射线上的词汇成分作为一个新的辐射中心，再形成一个新的辐射聚合。这样，一个辐射聚合连一个辐射聚合，最后形成一个巨大的“网”，这是词汇系统的聚合平面。具有造句、构词两种功能的三类词汇成分，分别形成相应的词汇层，各词汇层逐层下分（如图4—4），这是词汇系统的层级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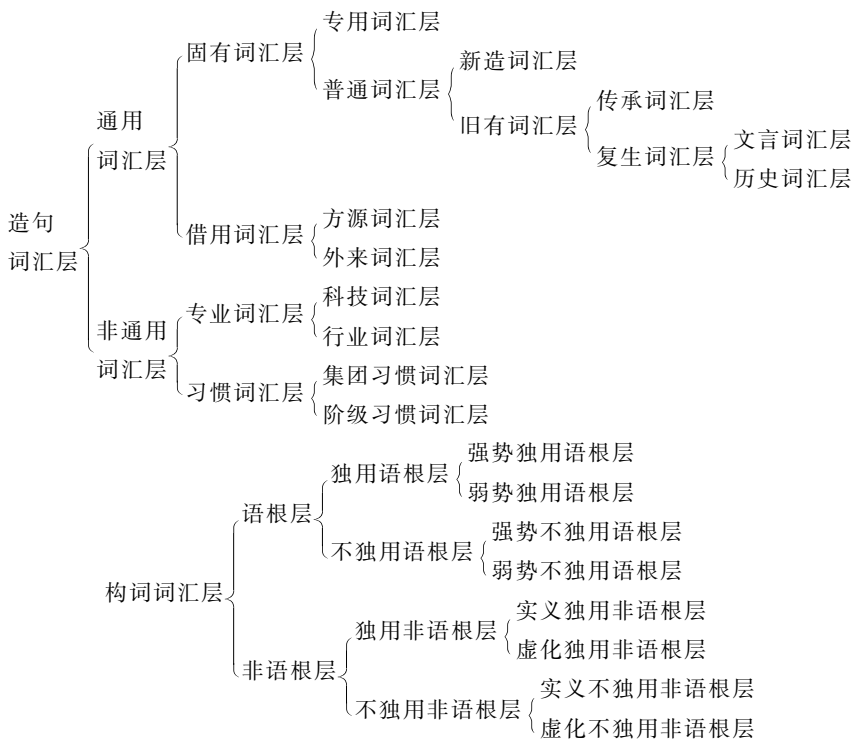


图 4—4 徐国庆的词汇系统层级图

3. 《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类教材系列

(1) 邢福义主编《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第三章第一节“语汇系统”列两个小标题：“语汇成分之间的联系”和“语汇系统的性质”。

邢氏认为，语汇成分相互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使之形成网络，构成

系统。语汇成分之间除常见的意义、音形、结构、功能、同源五方面的联系外，外来词语、方言词语、口头词语、书面词语、基本词语等等，也都依各自的特殊方式发生联系。一组词语之间可能具有多个方面的联系，一个词语可能会跟许多词语发生多方面的关系。每种联系方式都可以把一些词汇成分聚成一个组系，由于这些联系方式的错综交叉，使语汇网络呈现出非常复杂的面貌。

(2) 马学良、瞿蔼堂主编《普通语言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7)。第五章第二节“词汇体系”列三个小标题：“一、词汇层”；“二、词汇的类聚”；“三、词的结构类型”。

马学良等认为：“词汇成分因彼此在音义结构、词义色彩以及在词汇中的地位、作用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层次、类聚和结构类型。这些不同的词层、类聚和类型构成一种纵的逐层隶属关系和横的相互对立又同一的多层面的类聚体系。”^[22]这里的“词层”是“词汇层”之误，指词素、词、熟语三个层次。“类聚”指从四个不同角度分出的类聚，它们是：基本词汇、一般词汇；全民词、地域方言词与书面语词、口语词、旧词、新词、固有词、外来词；单音节词、双音节词、多音节词、同音词；单义词、多义词、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贬义词、褒义词。“类型”即结构类型，指根词、派生词、合成词、同族词。

(五) 分歧

纵观上述各个时期各位学者对词汇系统或系统性的揭示，大家各抒己见，看法很不一致，主要在以下五个问题上存在分歧。

1. 词汇单位间的联系和词汇系统

词汇单位凭借什么样的联系构成词汇系统？正是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理解，导致所揭示的词汇系统或系统性不同。

首先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主张要素构成系统的联系方式就是要素构成整体的联系方式。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系统就是整体，整体就是系统，系统和整体是一回事。明确就此详细阐述的有黄景欣、徐国庆二位（本章节第一部分已有论述）。自然，在这些学者看来，要素构成系统的联系方式和要素构成整体的联系方式一致。另一类主张要素构成系统的联系方式和要素构成非系统的一般整体的联系方式不同。个别学者对系统的理解比较严格，认为系统和整体不是一回事，系统是整体，但整体不一定是系统。不是系统的整体只是一般整体。高名凯、刘叔新、林杏光三位对此均有正面阐述。自然，在这些学者看来，要素构成系统

的联系方式和要素构成非系统的一般整体的联系方式不同。

其次，每一类里，对词汇单位究竟靠哪一种或几种联系构成词汇系统意见不一。

赞成要素构成系统的联系方式就是要素构成整体的联系方式的学者，对词汇系统或系统性的揭示，不外从直接说明词汇单位的联系或联系性、归纳词汇单位的聚合、划分词汇单位的类别这三方面的一个方面或者不止一个方面着手，具体如下：

(1) 直接揭示词汇单位的联系或联系性的，如周祖谟、周国光、武占坤、邢福义。

(2) 归纳词汇单位聚合的，如陈庆祐和周国光。

(3) 划分词汇单位的类别，如黄景欣、张永言、刘伶等。

(4) 三个方面中不止一个方面的：

1) 直接揭示联系或联系性、划分类别，如周祖谟、武占坤和王勤。

2) 归纳聚合、划分类别，如徐国庆。

3) 直接揭示联系或联系性、归纳聚合、划分类别，如马学良等。

直接说明词汇单位的联系或联系性、归纳词汇单位的聚合、划分词汇单位的类别这三种做法表面上不同，本质上一致。词汇系统由词汇单位相互联系构成，揭示系统或系统性，就等于揭示词汇单位的联系或联系性。具有某种联系或联系性的词汇单位为一个聚合，归为一个聚合的词汇单位具有某种联系或联系性，有多少种不同的联系或联系性就归纳出多少种不同的聚合，归纳出多少种不同的聚合就显示有多少种不同的联系或联系性。归为一个聚合的词汇单位属于一类，属于一类的词汇单位归为一个聚合，归纳词汇单位的聚合就是划分词汇单位的类别。这样，揭示词汇系统或词汇的系统性，除了直接说明词汇单位的联系或联系性外，还可以归纳词汇单位的聚合、划分词汇单位的类别。

词汇单位之间的联系或联系性多种多样，有在形式（包括语音形式、文字书写形式）、意义（概念）、结构、功能、同源、构成（指语素构成词、词构成固定语）等方面的联系，也有在“时间、地域、语源、语境、语体等”方面的联系^[23]（暂称作外在联系）。根据前一类联系归纳的聚合、划分的类别，如同义词语、反义词语、同音词语、同形词语、同素词语、同构词语、同源词语、同类词语（词类词性相同相当的词语）等即是。根据后一类联系归纳的聚合、划分的类别，如基本词汇、一般词汇、方言词语、外来词语、古词语、新词语、口语词语、书

面语词语等即是。有的学者主张一种联系构成词汇系统，有的主张两种甚至两种以上联系：

(1) 主张一种联系的：

- 1) 意义（概念）联系，如黄景欣、张永言、周国光。
- 2) 外在联系，如刘伶等。

(2) 主张两种联系的：

- 1) 意义、结构联系，如周祖谟。
- 2) 构成、意义（概念）联系，如武占坤、王勤。

(3) 主张三种以上联系的：

1) 形式（语音形式）、结构、意义、功能联系，如武占坤、陈庆祐和周国光。

2) 结构、意义、构成联系，外在联系，如马学良等。

3) 形式（语音形式、文字形式）、意义、结构、功能，外在联系，如徐国庆。

4) 形式（语音形式、文字形式）、结构、意义、功能、同源联系，外在联系，如邢福义。

不赞成要素构成系统的联系方式和要素构成非系统的一般整体的联系方式是一回事的学者，对词汇单位具体如何联系构成词汇系统，理解阐述也不一样。

高名凯最早指出是整体未必是系统。他说：“一堆散沙是由许多沙粒堆积而成的。尽管它是一个整体，它却不具备系统性，因为各个沙粒之间并没有相互关联、休戚相关的关系。”^[24] 系统具有系统性，具有系统性的实体是系统，散沙堆不具有系统性，自然散沙堆不是系统。这里，高氏用组成单位之间“相互关联、休戚相关”来区别系统和非系统的一般整体。“相互关联、休戚相关”实际上就是“休戚相关”。在一开始为“系统”下的定义里，高氏用的就是“休戚相关”：“系统指的是由一系列在相互关系之中的单位组织而成的一个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里，组成单位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彼此休戚相关的。”^[25]

对于词汇系统，高氏认为，它“正是由这些休戚相关的词组织而成”，词和词之间如何休戚相关，高氏用汉语、英语、威尔士语中的某个颜色词来说明。汉语里表示颜色的“红”处于和表示颜色的“白、蓝、黑、黄”等词的“休戚相关的关系”中，没有后面这些颜色词，“红”就不可能以这样一个汉语词汇成员的身份出现在汉语词汇里，

“红”和“红”的意义都将受到影响，而成为另外一个词。可见，高氏说的“休戚相关”关系，是一种影响词汇单位存在的关系。

紧随高氏之后，刘叔新在与黄景欣就词汇系统问题商榷的时候，用一句话简明扼要地指出系统和非系统的一般整体的区别：“成体系的事物是以其内部构成单位之间规律性的联系——对应关系而区别于非体系的一般事物的。”^[26]至于什么是词汇内部词汇单位之间构成词汇系统的“对应关系”，刘氏此时未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但从他对同义关系、反义关系、分割对象关系、特定搭配关系、同素族成员间关系的分析，从对不能用以证明词汇系统的词的语法类别、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等、主题义族、包括从属关系在内的各种概念关系的分析，可以很明显看出，“对应关系”的具体内涵是：意义上互相牵连对照、映衬、对立、制约等。

90年代，刘叔新再次谈到系统组织上的特征：“严格说来，体系不仅要求所含的成分全部处于相互影响或相互因应的一定关系的状态，而且应该具有若干明晰的组织层次。”^[27]这里的“相互影响或相互因应的关系”是刘氏名之为“词汇结构组织关系”的具体内涵“相互制约、对立或相互依赖、对比、因应的内在关系”的概括说法，也是60年代说的“对应关系”更具体充分的表述。此外，“若干明晰的组织层次”是刘氏对系统组织特征的补充。

林杏光把事物整体的构成方式区分为两种：一种是非系统联系的整体性，像一盘散沙、一堆橘子，整体是其各个部分简单相加，各个部分之间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各个部分对整体功能的影响很小。另一种是系统联系的整体性，像动物的肢体、社会系统，整体与其组成的部分之间、整体与其外部环境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这种内在的联系对整体功能有直接的影响。^[28]这里，林氏区分的实际上是系统和非系统的一般整体。具有系统联系的整体性的是系统，具有非系统联系的整体性的不是系统，只是一般整体。在林氏看来，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存在“对整体功能有直接影响的内在联系”。

上述三位均从理论上正面阐述了系统和非系统的一般整体的区别，但在具体处理词汇系统问题时，只有刘叔新不折不扣把理论付诸于实践，其余二位未能用于指导实践。

高名凯认为词汇系统由多种“词位类聚”复杂联系构成。在高氏列出的“词位类聚”中，同族词、同义词、反义词等少数类集确实是由

“休戚相关的词组织而成”，其余大多数“类聚”，如根词、基本词汇、一般词汇、表国别的词的类聚（中国、苏联、波兰、朝鲜等）、表厌恶感情的词的类聚（可恶、讨厌、卑鄙等）、表声音形象的词的类聚（乒乓、咔嚓、滴答等）、具有文学语言修辞色彩的词的类聚（设想、类似、华彩等）、具有公文风格色彩的词的类聚（咨文、通告、布告、指令等）等等，很明显不是“休戚相关的词组织而成”，这些类集之间更不存在“休戚相关”的关系。如此一来，高氏揭示的只是一个由词构成的非系统一般整体，而不是词与词“休戚相关”联系构成的系统。

林杏光主张对词汇是否成系统不要用非 A 即 B 的二值逻辑状态进行判断，即不必说词汇是系统也不必说词汇不是系统。书中“词汇的系统性”一章主要评述他人对词汇系统或系统性的揭示。他人为揭示词汇系统或系统性所挖掘的词汇单位之间的一种或多种联系是否是“对整体功能有直接影响的内在联系”，换句话说，他人揭示的是否都是具有“系统联系的整体性”的系统，抑或只是具有“非系统联系的整体性”的一般整体，林氏对此未做分析判断。这样林氏关于“系统联系的整体性”和“非系统联系的整体性”的区别没派上用场。

和高、林二位不同，刘叔新非常注意把对系统组织特征的认识理解贯彻到词汇系统的证明中。从 60 年代提出同义反义等五种关系是词语之间的结构关联并考察这五种结构关联还无法证明词汇系统，到 90 年代用同义反义等 11 种结构组织证明词汇系统；从主张挖掘词汇单位之间意义上的相互制约、对立或相互依赖、对比、因应的内在关系以证明词汇系统，到反对用词汇单位之间语法的、逻辑概念的、客观事物的、纯粹形式的以及时间地域语源语境语体等的联系来证明词汇系统，刘氏自始至终强调系统得以成立的两个条件：（1）内部构成单位之间规律性的联系——对应关系，即词汇内部词汇单位之间的“结构组织关系”。（2）所有构成单位，即所有类型的词汇单位以及所有类型的词汇单位中的所有成员。后来刘氏补充了“层次”，指出现代汉语词汇具有两个层次：词语层和结构组层^[29]。

2. 词汇单位的分类和词汇系统

揭示词汇系统是否就是划分词汇单位的类别、归纳词汇单位聚合，在这个问题上三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是持肯定态度。张永言、刘伶等有明确的表述。张永言说：“为了克服材料的分散性，显示出隐藏在外表的纷乱背后的系统，以便

按照各个词的相似和相异之点来加以比较和研究,就需要制订合理的词的分类原则。词的分类原则必须符合语言里真正存在的词与词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才能把一种语言的词汇当作由许多单位构成的一个体系来加以描写和研究。”^[30]刘伶等说:“研究词汇体系,也就是研究如何把词汇划分为若干个词的类聚。”^[31]

这些研究者的划分归纳出的词汇单位类别聚合很多:

(1) 基本词汇一般词汇、外来词固有词等等,如高名凯、刘伶、邢福义。

(2) 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及其下的小类,如黄景欣、张永言、武占坤和王勤、邢福义。

(3) 单音节词、双音节词、多音节词、同音词、同首音节词、同尾音节词、同声(母)词、同声同部词、同韵词、同韵尾词等等,如张永言、陈庆祜和周国光、徐国庆、邢福义、马学良等。

(4) 同构词、单纯词、派生词、合成词、同素词等,如周祖谟、陈庆祜和周国光、徐国庆、邢福义、马学良等。

(5) 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类义词、上下义词、褒义词、贬义词、具有感情义素的词、单义词、多义词等,如周祖谟、高名凯、张永言、陈庆祜和周国光、徐国庆、邢福义、马学良等。

另一种是坚决反对,如刘叔新。刘氏反对的用以揭示词汇系统的词汇单位分类及具体理由概括如下:

(1) 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语法分类。对黄景欣“从几个实词词类出发,每个词类按词汇一语法标准逐层分析下去”的做法,刘叔新指出,词类是词的语法分类,把支配词汇的语法因素当作词汇本身结构层次的经纬,得出的自然绝不会是词汇本身的体系组织状态。^[32]

对苏联学者 Ю. Д. Апресян “从词的语法功能形式出发,同一词类的词依其能与何种语法类别、何种语法变形的词相搭配及搭配方式的同异,而逐层地分类”的做法,刘氏认为,这种层级结构“表明的只是词的语法结构关系和词的语法功能类别的层次”,显示不出词与词在词汇组织上的对应关联。^[33]

(2) 基本词汇一般词汇常用词语、外来词方源词、古词语新词语旧词语、专门用语专名词语、情态词汇评价词汇、口头词语书面词语、各种风格词语等分类。刘叔新认为,这些类集是以某些词语具有在使用上、历史长短上或来源上的共同性质为依据的,不同的类集除了可能在

部分成员上重合,彼此并无必然的联系,有的甚至毫不相干;而同一类集的各成员,只是由于共有某种性质或因素而被汇集一类罢了,相互之间也并无必然的内在关联。词语类集让词汇看上去基本上是散漫无章的堆叠,组织性很弱。因此这种分类不是探索词汇体系性的途径,划分出上列词汇类集与词汇体系的确立并无关联。^[34]

(3) 单音词多音词同音词等、单纯词派生词复合词同构词等分类。刘叔新认为这是“单凭声音形式的特点”、“仅据构造形式的特点”分出的,由于“是不管词的具体意义而建立起来的”,“相互之间以及各类所包括的各个词之间也不存在必然的对应”。^[35]

(4) 主题分类(包括联用分类)、逻辑分类(即上下义分类)。刘叔新认为,主题本身以及总共包括了哪些单位,确定起来都有很大的主观性。“这个主观性很强、方法论上有许多问题的松散类集,距体系结构准确精严的要求未免太远”。逻辑分类(即上下义分类)同样存在具体成员不易确定,上位概念的设定有相当大的主观性等问题。此外,同属一个上位概念的成员之间,如同属于“水果”的“苹果”、“李子”、“梨”、“葡萄”在意义上不存在任何必然的关系,“只不过总是存在平行地共属于一个上位概念的逻辑关系罢了”。而且,某一个上位概念可以用词、自由词组表示,若概念上的种属关系成了语言词汇中的意义关系,那这“意义关系”就被扩张到非语言的、更非词汇单位的言语单位上去,无法表明词汇内部的关系组织的特点。有些上下义分类,上下位词间存有意义上单向依赖关系或同素族中的因应关系,或者同属于一层的下位词之间具有分割对象关系,刘氏指出,这样的逻辑分类,实际上已是词汇的一种词汇结构组织。^[36]

(5) 同义词反义词同素词分类。刘叔新认为,以往对这三者的研究,“研究者通常没有从结构关联的角度来理解”^[37]。同义的词汇单位(包括词和固定语)因意义上的同中有异而彼此牵连对照,反义的词汇单位(包括词和固定语)因意义相反而强烈地互相对照制约,含有同样一个语素的词汇单位(包括词和固定语)彼此在意义上相互因应,三者都形成有内部对应关系的词汇组织结构,和其他八种词汇组织结构一起,把现代汉语全部词语网罗在一起构成系统。^[38]

此外,刘叔新对国内一些学者提出“同源词语”、英国学者 D. A. Cruse 提出“对称系列”用以证明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的方法持反对意见。

刘叔新认为,从汉语现代时期来看,词与词(特别是单音词之间)的同源关系基本上是隐晦不显的,不为一般人所察觉,只有经词源学家进行考证,才能被少数知识分子所认识。因此,同源关系从基本部分上看,也不好肯定为现实存在的关系,同源词族大多不是现代一般人都能意识到的、现实存在的组织。即便在少量的、现实存在的同源词族里,词与词之间的同源关系也只是历史渊源上留下的痕迹,并非意义上相互影响的结构关系。这决定了同源关系基本上是历时语言学(如历史词汇学,词源学)的研究对象,同源词族不是现代语言词汇共时平面上的组织,不是词汇中的结构组织,不能成为词汇共时状态体系性的构成因素。^[39]

像“大学—讲师—大学生/军营—教官—士兵/工厂—工头—工人”这样的对称系列,刘叔新认为,至少以下两个原因决定其不能成为词汇结构组织:(1)所谓对称关系,实质上并非词语意义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而是不同事物现象间一种平衡的类比,是观念上的一种逻辑关系。互相对称的任何一方都不是以一个意义来同对方发生对称联系。另外,对称的一方中,不同的词往往还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必然关系,并不形成结构组织。双方的对称关联,显然谈不上是意义结构关系。(2)两对词彼此对称,须建立在联想的基础上,而这种联想往往只是分析者个人认为存在,不见得一般人都会产生,即未必是客观事实。对称系列对证明词汇系统性无任何作用。^[40]

第三种是有所区别地反对,如许威汉。许氏认为揭示汉语词汇体系,应从汉语自身的特点——孤立语及汉字与汉语单音成义特点相联系——入手,内发汉语词汇形、音、义的有机联系。“如果不从这一基点出发,尽管凭‘从不同角度、根据不同标准’的分类来论证汉语词汇体系,其结论也不一定令人信服。况且,所谓‘不同角度’,是个十分笼统的意念……词的各种类集,有可能是成体系的,但不能说各种类集一定都是词汇自身的体系性联系。判定是否体系性体现的标准,是类集有无内发性联系,外限的分类组合谈不上体系。”^[41]许氏说得很清楚,具有内发性联系的分类聚合是词汇系统性的表现,而不具有内发性联系的分类组合不是词汇系统性的表现。

无论是坚决反对还是有所区别地反对用词汇单位的分类证明词汇系统,刘叔新、许威汉二位都认为,只有属于词汇自身的词汇单位之间内在的对应联系才能把词汇单位集结起来,形成具有内部组织性的系统。

但具体什么才是“属于词汇自身的词汇单位之间内在的对应联系”，看法又不同。刘氏认为是“词汇单位之间互相制约、对立或相互依赖、对比、因应的内在关系”，许氏认为是“从汉语自身的特点——孤立语及汉字与汉语单音成义特点相联系——出发，汉语词汇形、音、义的有机联系”。

3. 词汇的意义系统和词汇系统

这里的“词汇的意义系统”指词汇单位的意义构成的系统。一部分学者认为词汇系统就是词汇的意义系统，如周国光、洪成玉、侯新华。

周氏的《概念体系和词汇体系》把“词汇体系”和“词汇的语义系统”交替使用。如“4.2 词汇体系和概念体系的差异”下说：“词语和概念各有自己的特点，因而它们各自构成的词汇体系和概念体系也必然不同。词汇的语义体系和概念体系只是相似，而不是等同。”^[42]这段话前面是“词汇体系”，后面马上换成“词汇的语义体系”，可见，这里周氏是把“词汇体系”和“词汇的语义体系”等同的。

洪氏的《词义的系统特征》虽然是研究古汉语词汇系统的，但对词汇系统的看法值得注意。洪氏明确地说：“词汇系统，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词汇的意义结构系统。”“词汇的意义结构系统就是词义的结构系统，表现为词义之间的各种联系形式。”

侯氏在目前唯一一篇对词汇系统研究进行回顾总结的《建国后的词汇体系研究述评》中指出：“贾彦德先生的《汉语语义学》中的‘语义场’部分，也比较系统、具体地探讨了汉语词汇体系内部规律。”《汉语语义学》中的“语义场”部分，分上下两章，主要内容包括什么是语义场、语义场的类型、语义场之间的关系、语言的总语义场等。贾氏把不同义位依据相互制约、相互规定的关系构成的集合称做“语义场”，一个“语义场”就是一个义位系统。若干“语义场”在纵横两向上逐层地交错联在一起，最终形成总的语义场——现代汉语语义的一个总的体系。可见，贾氏所说的“语义场”，其构成单位是义位，其构成的是语义系统。对义位，贾氏认为，是实词的一个大致相当于义项的语义单位。这样一来，贾氏所说的“语义场”、“现代汉语语义总体系”，实际上是以实词的意义（一个意义）为构成单位的实词意义系统。侯氏把它纳入“词汇体系研究述评”中，不知是否可以推测侯氏主张词汇系统和词汇（实词）的意义系统是一回事。

部分学者认为词汇系统和词汇的语义系统不是一回事。上面提到的周国光，在把“词汇体系”和“词汇的语义体系”交替使用不久，在与

陈庆祐合写的文章《词汇的性质地位和构成》中，把意义系统仅仅作作为构成词汇系统四个子系统中的一个。刘叔新非常重视词汇的意义系统，他说：“建立词汇体系的问题是与词汇的语义体系问题紧密相关联的。如果建立起表明所有词汇单位间的意义对应关系的语义体系，那就相应地存在词汇体系。”^[43]但刘氏并没有把词汇系统和词汇的意义系统等同。“由于词汇单位的本质为意义所决定，因而不同词汇单位之间若有意义的对应，它们便存在结构关系。在这种情形下，词汇单位的形式作为物质外壳和区别的标志，自然也随着成为词汇单位结构关系的构成因素。”^[44]从这段话可见，刘氏是把作为形式和意义统一体的词汇单位作为词汇系统的构成单位，而词汇的意义系统，其构成单位是词汇单位的一个意义，通常叫做义位。

4. 客观事物系统、概念系统和词汇系统

黄景欣首先指出，词汇系统和客观世界系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前者是后者的反映，并为后者所制约”，“这正如人类的概念体系和客观世界的体系的关系和区别一样”^[45]。黄氏以名词为例在其下划分出的生物名词、非生物名词，动物名词、植物名词等，本是生物学界根据事物的生物属性所做的划分，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识。黄氏用来证明词汇系统，贯彻了他自己的上述主张。

随后的几位学者，对词汇系统和概念系统的联系区别，认识不出黄景欣之外。武占坤、王勤说：“词汇成分所谓的事物、现象以及作为词汇语义基础的概念间的联系，自然成为这种系统形成的基础。”^[46]周国光说：“客观事物、概念体系和词汇体系之间具有同构关系”^[47]，“同构本质是一种映射，一个系统的结构可以用另外一个系统表现出来”^[48]。周国光还举例说明词汇系统和概念系统如何不同：“由于词语和概念间存在着‘一对多’和‘多对一’关系，因而词汇体系中的词项结构和概念体系中的概念结构之间存在着差异，如对应上下位概念结构‘方向—东、南、西、北’的上下义词项结构是‘方向—东、东边、东方、西、西边、西方、南、南边、南方、北、北边、北方’。”^[49]此外，还可以依据词项形式特点和功能特点构成系统，这些都是概念所不具备的。

词汇中绝大部分的构成单位的意义都体现概念并指称一定的事物现象，这容易让人把客观事物系统、概念系统和词汇系统联系起来，由客观事物间的联系、概念间的联系建立词汇系统。刘叔新、周荐对此持反对意见。

刘叔新认为,现实中客观事物对象之间有联系,并不意味着反映客观事物的词语在意义上存在必然的对应关联,如同属于“文娱活动”这个题目义族的“歌唱、表演、朗诵、郊游、联欢”等词语之间,从意义看不存在必然的影响制约关系。上下位词之间的属义关系等概念关系,并不必然地寓含着真正属于词语意义的相互联系及其有关结构,尽管它们是词语之间意义关系建立的基础,但并不是词汇系统建立的基础。^[50]

周荐认为:“词汇是否成系统,得看其成员——词语彼此间有无缜密的组织关联,这种组织关联不能是语音的,不能是语法的,更不能是逻辑的,而只能是词语本身的内容——语义的。”^[51]“词语本身的内容——语义”即词语意义,它和概念有联系,但二者属于不同领域,并不一一对应。周氏对此有详细论析。这样的话,词语意义之间的关系和概念间的关系也不一一对应,前者建立的是词汇系统,后者建立的是概念系统。

5. 外来词的改造、词语语义界限的调整等和词汇系统

武占坤、王勤、邢福义、马学良等肯定外来词的改造、词语语义界限的调整等是词汇系统性的表现。与此相反,许威汉则认为,方言词的存在、外来词的渗入、新旧词形的替换、词风格的分化(口语和书面)、词义位和语义场的变化,“当然与词汇体系有关,但非体系自身主流反映”^[52]。

“词汇系统或系统性的表现”这一说法,可以作两种理解:一是词汇系统或系统性本身表现出的情况,即词汇系统具体如何构成,词汇系统性是什么样的。另一是能够表明词汇是系统、词汇具有系统性的现象。武占坤、王勤等作第二种理解,许威汉主张建立在意义之上的词与词之间的联系是词汇系统或系统性的体现,因此作第二种理解。方言词的存在、外来词的渗入等不是词与词的相互联系,只是显示词与词有联系,因此不是“体系主流反映”,只是“和词汇体系有关”。

三、词汇系统的性质特征

学者们在研究中明确提到的有系统性、层级性、客观性、开放性、民族性。

(一) 系统性

如上所述,绝大多数学者主张系统和整体是一回事,自然系统性就是整体性,整体性就是系统性。正如武占坤、王勤所说:“语言的词汇

同自然界的情况一样，它也是各种词汇成分的相互联系的总体，是一个具有整体性或体系性的现象。”^[53] 整体系统由要素相互联系构成，要素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一种或多种联系都可以把要素关联起来构成整体系统。这样，系统性就是联系性，联系性就是系统性。武占坤主编的教材认为，“词汇成分间有规律的联系性，就是词汇的体系性”^[54]。这一看法很有代表性。整体性、系统性、联系性三者是否完全等同，有待探讨。

刘叔新不赞成把系统和整体完全等同，自然，在刘氏看来，系统性和整体性不是一回事。在揭示词汇系统或系统性的过程中，刘氏强调词汇单位之间所具有的相互制约、对立或相互依赖、对比、因应的内在结构组织关系，反对用语法的、概念逻辑的、纯粹形式的（包括语音形式、结构形式）、纯粹外在的（如历史来源、地域交际等方面）等联系代替词汇的结构组织关系。同时，刘氏强调必须是所有类型的词汇单位（刘认为是词和固定语）以及所有类型词汇单位中的所有成员，都应被词汇单位内在的结构组织关系无一遗漏地全部网罗起来。60年代和90年代刘氏前后两次对词汇是否为系统作出的截然不同的结论，都是看词汇结构组织关系能否把所有的词汇单位都网罗在内而得出的。可见，刘氏是从词汇单位内在的结构联系性和整体性的统一来理解系统性的。此外，刘氏指出词汇系统“并不很完善或充分”，“这种情况，大概适应于词汇较易变动发展的特质。体系强，可能会对新词语、新意义的大量产生，起消极的妨碍作用”^[55]。把词汇系统内在结构上的特点和词汇的易变化联系起来，给人以有益的启发。

（二）层级性

黄景欣首次揭示词汇是一个具有层级的系统。随后不少学者都有论述。大家的主张有如下四种：

（1）由从大到小划分归纳词汇单位的类别聚合而得到“词汇层”。

武占坤、王勤的概括有一定代表性：“词汇里词汇成分间在共时的‘类’的联系中，总是成组系、分层次的。一定的词语总是可以类聚为一定的组系，小的组系又进一步类聚为大的词汇组系。”^[56] 黄景欣、张永言、周国光揭示的“词汇层”即是如此得到的。

（2）根据三类词汇单位——语素、词、熟语依次构成而得到“词汇层”。

武占坤、王勤首次阐述到：“词素层是最低级次，它是构成词层的

材料和基础；词层又是构成熟语层的材料和基础。”^[57]邢福义主编、马学良等主编的教材采纳武、王二位的观点。

(3) 基于词汇内部的结构组织关系而得到“词汇层”。

刘叔新认为，现代汉语词汇系统“层次性相当薄弱，或者说，层次少而又不很明显”，全部词语处于底层，11种词语结构组织位于上层。结构组织作为一个层次，还不那么明显，与全部词语之间存在的高低层次的关系并不很明晰。^[58]

(4) 区分词汇系统研究的三个平面，根据结构和功能统一的原则而得到“词汇层”。

这是徐国庆的主张。其《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第一编第二章“现代汉语词汇层”共三节：“一、词汇层的一般性质”；“二、功能词汇层的划分”；“三、潜在词汇层的建立”。

徐氏认为，词汇层是词汇系统的构成要素——语素、词、固定词组在特定的等级秩序中有机组织起来形成的层级性结构组织。前辈学者对词汇层的研究有贡献有不足，不足是：黄景欣混淆语言的语法平面和词汇平面，建立的是语法性质的词汇层。武占坤、王勤混淆词汇体系研究的要素平面和层级平面，把要素平面上语言单位的“级次”，当作词汇成分的组织秩序。刘叔新混淆词汇的聚合平面和层级平面。有鉴于此，徐氏提出根据结构和功能统一的原则确定词汇层。词汇系统最高层次即功能词汇层的具体情况前面已有论述。词汇系统之外还存在一个提供新要素、收容旧要素的“潜在词汇层”，见图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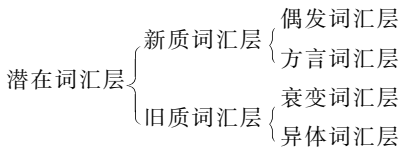


图4—5 徐国庆的潜在词汇层构成图

徐氏列专章讨论“词汇层”，十分必要而且很有意义。借鉴系统论中“结构和功能统一”的原则，有助于对词汇系统内在结构、外在功能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不过徐氏所确定的功能词汇层，像“固有一借用，专有一普通、新造—旧有、传承—复生、文言—历史、方源—外来、专业—习惯、科技—行业、集团习惯—阶级习惯”等很难说体现了词和固定语的造句功能。另外，词汇成分的功能和词汇成分相互联系构成的整体词汇系统的功能是否是一回事，是否应该把作为词汇系统层

次的词汇层和参与词汇系统构成的词汇单位间的各种联系分开，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开放性

武占坤、王勤着重指出词汇系统“对新成分的加入，开放性强，对旧成分的脱落，封锁性弱”的原因：词汇的组织形式比语音、语法松散得多，个体符号之间的制约性比较弱，给个体符号的增减以较大的自由。^[59]

邢福义、徐国庆都述及词汇系统开放性的表现，前者认为表现在它“经常有进有出”，“语素依据一定的构词法能较自由地生成固定短语。人们根据交际的需要可以较自由地创新新词语，淘汰旧词语，吸收古代词语和外来词语”^[60]。后者认为表现在它“必然与人类的社会系统、思维系统以及语言的语音系统、语义系统、语法系统这样的总体外部环境实现着物质、能量及信息的交换，形成一个开放的系统”^[61]。相比之下，徐氏的阐述相当宏观。此外，邢福义主编的教材还指出词汇系统比语音、语法系统有更大的开放性。

（四）客观性

徐国庆因为主张系统普遍存在而强调词汇系统绝对客观存在，系统是否普遍存在，哲学界也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词汇系统是否绝对客观存在，也需要人们去认识。没有认识，所谓绝对客观存在没有任何意义。认识会因人而异，认识是一个过程，认识须实事求是。

（五）民族性

明确提出“民族性”三字的是武占坤和王勤：“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具体内容，和其他民族语言词汇也有一定差异，从而显示了它的民族性。”^[62]二位用汉语量词比俄语复杂、汉语无俄语的“无主代词”来具体说明。黄景欣没有用“民族性”的字眼，但是也指出不同民族的语言词汇体系的差别，“这种差别表现在它们的同一相应的词汇层中的词汇单位的数目经常不同，对立关系也不同”^[63]。既重视单位又强调单位间的对立关系，这样的概括比较全面。

四、词汇系统的发展变化

谈及这个问题的学者不多，有高名凯、武占坤和王勤、葛本仪、徐国庆。

高名凯的阐述最早。在《语言论》第四节“词汇系统的演变”中，

高氏首先区分“发展”和“演变”。“发展”包括“演变”和“扩张”。“演变”指原有词汇系统及其所包含的词位的演变，“扩张”指由于新词的产生和旧词的衰亡之间的不平衡而产生的词汇范围的扩大。“演变”、“扩张”的总和及其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体现整个词汇系统的“发展”。紧接着，高氏就“演变”进行详细论述。主要观点如下：（1）词位的变化有质变和一般变化之别，无论哪一种，都影响到它自己和其他词位的地位及同义词反义词等各种词位类聚，使整个系统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2）“词汇系统的演变”也有“质变”和“一般变化”之别。作为词汇系统中本质部分的基本词汇，其总面貌发生变化时，产生质变，词汇系统也发生质变。基本词汇中个别词位变化，不能构成基本词汇的质变，词汇系统的变化属于一般变化。（3）词汇系统的演变也是朝着维持系统平衡或再度建立系统的平衡方向走的，演变的原因是除了内部的矛盾外，还有客观世界的变化、思维的变化，它们都通过内部矛盾起作用。^[64]高氏的上述阐述，除第三点带有哲学原理说解的意味、比较抽象外，其余论述是很有理论见地的。

武占坤、王勤说明的是古今汉语词汇系统的发展变化。二位认为，现代汉语词汇系统是在古代汉语词汇系统的基础上发展、形成、完善起来的，二者“大同小异”。古汉语词汇体系也具有直称词和指代词这两大组系以及隶属于其下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确称指代词、疑问指代词等几个较大的组系，这是“大同”，“表明古今词汇的历史继承关系，也反映了词汇体系的巨大的历史稳固性”。“小异”，则主要是彼此在某些基层的词汇组系的构成上有所差异。如动量词这一小组系，上古汉语词汇里还没开始形成。“小异”也是由于词汇的历史演变而来的。^[65]古今汉语词汇系统的发展变化是一个相当大且具有相当难度的课题，需要投入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葛本仪主编的《语言学概论》1988年本及2000年修订本都讨论了词汇系统的发展变化。2000年修订本第六章第三节“三、词汇系统的演变发展”认为，词汇系统的演变发展，表现为新要素的增加和旧要素的消亡。前者表现为：“一、适应新事物的出现而创造的新词”；“二、旧事物改换名称增加新词”；“三、词义演变产生新词”；“四、吸收外来词增加新词”。其他如古语词的重新启用、方言词的吸收等都是新词产生的途径。后者表现为：“一、旧事物的消亡引起旧词的消亡”；“二、事物名称的改变引起旧词的消亡”；“三、社会发展和交际需求的改变引

起旧词的消亡”；“四、词汇系统的规范与调整引起旧词消亡”。^[66]葛氏论述的“词汇系统的演变发展”是汉语词汇发展史上词汇单位（词）的出现和消失。

徐国庆《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第三编“动态论”共三章：“一、词的增生与衰变”；“二、词的分化与合并”；“三、词语的缩略与羡余”。徐氏认为：词汇系统的运动发展变化是绝对的，即使在特定时期内也不会产生“定格”，总是每时每刻都要在与环境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中，实现着本身的自我调节。^[67]自我调节有整体的，也有局部的。其主要内容包括新质要素的积累和旧质要素的衰变，具体表现形式是：新词的增生、新义的衍生、词的分合、词语的缩略、词语的羡余、地位的改变、词语的衰变、旧词的复生。^[68]“自我调节是共时词汇系统内部的历时矛盾运动”，不过徐氏的具体分析往往超出共时系统的范围，有不少属于历时范围的历时变化。如“地位的改变”中分析的“循循善诱”、“乘风破浪”等由自由词组“粘合”成的固定词组，“目、言、明、朋”等由词演变成的构词语素。此外，有的内容如“词语的羡余”还需要准确深入地研究。

五、词汇系统在语言系统中的地位作用

这个问题为不少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所关注，其看法如下。

（一）60年代

高名凯主张语言四要素，语音和语义对立，是语言符号的“两极”，任何一个语言成分（包括词汇成分、语法成分）都具有这两“极”。词汇和语法对立，是语言系统的两个层级，语言系统由它们构成。语音语义和词汇语法并不平列。^[69]高氏说的“语音”即语言成分的“语音形式”，“语义”即语言成分的“语义内容”。在高名凯与石安石主编的《语言学概论》中，他们解释到：“在语言这个系统中，每个语言成分都是由声音和意义两个方面结合而成的，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行。前一个方面就是语音，它是语言成分的形式；后一个方面就是语义，它是语言成分的内容。例如，现代汉语中的‘书’这个语言成分，‘shū’是它的语音，‘成本的著作’是它的语义。”^[70]

高氏的上述观点多为后学所采用，可用图4—6概括。

“词汇在语言结构中形成语言建筑材料中作为句子结构中最小的句子成分或结构项的一层”^[71]，高氏用一句话概括了词汇的地位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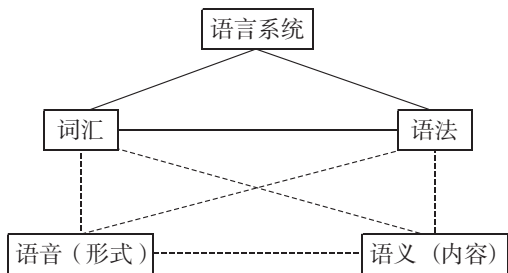


图 4—6 高名凯的语言系统结构图

刘叔新此时主张语言三要素。“只是词汇的全部构成单位在语法的支配下成为构造语句的现实材料，并且能够按照语法特征来分类；而语音体系的存在既使词汇和语法中的各个单位具有一定声音形式的物质区别标志，又使语法得以支配词汇。因此，正是由于语法体系和语音体系的作用，词汇能够和语法、语音紧密联系起来而共同构成语言体系。”^[72]

刘氏的上述阐述 80 年代遭到陈庆祜、周国光的批评：（1）把语音同词汇、语法并列在一个平面上不合理。（2）语音和语法体系综合确立的“语言体系”，“缺少意义上的系统性，并且这样确立的‘语言体系’中的语言符号（引者按：指词汇）也不具有系统性”，“这样的符号系统恐怕是确立不起来的，也是难以想象的”。（3）词汇同语音的紧密结合比较费解。“只有意义才需要同语音紧密结合起来，词汇无需同语音紧密结合，因为词汇自身就包含着语音部分。”^[73]

陈、周二位主张语言四要素（详见下文论述），语言四要素比三要素更符合语言实际，今天已为多数人所赞成，包括刘叔新自己也采用（详见下文）。不过这里二位的批评并未切中三要素的要害，反倒令人难以信从。

（二）80 年代

武占坤、王勤主张语言二要素。二位从词汇与语音、语法的关系来说明其在语言体系中的地位。语音离开了词汇，就只能是一般的声音而不是与一定意义结合起来的语音；没有词汇就谈不到词与词的结构关系和词的形态，语法规则自然就不存在。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形式，语法是语言的间架，词汇则是语言的主体。^[74]看得出，武、王二位说的“语音”就是词汇里与一定意义结合的词语的“语音形式”。

刘伶等主张语言四要素。从内容和形式来说，语义是内容，语音是

形式,语言由语音语义构成。从建筑材料和结构规则来说,词汇是材料,语法是规则,语言由词汇语法构成。而任何一个语法成分词汇成分又都是音义结合的统一体。^[75]这里的“语音”、“语义”还是语言成分(符号)的“语音形式”、“语义内容”,刘伶等对此有说明:“语言符号的形式是表达一定内容的声音,即语音。语言符号的内容,即语义,必须靠一定的语音表现出来。”^[76]

对词汇在语言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刘伶等专门提出讨论,不过很简单:“它只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没有建筑材料,任何语言都是不可想象的。”^[77]

陈庆祜、周国光主张语言四要素,词汇是语言符号实体系统,语法是语言规则系统,语音语义是构成语言符号的要素系统。语言系统由词汇语法构成,“词汇、语法是语言的直接成分,语音、语义则是成分的成分”^[78]。虽然借用了IC分析法(即直接成分分析法)术语表述,但基本框架不出高名凯《语言论》中的观点。基于一些语言事实,二位最后指出词汇在语言系统中的地位作用:“词汇不仅是语言体系存在的基础,也是语法系统存在的基础,一旦没有了词汇,语法以至于整个语言都不存在了。”^[79]

(三) 90年代

刘叔新此时主张语言四要素。1990年,刘氏认为整个语言是词汇—语法系统。语音语义处于语言的另一种组织层次。语音存在于词汇语法,词汇语法寓存着语义。^[80]这一看法没什么新意。不过到1993年,刘氏发表《全方位的现代语言研究》[《南开学报》,1993(1)]时,其看法有所改变:从语言符号单位及其语句组合的角度看,语言不无道理的被视作词汇—语法系统。换一个层面,从语言符号及其语句组合的物质形式材料和意义内容角度看,语言又未尝不可看成语音—语义系统。语音和语义都既存在于词汇,也存在于语法中。^[81]

刘氏说的“语音”是“语音系统”,和语言成分(符号)的“语音形式”(刘称之为“音流形式”)不是一回事。刘氏说:“词语的音流形式是词汇单位的表现形式,同语义相结合,属于词汇,而语音则是这些音流形式(以及语法中的音流形式)赖以构成的、为数有限而本身不带意义的声音物质材料单位及其系统。”“语音系统不可能有成千上万的音流形式单位!”^[82]一般学者在专门的“语音”章节里,分析元音辅音声调及其聚合组合的情况,有的学者明确指出语音是系统,高名凯说:

“音位只是语音系统的最小的单位。语音系统是由音位组织而成的。”^[83] 不过在论述语言内部结构时，不管是主张语言四要素还是三要素，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语音等同于语言成分（符号）的语音形式。刘氏所论没有这样的自相矛盾之处。

在另外一篇《语义学的对象问题》[《语文研究》，1993（4）]中，刘叔新阐述了语义学在语言意义范围内的研究对象，从中可见他对语言里的“语义”的理解：“在语言意义的范围内，语义学研究的是词汇意义……总的来看，语义学对于语言的词汇意义的研究，是要揭示和描写词义、语素义、固定语意义的义位及其可能有的变体，不同义位间的种种聚合关系和搭配关系，以及某些较大作用的语义范畴。再把语法意义也列入考察的范围内，语义学须研究语言系统内的语义系统，包括形成这个系统的复杂的语义关系和层次。”刘氏认为语言里的“语义”即“语义系统”——包括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在内的、由各种类型的义位构成的具有复杂语义关系和层次的系统。正如“语音”和语言成分（符号）的“语音形式”不是一回事，“语义”和语言成分（符号）的“语义内容”也不是一回事。

“语音”、“语义”既是系统，那么它们有资格和也是系统的“词汇”、“语法”平列。同时，通过属于词汇语法的词汇成分语法成分的语音形式，“语音”和“词汇”、“语法”联系起来；通过属于词汇语法的词汇成分语法成分的语义内容，“语义”和“词汇”、“语法”联系起来。刘氏的上述观点，可用图 4—7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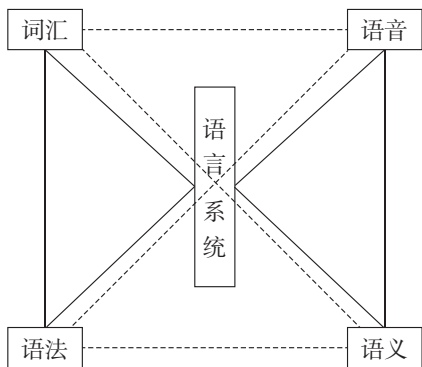


图 4—7 刘叔新的语言系统结构图

刘氏对词汇、词汇学在语言、语言学中的重要性强调最多，90 年代前后两次都有论述，这里概述他后一次的论述。刘氏指出：（1）没有

词汇，语言就空空如也，不能成立。脱离了词汇，语法会失去其存在的依据，语音不可能还有其存在场所，语义也会失去其主要部分。(2) 词汇是语言中同语法平起平坐地相对待的组成部分，具有平行于语法以及语音、语义的地位。词汇有词汇的特质，不能用语义加语音来取代，也不能以语法为中心。一旦弄清语言四要素各自的内涵及相互之间的联系，词汇在语言系统中的地位作用马上就能正确认识。

许威汉主张语言四要素，强调“语言系统以语义为基础，语言诸种要素关系相互交织”^[84]，许氏用下图（见图4—8）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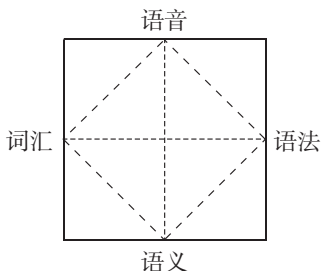


图4—8 许威汉的语言系统结构图

六、有待深入拓展的问题

（一）统一对“系统”的理解，从严认识

在词汇系统多方面的研究中，上述第二个问题——词汇系统或系统性的揭示意见最不统一。造成大家对词汇系统或系统性的理解各执一词的根本原因，是对什么是系统、词汇单位到底凭借什么样的联系形成系统——是任何可能存在的一种或多种联系，还是属于词汇本身的词汇单位之间的内在联系（其中，何种联系算属于词汇本身的词汇单位之间的内在联系），看法不一。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语言是一种结构、一种系统的观点，是学者们受近代西方哲学关于事物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观点的影响，在深入研究语言事实，认识到组成语言各方面的要素是互相影响制约的情况下提出的。^[85]既如此，那么词汇是一个系统的观点，也应该建立在词汇单位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基础上。这一点大家没有异议。在以往的研究中，用“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互相依存”、“互相对立”、“休戚相关”之类的词组限制“词汇单位的联系”的说法随处可见。但不少学者往往说归说，在具体挖掘词汇单位如何联系构成词汇系统时，有的仅仅

举出一两个词语简单说明，有的甚至全然不考虑考察出的联系是否真正使词汇单位“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互相依存”、“互相对立”、“休戚相关”。如音节相同的“班、般、搬、斑、颁、瘢”等同音词语之间，结构方式相同的“美丽、重复、同等、联合、友谊”等同构词语之间，同属于基本词汇的“人、口、手、水、火、土”等基本词之间，同来自汉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语言词汇的“扑克、克隆、扑尔敏、奥林匹克、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外来词之间，这些联系究竟是否算得上“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互相依存”、“互相对立”、“休戚相关”？因此，探讨词汇单位之间如何的联系算得上是“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互相依存”、“互相对立”、“休戚相关”的联系，是词汇系统研究进一步的要求。

（二）应该把所有类型的词汇单位、所有类型的词汇单位中的所有成员都考虑到

词汇系统由词汇单位相互联系构成，从某种意义上说，词汇系统就是词汇单位系统，是由所有词汇单位里的所有成员共同构成的系统。因此，研究词汇系统，首先就要确定有哪些类型的词汇单位。

对词汇单位，词汇学界的认识最开始只有一种类型——词，后来很快又提出有两种类型——词和固定语（固定词组、熟语），还有的主张有三种类型——语素、词、固定语（固定词组、熟语）。尽管目前对词汇单位到底是两种类型还是三种类型，对除词之外的其他类型的词汇单位的具体内涵、外延的界定甚至名称术语的确定等，看法不同，但词汇单位不仅限于词，还存在如“叶公好龙”、“一国两制”、“对不起”、“四川盆地”等这些固定语，却已早成为大家的共识。既如此，那么在揭示词汇系统或词汇的系统性时，应该把除词之外的其他类型的词汇单位和词放在一起考察，考察它们彼此之间是如何“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互相依存”、“互相对立”、“休戚相关”地联系，从而构成一个系统整体的。只有这样，揭示的系统或系统性才是真正的词汇系统或词汇的系统性。如果主张词汇单位不止词一种类型，考察时却仅仅考察词之间的联系，最后得到的只能是“词的系统”，而不是所有词汇单位构成的词汇系统。“词汇系统”和“词的系统”不是一回事。

60年代黄景欣主张词和固定语一起构成词汇系统，但在具体揭示的词汇系统中没有固定语的位置，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已为刘叔新指出并通过具体实践予以纠正。但在随后的研究中，绝大多数学者仍然多次

出现像黄氏一样明显地弃固定语而不顾、自相矛盾的做法。张永言、刘伶等认为词汇由词和词的等价物（固定词组）构成，武占坤和王勤、陈庆祜和周国光、邢福义、马学良等主张词素（或叫语素）、词、熟语是词汇单位，但在上述各位所揭示的词汇系统或词汇系统性中，却很难见到除词之外的其他词汇单位——词素（语素）、熟语、固定词组。不仅如此，即使他们阐述的一种或多种把词汇单位关联起来构成词汇系统的联系，也很少有可以覆盖到词素（语素）、熟语、固定词组的。如陈庆祜和周国光提出的结构子系统，其中包括有“单纯词语、合成词语、复合词语、派生词语”等同构聚合，词从结构上可以有单纯词、合成词、复合词、派生词之分，语素、熟语如何分出单纯结构、合成结构、复合结构、派生结构？“单纯词语、合成词语、复合词语、派生词语”这种称名本身就值得推敲。实际上，大家根本就只是从词出发，从词与词的联系考虑词汇系统的。这样的状况如果得不到纠正，很难有真正的词汇系统研究，顶多只能是“词的系统”的研究。

因此，应该把所有类型的词汇单位的所有成员都纳入考察的范围。词汇单位数以亿计，不可能一个一个穷尽考察，但应充分考虑所挖掘的词汇单位之间的联系是否能把所有的词汇单位无一遗漏地网罗进去。在这个问题上，刘叔新的考虑和实践值得继承发扬。

（三）深化既有研究，拓展新的视野和范围

比如“词汇系统的功能”，徐国庆首次提出，但只是为说明词汇系统的结构层次，并未作为专题专门论述。在进行词汇系统内在结构研究的同时，探讨其外在功能，把内在结构和外在功能结合起来，有助于对问题讨论的深入。又如“词汇系统的发展变化”，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发展变化和历史词汇学所说的词汇系统的发展变化不同，具体从哪些方面着手考察，应该既有理论说明又有汉语词汇的具体分析。对目前词汇系统研究存在的分歧和泛泛之论，有必要从思路方法上予以澄清，在对词汇系统研究进行史学研究的时候，不能仅仅回顾概述，而应多关注分歧和泛泛而论背后的原因，道出实质，以促进词汇系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词汇系统是汉语描写词汇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描写词汇学其他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课题，如“词汇”这一名称的内涵、词汇单位类型的确定、固定语的范围及在描写词汇学中的位置、概括基本词汇一般词汇等词汇单位分类的“词汇的构成”、词汇的范围等，都应该和词汇系统的

研究联系起来,放在词汇系统这一背景下,正确地描写分析。早在 60 年代,黄景欣就指出:“如果正确地从体系结构的观点来分析词汇的话,词汇学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都可以得到正确的、科学的解决。”^[86]黄氏还就“词义的概念”、“同义词和反义词”、“言语实践(语言学习、词典编撰)”三个方面一些问题的解决如何从词汇系统出发作了具体的分析说明。黄氏的意见非常正确,所进行的具体实践也很有启发意义。今后的词汇系统研究,一方面,应加强其对描写词汇学其他问题课题研究指导作用的研究,另一方面,应结合其他问题课题的研究以加强其自身的深入。此外,从目前综论性的现代汉语词汇学专著,《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类教材的词汇部分对“词汇系统”方面的内容安排很不一致来看,有必要在整个描写词汇学知识体系的范围内考虑词汇系统方面的内容究竟安排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比较科学合理,而它自己包括哪些方面、这些方面内在的逻辑联系先后顺序等等,也有必要理顺。这样不仅有助于汉语词汇系统研究的深入发展,而且有助于整个描写词汇学知识体系的建设更趋合理科学。

第二节 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词汇系统研究

古汉语学界对词汇系统的研究始于“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8 年王力在《论同源词》[《中国语文》,1978(1)]中说:“从前,我们认为,在语言三大要素中,语音、语法都有很强的系统性,唯有词汇是一盘散沙。现在通过同源字的研究,我们知道,有许多词是互相联系着的。”同源字表明许多词是联系着的,是否表明词汇有很强的系统性,王氏的意思很明白,只是未用“系统性”的字眼。到 1980 年出版的《汉语史稿》(下册),话就说明了:“这里所讲的同源词,就是词汇的系统性的现象之一。”^[87]既是“之一”,那么还有“之二”、“之三”、“之四”等等,同源字(词)不是词汇系统性的唯一表现,具体还有哪些现象足以说明词汇具有很强的系统性,王氏未作申述,这为后来学者的研究留下了空间。王力之后研究思考古代汉语词汇系统的学者,在指出同源词的同时,都探究了其他方面的表现。

1987 年洪成玉发表《词义的系统特征》,文章“结语”部分总结的四点概括了全文的主要观点:

(1) 词汇系统实际上就是词义的结构系统。词义的结构系统表现为

词义之间的各种联系形式。

(2) 词义结构系统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词义之间不可能只存在单一的联系形式，也不可能只是一个单层次的意义结构。词义系统是一个有多种联系形式，多层次的结构系统。

(3) 在词汇系统被清楚揭示出来以前，并不妨碍我们用系统的观点来研究词汇现象，弄清楚词义之间的具体联系，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逐步接近对词汇系统全貌的认识。

(4) 词义具有类聚性、结构性、依存性和互补性等系统特征。这些特征表明，词汇不是像一盘散沙似的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着各种联系的。

洪氏把词汇系统等同于词义系统，代表了古汉语界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此外，洪氏强调词义系统具有“多层次”，虽未阐述，但在古汉语词汇研究中像这样提出层次问题的，还是不多见的。

1989年，蒋绍愚《关于汉语的词汇系统及其发展变化的几点想法》[《中国语文》，1989(1)]发表。蒋氏提出从以下四方面考察汉语词汇系统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

(1) 义位的有无、义位结合成词的情况。

(2) 词的聚合关系，即词在语义场中的分布情况。

(3) 词的组合关系，即词的搭配关系。

(4) 词的亲属关系，即原有词和由它而产生的新词之间的关系。包括同源词、由原有词加上词尾构成的新词、由原有的词作为语素而构成的新词。

同年12月，蒋氏《古汉语词汇纲要》出版。书中第十章“汉语的词汇系统及其发展变化”和上文在章节结构、举例详略、具体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基本观点完全一致。《古汉语词汇纲要》除了第十章，其他章节也有关于词汇系统问题的叙述。第一章第一节“我国传统训诂学的成就及其不足”，蒋氏指出：“至于把语言看作一个语音、词汇、语法互相影响的完整的系统，这更是古代训诂家所不能做到的，我们也不应以此苛求古人。我们今天来研究古汉语词汇，就应该正确处理形、音、义三者的关系，而且要把词汇放到整个语言系统中来加以研究。”^[88]又说，“语义学把词汇和词义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这比传统的词汇研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传统的词汇研究往往只注意单个词的发展变化，这种研究被称为‘原子主义’(atomism)。”^[89]第九章第二节“近代汉语词汇研

究的方法”，蒋氏认为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最终的目的，是要通过横的和纵的研究，搞清楚近代汉语各个发展阶段的词汇的系统 and 近代汉语的词汇发展史”^[90]。而“要讲整个近代汉语的词汇发展史，就必须先把近代汉语各个阶段的词汇系统弄清楚，然后才能进而研究下一个阶段比之上一个阶段有哪些继承，有哪些发展”^[91]。

综观蒋氏的文章和上述论述，有以下三点引人注目：

(1) 不赞成传统词汇研究原子主义的做法，主张把词汇当作一个系统来研究，而且把词汇系统作为古汉语词汇研究的核心内容。词汇的共时研究最终描写各个阶段的词汇系统，词汇的历时研究最终弄清楚各个阶段词汇系统的继承发展。

(2) 语言是一个系统，词汇系统是语言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词汇系统研究不能割裂它与语言系统其他组成部分——语音语法的联系。

(3) 把现代语义学的理论和汉语词汇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深入探讨，是蒋氏进行古汉语词汇研究的突出特点，这个特点也非常鲜明地表现在他所提出的具体把握词汇系统的四个方面上。蒋氏把探讨在义位基础上的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作为词汇系统研究的关键，义位、组合关系、聚合关系、语义场，都是现代语言学语义学的理论观点。

1989年12月，许威汉发表《论汉语词汇体系》。许氏主张，必须在准确深入地了解汉语词汇的历史及其发展状况，对汉语具有孤立语特点、汉字与汉语单音成义特点相适应这些汉语事实认同的基础上，观察词汇系统的具体体现。他提出的观察词汇系统体现的三个方面是：

(1) 词的内部形式的联系，即同源词。

(2) 词的外部形式的联系，即同类词。如从“页”的“颈、项、颐、颜、顾”都和头有关，是同类词。又如犬部和豸部意义相通，“狐、狼、豹、豺”等是同类词。

(3) 词的构成形式的联系，即词的复音节化。“这么庞大的词汇量由单音节词扩展而成，其内部的有机联系应是有目共睹的。”

发掘词与词之间上述三方面的联系以作为词汇系统的具体体现，并非许氏独创。但强调从汉语汉字的历史与独特性出发，内发汉语词汇形、音、义的联系来揭示汉语词汇系统的主张，却是很独到的。

1992年，许威汉《汉语词汇学引论》出版。第二章第三节“词汇体系”部分除了上文的内容外，还补充申述了以下三个问题：

(1) 方言词的存在、外来词的渗进、新旧词形的替换、词风格的分化(口语和书面)、词义位和语义场的变化,当然与词汇体系有关,但非体系主流反映。许氏主张建立在意义之上的词与词之间的内在联系是词汇系统或系统性的体现,上述几种情况并不是词与词的相互联系,因此不是“体系主流反映”。不过它们可以显示词与词有联系,因此“和词汇体系有关”。

(2) 词的各种类集,有可能是成体系的,但不能说各种类集一定都是词汇自身的体系性联系。判定是否为体系性体现的标准,是类集有无内发性联系,外限的分类组合谈不上体系。在词的分类、词的各种类集是否可以说明词汇系统或系统性这个问题上,从事词汇系统研究的学者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许氏自成一家之言(本章第一节已有详细论述)。

(3) 汉语词汇体系研究是当前的重要课题。许氏认为,应该对词与词之间的联系作更深入的描写研究,进行更严格的抽象概括,不能使其“支离破碎”。

1994年,赵克勤《古代汉语词汇学》出版。该书绪论部分,在指出了词与词之间所具有的同义词关系、反义词关系、同音词关系、同形词关系、单音词与复音词的关系后,得出结论:“总之,各种不同类型的词的排列组合,构成了古汉语的词汇系统。对古汉语词与词的关系的研究,也就是对古汉语词汇系统的研究。”^[92]赵氏指出的古汉语词与词的关系,同义词反义词、单音词与复音词的关系是大家在研究词汇系统时一致提到的,而“同音词”、“同形词”这两类词与词在外在形式上的联系很少有人用来说明古汉语词汇的系统性。

1997年蒋冀骋、吴福祥合著的《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第三章“近代汉语的词义”部分,从共时的角度研究语词意义之间的关系,认为每一个多义词具有的诸多义项构成一个小的词义系统,找出中心义、派生义,并探求中心义是如何引申出派生义的,“从而爬梳出词的意义系统”^[93],是词义研究的主要目的。书中以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王锬《诗词曲语辞例释》、龙潜庵《宋元语言词典》中的部分近代词语为例,分析、梳理了具体语词的词义系统。例如,“寻趁”,龙潜庵在《宋元语言词典》中将其分为五个义项:(1)寻找,寻觅。(2)打交道。(3)亲近,追逐。(4)寻找活路。(5)纠缠。蒋氏等认为“义项间纠纷混杂,全无系统”^[94],经过重新分析和调整,“寻趁”的词义系统图示如下(见图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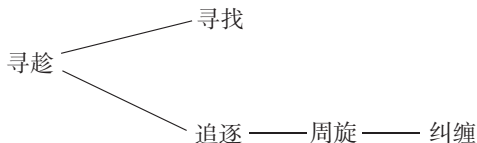


图 4—9 蒋冀骋、吴福祥关于“寻趁”的词义系统图

这一图示使“意义系统灼然分明”^[95]。蒋氏等倡导“将每一个多义词的词义系统都科学地加以说明”^[96]，同时还指出：“研究多义词的词义系统，对语义学、词典编纂学、注释学（即广义的训诂学）、语源学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97]

1999 年，蒋绍愚《两次分类——再谈词汇系统及其变化》[《中国语文》，1999（5）] 发表。基于“词汇的核心是词义，考虑词汇系统的问题主要还应从词义着眼。而词义是和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紧密联系着的”这一认识，蒋氏提出从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两次分类”），考察各种语言（或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历史时期）词义结构的不同，以进行不同语言词汇的对比研究和汉语词汇系统发展变化的研究。蒋氏所说“第一次分类”即人们把一些事物、动作、性状归为一类，成为一个义位，把另一些归为一类，成为另一个义位。“第二次分类”即人们把哪些义位归在一起用同一个词表达。所说“词义结构”，由两层构成，义位是词义结构的第一层，词是词义结构的第二层。各种语言（或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词汇结构，由于“第一次分类”不同，在义位层上不同，表现为义位参差和义域宽窄不同。由于“第二次分类”不同，在词层上也不同，表现为一个词包含哪些义位不同。

1989 年蒋氏发表《关于汉语的词汇系统及其发展变化的几点想法》，曾把“义位的有无和义位组合成词的情况”作为考察词汇系统及其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对此进行了较详细的举例说明，十年后，蒋氏从人的认知的角度，对此进行更透彻的析理。把人的认知和语言研究结合是当代语言研究的一大趋势，在古汉语学界，蒋氏率先把握此趋势，积极探索，再次给古汉语词汇研究赋以语言学时代特色。

2000 年，蒋绍愚发表《20 世纪的古汉语词汇研究》（见《20 世纪中国学术大典》，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在谈及什么是历史词汇学时，蒋氏把“各个时期汉语词汇系统的描写以及汉语词汇系统历史演变的研究”作为历史词汇学两大任务的基础部分。正式把历史词汇学定位在词汇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古代汉语词汇研究具体实践的系统化、科学

化,而且有助于历史词汇学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充实完善,对现代汉语描写词汇学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很有启发的。

纵观以上古汉语界对词汇系统的研究,可以看到,在一致肯定词汇是系统的前提下,大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努力探究词与词的联系关系。古汉语界都是从联系关系来理解系统、系统性的。有联系有关系就构成系统,具有系统性。词与词的联系关系多种多样,绝大多数学者继承了汉语词汇研究重视词义的传统,均以词义为基础来探究词与词的联系关系,只有个别学者于词义之外,把词与词在外在形式上的联系也作为词汇系统或系统性的体现。另一方面是努力确定词汇系统在古汉语词汇研究中的核心地位。蒋绍愚一直致力于此。从20世纪80年代末把词汇系统以及词汇系统的发展变化作为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最终目的,到20世纪末的2000年把词汇系统及词汇系统的发展变化作为历史词汇学两大任务中的基础核心任务,蒋氏所倡及具体实践,已得到更多的从事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学者的积极响应,并自觉地用于指导具体的研究工作。

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古代、近代汉语词汇系统研究远不如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研究,这是有客观原因的,不必苛求。今后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应首先区分共时和历时,即首先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词汇系统弄清楚,不能笼统地研究“古汉语词汇系统”。在描写各个主要的、典型的历史时期的词汇系统时,可以考虑借鉴现代汉语描写词汇学关于词汇系统研究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从确定词汇单位(不能把固定语排除在外)、挖掘词汇单位之间的结构关系着手。

本章小结

从把一个个词视为各自独立的个体,对词的研究基本上属于原子主义的,到把每一个词都看作是处于与他词(以及非词的词汇单位)密切相关的一个整体之中,对词与词间建构起来的复杂而多层级的语义网络进行全面、缜密、深入、细致的研究,这是现代词汇学的一大进步,更是汉语现代词汇学的一大发展。纵观汉语词汇研究的历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汉语现代词汇学是伴随着词汇体系的研究一同成长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词汇,不研究词汇体系问题,恐难深入。从体系的角度着手对词、词汇进行研究,不仅意味着研究者所面对的对象已是具有紧

密联系的一个结构体，更意味着研究者本人的头脑中已深深植入了系统的理念。

从最初对词汇体系认识朦胧而随意说出“词汇体系”，到因无法验证词汇成体系而否认词汇系统的存在，再到经过大量结构组织的发掘而坦诚面对词汇体系存在的事实，学者们的认识无疑实现了一次又一次质的飞跃。一个事物对象，未必会因同级事物对象都有体系性而也具有了体系性。一个下属的事物对象，未必会因上属事物对象有体系性而也具有了体系性。一个事物对象有无体系性（有无其他性质也一样），需要充分的论据、缜密的论证来证明。体系也好，系统也罢，它所标明的事物对象都不再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与其他体系不同的整体。准此，概念体系、语法体系等等能否用来取代词汇体系，回答大概只能是否定的；概念体系、语法体系等等能否用来证明词汇体系的存在，恐怕也需要慎重思考才行。所幸，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争辩，词汇体系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在绝大多数学者的心中已日益明朗，趋于解决；而词汇体系问题之趋于解决，则预示着词汇研究将会迎来更新的高潮。

注释：

- [1] 和“系统”相当的有“体系”，本章除引文外，叙述一律用“系统”。
- [2] 孙常叙：《汉语词汇》，273页。
- [3] 黄景欣：《试论词汇学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国语文》，1961（3）。
- [4] 刘叔新：《论词汇体系问题——兼与黄景欣同志商榷》。
- [5] 黄景欣：《试论词汇学中的几个问题》。
- [6] 刘叔新：《论词汇体系问题——兼与黄景欣同志商榷》。
- [7] 徐国庆：《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7页。
- [8]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380页。
- [9] 周荐：《汉语词汇研究史纲》，172页，北京，语文出版社，1995。
- [10]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382页。
- [11] 徐国庆：《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7页。
- [12] 林杏光：《词汇语义和计算语言学》，120页，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
- [13] 张素英：《对词汇是否成体系问题的刍议》，载《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3）。
- [14] 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一），载《语文学学习》，1955（3）。
- [15] 高名凯：《语言论》，291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63。
- [16] 参见上书，278~291页。
- [17] 张永言：《词汇学简论》，64页。

- [18] 同上书, 67 页。
- [19] 同上。
- [20] 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 16 页。
- [21] 参见徐国庆:《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 62 页。
- [22] 马学良、瞿葛堂主编:《普通语言学》, 210 页,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7。
- [23] 参见李宇明主编:《理论语言学教程》, 113 页,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 [24] 高名凯:《语言论》, 152 页。
- [25] 同上书, 145 页。
- [26] 刘叔新:《论词汇体系问题——兼与黄景欣同志商榷》。
- [27]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 383 页。
- [28] 参见林杏光:《词汇语义和计算语言学》。
- [29] 参见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 382~383 页。
- [30] 张永言:《词汇学简论》, 64 页。
- [31] 刘伶、黄智显、陈秀珠主编:《语言学概要》,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 [32] 参见刘叔新:《论词汇体系问题——兼与黄景欣同志商榷》;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 372 页。
- [33] 同上。
- [34] 参见刘叔新:《论词汇体系问题——兼与黄景欣同志商榷》;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 231、276 页。
- [35] 参见刘叔新:《论词汇体系问题——兼与黄景欣同志商榷》。
- [36] 参见刘叔新:《论词汇体系问题——兼与黄景欣同志商榷》;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 259~263 页、371~376 页。
- [37] 刘叔新:《论词汇体系问题——兼与黄景欣同志商榷》。
- [38] 参见刘叔新:《论词汇体系问题——兼与黄景欣同志商榷》;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 273、306、359、382 页。
- [39] 参见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 379 页。
- [40] 同上书, 376~378 页。
- [41] 许威汉:《汉语词汇学引论》, 60~61 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 [42] 周国光:《概念体系和词汇体系》, 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1986 (1)。
- [43] 刘叔新:《论词汇体系问题——兼与黄景欣同志商榷》。
- [44] 同上。
- [45] 黄景欣:《试论词汇学中的几个问题》。
- [46] 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 15 页。
- [47] 周国光:《概念体系和词汇体系》。
- [48] 同上。

- [49] 同上。
- [50] 参见刘叔新：《论词汇体系问题——兼与黄景欣同志商榷》；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259～236 页、372～376 页。
- [51] 周荐：《汉语词汇研究史纲》，172 页。
- [52] 许威汉：《汉语词汇学引论》，59 页。
- [53] 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13 页。
- [54] 武占坤主编：《现代汉语》，180 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
- [55]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383 页。
- [56] 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15 页。
- [57] 同上书，4 页。
- [58] 参见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383 页。
- [59] 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356 页。
- [60] 邢福义：《现代汉语》，159 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 [61] 徐国庆：《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203 页。
- [62] 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18 页。
- [63] 黄景欣：《试论词汇学中的几个问题》。
- [64] 参见高名凯：《语言论》，291～301 页。
- [65] 参见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17 页。
- [66] 葛本仪：《语言学概论》，195～198 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 [67] 参见徐国庆：《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202 页。
- [68] 同上书，208 页。
- [69] 参见高名凯：《语言论》，162～163 页。
- [70] 高名凯、石安石主编：《语言学概论》，17 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 [71] 高名凯：《语言论》，259 页。
- [72] 刘叔新：《论词汇体系问题——兼与黄景欣同志商榷》。
- [73] 陈庆祜、周国光：《词汇的性质、地位及其构成》。
- [74] 参见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2～3 页。
- [75] 参见刘伶等主编：《语言学概要》，33 页。
- [76] 刘伶等主编：《语文学概要》，29 页。
- [77] 同上书，142 页。
- [78] 陈庆祜、周国光：《词汇的性质、地位及其构成》，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7（3）。
- [79] 同上。
- [80] 参见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3 页。
- [81] 参见刘叔新：《语义学和词汇学问题新探》，84 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 [82] 同上书，62 页。

- [83] 高名凯：《语言论》，195 页。
- [84] 许威汉：《汉语学》，230 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 [85] 参见符淮青：《词义的分析和描写》，223 页，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 [86] 黄景欣：《试论词汇学中的几个问题》。
- [87] 王力：《汉语史稿》（下），545 页。
- [88]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14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89] 同上书，19 页。
- [90] 同上书，255 页。
- [91] 同上书，270 页。
- [92] 赵克勤：《古代汉语词汇学》，5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 [93] 蒋翼聘，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221 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 [94] 同上书，232 页。
- [95] 同上。
- [96] 同上书，232～233 页。
- [97] 同上书，232 页。

第五章 熟 语

第一节 对现代汉语熟语的研究

一、熟语研究的概况

汉语词汇单位中的熟语是指谚语、歇后语、成语、惯用语等语言单位。熟语在数量上虽然无法与词相提并论，但在人们的日常语言交际中起着重要作用。

汉语中的大量熟语在 20 世纪之前就早已产生并被广泛使用，新中国成立前虽然尚无“熟语”这一概念，但对谚语、歇后语、成语等熟语单位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有不少论文、专著发表和出版。

孙维张在《汉语熟语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中指出“熟语”是从俄语或英语译借过来的术语。“熟语”这一概念出现于 50 年代下半叶。俞敏、黄智显的《语言学概论讲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56）中认为“熟语是某些语言里特有的词组”，把熟语与成语、歇后语等单位看作“惯用语”的几个小类，这是“熟语”的较早用例。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5 年语言班编写的《汉语成语小词典》（中华书局，1958）的序中说，这部词典把“经常用的有现实意义的非成语的‘熟语’成分，也适当收集了一部分”。上海外国语学院、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合编的《语言学引论》（时代出版社，1958）认为：“语言中现成的固定的词组或句子，叫做熟语。”“熟语包括语言中的成语、谚语、惯用语等等。”王德春的观点更明确，他认为，“熟语：包括成语、俚语、格言、警句和歇后语形式”^[1]。又说：“熟语不一定表示一个概念，有些熟语（如谚语、警句、格言等）可以表示一个完整的思想。”^[2]云生对此观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说：“‘熟语’既然是指某种语言所有固定词组的总和，那末，固定的句子肯定是熟语。事实上谚语大都是句子，形式也比较固定。根据这种情况，熟语就包括了所谓成语、谚语等固定词语或固定句子。”^[3]云生还指出：《语言学引论》

一书和王德春的文章“把固定的词组或句子概括在熟语之中……是符合‘熟语’这个概念的”^[4]。此外，云生还针对《语言学概论》和《汉语成语小词典》中反映出来的观点批评道：“‘熟语’显然不能跟其他语言形式混淆起来。”^[5]这一时期对熟语的争论反映了50年代下半叶对熟语的认识由开始的混乱不清逐渐清晰统一起来。

60年代上半叶对熟语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些学者开始注意熟语的种类及其相互间的关系问题。1960年，马国凡发表的《谚语与歇后语》[《内蒙古师院学报》，1960（2）]谈了他对谚语尤其是歇后语的看法，认为“谚语的性质主要表现为它的口语性、普遍性、阶级性和民族性”，而“歇后语主要特点是‘歇’去了要说的话的后半截，被‘歇’去的部分是要说的主体，这一部分通常是不说出的（这 and 现代某些歇后语的使用是不同的），被‘歇’去主体是要听者或读者在已说出的前半截话中悟出，实际上是半截话，是一种人人尽知的公开隐语”。马国凡还进一步把歇后语分为单纯的和复杂的两大类。同年，唐松波在《熟语和成语的种属关系》[《中国语文》，1960（11）]一文中指出：成语只是熟语中的一类；成语和谚语、歇后语、格言、名言等一起构成熟语。这对于人们进一步认识熟语中的各类单位以及各类单位间的关系有着指导性的意义。唐文之后，杨欣安发表《成语和谚语的区别》[《中国语文》，1961（3）]较为详细地谈了成语和谚语这两类熟语的关系。杨欣安指出成语和谚语既有共同点又有区别点，共同点是：“成语和谚语的语句都是非常精练而生动的，用起来都有很强的表达效能”；区别点有四个：（1）“口头用语和书面用语的不同。”“谚语是流传在人民群众口头上的语言，而成语多用在书面语言上。”“成语和谚语在词句上都比较固定，但两相比较，成语的词句却比谚语更加固定。”“我国书面语言比较统一，无论南北东西，使用的成语是一致的……可是谚语就有很明显的地区性。”（2）“表达内容的不同。一般说来，成语表示一般的概念，仅仅表示一种客观的现象，人或事物的特点状态等；谚语表示判断和推理，它概括地反映出深刻的道理或总结斗争的经验。”（3）“成语在句子中是当作词来运用的，可以充当各种句子成分”，而“谚语应用在文章里就和成语不大相同，因为它是表示判断或推理的，一般是个独立的句子，所以它不做句子成分”。（4）“就字面能不能解释看也有区别……成语虽然不一定

都是四字格，但四字格却是最常见的格式。这些凝定成四字格的成语，有的就字面上看可以懂得它的意义……但有些只凭字面却不能了解它的意义……但谚语却没有这种情况，因为谚语是在人民群众口头上流传的，无论从词汇意义或语法组织上说，都是现代人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杨欣安的分析基本上指明了成语和谚语的实质性区别，为后人对此问题展开更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时期熟语研究几乎陷于停顿。改革开放以来熟语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熟语方面的论文、专著大量发表和出版，研究也更加深入细致，熟语词典的编纂也繁荣起来。

1989年5月，刘广和的《熟语浅说》（中国物资出版社，1989）和孙维张的《汉语熟语学》先后出版。这是汉语词汇研究中首部以熟语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专著，它们的出版使熟语研究进入新的高度。

刘广和的《熟语浅说》一书参考了大量的熟语学术成果，作者介绍了他人的成说，也说明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针对一些人把惯用语直接看作三字格的做法，作者指出，这是由于“把注意力放到动宾结构上”造成的。在谈到歇后语前后两部分的关系时，作者首先肯定了温端政的“引注”说，但又指出，“引注”说也会碰上一些困难，比如“半道捡个孝帽进灵棚——哭了半天不知死了谁”、“肚皮上栽桦树——种下隐木疙瘩”，到了具体语言环境里，前后两截儿都是譬喻；孤立地看这两个歇后语，后半截儿对本义说是比喻，它对前半截儿与其说是注释，不如说是补充。这一类很难用“引注”说概括。谈到歇后语的分类，作者不同意一般人把歇后语分为“喻意”、“谐音”两类，因为事实上还存在着既“喻意”又“谐音”的歇后语，如“狗撵鸭子——呱呱叫”、“四扇屏卷灶王——画（话）里有画（话）”。他认为可以把歇后语分别为“谐音歇后语”和“非谐音歇后语”两类，这样的分类标准单一，也可以突出歇后语形式的一个特点。

孙维张的《汉语熟语学》一书共分八部分，依次为：熟语和熟语学；熟语的特点；熟语的分类；成语；惯用语；歇后语；谚语和格言；熟语的形成和发展。

孙维张在《汉语熟语学》一书中指出，“熟语”被译借到汉语后，对这个术语的理解和应用上出现了很大分歧，有下面四种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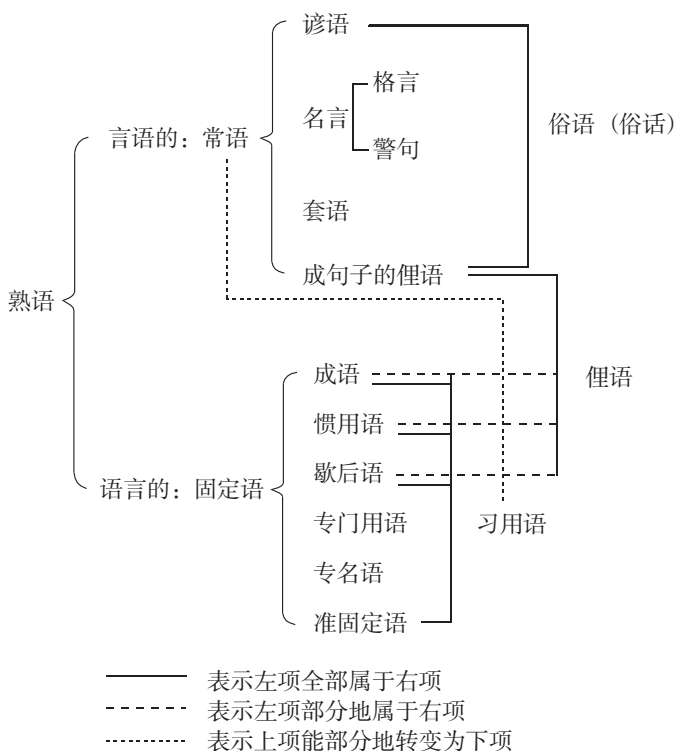


图 5—1 刘叔新的熟语分类图

周荐在《熟语分类问题研究》（中国语言学会第九届学术年会报告论文，1997）一文中对熟语从雅俗的角度进行了分类，具体分类见图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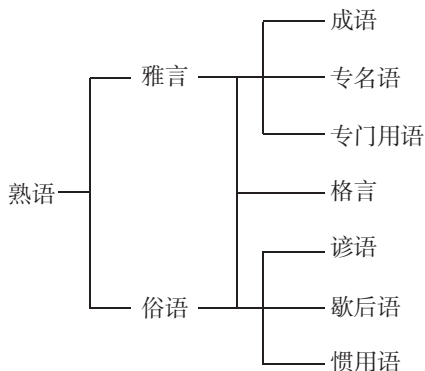


图 5—2 周荐的熟语分类图

90年代熟语研究的成果还突出表现在总结性著作、论文的不断出版和发表方面。周荐的《汉语词汇研究史纲》，符淮青的《汉语词汇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温端政、周荐的《二十世纪的汉语俗语研究》（书海出版社，2000），许威汉的《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等总结性词汇学著作都设专门章节对熟语研究情况做了概括总结和评论，一些综述性论文也对熟语研究做了总结和评论，如晁继周的《二十世纪的现代汉语词汇学》（见《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这些论著对熟语研究颇具参考价值。

汉语熟语的辑录整理在20世纪之前就已经开始并逐步发展。进入20世纪，尤其是“五四”以来，熟语研究更获得极大的发展。虽然对熟语的分类仍处于不断探索之中，但主流的观点把成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等看作熟语的小类。下面我们就对20世纪在谚语、歇后语、成语、惯用语方面的研究进行具体探讨。

二、谚语研究

“谚语”一词较早见于1921年郭绍虞的《谚语的研究》[《小说月报》，1921，2（2）～（4）]一文。

（一）谚语的研究状况

1. 新中国成立前的谚语研究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1919年五四运动高扬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使人们的思想发生深刻变化。1918年2月，北京大学在《北大日刊》上发表征集歌谣的简章。1920年冬，北大歌谣研究会成立。谚语和歇后语的调查研究工作开始。在谚语方面，一批重要论文的发表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郭绍虞的《谚语的研究》一文讨论了谚语的性质，指出谚语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理解。广义的谚语所指的范围过于宽泛，把狭义的谚语作为谚语研究的对象比较适当。作者讨论了谚语与歌谣、格言、寓言的区别。谚语的形式以“美”为主，有句的简短、调的整齐、音的和谐、词的灵巧等四个要素，它们共同的作用，就是便于记忆，便于口耳相传。谚语的内容重“真”重“善”。但谚语中也有“包含的知识是很不正确的，偏向于迷信方面的议论”。该文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特别是对谚语的定义，至今还为许多学者所引用。此文堪称运用现代语言学

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谚语的奠基之作。杜同力的《关于谚语的报告和说明》[《国语周刊》，1925（9）]一文是作者对读者来信的答复。文章认为“谚语是民间流行的格言，或由经验得来的定论，借以互相告诫的话”。谚语与歌谣、谜语、拗语（绕口令）的区别是明显的，最容易和谚语相混的是歇后语。杜氏也讨论了谚语与“熟语”、“经语”、“俗语”、“不完全的歇后语”的区别，但除举了几个例子之外，没有具体说明。任访秋的《谚语之研究》[《礼俗》，1931（6~7）合刊]一文是继郭绍虞《谚语的研究》之后研究谚语的一篇重要论文。该文通过诠释“谚”和“语”的含义，对谚语的性质作了进一步的探讨，给谚语下了新的定义，强调谚语是“一般人相传述的话”，强调谚语“劝戒教训”的作用，这些都应予以肯定。但任氏把“经典故训”作为谚语的来源之一，则是值得商榷的。曹伯韩的《谈谚语》[《太白》，1935，1（8）]、陈以德的《从谚语的搜集谈到口头语的语汇》[《太白》，1935，2（2）]和王国栋的《谚语的收集和整理》[《师大月刊》，1935（22）]内容都和搜集、整理谚语有关。王顺的《北夏农谚的研究》[《教育与民众》，1935，7（1）]一文是20世纪前半叶里有代表性的一篇研究农谚的论文。薛诚之的《谚语的探讨》[《禹贡》，1936（2）]一文分“谚语性质的探讨”、“谚语的要素”、“对于中国古谚的几点考察”等三个部分，是20世纪上半叶继郭绍虞《谚语的研究》之后另一篇全面、系统研究谚语的重要著作。薛文对谚语性质、内容和形式特点的探讨，都明显受郭文的影响，但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到见解，特别是对谚语考源，不再是为考源而考源，而是有比较明确的目的，即对谚语进行“史”的考察，以发现古谚变成今谚的“演变过程”。

20世纪上半叶的谚语研究，基本上改变了20世纪以前重资料辑录轻理论探讨、重考源轻释义、重典籍轻口语的倾向，在理论探讨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最为明显，关于谚语的性质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郭绍虞在《谚语的研究》里所提出的“谚是人的实际经验之结果”的论断，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任访秋指出，谚语“含有劝戒教训的意味”；薛诚之指出，“谚语是人类于各时代所积累下来的实际观察以及日常经验的成果”，进一步提高了对谚语性质的认识。这一时期的谚语研究，还注意把谚语同其他容易混淆的语言形式，特别是同歌谣、格言、歇后语等相比较，指出它们之间的异同，这无疑有助于加深对谚语性质的认识。在讨论谚语性质的基础上，还对谚语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比较全面、系

统的分析。郭绍虞的《谚语的研究》一文在这方面也做了坚实的基础性的工作。这个时期谚语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口语调查，到群众中特别是到农民群众中去搜集第一手资料，成为当时崇尚的一种优良学风，这和当时语文大众化的背景是分不开的。许多学者在实践中积累了经验，摸索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是很宝贵的。重视农谚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是这个时期谚语研究的又一个特点。王顺的《北夏农谚的研究》是这方面的开创性著作。王文关于农谚的性质和功用的论述，关于农谚具有时代性和地方性的论述，都具有重要意义。

这个时期谚语研究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把谚语研究纳入语言学的范畴。有的把它纳入民俗学，有的则把谚语看成是“平民文学”，从而影响了研究的科学水平。

2. 1949—1979 年的谚语研究

马国凡的《谚语的特点》[《中国语文》，1960（11）]是《中国语文》创刊后发表的第一篇研究谚语的文章，它标志着谚语开始成为语言学的一个研究对象，因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作者把谚语的特点归纳为通俗性、阶级性和民族性。杨欣安的《成语和谚语的区别》是全面、系统论述谚语与成语异同的重要文章。王毅的《略论中国谚语》[《民间文学》，1961（10）]主要讨论谚语的性质和分类，以及各类谚语的特点。王氏关于谚语的分类和各类谚语特点的论述，有其可取之处，但“讽劝谚语”和“训诫谚语”之间的界线很难划分清楚，而且“训诫谚语”并不一定都具有“阶级性”。

朱泽吉的《论民间谚语所表现的阶级意识与社会风貌》（《天津日报》，1957-01-05），杨鹏、田光的《对谚语要进行阶级分析》（《天津日报》，1974-11-29）和凌波的《对谚语要作阶级分析》（《新华日报》，1974-11-30）三篇文章比较集中地讨论了谚语是否具有阶级性的新问题，一致认为谚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编的《现代汉语词汇知识》（湖北人民出版社，1973）一书共分八节，第七节“成语、谚语、歇后语”，谚语部分讨论了谚语及其作用和谚语的种类两方面问题。该书认为，谚语是“人民群众口头上流传的通俗、简练、含有深意的现成话”，一般是完整的句子，表示判断或推理。谚语常常是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事情讲明深刻的道理，或总结了社会生活的经验，富有启发和教育意义。恰当地运用谚语，能使说话显得活泼，增强文章的表现力。该书把

谚语分为反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生活经验的三大类。谚语过去多被认为是民间文学的一种，很少作为词汇的组成部分。《现代汉语词汇知识》把谚语同成语、歇后语一起讲述，标志着谚语被视作词汇的组成部分，这是谚语研究上一个重要进展。

重视谚语内容的研究，是这个时期谚语研究的重要特点。这和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密切关系。谚语到底是否有阶级性，如何看待谚语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是谚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个问题还将继续讨论下去。

把谚语作为“熟语”的一种来研究，是这个时期谚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虽然仍然有人把谚语看成是“民间文学”的一种，但已经不是主流。由于把谚语看成是熟语的一种，便更加自觉地运用语言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谚语研究。这是谚语研究的重大进展。

由于谚语逐渐被公认为词汇（或语汇）的组成部分，谚语与歌谣的区别便不言而喻，而谚语与成语的区别便突出起来。马国凡的《谚语的特点》涉及了这个问题，杨欣安的《成语和谚语的区别》更是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的。由于对成语的概念和范围问题也还存在不同的理解，因此关于谚语与成语的关系，有其复杂的一面，一时难有定论，还须继续讨论。

3. 改革开放以来的谚语研究

这一时期是 20 世纪谚语研究的鼎盛时期。研究著作之多，研究成果的丰富，都非往昔可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武占坤、马国凡合著的《谚语》、王勤的《谚语歇后语概论》，以及温端政的《谚语》等著作。

（1）武占坤、马国凡合著的《谚语》。此书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于 1980 年 2 月出版，是我国研究谚语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分为九章：谚语的界说、谚语的思想内容、谚语的形式和风格、谚语的民族特色、谚语的分类、谚语的发展变化、谚语的语法作用、谚语的运用、对消极谚语的认识。

武占坤、马国凡的《谚语》，堪称 20 世纪研究谚语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入的一部专著，不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大大超过前人。在谚语的性质上，强调了“现成话”，即指出谚语是“语言中习用的定型性的现成语汇”；除指出谚语表现实际生活经验外，还表现“感受”。这样，给谚语所下的定义就更加全面、准确。在谚语是否有阶级性的问题

上，既肯定谚语作为一种语言形式，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又同时指出谚语所表达的思想不能不受阶级的影响，这比过去不加分析笼统地认为谚语具有阶级性的说法显然是前进了一大步。在谚语的“创造手法”、“语法结构”、用词造句风格，以及语法和修辞作用等方面，都做了细致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看法。对谚语的发展变化的原因和表现，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对如何看待消极谚语提出了比较切合实际的观点和做法。

(2) 王勤《谚语歇后语概论》里的谚语研究。此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5月出版，只比武占坤、马国凡合著的《谚语》出版时间晚3个月。该书谚语部分共十节：谚语的性质、谚语的民族性、谚语的思想性、谚语的科学性、谚语的艺术性、谚语的构造、谚语的类型、谚语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谚语的作用、谚语的运用。

(3) 温端政的《谚语》。此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语知识丛书”中的一种，1985年6月出版。全书分为七个部分：谚语的名称和性质、谚语的产生和发展、谚语的思想内容、谚语的语义、谚语的结构、谚语的语法功能、谚语的修辞特色和作用。

温氏指出，在古代典籍中，谚语常常单称成为“谚”或“语”；也有在“谚”、“语”之前加“里”、“鄙”、“俗”等称作“里语”、“鄙语”、“里谚”、“鄙谚”、“俗谚”等；明清以来小说，多称作“俗语”、“俗话”、“常言”、“古语”等。“古人所说的谚语，是指在群众口语中广泛流行并世代口耳相传的通俗而简练的语言形式”；近世以来，人们对谚语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的两个方面。广义的谚语和俗语是一个概念，具有三个基本特点：群众性、结构固定、口语性。广义谚语的这三个特点，使它既同歌谣区别开来，又同来自书面语的成语、格言区别开来。狭义的谚语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总结，以传授经验或认识。知识性是狭义谚语在内容上的“根本特征”。由此，温氏把狭义的谚语，即一般所说的谚语，定义为“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的俗语”。温氏指出谚语既然在内容上以知识性为根本特征，这就使它不仅同歌谣、格言，以及来自书面的成语区别开来，而且同歇后语、习用语（惯用语）和口头上常用的成语（俗成语）等其他俗语区别开来。

温氏的《谚语》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一些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如把谚语定义为“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的俗语”。书中关于谚语语义的研究，不仅关系到深刻理解和正确运用谚语，而且对于谚语辞书的

编撰有重要意义。

(4) 孙维张《汉语熟语学》一书中关于“谚语和格言”的研究。此书由吉林教育出版社于1989年5月出版。“谚语和格言”是该书的第七部分,内容包括“谚语和格言的性质和特点”、“谚语、格言的语音结构”、“谚语、格言的语法结构”、“谚语、格言的语义结构(附:谚语格言的分类)”等四个方面。

孙氏认为,谚语和格言同属于“表述性熟语”,基本性质相同,语用功能也相同,但风格特点不同。谚语和格言同成语、惯用语、歇后语的“根本不同点”在于:成语等是语言性质的单位,是语言词汇体系中的成分,语义具有普遍性和概括性,语用上只有指称功能和描绘功能。谚语和格言则是一种言语性的单位。谚语和格言在结构形式方面的特点是“韵语性”,或者说是“诗化”形式;谚语和格言在语义内容方面的特点表现为丰富性、知识性和教育性。谚语和格言在性质和特点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语体风格不同;语义内容特点不同;语源的明确性程度不同。

本时期相关论文论著还有很多,如刘桐孙的《学点谚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马威的《谚语的文学性》[《民间文学》,1979(12)]、马清文的《谚语的韵》[《民间文学》,1979(12)]、高学敏的《民间艺谚学习札记》[《西北大学学报》,1979(2)]、唐启运的《成语谚语歇后语典故概说》(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张如芳的《浅论谚语和格言之异同》[《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4(2)]、蒲申言、纪开利的《谚语和紧缩复句》[《语文教学》,1984(6)]、刘广和的《熟语浅说》、蒋荫楠的《当代谚谣概论》[《安徽大学学报》,1994(3)]等。此外,许多《现代汉语》教材也有谚语方面的内容。

新时期的谚语研究,以武占坤、马国凡、王勤、温端政、孙维张等为代表,不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新的高峰。在广度上,不仅注意对谚语的性质、谚语的内容和形式,以及谚语的产生和发展等谚语自身结构规律方面的问题继续进行研究,而且注意谚语的语用研究,包括谚语的社会功能、谚语的语法作用、谚语的修辞作用,以及谚语的规范化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展现了谚语研究的广阔领域。在深度上,更加注意发掘谚语的内在规律。在谚语的性质方面,除了多方面地探讨谚语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外,还注意探讨更有概括力的本质特点。在内容方面,把知识性作为谚语的本质特征,把以传授知识为目的作为认定谚语

的主要标志,这比以前把谚语仅仅看成是“人的实际经验之结果”更具有理论深度,为区分谚语与成语、歇后语、惯用语等提出了更加便于掌握的标准。在形式方面,除了继续探讨谚语的语音结构和修辞手法方面的特点外,还特别注意研究谚语的语法结构。通过对谚语语法结构的研究,可以认识到谚语构造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于正确理解和掌握谚语有重要的作用,对于汉语口语的句型研究也有特殊意义。重视谚语的语义研究,是本时期谚语研究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在这方面,温端政和孙维张做了一些具有开拓性的工作,但总的来说,还是初步的。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特别需要与谚语辞书编纂结合起来,用语义研究的成果来指导谚语的释义,提高谚语辞书编纂的质量。

(二) 谚语的收集整理和谚语辞书的编纂

在20世纪以前,谚语的收集、整理和谚语类辞书的编纂、出版已在进行。这一工作可追溯到东汉时代崔寔纂辑的《农家谚》。其后几乎各代都有谚语类的工具书纂辑出版,如唐代李义山的《杂纂》、宋代郭茂倩的《古乐府解题》、元代刘履的《风雅翼》、明代杨慎的《古今谚》、清代曾廷枚的《古谚闲谭》等。这些著作都为谚语的收集、整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半个世纪,谚语的收集成果有史襄哉的《中华谚海》(中华书局,1927)、朱雨尊的《民间谚语全集》(世界书局,1933)、费洁心的《中国农谚》(世界书局,1933)、赵质宸的《河南谚语集》(北平著者书店,1933)。

新中国成立初期谚语的收集整理和谚语辞书的编纂工作,一方面有对以前研究成果的继续整理,如清人杜文澜纂辑的《古谣谚》一书经周绍良校点于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58年、1959年、1960年分三册出版的《新谚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编纂的《中国谚语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四川《农民日报》等编纂并于1963年、1964年分两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川谚语》;另一方面,不再把收集、整理、出版工作局限在汉语这一种语言上,同时展开了对国内少数民族地区流行的民族语的谚语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有应社会急需而编成的谚语类的工具书,如潘宪良的《谚语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76)。

改革开放以来谚语的研究工作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也使得谚语的收集整理和谚语类工具书的编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新的高峰。从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末,国内出版的谚语类工具书有近百种之多,其中包括以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谚语为收集对象的辞典 30 余种,以人生、伦理、思想、修养、时代、地域方言、人的年龄、行业等为专题纂辑成的谚语类工具书 20 余种。

新时期编纂出版的谚语类工具书很多,这里择要介绍其中的几种:无锡师范学校编写的《汉语谚语词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81)。该书卷首的“凡例”说:“本词典共收条目 2 393 条,其中社会谚语(包括部分其他熟语)2 000 条,农谚 204 条,气象谚语 139 条,卫生保健谚语 50 条。”此书收条虽然不多,但是将谚语分为若干种分门别类地进行收列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张毅编著的《常用谚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收录古今常用社会谚语 3 200 余条。姚方勉主编的《谚语词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是在无锡师范学校《汉语谚语词典》的基础上修纂而成的,收古今常用谚语 6 000 余条,其中大部分为社会谚语,小部分为专科谚语,如气象谚、农谚等。耿文辉编著的《中华谚语大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收条达 1.4 万余条,每条都加注释,具有收条多、释义比较准确等优点。张鲁原、胡双宝编著的《古谚语辞典》(北京出版社,1990)是以古代汉语中的谚语为收取对象的词典。该词典共收截至清末各类著作中比较常见的反映社会生活的谚语 5 461 条。生僻偏窄的方言谚、农谚、气象谚、专门行业谚、地方人物谚等未加收录。

三、歇后语研究

“歇后”这一名称是在唐代出现的。《旧唐书·郑綮列传》中就已提到过所谓“郑五歇后体”(一种“歇后”体诗)。“歇后语”一词也早已出现。但古人所说的“歇后语”指歇后诗和一种文字游戏,如清代褚人获《坚瓠二集》中有“一日,寺僧进面,因热伤手忒地,黄作歇后语谑之曰:‘光头滑一,光头浪一,光头练一,光头勒一。’谓‘面汤抻忒’也”。而我们现在所说的歇后语,古人称为“俏语”、“方语”、“市语”,而更多的是统称为谣谚。直到 20 世纪初,白启明的《采辑歌谣所宜兼收的——歇后语》[北大歌谣研究会《歌谣周刊》,1924(44)]一文发表后,才把“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这种语言形式叫做歇后语。

(一) 歇后语的研究状况

1. 新中国成立前的歇后语研究

1920年冬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后，歇后语被作为“民众文艺”的一种，和谚语一样受到关注。调查和研究工作逐步展开，特别是到了30年代，围绕着歇后语的性质和名称等问题，曾经开展了热烈的讨论，为此后的歇后语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这一时期有关歇后语的论著有白启明的《采辑歌谣所宜兼收的——歇后语》，这是20世纪研究歇后语的首篇论文。全文分为“引言”、“歇后语本身的研究”、“歇后语中的附带收获”、“歇后语与谚语的比较”、“歇后语与谜语的比较”、“总结”六个部分。傅振伦的《谜语歇后语研究之一斑》[《歌谣周刊》，1924（68）]，内容分“通行于直隶新河的几首歇后语”、“谜语举例”、“世人对谚语之误解”三个部分。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大江书铺，1932）一书第七篇“藏词”一节里把“藏词”分为“歇后藏词语”和“抛前藏词语”。陈氏认为“新兴的歇后语”来源于“歇后藏词语”，并把歇后语作为一种修辞格式，这些认识对后来也有一定的影响。温锡田的《论“俏皮话”》[《国语周刊》，1933（91）；北平《世界日报》，1933-06-24]；《再论“俏皮话”》[《国语周刊》，1933（92）；北平《世界日报》，1933-07-01]，在此首次发生了歇后语的“名实”之争。汪锡鹏的《歇后语的研究》[《文艺月刊》，1935，7（2）]，全文分“歇后语与歇后诗及截尾语的区别”、“歇后语与谚语”、“歇后语与‘隐’或‘隐语’”、“歇后语与谜语”、“歇后语的特质”、“歇后语的分类举例”和“结论”七部分。汪氏把歇后语的前一部分改称为“提示语”，并认为“目的语”是“成语或俗语”的歇后语，提示语和目的语之间存在比喻和被比喻的关系。这个说法对后来的歇后语研究有一定影响。黄华节的《歇后语》[《太白》，1935，2（6）]和《略谈“缩脚语”》[《太白》，1935，2（9）]认为，歇后语不属于“民间艺术”，而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属于词汇范畴；歇后语前后两部分“一律”是“比喻”与“说明”的关系，这比汪锡鹏的观点（仅限于“目的语是一句成语或俗语”的歇后语）更前进了一步，与陈望道提出的“上譬”“下解”一样，对于后来的歇后语研究有很大的影响。黄文不足之处在于认为歇后语是从“自注格谚语”发展来的。实际上歇后语与谚语的区别，从本质上说，不在于前后两部分之间停顿的长短，或者书写时中间是用逗号还是破折号，而在于前后两部分之间内在的结构关系。至于歇后语的前后两部分之间是否一律是“比喻”与“说明”的关系，则是至今还在继续讨论的问题。樊宾的《我也来谈谈歇后语》[《太白》，1935，

2 (10)] 主要是为了阐述对陈望道给黄华节《歇后语》一文所加按语的看法而写的。全文分“歇后语的名称”、“譬解的历史”、“研究譬解的注意点”三个部分。樊氏认为,“譬解”除了“当做一种文学去研究而外,主要的该当是语言学的研究”,“还可以用社会学去研究”。李纪生的《民众“解后语”研究》[《中华教育界》,1947,1 (9)],全文分为“什么叫做‘解后语’”、“‘解后语’的功能”、“‘解后语’内容和取材的分析”、“‘解后语’的创制和应用”四个部分。李氏认为歇后语都是“前语解说后语”的,“前语的作用,只在解说后语”,因此主张把歇后语称为“解后语”。这种看法同陈望道等的看法正好相反。

新中国成立前,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汉语歇后语的理论研究,以当时的“大众语运动”为背景,气氛非常热烈,取得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涉及的主要问题有:

(1) 歇后语的名称。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歇后语本来另有所指,现在讨论的这种语言形式不宜再叫歇后语,主张叫“譬解语”、“缩脚语”、“俏皮话”、“解后语”等;另一种意见,认为歇后语的叫法比较普遍,主张还是叫歇后语。

(2) 歇后语的性质。也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歇后语和歌谣、谜语、谚语一样属于“平民文学”、“民众文艺”;一种认为歇后语不属于“民间文艺”,而是一种有艺术的“大众语”,属于“俗语”。同时,比较具体地讨论了歇后语与隐语、谚语、谜语、“截尾语”等的异同,认为歇后语是一种有“特质”的独立存在的语言形式。

(3) 歇后语的构成。一致认为歇后语都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但对两部分之间的关系,认识不一。

(4) 歇后语里后一部分的构成。一致认为,歇后语的后一部分,在形式上有不谐音和谐音两种;在表义上有本义和转义之别。

(5) 歇后语的来源。大致上有四种意见:一是认为来源于谚语,主要是“自注格谚语”;二是认为与谜语有关(或来源于谜语,或与谜语同源);三是认为与“风人”有关,歇后语是“风人”的俗称,“风人”是歇后语的雅号;四是认为来源于“歇后藏词语”,是“歇后藏词语”的“发展现象”。

(6) 歇后语的修辞特点。认为歇后语的主要特点是“隐语”不隐,把后一部分说出来,以加强听者的印象;同时有“调侃”、“讽刺”等作用。

(7) 歇后语的功能。除了修辞作用外,还强调歇后语的认识和教育功能。

2.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歇后语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研究的条件得到了根本改善,歇后语研究出现了新的热潮,除了继续重视歇后语性质和形式方面的研究外,还更加重视歇后语内容的研究,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论著。

欧阳德的《北京歇后语介绍》(《光明日报》,1950-03-22)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歇后语。姚念琴的《谈“譬解语”》(《大公报》,1952-03-26)认为譬解语“跟歇后语是不同的”,“乃是由歇后语演变而成的另一种形态”。此外还有何明延的《谈“歇后语”》[《语文知识》,1957(6)],程达明、黎运汉的《试谈歇后语》[《中山大学学报》,1963(1~2)合刊],于澄之的《民间歇后语》[《河北文学》,1963(4)]。1953年9月25日茅盾在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的报告引起了《中国语文》关于歇后语是否是文学语言的讨论。《中国语文》1954年第5期发表了朱伯石的《歇后语是“语言游戏”吗?》和张寿康的《歇后语是不是文学语言?》两篇文章,文中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歇后语经过加工提炼以后可以作为文学语言。讨论也涉及了歇后语的起源和演变问题。

本时期歇后语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注意从内容上研究,存在两种比较明显的倾向:一种是认为歇后语是庸俗、低级趣味的,是小资产阶级以至封建、落后、保守思想意识的产物,应当从文学语言里排除;另一种则认为歇后语产生于社会,而又对社会起着积极的作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是当时特定时代条件下社会思潮的反映。

本时期歇后语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把歇后语作为一种修辞方式,因此,比较重视歇后语修辞作用方面的研究。在这方面,肯定多于否定。

在对歇后语语言形式的研究上,有新的进展,其主要成果可以归纳如下:

(1) 关于名称问题,虽然有“譬解语”、“缩脚语”、“俏皮话”等多种说法,但都没有被普遍接受,多数人还是叫做歇后语。即使像茅盾这样有影响的人物提出另起名称的建议,也没有得到响应。

(2) 歇后语前后两部分的关系,公认为是“譬喻(比喻、比方、喻体)一解答(解释、说明)”的关系。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异议。

(3) 认为歇后语后一部分省略,是歇后语结构的本来形式,也是歇后语运用的本来格式。歇后语的名称即由此而来。这种认识被多数人接受,是歇后语名称得到确认的一个重要原因。

(4) 关于“譬喻—解答”式歇后语的起源问题,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从“本来的或‘正规’的歇后语”发展、演变来的;一种认为“譬喻—解答”式歇后语由来已久,是“在各阶层群众中产生的”,而“不是首先从某些上层分子那里产生的”。

和 20 世纪上半叶相比较,本时期的歇后语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总体上看,还是沿用了原来的某些观点,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3. 新时期的歇后语研究

本时期的汉语歇后语研究,以马国凡和高歌东的《歇后语》、王勤的《谚语歇后语概论》、温端政的《歇后语》和谭永祥的《歇后语新论》等著作为代表,把歇后语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繁荣的阶段。

早在 1961 年,马国凡就在《谚语·歇后语·惯用语》(辽宁人民出版社,1961)一书里,对歇后语作了初步研究,与高歌东合作的《歇后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在前一著作的基础上,对歇后语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全书共分八个部分:“歇后语的来源和性质”、“歇后语的结构”、“歇后语的发展和变化”、“歇后语的语法作用”、“歇后语的修辞作用”、“歇后语的运用”、“歇后语的规范化”、“歇后语选编”。马氏等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发掘了不少新的资料,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歇后语研究体系。

王勤的《谚语歇后语概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一书对歇后语的研究也比较全面,对一些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如认为人们所说的“俏皮话”,实际就是歇后语,否定了马国凡等关于歇后语来源于俏皮话的说法;对歇后语“比喻部分”的表现方法,以及“比喻部分”和“解释部分”的关系作了比较具体、全面的概括。

温端政的《歇后语》(商务印书馆,1985)一书共分七个部分:“歇后语的名称和性质”、“歇后语的来源”、“歇后语的结构”、“歇后语的语义”、“歇后语的语法功能”、“歇后语的修辞作用”、“歇后语的规范化”。温氏有关歇后语的论著发表后引起较大的反响,反对和赞同的都有。温氏所提出的观点是否正确,有待实践检验。但能引起大家讨论,表明对歇后语的研究已经起到了某种推动作用。

谭永祥的《歇后语新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一书共分十一

个部分：歇后语概说；歇后语跟比喻、藏词的区别；歇后语跟谚语、成语的区别；歇后语跟谜语、民歌中双关语的区别；歇后语的来源；歇后语的分类；歇后语的特点；歇后语的创作取材；歇后语的艺术性；歇后语的运用；歇后语的规范化。

本时期的歇后语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出前两个时期，但讨论得最热烈的问题，还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和 50 年代已经讨论过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

(1) 关于歇后语的名称问题。早在 30 年代初期，陈望道等已经指出，歇后语这个名称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前人说的‘歇后语’”，“可以称为‘歇后藏词语’”；一是指“新兴的歇后语”，也叫“譬解语”，即利用“譬解”来创造的歇后语，这种歇后语可以另称为“缩脚语”，那时也有人主张叫做“俏皮话”，或就叫“譬解语”。到了 50 年代，茅盾指出，为了区别于“本来的或‘正规’的歇后语”，现在人们所指的歇后语，“应当有一个另外”的名称，但茅盾没有具体提出改用什么名称。到了 80 年代，温端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认为学术名称应反映所称事物的本质特征，同意茅盾的意见，并建议改名为“引注语”。但多数人认为，歇后语这个名称已为人们所接受，要改变很难；同时认为“名实不符的事物并非偶见”，主张仍叫歇后语，不同意改变。

(2) 构成歇后语的前后两个部分在内容上是什么关系一直是歇后语研究的热门话题。20 年代刚开始研究时，有人认为前一部分是“起语”或“提示语”，后一部分是“目的语”。到了 30 年代，陈望道提出“上截是譬，下截是解”后，多数人认为前一部分是“比喻”，后一部分是“说明”，几乎成为定论。到了 80 年代，温端政认为，歇后语前后两个部分之间应是“引子—注释”的关系。这个说法得到不少人的赞同，但认识并不完全统一，有的认为是“话题—说明”的关系，有的则认为是“语面—语底”的关系。

(3) 关于歇后语的后一部分是否可以“歇”去的问题。30 年代，以温锡田为代表，倾向于认为后一部分原则上不能“歇”去，故主张把歇后语叫做“俏皮话”。50 年代，以张瓌一为代表，认为可以单说前一部分，把后一部分省去，并认为这是歇后语名称的由来。从此，张说居于支配地位，一直沿袭到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温端政、谭永祥等提出歇后语以“不歇后”为常，“歇后”是有条件的，使人们开始恢复了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认识。

(4) 关于歇后语的来源问题。歇后语来源于民间，是群众创造的，这一点没有分歧。分歧在于歇后语这种语言形式的具体来源。这在 30 年代就有不同意见；50 年代在讨论歇后语是否是文学语言问题时，曾经涉及这个问题；80 年代讨论得尤为热烈。30 年代所提出的来源于谚语、谜语、“风人”或“歇后藏词语”等说法，在 80 年代都还有人坚持。还有的认为来源于“隐语”、“俏皮话”，或来源于比喻。也有人认为来源是“多元”的。歇后语结构形式的独特性，使各种解释都可以找到某种根据，尚待形成一致的说法。

(5) 关于歇后语的分类。在 30 年代，汪锡鹏曾根据“目的语”（歇后语的后一部分）把歇后语分为四类。后来，多数倾向于根据后一部分是否运用谐音，把歇后语分为“喻意”和“谐音”两大类。80 年代，温端政对这种分类法提出质疑，认为“谐音”也是建立在“喻意”基础之上的，与“喻意”并不对立，提出根据后一部分对前一部分“注释”的方式，把歇后语分为“描写性”、“判断性”、“说明性”、“反问性”和“感叹性”五类；谭永祥提出分为“喻意型”和“会意型”两大类；孙维张则主张分为“比喻式”和“双关式”两大类。各种分类法都有一定的根据，难以取得一致意见。

此外，本时期歇后语研究还开拓了一些新的领域，主要是加强了歇后语结构的语法研究，重视了歇后语的语义研究、歇后语在运用中的语法和修辞的功能研究，以及歇后语的规范化研究。

（二）歇后语的收集整理和歇后语辞书的编纂

歇后语的收集工作在 20 世纪上半叶已有学者进行，当时整理出来的歇后语通常被放到俗语类的工具书里或谚语类的工具书中，没有独立成书。如胡朴安的《俗语典》、孙锦标的《通俗常言疏证》。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少歇后语在收集整理出来之后被收入其他类别的工具书中，如陆澹安的《小说词语汇释》。70 年代末歇后语类的工具书开始独立编辑出版，如建湖县文教局编写的《歇后语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79）、黄民裕等编写的《歇后语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等。

1978 年以来所出版的歇后语类工具书的数量有 40 多种，各具特色，影响较大的几部工具书有：宁渠编写的《古今歇后语选释》（1 版，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2 版，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一书，是我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走向改革开放新时期所出现的一部有代表性的重要的歇后语类工具书，影响较大。李兴望、闵彦文编写的《歇后语大

全》(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1984年增订再版)是80年代初出版的收条较为丰富的一部歇后语工具书,收取了常用歇后语1.2万余条。温端政、沈慧云、高增德合编的《歇后语词典》(北京出版社,1984),1994年北京出版社出了新版,更名为《中国歇后语辞典》。作者从收集到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汉语歇后语7000条中精选出了2000余条,并从正式出版的书籍和报刊当中收集了大量例句作为书证。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资料室、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编写的《歇后语大全》(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一书最大特点是收条达6万余条。孙治平、黄尔逸、蒋宝珊、洪善鼎、王文华合编的《中国歇后语》(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所出系列丛书“语海”的第一种。从“前言”可知,此书资料来源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编写《歇后语四千条》积累的近5万条条目;上海文艺出版社向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征集的4万多个条目;编者从群众口头采集的3万多个条目;从《中国谚语资料》、《歇后语大全》、《古今歇后语选释》等专集和古今文学书籍中辑录的两万多个条目,总计收集了约15万条歇后语。作者花了一年半时间,对这些数量可观的歇后语进行研究和反复筛选,最后选定2万条左右有使用价值或保存价值的歇后语。《中国歇后语大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一书是在主编者欧阳若修的《歇后语小词典》的基础上补充收进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中的一些歇后语编纂而成的,收条总计12580个。袁晖主编的《中华歇后语大观》(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收常见歇后语25000余条。

四、成语研究

“成语”一词在20世纪以前就已出现,徐耀民《成语的划界、定型和释义问题》[《中国语文》,1997(1)]一文中即指出,“成语”一词较早见于元代刘祁的《归潜志》,在卷十二中有“古文不宜蹈袭前人成语……四六宜用前人成语,复不宜生涩求异”。此处成语指习用的古语。明清“成语”一词使用更频繁。1915年版的《辞源》对“成语”的解释是“谓古语也。凡流行于社会,可征引以表示己意者皆是”。与今天的理解有明显的不同。

(一) 成语的研究状况

新中国成立前关于成语的论文不多。在白话文运动时期出现排斥成语的情况,佛郎[《成语跟俗语》,《太白》,1934(1)]认为“文言成语

是一种叫人思想兜圈子的笔头语，俗语却是大众口头语”。40年代余冠英〔《谈成语错误》，《国文月刊》，1940，1（2）〕阐述了成语的特殊作用：“用成语得当可助文字简洁，有时且能令语势生动。”方绳辉在《成语和成语的运用》〔《国文杂志》，1943，2（3）〕中讨论了成语和词的划界问题，认为“成语应当是‘语’或‘句’”。这一时期对成语的内涵的理解仍是习用的古语。

50年代，吕叔湘、朱德熙在《语法修辞讲话》中提到成语的现象时说，“成语多数是四个字的。最普通的格式是上下两截用对对子的办法连在一起。”1955年，周祖谟在《谈“成语”》〔《语文学习》，1955（1）〕一文中指出：“成语就是人民口里多少年来习用的定型的短语或短句。其中大部分都是从古代文学语言中当作一个意义完整的单位承继下来的……成语的结构是固定的，一般都是四个字，它是相沿已久、约定俗成的具有完整性的东西，所以称为‘成语’。”周祖谟在文章中还就成语的来源和结构作了分析。对成语的来源，他指出：“成语的来源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从书本上来的，一方面是从口语里传下来的。从书本上来的又有两类，一类是从古代寓言或历史故事里来的成语，一类是古典作品中的成句。”对成语的结构，周文的分析也很细致：“成语一般都是四个字，但是它的结构形式则有种种不同”，有些“都是一个句子的形式，具备主语和谓语”，“有些是两个句子形式结合在一起的……”还有些成语是不能用现代语法来分析的，特别是节缩而成的成语”。周祖谟对成语的这些认识，比40年代学者对成语的认识更加深刻和科学。这些认识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同年，朱剑芒在《成语的基本形式及其组织规律的特点》〔《中国语文》，1955（2）〕一文中提出“谚语就是成语”的说法。1956年孙慎之发表《试谈“成语”》〔《山东大学学生科学论文集刊》，1956（1）〕，批评朱剑芒的这种说法“不顾语言事实”，在比较了成语和词、熟语中的其他单位的异同之后又指出：“成语和歇后语不同，和谚语不同，不能说是‘老套的比喻’，不包括和它形似的某些复音词，也不仅限于文言的；它是社会上（书面、口头）流行习用的描述某种普遍事物的一般性状的精巧整练的固定词组，它一般是作为句中的描述部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在对成语的理解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对立。对成语历来有广义、狭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凡固定的词组和语句都是成语，大致与“熟语”的概念相当；另一种理解，成语是熟语当中的一类，是一种固定词组。对此，张志公有过

细致的说明。张氏说：“成语有广狭二义。广义地说，凡是习惯上常常作为一个整体说的语言单位都叫作成语，里边包括：（一）各种固定格式（或称固定词组），如‘三三两两、七上八下、三五成群、得心应手、任劳任怨’等；（二）谚语、格言、俚语等。狭义地说，只有（一）才叫成语。”^[6]在这一阶段，有的学者对成语持广义的理解，如昌煊、全基在《论成语》[《中国语文》，1958（10）]一文中说“从结构上看，成语是结合得比较紧的词组或句子”；有的学者对成语持狭义的理解，如黄再春在《成语做谓语的句法功能》[《中国语文》，1958（10）]文中说“成语的作用等于一个词或者一个词汇单位”。主张对成语作狭义理解的学者更多一些，涉及到成语的几部重要著作也大都只把成语看作是熟语中的一类而不把它看作是熟语的等价物，如周祖谟的《汉语词汇讲话》、王勤和武占坤的《现代汉语词汇》、马国凡的《成语简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59）。从学科发展日益精细的趋势来看，对成语作狭义的理解更有利于对语言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在成语是否具有意义的双层性的问题上，这一阶段学者们的观点有明显分歧。如何霭人曾表示：“成语一般是用来比拟或讽喻，言在此而意在彼。”^[7]欣向则认为，更多的成语，“它们的含义均如字面，言在此，意亦在此”。“成语……可分两类：具有比喻义、引申义的与只有字面义的。”^[8]

60年代初潘裕明编著了《列宁著作中的成语典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1962年，武占坤发表《有关“成语”的几个问题》[《河北大学学报》，1962（2）]提出：成语可分“组合性成语”和“非组合性成语”两类。文中还提到，成语跟词一样，可有同义成语、反义成语和多义成语。武氏所谈的虽只是成语，但是对他类熟语的研究也有启示作用。

“文化大革命”时期成语研究几乎陷于停顿，改革开放以来成语研究才获得长足发展。这方面的专著有马国凡的《成语》（修订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史式的《汉语成语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向光忠的《成语概说》（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刘洁修的《成语》（商务印书馆，1985）等。

马国凡于1978年出版的《成语》是在1973年出版的《成语概论》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而1973年出版的《成语概论》又是以马氏1959年出版的《成语简论》为蓝本的。近20年的积累，使《成

语》较《成语概论》、更较《成语简论》篇幅大得多，所谈的内容也更为丰富。在《成语》中，马国凡从“成语的性质”、“成语的范围”、“成语的形成”、“成语的发展和变化”、“成语的意义和结构”、“成语的运用”、“成语的规范化与成语词典”七个方面对成语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讨。1982年《成语》的修订本出版，1997年出了第3版，但主要内容未做大的改动。

史式的《汉语成语研究》是系统地研究成语长篇专著中较早的一部。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汉语成语的历史回顾”，谈何谓成语、成语来源、派生方法、成语与谚语典故的关系、四字成语、成语发展等问题；中篇“现代汉语成语研究”，谈现代汉语成语的范围、读音释义、语义变化、语法结构、成语的运用活用改造、成语词典等问题；下篇“汉语成语的发展趋势”，谈毛泽东对成语的运用，老成语的淘汰、新成语的产生，简化汉字、汉语规范化、文字拼音化、文化普及与成语的关系等问题。作者对当时还未深入开展的成语、熟语学研究中的各个问题作了探讨，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材料比较丰富，不少见解有启发性，但本书也有不少缺点，反映出当时熟语学研究中理论准备不足和不良学风、文风的影响。

改革开放至80年代末，成语研究方面的论文有不少。向光忠的《成语与民族自然环境、文化传统、语言特点的关系》[《中国语文》，1979(2)]一文就从民族性的角度着力探讨了成语的一些特点。刘叔新1982年在《固定语及其类别》(见《语言研究论丛》，第二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一文中发表了他对成语性质问题的意见。刘氏认为：“成语的重要特征，凭之基本上能同所有其他固定语区别开来的特征，是表意的双层性：字面的意义具有形象比喻作用或使人联想的作用，透过它曲折地表现仿佛处于内层的真实意义。固定语中，凡表意具有双层性的单位，无论只用于口语或书面语，也无论具有悠久的历史或只产生于现代，都是成语。例如‘三长两短’‘滴水不漏’‘穿小鞋’‘七上八下’‘碰一鼻子灰’和‘甚嚣尘上’‘为渊驱鱼’‘功亏一篑’‘沆瀣一气’‘邯郸学步’‘杯弓蛇影’‘越俎代庖’‘芒刺在背’和‘解剖麻雀’‘下马观花’‘有的放矢’‘遍地开花’等等，都同样具有成语的资格，是不应有什么疑问的。”刘洁修在《成语》一书中表述了与刘叔新大致相同的看法，他把“闭门羹”、“莫须有”、“翘尾巴”、“拦路虎”等看作“三字成语”。两位的观点虽尚未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代表一种看法。

本阶段还有一些单篇论文讨论了成语中的问题,如梁晓红《源于佛教的成语》[《语文园地》,1985(1)]、姚鹏慈的《同源成语刍议》[《杭州大学学报》,1987(1)]、傅克诚的《汉语成语与四字格》[《逻辑与语言学习》,1988(5)]。

90年代成语研究方面的论文和著作主要有:倪宝元和姚鹏慈的《成语九章》(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李启文的《从成语特点看汉语词义的人文性》[《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90(3)]、张万起的《汉语成语研究的新成果:评〈汉语成语考释词典〉》[《辞书研究》,1990(4)]、卢卓群的《成语研究和成语词典的编纂》[《湖北大学学报》,1991(5)]、谢芳庆的《试论成语的形式变化》[《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2(2)]、聂言之的《通用成语与异体成语》[《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2)]、薛从军和陈德荣的《异形成语浅析》[《语文建设》,1992(6)]、祝鸿熹的《汉语四字成语的意义切分》[《语文建设》,1992(8)]、卢卓群的《四字格成语的有形断裂及其作用》[《世界汉语教学》,1992(4)]、梁晓虹的《汉语成语与佛教文化》[《语言文字应用》,1993(1)]、卢卓群的《十余年来的成语研究》[《语文建设》,1993(7)]、卢卓群的《毛泽东著作中的成语异变现象》[《湖北大学学报》,1993(5)]、徐耀民的《成语及成语辞书的几个问题》[《辞书研究》,1994(6)]、倪宝元和姚鹏慈的《等义成语四题》[《中国语文》,1995(1)]、刘铁军的《谈成语的活用》(见《汉语言文化研究》,第五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章新传的《成语广告日见其多原因分析》[《上饶师专学报》,1995(2)]、李娴霞的《论汉语成语的价值系统》[《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5(3)]、王吉辉的《成语的范围界定及其意义的双层性》[《南开学报》,1995(6)]、陈子骄《浅谈广告标语中成语的语义转移》[《济宁师专学报》,1996(2)]、曹瑞芳的《〈论语〉成语研究》[《山西大学学报》,1996(3)]、韩希明的《明清小说中的成语俚俗化现象漫议》[《南通师专学报》,1996(2)]、倪宝元和姚鹏慈的《“同素异序”成语辨》[《杭州大学学报》,1996(3)]、邢福义的《关于成语换字活用》[《语文建设》,1996(12)]、胡毓智的《成语“嫁接”式广告得失谈》[《宜春师专学报》,1996(6)]、徐耀民的《成语的划界、定型和释义问题》[《中国语文》,1997(1)]、周荐的《论成语的经典性》[《南开学报》,1997(2)]、王吉辉的《典故与成语》[《汉语学习》,1997(2)]、王启明的《广告中成语的创造性运用,也谈“‘咳’不容

缓”之类》[《新疆教育学院学报》，1997（1）]、周荐的《成语问题四论》（见《纪念马汉麟先生学术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周荐的《成语规范问题谈略》[《汉语学习》，1998（3）]、张铁文的《成语的数量及产生年代》[《语文建设》，1999（5）]、王金鑫的《〈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成语注音问题》[《辞书研究》，2000（4）]、莫彭龄的《汉语成语新论》[《江苏社会科学》，2000（6）]等。

卢卓群《十余年来的成语研究》一文指出，改革开放十余年出版的成语专著、专书有 30 多种，成语词典、手册 80 多种，发表的论文达 100 多篇。

周荐在《熟语的经典性和非经典性》中提出：应以经典性来为熟语分类，有经典性的熟语为雅言，无经典性的熟语为俗语；成语是雅言的代表，谚语、歇后语、惯用语等则属俗语。在《论成语的经典性》一文中周荐又进一步论证指出四字格是雅言的范式，成语以四字格为基本模式正是由于成语是雅言的代表。

徐耀民的《成语的划界、定型和释义问题》一文对“成语”一词的产生和含义的演变做了较为细致的考察。

随着各类成语词典的不断出版，对成语的计量研究和产生情况的研究条件逐渐成熟，张铁文的《成语的数量及产生年代》一文分析了常用的规模较大的成语词典《汉语成语大词典》（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 年；收录古今成语 24 808 条）和《中国成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年；收释古今成语 17 934 条）等词典，作者认为成语的总数可能达二三万条，如果排除古今和变体等因素，汉语成语的总数可能为一万条左右，现实生活中较常用的成语则只有三四千条。作者根据《成语考释词典》对 6 000 多条成语的产生年代进行了统计，结果见表 5—1：

表 5—1 各历史时期成语出现数量统计表

朝代		该时期出现的成语条数	占成语总数的百分比（%）
先秦	春秋以前	88	1.21
	春秋时期	320	4.41
	战国时期	232	3.19
秦		1	0.01
两汉		479	6.59

续前表

朝代		该时期出现的成语条数	占成语总数的百分比 (%)
三国		96	1.32
两晋		198	2.73
南北朝	南朝	270	3.72
	北朝	71	0.98
隋		16	0.22
唐		711	9.79
五代		75	1.03
两宋		1 251	17.22
金		36	0.50
元		401	5.52
明		854	11.76
清		1 494	20.57
总计		6 593	90.77

(二) 成语的收集整理和成语辞书的编纂

新中国成立前成语辞书出版很少。1925 年郭后觉的《国语成语大全》(中华书局, 1925) 出版, 全书收词语 3 200 多条, 实际包括词、词组、谚语、歇后语等。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出版的成语辞书也不多。有代表性的是《汉语成语小词典》(中华书局, 1958), 该词典收常用成语 3 000 多条, 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用现代汉语解释成语意义的词典, 由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5 级语言班编纂, 后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历经多次修订, 至今仍是一部颇有影响的小型成语词典。

改革开放以来, 成语词典编纂非常活跃, 成语词典大量出版, 呈现繁荣局面。《汉语成语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8) 由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编纂组编纂, 收成语 5 500 多条, 除释义外, 说明成语出处或摘引较早用例, 多次修订。1986 年又出增订本, 收成语增至 8 700 多条。《汉语成语大词典》(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朱祖延主编, 收成语 17 000 条。《中国成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7), 商务印书馆汉语工具书编辑室、汉语大词典编纂处、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词编辑室

编,收成语 17 934 条。大部分条目直接取材于历代文献,提供了成语结构形式、语义内容、源流用例等较多信息。《汉语成语考释词典》(商务印书馆,1989),刘洁修编,收成语 7 800 余条,另收异体约 10 000 条,词典在考源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书证力求采用第一手材料,尽可能查考出成语的最早出处,颇具参考价值。《汉语成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收录古今成语 24 808 条。刘万国、侯文富主编的《中华成语辞海》(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收词目 4 万余条,以古今成语为主,也收格言、谚语、俗语等。《汉语成语大词典》(世纪出版集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是根据《汉语大词典》改编的成语词典,收古今成语 2 万余条。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数种分类成语词典,如王理嘉、侯学超的《分类成语词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王勤、马国凡的《分类汉语成语词典》(广东教育出版社,1988),胡省三主编的《中国成语分类大词典》(新世界出版社,1989)等。特殊用途的成语词典也开始出现,如史有为主编的《成语用法大词典》(大连出版社,1997),倪宝元主编的《成语范例大词典》(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倪宝元、姚鹏慈的《汉语成语辨析词典》(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

五、惯用语研究

1956 年,俞敏、黄智显在《语言学概论讲义》中称“熟语是某些语言里特有的词组”,并把熟语与成语、歇后语等并列起来,上面冠以“惯用语”的总名。这是“惯用语”这个名称的较早用例。

马国凡的《谚语·歇后语·惯用语》一书中用惯用语来指称“碰钉子”、“露马脚”、“吃不消”这类固定语,作者认为惯用语是一种意义整体化了的定型的词组。60 年代出版的一些现代汉语教材,如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开始把惯用语作为一种语汇单位,与成语、歇后语、谚语、格言等并列,归入熟语。从此,惯用语正式作为语言学术语并逐渐流行。

(一) 惯用语的研究状况

研究惯用语的论著主要发表在 80 年代以后。

马国凡的《惯用语的性质》[《语言文学》,1980(1)]一文是研究汉语惯用语较早的一篇论文。马氏把惯用语性质的特点归纳为:惯用语是一种固定词组;惯用语的整体意义在于它的抽象化,也就是虚指的意思。

义；惯用语的结构是定型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马国凡、高歌东的《惯用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一书共有六章：惯用语的性质、惯用语的特色、惯用语的范围、惯用语的来源、惯用语的发展与演变、惯用语的运用。该书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惯用语。作者从古今典范作品中搜集了惯用语使用方面的丰富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因而所得出的结论有一定的说服力，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该书对惯用语性质的认识还比较模糊。王勤的《论惯用语》[《语文研究》，1982（2）]一文讨论的问题涉及惯用语的性质、意义、来源和运用等。刘叔新的《固定语及其类别》（《语言研究论丛》，第二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指出，惯用语区别于成语之处，“只在于没有表意的双层性，字面意义就是真实的意义。换言之，它的特征只是结构固定，所有组成成分也固定，表示一般的概念”。据此，刘氏把“多快好省”、“知难而进”、“鞍钢宪法”、“不胜枚举”等都认为是惯用语，而把通常认为是惯用语的“穿小鞋”、“碰钉子”、“碰一鼻子灰”等看成是成语。王德春在《词汇学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一书里指出，“惯用语也是语言中一种习用的固定语句”。王氏把日常交际中常用的应酬语、招呼用语和口头用语，如“你好”、“再见”、“对不起”、“碰钉子”等，叫做惯用语。杨知文的《谈惯用语》[《南京大学学报》，1984（3）]一文主要讨论“惯用语的性质”、“惯用语与成语、谚语、歇后语之间的区别”、“惯用语的来源”、“惯用语的结构”、“惯用语的语法作用”和“惯用语的运用”六个方面的问题。温端政在《谚语》一书里指出，惯用语和谚语的区别在于内容，惯用语具有描述性，谚语具有知识性；惯用语与成语、歇后语的不同在于结构，把具有独特结构的成语和歇后语分出来，剩下的便是惯用语。张宗华的《关于惯用语词典的收词问题》[《辞书研究》，1985（5）]一文讨论了“惯用语和一般词组的区分”、“惯用语和熟语内其他分支的区分”、“惯用语和三音词、四音词的区分”、“熟语义项和非熟语义项的区分”。作者否定了马国凡等关于惯用语必须具有抽象意义，即“虚指”的说法，扩大了惯用语的范围。张氏认为，惯用语至少要由两个词构成，而且其中至少有一个是双音词，也就是必须有三字以上才能构成惯用语。高歌东的《惯用语再探》（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是高氏与马国凡合著的《惯用语》一书的续本。全书分为“惯用语的历史来源”、“惯用语的演变”、“惯用语的语法结构”、“‘动一宾’型惯用语谓语和宾语的语法特点”、“惯用语的语音形

式”、“近义惯用语与反义惯用语”、“数量词、方位词在惯用语中的使用”、“运用惯用语的几种方式”和“常用惯用语集释”九个部分。关于惯用语的性质，高氏后来在他与张志清合编的《汉语惯用语大辞典》的前言里，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并给惯用语下了这样的定义：“以动宾关系为基本语法结构，以三字格为基本形式，以比喻引申为基本修辞手法和表义手法的固定词组。”吕冀平、戴昭铭、张家骅的《惯用语的划界和释义问题》[《中国语文》，1987（6）]一文讨论了惯用语的“划界”和惯用语的“释义”两方面问题。

孙维张《汉语熟语学》一书中的第五部分专门讨论了惯用语，分为“惯用语的性质和特点”、“惯用语的结构”和“惯用语的分类”三个部分。孙氏对惯用语性质、特点、结构和分类的研究，体现了理论与语言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把惯用语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孙氏的主要贡献在于，突破了把惯用语限定在整体意义“抽象化”、“虚指”，“不是每个字的字面意义的相加”这个框框，把“描绘性”作为惯用语性质的主要特征，指出“惯用语是描绘性熟语”，“谚语是表述性熟语”，这就把长期以来纠缠不清的惯用语和谚语的界线从根本上划分清楚。在此基础上，对惯用语特点、结构和分类的研究，才能概括惯用语的全部事实，做出更加符合汉语实际的分析，得出更加科学的结论。

孙氏的论述中也有少数地方值得商榷，如孙氏所提出惯用语和成语的四个方面的区别，特别是第一点（成语的书面性很强，惯用语的口语性特点非常突出），也很难掌握。如成语里有所谓“俗成语”，像“酒囊饭袋”、“虎头蛇尾”、“三心二意”等，口语性不比惯用语差。孙氏在举例时，把“狐群狗党”、“浓眉大眼”、“马不停蹄”、“敲山震虎”等都作为惯用语，这样就将有一大批通常被认为是成语的语言单位进入惯用语的范畴，难以为人们所接受。孙氏在举例时，将“亲者痛，仇者快”、“如坠五里雾中”等书面性较强的语言单位作为惯用语，这又使人们对惯用语的口语性产生怀疑。可见，对惯用语和成语、谚语的区别，还有待于进一步从理论与实际方面加以澄清。

刘叔新的《汉语描写词汇学》一书第四部分“词汇的构成单位（下）·惯用语”中指出“意义的双层性是汉语成语的区别性特征，据此可把成语同其他固定语单位区别开，特别是同惯用语区别开”；“固定语中，凡充分具有结构成分固定的特点，但是不具意义的双层性，其含义体现成类事物的一般概念而非个别事物概念或专门概念的，就是惯用

语”。刘氏提出的把“意义的双层性”作为区别汉语成语与惯用语以及其他固定语的唯一标准虽然可以较清晰地吧成语与惯用语区分开来，但按照这个标准，通常认为是成语的，成了惯用语；通常认为是惯用语的成了成语，这与常人的语感有很大差异。

周荐的《论四字语和三字语》一文，从讨论成语与惯用语的区别中，引出“四字语”和“三字语”的关系问题。周氏指出，在如何划分成语和惯用语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可根据有无非字面理解的深层义划分成语和惯用语，有深层义的为成语，如“惹火烧身”、“背黑锅”；无深层义的为惯用语，如“望闻问切”、“之乎者也”。另一种意见是以音节数为标准来划分，四音节的多为成语，三音节的为惯用语。周氏认为这两种意见均非尽善尽美，因此不再沿用“成语”、“惯用语”的名称，而着重“从表义上和结构上”探讨“四音节单位和三音节单位的相互区别点”，得出的主要结论，一是四字语可以构成有深层义的，也可以构成无深层义的，而三字语一般却只用于构成有深层义的，很少用于构成无深层义的；二是三字语的结构方式比较简单，常见的只有“述宾式”（如“安钉子”、“吃独食”）和“定中偏正式”（如“安乐窝”、“白眼狼”）两种，而四字语的结构方式则要复杂得多；四字语不仅句法结构比较复杂，而且语义搭配上也远较三字语复杂。

在周荐的《惯用语新论》[《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1）]一文中，周氏指出，惯用语是汉语词汇中的一类重要单位，对惯用语的研究历史虽然还不很长，但是对这种现象的观察和认识却由来已久，至少在唐代就已经被留意到；惯用语所指称的对象给人的感觉似乎并不复杂，似乎不存在多大分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惯用语为多数人所认定的“那个所指”是完全正确，毫无争议的。周氏通过对“穿小鞋”类三字格与四字格、双字格单位的比较指出，“穿小鞋”类的三字格不应因其意义是比喻性的而被视为惯用语，惯用语所指的应是非三字格的一部分俗语。周氏认为，同为三音节三语素的单位，就是因为它们没有或有不能从字面上理解的意义，而分别为词和惯用语，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被公认作复合词的一些双音节双语素单位，也存在着能或不能从字面上理解的意义的情况；被公认作非词的一些四音节四语素的单位，也同样存在着能或不能从字面上理解的意义的情形。周氏指出，在语言研究中似乎很难单靠意义的标准来为语言单位分类，以意义作标准对语言单位进行分类时必须以一定的形式为依托，在考虑意义标准时需要考虑形式标准。周

氏得出的结论是：被某些学者界定为“惯用语”的三字格都是词，不应认为是惯用语；惯用语应该是“原惯用语”中除去三字格后剩下的那部分单位，如“喝西北风”、“打开话匣子”、“陈谷子烂芝麻”、“横挑鼻子竖挑眼”、“一块石头落了地”等。周氏对惯用语的看法正好同马国凡、王勤等相反，马氏等把“穿小鞋”之类的三字格作为惯用语形式的主要标志；把“驴唇不对马嘴”、“陈谷子烂芝麻”等称为“修辞谚”或“狭义俗语（俗语）”，周氏则认为“穿小鞋”等三字格不是惯用语，惯用语应该用来指“驴唇不对马嘴”、“陈谷子烂芝麻”这类语言单位。在“穿小鞋”之类的三字格的归类上，周氏的观点也有别于其他学者。

惯用语研究之所以出现如此之多、如此之大的分歧意见，关键在于惯用语的性质难以确定。在这个问题上，大概只有一点是公认的，即惯用语是一种固定词组。产生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找不出大家公认的“对内一致性、对外区别性”的特征。马国凡等提出的作为惯用语性质特点的三个方面的标志，吕冀平等提出的带有定义性的惯用语的四个特点，以及王德春提出的似乎概括了马氏、吕氏等所提出的全部特点的六个方面的特点都是如此。有的学者试图找寻出这种具有“对内一致性、对外区别性”的特点，如刘叔新把熟语分为“固定语”和“常语”两类，把谚语等归入常语，成语、惯用语、歇后语等归入固定语，提出以是否具有意义的双层性作为成语和惯用语的区别性特征。但区别出来的惯用语正好和多数人的语感相反，因此很难为人们所接受。

造成对惯用语性质认识不同的另一个因素是，除了难以划清惯用语和其他定型词组的关系外，也难以划清惯用语和合成词、专名语、专门用语，以及一般词组的关系。如吕冀平等《惯用语的划界和释义问题》一文所列举的，有人把“台柱”、“花里胡哨”等都列入惯用语。

惯用语与其他语言单位界限不清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惯用语这个名称是后起的。语言学里先有合成词、一般词组，以及成语、专名语、专门用语和谚语、歇后语等术语，后来发现有一些语言单位是这些术语所反映的概念所不能包括的，而这些语言单位又为人们所习用，于是就把它们归为一类，叫做习用语或惯用语。因此，惯用语本身很难具有明显的区别性特征，正如刘叔新所指出的，“现代汉语的惯用语，在固定范围内的区别性特点，不是积极地出现和起作用的，即作为固定语的一种单位不具有自身所独有的特征；其区别性特点实际上只消极地出现和起作用，即只是由于不具有其他这种或那种固定语单位所独有的特

征而才形成自身的特点。”^[9]

因此,要搞清惯用语的性质和范围,首先要把跟惯用语有关系的语言单位的性质和范围搞清楚。然而,要搞清楚这些语言单位的性质和范围绝非易事,因此,关于惯用语的性质和范围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短期内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

(二) 惯用语的收集整理和成语辞书的编纂

对惯用语的收集整理工作实际上很早就已开始,唐代李义山的《杂纂》、清代翟灏的《通俗编》、民国初期胡朴安的《俗语典》和孙锦标的《通俗常言疏证》以及现当代的一些学者纂辑而成的俗语类工具书中都或多或少辑录了一些今天人们称为惯用语的单位。但纯粹的惯用语词典是改革开放以来才不断出版的。近20年来出版的惯用语类工具书主要有:徐宗才、应俊玲的《惯用语例释》(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5),施宝义、姜林森、潘玉江的《汉语惯用语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5;收录2000余条),杨知文等的《惯用语小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85),戴木金的《惯用语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孙治平、叶敏华的《惯用语一千条》(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孟宪章、田秉镆合编的《惯用语汇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黎庶等的《简明实用惯用语词典》(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叶帆主编的《书信惯用语词典》(湖北辞书出版社,1989),周宏溟的《惯用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0),陈光磊的《中国惯用语》(语海第三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周培兴主编的《汉语惯用语新解》(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5;收录10576条),高歌东、张志清的《汉语惯用语大辞典》(天津教育出版社,1995;收录14500条),王德春主编的《新惯用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

第二节 对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熟语的研究

20世纪的学者对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熟语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

符淮青的《汉语词汇学史》一书中第六章第二节专门讨论了先秦至清对熟语的辑录和研究情况。该节分四部分:一、古代文献对熟语的引述和辑录;二、《杂纂》中的熟语;三、唐以前学者论谚语;四、俗语专书对熟语的辑录和研究。

在第一部分,作者指出,从先秦至清的众多古籍,广泛地引用熟语

来叙事、说理、说明、描写。清代杜文澜所辑《古谣谚》搜集见于经、史、子、集各种著作中的歌谣和谚语，引用的各种著作有 900 种左右。在未出现辑录熟语的专书之前，我国古代丰富的熟语就分散地保存在各种古籍中，其中经、史、典籍引述的熟语数量可观。我国古代农业发达，有关天时、耕作的气象谚、农谚十分丰富。一些有关农业、气象、天时的著作中有意地收集了这方面的谚语，汉代崔寔的《四民月令》、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元代娄元礼《团家五行志》、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明代王象晋《群芳谱》中都收集有不少谚语。此外，药书医书中也收集有关医药、保健方面的谚语。如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所收的谚语：穿山甲，王不留，妇人服了乳长流。黄芩无假，阿魏无真。明代张景岳《景岳全书》中所收的谚语：莫饮卯时酒，莫食申时饭。小孔不补，大孔叫冤苦。

在第二部分，作者指出，《杂纂》是语言俚俗幽默、别具一格的语录体古代笔记小品。现存《杂纂》最早的是唐代李义山的《义山杂纂》，宋、明、清代都有续作。《杂纂》中的短语一部分是文人的创作，一部分是民间的俗语汇集而成。由于作者的着意收集，这类作品中保留有比较多的古代谚语、俗语。

在第三部分，作者指出，关于谚语的来源、性质、作用，唐以前古籍中记有学者零星的论断。《尚书·无逸》：“俚语曰谚。”《礼记·大学》：“谚，俗语也。”《广雅·释詁》：“谚，传也。”《说文》：“谚，传言也。”这些论述指出了谚语来源于民间、广为流传而发挥作用的特点。《文心雕龙·书记篇》集中说明谚语运用的广泛、谚语的性质和作用，显示了刘勰对谚语的重视。唐代刘知几在《史通·载文篇》中也说明了史书、古籍中运用谣谚的功用，认为俗谚是正直忠实之言，文字简要，有“惩恶劝善”、“观风察俗”的重要的社会作用。刘勰和刘知几对谚语性质作用的论述，代表了古代学者对谚语俗语的认识，他们的思想观点对明清俗语专书作者的工作有明显的影响。

在第四部分，作者指出，东汉服虔的《通俗文》、南朝梁代刘霁的《释俗语》可能是最早的辑录俗语的专著，都失传了。现在见到的最早的俗语专书是宋代的，如无名氏的《释常谈》、龚颐正《续释常谈》、周守忠《古今谚》等；明代的俗语专书有杨慎的《古今谚》、陈士元的《俚语解》、郭子章的《六语》等；清代俗语专书更是丰富，重要的有翟灏的《通俗编》、顾张恩的《土风录》、钱大昕的《恒言录》、钱大昭的

《迓言》、杜文澜的《古谣谚》等 10 多种。作者详细介绍了各时期的俗语专书,指出这类书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当时口语、古白话作品所用的词语已同传统的书面语有相当的距离。二是传统诗文创作讲究“无一字无来历”,《尔雅》、《说文》、《方言》所开创的小学研究又重词语探源,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工作“或于小学之一助焉”,认为它是传统语文学(小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内容不同于经籍词语的训诂考释,但理论方法明显受经籍词语训诂的影响。俗语专书收集口头流行、古白话作品中的俗语,其中包括大量的熟语,考释来源,辨析意义,对俗语研究有很大功绩。传统训诂学重视先秦古籍词语的研究,俗语专书则注意近代口语词的收集考释。可以说,近代词语的研究,是从俗语的搜集研究开始的,他们收集的材料,对意义的辨析,对来源的考释,成为后人研究俗语的一个良好的基础。

梁晓红《源于佛教的成语》[《语文园地》,1985(1)]一文指出佛教用语是汉语成语的一个重要来源,几乎占了汉语史上外来成语的 90%多;江蓝生《敦煌俗文学熟语初探》(见《敦煌学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一文将敦煌熟语和现代熟语加以比较,探求了它们之间的传承和异同,文末辑录了敦煌民间流传的谚语、成语等熟语约 150 条;李明权《佛学典故汇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诠释了佛教典故 300 多条;梁晓虹的《汉语成语与佛教文化》[《语言文字应用》,1993(1)]讨论了汉语成语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向熹在《简明汉语史》一书中对古白话成语做了分析;顾之川的《明代汉语词汇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一书中在第五章第二节“熟语”中对明代熟语中的谚语、歇后语、惯用语、成语做了简略论述;徐时仪的《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一书中的部分章节中也讨论了古白话熟语方面的研究情况。

随着专书词典和断代词典的大量出版,古代、近代汉语中的单个熟语的研究有所发展,但十分零散。

本章小结

20 世纪初叶,熟语研究还主要是传统语文学性质的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意义上的汉语熟语研究从无到有,由浅入深,至今仍在不断发展。“五四”以来熟语方面首先开始的是谚语、歇后语的研究,

随后是成语、惯用语。新中国成立前熟语研究主要表现在论文和词典的编纂。新中国成立初至“文化大革命”前，一批熟语专著先后出版，说明研究已经有了很大进展，走向深入，汉语熟语研究的第一个繁荣时期到来。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一些教材对熟语的论述，对人们的熟语观念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文化大革命”时期熟语研究陷于停顿。改革开放以后熟语研究的第二个繁荣时期到来，熟语论文、专著、词典大量涌现。

我们依据《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乙编及《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80—2001)等资料对20世纪熟语研究方面的论文进行了统计，具体情况见表5—2：

表 5—2 20 世纪熟语研究论文统计表

时间	谚语	歇后语	成语	惯用语	合计	时间	谚语	歇后语	成语	惯用语	合计
1921	1				1	1965			1		1
1924	1	2			3	1978	1		4		5
1925	1				1	1979	1		6		7
1931	1				1	1980		4	5	5	14
1933		2			2	1981	5	6	8	1	20
1934			1		1	1982	3	3	6	5	17
1935	3	4			7	1983	1	2	8		11
1936	1				1	1984	3	4	5	1	13
1937		7			7	1985	2		6	2	10
1940			1		1	1986		1	8	2	11
1943			1		1	1987	2	1	9	1	13
1947		1			1	1988	3	4	9	1	17
1950		1			1	1989	2		11	4	17
1952		2	1		3	1990	1	1	4	2	8
1953			1		1	1991	1	1	7		9
1954		3	1		4	1992			7	1	8
1955		1	5		6	1993		3	6	3	12
1956	1		2		3	1994	3	2	9		14
1957	2	2	2		6	1995	2	1	10	1	14
1958	1		9		10	1996	1		6	1	8
1959			3		3	1997	4	3	9	2	18
1960	2	1	3		6	1998	1		12	4	17
1961	3		2		5	1999		4	16		20
1962			2		2	2000	3		18		21
1963		2			2	合计	56	68	224	36	384

从表中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熟语的小类谚语、歇后语、成语、惯用语的研究状况,这几类熟语从1921年(首次有研究论文发表)到2000年底共有384篇论文发表,从时间看,先后进入研究视野的次序是谚语(1921)、歇后语(1924)、成语(1934)、惯用语(1980)(1956年,俞敏、黄智显在《语言学概论讲义》中较早使用了“惯用语”这个名称),从数量上看,由多到少依次是成语(224)、歇后语(68)、谚语(56)、惯用语(36),成语研究有明显的优势。从表中还可看到几类熟语研究的发展过程和趋势。此外专论熟语的论文有15篇,其他类熟语的论文有40多篇。综合起来,20世纪熟语方面的论文共有440多篇。

熟语方面的专著不多,有十几种,主要有马国凡的《成语简论》、马国凡的《成语》,马国凡的《成语》(修订本),史式的《汉语成语研究》,马国凡、高歌东的《歇后语》,王勤的《谚语歇后语概论》,马国凡、高歌东的《惯用语》,向光忠的《成语概说》(1982),刘洁修的《成语》,温端政的《谚语》,温端政的《歇后语》,高歌东的《惯用语再探》,张卫国的《四字语型及其应用》(中国物资出版社,1989),刘广和的《熟语浅说》,孙维张的《汉语熟语学》,崔希亮的《汉语熟语与中国人文世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其中关于成语的著作6种、歇后语3种、谚语2种、惯用语2种、熟语2种。此外,一些词汇学专著和教材也对熟语有不同程度的论述。

辞书方面,20世纪成语辞书出版有100种左右,谚语辞书也在100种左右,歇后语辞书在50种左右,惯用语有十几种,各类熟语辞书总数在300种左右。

熟语研究在20世纪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在21世纪里,关于熟语性质方面的探索会进一步走向深入,如成语、惯用语的性质分析问题;在定量研究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如各类熟语的数量研究、统计分析、词表的编制;在词源研究方面也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如熟语个体的产生和发展情况、某时期熟语的产生情况及原因分析;语用、翻译等方面的研究也会继续进行。熟语辞书的数量仍将不断增长,种类会更多、分工会更细、目的性会更强。

20世纪,学者对古代、近代汉语熟语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全面和系统,在21世纪,这一领域的研究必将会有更多成果出现。

注释:

[1] 王德春:《熟语的修辞作用》,载《上海外国语学院季刊》,1958(2)。

[2] 王德春：《词、词组、熟语》，载《上海外国语学院季刊》，1958（3）。

[3] 云生：《关于“熟语”》，载《中国语文》，1959（7）。

[4] 同上。

[5] 同上。

[6] 瓊一：《成语、谚语、格言、俗语、俚语的区别》，载《语文学习》，1958（1）。

[7] 何霭人：《汉语的成语》，载《语文知识》，1955（7）。

[8] 欣向：《成语的特性》，载《中国语文》，1958（10）。

[9]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137～138 页。

第六章 词汇学史研究

词汇学史，从字面看，即词汇学的历史，但人们一般并不做如此狭窄的理解，而是把词汇研究的历史称作词汇学史。历史即过去的事实即凡在过去的时间里进行的词汇研究就是词汇学史。词汇学史研究就是对过去的词汇研究进行研究。

任何一项研究的发展都建立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词汇研究也不例外。词汇学史研究很早就有了，而且一直受到大家的重视。20 世纪的词汇学史研究，从研究的时间看，有概括某段时间（1 年、5 年、10 年、20 年、1 个世纪乃至更长）的，也有概括整个词汇研究 2000 年历史的；从研究对象看，有的针对词汇研究的总体情况，有的针对某一词汇研究现象专题、某论著论文、某次会议活动、某位学者；从研究成果的形式看，既有专著、单篇文章（包括一般论文、书评、读后感、商榷、为他人作的序、会议纪要、年鉴、传记等），又有一本书中的专章专节、辞书中著作人名的词条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蔚为大观。

长期以来词汇学史研究或限于某个专题、或限于某段时间、或不是专著，总之没有一部对汉语词汇研究总体情况进行史学研究的独立著作。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近 1 个世纪历程进行研究的《汉语词汇研究史纲》出版，此后《汉语词汇学史》、《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陆续出版，这些专著的问世，标志着词汇学史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一节 概观——主要论文著作目录

一、以现代汉语词汇学史为对象的研究

（一）以专题为对象

姚鹏慈. 成语研究的新进展. 语文导报, 1985 (7)

汉语拼音研究室整理. 同音词问题讨论综述 (1950—1985). 语文建设, 1987 (2)

施光亨. 语素研究述评. 语文导报, 1987 (6)

李升台. 词的划界研究述评. 语文导报, 1987 (11)

史有为. 外来词研究之回顾与思考. 语文建设, 1991 (1)

王铁昆. 10 年来汉语新词语研究. 语文建设, 1991 (4)

华旭. 反义词判定标准研究述评.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1992 (1)

葛本仪, 王立廷. 建国以来对“词”“词汇”概念的研究. 语文建设, 1992 (4)

姚汉铭. 新时期新词语研究述评. 汉语学习, 1993 (4)

卢卓群. 十余年来的成语研究. 语文建设, 1993 (7)

A. JI. 谢米纳斯 (冯文洁译). 汉语中同义词词汇化的问题. 呼兰师专学报, 1995 (4)

张金梅. 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述评. 阴山学刊, 1996 (4)

应雨田. 异体词语规范研究述评. 武陵学刊, 1997 (1)

谭汝为. 异形词定义和性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天津教育学院学报, 1997 (2)

侯新华. 建国后的汉语词汇体系研究述评. 高校社科信息, 1997 (2)

池昌海. 五十年汉语同义词研究焦点概述. 杭州大学学报, 1998 (2)

工泽鹏. 近 20 年汉语惯用语研究. 学术研究, 1998 (11)

张能甫. 汉语基本词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1999 (2)

于全有. 关于“您们”用法的规范性研究述评. 语文建设, 1999 (4)

陈瑶. 近年来现代汉语复合词结构研究述评. 暨南学报, 2000 (5)

(二) 以论文、著作、词汇学专题辞书为对象

1. 以论文为对象

寒蟾. 《国语释词》的商榷. 教育杂志, 1920 (12)

伯韩. 李荣、李向真两位先生关于基本词汇的论文读后感. 中国语文, 1953 (7)

惠修等. 对《引用成语要慎重》的意见. 语文学习, 1956 (9)

胡格非. 读《怎样辨认同义词》(孙玄常). 语文知识, 1957 (4)

月心. 现代汉语词语和汉字里的“化石”: 读俞敏《化石语素》想

到的.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1984 (2)

胡华.《名词比喻造词》疑点. 中国语文, 1997 (5)

程志后.《名词比喻造词》辨正. 中国语文, 1997 (5)

2. 以著作作为对象

傅葆琛. 评《基本词汇》(庄泽宣). 教育与民众, 1930 (3)

俞敏.《北京话单音词词汇》(陆志韦). 燕京学报, 1951 (4)

张洵如. 读陆志韦著《北京话单音词词汇》. 光明日报, 1951-08-18

鲁扬.《小学词汇学基本知识讲话》(张世禄). 中国语文, 1957 (1)

许令方.《普通话词义》(何霭人). 中国语文, 1957 (4)

劳君方.《汉语词汇》(孙常叙). 中国语文, 1957 (8)

林运来、林瑾. 评介《汉语词汇》(孙玄常). 语文学习, 1957 (9)

朱锡裕.《普通话词汇》(张世禄)读后. 语文知识, 1957 (9)

雍庸等.《词汇教学讲话》(张静). 中国语文, 1957 (11)

谢晓安. 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和孙常叙先生讨论基本词汇的特点和本质. 人文杂志, 1958 (1)

刘凯鸣.《现代汉语词义讲话》(崔复爰). 中国语文, 1958 (6)

邵荣芬. 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高名凯、刘正琰). 中国语文, 1958 (7)

胡双宝. 对《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高名凯、刘正琰)的几点补充意见. 中国语文, 1958 (7)

孙良明.《汉语词汇》(孙常叙)中几个问题的商榷. 中国语文, 1958 (8)

良明. 对《普通话词义》(何霭人)的几点意见. 语文, 1959 (8)

孟原.《汉语词汇讲话》(周祖谟). 语文学习, 1959 (12)

马天祥. 评《现代汉语词汇》. 人文杂志, 1960 (2)

刘凯鸣. 读《现代汉语词汇》. 人文杂志, 1960 (2)

司马川. 评《北京话语汇》(金受申). 中国语文, 1962 (7)

余平. 评《词汇常识》. 中国语文通讯, 1980 (3)

裘星熙.《金融词汇》读后. 辞书研究, 1983 (4)

金晓阳. 词汇学研究的一部重要论著: 介绍王德春的《词汇学研究》. 语文导报, 1985 (10)

世晓. 一部有中国气派的词汇学专著——评张永言的《词汇学简论》. 语文导报, 1986 (4)

王继同. 词汇学研究的新成果: 介绍刘叔新的《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 语文导报, 1986 (4)

张旭. 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语言学新著——读刘叔新著《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 渤海学刊, 1988 (3)

张志毅. 中国第一部词汇科学专著(《汉语词汇》). 烟台大学学报, 1989 (3)

娄建伟. 熟语和成语属于并列范畴吗? ——评《谚语、格言、歇后语》一书. 大庆师专学报, 1989 (3)

季羨林. 《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序. 语文研究, 1991 (1)

刑公畹. 论同义词的研究: 《同义词语的研究》序.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1 (2)

周荐. 《汉语描写词汇学》读后. 中国语文, 1991 (6)

刘丹青. 文化语言学的新收获: 读史有为《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 语文研究, 1992 (1)

A. JI. 谢米纳斯(田淮宾译). 中国词汇学研究概况. 见: 语言学论辑(1).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

王吉辉. 《同义词语的研究》读后. 语文研究, 1993 (3)

张庆云. 喜读 A. JI. 谢米纳斯的《现代汉语词汇学》. 世界汉语教学, 1994 (2)

赵艳芳. 西方语言文化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影响: 《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及向国语的进化: 1840—1898》评价. 国外语言学, 1996 (1)

孟天. 开拓性的汉语词汇研究: 评王立廷的《词汇丛稿》. 语文学刊, 1996 (4)

苏新春.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史大有可为: 《汉语词汇研究史纲》得失谈. 汉语学习, 1997 (1)

段观宋. 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力作: 读《阴阳五行与汉语词汇学》. 湘潭大学学报, 1997 (1)

郭伏良. 开拓我国词彩学的重要之作: 《现代汉语词彩学》评价. 修辞学习, 1997 (3)

朱广祁. 读《现代汉语词彩学》. 东岳论丛, 1997 (3)

罗其精. 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一书浅评. 当代语言学,

1999 (1)

黄兴涛. 近代中国汉语外来词的最新成就研究: 评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 开放时代, 1999 (10)

3. 以词汇学专题辞书为对象

李西溟. 对于《中华成语词典》(吴廉明)的小贡献. 学风, 1937 (5)

见宇. 介绍《汉语成语小词典》(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5 年级语言班编). 语文学习, 1959 (1)

王克仲. 《汉语成语词典》读后记. 中国语文, 1979 (3)

杨天戈. 成语考源——对《汉语常用成语手册》的补正. 语文知识丛刊, 1981 (1)

马天祥. 《八用中文成语词典》匡谬. 西北大学学报, 1982 (3)

卢润祥. 《简明同义词典》评介. 中国语文, 1982 (3)

梅家驹等. 编纂汉语类义词典的尝试——《同义词词林》简介. 辞书研究, 1983 (1)

卢润祥. 浅论“同中求异”——评介《简明同义词典》. 语文研究, 1983 (2)

姜亮夫. 《成语例示》序. 杭州大学学报, 1983 (2)

倪宝元. 关于《成语例示》. 杭州大学学报, 1983 (2)

诸祖煜. 简评《成语词典》. 辞书研究, 1983 (2)

高极明. 我国第一部《汉语外来词词典》及其主编刘正琰教授. 百科知识, 1985 (12)

王恩圻. 具有开拓意义的《汉语外来词词典》. 语文导报, 1986 (6)

刘天锡. 集反义词研究的大成: 评《汉语反义词词典》. 丹东师范学院学报, 1987 (3)

吕叔湘. 《中国俗语大词典》序. 语文研究, 1987 (3)

吕叔湘. 《汉语成语考释词典》序. 中国语文天地, 1987 (4)

吴士文. 评介《汉语反义词词典》. 辞书研究, 1987 (5)

温朔彬. 简评《中国俗语大辞典》. 晋阳学刊, 1990 (1)

樊金树. 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词典——写在《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获奖之际. 天津新闻与出版, 1990 (2)

张万起. 汉语成语研究的新成果: 评《汉语成语考释词典》. 辞书

研究, 1990 (4)

钱宗武. 社会新发展的真实镜相: 评《汉语新词新义词典》. 汉字文化, 1991 (2)

祝注先. 一部颇具特色的新词词典: 评《新词新义词典》. 辞书研究, 1991 (5)

季恒铨. 新词新语词典编纂的新收获: 读《1991 汉语新词语》. 语言文字应用, 1993 (1)

王铁昆. 简评《1991 汉语新词语》. 语言文字应用, 1993 (1)

于根元. 读《汉语新词新义词典》.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3 (2)

伍铁平. 简评岑麒祥著《汉语外来词词典》.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1994 (6)

周维国. 评介几部汉语成语词典. 语文建设, 1994 (10)

陈庆延.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读后. 语文研究, 1997 (2)

胡明扬. 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基础工程: 评《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语言文字应用, 1997 (3)

林寒生. 词的理据和《汉语理据词典》. 辞书研究, 1998 (5)

何华道. 汉语成语辞书的比较、评价与选择. 辞书研究, 1999 (5)

黎良军. 加强理论研究, 探讨词内世界: 《汉语理据词典》指瑕. 辞书研究, 2000 (4)

(三) 以活动为对象

首届现代汉语词汇学术讨论会在天津举行. 中国语文, 1993 (5)

(四) 以专人为对象

潘文国, 叶步青, HanYangSaxena. 汉语构词法研究的前驱薛祥绥. 中国语文, 1993 (1)

邓国栋, 张焱. 限定现代汉语词汇范围的理论框架——评刘叔新的描写主义词汇观.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1994 (2)

王凤阳. 孙常叙先生的学术生涯和成就. 社会科学实践, 1995 (6)

姚鹏慈. 倪宝元教授成语研究述评. 台州师专学报, 1999 (2)

(五) 以总体研究为对象

1. 过去 1 年

舒辛. 创新与讨论是学科发展的动力——1992 年汉语词汇研究述评. 语文建设, 1993 (6)

周荐. 现代汉语研究综述·词汇部分 (1992). 中国语言学年鉴 (1993).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4

周荐. 现代汉语研究综述·词汇部分 (1993). 中国语言学年鉴 (1994).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5

周荐. 现代汉语研究综述·词汇部分 (1994). 中国语言学年鉴 (1995).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6

周荐. 现代汉语研究综述·词汇部分 (1995—1998). 中国语言学年鉴.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2

2. 过去 5 年

邢福义, 汪国胜, 吴振国, 萧国政. 八五期间的现代汉语研究 (二、词汇研究). 见: 许嘉璐、王福祥、刘润清主编. 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6

3. 过去 20 年甚至更长

(1) 论文

刘哲、匡国建. 建国以来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综述. 语言学通讯, 1987 (1)

周荐. 近二十年来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概说. 理论与现代化, 1997 (12)

晁继周. 二十世纪的现代汉语词汇学. 见: 刘坚主编. 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 专著

周荐. 汉语词汇研究史纲.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5

二、以古代汉语词汇学史为对象的研究

(一) 以专题为对象

张世禄. 汉语词源学的评价及其他——与岑麒祥先生商榷. 江海学刊, 1963 (7)

郭在贻. 俗语词研究概述 (上、下). 语文导报, 1985 (9)、(10)

苏新春. 近年来国内古汉语词义理论研究现状及其走向. 广州师院学报, 1988 (1)

朱瑞平. 略谈传统语言学中的词源学研究. 黄淮学刊, 1996 (4)

刘福根. 历代连绵字研究述评. 语文研究, 1997 (2)

石镔. 古汉语复音词研究综述: 兼谈《睡虎地秦墓竹简》复音词.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1999 (3)

池昌海. 古代汉语同义词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0 (1)

徐时仪. 白话俗语词研究的百年历程. 文献, 2000 (1)

李长仁. 汉语同源词研究的回顾和前瞻. 松辽学刊, 2000 (1)

徐时仪. 戏剧文献整理与词语研究的百年回顾.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2001 (1)

(二) 以论文、著作、词汇学专题辞书等为对象

1. 以论文为对象

王菩生. 读何仲英先生的《水浒传释词》. 教育杂志, 1921 (10)

王菩生. 再读何仲英先生的《水浒传释词》. 教育杂志, 1921 (12)

计永佑. 汉语词汇史的对象、任务和方法——评王力《汉语词汇的发展》.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语言文学), 1959 (4)

张在西. “俨茹毛饮血”新解质疑. 青海师范学院学报, 1981 (2)

蒋礼鸿. 读《同源字论》后记. 语言学年刊, 1982 (1)

刘瑞明. 《元明市语汇释》. 贵州大学学报, 1999 (6)

2. 以著作或著作中的章节为对象

仲颖. 介绍《诗词曲语辞汇释》(张相). 中国语文, 1953 (11)

葳. 《元剧俗语方言例释》(朱居易). 中国语文, 1956 (12)

蔡美彪. 元代杂剧中的若干译语 (评朱居易的《元剧俗语方言例释》). 中国语文, 1957 (1)

邹嘯. 读《元剧俗语方言例释》(朱居易). 戏剧论丛, 1957 (2)

徐复. 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增订本)(蒋礼鸿). 中国语文, 1961 (10)、(11)

吴小如. 读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札记. 文献, 1980 (1)

龙潜庵. 《宋元语词集释》题记. 辞书研究, 1981 (2)

曹长河等. 《唐宋常用词释例》读后琐记. 天津师专学报, 1982 (1)

袁泽仁. 《诗词曲语辞汇释》刍议. 温州师专学报, 1982 (1)

吕叔湘. 新版《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读后. 中国语文, 1982 (3)

苏宝荣. 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词汇研究. 文科教学, 1983 (1)、(2)、(3)

刘凯鸣. 《戏剧词语汇释》注释商榷. 中国语文, 1983 (6)

李之亮. 关于《戏剧词语汇释》的几点异议. 中国语文, 1983 (5)

蔡正发等. 读《小说词语汇释》见瑕录. 河池师专学报, 1984 (1)

苏宝荣. 汉语词义演变规律新探——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词汇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 山西师院学报, 1984 (2)

隋文昭. 《戏剧词语汇释》训解商兑.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1984 (4)

任学良. 汉语历史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评《古代汉语·常用词》词汇史.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1986 (1)

张永言. 古典诗歌“语辞”研究的几个问题——评张相著《诗词曲语辞汇释》. 中国语文, 1986 (4)

颜洽茂. 读第五版《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兼论著者的俗语词研究思想. 杭州大学学报, 1989 (3)

董志翘, 陈文杰. 读李维琦先生近作《佛经续释词》. 古汉语研究, 1992 (2)

方一新, 王云路. 评《佛经续释词》. 语言研究, 1999 (2)

珊珊. 古汉语词义研究巨著《古词辨》介绍.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1992 (4)

刘晓南. 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新拓展——评《佛经释词》. 古汉语研究, 1994 (1)

方一新, 王云路. 读《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 古汉语研究, 1994 (1)

陈建初. 《汉语语源学》评介. 古汉语研究, 1994 (1)

之言.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简评. 文史知识, 1994 (2)

朱诚. 《汉语词汇史》琐议.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1995 (4)

周福云. 读《汉语词汇史》献疑. 台州师专学报, 1995 (4)

关童. 《古代文化词类集义辩考》管窥. 杭州大学学报, 1996 (4)

余延. 用文化语言学方法研究词义训诂的新成果: 评黄金贵《古代文化词类集义辩考》. 汉字文化, 1997 (2)

殷寄明. 文化史暨同义词研究的新硕果: 评《古代文化词类集义辩考》. 古汉语研究, 1997 (2)

严修. 评《汉语词义引申导论》. 中国语文, 1997 (5)

蒋宗许. 《中古汉语语词例释》述评. 辞书研究, 1997 (6)

陆忠发. 试说《说文段注》的同源词研究在古汉语语源学史上的意

义.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1998 (2)

钟明立. 《说文段注》同义词论证方法述略.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1998 (3)

严修. 《汉语语源义初探》序. 古汉语研究, 1998 (3)

纪国泰. 先秦汉语词汇研究的力作: 评毛远明的《左传词汇研究》. 成都师专学报, 2000 (1)

方一新. 近年来国内敦煌语词校释研究专著四种述评. 浙江大学学报, 2000 (2)

诸良才. 中古汉语的又一力作: 读方一新《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 浙江学刊, 2000 (3)

3. 以词汇学专题辞书、断代辞书为对象

孙伏园. 评《连绵词典》. 四川教育通讯, 1947 (23)

李京. 评清代六部成语词典. 中国史研究动态, 1991 (8)

肖楠. 一本精于辨审的同义词词典——评《简明汉语同义词词典》. 古汉语研究, 1993 (2)

任思愚, 刘德高. 一部有严重质量问题的词典: 《宋元明清百部小说语词大词典》评略. 辞书研究, 1996 (1)

陈淑梅. 介绍一部科学适用的专门词典: 《古今称谓词典》简介. 辞书研究, 1998 (2)

俞理明, 彭高林. 汇古今训诂精萃, 开诗经研究新篇: 读新版《诗经词典》. 辞书研究, 1998 (2)

伍宗文. 一部独具特色的专书词典: 评《吕氏春秋词典》. 辞书研究, 1998 (2)

何九盈. 《声韵语源词典》读后记. 中国语文, 1998 (5)

刘瑞明. 为《敦煌文献语言词典》进一言. 辞书研究, 1999 (2)

董志翘. 评《宋语言词典》——兼论断代语言词典编写的有关问题. 辞书研究, 2000 (1)

汪维辉. 《元语言词典》评介. 辞书研究, 2000 (1)

(三) 以活动为对象

王宁. 汉语词源学将在二十一世纪有巨大发展: 首届汉语词源学学术研讨会述评. 中国教育报, 1999-08-24

(四) 以专人为对象

蒋礼鸿. 蒋礼鸿自传. 文献, 1980 (3)

问清松. 王念孙的连语理论. 研究生学报 (华中师范学院), 1983 (5)、(6)

徐超. 杨树达语源学思想及其研究方法. 文史哲, 1991 (4)

顾之川. 试述吕叔湘先生古汉语词汇研究及其特点. 古汉语研究, 1994 (4)

苏瑞. 黄侃先生对汉魏六朝词语的研究. 古汉语研究, 1995 (1)

姚淦铭. 论王国维的上古成语研究. 铁道师范学院学报, 1998 (5)

袁雪梅. 试评方以智对“连语”及联绵词的研究.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1998 (3)

袁雪梅. 从《通雅》看方以智的同源词研究. 天府新论, 2000 (1)

(五) 以总体研究为对象

1. 上古汉语词汇学史研究

姚锡远. 上古时期词汇学研究说略.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1996 (3)

李长仁. 周秦时期汉语词汇研究管窥. 松辽学刊, 1996 (4)

2. 中古汉语词汇学史研究

王云路. 百年中古汉语词语研究述略. 浙江大学学报, 2001 (7)

3. 近代汉语词汇学史研究

蒋绍愚. 古汉语词汇纲要 (第九章关于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蒋绍愚. 近代汉语研究概况 (第五章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王镛. 一九九三年近代汉语研究综述. 语文建设, 1994 (12)

江蓝生, 曹广顺, 吴福祥. 近代汉语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四、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见: 许嘉璐、王福祥、刘润清主编. 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6

蒋绍愚. 近十年近代汉语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古汉语研究, 1998 (4)

4. 整个古代词汇学史研究

颜恰茂. 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反思和创新. 语文导报, 1986 (3)

蒋绍愚. 20 世纪的古汉语词汇研究. 见林焘主编, 20 世纪中国学

术大典·语言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三、以古代汉语、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词汇学史为对象的研究

（一）以专书为对象

宋永培. 当代中国词汇学的创造性成果：评苏新春的《当代中国词汇学》. 学术研究，1997（5）

王晓珑. 百年汉语词汇学历史画卷的成功描绘——评许威汉先生的《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0（5）

（二）以总体研究为对象

1. 通史

符淮青. 汉语词汇学史.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2. 世纪断代史

苏新春. 中国当代词汇学（第一、二章）.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许威汉. 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 太原：书海出版社，2000

第二节 《汉语词汇研究史纲》

《汉语词汇研究史纲》，周荐著，语文出版社 1995 年 8 月第 1 版，1998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该书是第一部对近 1 个世纪的现代汉语词汇研究进行史学研究的专著，也是汉语词汇研究史的开创之作。全书除去序和后记（1998 年版多一重印后记）共五部分：一、绪论；二、萌芽时期（“五四”前后—40 年代末）；三、草创和初步发展时期（50 年代初—60 年代中叶）；四、停滞时期（60 年代中叶—70 年代下半叶）；五、走向繁荣时期（70 年代末—90 年代）。

绪论部分主要对传统语文学、普通语言学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影响、指导以及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史的分歧和发展趋势做简明扼要的概述。其余四部分，分别以时间为经，词汇研究专题、专著为纬，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走过的历程逐一铺叙，每一部分末尾专设“小结”用于总结概述。

对于本书的特色，刘叔新在《序》中总结了以下三点：

第一，溯源探流，分期得体。

作者既能在微观上把具体问题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同时，又能在宏观上使汉语词汇研究阶段性的演进眉清目楚。作者把汉语词汇的研究史划分为萌芽、草创和初步发展、停滞、走向繁荣四个阶段，多数阶段内又再分出不同的发展段落。这不仅大体符合汉语词汇研究发展进程的基本情况，抓住了每一个发展阶段和小段落的特点，而且确实使数十年相当繁复的史实化为一个简明、醒目的“史纲”而呈现于读者眼前。

第二，夹叙夹议，史述与评论交融。

作者不仅客观叙述史实，而且“自始至终在客观叙述史实中贯穿着自己正确的学术观点，融注进个人浓厚的学术感情，评鹭得失，辨分正误”，使读者在了解史实的同时还能被激起共鸣，触发深思、引起浓厚的趣味。

第三，评介稳妥，褒贬严正。

这是最突出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色。作者以忠实于学术的原则为写作的唯一指导原则，表现出一种严正的作风：只从科学性的准则出发来评述，只就事论事而不冲着任何个人来说意见；论点、论著，该肯定就肯定，该指失就指失，不管涉及的学者是谁。即使对自己，也是赞扬、毛病都不回避。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确实贯彻全书正文始终。

1997年，苏新春在《汉语学习》第1期发表题为《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史大有可为——〈汉语词汇研究史纲〉得失谈》的书评。对该书的突出之处做了如下概括：

第一，首次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史的大势作了正确的划分。

《史纲》把百年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史划分出四个时期，准确反映了历史事实。而在叙述这四个时期时所用的篇幅笔墨详略不同也是把握准了史实的。在全书231页的分期叙述中萌芽期是14页，停滞期是3页，草创和初步发展时期、走向繁荣时期分别是63页、150页。后两个时期所占时间不长，却是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主体。作者把它们独立出来着力论述，说明是把握准了这段研究历史的发展大势。

第二，详细占有材料，条分缕析，微观取胜。

作者阅读了大量各个时期的论著，详细进行了征引，特别是对不同学术观点上的承继、发展、辩驳、改进等方面的关系，下了很大的工夫，努力理清它们的头绪。如50年代后期对“词”定义研究的进展，就从以前黎锦熙“概念说”、王力“意义说”、吕叔湘“运用单位说”，

论述到郑林曦“综合说”和高名凯“建筑材料说”。

此外,《史纲》对许多具体词汇问题,如“词义与词性的关系”、“同义词与近义词”、“反义词”、“文言词”、“方言词”、“熟语”、“成语”、“词的色彩义”、“词汇系统”、“基本词汇”等问题的论述,都显示了作者对史料的全面掌握和熟识程度。作者本来就是一位词汇研究的专家,在不少问题上都做过认真的研究,对它们有着细致的了解,这使得《史纲》在对整个词汇研究史作概述时,能在一个个具体的问题上作丰满的落笔,评论起来游刃有余,创见跃然纸上;也使《史纲》全书显得有纲而不乏目,充实饱满而不粗疏空略。

第三,积极参与历史,敢于评鹭前贤。

《史纲》在对诸多问题作信而有征的叙述中,一出己见的议论随章节的展开而随时可见,或张扬其功,或指斥其过,或明其大势,或点其所憾。书中不少中肯的意见,一下子把繁复的历史陈事清楚地摆在人们面前。如评价孙常叙《汉语词汇》对外来词研究,“孙常叙的分析在当时细致而精当,对后世影响甚巨,即或在《汉语词汇》出版后不久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第三节 《汉语词汇学史》

《汉语词汇学史》,符淮青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4月第1次印刷。

该书是第一部贯通古今2000年词汇研究的词汇学通史著作,也是第一部兼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史学专著。全书除去前言共九部分:一、绪论;二、先秦文献中的词汇学内容;三、汉代至清代训诂学中词汇学内容;四、“五四”至新中国成立前汉语词汇研究;五、新中国成立后汉语词汇学的建立与发展(上);六、新中国成立后汉语词汇学的建立与发展(下);七、汉语熟语学;八、结语;九、附录。

本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古今兼顾、古代现代词汇研究并重

从篇幅上看,“五四”之前古代的词汇研究不如“五四”之后现代的词汇研究,前者两章,共46页;后者三章,共266页。但从内容上看,对古代的词汇研究,作者主要从现代词汇学知识理论体系出发,选择重要的训诂学成果和辞书,着力挖掘其中所体现的词汇研究的理论、

观念、方法，揭示古代词汇研究的优秀传统，显示其对现代词汇研究的启发，这在分量上是很重的。

作者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是这方面为大家公认的专家。在客观冷静地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进行述评的同时，作者对古代汉语词汇研究投入同样的笔墨和心血。从学者到学术成果，从论著、论文、教材中的词汇部分到辞书，从零星的看法观点到成系统的研究，一切都像对待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一样一丝不苟。而在章节上根据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具体内容、具体特点具体安排。比如，新中国成立后的现汉古汉词汇研究各一章，分别有 104 页、109 页。除去首尾都有的“概说”、“辞书”，前者根据时间分两节：一、五六十年代中期的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二、70 年代中期、80 年代以来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后者则根据研究内容分三节：一、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二、综论古代汉语词汇著作；三、各时期的词汇研究。作者采取先现汉后古汉、二者相对独立的方式进行叙述，尽管如此，由于作者总是从汉语词汇学的知识理论体系出发，以此对现汉和古汉的词汇研究加以述评，因此两部分内容并不显得割裂成两块，而是统一在一个体系里。

第二，条理清楚

作者根据汉语词汇研究从不独立到独立到正式成为一门学科这一内在发展趋势，把从肇始至今绵延了几千年的汉语词汇研究划分为三个大阶段：先秦至清、“五四”前后、新中国成立后，每个阶段又以当时词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主要成果为坐标展开，比如先秦至清，主要述及“名实论”，《说文》、《尔雅》等重要的学术成果及其所蕴涵的词汇学理论、方法；“五四”前后，主要论述在借鉴西方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开展的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以时间为顺序进行叙述，每个时期综论性的词汇学专著和词汇学专题研究并重，古代汉语词汇研究不再以时间为序，而是直接以专题研究和重要的词汇学论著展开。这样一番安排，就使得 2000 年词汇研究的方方面面，繁而不乱、有条不紊地呈现出来。

此外，在写作及具体文字表述上，作者也做到了有条有理。比如书中许多章（第三、四、五、六章）的第一节都是“概说”，“概说”既是对这个阶段研究的总述，又是对以下各节内容的概括。又如书中随时可见列有 1、2、3 或（1）、（2）、（3）之类的序号，这是作者特意采取的表达方式，目的是使行文层次分明、纲目清楚。

第三，客观冷静

作者采用以史为主干，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的惯常写法。在史的叙述上，以介绍论著论文等学术成果为主，采用统一格式，着重对论著论文中有特色的内容进行缩写，尽可能最简洁最准确地再现其真实情况。比如对专门提出来的论著，一律按照作者简介、该论著全部研究内容、几个有特色的问题这样“三段”予以介绍。这样不惜精力于论著论文内容的缩写，是很用心的。一方面，论著论文等学术成果是词汇学史的大部分内容，也是词汇研究实绩的重要反映，客观真实地对其全部或部分内容加以再现，可以为后学的研究提供极大的方便。求得史实的“真”，本是史书的一大责任。另一方面，尽量用原始材料说话，这比任何评价都更有说服力。再有，对论著论文及其内容的取舍缩写，也是作者参与评论的一种方式。

在论的阐发上，作者持论公允，无论对己还是对人，都既无过誉之词也无横加指责的过激之言，表现出一种史家的冷静态度。比如，作者自己有关言语反义词及词群的研究是为其他词汇学史著作论文高度赞扬的，但出于一贯的取舍原则，作者一样地把它们剪裁掉，只字未提。又如，作者只用了“不妥”两个字评价有学者把假借义归入词义系统的做法，简明扼要，无一字累赘。

第四，突出熟语学

汉语里的熟语是一群数量众多，内部成员在性质、结构、功能等方面存在差异，可以划分出许多类别的单位。熟语中有不少来自古代，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有的来自民间口头，具有浓厚的社会生活气息。对其形成来源的探讨，涉及古代文学文化、社会民情民俗。熟语具有特殊的表达效果，被大家经常使用，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同时也存在不少混乱现象需要规范。对熟语进行研究不仅仅需要词汇学知识，还涉及语法学、修辞学、应用语言学、社会民俗学、古代文学、文化学等方面的知识。在现实的研究实践中，熟语研究已具备“学”的地位。作者专门用一章共四节对汉语熟语研究从零星的辑录研究到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系统的专著出现、从一种研究到独立成为一门学科的历史进程做了详细充实的叙述，从而从史论角度奠定了熟语学在词汇学分支学科中的地位。

第四节 《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

次印刷。

全书共上下两编，上编“20世纪汉语词汇学大观”共四章：一、20世纪汉语词汇学的历史前奏；二、20世纪汉语词汇学的起步；三、20世纪汉语词汇学的进展（一）；四、20世纪汉语词汇学的进展（二）；下编“20世纪汉语词汇学问题的具体探讨”共七章：一、“五四”前（1900— ）的初步探讨；二、“五四”后（1920— ）的初步探讨；三、新中国成立后（1950— ）的具体探讨（一）；四、新中国成立后（1960— ）的具体探讨（二）；五、“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弹与中衰（1966— ）；六、“文化大革命”后的新步伐（1978— ）；七、新时期的拓展与深化（1990年前后）。

王晓珑发表于《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的《百年汉语词汇学历史画卷的成功描绘——评许威汉先生的〈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认为本书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学术著作，其特色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史论结构

此书叙史脉络清晰、议论深刻有据、评价恰当公允。

第二，源流结合

汉语词汇只是“流”，而传统语言学才是“源”。作者的处理方式是“源”“流”结合，但以流为主。在此书的上编，作者用一章的篇幅，对传统语言学进行了扼要阐释，重点是与汉语词汇研究关系最密切之处。这样既便于让读者了解20世纪汉语词汇学的历史前奏，又让读者对汉语词汇学史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第三，点面结合

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对汉语词汇发展史的鸟瞰，是“面”的考察。下编是对汉语词汇发展史的“特写”，是“点”的研究。下编将20世纪的汉语词汇发展史分为七个阶段，然后分阶段论述学术界对汉语词汇学具体问题的研讨。如“同义词”研究，如果把不同阶段的同义词研究前后串联起来，就是汉语“同义词”研究的历史。

第四，中外结合

论述汉语词汇学史时，既能做到大陆与港台结合，也能做到中国与外国结合。本书的重点当然放在对大陆学者研究成果的评述上，但也兼及港台地区和外国学者的成果。

除了王氏归纳的上述四点，本书所提出并贯彻到实践中的“以研讨

为核心，史、论、评兼而有之”的写作方法，也是其一大特色。

作者在“后记”中说：“如何顾及词汇学的方方面面，以史带论，史论结合，以史为主干，以研讨为核心，史、论、评兼而有之（行文夹史、夹论、夹评），便都纳入我综合思考之轨道。”“以史带论，史论结合”是撰写学科史的惯常写法。对“史”、“论”的理解，一般认为，“史”即史实；“论”即评论，“评论”可以理解为“评价讨论”，不过“史论”的“论”重在“评价”，因此，“以史带论，史论结合”实际上是“以史带评，史评结合”。本书作者在“以史带评，史评结合”的基础上，又提出“以研讨为核心，史、论、评兼而有之（行文夹史、夹论、夹评）”。“研讨”即研究讨论，在史学研究中强调“研究讨论”，这样的考虑在其他学者那里是很少见的，而在本书的行文中却随处可见。比如下编第七章第四节“词的意义内容的探讨”，在从“同义词的探讨”、“反义词的探讨”等八个方面回顾 50 年代下半叶对词的意义内容所开展的探讨之前，作者用两个自然段对“词义内容”进行了研讨。首先说明为什么把“意义”和“内容”并提，其次，叙述从不同角度分析词义得到的所指意义、感情意义、认知意义、语境意义、词汇意义、语法意义、构词意义等。

作者认为，现代科学不断发展，既高度分化，又互相渗透；既高度综合，又纵横交错，都有其核心，也有其边缘。因此，书中的研讨常常“以词汇和词汇学为中心，旁及透视语言其他诸要素及其边缘学科”。比如，在述及词汇研究对国外科学方法论的借鉴时，首先就什么是方法论、方法论的重要意义进行讨论，在着重叙述词汇学界如何运用统计方法后，最后又就语法学中的种种研究方法，如中心词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模式分析法、生成—转化分析法等进行了讨论，以此说明“词汇学研究跟相关因素的学科研究方法不能固步自封”。

通阅全书，作者还就许多具体问题，如汉语研究发端于汉字的创造、汉语式是汉字文化史的展示、甲骨文金文词汇的内容特点、义素分析法、单音词的模糊性与能产性、动宾之间的复杂关系、模糊语言学、继承传统“因声释义”“以形索义”方法阐述词群、联系文化背景观察词义、词类集与词汇体系关系的探讨等进行了探讨。这样的写法在史学著作中是与众不同的。

此外，实事求是也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作者充分重视前出的词汇学史著作，对于所引，首先在前言中说清楚：“其间周荐《汉语词汇研究

史纲》的资料采用的最多，有的成片连续转引，有的间接组织在笔者叙述中。为尊重起见，径先函致意，并申谢忱。本书所引资料（包括直接和间接）多，与其说是专著，毋宁说是集编（尽管间寓新知，益以己见）；这从叙‘史’选精要求看，虽尚无伤大体，然作为本书作者，有必要特加说明。”具体行文时，则尽可能注明。有的用括号写明出处，如 532 页、547 页所引《社会科学争鸣大系（文学艺术语言卷）》的内容；有的加按语，有的直接说明，如 550 页：“有鉴于此，笔者不拟复述，径转录周文，谅可收叙一而兼二（众学者的探讨和周氏的研析）之良效。”

第五节 《中国当代词汇学》第一、第二章

《中国当代词汇学》，苏新春著，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1996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该书不是专门的词汇学史著作，作者在“内容提要”中说：“本书是用文化语言学理论来进行汉语词汇学研究的一部理论著作。它对当代汉语词汇研究主要进行了五个方面的论述：导致当代中国词汇学出现的百年研究传统及其反思；当代中国词汇学的语言观；词汇结构观；方法论；古代词汇研究的人文阐释。”书中第一方面的论述——导致当代中国词汇学出现的百年研究传统及其反思，属于词汇学史范畴，因其在写作上、内容上很有特色，值得一提。

这部分有两章，共 82 页，约 59 000 字。作者以 70 年代末为界，把 20 世纪的汉语词汇研究区分为两代：70 年代末之前是现代，70 年代末至今是当代。书中主要对 20 世纪初到 80 年代初，即现代和一部分当代词汇研究进行回顾。

第一章“汉语词汇现代研究的历史进程”。作者没有采用通常的和时间先后顺序一致的划分发展阶段的做法，而是“从词汇研究的基本倾向所体现出来的词汇研究观和方法论入手”，根据对“研究特点和重心所作出的一种判断”，从现代词汇研究中归纳出四种词汇研究类型：传统派的、社会功能派的、结构观的、人文观的。一种类型用一节对其兴起及历史背景原因、研究领域成果、历史地位影响等作专门叙述，最后总体总结一节，共五节：一、传统词汇研究的延续和发展；二、社会功能派的汉语词汇研究；三、结构形式派的汉语词汇研究；四、汉语词汇

人文研究的萌芽；五、现代词汇研究的特点和启示。

第二章“汉语词汇当代研究的词义与人文趋势”。作者出于建立文化词汇学的最终目的，着重对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汉语词汇研究中词义化与人文化两种趋势作了简要论述，一种趋势的论述成一节，共两节：一、当代词汇研究的词义化趋势；二、当代词汇研究的人文化趋势。

作为词汇学史的内容，论字当头，以论带史，论史结合是第一、二章最大的特点。通常学术史的写作，无论是系统的论著、单篇的文章，还是夹杂在他书他文中的章节，往往采用以史为主干、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的方法。对过去学术研究进行研究，过去的研究情况如何，须首先叙述清楚。而如果仅仅对史实作叙述，称“研究”又不妥，因此，在叙述史实的基础上，随着具体史实的展开进行具体评论，史和论结合，成为大家顺理成章的选择。第一、二章没有采用这一惯常写法，在史和论问题上，以论为统率，“史”服务于“论”。作者对第一、二章的写作意图说得很明白，反思百年研究传统，寻找以文化语言学为指导的当代中国词汇学兴起的内在必然性。既然是“反思”，那就和一般的“回顾”、“述评”、“评述”、“研究”等不同。“反思”重在“思”，“思”就得有思想、有深度，应该站在一定思想理论高度，对隐藏在事实背后深层次的东西进行阐论，而不是一般的就事论事。第一、二章从汉语词汇 70 年代末之前的现代研究归纳出四种类型，从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的当代研究中抽绎出词义化、人文化两种趋势，正是“反思”的结果。

且以社会功能派的确定为例。对 50 年代中后期的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其他词汇学史专著都按照各自的知识理论体系进行了梳理评论。作者没再重复前辈时贤的做法看法，而是着重挖掘具体史实本身的实质、目的、出发点、着眼点，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概括。如指出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对语言问题的所有看法都是从语言与社会的特殊依存关系与作用关系来出发的”。指出当时的著作论文不少是为服务社会需要普及词汇知识而写，如孙常叙《汉语词汇》正式出版时书的题头仍注明“东北师范大学函授讲义”。指出词的定义中词是“语言中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这一提法显示词的社会使用功能。指出关于基本词汇的确定是根据词汇的使用功能——词汇单位的作用地位、使用频度、生命力如何进行的。指出同义词、反义词、同音词等，主要是从提高词语的使用效果出发，为了有针对性地教学、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而提出的。指出黑话、行业话、文言词、方言词等分类，由于注意得更多的是它们

在使用上的不同特点、不同效果，因此具有浓重的词语社会功能研究特色。由这一系列情况，作者概括出社会功能派的研究。

其实，第一、第二章中不乏史实，既有某一阶段大批的论著论文之类学术成果，又有一系列学术会议活动，既有某一阶段词汇研究的时代背景、外在影响，又有主要研究领域的具体专题。但这一切都纳入在作者的反思阐论中，因反思阐论的需要而提出，为反思阐论服务。例如，在阐论词汇研究这一时期的词义化趋势时，作者提出的有关学术会议中有两次是非专门的词汇研究会议：1987年在南昌召开的“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1990年在成都召开的“青年汉语史学会”。为什么这样提，作者说得很清楚：前次因为会议上提交的一些论文强烈体现了加强词汇学科的科学化、理论化、系统性、意义化的特点。后一次因为“明言以‘词汇词义’为主要议题的只有这一次”。

在学科史写作中，像《中国当代词汇学》第一、第二章这样以“论”为主、“论”统率“史”的写法是不多见的。对近百年的汉语词汇研究，作者注重从研究的指导思想、方式方法入手进行概括阐论，虽是一家之言，但也足启后人。

本章小结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词汇学史研究实践，充分显示了这一工作的存在意义和实绩。尤其是《汉语词汇研究史纲》、《汉语词汇学史》、《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中国当代词汇学》等研究词汇学发展史的专著、章节，它们各自不同的体制、不同的写作方法、不同的剪裁识断，为词汇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过，词汇学史研究虽然在实践上拥有数量众多的成果，但把词汇学史研究本身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有意识地对其研究目的、原则、方法、范围、特色等从理论上进行探讨的却很少。个别学者已开始关注这一方面，这是很可贵的，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另外，可以尝试有专门的学者从事词汇学史研究，比如建立词汇学史研究方向，招收这方面的研究生，培养专门人才。这样至少有三点好处：避免参差不齐的状况；避免重复研究而造成浪费；有助于提高写作者本人的德才识见。

第七章 汉语词汇学研究方法

20 世纪是语言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也是汉语词汇学萌芽、创立和发展的时期。从世界语言学的大背景看，语言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训诂学时期；（2）传统语文学时期；（3）现代语言学时期。三个时期代表了三种研究取向，因此汉语词汇学研究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也可以从三个大的方面来观察，这就是：（1）训诂学意义上的汉语词汇研究，（2）传统词汇学意义上的汉语词汇研究；（3）现代词汇学意义上的汉语词汇研究。下面分析传统词汇学和现代词汇学意义上的现代汉语词汇研究。

第一节 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方法的研究

一、传统词汇学意义上的现代汉语词汇研究

传统词汇学就其研究内容而言是“多中心”的，所关注的对象有：（1）词汇类别研究，如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研究、共同语词汇与方言词汇研究、外来词汇研究、新旧词汇研究等；（2）词义类聚研究，如同义词研究、反义词研究、多义词研究等；（3）构词法和造词法研究；（4）词的中心义和色彩义研究；（5）词义跟概念、语音和事物的关系研究；（6）词和词义的变化和演变研究，等等。^[1]传统词汇学意义上的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大体是这几个方面，其中最具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课题有两个：同义词研究和构词法研究。前者涉及了词的“内容”，后者涉及了词的“结构”，而词的“内容”和“结构”是现代汉语词汇学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通过对汉语同义词研究和构词法研究的总结与梳理，基本上可以看清传统词汇学范畴内的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探索与演进。

（一）同义词研究

我国传统训诂学很早就关注同义词问题，现存的最早辞书《尔雅》按义类收录了不少同义、近义词。古人对同义、近义词的分析材料大多

散见于经籍注疏当中，主要侧重辨析词义的细微差别，也提出了一定的理论（如清代段玉裁的“浑言”、“析言”说）。

新中国成立以后，汉语同义词研究围绕着词义的同异及其判定标准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讨论，在分析理论和分析方法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先后提出了“意义相同说”、“概念相同说”、“所指对象同一说”、“替换法”、“同形结合法”、“在组合中分析同义词”等多种分析汉语同义词的理论和方法，把同义词研究逐步推向深入。

1. 意义相同说

学者们对同义词的认识与研究首先是从词的“意义”入手的。张志公认为：“‘父亲’、‘爸爸’、‘爹’、‘爹爹’这些词的意义完全相同；‘父亲’带点文言气，‘爸爸’是口语，‘爹’、‘爹爹’是方言。‘聪明’、‘智慧’意义很相近，但用法不同，前者是形容词，后者是名词。‘规则’和‘规矩’，意义和用法相近，但都小有区别。这些习惯上都叫做同义词。”^[2]王力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同义词，就是意义相同的两个或更多的词。严格地说，真正完全同义的词是很少的。当我们说它们同义的时候（甚至说它们完全同义的时候），意思只是说它们在一定范围内意义相同罢了。”^[3]周祖谟开始也认为同义词是“意义相同或意义极其近似的词”，并指出：“同义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完全同义的词，一类是意义稍有差别的词。”^[4]后又根据苏联学者的观点认为同义词是“同一概念以内的各种细微差别，如果超出这个界限，在意义使用上都会有很大差别，就不是同义词”^[5]。其他学者如孙良明〔《同义词的性质和范围》，《语文学习》，1958（3）〕等也持同样的观点。

意义相同、相近说反映了人们对同义词现象初步的、朴素的认识，这一认识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不好操作，因为在“什么是意义”、“意义相同的标准”等关键问题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标准。

2. 概念相同说

受当时苏联学者观点影响，我国学者在判定是否是同义词的问题上也试图采用概念相同的标准。20世纪50年代，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崔复爱编著《现代汉语词义讲话》等都指出同义词是同一概念内具有各种细微差别的词。60年代初，石安石进一步论述了判定同义词的概念相同说：“同义词是概念相同而且词义有所不同的词。同义词间的意义差别不能大到概念的差别，只能是同一概念下的细微差别，或所谓‘补充意味’的差别，例如感情色彩上的、风格上的、应用范围上

的，等等。像汉语中的‘老头儿’和‘老头子’，‘生日’和‘诞辰’，‘母亲’和‘妈妈’，‘悲哀’和‘悲伤’，‘肥’和‘胖’等，就都是同义词。如果意义差别超出了一个概念的范围，那么它们的意义无论怎么‘相近’，也不是同义词。”^[6]

和意义相同说相比，概念相同说看起来似乎更清楚、易于掌握，但实际上同样面临着不同人对“概念相同”可能有不同理解的难题。对此，王理嘉、侯学超（《怎样确定同义词》，见《语言学论丛》，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3）是这样评述的：“根据‘同意义’的标准来确定同义词，很难把问题弄清楚，因为什么叫‘同意义’，标准不明确。”“根据概念的标准来确定同义词，就是从两个或更多词的意义中抽象出一个共同的概念来。实际上，这和从两个词中去综合一个共同意义的做法是一样的。因此，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同义词的范围同样会随着各人对概念的不同理解而有所不同。”比如，“肥”和“胖”这两个词，如果把这两个词的意义归结为“含脂肪多”这样一个概念，那么这两个词就是同义词；如果把词义联系对象的其他本质特征也包括进来，那么“肥”的概念应该是“动物含脂肪多”，而“胖”的概念应该是“人体含脂肪多”，这样二者就不代表同一概念，也就不构成同义词了。

张志毅《确定同义词的几个基本观点》也明确指出“确定同义词时，用逻辑标准代替语言标准，用概念代替词义，是不对的”，因为“逻辑仅仅是同义词存在的基础之一，而不是主要的基础，更不是唯一的基础”。概念相同说实质上就是把“同一概念”作为确定同义词的唯一根据，从而用概念代替了词义。其结果就是“在同义词研究中忽略词汇系统的界限，把不同词汇系统的‘同一概念’的词当作同义词”，如“箸”和“筷子”，“老头”和“父亲”，“郎中”和“医生”等；同时又排除掉了“词义大部分相同的这类同义词，如‘心情’和‘心绪’，‘朴素’和‘朴实’，‘歌唱’和‘歌颂’”。张志毅特别强调词汇系统在确定同义词时的重要性，这是同时代的学者未曾注意和充分论证的方面。

3. 所指对象同一说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也从另一角度来思考同义词的判定标准问题，这就是在意义和概念之外，引入“所指对象或事物”这一参照物。孙常叙提出：“判定同义词，唯一的依据就是它们是不是概括同一对象。”^[7]根据这一标准，孙常叙又进一步区分了同义词和近义词：近义词和同义

词的区别就在于它们是否能够在同一句子中替换并表达同一事物。如果替换后不改变所指事物，就是同义词，反之，不管两个词之间意义多么相近，也只能是近义词。此后，刘叔新把这一观点加以深化和系统化，指出：“所指事物对象的同一，是词与词能成为同义词的决定因素”，“同义词由于指同一种事物对象，因而是意义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而存在细微差别的词……近义词由于各指不同而相近的对象，只能是意义基本上不同而有些接近的词……因此，是否指同一的事物对象，成为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区别标志和划分的准绳。”^[8]

所指对象或事物同一说比意义相同或概念相同说有优势的地方是，它避开了“意义相同”或“概念相同”这些不易讲清楚的命题，而直接诉诸于客观存在物——所指对象或事物。例如“读物”和“刊物”，“演说”和“谈话”分别指的不是一样的东西或事情，尽管它们的意义相近也不成其为同义词。但是何谓“对象同一”、“事物同一”仍需一个具体而明晰的依据，否则依然会流于主观臆断。为此，刘叔新后来提出了“同形结合法”来检验和判定两个词是否指同一对象、是否构成同义词。

4. 替换法

一些学者试图在意义之外为同义词的确定寻找形式标志，于是提出了所谓的“替换法”。20世纪50年代，高名凯等学者已经注意到词的同—与可替换的关系。到了60年代，王理嘉、侯学超进一步明确地把可替换性看作是确定同义词的最重要的根据。他们指出：“从词的功能看，同义词就是两个或几个在使用范围上有相通地方的词……所谓使用范围的互通，反映在言语中就是两个词可以互相替换。两个词如果在同一个上下文中可以互相替换而不改变句子的基本意义，那么它们就有意义上的共同性，就是同义词。”“词之间含义上的共同性和使用上的可替换性是确定同义词的两个共同的必要条件。”^[9]

替换法的提出，反映出人们希望找到判定同义词的形式化的可操作的方法，以避免人为因素、主观因素的干扰，使同义词研究更科学、更精确。但是这一方法只注意到了同义词的可替换的一面，而忽略了其不可替换的另一面，因而对许多语言事实无法解释。对此，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张志毅（《确定同义词的几个基本观点》）、刘叔新（《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划分》）等学者有许多深入的论述。张志毅还针锋相对地指出：“同义词的替换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义词的不可替换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替换并不是同义词的本质特征。”

5. 同形结合法

刘叔新认为,应该而且可以明确区分同义词和近义词。“不同的词,凡词义反映同一种对象的是同义词,各反映不同的对象而有相近处的是近义词。”那么如何判定是反映同一种对象呢?他提出了所谓“同形结合法”。具体就是:如果甲+丙和乙+丙指同样的事物,那么就可断定甲和乙有同样的对象,是同义词;如果甲+丙和乙+丙不指同样的事物,而甲和乙在意义上相近,它们就必然是指不同的对象,相互只是近义词。用公式表示就是:如果 $A+C=B+C$, 则 $A=B$ 。例如“迎接客人”=“迎接来宾”,则“客人”和“来宾”是同义词;而“效果如何” \neq “结果如何”,那么“效果”和“结果”就不是同义词,而是近义词。^[10]

同形结合法的提出,是人们试图寻找判定同义词的形式化标准的又一次努力和尝试,其对语言事实的解释能力如何仍需实践和时间的检验。有学者研究指出,同形结合法实际上是在上下文中确定词义所指对象的检验方法,因此本质上仍是一种“替换”。例如在“宏大的建筑物=巨大的建筑物”($A+C=B+C$)中, C 为固定词语, A 和 B 就是替换词语,其形式可以变换成:“_____的建筑物。”这样,“宏大”和“巨大”就在空格中进行替换检验。而且,词义是非常复杂的,在上下文中,抽象的词典义相同的词具体所指可以不同,如“边境”和“边陲”;而抽象词典义不同的词具体所指又可以相同,如“边境”和“边界”。^[11]因此,“所指对象同一”和同形结合法在具体实践中仍会遇到许多复杂的、有待解释的语言现象。

6. 在组合中分析同义词的思路

20 世纪末,符淮青 [《同义词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2000 (3)] 继续对同义词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探讨,提出了“在组合中分析同义词”的思路。符淮青指出,辨析词义的异同是非常复杂的,词义内容可以“二分”(分为“词的语音外壳”和“词的所指对象”),也可以作更细致的分析。根据西方语义学的分析,符淮青认为:“词义内容不只简单归结为‘意义’、‘概念’、‘所指对象’等等,而是区分为词位义、词位义的客观所指、应用中词的意义、应用中的词的具体所指。”“同义词只是词位义相同,它们在教育中的词义内容有变化。”例如“边境:靠近边界的地方”和“边陲:〈书〉边境”这一对同义词,它们都可以用在“战士守卫着祖国的_____”句

子中,二者在应用中的具体所指同它们的词位义(即词典收录的意义——笔者注)是一致的。但“中缅边境”不能换成“中缅边陲”,“祖国边陲”也不能换成“祖国边境”。这是因为在“中缅边境”组合中,“边境”指“两国靠近国界的地方”,而在“祖国边陲”组合中,“边陲”指“靠近国界的本国领土”,“边境”、“边陲”的具体所指都发生了变化。词义内容上的变化是在组合中实现的,因此“在组合中分析同义词至关重要”。在组合中分析同义词,“‘替换’试验是主要方法”,“不能把‘替换’仅仅作作为鉴定同义词是否同义的方法,而应把它作为进行多方面对比分析的方法”。在组合中分析同义词可以讨论许多问题,比如“组合中词的语义范畴的变化”,如“光辉”和“辉煌”,词性不同,但在一定组合中,可以因具体所指发生变化、语义范畴变化而同义。另外,在组合中分析同义词还可以“显示同义词组合的差别”、“辨析词的词位义”,等等。

同义词的组合分析思路把同义词研究由传统的静态分析层面引入到了新的动态分析层面。这给同义词研究提出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词的同义现象究竟是发生在静态的、储存状态下的词汇聚合层面,还是发生在动态的、应用状态下的句法组合层面,抑或兼而有之?相信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研究会推动 21 世纪同义词研究的发展。在组合中分析同义词的思路是基于词义内容的复杂性和“词位义”在句子应用中会发生变化这一语言事实而提出的。但是不管怎么分析,人们最渴望知道的还是答案,即 A 和 B 两个词到底是不是同义词。因此,同义词的组合分析思路在揭示和解释一些复杂现象的同时,还应该在提供明确答案方面下工夫。这个问题实际上与同义词研究的目的相关。符淮青认为,目的不同,同义词研究也不同。他认为汉语同义词研究发展到今天,形成了三种分析类型:一是古代学者为理解古籍中词义的异同所做的同义词分析,以《尔雅》为代表;二是为指导语言应用,对现代语言词义、用法异同所做的同义词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同义词研究多是这样的研究。特点是确定同义词较宽松、多考虑指导应用的需要,不同同义词词典确定的同义词有较多差异;三是为研究词汇、词义系统所做的同义词分析,这是随着对同义词现象认识加深而出现的新的研究要求。这方面的研究,前人已经开始做了,但还需进一步深入探讨。“如何在词汇、词义系统中,从聚合、组合关系两个角度分析同义词,无疑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总的来看,20 世纪的汉语同义词研究是沿着多元化的态势发展的。

多元化的研究态势有利于学术的繁荣, 21 世纪汉语同义词研究应该继续保持这种态势, 并在某些方面争取有大的突破。

(二) 构词法研究

19 世纪中晚期以后, 在西方语言学的启发和影响下, 汉语语言学开始研究汉语的词和词的构造等问题, 汉语语言学始有构词法研究。汉语构词法问题首先是在语法研究中进行的。1898 年出版的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有不少地方涉及构词法问题。随着汉语词汇学, 特别是现代汉语词汇学的建立和发展, 构词法问题遂成为汉语词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近 1 个世纪以来, 汉语构词法研究(包括造词法研究)“经历了相当长的材料积累和理论探讨的过程, 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12]。值得注意的是, 汉语构词法研究已经并且正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 这些变化是: (1) 对构词成分及其关系的分析, 由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语法分析, 转变为 90 年代以后的语义分析; (2) 由注重构成成分性质及其关系的单一层面分析, 逐渐扩展为构成成分性质、关系、结构及其表义方式、意义变化等并重的多个层次分析。

1. 20 世纪初的汉语构词法研究

薛祥绥(《中国言语文字说略》)借鉴梵语的“六合释”分析了汉语复合词, 指出汉语同于“六合释”的构词方式有四类: (1)“复合”类, 例如“通达”由同义之本字假字合成;“山林”由相类之字连成新字, 其义与原字有关而不相同。(2)“限定”类, 例如“剑盒”是两词相接, 其一附以说明他词之格;“白璧”是以状词限定名词成新词;“雪白”是名词与状词相合成一状词;“精微”是状词与状词相合成一疏词。(3)“假借”类, 指二词相结为一字, 其义所指乃在所属之人, 例如头秃者为“秃头”。(4)“带数”类, 例如“三坟”由数词与名词合为一词;“二八”由二数字结合成词。与“六合释”不相合的有“译音之字”, 如“琉璃”;“表声之字”, 如“婀娜”;“虚助之字”, 如“纷若”等。此外, 薛氏还提出了相当于今天所说“词根、词缀”的概念——“语根”、“语系”:“语根不变, 缀以语系, 职因语系而明。”应该说, 薛氏的研究“为汉语的构词法体系勾勒出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13]。

这一时期, 对汉语构词法问题持续不断进行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的是黎锦熙。1921 年,《黎锦熙的国语讲坛》的附录“词类连书条例”中

记录了黎锦熙对词的结构形式的认识。他把“复字名词”分为六类：(1)合成的：两个字拆开独立，就没有意义了，如“蜘蛛”。(2)并行的：可以拆开独立，但合用时只算是一个名词，如名与名合的“道路”，形与形合的“富贵”，动与动合的“学问”等。(3)联属的：两个字不同义类，不是并行，是相联属而成一个名词，如两名相合的“男人”，形名相合的“温泉”，动名相合的“招牌”，动形相合的“新闻”等。(4)对待的：两个字的意思相反，但合用时是一个名词，如名与名合的“昼夜”，形与形合的“多少”，动与动合的“生死”等。(5)叠用的：两个同样的字，重叠起来，如“人人”。(6)带语尾的：如带“头”字的“石头”，带“儿”字的“杏儿”，带“子”字的“桌子”、“胖子”等。

1929年，黎氏又在《复合词构成方式简谱》[《国语旬刊》，1929(11)]中系统地讨论了汉语复合词的类型。他把汉语复合词分为三类：(1)“合体”类，如“仿佛”、“依稀”等，这一类主要是单纯词。(2)“并列”类，又分“同义”、“对待”、“重叠”三个次类。“同义”的(比类合谊，融为一词)，如“地方”(双名)、“回旋”(双动)、“光明”(双形)；“对待”的(两字相反，浑括成义)，如“东西(物件)”(双名)、“呼吸(气息)”(双动)、“长短(度量)”(双形)等；“重叠”的如“常常”(重形)等。(3)“相属”类，又分“两名相属”、“动名相属”、“形名相属”、“动副相属”、“带词尾”等次类。例如，两名相属的例子有，A. 以上名别下名(下名是主，上名依属)的“男仆”(别性)、“酒缸”(标类)、“草绳”(明质)、“蚂蚁”(喻型)等；B. 以下名辅上名(上名是主，下名依属)的“晚间”、“码头”(定时空)、“光线”、“眼球”(表形质)、“我们”(表复数)等。

黎锦熙的分析“是新中国成立以前最细致最系统的构词法分析”^[14]。新中国成立以后，黎氏在其《汉语语法教材》(商务印书馆，1959)中，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汉语构词法基本系统”，从“词的创造方法”角度把汉语词的结构分析为“句法构词”、“形态构词”和“语音构词”三种类型。

2.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汉语构词法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学者都加入了汉语构词法的讨论。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分出了“联合式”(如“斗争”、“丰富”)、“主从式”(如“优点”、“武器”)、“动宾式”(如“动员”、“革命”)。张

志公、高名凯、周祖谟等学者也都对汉语复合词的构造方式进行了多种分析。

根据各家的研究成果,1956年完成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下称“暂拟”)构词法部分,对汉语构词法有较详细的分析,可以看作是这一时期汉语构词法研究的一个代表。“暂拟”把汉语词汇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两大类。“单纯词”包括“单音单纯词”和“多音单纯词”两类,前者如“水”、“鱼”等,后者如“蜘蛛”、“芍药”、“哈达”、“鸳鸯”等。“合成词”下又分两大类:(1)不包含辅助成分的,有“联合式”(如“人民”、“矛盾”)、“偏正式”(如前偏后正的“国旗”、前正后偏的“马匹”)、“主谓式”(如“心疼”)、“动宾式”(如“出席”);(2)包含辅助成分的,有“实词素加虚词素”的“桌子”、“椅子”、“棍儿”、“石头”、“姑娘家”等,有“实词素前面加虚词素”的“老鼠”、“老虎”、“老三”等,有“形词素加一个虚词素”的“热忽忽”、“酸溜溜”、“绿油油”等。“暂拟”提出了“词素”这一构词单位,并把词素区分为实词素(动词素、名词素、形词素)、虚词素,把出现在合成词中的虚词素称为辅助成分,使构词类型的分析更细致。

陆志韦等人的《汉语的构词法》着重探讨如何确定现代汉语的词,并对现代汉语各类合成词的构词类型作了分析,成为这个时期构词法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汉语的构词法》认为从各个成分的意义关系来说,汉语的构词法和造句法是共同的,并根据构词语素的语法类、词的结构层次、构成的词的词性分类等,把汉语的合成词分为“偏正格”(又分偏正格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连词等类,如“羊肉”、“通红”、“快走”等)、“后补格”(又分结果性后补结构、趋向性后补结构,如“红透”、“走出来”等)、“动宾格”(又按动字的音节划分类型,如单音动字+多音宾语,多音动字+单音宾语等,如“鞠躬”、“打哈哈”等)、“主谓格”(又分名词、形容词、其他等类,如“心焦”、“老头儿乐”等)、“并列格”(又分两字、三字、四字并列等类,如“弟兄”、“工农兵”“横七竖八”等)、“重迭格”(包括两字、三字、四字重迭的各种形式,如“哥哥”、“明明儿”、“思思想想”等)和“带前置成分”(如“老黄”、“第三”)和“带后置成分”(“桌子”、“看头儿”)等类型。

孙常叙在《汉语词汇》中对汉语词汇进行了造词法分析,提出“汉语造词方法系统表”,从另一角度对汉语词汇的结构和构成进行了研究,是对广义的构词法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孙氏认为,汉语造词法分“语

音造词法”、“语义造词法”和“结构造词法”三大类。其中“结构造词法”是个大类，又分“词汇—结构造词法”和“形态—结构造词法”两大次类。例如“词汇—结构造词法”中有“词组结构”（“夏季”、“落花生”）、“短语结构”（“地震”、“民主”）、“附注”（“鱼”附注于“鲤”造出“鲤鱼”）、“重叠”、“加前缀”（“阿叔”、“老人”）、“加后缀”（“架子”、“作家”）等类型；在“语义造词法”中有“比拟造词”（如“螺蛳”，原指田螺，后指工业上用的螺旋钉，后写成螺丝钉）。另外孙氏还提出了“词根”、“非词根”和“词缀——前缀、后缀”等单位名称。

关于汉语造词法，20世纪80年代，任学良继续进行研究，其《汉语造词法》除列有“句法学造词”、“语音学造词”外，还明确提出了“修辞学造词法”。具体分“比喻式”（如“银耳”、“油水”）、借代式（如“须眉”、“巾帼”）、夸张式（如“千古”、“万一”）、婉言式（如“后事”、“有喜”）、综合式（如“板鸭”、“鹅卵石”）等。

这一时期，一些学者还从复合词构成成分表义的角度丰富了构词法的研究。崔复爱（《现代汉语词义讲话》）对偏义词词义的说明揭示了词的构成成分表义特点：偏义词是指一个词偏重于其中一个词素的意义，如“国家”偏重于“国”的意义，“动静”偏重于“动”的意义，另一个词素的意义比较轻些，甚至被吞并了。符淮青在其《现代汉语词汇》中，专辟一章（第九章）系统讨论了构词语素在构词中的表义和变异问题。构词语素在构词中的表义主要有5种情况：（1）语素义直接和完全表示词义，如“平分——平均分配”等；（2）语素义直接但部分表示词义，如“平年——农作物收成平常的年头”，其中“平”义为“平常”，“年”义为“年头”，而“农作物收成”的词义在语素义中完全没有，但却是词义所包含的；（3）语素义和词义是间接的联系，词义是语素义的引申、比喻义，如“铁窗”借指监狱，“风雨”比喻艰难困苦；（4）部分语素在构词中失落原义，如“忘记”中的“记”，“船只”中的“只”原有的语素义都失落了；（5）所有的语素义完全失落，如“东西”泛指各种具体的或抽象的事物，构词中语素的现有义和词义没有关系。语素义在构词中的变异有三种：（1）意义上的变异。在合成词中语素义同有关义项的意义除有一致关系外，还有关联关系、种类关系、比喻关系、借代关系等。（2）作用上的变异。一种是语素在不同的词中所处的语法地位不同，表义作用不同（如“尘封”是主谓式，“尘”相当于主语，表示“封”是“尘”造成的，而“尘肺”是偏正式，“尘”修饰限制

“肺”，指出病源性质)；另一种是在同一语素构成的同类型（如同为偏正式）的合成词中，由于结合的语素不同，所构成的词反映的事物现象不同，因而语素的表义作用也不同（如“电池”、“电车”同为偏正式，“电池”中的“电”表示生电，“电车”中的“电”表示用电）。（3）特殊变异。一是语素的意义完全消失（如“作别：分别”，“作”义消失），一是语素义完全改变（如“淡竹”，“淡”已不用原义，又不能说没有意义）。

还有一些学者从前人已归纳出的构词类型中进一步发现了一些新的构词特点，如李行健在《汉语构词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语文研究》，1982（2）]一文中指出“养伤”、“打拳”、“打野外”等词的意义分别是“因伤养”、“以拳打”、“在野外打”，其间是状语和动词的关系。“伤”、“拳”、“野外”表示的不是行为的对象，而是分别表示行为的原因、工具、处所，可以把这类词的结构称作“动状”结构。

3.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的汉语构词法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汉语构词法研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重要变化之一就是，一些学者不满足于传统的以语法性质、语法关系为框架的构词法分析，转而注重挖掘构词内部的“语义结构”和“语义关系”，对汉语复合词的构词类型进行了新的描写和解释。

戴昭铭（《现代汉语合成词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功能的关系》）指出，构词和造句不是一回事，二者并非如此“对应”和“一致”。他列举了构词和造句的四种不对应情况：（1）结构方式不完全对应。偏正、并列、动宾、补充、主谓、重叠等结构方式，确实是句法结构和词法结构所共有的，但是，句法中的连动、兼语、同位、紧缩等结构方式，又是词法中所没有的。（2）组合单位不完全对应。合成词不可能像句法结构那样使用词序、虚词等手段从容地进行逻辑性的表述，有时不得不使用一些非句法手段，略去句法表达中的虚词乃至部分实词（或实词素），是最能表现事物或现象的本质特征的最重要的词素直接结合。这样，即使表达同一概念，句法的和词法的组合单位也不可能完全对应，如“瓜分”一词，句法表达是“如瓜之被分”，“狼狗”一词，句法表达则是“如狼之狗”。又如“菜干”一词，从词法上看是后一语素修饰前一语素的正偏结构，从句法上看要恢复成“干的菜”这种前修饰后的偏正结构才好理解。这是运用了“颠倒组合单位次序”的词化手段。（3）两种结构的组合种类彼此互缺。比如，“主谓”或“主谓宾”结构的句子，其

中任何一项都可以加上修饰语,使组合成分增至很多。而“主谓”或“主谓宾”结构的合成词,一般只限于二至三个词素,各词素前不加修饰成分。句法中有而词法中无的组合类型非常多,相反,也有一些组合类型只在词法中出现而不在句法中出现,如“名+量”(车辆)、“量+名”(磅秤)、“动+量”(唱段)、“副+名”(不法),等等。(4)同样组合的性类不一定对应。在句法结构中,向心结构的性类同它的中心成分的性类一致,词法结构则不一定。如“能干”作为词组,是动词性的,作为词,却是形容词。

刘叔新在《复合词结构的词汇属性——兼论语法学、词汇学同构词法的关系》一文中,对长期以来构词法隶属于语法,从语法结构、语法关系的角度分析复合词结构的说法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认为“复合词结构无论其词素的顺序形式还是意义关系,都无句法性质,也非词法现象,而只是词汇性的”。“复合词乃至各种词的结构方式以及构造新词的各种方式,都是词汇学的研究对象。”刘氏指出,“词汇学研究构词法,概括来说,就是一方面描写各种词的结构方式(词式),另一方面研究造出新词的种种方法(造词法)”。

黎良军(《汉语词义学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认为,合成词的“语素序”“是没有句法性质的一种约定顺序”。“分析合成词的结构,只能是分析它们的语义结构。”他提出了几种构词的语义结构类型:“互限式”(如“道路”)、“反义概括式”(如“男女”)、“类义互补式”(如“爪牙”)、“分别提示式”(如“病房”)、“因果式”(如“打败”)、“物动式”(如“卷烟”)、“短语词化式”(如“百姓”)、“截取古语式”(如“动辄”)等。

徐通锵对传统构词法理论和分析方法完全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一谈起构词法,人们就会想到述宾式、述补式、主谓式、联合式、偏正式这些名称,认为它是语法结构的一部分。这是仿效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来研究汉语而得出的一种结论,实在是张冠李戴,可以说是汉语构词研究的一个误区。”^[15]为此,徐氏提出了自己的构词法理论和分析方法,认为“汉语词的构造最主要的是语义问题,需要重点弄清楚词内字与字之间的语义关系”^[16]。因此,从语义关系看,汉语构词法大的类型就有两种:一是“向心结构”,如“斑马、海马、木马”中,“马”位置居后,是语义核心;二是“离心结构”,如“马鞭、马车、马枪、马靴”中,“马”位置居前,非语义核心。

和以上几位学者不同，符淮青对汉语传统的构词法分析采取了积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传统的构词法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汉语多个构词成分组成的语言单位结构的理论根据和分析方法”。“尽管这些分析描写存在种种问题，但不能否认，现有的汉语一般语词的构词法分析，汉语历史构词法的分析，断代、专书的构词法分析，是人们对语言构造一种理性认识的成果。”“现有的构词法分析有它的较强的解释能力，它在语言理论研究和指导实践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的构词法分析取得了以下四方面的成果：（1）提供了描写汉语多个构词成分组成的语言单位的结构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不少学者运用通行的构词法理论和分析方法，研究汉语构词法的发展，研究某一历史时期、某一专书的构词法，取得了重要的成果；（2）构词法的研究对词典收入的语言单位性质的确定、划分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这表现在，对字和词、词和词组、固定词组和自由词组的区分，对词典收入什么样的语言单位，科学地区分不同的语言单位有深刻的影响；（3）构词法的分析对正确解释词语的意义有着重要的作用，如词典对“尘垢（灰尘和污垢）”、“浅见（肤浅的见解）”、“藏书 1（收藏图书）”、“藏书 2（图书馆或私人收藏的图书）”等词语的解释应该是建立在对这些词语进行正确的构词法分析基础之上的；（4）构词法的分析是词义理据说明的基础，词义文化义说明的重要依据，如对“须眉（表男子）”、“巾帼（表女子）”的理据的说明。^[17]

20 世纪末，汉语构词法研究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由过去单一层面的研究开始向多个层面的分析过渡。符淮青（《构词法研究的一些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包括五个分析层面的“扩展的构词法分析”思路。具体内容是：用“AB”表示合成词，“C”表示它的词义，这样构词法研究的第一个层面就是研究 AB 的性质，第二个层面研究 AB 的关系、结构，第三个层面研究 AB 表示 C 的方式，第四个层面研究“A”、“B”在“AB”中的意义及其变异，第五个层面研究 AB 表示 C 的信息量，如是全部表示还是部分表示，如果是部分表示，那么表示了哪些内容，哪些内容没有表示。目前，“扩展的构词法分析”思路还处于提出阶段，具体研究还需后人努力。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汉语构词法研究所发生的变化是深刻的，反映出汉语构词法研究正在走向深入，相信这些变化会对 21 世纪的汉语构词法研究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二、现代词汇学意义上的现代汉语词汇研究

20 世纪, 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开创了注重语言“结构”和“系统”研究的结构语言学流派, 世界语言学开始步入现代语言学时期。现代语言学的几个重要特征是“描写性”、“系统观”和“共时论”。它强调语言是一个结构系统, 研究语言应该区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 应该抓住“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这两个语言的根本关系来描写语言。在结构语言学思潮的影响下, 欧洲的语言学家开始运用“结构”和“系统”的理论来研究词汇、词义, 并于 20 世纪 30 年代提出了著名的语义场理论, 词汇学研究也进入了现代词汇学时期。现代词汇学关注的重要问题有: (1) 词汇、词义系统; (2) 词义的分解与描写; (3) 词汇、词义的聚合、组合分析等。这些问题大多是西方语义学研究的内容, 因此有学者认为, 现代词汇学的特色之一就是它的“语义学特色”(其他还有计量研究特色, 形式化表述特色, 用计算机、大型语料库对词汇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的特色等)。^[18]

汉语词汇学建立的历史虽然不长, 但所讨论和研究的问题有些已经属现代词汇学范畴, 这些问题有: (1) 汉语词汇体系问题; (2) 词义构成分析; (3) 词汇、词义的聚合和组合分析。20 世纪末, 也出现了词汇的语料库语言学研究。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 学者们逐渐探索出分析词汇、词义的一些重要理论和方法。

(一) 汉语词汇体系研究

1. 五六十年代的词汇体系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学者开始全面讨论词汇学问题。其中首先接触的就是词汇体系或系统性问题。1955 年, 周祖谟在《语文学习》上连续撰文讨论汉语词汇问题, 这些文章后集结成《汉语词汇讲话》。在《汉语词汇讲话》“汉语的词汇和基本词汇”一节中, 周祖谟论证了汉语词汇的系统性。他指出“词汇的系统性就表现在基本词汇与词汇间的内在联系, 不但构词方面有其联系, 就是词义方面也有一定的关联”^[19]。这可以拿由“胜”构成的一系列词来说明。“胜”可以构成“胜利、战胜”一类词, 也可以构成“名胜、形胜”一类词。两类词的意义是有关联的。通过对基本词汇的研究, 可以找到词义上有关联的“词族”, 可以了解词汇发展的规律和系统性。1958 年, 周祖谟又撰文 [《词汇和词汇学》, 《语文学习》, 1958 (9)、(11)] 着重论述了“词汇构成一个统

一的词汇体系”的观点。他指出汉语词汇的系统可以从构词成分和构词类型两个方面得到反映：(1) 古代就有的词作为词素构成了一大批词，如“工”构成了“工人、工业、工整、工致”等词，这些词不仅在构词成分上有关系，而且在词素的意义上也有联系，如“工人、工业”的“工”意义相同，它有别于“工巧”义的“工整、工致”中的“工”；(2) 每种语言的所有构成类型是成系统的，如汉语构词有两大类型，词根复合法（如“运动”、“展开”）、附加法（如“第一”、“麦子”），有别于俄语的改变重音、在词干上加前缀后缀，词干复合等类型。因此汉语整个词汇构造上也就有了系统。此外，词义的发展，词与词义方面的关系也表现出词汇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1961年，黄景欣撰文《试论词汇学中的几个问题》全面阐发了词汇的体系问题。他指出：“词汇是语言的构成要素。一种语言的词汇是由该种语言的一系列具有一定形式、意义和功能特征的互相对立、互相制约的词汇单位（包括词以及和词具有同样功能的固定词组）构成的完整体系。”他根据“词汇—语法范畴”标准，逐层划分词汇，认为词汇体系最高一层互相对立的单位是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代词等“几个最大词类”，这些词类又可各分成几个更小的对立单位，“直到不能再分析为几个对立单位的那些词，就是词汇体系的最下的一个词汇层”。黄景欣的观点在当时“颇具新意，意义重大”^[20]，但从“语法范畴”标准入手来概括词汇体系的做法却引发了后来学者的不同认识。

1964年，刘叔新《论词汇体系问题——兼与黄景欣同志商榷》针对黄氏的一些观点指出：“把支配词汇的语法因素当做词汇本身体系结构的经纬，以为这就解决了确立词汇体系结构的问题，是很值得商榷的。”“词汇如果存在着体系，它也只能建立在词汇本身的组织特点上。”根据这一认识，刘叔新探讨了能够对词汇构成体系起作用的同义关系、反义关系、分割对象关系以及搭配关系等词语间的组织关联，最后认为：“目前所能看出的词汇内部的组织关系，事实上只表现在上面分析过的几种词汇单位组织上”，“词汇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含有种种小组织的整体，只不过不足以成为体系。”对于刘氏的观点，周荐是这样评论的：“刘文的重要性，今天看来，并不在于词汇是否足以构成体系，而在于提出了词汇结构组织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在方法论上有着重大的价值——词汇不同于语法，词汇体系有别于语法体系；词汇研究应与语法研究在内容上、方法上严格区别开来。词汇能否成体系，当然只

能看词汇的构成单位相互间的词汇性的结构关系，而不能以语法的关系或逻辑的关系代替之。也唯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够进一步探讨词语间的各种关联，才能考虑词汇本身是否构成体系的问题。”^[21]

这一时期，学者们针对“词汇仿佛是一盘散沙”的认识，提出并论证了词汇是有系统性和成体系的。这种认识上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它开辟了现代汉语词汇学研究的又一个重要领域。学者们首先是从汉语词汇构词规律的角度来认识词汇体系性这一问题的，这抓住了汉语词汇自身的特点，对以后的研究有启发意义。关于词汇体系判定标准的争论及“词汇结构组织”思想的提出，深化了汉语词汇体系的研究。

2. 八九十年代的词汇体系研究

八九十年代，一些学者继续从理论上论述汉语词汇体系问题。武占坤、王勤在所著的《现代汉语词汇概要》一书中论述了词汇体系问题，对此，符淮青（《汉语词汇学史》，158～159页）是这样分析和评论的：

作者认为词汇是一个体系，其表现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说明。整个词汇成分，可分为词素、词、熟语三个等级。词汇成分间有层递联系性，这是词汇体系性的一个重要的侧面。词汇成分在总的方面存在着共同的特点，服从于共同规律的支配，这也是词汇体系性一个重要表现，如外来词进入汉语，是“民族化”了的，这就体现了这种总规律特点的制约。词汇体系性也表现在词汇成分间历史的发展演变中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上，如词和词之间存在词义互相影响而语义界限调整、同化、异化等现象。词汇类聚成分在共时的“类”的联系中存在有上下逐级隶属的现象，这是词汇系统性在词的类聚上的表现。词的称谓功能是词汇成分的基本功能，因此由称谓内容（语义内容）同一和对立形成的纵的逐层隶属、横的相互对待的大小词汇组系，当然成了词汇系统中的根本现象。词汇系统是一种历史现象，它也有民族性。作者还指出，词汇是数以万计的词汇成分的聚合体，它的组织形式和语音、语法相比，要松散得多。个体符号之间的制约性比较弱，松散的词汇系统给个体符号的增减以较大的自由，因此，词汇反映社会的各种变化必然是敏感的经常的。

作者上述观点是到当时为止对词汇体系性问题的相当深入而有根据的说明。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发掘汉语词汇的结构组织，着重从语言分析、语言描写的角度论证了汉语词汇成体

系的观点。他分析了 11 种“真正词汇本身内部的词语结构组织情况”，这 11 种结构组织是：同义组（如“吝啬、慳吝、小气”；“顺利、顺遂、顺当、一帆风顺”）、反义组（如“停战—开战”；“不足—充足、充分”）、对比组（如“具体—笼统”；“民主—集中”）、分割对象组（如“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固定搭配组（如“意气风发”；“文质彬彬”）、特定搭配组（如“理—发/头发”：“理”含“修剪”义；“生机/英姿—勃发”：“勃发”表焕发、旺盛）、互向依赖组（如“母鸡—鸡蛋”；“武器—杀伤力”）、单向依赖组（如“嫂子→哥哥”；“女婿→女儿”）、挨连组（如“春—夏—秋—冬”；“宫—商—角—徵—羽”）、级次组（如“总行<分行<支行<办事处”；“里<丈<尺<寸<分<厘”）和同素组（如“地 地面 地底 地下 地洞 地窖 地埤子 地段 地衣 地府 地铁 地产 地下 地皮 地堡 地势 地形 地温 地下室……平地一声雷 脚踏实地 肝脑涂地 五体投地……”）。他根据这些分析得出结论：“既然全部词语都被相互的意义结构关联安排在一定的结构组织中，而且各种结构组织既各有不同的特点，各自拥有一定数量，又彼此这样或那样地联系着，因而可以认为，现代汉语词汇形成一个体系。”

这一时期，张永言（《词汇学简论》）、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周国光（《概念体系和词汇体系》）等学者也分别从“词汇场”、“语义场”中词义间的相互制约、从概念体系等角度论述了词汇体系问题。梅家驹等（《同义词词林》，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借鉴西方语义场理论，第一次以词典的形式全面展示了现代汉语词汇的“语义体系”。

汉语词汇体系问题研究，历史虽然不长，但却抓住了词汇体系研究的关键——词汇间的各种关系，取得了较大的成果。词汇间的各种关系主要是词义上的，如同义关系、反义关系、对比关系等；也有概念上的，如“分割对象组”中各词语间的关系；还有构词上的，如“同素组”中词语间的关系。学者们的研究表明，正是这些关系把“分散”的词汇组织了起来，形成了各类“词汇组织结构”，构成了整个词汇体系。

西方语义学对词汇系统问题也一直有所研究，他们主要是在语义场理论的指导下，在语义关系范围内进行研究的。从关系出发研究词汇体系或系统是一种宏观的研究，与此相对，西方一些语言学家还试图从词义构成成分分析的微观角度说明词汇之间的关系和词汇系统。20 世纪

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认为关系(如同义关系、反义关系)可能还不是最“初始”的东西,它还可以分解,分解成更为基本的概念,关系不过是更为复杂的概念。一些学者又提出了分析词汇系统的三种单位——对比(contrasts)、场(fields)和框架(frames),进一步丰富了传统的语义场理论。^[22]

词汇体系或系统性问题是词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面,它涉及词汇学理论乃至普通语言学理论的一些根本认识,中外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探讨。21世纪汉语词汇体系或系统研究,应该注意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借鉴国外的最新理论,尝试把宏观的词汇关系分析与微观的词义成分分析结合起来,在研究方法、研究角度方面,争取有新的开拓。

(二) 词义构成分析

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结构语义学对词汇、词义的研究主要采取两条路线,一个是以语义场理论为指导,从宏观角度研究词汇成员的存在状态和相互关系与制约,另一个是运用义素分析法(或叫“构成成分分析”),从微观的角度,对单个词的词义(主要是概念义)进行分解,找出构成词义的各个成分及其组成方式。义素分析法作为一种具体的分析方法对我国词汇学研究产生过很大影响。在义素分析法的影响和促动下,我国学者经过长期摸索,也总结出了分析词义的另一种方法——“词义成分—模式”分析法。

1. 义素分析法

传统词汇学往往把词义看成是一个囫圇的整体进行分析,对词义、对词义发展的说明不够精细和形式化,因而无法适应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需要。20世纪40年代,丹麦语言学家叶姆斯列夫首先提出了对词义进行分解的“义素”分析设想。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借鉴语音学的特征分析法对美国印第安语言的亲属词作了义素分析。60年代初,美国理论语法学家卡茨等人首先把这种方法引入转换生成语法研究之中,使句法的形式化与语义的形式化更紧密地结合起来。70年代,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和利奇从不同角度对义素分析法作了深入的探讨。在法国、德国、前苏联等国家,也都有学者探讨和运用这种方法。英国学者利奇运用义素分析法对英语中的四个词:man、woman、boy、girl进行了非常成功的分析:

man: + HUMAN + ADULT + MALE

woman: + HUMAN + ADULT - MALE

boy: + HUMAN - ADULT + MALE

girl: + HUMAN - ADULT - MALE

20 世纪 70 年代末, 义素分析法传入我国, 我国学者开始借鉴这种方法分析汉语词汇。其中石安石 (《亲属词的语义成分试析》, 见《语言学论丛》, 第 9 辑, 商务印书馆, 1982)、贾彦德 (《语义学引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汉语语义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严格遵守义素分析的理论 and 程序对汉语亲属词和军衔词作了分析; 刘叔新 (《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划分》, 1980; 《论同义词词典的编纂原则》, 1982) 吸取义素分析的精神结合词典释义对汉语同义词、近义词作了样例分析; 蒋绍愚 (《古汉语词汇纲要》) 对古汉语词汇进行了义素分析。蒋绍愚和贾彦德在分析汉语词义时都十分重视把义素分析同语义场理论结合起来运用, 充分考虑到词汇的系统性研究。总的来看, 我国学者运用义素分析法对汉语的亲属词、同义词、近义词、大量的实词 (现代汉语)、古汉语词汇等进行了义素分析, 取得了一定成绩。下面举两位学者的分析例子。

刘叔新 (《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划分》、《论同义词词典的编纂原则》, 均见刘叔新: 《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 对同义词、近义词所作义素分析如表 7—1 所示:

表 7—1 刘叔新的同义词、近义词义素分析法示例

义素 \ 词			英勇	神勇
理性的	主要的	1 精神状态的表现	+	+
		2 不怕艰难险阻	+	+
		3 奋不顾身	++	+
		4 表现在战斗或斗争当中	+	+
感性的	次要的	5 精神力量的奇伟	-	+
		1 书面语色彩	+	++
		2 颂赞的感情色彩	+	+

义素 \ 词			行为	行径	行动
理性的	主要的	1 人所发生的	+	+	+
		2 有动作性	±	±	+
		3 做出某种事情	+	+	-
		4 已表现出来而为人所知	+	+	±
感性的	次要的	5 在进行中	-	-	±
		1 贬的感情色彩	-	+	-
		2 感情色彩上中性	+	-	+

刘叔新认为义素分“理性义素”和“感性义素”两大类, 理性义素

又分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种。在判定同义词、近义词时主要依据主要的理性义素，次要的和感性义素不起作用。如“行动”和“行为”（或“行径”）因其主要理性义素有不同而构成近义词，“英勇”和“神勇”的主要理性义素都相同，是同义词。刘氏的分析有这样几个特点：（1）把“感性义素”纳入义素分析之中，扩大了传统义素分析法的范围（严格意义上的义素分析法只分析词的理性意义）；（2）用短语来表示义素，形式上长短不一，很不规整，这说明对什么是“义素”这一问题，刘氏有自己的理解；（3）在义素分析中，他没有交代义素提取的依据，但看得出是依据词典释义和语感进行的，是词典释义的表格化处理。刘叔新试图运用义素分析法解决难度较大的同义词、近义词的划分问题，有自己的理解和特色，但在操作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贾彦德（《汉语语义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对现代汉语的大量实词（主要是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三大类）进行了义素分析，并致力于词义的形式化描述。例如：

对名物词的分析：

师傅：（人）[x→（教）K（技艺）] f [（在…行业中）（工业）（商业）（戏剧）…]

徒弟：（人）[x←（教）K（技艺）] f [（在…行业中）（工业）（商业）（戏剧）…]

对性状词的分析：

真实：〈xi〉（跟实际）+（符合的）

虚假：〈xi〉（跟实际）-（符合的）

红：〈xi〉{x（像）K [（鲜血）v（石榴花）]} 的（颜色）

黄：〈xi〉{x（像）K [（丝瓜花）v（日葵花）]} 的（颜色）

白花：〈xi〉[白] □ 〈视〉[（白）（耀眼）]

硬邦邦：〈xi〉[硬] □ 〈触〉[（硬）（结实）]

甜丝丝：〈xi〉[凉] □ 〈味〉（甜）（\）

对行为动作词的分析：

赢：〈d〉x {→（胜利）f [（在…中）（下棋）（赛球）（赌博）…]} zh [（人）V（队）]

平：〈d〉x {（胜利）f [（在…中）（下棋）（赛球）…]} zh [（人）V（队）]

输：〈d〉x {←（胜利）f [（在…中）（下棋）（赛球）（赌博）…]} zh

[(人) V (队)]

出境: 〈d〉 x+ (离开) zh (人) k (国境)

入境: 〈d〉 x- (离开) zh (人) k (国境)

贾彦德还提出了义素分析的操作步骤: (1) 选用成人用的语文词典, 一部不够可多比较几部; (2) 对词典释义要做考察, 必要时在保持原意的前提下做适当的调整和改动, 以便于通过比较找出义位的结构式子; (3) 列出所比较词的结构式子。

20 世纪末, 张志毅、张庆云 (《词汇语义学》第二章第二节) 从“义位的微观结构”角度分析了词义的构成。他们借鉴国外语言学的成果, 提出了分析词义构成的几个重要概念——“义值”、“义域”、“基义”和“陪义”。义值“就是词形式所表示的内容”; 义域是指“义位的量, 是义位的意义范围和使用范围, 是人所认识的具有义位所表示特征的事物集或群”; 基义“部分地相当于传统词汇学 (或语义学) 的‘理性义’‘概念义’……”“是义位的基本义值、基本语义特征, 是义位的核心……”; 陪义是“义位的附属意义、附属语义特征、附属义值、补充义值”, 是一个词的基本意义之外的含义。认为义位是由义值和义域构成的, 而义值又是由基义和陪义构成的。在此基础上, 他们总结了词义分析的几种方法, 如二元法和多元法、图表法、义素配列比较法等, 提出了一些分析原则, 如等值原则、简化原则等。这里举他们分析的一个例子 (见表 7—2):

表 7—2 张志毅、张庆云的义位分析法示例

	基义				陪义	
	来回走		犹疑		褒贬	语体
	共性	个性	共性	个性		
徘徊	+	多用	+	少用	中	通用
彷徨	+	去向不明 心情不好	+	多用	贬	通用
踟蹰	+	少用	—		中	书面
徒倚	+	少用	—		中	书面
踌躇	+	少用	+	多用	中	通用
踌伫	+	少用	—		中	书面
盘桓	+	逗留	—		中	书面
盘旋	+	留连	—		中	通用
逡巡	+	不敢	+	少用	贬	书面
踟蹰	+	缓行	+	迟疑	中	书面
趑趄	+	折回	—		中	口语

这种分析把词义分析由传统的“概念义”(即“基义”)分析扩展到“附加义”(即“陪义”)上,扩大了义素分析的范围。为此,他们详细分析了陪义的类型,如“属性陪义”(次要理性义素等):“山”的基义是“地面形成的高耸的部分”,次要语义特征有“如山聚集土石之多——人山人海”等。“情态陪义”: (1) 惋惜—功败垂成、功亏一篑; (2) 喜爱—宝宝、蚕宝宝、银燕; (3) 亲昵、亲热—小鬼、小家伙、老头儿; (4) 厌恶、憎恶—尊容、老头子、充斥、叨叨、花里胡哨(颜色)等。“形象陪义”: (1) 形态形象—汗颜(惭愧)、梯田、蘑菇云; (2) 颜色形象—彩霞、桂花、银白、红扑扑; (3) 声音形象—啊呀、知了、乒乓球; (4) 动态形象—蚕食、爬行,等等。词的附加义是词义内容的重要部分之一,张志毅、张庆云对陪义的分析拓展了我们的视野,丰富了词义分析的内容。

义素分析法虽然曾被广泛用于汉语词义分析实践当中,但自身还存在着某些缺陷,如“有一定的主观性”^[23]、“概括粗疏”^[24]这些缺陷在我国学者的分析当中也未能避免。这就大大影响了义素分析法在实际语言分析中的运用。为此,有学者开始探索词义分析的其他途径。

2. “词义成分—模式”分析

符淮青吸收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的观点指出,“构成成分分析”即义素分析法在理论和应用上都存在许多问题,试图从分析出有限的“词义成分”即“义素”来对大批词汇词义进行形式化、科学化的描写是非常困难的。^[25]他认为词义是用自然语言的“扩展性词语”表述的,词典的正确释义是扩展性词语,因此可以从分析总结词典释义模式入手,来说明词义。1989年,符淮青提出“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分析(后简称为“词义成分—模式”分析),1996年又在其所著的《词义的分析 and 描写》中详细论述了词义分析的基础、“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分析的形成等。

“词义成分—模式”是从大量的词典释义中总结归纳出来的,主要有三种类型:

(1) 表动作行为的词的“词义成分—模式”是:

$$A + {}^b B + {}^{d_1} D_1 + {}^{d_2} D_2 + \dots + {}^e E + F$$

其中 A=原因条件, B=施动者, b=施动者的各种限制, D₁=动作 1, 必有, d₁=动作 1 的各种限制, D₂=动作 2, d₂=动作 2 的各种限制, E=关系对象或关系事项, e=E 的各种限制, F=目的结果。词

义成分组成的是以动词为中心的谓词性结构。如：

d ₁	D ₁	e	E	D ₂	e	E	D ₃
刮：用刀等	贴着	物体的	表面	移动	把物体 表面的	某些 东西	去掉或 取下来

(2) 表名物的词的“词义成分—模式”： $t+L$ ，其中 t =种差，可不止一个， L =类词语。词义成分组成的是体词性结构。如：

t	L
号兵：	军队中管吹号的 士兵

(3) 表性状的词的“词义成分—模式”： $n+t$ ，其中 n =适用对象， t =性状特征，词义成分组成的是主谓结构。如：

n	t
根深：	(道理、文词) 深奥难懂

在各类“词义成分—模式”的基础上对相应的词进行“词义成分—模式”分析，例如对“吮、吮吸、嘬、嘬、啣”一组表动作行为的词的分析过程如下^[26]：

(1) 比较几种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的释义。(释文略)

(2) 考察语言实际应用：参照词典释义中的例子，不够时自拟补充。如在对比说明“吮”、“嘬”词义不同时指出“吮”、“嘬”虽同是用嘴唇吸入，但在条状物上吸附着物一般叫“嘬”，如：嘬筷子上的蜂蜜。

(3) 确定“词义成分—模式”：

B	d ₁	D ₁	D ₂	e	E
吮：	人或动物	把嘴唇	聚拢	吸取	液体
吮吸：	人或动物	在小口上			
嘬：	人或动物	把嘴唇	聚拢	吸取	液体
		在小口上			
嘬：	人或动物	把嘴唇	聚拢	吸取	液体
啣：	人或动物	把嘴唇		吸取	少量 液体

(4) 根据“词义成分—模式”比较说明词义成分的相关特征。如：这组词的词义都以“用嘴唇”为帮助特征。又如：“嘬”、“嘬”是口语词。“嘬”常有“用力(吸)”的孳生特征，“嘬”由于常用于吮吸条状物上的附着物，因而可能有“来回(吸取)”的孳生特征。

“词义成分—模式”分析的理论基础是：(1) 词义只能以扩展性词语表述；以扩展性词语的内容形式为基础概括出“词义成分—模式”。(2) 词义成分同词义的关系并不是利奇等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原子”和“分子”的关系，它是表述词义的“扩展性词语”的成分，它存在于一定的模式中。“词义成分—模式”分析重视自然语言（扩展性词语）对词义的表述，重视词义构成的模式，因而在词义分析方面弹性较大，适用范围较大，为大规模的形式化分析词义提供了较好的分析框架。这种方法已经被用来分析现代汉语的实词、同义词研究、对词典释义的检查、普通话、方言词异同的比较、词义发展的说明等。^[27]

20 世纪，汉语词汇学在词义分析精细化、科学化和形式化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吸收、借鉴国外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还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方法，这是十分可贵的。新的世纪，汉语词义分析应该扩大研究视野，进一步明确研究目的和研究方向，为语文词典编纂、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等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三）词汇、词义的聚合、组合分析

1. 词汇、词义聚合分析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学者易普森、特里尔先后提出了语义场、词汇场学说，特里尔还考察了德语表“智力”词汇场的发展变化。到了 70 年代，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发展了语义场理论，提出词汇场历时演变的 5 种可能，并用图表形式展示出来。^[28] 80 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在运用义素分析法分析词义的同时，也开始借鉴语义场理论来分析汉语词汇。贾彦德（《语义学引论》、《汉语语义学》）、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一直很重视从语义场出发进行词义的义素分析；符淮青借鉴语义场理论开辟了汉语“词群”分析领域。^[29] 词汇、词义的语义场研究或词群研究是对表达或覆盖同一概念领域的一组词或一批词进行语义关系分析（如同义关系、反义关系、对比关系、上下位关系等），这实际上是一种聚合分析。它和传统的词汇、词义分析不同，传统的词汇、词义研究常常以一两个词为对象，进行孤立的“原子主义”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局部的，覆盖面小。语义场或词群研究则不同，它紧紧抓住关系和系统，对词汇进行大范围的研究，可以很好地揭示同一词群内各词汇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存在状态，也可以较好地反映词群内部各个词汇的历史发展变化。无疑，词汇、词义的聚合分析（语义场分析或词群分析）在方法论上比传统的“原子主义”分析具有更大优势。下面介绍符

淮青对汉语两个词群的分析。

(1) 汉语表“红”颜色词群的分析。符淮青对汉语表“红”颜色词群中各词意义的异同、词群的发展变化等进行了古今对比分析。他根据辞书古注的释义,描写了古今表“红”颜色的词在词义构成上的特点和发展变化,例如,古代表“红”颜色的词的词义分别在“适用对象”、“浓度(浓中淡)”、“亮度(明中暗)”、“纯色”、“多色”、“其他内容”等方面有差异(见表7—3):

表 7—3 古汉语表“红”颜色词的词义差异

	适用对象	浓度			亮度			纯色	多色	其他内容
		浓	中	淡	明	中	暗			
缙	帛→一般			+		+		+		—
绯	帛→一般	+				+		+		—
缙	→一般	+				+		+	←丹黄	—
赧	人面	+				+		+		(面) 惭

根据分析,建立古汉语(汉以前)表“红”的颜色的性状词的词汇系统,如图7—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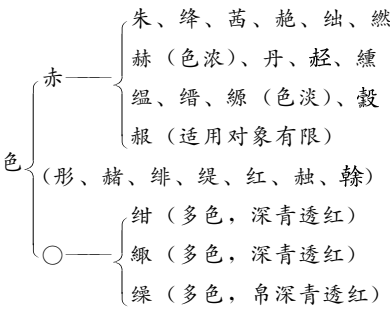


图 7—1 古汉语表“红”颜色词词汇系统图

相比之下,现代汉语表“红”颜色的词词义在这几方面有发展和变化,如表7—4所示:

表 7—4 现代汉语表“红”颜色词的词义分析

	适用对象	浓度			亮度			纯色多色	色调	其他内容	感情色彩
		浓	中	淡	明	中	暗				
红	—	+			+			+	—	—	—
鲜红	—	+			鲜明			+	—	—	—

续前表

	适用对象	浓度			亮度			纯色 多色	色调	其他 内容	感情 色彩
		浓	中	淡	明	中	暗				
红润	皮肤	+			+			+		滋润	
猩红	—	+			+			+	像猩血	—	—
红艳艳	—	+			鲜明			+	—	好看	—
红巴渣	—	+			+			+	—	—	贬
肉色	—	+			+			带浅黄	像人皮肤	—	—

因此现代汉语表“红”颜色词群是一个由不同词性的词组成的，以上下位层次关系为主的词群，可表示为（见图 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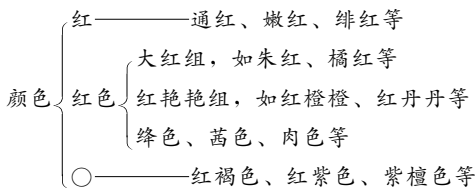


图 7—2 现代汉语表“红”颜色词词汇系统

这样就可以比较分析古今表“红”颜色词词群的异同：1）古今汉语区分红色的深浅、明暗是一致的，但现代汉语词汇数量大得多，色调区分更细致，表多色词增加，这是明显的发展；2）古汉语中有少量表示含红的事物的名词，多数是表性状的词，现代汉语从内容上讲是表性状的，但语法性质有明显差别，表达意义更丰富，是语言表达手段发展的重要方面；3）现代汉语的这一词群是单纯表颜色的，而古汉语中有本身是含红的事物，如“霞”指彩色的云，不专指红色，但如果和其他表事物的语素组合则又表红色，如“丹枫”、“朱墨”中的“丹”、“朱”，这反映了词群中词义变化的相互制约与影响等。

（2）汉语表眼睛活动的词群分析。表动作行为的词群大多是“非层次关系”词群，很难用层次关系来说明，表眼睛活动的词群（如“睁、瞪、眨、看、看见、望、俯瞰、瞥、扫、阅览、参观、游览、观察、见面、会面、探望、窥伺”等）就是这样一种词群。符淮青以他提出的“词义成分—模式”为框架，对汉语表眼睛活动的词群（主要是汉以前和现代汉语的词）进行了分析，试图探索出一种说明表动作行为的词群分析方法。其具体做法是，参考古代辞书和《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释

义，根据词的词义内容，把词群内的词分成小的次类，总结其“词义成分—模式”，然后古今对比，进行分析。例如：

1) 表眼睛活动而不含视觉内容的词的“词义成分—模式”为：

	B	d ₁	D ₁	d ₂	D ₂	E
现代						
睁	眼睛		张开			
瞪	眼睛	用力	睁大			
眯	眼睛	微微	合上			
眯缝	眼睛	微微	合上			
眨	眼睛	很快地	张开	很快地	闭上	
挤咕	眼睛	很快地	张开	很快地	闭上	
瞎	眼睛		丧失			视觉
目眩	眼睛		发花			
汉以前						
瞋	眼睛		张开			
瞋	眼睛		张开			
睚	眼睛		跳动			
瞋	眼睛	很快地	张开	很快地	闭上	
瞑	眼睛		闭上			
瞋	眼睛	怨恨地	张开			
眴	眼睛		转动			
眩	眼睛		昏黑			
			发花			

2) 表眼睛活动产生视觉而有种种不同情况的词。这一类词数量最多、内容丰富，可根据“词义成分—模式”分为不同类型。例如“d₁ D₁ + eE 型”：

	B	d ₁	D ₁	e	E
现代					
浏览		大略地	看		书报等
参观		实地	观察		展览品、设施、名胜等
了望		从高远、远处	监视		敌情
观光			参观	外国的 外地的	景物、建设
目送			注视	离去的 离去的	人 车、船等

载人的				
盯	集中精力	看		某物
瞄	集中精力	看	远处	某目标
瞄准	把枪口、炮口	对准		某目标
打量		察看	人的	衣着、长相
汉以前				
监		看	水中、镜子	
			中自己的	影子

通过分类、分组地分析这一词群中各个词的“词义成分—模式”，来总结、说明这个词群的构成、古今词群的变化等。例如，在这个词群中，词汇成员也有同义关系（如“看—瞧—瞅”、“鸟瞰—俯视—俯看”等）、反义关系（“眯—瞪”等）；表眼睛活动的词，现代汉语比汉以前丰富，但就某些范围中的词来看，汉以前的词表示的意义比现代汉语丰富。

2. 词汇、词义组合分析

20 世纪 30 年代，继易普森、特里尔提出语义场理论后，德国另一位学者波齐格从动词和名词、形容词和名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出发，提出“句法场”的观点。认为属于同一词组的词常常具有一些共同的语义特征，同一词组中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不仅存在着语法上的联系，也存在着意义上的联系。例如德语的 *reiten*（骑）意味着必须有 *Pferd*（马），*blonde*（金发的）意味着必须有 *Haar*（头发）等。英国学者莱昂斯也认为“词的意义和它的分布存在一种内在联系”^[30]。80 年代以后，我国学者也开始探讨词汇、词义的组合分析。

符淮青〔《语素“红”结合能力分析》；《“打”义分析》；《词义的分析 and 描写》第十章；《词义和词的分布》，《汉语学习》，1999（1）〕从理论和语言描写两个方面探讨了词汇、词义的组合分析。他认为，词义一方面是人对客观事物和现象的概括反映，另一方面又是在应用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词义同经常结合的词语就有密切的关系。其中既有规律性的表现，又显出众多的差异和独特性。对词义、词义成分的描写和分析应该同它的组合能力（即分布）的描写结合起来才是细致恰当的。他举例分析了表“红”颜色词词群中几组词性不同的颜色词的组合分布特点，如“大红”组性质近于区别词，不能直接做谓语，主要做名词的修饰语或末后加“的”做“是”的宾语，如“大红（的）上衣”、“*上衣大红”、“上衣是大红的”等。他详细分析了“红”、“打”作为语素的构

词能力和作为词的结合能力的情况，比如分析语素“红”的“共义”和构词中“变义”的各种关系（一致关系、种类关系、关联关系、借代关系等），指出这些关系在各种构词方式中的分布。分析了作为词的“红”的各种意义的分布条件等。他还分别分析了表行为动作的词、表名物的词和表性状的词这三类词的词义和词义的组合条件和组合格式。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在描写现代汉语词汇结构组织中的一类“固定搭配和特定搭配组”时，分析到了词义和词的搭配的关系。例如在“头发该理一下”、“理完发再洗澡”这样的搭配环境中，“理—头发/发”中的“理”含“修剪”的意义，不是一般的“整理”义。又比如在“这是一部灰色的作品”、“他摒弃了灰色的人生观”、“无人了解她灰色的心情”等句子中，“灰色”在同“作品”、“人生观”或“心情”搭配的情况下，含有“颓废、消极”义，不是一般的指某种颜色的意义。他还注意到音节和语体对词语搭配的制约，指出单音词成员一般多同单音词搭配，双音词成员多同双音词搭配；文言词语须同文言或含有书面语色彩的词语搭配，不同口语色彩的词语搭配，如“用—用人、用典”，“使用—使用人员、使用典故”，“聪睿—林君何等聪睿不凡”等。

张志毅、张庆云（《义位的组合》，见张志毅、张庆云：《词和词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词汇语义学》第四章第一节）非常重视词汇、词义的组合分析，认为现代词汇学“应该突破传统词汇学的研究范围，把组合问题作为自己的新课题”。他们全面分析了“义位”的组合系统、组合类型、制约组合的规则和组合中“义位”的变异等词义组合分析的重要问题，所作分析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指导意义。下面摘要介绍他们的研究：

（1）义位组合系统。义位组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义位内部组合，即语素之间的组合；二是义位外部组合，即义位之间的组合，也叫义位搭配。义位组合从动态上反映着义位内部关系和义位之间的关系，反映着义值及其变体，反映着义域，反映着附属义和语用意义。对义位组合的研究是聚合系统研究的“回归式”的深化，从而显示出语义组合系统。义位组合受到组合规则的制约，义位因此分为两个系统：自由意义系统和非自由意义系统。例如：“车”的自由义位是“车子”，常用且能构成80多个常用词语，占各义位构词总数的90%多；非自由义位是“水车”的“车”、“车床”的“车”以及它的动词用法，它们仅构成10来个词语。又如：“买”和“购”都有“买”这个义位，但是前者的这

个义位是自由的，可以在口语和书面语中单用，而后者的这个义位只能在书面语中单用，而且它构成的词语多含有“大量买”的意思。这说明，自由义位的组合或搭配是相对开放的系统，非自由义位的组合或搭配是相对封闭的系统。在这两个系统里，语义语境制约较强，而语法的制约性较弱。

(2) 义位组合类型。按不同标准，义位组合可以分出很多类型，如简单的二项组合和复杂的多项组合，开放组合和封闭组合，必需组合和非必需组合，等等。他们重点分析了超常类型的组合和通常类型的组合。超常类型的组合是指童话、寓言、宗教典籍、幻想作品中的一些超越现实的义位组合，也指一般文学作品的一些修辞性的组合，如“夸父逐日，羿射九日，阎王是印度人，地球人游览银河系，太阳是咸的、月亮是甜的，袖珍男子汉”。通常类型的组合是指口语和书面语经常使用的，超常类型以外的义位组合，又可分为中心类组合、中间类组合、边缘类组合等，如“关怀”跟表人的义位（领导、上级、长辈、群众、下级……）组合，是中心类组合，跟表事的义位（健康、工作、生活……）组合是中间组合，跟表物的义位（纪念碑等）组合是边缘类组合。

(3) 义位组合限制规则。义位组合既受语言外部因素制约，也受语言内部因素制约。语言内部因素有四类规则，即语义规则、语用规则、语法规则和语音规则。他们主要分析了语义规则和语用规则，主要的语义规则有“同素规则”、“施事规则”、“同系规则”、“形容规则”等 16 种规则。例如：

1) 同向规则

A. 内向的“收”与内向的动词组合：

收受、收取、收购、收回、收获、收买、收入、收听，回收、接收、吸收、招收

B. 外向的“发”与外向的动词组合：

发表、发布、发出、发放、发给、发还、发售、发送、发问、发泄，颁发、播发、出发、启发、散发、抒发、喷发

C. 第一类方向的“下→上”：

升起来、浮起来、爬起来、站起来、支撑起来、挂起来、挑起来

2) 互补分布规则

“年龄”和“年纪”的义域互补表现为下列互补组合：

年龄：果树～、马的～、生物～、生理～、心理～、相貌～、月球的～、北京的～

“年纪”一般不用于人之外。

“年龄”更多用于表示龄数，确指岁数，例如：应征～、服兵役～、入学～、生育～、结婚～、规定～、实足～、获奖时的～、～结构、～群、几个～组等。

(4) 义位组合意义变异。义位在组合中还会发生意义上的变异，常见的有 10 种，如“词化”、“异化”、“特指化”、“虚化”、“强化”、“显化”，等等。例如：

1) 异化

原来的一个义位，在义位组合中异化为对立或有差异的变体，以表容量单位的“斗”为例，它在下面两个组合系列中，向对立的两极“大”和“小”异化：

斗₁ = [斗 + (斗 > N)] → 大

斗胆、斗印、斗碗、斗石、斗大的字

斗₂ = [斗 + (斗 < N)] → 小

斗室、斗舍、斗城、斗门、斗船

2) 特指化

如“球”的“球形的体育用品”这个义位，在下面的组合系列中，有不同的变体：

球₁：角球、点球、头球、任意球 → 足球

球₂：扣球、持球、勾手飘球 → 排球

球₃：抽球、近台球、擦边球 → 乒乓球

.....

3) 狭化

例如在固定的义位组合中的变化：

离 + 休 > 老干部离职休养

→ 特指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离休

守 + 业 > 守住前人所创立的事业

→ “业”特指前人的事业

4) 褒化

A. (很/非常) 有 + (点/些) + 某些抽象的意义中性的名词：有本事、有分量、很有特色、非常有气派、有水平、有思想、有点见识、

有些眼光、有办法、有道德、有意志、有模样

B. 干/打/玩/赛/混+出+(个)+某些抽象的意义中性的名词:

干出(个)样子、打出(个)情绪、玩出(个)水平、赛出(个)风格、混出(个)人样

20 世纪末,现代汉语词汇学领域还出现了借鉴国外语料库语言学,利用大型汉语词汇语料库和计算机检索、统计、分析等,对不同地区汉语词汇现状和变异进行精细的“跨社区”比较研究的成果^[31],其新颖的研究方法和广泛运用的定量分析模式一定会对 21 世纪汉语词汇学的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第二节 对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方法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现代汉语词汇学建立发展的同时,古汉语词汇学也建立和发展起来。”^[32]这里的“古汉语”是指从殷商到清代的汉语,包括通常所说的“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对古代汉语词汇的研究主要是由传统训诂学和古代汉语词汇学完成的。我国传统训诂学一直以词汇、词义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了大量的词语考释研究,探讨了词义的引申发展,提出了“因声求义”等探求词义的观点方法。“五四”前后,西方学术思想传入我国,传统训诂学也开始借鉴国外的理论方法研究汉语。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古汉语词汇学更是及时吸收西方语义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古汉语词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因此从大的方面来看,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可以概括为“更新”的训诂学方法和现代语义学方法这两种。两种方法主要体现在汉语词汇史(或叫历史词汇学)研究和古汉语词义分析、词义系统及发展研究这两个领域。

(一) 汉语词汇史研究

传统训诂学注重词语考释,这是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基础,但研究问题过于零散,缺乏历史的眼光,是经学的附庸。1947 年,王力发表《新训诂学》(见《王力文集》,19 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批评了“五四”以来训诂学发展中的流弊,主张建立“新训诂学”,“从历史上去观察语义的变迁,然后训诂学才有新的价值。即使不顾全部历史而只做某一时代语义的描写(例如周代的语义或现代的语义),那就等于

断代史，仍旧应该运用历史的眼光”。认为“训诂学脱离了经学而归到史的领域之后，新的训诂学才算成立”。摆脱经学的束缚、确立历史观念、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指导词汇、词义发展规律的研究，这是古汉语词汇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重要转折，对古汉语词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汉语词汇发展史研究又称汉语历史词汇学，它分两大部分：一是历史的研究，即各个时期汉语词汇系统的描写以及汉语词汇系统历史演变的研究；二是理论的研究，即汉语词汇历史演变的规律以及其他有关理论问题的研究。^[33]王力、潘允中、史存直等学者开这一领域研究之先河。为汉语词汇史的建设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 王力的汉语词汇史研究

王力在《汉语史稿》（下册）和《汉语词汇史》两部著作中用丰富的材料说明了汉语词汇发展的几个重要方面。在《汉语词汇史》中，王力运用新的语言学观点，分析描写了社会发展与词汇发展，同源字、滋生词，古今词义的异同，词是怎样变了意义的和概念是怎样变了名称的，鸦片战争前后汉语的借词和译词等汉语词汇发展的各方面现象。下面扼要介绍他的研究。

（1）社会的发展和词汇的发展

运用甲骨文、金文和古籍中的材料，王力说明了不同时期出现的在生产上、阶级关系上、精神观念上有特点的词汇。例如：

原始社会的词汇，重要的有：表示天文气象的，如“日”、“月”、“风”、“云”等；人称代词已出现了第一人称“余”（用于单数，主、宾格）、“朕”（用于领格）、“我”（用于复数主宾格），第二人称有“女”（用于主宾格）、“乃”（用于领格），第三人称未见。渔猎时代，有关渔猎的词汇产生了不少，如“渔”（表示打鱼）、“田”（表示打猎）、“逐”（表示猎取某物）、“隻（获）”（表示猎得）等。农牧时代，出现了农作物的名称和表耕作的词：如表农作物名称的词有“禾”（谷）、“黍”（黄米）、“稷”（高粱）、“麦”等。奴隶社会的词汇，出现了许多指称奴隶的名称，如“臣”、“妾”、“奚”、“童”、“仆”、“宰”、“众”、“民”等。封建社会的词汇，出现了许多表示道德的抽象概念，如“忠”、“孝”、“仁”、“义”、“圣”、“贤”等。

王力认为上古社会里汉语词汇已经相当完备，社会发展、新事物不断产生促使新词的产生，如“纸”、“寺”、“观”等。

(2) 词怎样变了意义和概念怎样变了名称

先看词是怎样变了意义的。首先王力用现代语言学的观点说明词是“能指者”，概念是“所表者”，它们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是历史造成的。这种关系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变化的。“能指者”要换一个“所表者”，在正常情况下，只能转化为邻近或与原意有关的概念，这在中国文字学上叫做引申，有扩大、缩小、转移三类。词义引申的情况大致也可以归入这三类。词义的扩大是概念外延的扩大，缩小特征，扩大应用范围，如“房”，《说文》：“房，室在旁也。”本义是正室两边的房间，战国以后，可以用来指一般的房屋，如“无门无房，四达之皇皇也”（《庄子·知北游》）。词义缩小是外延缩小，扩大特征，缩小应用范围，如“瓦”，原为土器总名，后来只指屋上所盖的东西。词义转移包括很广，凡引申不属于扩大、缩小的，都可以认为是转移，如“诛”，最初的意义只有“责”，后来转为“杀戮”，词义加重了。王力还指出，应该区分词义的发展和词义的变化这两种情况。词义发展是指甲义发展为乙义，甲乙两义同时存在，例如“朝”的“早上”义，发展出“朝见”义，如牛生犊；词义变化是指甲义变为乙义后，甲义消失，如“脚”由“胫”义变化为“足”义后，“胫”义不存在了，如蚕化蛾。

再看概念是怎样变了名称的。这是从另一角度说明词汇的发展，即旧词的消亡。王力从概念和词的关系角度说明这个问题。在某个词义消失时，这个概念并没有跟着消失，它找另一个“能表者”来表示它。有时候，旧词只在文言语中实用，在日常口语中让位于新词，这就是概念变了名称，如“走路”这一概念，现在普通话用“走”来表示，古代则用“行”来表示，如“三人行，必有吾师”（《论语·述而》）。“走”当行讲，大约起于明代。又如现代“喝”的概念，上古用“饮”表示，如“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孟子·告子上》），用“喝”表示饮，是明代以后的事，如“将椰酒满斟一碗奉上，大圣喝一口”（《西游记》第五回）。概念改变名称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如“行”的概念用“走”表示，“走”的概念就改用“跑”（古代用“走”）表示。有时候，人们要求对某些事物区别得更细微些；有时候，又满足于较大的类名，如上古人们区别鸟的叫（用“鸣”）和别的动物的叫，如犬鸣为“吠”、马鸣为“嘶”等，在现代汉语这些概念都统一起来，由“叫”来表示了。王力指出，避讳和禁忌也可以使概念变更名称，如西汉吕后名“雉”，为避讳，“雉”改称“野鸡”；把“虎”称为“大

虫”，“蛇”称为“长虫”是忌讳。委婉语同忌讳相似，如“死”的别名有“崩、物故、去世、升天”等。避讳、委婉往往只产生一些同义词，不能取代原词。

(3) 鸦片战争前后的汉语借词和译词

借词和译词是汉语中重要的词汇现象。“把别的语言中的词连音带义都接受过来”是借词，即音译词；“利用汉语原来的构词方式把别的语言中的词所代表的概念介绍到汉语中来的时候，这种词叫做译词”，即意译词。

鸦片战争以前，汉语中的借词、译词有来自国内各民族的，也有来自国外的。王力主要说明了来自国外的借词、译词。例如来自匈奴、西域的有：“琵琶”（《释名·释乐器》：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师子”（《汉书·西域传》：乌戈地暑热，莽平……有桃拔、师子、犀牛）。来自佛教的有：“禅，梵语‘禅那’的简称，意译为‘思维修’，有静思之意”；“比丘，梵语，意为乞者。佛教称出家修行的和尚为比丘”。来自西洋的有：“鸦片”、“火轮船”等。

关于佛教借、译词，王力指出，有一种佛教用语已经深入到汉语的血液中，令人不再意识到它们的来源，它们也已经变了质，不能再认为是佛教用语了，如“世界”，佛经中“世”指时间，“界”指空间，佛家所谓“世界”等于古人所谓宇宙，后来“世界”、“宇宙”的意义都变了，“世界”指人间，“宇宙”指太空。又如“因果”原指佛教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的说法，现代汉语“因果”仍表示原因结果，但不再有佛教的含义。这样的词还有“现在”、“过去”、“未来”、“因缘”、“庄严”等，这些都是意译词。由此可见，意译比音译应用更普遍，更能影响语言发展，这个意译的传统，到现代也没有改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起了急剧的变化，新词的产生，比任何时期都多。西洋词汇的输入比佛教词汇的输入多千百倍。从鸦片战争到戊戌政变（1898年）新词产生有限，到五四运动（1919年）新词产生较快，五四运动以后，新词迅速增加。现在一篇学术论文或政论，新词往往达到70%以上。从词汇角度看，近60多年汉语的发展速度超过以前几千年。

1) 音译词方面：表用具的有“沙发”（英 sofa）、“马达”（英 motor），表食品的有“咖啡”（法 café）、“布丁”（英 pudding），表度量衡的有“米”（法 mètre）、“吨”（英 ton）、“安培”（法 ampère）、“伏特”

(英 volt) 等。还有音译加类名的借词, 如“卡片”(英 card)、“沙丁鱼”(法 sardine) 等。

2) 意译词方面: 现代汉语中的新词, 大多是在西洋语言影响下产生的意译词, 也有起初为音译后来改为意译的, 如“telephone”初译为“德律风”, 后改为“电话”等。汉语中有一种特殊的意译词叫摹借词, 即把外语中的一个词, 用同样的构词方式搬到自己语言中来, 如“铁路”是摹借英语的“railway”, “铁”对应“rail”(铁条)、“路”对应“way”(路)。

3) 借用日本译名: 现代汉语中的意译词大多是采用日本人的原译。王力认为, 借用日本译名不应该认为是向日语“借”词。这种借用日本译名的词有两类: 一类是利用古代汉语原有词语给以新的含义, 如“革命”、“教育”、“文学”、“艺术”等; 另一类是利用两个汉字构成按照汉语原义讲得通的新词, 如“科学”、“哲学”、“系统”、“物质”等。另有一些是来自日本的借词, 如“场合”、“手续”、“取缔”、“出勤”等。王力认为, 严格说, 这些不是借词, 而是译词, 因为没有借用日语原来的读音, 只是借用日语中的汉字而已。

2. 潘允中的汉语词汇史研究

潘允中在所著《汉语词汇史概要》中对汉语词汇的发展着重进行了“追源溯流”的研究工作。他主要是从汉语词汇史的概貌、汉语构词法发展、基本词汇发展、同义词发展、词义的历史发展规律、古今借词、译词的来源、汉语成语和典故的形成发展等方面来描写的。下面简介三个方面。

(1) 汉语词汇史的概貌

上古时期汉语词汇由简约向复杂发展。前期单音词占优势, 但不能说没有双音词。甲骨文、金文中的合体字, 如“允雨”、“小雨”等写在一起, 可以看作是汉语复音词结构的初级形态。农业生产的词汇逐渐丰富, 表抽象概念的词日益发达。例如“任地”、“浴土”、“保湿”等表农业生产的词; “仁”、“义”、“爱”, “大、小”, “有、无”, “难、易”, “虚、实”, “泰、否”等表抽象概念的词。中古时期散文、赋、乐府诗歌、唐代诗文非常发达, 文学语言空前发展。词汇新陈代谢很明显, 如《尚书》中使用的部分词语到汉代人们已经不很了解, 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换用了当时通用的词语。近代时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新词、新术语非常发达, 成为汉语词汇发展的新生力量。例如“直线”、

“平行线”、“三角形”、“锐角”、“钝角”等数学用语现在仍在使用。这一时期书面语开始口语化，产生了大量的用口语写作的文学作品。现代前期（新中国成立前）词汇发展的特点是：1）借词、译词所占比重大，社会科学的新词、新术语相当多；2）口语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取代文学语言的地位；3）复音词空前发展，在语言中占绝对优势，产生了四个音节以上的词，如“盘尼西林”、“布尔什维克”等，这是前所未有的。现代后期（新中国成立后）社会飞速发展，推动了汉语的发展，新词大量产生，出现以下特点：1）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的术语、科技术语，越来越多于其他词语；2）词组迅速词化，如“整风”、“高速度”等都逐渐凝固成词；3）简称大量流行，也有凝固成词的趋势，如“党委”、“双百方针”、“马列主义”等。

（2）汉语构词法的发展

潘允中分期说明了汉语构词法的发展。上古时期复音词有三个特点：一是两个语素仍保持它们的独立性，如“恭敬”可合用（如“体恭敬而心忠信”，《荀子·修身》），也可单用（如“居处恭，执子敬”，《论语·子路》）；二是语素次序不很稳定，如“恭敬”又可说“敬恭”（如“敬恭神明”，《诗经·云汉》）；三是复音单纯词有时可以单个字出现，如“蝴蝶—蝶梦”、“蜘蛛—蛛网”等，这是少数。中古时期新词产生以复合为主，有联合式、偏正式、动宾式、动补式、主谓式等，另外还有加词缀的附加法等。近代至现代，汉语构词法发展的特点是：1）单纯词多音化，甚至达到四音节以上，突破了双声叠韵的老方式，变为以汉字注音为主，如“吊儿郎当”、“花里胡哨”、“布尔什维克”等；2）复音词多音化，三音节的词多起来，有多种混合结构，如“收音机”（以动宾式为主）、“狗东西”（以联合式为主）等；3）附加法多音化，产生了好多新的结构，如“～家—作家、专家、艺术家”，“～手—新手、助手、多面手”，“～性—党性、思想性、启发性”。

潘允中在探讨汉语词汇复音化原因时，不同意复音词大量产生是由于上古汉语语音简化、产生大量同音词而影响交际的观点，认为先秦时期汉语无所谓语音简化，中古也一样，语音简化是唐宋以后北方音系发展的趋势，而在上古词的复音化发展趋势已经极为显著了。词汇复音化的发展，是在语音简化前已存在的事实，只能说后来语音趋向简化加速了复音化的发展。产生大量复音词的原因，一是同音单词太多，一是同义的单音词过于纷繁。语言的交际功能与语言结构系统（单音节结构）

之间有矛盾,这个矛盾直接决定词汇向复音化发展。

(3) 同义词的发展变化

潘允中分析了大量同义现象,概括了同义词的不同类型,提出了内部变化的规律。如把同义词分为古代音近义同的同义词、方言性同义词、代表特殊概念的同义词、具有修辞色彩的同义词等。例如:1) 古代音近义同的同义词发展。这类词绝大多数产生于先秦,最初以单音节形式单用,后来变化为两种方式,一种是同义复合化,如“永、悠,远也”,后组成“永远”、“悠远”等同义复合词;另一种是词的规范性选择,如“洵,信也”,后文学语言通行“信”。2) 代表特殊概念的同义词的发展。古人在某些方面的特殊概念相当发达,如《尔雅·释诂》:“陨、下、降、坠、零,落也。”“落”是通语,其余代表特殊概念,如“陨”指石头掉落,“下”指叶落,“降”指从上落下,“坠”指从高处落下,“零”指草落。后来这些词都词素化了,分别与“落”组成“陨落”、“下落”、“降落”、“坠落”、“零落”等同义复合词,词义也走向一般化和抽象化。3) 具有修辞色彩的同义词的发展。由于汉语历史悠久。文学作品丰富,这类同义词特别发达。这类同义词的特点是代表同一概念,但色彩有别。如“哭”的同义词有“泣、啼、号、呜咽、泫然”等,每个词有特殊的感情色彩和不同用法:“哭”指有声有泪的,“泣”指有声无泪的,“啼”指小儿呜咽,“号”指有声无泪的和大声哭,“呜咽”指较悲痛的,“泫然”指光流泪的。这类同义词是向多样化、精密化即特殊化发展。

史存直在其《汉语词汇史纲要》中,也对汉语词汇的形成、发展,新陈代谢,词义演变,构词法的发展,借词、译词等作了分析和描写,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语言材料。

除了对汉语词汇进行“通史”性的研究外,还有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断代、专书词汇研究,如王力的上古同源词研究、程湘清等的先秦汉语词汇研究、张双棣的《吕氏春秋》词汇研究等。^[34]

20 世纪,古汉语词汇史的研究确立了历史的眼光,运用了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论历史研究还是理论研究都“还有很多路程要走”,“和已有的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相比,显然汉语词汇史是比较薄弱的”。^[35]因此,新的世纪,古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仍须不断借鉴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继续深入研究。

(二) 词义分析、词义系统及发展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古汉语词汇学也开始借鉴西方现代语义学的

研究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古汉语词汇、词义系统和词汇、词义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把现代语义学理论和汉语词汇实际结合起来深入探讨古汉语词汇各方面问题的研究成果。蒋绍愚、苏宝荣等学者在方法的继承与创新、理论的总结与提出方面，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

1. 蒋绍愚的研究

蒋绍愚是较早运用西方现代语义学理论和方法，对古汉语词汇、词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其代表作《古汉语词汇纲要》集中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力图在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中把传统训诂学的成果和现代语义学理论结合起来，“由于应用现代语义学的义位、义素、词汇场等理论分析词义、词汇现象，在宏观方面，把词汇词义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在微观方面，能在铺陈材料时，从新的角度作出分析，令人耳目一新。”^[36]下面举例介绍其主要研究。

(1) 引入义位和义素概念，对古汉语词义进行分析。蒋绍愚认为，在分析一个词时，首先分析它有几个义位，然后对其中一个义位作义素分析，不能笼统地以词为单位。传统训诂学就常犯混同字词及同一个词的不同义位的毛病，如《尔雅·释诂》：“林、烝、天、帝、皇、后、辟、公、侯，君也”一条，“天”以后的词都有“君”义，或同“君”义有联系，“林”、“烝”则无“君”义。义位在上下文中有义位变体，义位变体是由上下文显示的不同意义。运用义位、义素概念，他分析了古汉语“川、溪、沟、海、湖、池”等词的词义构成，如表 7—5 所示：

表 7—5 蒋绍愚的义素分析法示例

水			面		
流动的			停聚的		
大	中	小	大	中	小
川	溪	沟	海	湖	池

这样就得到“〔水面〕〔流动〕〔面积（大、中、小）〕”三个义素，那么“池”的义素分析式就是池：〔水面〕〔一流动〕〔面积小〕。

他注意到义素的组合是有层次的，区分出“中心义素”和“限定性义素”。如上例中〔水面〕是“中心义素”，表示“池”所属的语义场；〔一流动〕和〔面积小〕是“限定性义素”，用来限定中心义素的性质。还运用“上位词”、“下位词”和“同位词”讨论了名词的等级体系，指出，处于等级系列中的词，义素越多，词的外延越窄；义素越少，词的

外延越宽。如“马”=[马]>“骠”=[黑色]+[马]>“騊”=[白尾]+[黑色]+[马]。这对说明词义的扩大、缩小、转移十分重要。

蒋绍愚提出动词、形容词的义素分析思路。认为动词、形容词也能进行义素分析,但情况与名词不同。概括说来,动词的义素分析与下面四个方面有关系:1)动作的主体,如“鸣,鸟声”,“吠,犬鸣”;2)动作的对象,如“洗,洒足也”,“沐,濯发也”;3)动作的方式、状态,如“行、趋、走、奔”都是行走,但快慢不同;4)动作的工具,如“扶,笞击也”,“捶,以杖击也”。形容词的义素分析也与四个方面有关:1)性状的主体(人、兽、山川、宫室等)。如“腠,牛羊曰肥,豕曰廋”。2)性状的方面(色彩、声音、形状、质量等)。如“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3)性状的性质。如“暑,热也”。实际上,“暑”是“湿热”,“热”是“燥热”。4)性状的程度,如“醵”、“红”、“黧”等都是赤色,但深浅程度有差别。这就扩大了传统义素分析的范围,丰富了义素分析的内容。

蒋氏还运用义位、义素的观念分析了同义词、反义词、词义的发展变化等问题。例如对词义发展的说明,传统上讲词义的发展变化常常用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那么究竟什么是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呢?以“子”为例(见图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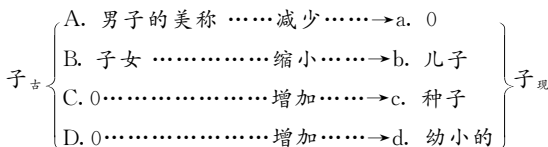


图 7—3 “子”古今词义的变化图

古代“子”有A、B两个义位,义位A在现代汉语中消失了,义位B变为现代汉语中的义位b,意义缩小了。同时,在历史发展中,“子”这个词又增加了两个义位c和d。这样描写“子”这个词的发展,才是全面的。由此可以说,讨论词义的发展变化,要以义位为单位,而不能笼统地以一个词为单位。分析同义词、反义词也同样要以义位为单位,不同的义位,对应不同的同义词和反义词。

(2) 运用语义场等理论分析汉语词汇系统及其发展问题。他认为词汇是一个系统,但比语音系统、语法系统复杂。他提出了考察词汇系统的3个重要方面:

1) 在语言系统中,义位是怎样结合成词的。在汉语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有哪些义位,没有哪些义位,是不同的。例如,上古人们区分出了“𦍋”“醕”,现代汉语的语义系统中却没有,现代人认为,“𦍋”和“羹”都是肉,“醕”和“酏”都是酒,区别可以用词组表示:“大块肉”和“带汁的肉”,“淳酒”和“薄酒”。相反,有的在上古语义系统中没有形成义位,如“泼”,当时人们觉得“弃水”的“弃”和“弃物”的“弃”并无区别,后来才把“弃水”这个动作从一般的“弃”中分出来,形成一个新义位,称为“泼”,等等。词是词义系统的“分子”,义位是词义系统的“原子”。研究某一时期词汇系统的面貌或某个历史时期词汇系统的变化,重要的是考察这些“原子”(义位)的有无,以及这些“原子”以什么方式结合成“分子”(词)。“分子结构”的不同,正是两个词汇系统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

2) 语言系统中,词在语义场中构成什么样的关系(包括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词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们处在相互的联系之中。一批有关联的词组成一个语义场。在语言的历史发展中,词在语义场中的分布会产生变化。有的词从一个语义场跑到另一个语义场,有的词留在语义场中,但和其他词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例如,古今表温度语义场的变化就说明了词在聚合关系上的发展,如表7—6所示:

表 7—6 表温度语义场的古今变化

古 代	热	温	凉	寒
现 代	热	温	凉	冷

词的组合关系的历史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一个词,词义基本不变,但在不同历史时期组合关系有所不同。例如“上”作动词,表示“升、登”义,直接带宾语的情况在先秦不多,后来“上”使用范围大大扩展,能与许多词组合,如《世说新语》中的“上楼”、“上车”、“上船”、“上床”、“上坐”等,“上”的组合能力大大增强。二是新词代替旧词,新旧词的词义相同,但组合关系却不相同。例如《祖堂集》中有“木”,有“树”,“木”是旧词,“树”是新词,只有“树”能和词尾“子”组合为“树子”、“柏树子”等,“木”不能。

3) 词的亲属关系。语言不断产生新词,多数同原有的词有关系,这些关系可分为“同源词”、“由原有的词加上词尾而构成新词”和“由原有的词作为语素构成新词”。这些都可称为词的“亲属关系”。这种关

系是构成词汇系统的一个重要方面。

(3) 总结梳理了近代汉语的研究方法。蒋绍愚指出,上古汉语词汇史研究比较充分,六朝以后的研究相当薄弱,这对“汉语历史词汇学的研究十分不利”。他认为,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更需要“从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做起”,最终通过横的(研究一代的语言)和纵的(联系各个时代的语言进行比较)研究,搞清楚近代汉语各个发展阶段的词汇的系统 and 近代汉语的词汇发展史。有几方面的工作需要做: 1) 词语考释。通过认字辨音、参照旧注、排比归纳、因声求义等考释近代汉语词汇,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做准备。2) 常用词演变研究。常用词是构成一个历史时期词汇系统的主要部分,需要对其历史变化进行研究。只有弄清楚了这部分词汇的发展变化,才能对现代汉语词汇有更透彻的了解。3) 构词法研究。各个历史时期构词法不同,明显影响各个时期的词汇面貌,有必要研究近代汉语时期构词法的新的特点。4) 各阶段词汇系统的研究。在前面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应该对近代汉语各个发展阶段的词汇系统做一个综合的研究。这种研究可以从一部著作开始,从某一类词开始,最后描写一个时代的词汇系统。5) 近代汉语词汇发展史的研究。重在寻找词汇发展变化中的规律性。这些方法论上的总结对指导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有重要意义。

2. 苏宝荣的研究

苏宝荣总结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在其《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商务印书馆,2000)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关于汉语词义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他特别强调和突出汉语词义的“民族特征”,反对套用或照搬西方语言的分析方法,主张汉语词义分析要“在词义民族性和词义构成分析的结合上寻找新的突破点”。下面分三个方面介绍其观点。

(1) 关于词义研究的理论主张。苏宝荣认为,汉语词(词义)同时与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具有直接的联系,汉语特有的以音表义和以形示义的词形二重性,是区别于以拼音文字为书写形式的西方语言的重要特征。汉语形、义关系的“可视性”与汉民族重感觉甚于重思辨、重视觉甚于重听觉的心理机制有关;汉语的语义表达方式与汉民族具象思维发达的特征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这是我们认识汉语词义形成和演化的重要线索”^[37]。他认为,要科学认识词义,必须对词义内部构成进行词义分析。词义具有层次性,分为词的“表层所指义(指称义)”和词的“深层隐含义”两个层次;构成词的表层所指义的诸义素称为“表义素

(实义素)”,构成词的深层隐含义的义素称为“隐义素(虚义素)”。对表义素的分析主要是理性思维的过程,各民族语言之间差别不大;对隐义素的分析主要是感悟、联想的思维过程,最能体现与民族思维密切相关的不同语言的不同特征。要实现汉语词义研究的新的突破,必须围绕汉语的本质特征——即形、音、义的特殊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对汉语词义进行民族的、科学的构成分析。在词义分析中,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注意对词的深层义之中的隐义素的分析;二是注意揭示依托于词音、词形(汉字),以意念(或比附)为特征的联想思维的演变线索。

(2) 继承和改造后的训诂学词义研究方法。苏宝荣指出,清代杰出的语言文字学者提出的关于词义分析的精辟见解对帮助我们正确认识汉语词汇形、音、义的辩证关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该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利用其全面、正确认识汉语词汇形、音、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此,他提出了对词的形、音、义作“横的综合分析”和注意古今之变,对词义进行“纵的动态系联”分析的方法。

1) 横向的系统一综合研究方法。第一,在汉语词汇研究中,分析字形对说解词义有很大益处,应该充分重视和利用。根据“音近义通”现象,通过词音探求词义也是汉语词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要坚持以词义统摄词音和词形的方法,摆正三者的关系,避免拘守字形、望文生训以及乱用“声训”、穿凿附会两个方面的偏向。第二,要利用词的形、音、义三者联系,深入探求词义。首先“以形说义”,探求词的本义。例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虽及胡耆,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中“获则取之”容易理解为“抓住了就俘虏他”。这样就把“获”、“取”看成同义词了。根据古汉语同义词连用的习惯,应该是“获取之”,中间不能用连词隔开。显然,“获”、“取”并非同义词。《说文·犬部》:“獲,猎所獲也。从犬,萇声。”“获”的本义是猎得禽兽,引申为俘虏、得到的意思。《说文·又部》:“取,捕取也,从又从耳。”“取”的本义与“又”(即“手”)和“耳”有关,为割取不降服的敌人的耳朵。这样,就明白“获则取之”中的“获”和“取”是一先一后两个不同动作。“以形说义”必须有具体的语言材料支持,如上古中“行”作“道路”解,不仅与甲骨文的形体(𠂔)相符,而且有《诗经》等语言材料佐证(如《诗经·周南·卷耳》:“嗟我怀人,真彼周行”;《诗经·豳风·七月》:“女执懿筐,遵彼微行”),“周行”指大道,“微行”指小路。其次“因声求义”,从声音线索探求词的本义和语源,进行汉语同

源词研究。还有就是利用语言环境，直接说明词义。

2) 纵向的系统一动态系联的方法。认真研究和借鉴《段注》等传统语言学著作中的优秀成果，从三个方面深刻认识和掌握汉语的词义系统。第一，溯本求源，从本义出发说解词义。《段注》根据《说文》确定词的本义，由本义出发推求词的引申义，再以本义权衡“假借义”。这样，溯本求源，就提纲挈领地把握了词义的整个系统。例如，“婴”的两个看似不相干的引申义——“婴儿”义（《老子》：“如婴儿之未孩”）和“缠绕”义（司马迁《报任安书》：“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通过字形分析，了解其本义，词义发展线索就一目了然了。《说文》十二篇下：“婴，颈饰也。从女戠，戠其连也。”《说文》六篇下：“戠，颈饰也。从二贝。”由于颈饰之“婴”是缠绕在人颈之上的，故引申出“缠绕”义；又因为婴儿颈项多戴有饰物，又引申出“婴儿”义。第二，认识词义纵向的联系，注意做到以简驭繁。传统词汇研究非常重视“一词多义”的内在联系，《段注》对词义内在联系探讨精微，说解详密，对我们今天研究词义的系统性，很有启发意义。例如对“北”词义的分析，《说文》：“乖（违背——苏注）也。从二人相背。”《段注》（八篇上）：“乖者，戾也，此于其形得其义也。军奔曰北，其引申之义也，谓背而走也……北方，伏方也，阳气在下，万物伏藏，亦乖之义也。”《段注》在依据字形（两人相背）确定“北”的本义之后，又指明了其词义“违背”→“败北”→“北方”的发展线索。第三，认识词义演变的规律性。总结传统词汇研究的优秀成果，知道汉语词义演变表现为以下六种主要形式：一是词义范围的扩大或缩小；二是词义褒贬感情色彩的变化；三是词义比喻性引申；四是词义程度轻重、深浅的变化；五是词义重心的转移；六是词义的辗转引申。从这六个方面出发，可以对汉语词义演变规律进行很好的说明。

（3）汉语词义构成成分分析。在分析了义素分析方法和我国学者的词义构成分析方法（主要是符淮青的词义分析理论）的得失基础上，苏宝荣提出了自己所理解的“汉语词义构成成分分析”。他认为，必须从语言的现实状态，即“使用状态”和“贮存状态”去把握和分析词义。使用状态的词处于话语即组合关系之中；贮存状态的词在词汇整体中同相关词（同义词、反义词、同类词等）发生联系，处于聚合关系之中。因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分析词义：

1) 通过聚合关系进行义素分析——利用相关词比较揭示词义的区别

别性特征。

在聚合关系中进行义素分析，主要是对词所表达的概念义，即理性意义进行分析。词的附加意义分析一般只能进行描绘或说明。例如：

凉 冰凉（附加触觉形象）

白 雪白（附加视觉形象）

响 轰响（附加听觉形象）

香 喷香（附加嗅觉形象）

苏宝荣指出，目前词义的聚合分析中，只有那些带有人为规定性的概念义（亲属词、军衔词等）才能在聚合关系中得到充分的说明；而大量的词语“约定俗成”的语义特征，虽在聚合状态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显示，却只有在组合关系中其语义特征才能够最后得以说明和验证。至于词语的深层隐含义、语境变义，特别是语法语用特征的说明，聚合关系几乎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词的组合关系制约和决定着词的聚合关系，词义的全部区别特征最终是在词的组合关系（即话语）中形成、变化并得以显现的。”^[38]

2) 通过组合关系进行义素分析——语素的切分与义素的分析。词义构成是复杂、多变的，贮存状态下的聚合关系，不可能充分展示词义的区别性特征。只有根据大量的语言事实，依据词在使用状态下的不同组合关系加以概括，才能揭示词义的区别特征。例如：

吠：（狗）叫。

刺：（尖的东西）进入或穿过物体。

肃清：彻底清除（坏人、坏事、坏思想）。

扩印：放大洗印（照片）。

揉：（用手）来回擦或搓。

开绽：（原来缝着的地方）裂开。

其中释义里的语义特征是靠组合关系来揭示的。

苏宝荣认为，义素分析的基础是语素，归根到底，义素是体现于语素的意义组合即语义搭配之中的。义素的载体是语言中音义结合的最小单位——语素。当前，一些关于义素理论的著作，极力把义素研究与语素研究割裂开来，使义素分析脱离具体语言，失去了客观依据，这是不妥当的。汉字记录的是语素，汉语语素的不可分性比以词为书写单位的印欧语言更明显。因此，汉语以语素为突破口，对语义进行深入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3) 词义的层次与义素的类型。前人研究表明,词义是有层次性的,如《广雅·释诂》卷一:“道、天、地……般,大也。”王念孙《疏证》:“般,大也……大学:心广体胖,郑注云:胖,犹大也……槃,大也……槃,胖并与般通。说文:槃,覆衣大巾也。鞞,大带也……磐,大石也,义并般同。说文:伴,大貌,伴与般亦声近义同。”王念孙所说的“义同”之“义”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词义,具有隐含性。这体现了词义的层次性。词义的层次性导源于义素的层次性。义素分“隐义素(虚义素)”和“表义素(实义素)”两类。如“水”这个词,依照《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为“无色、无臭、无味的液体”,对其表义素可作如下分析:

水 = [+ 液体 - 颜色 - 气味 - 味道]

而其隐义素则有:

柔软的:如“柔情似水”;

随意的、轻浮的:如“水性杨花”。

这一时期,许多学者也都从不同角度对古汉语词汇、词义进行了研究,探索研究理论和分析方法。洪成玉《古汉语词义分析》深入系统地说明了古汉语词汇、词义分析的有关问题,如同义词辨析、词义的求证、词义分析和语法分析的关系等。观察细致,注重论证,常有前人未发之论。^[39]苏新春在所著《汉语词义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一书中总结梳理了传统训诂学和现代语义学研究词义的方法,如形训法、声训法、界说法、义素分析法、语义搭配法、构词鉴定法等^[40],并在词的“文化意义分析法”方面做了富有意义的探索^[41]。

本章小结

汉语词汇学建立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却发展迅速,成果丰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现代汉语词汇学不断借鉴国外最新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并在探索中努力提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但是,和汉语语言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如汉语语法学相比,汉语词汇研究仍被认为是“比较薄弱”的领域。因此,展望未来,在21世纪,汉语词汇学仍需加倍努力,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使汉语词汇研究更上一层楼。我们认为,以下几个问题是关系到现代汉语词汇学发展的重要问题,需要新世纪汉语词汇学继续给予关注。这些问题是:

(1) 现代汉语词汇学的“现代化”问题。“现代化”有两层含义，一个是研究对象、研究理论和方法的现代化，另一个是研究手段和技术的现代化。新的世纪，现代汉语词汇学应该及时吸收国外最新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避免重复性的、孤立零散的、甚至是“炒冷饭”式的研究。研究内容要有开拓性和创新性，同时注意利用计算机和大型语料库，不断改进研究手段和研究技术。

(2) 现代汉语词汇学的研究对象问题。20 世纪，关于现代汉语词汇学的研究重点，词汇学和语义学、词典学的关系等问题，学者们还有不同的看法。^[42]新的世纪，这些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以明确本学科的发展方向。我们认为，对于这些牵涉学科发展方向的问题不宜过早下定论，应该在具体实践中，既联系历史，考虑中国语言学的实际，又联系世界，考虑世界语言学的大背景、大框架。毕竟现代汉语词汇学还是汉语语言学的一部分，是世界语言学的一部分，它应该符合普通语言学的一般规律，应该具备普通语言学的一般特点。这样思考问题，也许会给现代汉语词汇学一个合理的定位，使之更加健康地发展。

(3) 现代汉语词汇学的理论建设和应用问题。一方面，现代汉语词汇学应该通过对词汇、词义的研究，提出关于整个语言系统、语言结构的理论观点，为普通语言学做出贡献；另一方面，现代汉语词汇学仍应关注社会需要，加大应用性研究，在为语文词典编纂服务的同时，进一步为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对外汉语教学等提供服务。这就要求现代汉语词汇学不能仅在传统的一些研究领域里打转转，而应该在突出重点、牢牢把握大方向的同时，开阔视野，大胆创新，为新世纪的汉语词汇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

20 世纪，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领域是广泛的，限于篇幅，这里未能对其他重要问题，如基本词汇问题、词汇规范问题、外来词研究、熟语研究等进行总结和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参阅其他著作的分析。^[43]

20 世纪的古汉语词汇研究在理论探索和方法运用上，基本上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一是积极借鉴国外新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利用我国传统的训诂学材料和成果，来分析古汉语词汇、词义，努力有所创新；二是充分吸收和继承我国传统训诂学研究的精华，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从汉语自身特点出发，研究古汉语词汇、词义。这两种研究取向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走的都是“结合”的路子，只不过前者更强

调借鉴，而后者更强调继承。新的世纪里，古汉语词汇研究仍然面临着如何进行“结合”的大问题。我们认为，虽然古汉语词汇学的研究对象是“古”的，但古汉语词汇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应该是“新”的。因此，新世纪的古汉语词汇研究仍然应该不断关注和借鉴一切有价值的、新的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同时也要充分利用传统训诂学研究的丰富资料。在研究领域方面，新世纪的古汉语词汇研究应该进一步努力，进行汉语历史词汇学的研究，在搞清各个历史阶段汉语词汇系统的基础上，撰写出贯穿整个汉语发展史的汉语词汇史。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后来者坚持不懈地努力。

注释：

- [1] 参见张志毅、张庆云：《词汇学的现代化转向》，见《词汇学理论与实践》，1～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2] 璩一：《谈同义词》，载《语文学习》，1953（8）。
- [3] 王了一：《语文知识》，载《语文学习》，1953（8）。
- [4] 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八），载《语文学习》，1956（2）。
- [5] 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46页。
- [6] 石安石：《关于词义与概念》，载《中国语文》，1961（8）。
- [7] 孙常叙：《汉语词汇》，220页。
- [8] 刘叔新：《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划分》。
- [9] 王理嘉、侯学超：《怎样确定同义词》。
- [10] 参见刘叔新：《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划分》。
- [11] 参见罗曼玲：《现代汉语同义词的词义分析和组合分析》，23、30页，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8。
- [12] 符淮青：《构词法研究的一些问题》，见《词汇学理论与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13] 周荐：《汉语词汇研究史纲》，15页。
- [14] 符淮青：《构词法研究的一些问题》。
- [15] 徐通锵：《语言论》，362页。
- [16] 同上书，363页。
- [17] 参见符淮青：《构词法研究的一些问题》。
- [18] 参见张志毅、张庆云：《词汇学的现代化转向》。
- [19] 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12页。
- [20] 周荐：《汉语词汇研究史纲》，80页。
- [21] 同上书，81页。
- [22] 参见李红印：《现代汉语颜色词词汇—语义系统研究》第二章“词汇—语义系

统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

- [23] 刘叔新：《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划分》。
- [24] 符淮青：《概念义分析的形式化》，载《汉语学习》，1995（6）。
- [25] 参见符淮青：《概念义分析的形式化》。
- [26] 参见符淮青：《“词义成分—模式”分析（表名物的词）》，载《汉语学习》，1996（5）。
- [27] 参见符淮青：《汉语表眼睛活动的词群》，见《中国语言学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6）；符淮青：《词义的分析 and 描写》，第四、第五、第六章；赵强：《表动作行为的词现代词义项划分比较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7；罗曼玲：《现代汉语同义词的词义分析和组合分析》，23、30页，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8。
- [28] 参见符淮青：《词义的分析 and 描写》，215～217页。
- [29] 参见符淮青：《汉语表“红”的颜色词群分析》，第九章。
- [30] 参见李红印：《现代汉语颜色词词汇—语义系统研究》，26、164页，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
- [31] 参见汤志祥：《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 [32] 符淮青：《汉语词汇学史》，211页。
- [33] 参见蒋绍愚：《20世纪的古汉语词汇研究》，见蒋绍愚：《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35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34] 参见符淮青：《汉语词汇学史》，272～285页。
- [35] 蒋绍愚：《20世纪的古汉语词汇研究》，见蒋绍愚《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353～354页。
- [36] 符淮青：《汉语词汇学史》，264页。
- [37] 苏宝荣：《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38] 苏宝荣：《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198页。
- [39] 参见符淮青：《汉语词汇学史》，246～253页。
- [40] 详见苏新春：《汉语词义学》，339～382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
- [41] 参见苏新春：《文化的结晶——词义》，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汉语词义学》，383～400页。
- [42] 参见刘叔新：《对准词汇的重要方面——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取向刍议》，见《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204～210页，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许威汉：《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556～571页；张志毅、张庆云：《词汇学的现代化转向》。
- [43] 有关研究详见周荐：《汉语词汇研究史纲》；符淮青：《汉语词汇学史》；晁继周：《二十世纪的现代汉语词汇学》；许威汉：《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

第八章 词汇应用与词汇规范化

第一节 对现代汉语词库的研究

词库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出现的新事物。它的出现为现代汉语词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促进了词汇学的深度发展。词库只有十几年的历史，但是它的建设和发展已经使词汇研究者得到了许多启发，使原来的封闭性研究趋向开放性研究。

许威汉在《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中指出，1993 年 7 月，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创刊《词库建设通讯》致读者公开信中这样说道：“从内容上说，我们的‘词库’是以‘释义’为主，兼及‘词源’等项，以补现有词典之不足，因此可以说是一种‘说文解词’，也可以说是一种‘另类词典’。”这里“说文解词”套用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书名，其中“文”则指“文句”或“文章”；“另类”则寓“非正统的”、“另辟蹊径”之意。词库不是一般词典，但还是供查检的。词库中的信息比词典新而可靠，词库是 90 年代的新事物。

许威汉在《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中介绍词表时说：“词表有几个含义：一是指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中词或词项的汇集，相当于狭义的词库；二是指术语词典，即对某个专门领域内使用的术语下定义的词典；三是指进行语言实地调查中使用的基本词项表，也就是在语言或方言实地调查中为达到预期目的而事先拟订的调查表，用以与当地发音合作人一起查对语言特征、语法特征和词汇特征。”我们排除词表的后两种含义的介绍，把体现第一种含义的词表视为狭义的词库。下面的论述将从词表开始。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中文信息处理中也用到了“词库”的概念，它与前面《词库建设通讯》中提到的“词库”有着不同的含义。中文信息处理中的“词库”实质上“是一个计算机化的词表，为以词加工提供规范”^[1]。作为一个计算机化的词表，人们对它的研究也需要作一下简要的介绍。

这里将从三个方面进行现代汉语词库研究的论述：一、词表的研究；二、中文信息处理中相关词库的研究；三、90 年代作为新事物出现的词库的研究。

一、词表的研究

我国最早具有词表性质的论著是教育家陈鹤琴在 1928 年 6 月完成的《语体文应用字汇》。“他和助手用手工操作，历时两三年时间，使用六类语料 55 万个字符，得出汉字字种（有人称为字户）4 261 个。”^[2]虽然主要是研究字，但也进行汉语常用词的研究。“陈鹤琴先生在《语体文应用字汇》的绪论中说，他从民国九年（1920 年）开始研究常用字汇，采用两种方法，一种研究单字，一种研究联词，并认为第二种研究效用浩大。1921 年后便开始常用词的统计研究（成果未发表）。”^[3]

常用词的统计研究与常用字的统计研究都始于 20 年代，但是常用词的编制难度大，取得的成绩似乎也不如常用字那样大。究其原因，主要困难是汉语没有明显的划分词的依据，也就是说，语素和词、词和词组（短语）的界限划分以及词的分类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没有妥善解决。因此，尽管从 20 年代就开始了常用词的统计的研究，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却比较少。1992 年，刘英林、宋绍周在《汉语常用字词的统计与分级》一文中介绍了 20 年代至 90 年代初期我们能够见到的主要的常用词统计资料：“（1）《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词表》（3 000 词），1959 年，文字改革委员会汉字组。（2）《两千双字词表》（2 000 词），1960 年，《文字改革》发表。（3）《外国学生用四千词表》（4 000 词），1964 年，北京语言学院。（4）《外国人实用汉语常用词表》（3 040 词），1981 年，北京语言学院。（5）《报刊词语三千六百条》（3 600 词），1983 年，北京语言学院。（6）《中小学文科教学七千词表》（7 000 词），承德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7）《现代汉语七千词表》（7 000 词），中国人民大学。（8）《拟制文件六千词表》（6 800 词），燕山计算机应用研究中心。（9）《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五千词表》（收双音以上词语 5 639 条），1985 年，现代汉语工程实用词库国家标准研制组。（10）《对外汉语教学常用词表》（4 000 词），1986 年，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11）《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词汇大纲》部分收甲、乙、丙三级常用词 5 168 个），1988 年，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12）《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常用词部分

8 548 词), 1986 年, 北京语言学院。(13)《现代汉语常用词词频词典》(常用词部分 9 000 条), 1989 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14)《中小学汉语常用词表》(常用词部分 8 107 条), 1990 年, 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15)《现代汉语常用词库》(常用词部分 9 000 条), 1990 年, 山东大学。(16)《北京口语调查》(常用词部分 6 966 条), 1991 年, 北京语言学院。”在作者叙述的这些资料中,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80 年代中期的《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编,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6) 这一科研项目从 1979 年 11 月开始到 1985 年 7 月结束, 它包括: (1) 按字母音序排列的频率词表; (2) 使用度最高的前 8 000 词和频率最高的前 8 000 词词表; (3) 使用度较低的词语单位表; (4) 各类语体(报刊政论、生活知识、文学作品) 中频率最高的 4 000 词词表(四个); (5) 分布最广的词语频率表; (6) 前 300 个高频词分布情况分析; (7) 汉字频率表; (8) 汉字构词能力分析。附录中对各等级的词数、不同音节的词数、各类语料平均词长以及字、词的覆盖率等作了统计和分析。

80 年代, 除了上面作者介绍的资料外, 还有三个比较重要的词表, 它们是:《现代汉语词表》、《现代汉语三千常用词表》和《汉语词汇的统计与分析》。1986 年, 马广申等编制了《现代汉语词表》(湖南人民出版社)。该词表的主要收词对象是“20 多部国内外辞书。正文收双音节、三音节和三音节以上的词和词组, 包括专科名词术语和国内外主要地名 9 万余条。词条按音序排列, 首字相同的词条排在一起。正文前有《音节表》、《新旧字形表》、《部首检字表》。正文后附有:《同音同调词表》, 收词条 12 000 余条;《单音节词表》, 收词 2 116 个;《汉语拼音方案》。本词表除能直接为现代汉语词频、字频统计服务外, 还对汉字编码、汉字输出设备及字形字模标准设计、自然语言处理、人工智能研究、机器翻译、中文信息处理系统研制与理论研究等提供科学的基础信息”^[4]。1987 年, 何克抗、李大魁主编了《现代汉语三千常用词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作者在书的“前言”中说:“为了科学地确定现代汉语常用词, 做好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化工作, 同时, 也为了编写语文词典和中小学语文教材的需要, 以及为从事现代汉语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研究的语文工作者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部分研究人员同中文系部分汉语教师合作, 利用两年多的时间, 对全国统一使用的 1983—1984 年度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共

24 册)作了大规模的词频统计与分析。词库的建立和词频的统计全部由电子计算机软件系统自动完成。共输入 107 万字约生成 4 万个词条。然后再利用计算机把频率值(即词的出现频度的高低)和方差值(即词在各种文体中的覆盖率)都达到某一界限以上的词全部挑选出来,确定为常用词。这种编选方法比电子计算机问世以前只靠人工编选的常用词表要科学得多,且速度快、误差小,而不带主观随意性。”该词表正文前有“检词表”,正文后附有“词频统计的有关问题”和“关于《中小学教材》现代汉语词语切分与统计的标准及其说明”。至于《汉语词汇的统计与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5),许威汉在《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中介绍道,这是一个准词表,它“采用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年至 1990 年出版的全日制十年制语文课本(试用本)作为现代汉语词语统计、分析的语料,精心切分和统计,并借助电子计算机完成运算和排序。本书中心部分是两个频率词表:按音序排列并注明年级分布的频率词典、按频率排列的词表(一)、(二)。附录有:前一千个高频词的汉字组词能力分析、各词次级别和同级单位的数量统计、不同音节词的数量及覆盖率对比、前若干词在语料中的覆盖率。正文前有详细的体例说明。本书的统计结果可以为制定不同类型的汉语教学大纲、编写不同程度的教材提供重要的选词依据。”

90 年代初期的词表,除了前面刘英林、孙绍周介绍的常用资料外,还有《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常用词表》和《汉语主题词表》(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北京图书馆主编,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1)。

在 90 年代中后期有三个比较大的词表:《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现代汉语通用词》和《现代汉语通用词表》。

1996 年,陈章太、李行健主编的《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由语文出版社出版。在书的“前言”中作者指出:“‘北方话词汇调查’课题经过多次论证后于 1985 年底由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立项……后又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规划‘七五’期间重点项目,此后经历了准备、调查、整理、编纂等阶段的工作和近百人整整 6 年的共同努力才告完成。”此书包括语音篇、词汇篇和地图篇三部分内容,另有一个词语索引。它共记录北方话地区 93 个点的概况。其中编印成的《北方话基本词汇调查表》收录的主要是“北方话基本词汇,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介词、数词、量词等,还收录一部分日常生活使用的但不属于基本词汇的词和少数表示新事物名称的词汇。除词之外,也酌量收录一些短

语”。该词表“选词力求较为全面地反映现代北方话词汇的基本面貌，并偏重于各方言点乃至整个北方话区域共同使用或大部分地区使用的词语”。这个词汇表是参考了一些北方话词汇调查材料编制而成的，共收词语3 200多条。作者在书中还指出了词表的一些不足之处，如：“收词还不够精，有些该收的词没收，而有些可以不收的词则收进来了；有的类收词过多，有的类收词则少了；词目后面所列的参考条，有些不够贴切，以致造成误导；少数词条意义不易掌握而没有加注限定，造成调查时的困难或错误。”虽然该书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它的出版对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化工作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此书进行介绍的文章有陈章太、李行健《关于北方话词汇调查、整理、编纂的几个问题》〔《语言文字应用》，1995（2）〕等。1998年，国家语委语用所的科研课题《现代汉语通用词》通过了专家组的审定。《现代汉语通用词》包括基本集和扩充集两个子集。基本集以语法词为主，兼收惯用语和成语。扩充集以短语为主。该词表的选词原则比较全面客观，具有概括性、同一性，可操作性也很强。这项成果对语言学理论、语文教学、词典编纂等都很有意义。这一方面相关的文章有：《现代汉语通用词研究的若干原则和方法》〔通用词研究课题组（执笔：方世增），《语文建设》，1994（4）〕、《〈现代汉语通用词〉选词原则》〔国家语委语用所《现代汉语通用词》课题组（执笔：厉兵），《语言文字应用》，1998（2）〕。《现代汉语通用词表》是1998年7月经国家语委批准正式立项的科研课题，全部工作由规范词典编写组邀请有关专家共同进行。经过研制组近一年半的工作，完成了语委提出的搜集资料、确定选词原则、收词量和覆盖率测试等几项基本任务。^[5]

二、中文信息处理中相关词库的研究

随着计算机技术在我国的高速发展，中文信息处理在80年代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字处理发展到词处理阶段。这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词在中文信息处理中的重要作用。为了对现代汉语词汇进行科学的描述并给它制定计算机化的映象，人们提出了建立词库的建议。

1985年，陶沙在第3～4期《中文信息》上发表了《词库的结构》一文。陶氏在文中对一种实用工程词库的结构作了初步的探讨，文章指出实用工程词库的结构包括：“1. 三级体系——字、词、语。2. 最佳值——二字三字四字的组合。3. 两个层次——通用词、专用词。”在中

文信息处理从字处理阶段向词处理阶段过渡的时期，此文说明人们已经开始重视信息处理系统中词的作用。在同一期中还刊登了何克抗的《计算机中文信息库的总体设计》一文。何氏在文中介绍了计算机中文信息库的三个设计思想，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建立词库。虽然此文有关词库方面的内容比较少，但是对于人们了解怎样建立词库起到了一定作用。1987年，刘涌泉发表了《谈谈词库问题》一文。作者在文中首先指出，词库的建立标志着中文信息处理从字处理阶段发展到词处理阶段。对词库的概念，作者指出：“词库实质上是一个计算机化的词表，为以词加工提供规范。词库可分为基本词库和辅助词库两种。前者为各行各业的用户服务，后者为特殊用户提供补充。”而词库的内容则“应该是词和一部分词组词，另外还包括少量的构形成分（们、了、着、过等）”。文章重点介绍了如何建立词库，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建立词库比较理想的方式是“采用动态底表法，具体地说，就是精心选定底表，让机器进行自动切分，同时，不断回收新词或机器不能切分的词，进行人工干预，从而使底表不断得到补充”。此外，作者还介绍了建立词库的原因和词库的规模及结构。此文对中文信息处理中的词库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是，这也只是一个开始，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作者在文章最后也指出“至于在此词库的基础上提供什么信息或特征，那是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

此后，对中文信息处理中相关词库进行研究的主要有：刘涌泉《中国计算机和自然语言处理的新进展》[《情报学报》，1987（1）]，胡明福《部件词库生成技术》[《中文信息》，1987（2）]，刘涌泉《再谈词的问题》[《中文信息学报》，1988（2）]，冯志伟《术语数据库》[《语文建设》，1989（2）]，李向方《自动生成词组和建立词库》[《中文信息》，1990（4）]，许惠山《词联码及词处理技术》[《中文信息》，1991（1）]，施广新、李劲、郑弥雄《大型汉字词库的生成环境》[《中文信息》，1991（1）]，李先国、徐秋元等《五码拼音法字词库的建立和维护》[《中文信息》，1992（2）]，李竹《应用语言学术语数据库》[《中文信息》，1992（2）]，张普《汉字键盘输入方法》[《语文建设》，1992（3）]，林联合、吴杰、吴亮《以成语为范围的词汇支援系统》[《中文信息学报》，1993（1）]，钱培德《多级中文词库有理想的实用效果》[《中文信息》，1993（4）]，戴聚岭《在汉字操作系统中组织大型词库》[《中文信息》，1993（4）]，冯志伟《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语文建设》，

1993 (9)], 龚彦如、李竹、冯志伟《英—汉计算语言学术语数据库》[《语文建设》, 1994 (7)]。在这些文章中, 有一篇对词库研究中存在的误区给予了关注, 这就是张普的《汉字键盘输入方法》, 张氏在文中指出: “进入词处理阶段后, 各种输入方法纷纷关注词库的大小。因为词少了不行, 往往打了词码后, 词库中没有该词, 又得退回来用字的方式输入。所以词库从 3 000 词发展到 1 万、2 万、3 万、7 万、9 万、12 万……还有人准备推出更大的词库。显然, 绝大多数人使用计算机都是在一定领域范围内工作, 最佳的词库设计应该是: 通用词库+专业词库+个人词库。个人词库是个人自己生成的独用的习惯‘词语’, 通用词库据现有的词频统计结果收四万左右的词已足够了, 专业词库则各领域词数多少不一。因此, 简单地认为词库的词越多越好也是不全面的。”作者的论述有助于人们合理地建立词库, 防止盲目地建立大型词库。

三、90 年代作为新事物出现的词库的研究

前面介绍的词表和中文信息处理中的词库, 只是汉语词或词项的简单汇集, 没有更多的有关词的信息的描述, 如: 释义、词源等。既能释义又可追溯词源的词库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1992 年, 香港地区的肖正方、李薇在第 4 期《语言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从香港新外来概念词到词库建设》一文。这可视为此类词库研究的前奏。作者在“前言”中指出: “香港是个资讯发达的世界性大都会, 在香港研究外来事物概念词, 建立外来概念词词库是有条件的。”对于词库的意义和作用, 作者认为“不单可以从某一角度看到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为语文规范化词汇方面的工作打稳基础, 进而把成果应用到语文教学(包括普通话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上”。作者还介绍了一些香港通用的外来概念语词, 同时介绍了一种新的外来概念语词的排列方法, 并且说明可以利用这种排列方法来设计外来概念语词词库。1993 年 7 月,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词库建设通讯》创刊, 标志着词库建设的开始。

我们这里介绍的词库与前面所论述的词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词表和词库都是词语的汇集, 词表是把所有的词语按一定的顺序简单地汇集成册, 而词库则不但要汇集词语, 还要对这些词作一些必要的说明, 以便人们能够充分利用它进行语言研究。另一方面, 词库与词典也是有差别的。“词库中的信息比词典新而可靠, 词库的模式不同于一般词典模

式，没有严格的凡例约束，格式较宽松。有争议的词，分别列出不同意见提供再检讨。”^[6]

为了使词库的建设更加顺利，香港中国语文学会成立了词库工作组。“词库工作组的负责人是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姚德怀主席，成员有游社援、林万菁、汪惠迪、黄河清诸位。参加词库建设的以香港为主，还有新加坡和内地的学者。工作组的组成有利于开阔视野、沟通信息。”^[7]词库作为 20 世纪 90 年代才出现的新事物，它的发展还处于初始阶段，我们从《词库建设通讯》的发刊词中可以了解到词库建设的一些内容。下面转引许威汉在《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中对《词库建设通讯》发刊词的介绍：

1. 缘起

《词库建设通讯》是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语文建设通讯》的姊妹刊物。因此发刊词不得不从《语文建设通讯》说起。

1982 年，李业宏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说，要“留意收集民间吸收外来词语和语法的状况，及时整理出其中合乎逻辑的优美的成分编入教科书和词典之中，使我们的语言和文字得到健全的发展”。

1989—1990 年间，《语文建设通讯》开设了“词苑”专栏，专栏每一篇文章是一篇独立短文，探讨某一个语词的释义、词源、引申义。和一般词典条目相比，它没有后者那么刻板，可读性较高。作者选词若是旧词，往往讨论它的新意；若是新词，则还未为一般词典所收。因此，这些短文能补词典之不足，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在“词苑”的基础上，慢慢酝酿了“词库”的想法，也就是说，怎样把“词苑”系统化、完备化。1989 年 10 月第 25 期《语文建设通讯》刊出了《整理词语建立词库》的“征稿启事”，得到了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回应。1990 年到 1992 年是 brain storming（脑力激荡，论证）时期，各种意见都有人提出，如：①建立词库应该是大而全；②Small is beautiful（小即美）；③词库应该高度系统化、自动化；④建词库是不可能的事，等等。正面和反面的意见都有。这也是十分正常的现象。

同时，我们认识到，不应该为建库而建库，还要注重它的实用性，因此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于 1990 年 6 月举办了一个座谈会，题目是：《如何面对香港写作教学的词汇危机？》这次座谈会非常成功，反应强烈，同时也传播了建立词库的想法。

1990年中,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名誉会长李业宏先生表示愿意在经济上支持词库计划,1991年春,李先生的支持更进一步具体化。这使建库计划有了较好的物质基础。

2. 起步

1991年经历了多个繁忙的月份。我们发了几次“内部通讯”,收集了香港和外地多方面朋友的意见。首次确立了以下几个原则。

(1) 大而全的“总词库”,应该由大陆做。也许现在条件还没成熟,不过将来总是要做的。我们可以为将来的“总词库”提供一些想法和参考意见。

(2) 结合香港和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计划建立两个“子词库”。一个是“香港粤语词库”;一个是“外来概念词词库”。

(3) 香港粤语词库

1991年秋,北京陈建民先生应本会邀请来香港进行学术访问。陈建民先生在香港的三个月期间做了大量的收集香港粤语词工作,为香港粤语词库的建立树立了良好的开端。1992年,本会同仁继续在做这方面的整理工作。

(4) 外来概念词词库

1991年暑期,我们继续做了不少外来概念词的收集工作,并且用不同格式编样条征求意见,这方面张励妍女士做了不少工作。1992年暑期再对样条的格式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在这个基础上,肖正芳、李薇两位撰写了论文,扼要地介绍了这方面的工作,并且把论文提交杭州研讨会。

(5) 词库中词条的格式问题

词库中的词条采用何种格式是一个主要问题。如上所述,由于我们计划中要收集的是香港粤语词和外来概念词,这些词对绝大多数的外地读者来说可能都是陌生的。一般中国人看到新词免不了要“望文生义”,但是很多词,如果没有较详细的说明,实在很难由“文”过渡到“义”。因此,我们觉得词库中的词条至少要起到从“文”到“义”的桥梁的作用,所以不能太简略。

举个简单的“旧词”为例。“大学”究竟是指“大的学校”呢还是“新式大学(university)”?“大学生”究竟是指“岁数较大的

学生”呢还是指“新式大学的学生”？（请诸位读者查一查《汉语大词典》）大家比较熟悉的旧词的词义已经不容易肯定，何况陌生的方言词和新的外来概念词呢？

正因为这样，过去两年时间，我们对格式的考虑曾经有过较大的反复。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从宽还是从严？二是不同子词库的格式是否需要一致？

现在的答案是：①格式可以从宽。词库和词典不同，词典是封闭性的：它一经出版不能在短期内修改；同时词典内容也是阶段性的：它容许修改，但是至少得经过若干年后才能再版。而词库则不同，它是开放性的：词条储存在电脑里，容许经常更新；同时词库内容是连续性的：一有新的内容，有关词条可以立即以新的面貌打印出来。

②子词库的格式可以不一致：不同的子词库的性质和内容就不一样，因此可以用不同的格式。例如香港粤语词库的性质和外来概念词库的性质就相差很远，所以用不同的格式也是很自然的事。这有点像地图集中的个别地图，根据需要可以（甚至应该）采用不同的投影法。

（6）《词库建设通讯》的构思

1989年开始构思“词库”的时候，我们就计划同时要出版一本刊物与它相配合。理由是：

①上面说过，词库不是词典，不大可能像词典那样结集出版。但是通过刊物，我们可以定期向大家报道建库的进展。

②“词库”是新事物，要不断接受反馈。

③上面说过，“大而全”的“总词库”，将来总是要做的。大家可以通过刊物来发表各自对这方面的意见。

④建立词库是众人的事，不限于一时一地。有一个设想是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华人社会，可以考虑建立“词语观察点”或“词语观察站”。通过刊物，大家可以对这个设想交换意见经验。

⑤语言更是众人的事。研究词汇问题不能关起门来做，将来的词库也是为大家开放的。通过刊物我们可以逐步建立一个“开放”的传统。

3. 《词库建设通讯》创刊

《词库建设通讯》终于创刊了。

当时，词库的格式还没有统一的规定，表现出了多样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词库的建设还不成熟，还处于雏形状状态。这里举“外来概念词库”的两个实例来说明：

例一：

检索词：science（英语）；kagaku（日语）

词目：科学

释义：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据《现代汉语词典》）

词源：1874年，日本学者西周在《明六杂》发表的文章中最先用“科学”来译 science。光绪二十二年（1897年），康有为戊戌奏稿中直接从日语中借用“科学”二字。此后“科学”一词逐渐为我国人民所接受。①（按，此为参考文献记号，余同。）

参考文献：①陈章国“科学”一词的由来”，北京：《中国翻译》，1991年，第1期，第43页。

编写者：黄河清 审定者：姚德怀 （《词库建设通讯》1期17页）

例二：

检索词：mini（英语）

词目1：微型

词目2：迷你

释义：（表示与其他同类者相较）极小的；极短的。

说明：mini有时译成“迷你”，是由香港在60年代译 mini-skirt 为“迷你裙”开始。“迷你”因汉字而改变了原来的修饰意义，可说是一个“假（Pseudo）外来修饰风格词”。

争议：有人认为，把 mini 译成“迷你”，总有些不雅的意味在里头，“迷你”这词语不会有生命力。也有人认为，人们听到或看到“迷你”二字，大抵不会想入非非地觉得有什么不雅的意味在里头，“迷你”是个富有生命力的词儿。这个例子证明了：汉字虽能令人望文生义，但是每人的反应不一样。①

参考文献：①新加坡《联合报》1991年8月27日崔卯求《迷你》。

编写者：陶德怀 审定者：潘礼美（《词库建设通讯》1期16页）
《词库建设通讯》从1993年7月份开始出第1期，以后每隔两个月

出一期，每期开头都有“编者的话”，就词库建设中层出不穷的问题作说明、交待等，在编者与作者、读者间起联络作用。每期刊载的文章短小精悍，内容新而实，对汉语词汇研究颇有参考价值。^[8]

《词库建设通讯》对《外来概念词词库》的研究是最早的，也是比较成功的。研究者在《外来概念词词库》的“总说明”中介绍了外来概念词的定义：“汉语中表示本为外族语词的概念的那种词。”指出了建立词库的目的：“准备将近现代所出现的，以一词多译名形式，当今流行于各地的或者译名有争议的汉语外来概念词进行研究、整理，然后输入电脑储存，这样就成了我们将来对汉语外来概念词进行规范和统一时的基础资料。”同时还叙述了我国外来概念词使用和研究的现状，外来概念词词库的收词范围、编写原则、用途、检索以及参考文献等。^[9]此后，《词库建设通讯》每期都收录“外来概念词词库”词条选刊，这一方面的工作还在继续。

《词库建设通讯》的词库工作组除了研究“外来概念词词库”以外，还建立了“植物名称库”。在第2期《词库建设通讯》上，词库工作组发表了《设置“植物名称库”缘起》的文章。文中介绍了建立“植物名称库”的原因和其他相关内容。这种在一个门类上所做的尝试，是可取的，为大型词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对词库建设介绍的相关文章还有田小琳《香港词汇研究》[《语言文字应用》，1997（2）]。文章对香港在外来词、粤方言词和社区词的一些研究作了简要的介绍。

作为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新事物，词库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它还没有完全成熟，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内容也需要不断增加。同时，“大而全”的词库还没有建成。因此，进入21世纪的词库研究将会有大量的工作需要人们去做。

第二节 对现代汉语语料库的研究

1946年电子计算机的问世，促进了数理学科的发展，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也促进了语言学的发展。人们对语料库的研究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语料库，顾名思义，就是存放语言材料的仓库（或数据库）。传统上，语言学家用语料库这个术语表示可作为语言研究基础的、大量自然

出现的语言数据。“在计算机出现之前,研究者——特别是词典编纂者,也有语料库,只是规模小,范围窄,因而难以在学术界形成气候。近40年以来,语料库这个术语通常指以电子形式保存的语言材料,并被广泛用于语言研究和语言工程。”^[10]

语料库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建立的。六七十年代,主要是由西方国家主持建立,我国是在70年代末期开始建立汉语语料库的。从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我国建立了一批语料库。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如专业性太强,功能单一而难以共享,规模小。这一时期,语料库的建立和研究还是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进入90年代,我国开始建立能够共享、规模大、多功能的现代汉语语料库。语料库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无论是语料库的建立数量、质量、规模还是研究深度都得到飞速发展。

由于“语料库并非文本资料的简单堆砌,它必须是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一种语言或其子语言”^[11]。因此,语料库要进行一系列的加工之后才能更好地为人们所使用,汉语语料库的加工过程主要包括:分词、词性标注、词义标注、句法标注、句义标注以及话语一篇章标注等。这里将着重介绍语料库的分词和词性、语义标注等几个方面的研究情况。

现代汉语词汇语料库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70年代末到80年代;二、90年代。下面分别进行论述。

一、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语料库研究

我国在70年代末期开始建立汉语语料库,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我国陆续建立了一批大规模的用于汉语计量分析研究的计算机语料库。这主要包括“1979年武汉大学的现代汉语文学作品语料库(527万字),1983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2千万字),1983年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学语文教材语料库(106万8千字),1983年北京语言学院的现代汉语语料库(180万字)。”^[12]由于计算机发展的制约,这一时期的语料库主要用来进行字词频统计。主要成果“现代汉语字频统计”和“现代汉语词频统计”已通过国家鉴定。

“‘现代汉语字频统计’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标准局于1983年初共同下达的科研项目”,主要是由“北京航空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刘源、梁南元、孙伟、杨铁鹰、马广申等同志主持”。这个科研项目“经国家标准局同意,利用了‘现代汉语词频统计’的选材内容,从1977—1982年的一亿三千八百万字(包括标点符号)的社会科学和自然

科学样本中，按等距抽样法、随机抽样法等抽样方法抽取了包括标点符号在内的一亿三千八百万汉字（实际统计字数为 138 348 324）作为样本，统计了 9 199 个字种的频度，具有背景干扰小、代表性好的特点。全部统计结果为：总频度，社会科学综合频度，自然科学综合频度，社会科学 5 个分科的统计频度”。鉴定会的专家认为“这一次的字频统计是我国历史上利用计算机进行统计的规模最大、统计科目最多的一次，它为我国全面建立‘现代汉语语料库’、‘现代汉语字库’奠定了科学的技术基础。这一重要科研成果，可以为语言文字研究与文字改革、汉语教学与教材编写、汉语编码与键盘字表排列以及汉字信息处理系统的设计，提供了用字的基础科研信息与理论依据”^[13]。这一成果于 1985 年 3 月正式通过国家鉴定。

“‘现代汉语词频统计’是将人们日常使用的词语，如：‘国家’、‘地图’、‘蛋白质’、‘唯物主义’等在不同学科领域、不同时期所出现的频度进行统计。此项工程的选材范围是从 1919 年至 1982 年，并分为民主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文革、调整等四个历史时期。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类十个学科共选取了近三亿字的原始素材，从中抽取样本总字数两千余万。然后利用计算机根据由二十三部词典（如《现代汉语词典》、《辞海》、《汉英词典》等）汇集的十二万余词条作底表，并按一定的分词原则进行机器自动分词统计。得出不同类别、不同学科、不同时期、不同排序方法及各种总频度统计结果五十一种。”鉴定委员会的专家们认为：“此项工程被统计材料的选择和抽样是科学的，时期划分是合理的，是迄今为止国内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词频统计工程。统计的结果具有代表性，也减少了时代背景的干扰。在统计技术方面，采用了电子计算机自动分词方法，是可行的，在国内也是首创的。因此，这次统计结果是高质量的、可靠的，为汉语教学、中文信息处理、汉语理解、机器翻译、速记、盲文、手语的编制、办公自动化以及国家标准词库的建立，提出了可靠的数据和依据，并为汉语计量学和语言工程研究奠定了基础。”^[14]此后不久，1987 年，刘源、梁南元在《汉语处理的基础工程——现代汉语词频统计》[《中文信息学报》，1987（1）]一文中也对这一项目进行了论述。值得一提的是，这项工程首次实现了一个汉语自动分词系统——CDWS。这在下文中将详细论述。

1983 年，武汉大学中文系和计算机科学系合作出版了《现代汉语语言资料索引（第一辑）（老舍〈骆驼祥子〉）》（武汉大学语言自动处理研究

组编,四川人民出版社)。此后,他们陆续出版了叶圣陶《倪焕之》等共二十三辑《现代汉语语言资料索引》。他们把这些作品的全文存入 RD—11 微型机软盘,并且利用计算机对这些语言资料作了自动加工处理。他们所使用的软件系统可以进行自动查频、自动编索、自动检索、自动校对、自动统计标点及句长等工作,还可以在计算机上对语言工作者提出的任意字、词、词组、短语、句子进行检索。吕叔湘在为索引所作的序中说:“这对我国语言研究的现代化,特别是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他们分辑出版的这一套索引,为语言研究者提供了大量详细的语言资料,这对他们的语言研究将是极大的帮助”。

从 8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末,学者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语料库自动分词系统的研究上。1984 年,梁南元在《书面汉语的自动分词与一个自动分词系统——CDWS》[《北航学报》,1984 (4)] 中介绍了书面汉语自动分词的可行性以及我国第一个汉语自动分词系统——CDWS。作者指出,CDWS 是基于可靠、可实用和结构化的原则设计的一个现代书面汉语分词系统,它是在 1983 年实现的,也是我国第一个分词系统。CDWS 采用 MM 分词方法、词尾字构词检错技术和知识纠错。它有两种工作方式:批处理方式和终端对话方式。这个系统还有如下统计功能:统计句子、标点符号数;统计字词总数,1—7 字词的总数;统计链长 1—7 的交集字段出现个数,知识切分数;统计多义组合字段出现个数,知识切分数;错码个数。它是一个逻辑上独立的系统,可以用于汉外翻译、汉语言理解、词频统计等基于分词结果的语言处理系统。作为我国第一个分词系统,它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是它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并积累了经验。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学者们开始对自动分词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他们提出了不同的分词方法。1985 年,梁南元、刘源在第 3 期《中文信息》上发表了《OM 自动分词方法》一文。1986 年,梁南元、刘源又在第 1 期《中文信息》上发表了《书面汉语计算机自动分词》的文章,作者在分析了人工分词不能满足汉字处理现代化的要求的同时,指出必须实现自动分词。作者在文章中介绍了已有的几种自动分词方法:“1. 最早提出的自动分词方法——MM 方法(The Maximum Matching Method)。2. 由 MM 方法自然引申为逆向的最大匹配法——OMM 方法(The Opposite Directional Maximum Matching Method)。3. 逐词遍历匹配法。4. 设立切分标志法。”随后作者对这四种方法进行了评价,

指出这四种方法都是“机械的分析方法，它们都没有利用汉语的各种语法规则，没有考虑上下文语义，因而或多或少都产生了错误切分”。在介绍评价了这几种方法后，作者提出了另一种分词方法——最佳匹配法——OM方法（The Optimum Matching Method）。此外作者还分析了自动分词的研究现状，作者在介绍了自动分词存在的三个方面困难后指出自动分词的研究还“不深入，方法也较落后”。这篇文章不但介绍了当时的几种自动分词方法，而且分析了自动分词的现状，这在那个时期具有一定综合性和概括性。

在这一阶段对语料库自动分词进行论述的还有：关春英、秦蓓《汉语文字自动统计系统——CWSS》[《中文信息学报》，1986（1）]，张普、张光汉《现代汉语有穷多层列举——自动分词方法讨论》[《语言与计算机》，1987（3）]，梁南元《书面汉语自动分词系统》[《中文信息学报》，1987（2）]，梁南元《书面汉语自动分词综述》[《计算机应用与软件》，1987（3）]，梁南元《再论汉语自动分词和切分知识》[《中文信息处理国际会议论文集》，1987（8）]，陈力为《当前中文信息处理中的几个问题及其发展前景》[《计算机世界》，1987（21）]，李国臣、刘开瑛、张永奎《汉语自动分词及歧义组合结构的处理》[《中文信息学报》，1988（3）]，揭春雨、刘源、梁南元《论汉语自动分词方法》[《中文信息学报》，1989（1）]，黄祥熹《书面汉语自动分词的“生成—测试”方法》[《中文信息学报》，1989（4）]，揭春雨《“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的若干问题探讨》[《中文信息学报》，1989（4）]。

在这些文章中，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分词方法，人们在把这些各有特点的分词方法应用于语料库的自动分词时，不能确定究竟哪一种最适合语料库的研究。因此，当语料库自动分词方法经过80年代的深入研究，已经比较成熟时，人们需要对这一方面作一个总结。同时，人们提出的这些多种多样的自动分词方法，却对语料库乃至汉语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因为不同的分词技术会产生不同的分词效果。因而，自动分词需要一套统一的、通用的、实用并且简单易行的分词规则，也就是分词规范，来统领整个工作。这两方面的工作由揭春雨、刘源、梁南元等作了研究。1989年，揭春雨、刘源、梁南元在《论汉语自动分词方法》中对80年代汉语自动分词的研究作了一个总结性的论述。作者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已有的自动分词方法简论；二、自动分词方法的结构；三、分词方法的时间复杂度和分词速度；

四、分词方法和分词精度；五、‘切分标志’和分词词典的功能。”这篇文章对人们了解 80 年代的汉语语料库自动分词有很大帮助，同时也是这一阶段自动分词研究成果的介绍。1989 年，揭春雨对分词规范问题进行了探索，他发表了《“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的若干问题探讨》一文，揭氏在文章中对“信息处理用‘词’的特点，‘分词规范’和汉语拼音正词法的比较，‘分词规范’和民族语用心理习惯的关系等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分词规范提出了一些个人意见和建议。虽然这只是对分词规范的一个初步探索，但是表明了人们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80 年代的汉语语料库研究主要集中在自动分词上，对于语义的研究只有一些零星的介绍，而且主要探讨的是歧义兼类词，这在严格意义上说，仍然属于自动分词研究的范畴。主要文章有：冯志伟《中文科学术语的结构描述及潜在歧义》[《中文信息学报》，1989（2）]，冯志伟《中文科技术语中的歧义结构及其制定方法》[《中文信息学报》，1989（3）]，孙茂松、黄昌宁《汉语中的兼类词、同形词类组及其处理策略》[《中文信息学报》，1989（4）]。

二、90 年代的语料库研究

“到了九十年代，随着计算机容量和计算速度的不断提高，汉字处理能力的不断增强，通过积极借鉴国外语料库建设的经验，我国大规模语料库的建设迅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15]这一时期的语料库有着十分广泛的用途，不仅继续研究汉语的自动分词，还对词性标注、句法标注和语义标注等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在自动分词的研究方面，这一阶段，学者们在 80 年代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不断提出新的分词方法。也有学者就某一类词进行研究，还有的学者则从理论上进行了一些探讨，从而使自动分词的研究不断深化和完善。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成果是《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的制定。

1990 年，姚天顺、张桂平、吴映明发表了《基于规则的汉语自动分词系统》[《中文信息学报》，1990（1）]，此文提出了一套机械切分与语义校正的汉语自动分词方法。在 1990 年第 2 期《中文信息学报》上，王永成、苏海菊、莫燕在《中文词的自动处理》中提出了一种最新的分词算法思想。同年，揭春雨在《正词法和分词规范》[《语文建设》，

1990 (4)] 中对“信息处理中的分词和汉语拼音中分词连写的分词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 面向人的正词法和面对机器的‘分词规范’两者之间有些什么内在联系? 它们的共同点和各自的侧重点又是什么?”等问题进行了论述。这对人们正确认识正词法和分词规范有较大帮助。在 90 年代初期发表的论文还有: 梁南元《汉语计算机自动分词知识》[《中文信息学报》, 1990 (2)], 张国焯等《快速书面汉语自动分词系统及算法设计》[《计算机研究与进展》, 1991 (1)], 何克抗、徐辉、孙波《书面汉语自动分词专家系统设计原理》[《中文信息学报》, 1991 (2)], 王永成《论中文切分中的歧义切分问题》[《情报学报》, 1991 (2)], 黄俊杰等《书面汉语自动分词的研究》[《计算机杂志》, 1991 (1) ~ (3)], 贺银云等《一种基于词链库的分词方法》[《计算机杂志》, 1991 (1) ~ (3)], 何克抗、徐辉、孙波《书面汉语自动分词专家系统的实现》[《中文信息学报》, 1991 (3)], 揭春雨、刘源、梁南元《汉语自动分词实用系统 CASS 设计和实现》[《中文信息学报》, 1991 (4)], 陈豫《汉语自动切词表音系统 (CWSAIS) 研制及其应用》[《情报学报》, 1991 (5)], 黄祥熹《书面汉语自动分词的“语境相关”方法》[《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1991 (6)], 徐秉铮《汉语自动分词歧义及处理策略》[《中文信息》, 1992 (1)]。面对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期分词方法的研究, 人们有必要作一下简单的回顾。1992 年, 刘源发表了《字词频统计和汉语分词规范》[《语文建设》, 1992 (5)] 一文。刘氏在“书面汉语自动分词情况”中介绍了当时国内采用的十种自动分词方法: “1. 最大匹配法—MM 方法 (The Maximum Matching Method), 2. OMM 方法 (The Opposite Directional Maximum Matching Method), 3. 逐词遍历法, 4. 设立切分标志法, 5. OM 方法 (The Optimum Matching Method), 6. 有穷多层列举法, 7. 基于词频统计的分词方法, 8. 联想一回溯法, 9. 双向扫描法, 10. 基于期望的分词方法。”刘氏在介绍这些分词方法的同时对它们作了简要的评价, 指出“以上所列的 10 种分词方法, 前 3 种是基本的分词方法, 其他几种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机械分词方法。实际运用中, 一般都是几种方法配合使用, 以求得到最佳效果”。这篇文章对人们了解学者们提出的种种分词方法, 认清它们的优缺点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十余年的时间, 出现了这么多分词方法, 虽然有学者对这些分词方法进行了综述, 但是对分词方法的规范进行研究的却比较少, 我们前面

介绍了 80 年代末揭春雨关于现代汉语分词规范的论述,那只是做了初步的探讨,更深一步的研究还没有做。到了 90 年代,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分词方法需要规范。在这种情况下,1994 年,《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及自动分词方法》(刘源、谭强、沈旭坤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的出版为人们提供了分词方法的规范原则。作者在书中介绍了《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的内容,对分词单位的定义作了界定:“汉语信息处理使用的,具有确定的语义或语法功能的基本单位。它包括本规范的规则限定的词和词组。”书中介绍了现代汉语的主要分词原则:(1)空格和标点符号是分词单位的分割标志;(2)用“结合紧密,使用稳定”作为划分汉字串为分词单位的基本原则;(3)四字成语及“结合紧密,使用稳定”的四字词组(通常可称为习用语)一律为分词单位;(4)缩略语、非汉字符号串、音译外来词一律不切分,为一个分词单位;(5)分词单位加儿化音构成一个分词单位,如“花儿、悄悄儿”等;(6)切分单位中还存在小于词的单位——语素(词素),如“新华社/四月/五/日讯”中的“讯”字。当然,书中介绍的分词规范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本身也存在一些不足,但是它使人们在进行研究时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标准,避免了许多分歧,这是它的可贵之处。

在这之后,又有部分学者提出新的分词方法或对已有的分词方法进行改进。主要文章有:骆正清、陈增武等《一种改进的 MM 分词方法的算法设计》[《中文信息学报》,1996(3)],唐棠、戎启俊《一种实用性汉语词汇处理系统 CWP 之设计》[《中文信息学报》,1997(1)],徐九韵等《数据库汉语查询语言的分词研究与实现》[《中文信息学报》,1998(4)],郑德权《汉语自动分词最大匹配算法的改进》[《中文信息》,1998(12)],沈达阳、孙茂松《基于统计的汉语分词模型及实现方法》[《中文信息》,1998(13)]。

这一时期关于对某一类词的分词方法的研究主要有:曹敏《计算机自动分析量词短语的方法及规则》[《中文信息学报》,1990(1)],张俊威等《多语料库作法之中文姓名辨识》[《中文信息学报》,1992(3)],郑家恒、刘开瑛《自动分词系统中姓氏人名处理策略探讨》(见《计算语言学研究与应用》,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宋柔等《基于语料库和规则库的人名识别法》(见《计算语言学研究与应用》,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郑家恒、刘开瑛《汉语姓名自动辨识初探》[《语言文字应用》,1994(2)],沈达阳等《中国地名的自动辨识》(见《计算

语言学进展与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孙茂松等《中文姓名的自动辨识》[《中文信息学报》，1995（2）]，张小衡、王玲玲《中文机构名称的识别与分析》[《中文信息学报》，1997（4）]，宗成庆、章森《基于多知识源的同音词识别方法》[《中文信息学报》，1998（4）]，郑家恒等《基于语料库的中文姓名识别方法研究》[《中文信息学报》，2000（1）]。

90年代从理论方面进行自动分词研究的文章比较少，在这一方面进行探索的有：1995年，孙茂松、邹嘉彦在第4期《语言文字应用》上发表的《汉语自动分词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此文从分词词表、歧义切分字段、生词、全局统计量与局部统计量四个方面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处理策略。此文能够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探索，这是难能可贵的。1996年，陈力为在《汉语书面语的切分问题——一个有关全民信息化问题》[《中文信息学报》，1996（1）]中论述了书面汉语切分的重要性，指出了它在信息化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他相关文章还有：1997年第1期《语言文字应用》开辟“中文信息处理专题研究”专栏，在第一部分“自动分词”中发表的董振东《汉语分词研究漫谈》等六篇文章；进明《有关汉语分词的几点意见》[《语言文字应用》，1997（2）]；杨成凯《关于汉语分词问题之我见》[《语言文字应用》，1997（3）]；孙宏林《浅谈汉语分词的标准》[《语言文字应用》，1997（4）]；袁毓林《关于分词规范和规范词表的若干意见》[《语言文字应用》，1997（4）]；张小衡《也谈汉语书面语的切分问题——分词连写十大好处》[《中文信息学报》，1998（3）]。在这些文章中，张小衡的《也谈汉语书面语的切分问题——分词连写十大好处》是比较有特点的，张氏在文中阐述了书面汉语分词连写的十大好处，同时还谈论了一些实施方面的问题。此文独特之处表现在为了实践分词连写这一方法，全文采用了分词连写。虽然分词连写有许多好处，但是中国传统的书写形式对人们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而且人们的阅读习惯很难改变。在现阶段进行这一方面的改革有一定的难度。

自动分词是对语料库中的语料进行加工的第一步，第二步是自动标注。“没有经过科学标注的语料库无法适应大规模真实文本处理的需要。语料库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标注的深度与准确度。”^[16]汉语语料库的标注过程包括：词性标注、句法标注、语义标注和话语标注。这里主要介绍词性标注和语义标注。

“1992年—1993年，我国在汉语文本的词性标注和语义标注实现了零的突破。”^[17]在汉语文本词性标注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的是1992年白栓虎的硕士学位论文《基于统计的汉语语料库词性自动标注的研究与实现》。白氏在文中指出“基于统计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是近年来计算语言学研究十分活跃的课题。语料库词性标注是利用统计模型获得较大成功的一项成果。尤其是对英语的处理更是如此，但是目前还没有对汉语语料库词性标注的成果的报告”。文章从各个方面探讨了汉语语料库词性标注的有关问题：对语料库语法标记集的设计作了一些研究，讨论并给出了词性标注的统计模型，分析了在二元语法计算模型中训练语料不足的情况下影响标注正确率的因素，研究了词典空缺对标注正确率的影响及其处理策略——推测技术及如何把这一技术引入统计模型中参与决策，把动态规划方法和FB算法应用于汉语词性标注过程中来选择标记，已实现的标注系统的组成和一些实现技术。对系统的封闭测试表明“在对每个词只返回一个标记的情况下正确率可达95%和93%以上”^[18]。这一阶段对词性标注进行研究的还有很多：采用统计方法的如刘开瑛、赵军《语料库词类自动标注算法研究》（见《机器翻译研究进展》，电子工业出版社，1992），采用规则方法的如周莉娜等《汉语词类标注规则的获取技术》（见《计算语言学研究与应用》），采用统计与规则相结合的方法的如周强、俞士汶《一种切词和词性标注相融合的汉语语料库多级加工方法》（见《计算语言学研究与应用》）。

在语义标注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的是1993年黄昌宁、童翔在第3期《语言文字应用》上发表的《汉语真实文本的语义自动标注》。文章介绍了一个汉语真实文本的语义自动标注系统，该系统的输入是未经处理的汉语文本。同以往的方法不同，此系统根据汉语的特点，利用了机器可读词典、机器可循词典以及一种基于实例的义项标注方法来处理文本中的多义词和未登录合成词/词组。张庆旭在《汉语真实文本语义标注取得突破性进展》〔《语文建设》，1993（9）〕中对上文进行了论述，张氏指出“这一研究成果引起我国学术界和新闻界的重视。世界计算语言学界也很关注这项研究成果”。当然这一标注系统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如，“如果输入的文本切分不正确，就可能做出错误的标注。现在还不能保证已标注的短语不含多种意思……现有的标注系统对单音节实词很有效，但对虚词常做出错误的猜测，因此对虚实兼类的单音节词常常标错”。此外，童翔《汉语真实文本自动语义标注》（1993年硕士学位论文）

(见《语言信息处理专论》，清华大学出版社，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也对此进行了论述。

1993 年之后，学者们对这一方面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主要文章有：周强、段慧明《现代汉语语料库加工中的切词与词性标注处理》(《中国计算机报》，85 版，1994-05-31)，周明、黄昌宁《面向语料库标注的汉语依存体系的探讨》[《中文信息学报》，1994 (3)]，白栓虎《基于统计的汉语词性自动标注方法》[《语文建设》，1994 (10)]，周强《规则和统计相结合的汉语词类标注方法》[《中文信息学报》，1995 (3)]，白栓虎《汉语词切分及词性自动标注一体化系统》[《中文信息》，1996 (2)]，周强、俞士汶《汉语短语标注标记集的确定》[《中文信息学报》，1996 (4)]，沈达阳、孙茂松等《汉语自动分词和词性标注一体化系统》[《中文信息》，1996 (5)]，俞士汶《现代汉语语料库加工——词语切分与词性标注规范与手册》(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1999 年 4 月)，段慧明、松井久仁於等《大规模汉语标注语料库的制作与使用》[《语言文字应用》，2000 (2)]，俞士汶、朱学锋等《大规模现代汉语标注语料库的加工规范》[《中文信息学报》，2000 (6)]。

在这些文章中，白栓虎和沈达阳、孙茂松等把分词和词性标注结合起来论述，这比较有特点。白栓虎在《汉语词切分及词性自动标注一体化方法》中指出“汉语词切分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消除切分歧义。所有的切分歧义中能够用语法知识解决的约占 90% 以上，而涉及到语义和语用知识则很少。在建造词性标注系统中，我们已经获得了汉语词类与词类同现的频度，同时也获得了一定规模的词条上带有词性标记的词典，这都是汉语处理的宝贵语法资源。若能充分利用这些语法资源来有效地解决汉语切词中的一些问题，那么必将减轻专门为汉语切词系统建造大量资源的负担，同时也可减轻系统整体规模”。利用切词和词性标注一体化的方法以后，“输入的是汉字字符串，输出的结果则是带有词性标注的汉语词串”。这表明汉语语料库的自动分词和词性标注可以不再作为独立的项目来研究，如把二者结合起来，优势互补，就可提高语料库加工的精度和速度。沈达阳、孙茂松等在《汉语自动分词和词性标注一体化系统》中则介绍了清华大学实验室语料库建构的一个开放的具有较高实用化性能的书面汉语自动分词和词性标注系统。

90 年代的汉语语料库词汇研究，在进行大量的分词和标注等方面的探索的同时，也在总体上作了一些研究。1993 年，黄昌宁发表了

《关于处理大规模真实文本的谈话》[《语言文字应用》，1993（2）]。黄氏在文中以谈话的方式介绍了处理大规模真实文本的要求以及它对语言文字研究带来的巨大影响。“影响之一是语料库语言学的崛起，它反映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经验主义思潮的复苏。影响之二是词库在整个语法理论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1994年，林杏光在第2期《语文建设》上发表了《信息化时代促使词汇研究蓬勃发展》。林氏在文中介绍了当前世界理论语言学的发展态势的八大倾向：“一、词汇主义，二、整体主义，三、跨结构体，四、多结构体，五、关系主义，六、单层次主义，七、认识主义，八、实现主义”，并指出“为了适应计算机的需要，我国语言学的发展要强调八大倾向之首的‘词汇主义’……要把许多信息放到词汇上去，要研究词汇功能语法，要研究词的全部本领，即词的复杂特征集”。作者的论述对促进词汇学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增强了人们研究词汇的信心。相关文章还有：罗振声、袁毓林主编的《计算机时代的汉语和汉字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中介绍的刘连元《现代汉语语料库选材设计》等五篇有关语料库的文章，刘连元《现代汉语语料库的研制》[《语言文字应用》，1996（3）]，胡百华、李行德《香港的语料库和相关研究》[《语言文字应用》，1997（2）]，周强、张伟等《汉语树库的构建》[《中文信息学报》，1997（4）]，王建新《语料库语言学发展史上的几个重要阶段》[《外语教学与研究》，1998（4）]，侯敏的《计算语言学与汉语自动分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中第四章介绍了有关语料库的情况，张普《关于大规模真实文本语料库的几点理论思考》[《语言文字应用》，1999（1）]，孙茂松《谈谈汉语分词语料库的一致性问题》[《语言文字应用》，1999（2）]，陈明谣《语料库与词汇学研究》[《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1）]，隋岩《动态流通语料库理论的概念和方法》[《语言文字应用》，2000（2）]，约翰·辛克莱著、王建华译《关于语料库的建立》[《语言文字应用》，2000（2）]。

汉语语料库经过20多年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相信进入21世纪的语料库词汇研究会更加深入、细致，必将取得更大的成绩，从而推动现代汉语词汇学的发展。

最后介绍几个最典型的现代汉语语料库。这些资料引自黄昌宁、李涓子《语料库语言学》（商务印书馆，2002）：

（1）北京语言学院《现代汉语频率词典》项目专用语料库

1979年,北京语言学院语言研究所为编纂《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建立了一个规模为200万字次的现代汉语语料库。这个语料库的语料选自报刊政论、科普作品、日常口语和文学作品等四个主题方面。当时,汉语的自动分词研究大都只进行了方法不同、语料规模不大的试验,还不能说从理论到实践上已经解决了“汉语自动切分”问题,因此语料库是用人工完成了全部语料的词语切分,并且用人工标出每个样本的类型特征,最后再用计算机完成登记、统计、分析、综合等工作。利用这一语料库在现代汉语词汇方面完成的统计有:

1) 词的分类和综合,词次和词型数的总计和累计,计算相对词频和累计词频。

2) 计算每个词型的散布系数及使用度。

3) 根据词频高低编定词级,求出平均词长,计算各级词的词型数以及它们在各种词长中的分布。

4) 计算最高频词在分布中的观察值和期望值。

5) 求出单音节词、双音节和三、四音节词及其他多音节词的百分比。

6) 按词的频次高低排列造表。

7) 按词的使用度大小依次造表。

8) 编出使用度在“5”以下,频次在“10”以下的低频词表。

(2) 北京航空学院等单位的语料库

1981年11月19日,国家科委委托国家标准局下达了“现代汉语词频统计”任务,北京航空学院为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10个单位为参加单位。这个语料库就是为这项任务建立的。语料库的选材范围为1919—1982年的正式出版物。从年代上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1919—1949),第二时期(1950—1965),第三时期(1966—1976),第四时期(1977—1982)。每个时期都分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主题类,每个大类又分为五个子类。在建立语料库后,他们作了以下的工作:

1) 对1919年到1982年(分为四个时期)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下分十个主题)的词语材料,分时期、分主题进行了词频统计。同时,还对14种汉语标点符号进行了频度统计。

2) 首次实现了第一个实用的汉语自动分词系统CDWS。

3) 设计和实现了第一个完整的现代汉语词频统计软件系统。

4) 建立了一个有 131 161 个词条的计算机词典。

5) 建立了一个有 52 个属性的汉字信息库。

6) 打印输出了 1919—1949、1950—1965、1966—1976、1977—1982 年等四个时期词语的综合频度,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词语综合频度, 以及总频度。7 种打印结果分别以汉语拼音和频度两种排序形式输出, 共计打印纸张 1 万余张。

(3) 台湾“中央研究院”平衡语料库

台湾“中央研究院”平衡语料库(简称台湾研究院语料库), 是世界上第一个带有完整词类标记的汉语平衡语料库。该语料库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五百万词次的汉语平衡语料库。语料库的语料主要来自: 报纸、一般杂志、学术期刊、教科书、工具书、学术论著和会话访谈等。为了妥善管理以及选取平衡语料库的内容, 语料库中的每个样本前都有一定的标志来描述它们的体裁、题材、语式、主题、媒体、作者姓名、性别、国籍、出版单位等特征属性。

台湾研究院语料库进行了自动分词处理。切分的过程是: 以台湾“中央研究院”词典的九万词条为基础, 将语料切分成一个个独立的词。没有列在词典中的成分, 则以字为单位, 被一一切开。然后, 以构词规律对衍生性强的词缀及数字组合成分进行结合成词的工作。词类标注方面, 采用先机器后人工校对的方法, 对全部语料库进行了词类标注, 在标注时采用的词类标记集共含 46 个标记。除了标记词类外, 还对语料库中的某些特殊句法表现作了标记, 使用的特殊标记共 8 个, 是针对动补式动词和动宾式动词的可拆现象、合并词中插现象、名物化结构和外来语设计的。此外, 语料库还提供了对语料库进行关键词检索的功能。

(4) 中文五地区共时语料库

中文五地区共时语料库 [Linguistic Variety in Chinese Communities (简称 LIVAC 语料库)] 是由香港城市大学开发的。该语料库从 1991 年开始酝酿, 1993 年获得初次资助后开始策划。语料的选择为在香港、澳门、上海、新加坡和台湾五地, 每四日选定一天的报纸。资料的内容包括社论、第一版的全部新闻和文章、国际和地方版以及特写和评论。这个语料库的特点是: 1) 像 LIVAC 语料库这样同时在五大华语地区进行大规模系统的语料采集, 是史无前例的。2) 设计并坚持在相当长的时期中采集“共时性”的语料。

建立该语料库的主要目的是对词语进行分析,所以首要任务便是对文本进行词切分,语料库采用了最大匹配的分词方法,首先由计算机自动分词,并且在切分过程中对一些特别类型的词语(如数词、人名、地名等)自动加上一些标志,以方便以后分析和利用。自动词切分的正确率在95%到96%以上。然后由人工对切词结果进行校对。此外该语料库还建立了一个快速而全面的检索系统,这个系统能够进行词语检索和文本检索。

(5) 现代汉语研究语料库

现代汉语研究语料库被确定为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同时被确定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八五”科研规划重点项目。现代汉语研究语料库的研制目的是,为从事现代汉语研究、汉语教学以及汉语信息处理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个以大规模真实文本为基础的研究平台,促进汉语研究的深入开展。该语料库有两个层次:第一级是规模达2 000万字次的粗语料库,第二级是一个规模为200万字次的精语料库,即经过分词和词性标注的语料库。相应的有两级采样:第一级采样是从约6 000万字次的素材中抽取2 000万字次的粗语料库。主要来源有《人民日报》、《中国新闻》和科普等类书籍。第二级抽样是从不含《中国新闻》和科普等类书籍的1 250万字次语料库中按照设定的比例随机抽取的200万字次样本。

该语料库制定的分词原则有三个方面:1)词是一个句法语义范畴。2)词的划分不是绝对的。3)应该区分语料中的不同层次。在词性标注方面,制定了确定词类标记的两个主要原则,一是完全根据词在句子中的句法功能确定词性,二是词的分类粗细适度。为此设计了多级的词类的分类体系。共设计了含有85个词类标记的标记集。该语料库的标注采用了CCID提供的分词和词性标注一体化的标注工具。机器标注完后,人工对200万字次的语料进行了逐词校对。为了使现代汉语研究语料库为语言研究者服务,还开发了一个具有建库、检索、统计等功能的应用平台。利用一级语料库可以进行基于字串的检索;利用二级语料库可以进行基于词和词性的多种检索和统计。

(6) 汉语精加工语料库

汉语精加工语料库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语料库语言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工具”的一个子课题。该子课题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汉语语料库的精加工体系,该体系主要包括:《现代汉语语料库文本

分词规范》、《现代汉语语料库词性标注规范》；语料库选样的基本原则及语料分布；最后得到一个 200 万字次（不包括标点符号）的经过分词、带有词性标注和部分语法信息的、分布合理的均衡语料库，以及 1.2 亿词次的质量可靠的生语料库。语料主要选用 90 年代的现代汉语语料，按文体分为文学、新闻、学术、应用四类。

该语料库的分词规范是在对分词进行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充分借鉴计算语言学和汉语研究的成果，尽量和已经颁布的国家标准取得一致，但是又体现出自己的特色。并且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保证分词的一致性。词性标注方面，制定的词性标注规范共含标记 119 个，其中词性标记 95 个，标点符号标记 24 个。该语料库的分词和词性标注在机器自动切分和标注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人工校对。

语料库取得的成果可以形成现代汉语词汇、句法研究的支撑平台，对中文信息处理、汉语语言学研究、汉语教学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节 对现代汉语词汇应用的研究

词汇应用属于应用语言学的范畴，广义的词汇应用研究涉及很多方面，在这里主要介绍词汇在词典学、文化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和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的应用。

一、词汇应用之词典学

研究词汇应用，其中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和词典学挂钩，也可以说，词汇学最重要的应用，就是为词典学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从 20 世纪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我国辞书编纂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辞书编纂，既有对我国古代辞书编纂优良传统的继承，又有对辞书编纂内容、方法的革新和创造。而且伴随着词汇学的初步发展，这个时期学术界开始探讨新的辞书编纂理论，关于词典、字典的研究十分活跃，发表了不少文章。如：蔡元培《商务印书馆新字典序》[《东方杂志》，1912，9（4）]、陆费逵等《中华大字典序文》[《大中华》，1915，1（1）～（3）]、沈兼士《新文学与新字典》[《新青年》，1918，4（2）]、田锡安《汉字改造中词典编辑法的几个提议》[《国语月刊》，1922，1（7）]、万国鼎《字典论略》[《图书馆学季刊》，1926，1（1）]、中国大辞典编辑处《中国大辞典编辑处计划书》[《国语旬刊》，

1929, 1 (1)]、傅葆琛《改良康熙字典式字典的建议与编辑民众实用字典的商榷》[《教育与民众》, 1930, 2 (4)]、朱智贤《儿童字典的研究》[《中华教育界》, 1930, 18 (3)]、须尊《国语大辞典之楷模》[《鞭策周刊》, 1932, 2 (1)]、刘大白《辞通序》[《北平图书馆馆刊》, 1932, 6 (6)]、吴文祺《介绍朱丹九先生著辞通》[《北平图书馆馆刊》, 1933, 7 (2)]、张世禄译《高本汉中文解析字典译》[《中国语文学丛刊》, 1933 (1)]、林语堂《分类成语辞书编纂法》(《语言学论丛》, 1933)、林语堂《编纂义典计划书》(《语言学论丛》, 1933)、钱玄同《辞通序》[《师大月刊》, 1933 (10)]、《世界日报》(北平), 1934-03-31]、胡适《辞通序》[《中学生》, 1934, (44)]、《世界日报》(北平), 1934-04-07]、陈登原《评朱起凤辞通上册》[《图书季刊》, 1934, 1 (2)]、《大公报》(天津), 1934-06-23]、林斯德《中文字典辞典解题》[《图书展望》, 1935, 1 (3)、(5)、(7)、(10)、(11)、(12)]、丁霄汉《辞源简评》[《文化建设月刊》, 1935, 1 (10)]、黎锦熙《平民百部字典序》[《世界日报》(北平), 1935-09-21]、黎锦熙《刘复中小字典序》[《世界日报》(北平), 1935-09-25]、刘复《中小字典序》[《国学季刊》, 1935, 4 (4)]、《世界日报》(北平), 1935-09-28, 1935-10-05、19、26]、管思九《民众字典的需要和内容》[《中华教育界》, 1936, 23 (12)]、黎锦熙《辞海序》[《世界日报》(北平), 1936-11-21、28]、黎锦熙《四年前的一段著述工作——考释一个字和两样东西(辞海序代生涯自叙)》[《文化与教育》, 1936 (108) ~ (109)]、黎锦熙《“国语辞典”编纂的经过》[《世界日报》(北平), 1937-01-16、23]、李西溟《对于〈中华成语词典〉的小贡献》[《学风》, 1937; 7 (5)]、王云五《编纂中山大辞典之经过》[《东方杂志》, 1939, 36 (1)]、瞿润缙《辞源正误》[《文学年报》, 1940 (6)]、方辉绳《辞海补漏》[《国文杂志》, 1944, 3 (1)、(2); 1945 (3)、(4)]、王力《理想的字典》[《国文月刊》, 1945 (33)]、《中国语文研究参考资料选辑》, 1955]、王了一《了一小字典初稿》[《国文月刊》, 1946 (43)、(44)]、《中国语文研究参考资料选辑》, 1955]、唐兰《小学杂记》[《国文杂志》, 1946, 3 (5)、(6)]、黎锦熙《评东莞尹崧先生编〈五声辞汇〉稿》[《华北日报》(北平), 1947-07-24]、吕叔湘《赵元任、杨联升合编〈(汉英)国语字典〉评介》[《中国文化研究汇刊》, 1947 (7)]、孙伏园《评联绵字典》[《四川教育通讯》, 1947 (23)]、严仁赓《四四字典(姚仲拔)》[《大公报》(天津), 1947-

12-26]、洪焕椿《读书治学的工具——字典和词典》[《读书通讯》，1948（150）]等。

在众多文章中，值得一提的是王力的长篇论文《理想的字典》。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1）现代的“字典”（Dictionary）不等于古代的“字书”，它应该兼顾形、音、义三方面，而又以义为主。（2）中国字典有着良好的基础。（3）古代字书（以《说文》为代表）存在着四个缺点：一是“文以载道”，二是滥用“声训”，三是注解中有被注字，四是望文生义。（4）近代字书的进步，一是知举例，二是知举篇名。（5）近代字书存在两个最大的缺点，一是古今字义杂糅，二是以一字释一字。（6）编纂理想的字典，须做到三件事，一是明字义孳乳，二是分时代先后，三是尽量以多字释一字。（7）“字典必须是官书”，必须由国家组织人力进行编纂。《理想的字典》这篇论文，对现代词典编纂理论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直到今天还对我国的辞书编纂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词典研究工作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不仅出版了几千种辞书，而且关于辞书研究的理论也逐步深入展开。在五六十年代发表了一些关于字典、词典的文章。如韩玉西《目前需要一部标准字典》（《光明日报》，1951-12-08、30）、张篷舟《从“□”与“○”说到需要一部新字典》（《大公报》，1951-12-19）、秉仁《关于编写通俗字典的几点意见》[《语文学习》，1952（8）]、马达《通俗字典里应该收些冷僻字吗？》（《大公报》，1952-10-20）、汪家祉《通俗字典里不必选收冷僻字》（《大公报》，1952-12-15）、胡帆《通俗字典和冷僻字》（《大公报》，1952-12-15）、刘永平《必须编辑一部〈普通话辞典〉》[《中国语文》，1953（3）]、杨宇麻《字典应该有计划地出版》[《中国语文》，1954（4）]、刘进《要打破旧字典的“成规”》[《语文知识》，1954（1）]、渭生、肇曾《谈谈查字典》[《语文知识》，1954（4）]、韩大鑫《字典的分部问题》[《语文知识》，1954（7）]、孙崇义《关于词典的选词工作》[《中国语文》，1955（12）]、韩镕石《对实用的字典词典的迫切要求》[《中国语文》，1956（3）]、宁渠《略谈词典编纂工作如何处理词汇的问题》[《中国语文》，1956（3）]、玄常《谈谈字典的用处》[《语文学习》，1956（6）]、郑奠等《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初稿）》[《中国语文》，1956（7）～（9）]、王士襄《对〈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的意见》[《中国语文》，1957（3）]、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

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凡例和样稿》[《中国语文》，1958（9）；《语文学习》，1958（9）]、中华书局辞海编辑室《我们是怎样重编〈辞海〉的》[《学术月刊》，1958（12）]、拓牧《音序字典的优越性》[《文字改革》，1960（12）]、何梅岑等《词典里如何表现思想性》[《中国语文》，1960（12）]、吕叔湘《关于汉语词典的编辑工作》[《新建设》，1961（1）；《中国语文》，1961（3）]、魏建功《参加词典编辑和古籍整理工作的体会》[《新建设》，1961（1）；《中国语文》，1961（3）]、张涤华《论康熙字典》[《江淮学刊》，1962（1）]、何多源《论字典、词典的使用》（《光明日报》，1962-12-22）、黄俊贵《关于字典的几个部首》（《北京日报》，1963-11-14）等。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词典编纂工作遭到了严重破坏。1958年正式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1965年编成初稿，本定于1966年付印正式发行，却因“文化大革命”而搁浅，直到1978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期间，词典学的理论研究工作也停滞不前。

“文化大革命”之后，汉语词汇学和其他学科一样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春天。伴随着词汇学的蓬勃发展，词典学理论研究也获得生机，开始了新的步伐。1979年，我国唯一的词典学期刊《辞书研究》创刊。20年来，该刊物发表了大量关于辞书编纂理论与实践的文章，也对词汇学与词典学的结合问题给予了应有的关注。众多学者辛勤耕耘，发表了大量文章，对词汇学与词典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些文章，因篇幅所限，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80年代至90年代，一批词汇学与词典学著作相继问世。如胡明扬等《词典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刘叔新《词汇学与词典学问题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黄建华《词典论》（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郭良夫《词汇与词典》（商务印书馆，1990），张志毅、张庆云《词与词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等。下面简介几本专门探讨词汇学与词典学二者之间关系的著作。

刘叔新的论文集《词汇学与词典学问题研究》共收论文12篇，作者在“前言”中指出，广义的词汇学一个重要的应用方面，就是给解决词典编纂上的方法、原则、体例等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在《词目的确定和词汇的范围》中，作者指出词目的确定是词典编纂上的一个根本问题，并且由词目收取、确定不当涉及如何确定语言词汇的范围这个现实性问题。他给词汇范围订了几条原则：（1）语言系统是个有一定组织形

式的整体,那么,作为语言的组成部分之一的词汇(包括固定语)当然也有确定的范围,其单位也是可以统计的,虽然词汇的单位要比语音的和语法的多得多;(2)自由词组不能算词汇单位;(3)不能把某一语言的词汇跟使用这一语言的一个作家或者一部作品所用的词语总和等同起来,前者属于“语言”,后者属于“言语”,“言语”的“语汇”里可以带上个人成分和狭窄集团的惯用语;(4)应当分清民族共同语和方言在词汇上的界限。此外,在书中同时涉及词汇学与词典学这两个相关联领域的文章有《词性和词的释义》、《论词的单位的确定——兼谈以词为词目的问题》、《词典字头的性质及其释注》、《论同义词词典的编纂原则》、《词的同义关系和词性——兼谈汉语同义词词典处理词性的问题》等。

郭良夫的论文集《词汇与词典》共收论文26篇,其中大部分是关于词汇与词典的。在《词汇学与词典编纂》中,作者主要谈了词汇是什么,语素是什么,以及如何从语法的角度和词汇的角度两个方向来观察词与语素的区别,词汇规范化,词汇史等词汇学基本问题,并用几本有代表性的汉语语文词典来说明我国的词典编纂的发展与不足。在《字典词典编写问题》中,作者探讨了编写汉语字典、词典的四个基本问题:条目问题、汉字问题、注音问题、释义问题。在《词典编纂的描写原则和历史原则》中,作者指出:“无论是充分的描写,还是全面的历史叙述,我们都得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才有望词典编纂取得更好的成绩。”在《关于词典修订》中,作者用《现代汉语词典》1973年试用本、1979年正式本、1984年重排本加以对照和比较,说明词典修订的重要。在《立目与立解——汉语词典编写问题之一》中,作者谈了如何设立词目,如何解释等一些问题。在《词项层次与义项层次——为〈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作》中,作者讨论了词项的时间层次,义项的底层和上层、单层和多层等问题。作者的这些文章,对词汇学与词典学的结合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张志毅、张庆云的论文集《词与词典》收论文27篇,其中仅论字、词典中的问题的文章就有10篇,另外的论文也都与词典学有关或对词典中问题的解决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几十年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词汇学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都对词典编纂起到了指导作用,在许多方面,其对词典编纂工作的指导越来越受到词汇学研究的重视。1998年9月首届中青年辞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在石家庄市召开,会议把“如何将汉语词汇研究成果用于辞书编

纂，在辞书中对词语进行科学、准确、全面的释义”列入了首项议题。

将来，不管词汇学与词典学的学科怎样发展，研究怎样分工，词汇学的理论与实践必将与词典学息息相关。

二、词汇应用之文化语言学

词汇是语言的三大要素之一，词汇和文化的研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回顾我国词汇学发展的历程，就会发现词汇与文化，词汇学与文化学的关系十分密切。

近代西学东渐和新文化运动使新思潮广泛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文化和文化史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开设《中国文化史》课程，并拟就了《中国文化史目录》，提出撰写文化专史的主张。1935 年吕叔湘翻译了路威(R. H. Lowie)于 1929 年所著的《文明与野蛮》，此书论述了食、住、衣、工艺、交通、婚姻、家庭、氏族与国家、礼仪、教育、艺术、宗教、医药、科学等人类社会从物质到精神的各个方面，是以全人类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著作，是人类文化史和文化人类学的专著。

1989 年语文出版社重版了罗常培 40 年代撰写，1950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与文化》一书。此书“想从语词的涵义讨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全书共分六部分：(1) 从语词的语源和演变推溯过去文化的遗迹；(2) 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3) 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4) 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5) 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6) 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这是一本较早的研究语言与社会、文化的专著，开拓了我国语言研究的新领域，在文化语言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1989 年该书再版时，吕叔湘在“前言”中说罗常培“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极为关心”，邢公畹在“序言”中赞誉罗常培在学术上的“开来”精神其中之一表现为“从语言学的研究扩展到语言与民族文化关系方面的研究”。

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以及语言学与文化学关系的研究沉寂了 30 多年，直到 80 年代才重新活跃起来。1982 年下半年，上海复旦大学举办了两次“中国文化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会议主题是如何写好一部中国文化史。后来由文化史的讨论引出了“文化”定义之争，“文化”定义之争还引发了文化研究的众多问题，比如文化形态诸问题、中国文化传统的估计问题、中外文化

的交流问题、文化中心问题等。这些问题的提出,使原来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反倒处于次要地位,导致研究方向性的转移,引起我国理论学界的普遍关注。^[19]1988年12月24日、25日,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了武汉地区首届“语言与文化”学术研讨会,1989年8月,在大连市举办了全国首届“语言与文化”研讨会,这些会议的主要议题是:(1)我国当前语言与文化研究的评价;(2)关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问题。1992年语用所和西安外国语学院在西安联合举办了全国社会语言学第三次研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语言与文化”。会后出版了《语言与文化多学科研究》的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从多方面反映语言与文化研究的成果。此后,全国很多学术单位,也十分重视语言文化的研究,积极开展各种活动。

从语言与文化研究热点的时间来看,不过短短十余年,但出版了很多论著,“由于从事语言和文化研究的学者主攻的专业方向不同,个人在具体领域中作为前提而确立的语言观在总体一致的精神下也有侧重点的不同”^[20]。由于这些分歧,逐渐形成了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三大流派:以游汝杰为代表的“双向交叉文化语言学”,以陈建民为代表的“社会交际文化语言学”,以申小龙为代表的“全面认同文化语言学”。这些学说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1]

游汝杰是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创者。游汝杰、周振鹤在《方言与中国文化》[《复旦学报》,1985(3)]中倡议建立“文化语言学”。作者在文中指出:“我国境内的语言,一般估计有六七十种之多,几乎每一种语言内部都有文化的差异。如果将如此丰富的语言材料和历史悠久、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是不是可以称之为文化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边缘学科,应该是把中国语言学和文化史研究结合起来,探索语言与文化史的内在联系”。在二人所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序言”中提到,“现在我们试图把方言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一方面探索方言形成和发展的文化背景,另一方面以方言为钥匙求解文化史上的某些课题,既为汉语方言学开辟一个新的研究园地,也为文化史研究寻找一个新途径。”

陈建民在《语言文化社会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一书中称:“如果说20世纪是描写、转换生成的小语言学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大语言学的世纪。大语言学主要把语义与文

化、语义与社会等结合在一起研究，既包含文化语言学的内容，也包含社会语言学、言语交际学、社会心理学、人类语言学等内容，这些学科的交叉研究表现出大语言学的重要特色。”他强调，文化语言学语言观的突出表现是重视语言的交际价值，重视语言的变异形式，从动态的角度观察语言。

申小龙较早提出中国文化语言学观点，出版了不少著作，如《中国语言的结构与人文精神》（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学林出版社，1989）、《中国的句型文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中国文化语言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他主张科学的语言学应向民族文化和民族语文传统认同并加以转化，以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在《文化语言学》（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一书中，他提出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包括：镜象认同法、思维认同法、气质认同法、深层结构认同法、比较认同法。

文化语言学的涵盖面很广，包括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各个方面，但其核心内容是词汇—词义。现在就从词汇学方面作一些介绍。

吕叔湘在论文《南北朝人民与文化》[《中国语文》，1988（4）]中指出：一种语言的历史和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尤其是词汇的历史最能反映人们生活和思想的变化。邢福义主编的《文化语言学》一书分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语言看文化，讲“语言——文化的符号”，讨论从语言看文化的层次、从语言看文化的发生发展、从语言看文化的传播交流、语言对文化的影响等问题；第二部分是从文化看语言，讲“文化——语言的管轨”，讨论文化对语言系统和语言观念的影响、文化对语言接触和融合的影响、文化对文字和准语言的影响等问题。书中探讨了方言词的差异与文化的关系、从词源结构看古代文化的思维方式、从词源结构看古代文化的伦理观念、从词源结构看古代文化的价值系统、色彩词与文化背景、文化局限词、成语的文化背景等词汇学与文化学相关联的问题。宋永培在《古代汉语词义的整体贯通与中国文化词汇学》（见《中国文化语言学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中提出了“中国文化词汇学”的定义，即“紧密结合中国一定时期的文化背景，主要通过汉语词义的系统与贯通来探求汉语词汇、词义的特点与规律的科学”。常敬宇的《汉语词汇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该书从汉民族的辩证观念、伦理观念、心态特征、典籍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礼俗文化、饮食文化以及姓氏、地名等诸多方面

全面而细致地探讨了汉语词汇与文化的密切联系。黄金贵的《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一书中通过对词语文化内涵的深入发掘, 订补了传统训诂学著作对 400 余条词义的浑诂、偏诂、误诂和失诂, 从文化语言学角度系统考释古代汉语文化词义。杨琳在《汉语词汇与华夏文化》一书中, 从文化的角度去探讨汉语词汇问题, 探寻汉语词汇的文化现象。书中用很大篇幅着重考察了方位词的文化蕴涵、词义的文化阐释、词义发展的文化动因三个大问题。陈立中的《阴阳五行与汉语词汇学》(岳麓出版社, 1996)论述了“反义词的发育和阴阳学说”、“两个庞大的词族”、“同构同位替代构词法”和“阴阳五行与汉语词义”四大问题。

此外关于词汇学与文化语言学关系研究的著作还有吴光范《云南地名探源》(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 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王建华《文化的镜象——人名》(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0), 史有为《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3), 苏新春的《文化的结晶——词义》(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4), 李如龙《福建方言》(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等, 再加上众多关于词汇与文化研究的论文, 学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吕叔湘曾说过:“说到底, 语言学的本质仍然是一门人文科学。”^[22]由此可见, 重视语言的人文属性, 强调文化的心态特征, 这是语言的本质所决定的。^[23]“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 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罗常培引萨丕尔语)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资源, 这些将是文化语言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所以, 中国文化语言学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

三、词汇应用之计算语言学与对外汉语教学

当今语言研究要特别重视两个“热点”问题: 一是计算机的应用, 一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应用。这两个领域与词汇应用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一) 词汇学在计算语言学上的应用

计算语言学属于应用语言学范畴, 它的研究是从机器翻译开始的。自从 1946 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以来, 在应用计算机运算数据的同时, 人们希望利用计算机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当时主要研究的是“词对词”的翻译法, 可是这种方法无法翻译出正确的语

句。从 60 年代开始,人们转而尝试让计算机来理解自然语言的语法、语义及语用,经过 30 多年的努力,这种尝试取得了进展,计算语言学也随之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起来。

计算词汇学是计算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是研究如何用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的词汇,建立语言词汇库、术语数据库等机器可读词典的科学。^[24]世界各国在发展计算词汇学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仅 1986 年就召开了四次有关机器词典的国际会议。1966 年至 1968 年,美国的奥尔尼(Olney)和齐夫(Ziff)提出“英语词汇结构调查”的计划,编制了两部英语可读词典。从 1984 年下半年起,美国的 MMC 公司进行“CYC”研究工作,将整本百科全书用人工输入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大型的知识库,即把百科全书变成计算机的知识表示,使每一个词条都变成计算机可接受的知识。此外,日本和西欧在计算词汇学方面也作了很多的努力。在我国,台湾“中央研究院”成立了中文词知识库小组,主要目标之一是建造汉语机器词典。在我国内地,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河南财经学院等单位也独立或联合开发了汉语电子语法、语义词典。编写机器词典成了计算词汇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另外,语料库也是计算词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前面有专节叙述,这里就不再介绍。可以说,计算语言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着重研究两个问题:一是机器词典怎么编,二是语料库怎么建。^[25]

在林杏光所著的《词汇语义和计算语言学》一书中,他指出,汉语词汇应走的两条康庄大道:一是以社会语言学研究汉语词汇,从宏观角度研究汉语词汇与外部条件的关系;二是以现代语义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汉语词汇,而重点研究汉语词汇语义学,从微观角度研究汉语词汇的内部规律。也就是以语义学为指导,适应计算机的需要而研究词汇语义学,这条研究路子的基本知识就是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外语、计算机。这条道路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为计算机研究汉语词汇”。

现代语言学理论发展的趋势也更加注重对词语的研究。美国学者赫德森(R. A. Hudson)在 1990 年出版的《英语的词语法》(*English Word Grammar*)一书中认为当今世界理论语言学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词汇主义”,即突出词汇的重要性,强调语言研究要落实到词汇上,描写语言从对语法规则的解释转向对词语事实的解释。^[26]

当今的时代是信息时代,信息处理是最热门的知识,而信息处理实

际上就是对语言文字资料的处理。中文信息处理既离不开计算机科学,又离不开语言科学。计算机要智能化,语言研究要现代化,语言学与计算机科学的结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27]我们必须加快对语言理论的研究,为计算机语言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二) 词汇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上的应用

“对外汉语教学”一般专指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从教学理论、教材建设到教学实践,从方法到应用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20世纪50年代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周祖谟《教非汉族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些问题》[《中国语文》,1953(7)],王学作、柯柄生《试论对留学生讲授汉语的几个基本问题》[《教学与研究》,1957(2)],曹琮玮《汉语拼音在外语语音教学上的应用》[《文字改革》,1959(12)],杜荣等《用汉语拼音方案教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些体会》[《文字改革》,1960(4)]等。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是:从最初阶段开始就明确了对外国人和我国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教学不同于对我国汉族学生的语文教学,对成年人的教学不同于对儿童的教学,指出必须针对非汉族成年人学习汉语的特点进行教学;明确了对外国人和我国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教学是培养他们实际运用汉语的能力;指出了结合对外国人进行汉语教学的需要加强汉语研究的必要性。^[28]

20世纪60年代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主要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验的总结。70年代,我国对外汉语教学进入了重要的恢复时期。这个时期的研究重点仍然是课堂教学,但是研究的视野更为宽广,对理论和方法的探讨更为深入。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在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上的主要特点是:侧重于研究解决教学中的具体问题;比较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对立统一观念分析教学中的矛盾;注意把理论研究、教学试验和总结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在论述具体教学问题时,较多地受到“听说法”及其理论基础——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映理论——的影响。^[29]

进入80年代以来,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研究的领域大范围拓展,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出版了一系列专门的论著。如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探索》(华语出版社,1987)、《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概要》(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华语教学讲习》(北京

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讲义)》(国家教委对外汉语教师资格审查委员会办公室, 1996), 杨惠元《听力训练 81 法》(现代出版社, 1988 年)、《汉语听力说话教学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6), 赵贤洲、李卫民《对外汉语教材教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0), 盛炎《语言教学原理》(重庆出版社, 1990), 周小兵《第二语言教学论》(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等。这些论著从不同角度对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和实践工作进行阐释, 促进了它的迅速发展。

对外汉语教学涉及的领域不仅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学传统学科, 还包括汉字、文化、汉外对比等方面内容。属于词汇研究方面的著作有许德楠《实用词汇学》(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0) 等。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出版了大量有实用价值的工具书, 如北京语言学院教学研究所编纂的《简明汉英词典》、《简明汉法词典》、《简明汉日词典》(商务印书馆, 1982) 等一系列词典, 《汉语词汇的统计与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5)、《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6); 李亿民主编《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6)、李小琪等编《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等。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 如今,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 中国与世界的交流越来越密切, 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 在学科建设上日益取得显著的成就, 正一步步地走向成熟。

词汇应用还涉及其他领域, 如语言规划、语文教学、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 在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了。在 21 世纪之初, 我们应该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 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 并且积极投身于实际研究中, 及时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样, 词汇研究一定会得到迅速的发展, 词汇应用的天地也一定会更加广阔。

第四节 对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化的研究

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化不仅是现代汉语规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而且对汉语词汇研究提出了现实性要求, 促进了词汇学科的发展。20 世纪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化工作的发展历程, 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时期。

一、新中国成立前汉语规范化的研究

早在 20 世纪初开展的“国语运动”, 给汉语共同语的发展带来了新

的活力。1916年10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主张“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言文一致”即要求书面语使用现代白话文；“国语统一”即把北京话定为标准国语。1919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部”，制定国音标准、修改语词读音、举办国语讲习所。这些都是为了确立现代汉语共同语规范所作的努力。但是，“国语运动”的最大成果就是确立国语的标准音为北京语音，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并未对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做更深入的研究。

二、五六十年代词汇规范化的初步发展

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毛泽东主席曾多次发表关注语言问题的指示。新中国成立以后，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更是提到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上。1949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后改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成立，主要工作是汉字改革的研究，汉语和汉语统一问题的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等。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社论指出：“语言的使用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是每人每天所离不了的。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对于我们的思想的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极重要的意义。”“正确地运用语言表达思想，在今天，在共产党领导的各项工作中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号召“建立正确地运用语言的严肃的文风”。在社论中重点论述了词汇的运用及规范问题。同时《人民日报》还连载了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这部书的目的在于纠正当时社会上在使用语言文字方面的混乱现象，内容切合实际，影响较大。在《语法修辞讲话》的第二讲“词汇”中，具体分析了报刊上的用词错误，包括不了解词义而用词不当，词性转换不当，词的配合不当，以及乱用文言词语、简称，生造词等现象。这些分析，对报刊用词起到了积极的规范作用。

1955年10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北京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罗常培、吕叔湘作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分三部分，谈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二是关于现代汉语的规范化有些什么原则性问题需要解决？三是怎样进行规范化工作？文章指出：“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统一的、普及的、无论在它的书面形式或是口头形式上都具有明确的、规范

的汉民族共同语。”文章具体分析了词汇规范问题，并指出，“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现在语言使用上存在混乱情形——大部分是在词汇方面。”“讲到文学语言，规范不明确的情况也是相当严重的，特别是在词汇方面。”文章指出词汇规范化问题主要是同义词繁多，意义上比较抽象的词用法不确定，生造词，滥用简称等。文章还指出我们需要一部反映现代汉语的词汇真实情况的词典。格·谢久尔琴柯（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苏联顾问）也在会上做了《汉语标准语规范化重要性和一些原则》的报告。在关于词汇问题讨论的专题中，陆志韦认为：“从书面语和国语的关系上看，语音、词汇、语法这三方面最麻烦的就是词汇问题。”郑奠在会议上的发言是《现代汉语词汇规范问题》，谈了以下内容：一是普通话词汇应以“官话区”方言为基础；二是由于吸收方言词而引起的词汇规范问题；三是由于吸收古汉语——文言词而引起的词汇规范问题；四是由于吸收外语词汇而引起的词汇规范问题；五是有关词汇规范化的一些别的问题。萧璋的《略谈现代汉语词汇规范问题》提出了搜集经过规范的普通话词汇编一个常用字表，以备调查方言等建议。此外关于词汇问题的报告还有孙崇兴的《关于词典的选词工作》等。这些论文被收入《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

这次会议前后，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的研究出现了高潮，报刊、杂志纷纷发表关于规范化的文章。主要有鲍明炜《略论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中国语文》，1955（8）]、林焘《关于汉语规范化问题》[《中国语文》，1955（8）]、黎锦熙《从汉语的发展过程说到汉语规范化》[《中国语文》，1955（9）]、王力《论汉语规范化》（《人民日报》，1955-10-12）、罗常培《略论汉语规范化》[《中国语文》，1955（10）]、凌袁《略谈语汇规范化》[《语文知识》，1956（1）]、王力《论推广普通话》（《人民日报》，1956-02-13）、向若《对汉语词汇的规范化工作的一些意见》（《光明日报》，1956-02-28）、平群《报刊要重视词儿规范化》[《中国语文》，1956（9）]、周达甫《行业语和外来语的规范化》[《中国语文》，1956（9）]、郑锡祺《教学中重视词汇的规范化》[《语文知识》，1957（2）]、朱伯石《师范院校中文系同学词语的规范化》[《语文学习》，1958（6）]、殷焕先《谈词语书面形式的规范》[《中国语文》，1962（6）]等。这些文章或涉及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化，或全文讨论词汇规范化内容。

在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词汇专著中，周祖谟的《汉语词汇讲话》在第

五讲中专章讲述“汉语词汇规范化问题”。文章指出,汉语词汇规范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如何把不必要的同义表达形式和妨害语言纯洁健康的成分加以适当的改变和澄清;另一方面是确定词的意义和用法,消除用词上的混乱现象,使语言的运用更趋于确切和精密。作者还指出词汇规范的具体工作,包括调查北方方言内的通用词汇,对各种译名和术语进行统一,研究用词方面的规范问题,编纂现代汉语规范化的详解词典等。这些工作在后来都得到了大力推行。张世禄在其著作《普通话词汇》中认为现代汉语各种词汇的选择和规范的原则有三条:即普遍性原则、需要的原则、意义明确的原则。张静的《词汇教学讲话》(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中指出词汇教学是促进汉语规范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词汇规范问题走入课堂。195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课程,由林焘主讲。该课程的部分讲稿后来以《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为题发表在1959年《语言学论丛》第三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该课程分为六方面:(1)词汇规范的主要依据;(2)方言词的规范问题;(3)古代词语的规范问题;(4)外来词的规范问题;(5)词义的规范问题;(6)词语简缩和生造词语问题。在“词汇规范的主要依据”中,林焘指出词汇规范不能像语音规范那样定出“标准”,只能提“基础”。因为词汇处在一种经常的变动中,所以要给一个经常变动的东西确定“标准”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在一定基础上对它的经常变动加以规范。他指出词汇规范的主要根据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普通话。“在词汇上‘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是应该和语音上‘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联系起来看的。”他还指出词汇规范化的阶段性总结应该是一部规范的词典,这部词典应该对每一个词都能标出它的读音,分析它的意义,说明它的用法。在“方言词的规范问题”中,林焘提出吸收和排斥两方面原则,并且充分认识到方言词规范的复杂,指出运用这两个原则时要注意:一是不要孤立地只在各方言词之间比较优劣,而要全面考察词汇的各个方面;二是不要静止地看一个词在目前是否起作用,而应看到哪些词在群众中已经受到一定考验而得到发展,使用范围在扩大,哪些词已逐渐不为群众所用,使用范围在缩小;三是不要简单地看普通话中是否已经有同义词;四是不要机械地比较哪个方言使用的人多。在“古代词语的规范问题”中,林焘认为应该根据不同的文体和不同的修辞作用来处理古代汉语词语。在“外来词的

规范问题”中，他指出，对外来词的规范，“从根本上看，吸收外来词实际上是如何根据外来的新事物在汉语中创造新词的问题，这种创造往往和原来的外国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词义的规范问题”中，他指出，词义随时在发展，因此不能太保守，也不能过早肯定新义，对一般认为的完全同义词处理时可以从宽，等等。

从此词汇研究更加重视词汇规范化工作。

三、“文化大革命”十年词汇规范化工作遭到严重破坏

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十年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社会的各个领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也给现代汉语带来了灾难性破坏。语言规范化工作几乎完全停滞，甚至出现了一些扭曲、病态的语言现象。

“文化大革命”时期，语言的混乱、不规范主要表现在逻辑上和语法上。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最”字叠用。“最”字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副词，表示某种属性超过所有同类的人或事物。但是那时的文章动辄“最最最衷心地祝愿”，“最最最热烈地欢呼”，这种堆砌一个程度副词的做法既不符合逻辑，又不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还有“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突出政治的，是同等的大好；不然的话，是同等的大坏”，这些由“大好”联想出的“小好”、“大坏”不符合正常的词语搭配规则，是那个混乱年代所结出的语言怪胎。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什么“大书特书”、“革命加拼命”、“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早就没有了，一定没有了，是一定的，不是可以有，可以没有，而是肯定的没有，而是肯定没有的”这样的胡言乱语层出不穷，不仅损害了语言的纯洁健康，而且使语言规范化工作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四、80年代词汇规范化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得到了国家语文工作者和各界人士的注意，被纳入正常轨道。词汇规范问题不时被学者重新提起，加以讨论。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词汇规范问题研究者众多，成果丰硕。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化问题上，由于部分语言学家的过严要求引起了一些争论，也引起了部分群众的疑虑和误解。其中以高振东的《语言是活的东西》（《人民日报》，1978-08-24）这篇文章

最具代表性。文章认为：“语言是活的东西”，“对于语言、文字和语法，都不可过于拘泥。”“在社会上，切不可搞什么‘语言规范化’，否则就要限制语言的发展，使之僵化。”“用‘规范’语言堆砌出来的东西，则往往给人一种干巴巴的感觉。”该文发表后，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反应。发表于《中国语文通讯》1978年3期的《语言究竟要不要规范化？》对来稿进行了综述，对高文提出了质疑。姜闻翰也针对高文的看法发表了论文《有关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1979（1）]，论述了三个问题：（1）语言规范化同语言发展的关系问题。其中又包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语言是不断发展的，如果用规范来限制它，会不会使语言“僵化”？作者认为，汉语发展的主流是朝更加完善的方向前进，但是在发展中也有非主流的一面，不合规范的现象。我们要在正确认识语言规律性的基础上，进行人工调节，即所谓搞规范化，这样做是有利于语言发展的。第二个问题是语言既然是在不停顿地发展着，能不能规范化？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语言规范化就是把语言的变动性和稳定性统一起来。（2）语言规范化对于我们运用语言是不是一种“约束”？这种“约束”会不会影响语言的生动，会不会限制语言风格的多样化？作者认为语言规范化是语言生动的前提，语言风格是同语言规范化统一的，不会妨碍语言风格的发扬。（3）为什么有些人不赞成汉语规范化？作者分析了不赞成规范化的三个原因，并且对原因进行了探讨。另外许宝华、颜逸明发表了文章《进一步促进汉语规范化》[《中国语文》，1978（2）]，提出了如何进一步促进汉语规范化的四项措施；对于词汇规范化研究，提出要研究现代汉语中新词语、古词语、外来语成分，也要研究方言；建议编写各种类型的词典等问题。

1980年10月成立了全国语言学会，在会上吕叔湘指出：“语言工作者有责任做些切切实实的工作，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努力。”而且从70年代末开始，发表了不少关于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化的文章，其中有蒋荫楠《谈现代汉语书面形式的规范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78（3）]、严修《汉语规范化问题的再认识》[《复旦学报》（语言文字专辑增刊），1980（9）]、叶景烈《普通话概念的表述质疑》[上海《社联通讯》，1984（3）]、朱炳昌《试论词形的歧异和规范》（见《语言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5）、陈亚川《异形词的规范可与多音字的精简相结合》[《语文教学与研究》，1986（1）]、郭良夫《汉语词汇规范问题》[《语文研究》，1981（2）]，《关于词语规范》[《中国语文》，1987

(1)]、李行健《词语的规范问题》(见《词语学习和使用述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侯敏《现代汉语词义的变化和规范》，[《语文建设》，1989 (5)]、王铁昆《新词语的规范与社会、心理》[《语文建设》，1988 (1)]、邹韶华《漫谈词语规范问题》[《学术交流》，1988 (3)]、倪宝元《名家在促进汉语词汇规范化》[《语文建设》，1988 (3)]、胡士云《词汇规范三题》[《语文建设》，1989 (6)]等。《中国语文》、《语文建设》上经常刊登评论各种使用语言不规范现象的文章，促进了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的发展。

吕冀平、戴昭铭的论文《当前汉语规范化工作中的问题》[《中国语文》，1985 (2)]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汉语规范化：(1) 强调语言学家应该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为语言的规范提供标准，施加积极影响。(2) 分清语言问题和非语言问题的界限，集中研究语言规范的原则标准。(3) 规范是发展中的规范，发展是规范下的发展。(4) 根据准确经济地传达信息的原则，提出处理不同冲突采取的不同方式。

李行健潜心研究词汇规范问题，从理论上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这个问题的。在《词语的规范问题——兼论汉语规范工作中的一些分歧》(见《词语学习与使用述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一文中，李行健指出：“词语的规范问题，是汉语规范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必须在汉语规范工作总体中去求得解决。”针对一些人在对词语规范问题认识上的偏颇，他又指出：“对于‘规范’（标准），我们既要把它看成固定的，又要把它看成发展的，不是凝固的。不把标准看成相对固定的，就无法进行规范工作，使用语言的人也会无所适从；但是，如果不把‘规范’看成发展的，非凝固的，就会妨碍语言健康地发展，甚至会‘规范’（标准）和群众活的语言形成对立，使规范工作处于被动地位。”他进一步提出：“对于已经制定的规范，我们也需要科学地去理解和贯彻。”李行健还具体谈到了对方言词、文言词、外来词如何进行规范以及词义规范的问题。他认为，“所谓方言词的规范问题是指那些已经出现在普通话中，但还未明确它们是否符合规范的方言词。”“所谓正确吸收方言词，就是把应该吸收的要尽可能吸收进来，把不该吸收的要淘汰排挤出去。”李行健认为，“文言词语是指那些从前在文言中常用，而现在只保留在普通话某些特定场合使用的词，即是说，从来源看它们来自文言，但从现实身份看却又是现代汉语词汇的组成部分”，对文言词语的规范，“一要防止滥用”，“二是防止乱用死去的古代词语”。对外

来词的规范,他提出三个原则:一是以意译为主,尽可能采取意译词;二是在同义的外来词中以使用的普遍性最大的那个为规范;三是音节的长短、构词的特点及表意方式合乎汉语习惯。对词义的规范,他认为主要是在旧义消亡和新义产生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另一篇文章《成语词典收词的规范性及其他》中,李行健还谈了对成语规范问题的意见。在《词汇规范和北方话词汇的调查研究》(《汉语研究》,第一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一文中,李行健认为,“在语言规范工作中,规范的对象主要应该是词汇”。给词汇规范制定的“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标准,“本身就是不严格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完全科学的”。“规范的标准要不断随着客观情况的发展而修订和补充。”从5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谈到了词汇规范问题,李行健的说法更加明确,对词语规范工作不仅有理论而且有实践的意义。

词汇规范化工作,本阶段的成果还表现在对术语、缩略词语和异形词的研究上。

早在50年代,罗常培、吕叔湘在《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中就指出,“专科术语最需要严格的标准”。80年代,刘涌泉的论文《略论我国术语工作》[《中国语文》,1984(1)]论述了术语学的一些理论问题。主要有:(1)术语的概念和特征。(2)术语的产生和移植是自发的,导致术语混乱是必然的。语文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要共同努力解决术语规范问题。(3)术语的标准化和国际化问题迫切需要解决。(4)积极从事术语数据库的建设工作。1988年12月10日,国家技术局颁布了《确定术语的一般原则和方法》的国家标准(主要起草人栗武宾),这个标准明确了“概念”、“定义”、“术语”三者的内容。

本阶段关于缩略词语的研究和探讨更加集中和深化,不仅出版了工具书《略语手册》(知识出版社,1986),而且还发表了多篇论文,如郭良夫《论缩略》[《中国语文》,1982(2)]、李行健《“第一内科”和“内一科”——简称的复杂多样性》[《中国语文通讯》,1984(5)]、李熙宗《论语词的紧缩》[《语文现代化》,1983(1)]、凌远征《现代专名略语》[《语文研究》,1987(3)]、徐耀民《缩略语的划界和规范问题》[《语文建设》,1988(3)]、周荐《缩略词和缩略语》(《语言研究论丛》,第五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马庆株《关于缩略语及其构成方式》(《语言研究论丛》,第五辑)。这些论文对缩略词语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对人们更深入地认识这类单位有很大帮助。

对异形词的研究，本阶段出版了朱炳昌编著的《异形词汇编》（语文出版社，1987）。该书收集汇总了“异形词”603组，涉及1316个词语，具有拓荒的性质，但是作者把“异形词”和“等义词”画上等号，没有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

五、90年代词汇规范化工作的拓展和深化

进入90年代以来，词语规范化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加强。在此阶段，对词语规范化做深入研究的学者首推李行健。他既重视理论的探索，又非常关注活的语言的应用。^[30]李行健的论文集——《语文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中收选了数篇关于词语规范化的论文，从中可以看出他研究的深入。在文章《汉语规范化中的几个问题》中，李行健针对一些人对词语规范化的误解作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语言规范化，只是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把语言在其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分歧适当地加以调整，引导它向更加健康和完善的方向发展。语言规范的确立，绝不像某些同志想象的那样，是由少数人主观决定的。语言规范（标准）的建立，只能顺应语言的发展，主要看社会实践，看它能否约定俗成，看它是否符合汉语的结构规律。”他还强调说：“对于‘规范’（标准），我们既要把它看成固定的，又要把它看成发展的，不是凝固的。”李行健还就语言规范的重点、难点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规范化的主要工作集中在词汇方面。这是由于词汇中方言分歧大，而普通话词汇规范的标准也不可能定得像语音、语法那么明确，只能以北方话为基础进行规范，而北方话词汇内部就存在不少分歧。”在文章《词汇规范和对外汉语教学》中，李行健呼吁抓紧进行有关词汇规范的三项基本工作。这三项工作包括：一是抓紧编写《现代汉语大词典》，因为“词汇的规范必须寄托在有形的作品上，特别是规范性的词典上”。二是抓紧进行北方话基本词汇的调查工作，因为这项工作“将使我们对方北方话基本词汇的概况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为词汇规范提供有力的参考资料”。三是抓紧进行新词新语的研究和新词新语词典的编纂，“新词新语的出现是语言发展中很可喜的必然现象。但由此引起的规范问题也是词汇规范中必须注意并解决的问题”。在文章《从语言发展和社会心理看某些词语的规范问题》中，李行健以“老鼠—耗子”、“下雨—落雨”、“电子计算机—电脑”、“照相机—摄影机”四对词语为例，谈了对词语规范问题的意见，并且进一步强调说：“上面的讨论，展示了词语规范

工作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提醒我们在词语规范工作中不能简单从事,一定要从多角度和多层次去观察和考虑问题,并且要改变我们对词语规范工作的某些过时的现象和做法。”李行健还指出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要辩证地看待规范词语和不规范词语;二是要正确对待某些所谓的完全同义词;三是要不时地按照语言的发展变化情况修改规范标准。在文章《词语规范问题趣谈》中,李行健以“医生”和“大夫”为例指出,“在进行词汇规范工作时,不仅要从词的意义考虑,还要从词在社会中的使用的情况去考虑。只有全面地了解一个词,才能在规范工作中做出正确的抉择”。以“照电火”、“照光”、“照X光”、“透视”这几个新旧词语的选择为例指出,“词语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这种发展反映了使用语言的社会集体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深化,也正是由于这种认识的深化,不断地推动着语言的发展”。以“其他”和“其它”为例指出,“‘其他’和‘其它’实应进行规范,统一用‘其他’而不用‘其它’。人为地在书面上分别‘人’和‘物’,这不仅无助于语言的精密化和规范化,反而给使用的人增加负担”。以“第一内科”和“内一科”为例指出了简称的复杂性。从这几篇文章可见李行健对词汇规范从宏观上和微观上都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和分析。

刘叔新在论文《从词汇规范化看方言词的吸收》[《语文建设》,1991(6)]中提出:“词汇规范化的对象,除了生造词语、某些新词语、外来词和等义词之外,还应包括有可能被共同语所吸收的或已‘侵入’共同语的方言词。”其他人也纷纷发表关于词汇规范化的文章。如赵怀印《词汇规范化应具有层次观念》[《语文建设》,1993(4)]、杨碧珠《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规范问题》[《语文建设》,1994(1)]、刘文仲《词语规范二题》[《语文建设》,1994(11)]、刘叔新《现代汉语词汇规范的标准问题》[《语文建设》,1995(11)]、陈章太《普通话词汇规范问题》[《中国语文》,1996(3)]、史定国《现代汉语儿化词规范问题》[《语文建设》,1996(6)]、杨琳《词汇规范应以从众和需要为根本原则》[《语文建设》,1997(5)]等。

对于异形词、缩略词语和简称、新词新语及外来词,本阶段也有一些学者继续研究。

对异形词的研究,如侯敏在文章《异体词的规范问题》[《语文建设》,1992(3)]中为异体词的规范订立了“从俗”、“从简”、“义明”、“音准”四原则。侯敏一方面同意朱炳昌在《异形词汇编》中的“同

音”、“同义”、“异形”三原则，另一方面又对“同音”、“同义”两个条件进行了修正。周荐在论文《异形词的性质、特点和类别》[《南开学报》，1993（5）]中对异形词设立“意义相同”的标准这种做法提出了否定的意见。周荐认为：“众所周知，语言中存在着因所指对象同一而在意义上具有等同关系的词，这类词即是所谓同义词。凡同义词，必得由至少两个词构成。换言之，‘意义相同’实际上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彼此间的关联。把‘意义相同’拿来也作为异形词确立的标准，却未为妥当。异形词，不管其书写形式有多少个，在实际语言中只是一个词，它是一个词位在书写上表现为若干个变异形式的现象。”周荐还对一些研究者提出的“读音相同”的标准，“可以互相换用”的标准提出异议，为异形词作了新的界定：“所谓异形词，是一个词位在书面上有若干不同写法的一种用词现象；异形词的若干个形体在共有一个意义的前提下，多是有着同一的语音形式，少数异形词的不同形体的语音形式略有参差；异形词从最初形成的角度着眼，各形体有使用上的代换关系，但是从规范的角度看，几个形体应该而且也可以区别出正体、异体，以利于人们的使用。”其他人也有研究，如马彪《从定量分析的角度看异体词的规范》[《语文建设》，1994（11）]、邓英树《异体词的语义差别及规范问题》[《语文建设》，1994（11）]、黎新第《多音字统读与异体词规范》[《语文建设》，1995（12）]、刘剑三《异形词的规范原则》[《语文建设》，1996（4）]、徐昌火《异形词规范的操作原则》[《语文建设》，1997（1）]等。

关于缩略词语和简称词语，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如程荣在《试谈词语缩略》[《语文建设》，1992（7）]中指出缩略语的词化是新词形成的途径之一，并呼吁加强缩略语的规范工作。还有杨碧珠《现代汉语缩略语的规范问题》（见《现代汉语专题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等。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新鲜事物的大量涌现，人们思想观念的迅速更新，出现了大量的新词新语。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新词新语再一次成为汉语研究的热点。1984年，吕叔湘在《辞书研究》上号召“大家都来关心新词新义”。从这以后，对新词语的研究逐渐形成热潮，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出版了几十部新词词典。最值得一提的是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于1991年成立了新词新语用法研究课题组，比较全面地进行新词语的整理和研究。于根元、刘一玲、周洪波推出了编年体新词语词典《1991汉语新词语》、

《1992 汉语新词语》等，并计划逐年编写下去。这本词典“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一定会逐步完善起来，其语言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也必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31]。

关于外来词的规范问题，一直是这些年人们关注的焦点。2000 年 3 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吕冀平主编的《当前我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问题》一书，该书以大量篇幅叙述了词汇规范问题，并且着重谈了外来词的规范问题，对“改革开放以来外来词大量涌入”这一突出现象给予应有的关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996 年语文出版社出版了陈章太、李行健主编的《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原名《北方话基本词汇集》）。全书共 5 册，约 1 000 万字，共记录北方话地区 93 个点的概况、语音系统，包括同音字表和 2 645 条词语，并绘制 63 幅方言地图。该书用国际音标标音，基本上反映了普通话基础方言区的语音、词汇概貌。胡明扬在《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基础工程——评〈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语言文字应用》，1997（3）]中对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为北方话词汇调查的最终结果，它对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化工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近一个世纪以来，语言规范化工作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通过许多语文工作者坚持不懈的努力，语文规范化尤其是词语规范化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却面临着许多现实性问题。比如如何把规范化工作的成果推广，应用于实践，引起社会上的重视；如何把规范化工作同中文信息处理更好地结合等。这些仍是语言规范化工作所面临的重要课题。随着新世纪的到来，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们将对语言规范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要认清规范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使词汇规范工作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取得更大的成就。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 20 世纪现代汉语词汇应用和词汇规范化的研究情况，着重叙述了词库、语料库、词汇学在其他学科的应用、词汇规范化等四个方面的发展历程。20 世纪的词汇应用和词汇规范化的研究工作不断地进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有些方面还需要深入研究。如词库的格式究竟采取何种方式为最佳，“大而全”的“总词库”还没有建成；

语料库在词性、语义、句法标注等方面的工作还需继续深入研究；词汇应用如何更多地为信息化社会服务；词汇规范化如何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在社会普遍推行等问题。这些工作在 20 世纪做得还不够，进入 21 世纪，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我们去。我们深信，经过学者们的辛勤耕耘，词汇应用和词汇规范化研究工作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注释：

- [1] 刘涌泉：《谈谈词库问题》，载《中文信息学报》，1986（1）。
- [2] 刘英林、宋绍周：《汉语常用字词的统计与分级》，载《中国语文》，1992（3）。
- [3] 林杏光：《词汇语义和计算语言学》，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
- [4] 许威汉：《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208 页。
- [5] 参见李行健：《〈现代汉语通用词表〉（国家标准）的研制工作》，载《语言文字应用》，2000（2）。
- [6] 许威汉：《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202 页。
- [7] 同上。
- [8] 参见上书。
- [9] 参见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词库建设通讯》，1993（1）。
- [10] 黄昌宁、李涓子：《语料库语言学》，2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11] 同上书，18 页。
- [12] 同上书，69～76 页。
- [13] 梁航：《“现代汉语字频统计”通过国家鉴定》，载《中文信息》，1985（2）。
- [14] 杨铁鹰：《现代汉语词频统计通过国家鉴定》，载《中文信息》，1986（3）。
- [15] 黄昌宁、李涓子：《语料库语言学》，69 页。
- [16] 侯敏：《计算语言学与汉语自动分析》，160 页，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 [17] 黄昌宁：《1992—1993 年我国计算语言学研究述评》，载《语文建设》，1994（7）。
- [18] 黄昌宁、夏莹主编：《语言信息处理专论》，37 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 [19] 参见许威汉：《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505～506 页。
- [20] 参见《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88（3）。
- [21] 参见许威汉：《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
- [22] 转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5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 [23] 参见许威汉：《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
- [24] 黄昌宁：《计算语言学简介》，载《语文建设》，1992（2）。

- [25] 参见林杏光：《词汇语义和计算语言学》。
- [26] 参见侯敏：《计算语言学与汉语自动分析》，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 [27] 参见林杏光：《词汇语义和计算语言学》。
- [28] 参见吕必松：《二十世纪的对外汉语教学》，见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615～64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29] 参见吕必松：《二十世纪的对外汉语教学》。
- [30] 参见周荐：《汉语词汇研究史纲》。
- [31] 徐祖友：《初创既成，更待提高》，载《辞书研究》，1995（1）。

附录一 20 世纪汉语词汇研究大事记

1907 年

4 月章士钊《中等国文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15 年

10 月《辞源》正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16 年

10 月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在北京成立，提出“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

1919 年

4 月 21 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部”。制定国音标准，修改语词读音，举办国语讲习所。

1931 年

12 月《辞源》续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2 年

5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国音常用字汇》。

1934 年

4 月朱起凤《辞通》由开明书店出版。

1935 年

8 月 21 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

1936 年

12 月舒新城等主编《辞海》（乙、丙种）（初版）由中华书局出版。

12 月孙起孟《词和句》由开明书店出版。

1937 年

3 月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国语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 月舒新城等主编《辞海》（甲、丁种）（初版）由中华书局出版。

1938 年

10 月舒新城等主编《辞海》（戊种）（初版）由中华书局出版。

1939 年

6 月《辞源》合订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47 年

3 月 2 日中国语文学会在上海成立。

1949 年

10 月 10 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

1950 年

6 月 25 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

1951 年

5 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制出《第一批简体字表（初稿）》。

6 月 6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

1952 年

7 月《中国语文》创刊。

7 月 中央人民教育部编印《常用字表》（单行本）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1953 年

3 月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由中华书局出版。

1954 年

2 月符定一《联绵字典》（第 2 版）由中华书局出版。

10 月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由中华书局出版。

11 月杨树达《词诠》由中华书局出版。

1955 年

10 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

1956 年

4 月张世禄《小学词汇教学基本知识讲话》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6 月陆志韦《北京话单音词词汇》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7 月孙玄常《怎样辨别同义词》由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

7 月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秘书处编《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8 月王了一《谈谈汉语规范化》由工人出版社出版。

11 月王松茂《谈谈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化》由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

12 月孙常叙《汉语词汇》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7 年

2 月何霭人《普通话词义》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3 月王力《汉语史稿》(上册)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4 月张静《词汇教学讲话》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4 月张世禄《普通话词汇》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4 月高庆赐《同义词和反义词》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5 月崔复爰《现代汉语构词法例解》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5 月林裕文《词汇、语法、修辞》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6 月新华辞书社编《新华字典》(修订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7 月傅朝阳《方言词例释》由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

10 月张洵如《北京话轻声词汇》由中华书局出版。

11 月陆志韦《汉语的构词法》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12 月崔复爰《现代汉语词义讲话》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8 年

1 月(清)杜文澜辑,周绍良校点《古谣谚》由中华书局出版。

2 月高名凯、刘正琰《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由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

6 月王力《汉语史稿·词汇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9 月《现代汉语词典》凡例和样稿在《中国语文》第 9 期上刊登。

10 月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5 年语言班编《汉语成语小词典》由中华书局出版。

12 月 13 日杰出的语言学家、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罗常培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 59 岁。

1959 年

3 月[苏]伏尔诺等著、彭京译《英语词汇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 月马国凡《成语简论》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4 月吕叔湘《文言虚字》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5 月许威汉《词汇》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7 月王勤、武占坤《现代汉语词汇》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11 月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12 月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编著《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61 年

1 月葛本仪《现代汉语词汇》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7 月张国庆《词汇》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9 月马国凡《谚语、歇后语、惯用语》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4 年

2 月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3 月郑奠、麦梅翘《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5 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简化字总表》由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

5 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汉语方言词汇》由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

1965 年

1 月 3 日杰出的理论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高名凯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 54 岁。

2 月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老俗语里的是和非》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9 月孙玄常、陈方《多义词、同义词、反义词》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0 年

11 月 21 日著名语言学家、心理学家、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陆志韦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 76 岁。

6 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多义词、同义词、反义词》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3 年

5 月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编《现代汉语词汇知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9 月马国凡《成语》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9 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74 年

5 月张国庆《成语浅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5 年

8 月李行健、刘叔新《怎样使用词语》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7 年

10 月 29 日著名学者、杰出的语言学家、复旦大学教授陈望道先生在上海病逝，享年 86 岁。

1978 年

2 月《四角号码新词典（1977 年修订重排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3 月 27 日杰出的语言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黎锦熙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 89 岁。

7 月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词汇常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9 月鲁歌、陆永俊、孙玉溱《汉语常用成语手册》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10 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2 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 1 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79 年

4 月《辞书研究》（第一辑）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4 月马国凡、高歌东《歇后语》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6 月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7 月《辞源（修订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 月朱盛科《常用多音多义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9 月史式《汉语成语研究》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9 月《语言教学与研究》在北京语言学院创刊。

9 月北京大学中文系等编《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1 月李行健、刘叔新《词语的知识和运用》（原名《怎样使用词语》）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0 年

1 月 21 日著名训诂学家、南京大学教授洪诚先生在南京病逝，享年 70 岁。

2 月武占坤、马国凡《谚语》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2 月由高等院校文字改革研究会编辑的《语文现代化》丛刊在上海

创刊。

4 月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4 月王锺《诗司曲语辞例释》由中华书局出版。

5 月王勤《谚语歇后语概论》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6 月王力《汉语史稿》由中华书局出版。

6 月宁渠《谚语、格言、歇后语》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7 月陆宗达《训诂篇论》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9 月许肇本《成语知识浅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9 月周大璞《训诂学要略》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10 月何九盈、蒋绍愚《古汉语词汇讲话》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10 月 21 日中国语言学会成立。

12 月由山西省语言学会编辑，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的山西省语言学会会刊《语文研究》创刊并出版第一辑。

1981 年

2 月任学良《汉语造词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2 月朱星《汉语词义简析》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3 月刘家琪《正确使用成语》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3 月唐启运《成语、谚语、歇后语、典故概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4 月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5 月 6 日至 10 日中国训诂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

6 月赵克勤《古汉语词汇问题》由中州书画社出版。

7 月石肆壬选编《词典学论文选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 月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8 月张寿康《构词法和构形法》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10 月 21 日至 27 日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在武汉市举行。

10 月 [英] R. R. K. 哈特曼、F. C. 斯托克著，黄长春等译《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11 月陆澹安《戏曲词语汇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2 月张志毅《简明同义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12 月季成家、高天星、尚延令、张祚羌《中国谚语选》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2 年

- 1 月胡明扬等《词典学概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 2 月《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 2 月 25 日杰出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在美国病逝,享年 89 岁。
- 3 月郭先珍《趣味词义》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 5 月高文达、王立廷《词汇知识》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 5 月刘希忠《现代汉语同义词辨析》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 7 月傅兴岭、陈章焕主编《常用构词字典》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 7 月向光忠《成语概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 7 月谢文庆《同义词》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 7 月孙良明《词义和释义》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 7 月杨天戈《汉语成语溯源》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 9 月张永言《词汇学简论》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 9 月尹大力《古代格言警句选》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 10 月王力《同源字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12 月马国凡、高歌东《惯用语》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3 年

- 1 月《现代汉语词典》第 2 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1 月中国语言学会编《中国语言学报》创刊号出版。
- 1 月武占坤《词汇》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 2 月舒化龙《汉语发展史略》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
- 3 月王德春《词汇学研究》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 3 月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词汇基础知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 3 月陈垂民、吴伯方《词汇常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 3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增订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4 月吴孟复《训诂通论》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 5 月杨书忠《多义词、同义词、反义词》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 5 月马国凡《成语》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 6 月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由中华书局出版。
- 7 月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

8 月徐青《词汇漫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9 月〔捷克〕拉迪斯拉夫·兹古斯塔著、林书武等译《词典学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0 月梅家驹、竺一鸣、高蕴琦、殷鸿翔《同义词词林》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11 月陆国强《现代英语词汇学》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11 月—1990 年 10 月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一册 1983 年 11 月,第二册 1984 年 10 月,第三册 1988 年 12 月,第四册 1990 年 10 月)。

1984 年

2 月常晓帆《实用成语词典》由知识出版社出版。

5 月温端政、沈慧云、高增德《歇后语词典》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5 月王安节等《简明类语词典》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6 月刘叔新《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6 月罗世洪《现代汉语词汇》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7 月谭永祥《歇后语新论》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7 月洪诚《训诂学》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7 月缪书晟、余伯良《成语述源释义》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8 月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9 月 25 日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成立。

10 月史式《太平天国词语汇释》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10 月张世禄《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10 月白兆麟《简明训诂学》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11 月倪宝元《成语例示》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12 月《词语评改五百例》编辑组编《词语评改五百例》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12 月刘正琰、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汉语外来词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1985 年

1 月程湘清主编《两汉汉语研究》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2 月田宗尧《中国话本小说俗语辞典》由新文丰出版公司(台北)出版。

2 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词典编辑进修班编《词书与语言》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3 月陈炳超《辞书概要》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3 月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3 月孙良明《词义和释义》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3 月朱星《汉语词义简析》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3 月宁架《古今歇后语选释》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3 月史东《简明古汉语词典》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3 月田宗尧《中国古典小说用语辞典》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出版。

4 月徐宗才、应俊玲《惯用语例释》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

4 月张永言《训诂学简论》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4 月朱广祁《〈诗经〉双音词论稿》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4 月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编《汉语词汇的统计与分析》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4 月曹聪孙《中国俗语选释》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6 月温端政《谚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6 月陈原《辞书和信息》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6 月辞书研究编辑部《词典和词典编纂的学问》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6 月刘洁修《成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6 月施宝义、姜林森、潘玉江《汉语惯用语词典》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7 月郭良夫《词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7 月温端政《歇后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 月丁石等编《常用典故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9 月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9 月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0 月刘坚《近代汉语读本》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11 月洪成玉《古汉语词义分析》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11 月杨伯峻、徐提《春秋左传词典》由中华书局出版。

12 月郭在贻《训诂丛稿》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2 月许宗才、应俊玲《常用俗语手册》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出版。

12 月龙潜庵编著《宋元语言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1986 年

1 月 6 日至 13 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

1 月钱剑夫《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 月史式、赵培玉《汉语新成语词典》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3 月陈高春《中国语文学家词典》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3 月向熹《诗经词典》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4 月林仲湘《古汉语词汇常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4 月符淮青《词的释义》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5 月 3 日杰出的语言学家、教育家、诗人和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王力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 86 岁。

5 月周士琦《实用解字组词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5 月孟宪章、田秉锬《惯用语汇释》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6 月高歌东《惯用语再探》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6 月张庆云《汉语反义词词典》由齐鲁书社出版。

6 月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

7 月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7 月贾彦德《语文学导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0 月杨为珍、郭荣光主编《〈红楼梦〉辞典》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10 月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第一卷由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出版（至 1990 年 10 月，全书八卷出版完毕）。

11 月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一卷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至 1994 年 4 月，余下十一卷及一卷附录、索引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完毕）。

12 月李升初、李伯超《汉语语义学论文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2 月耿二岭《汉语拟声词》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1987 年

1 月程曾厚《计量词汇学及其他》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3 月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秘书处编《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4 月赵克勤《古汉语词汇学概要》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5 月王宁《文言字词知识》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

6 月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资料室、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编《歇后语大全》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6 月沈孟璎《新词·新语·新义》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6 月张韵斐主编《现代英语词汇学概论》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7 月周大璞主编《训诂学初稿》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8 月 14 日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在北京成立。

8 月〔英〕杰弗里·N·利奇著、李瑞华等译《语义学》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8 月《中国成语大辞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8 月 21 日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病逝，享年 85 岁。

8 月何克抗、李大魁主编《现代汉语三千常用词表》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9 月郝迟等编《汉语倒排词典》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9 月朱炳昌《异形词汇编》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10 月刘叔新主编《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10 月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0 月张伟《字义与词义》由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

10 月蒋荫楠、郭熙《同义成语词典》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10 月苏宝荣、宋永培《古汉语词义简论》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11 月钟旭元、许伟建《上古汉语词典》由海天出版社出版。

12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倒序现代汉语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2 月闵家骥等编《汉语新词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12 月张毅《常用谚语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12 月陈炳昭《近义词应用词典》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12 月 24 日至 26 日汉语词汇学交流会在东北师范大学（长春）举行。

1988 年

1 月 13 日著名汉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陆宗达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 83 岁。

2 月 16 日著名教育家、作家、语文学家叶圣陶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 94 岁。

4 月王文襄等《现代汉语反义词词典》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5 月伍谦光《语义学导论》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6 月谢文庆《反义词》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6 月张静、蒋荫楠《词和词汇》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6 月孙治平等《中国歇后语》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8 月吴昌恒等《古今汉语实用词典》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9 月李行健《词语学习与使用述要》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10 月李布青《金瓶梅俚语俗谚》由宝文堂书店出版。

10 月张孝忠等《古今称谓语词典》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11 月王陶宇《歇后语大辞典》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

1989 年

1 月 10 日著名语言学家、杭州大学教授郭在贻先生在杭州病逝，享年 50 岁。

1 月史存直《汉语词汇史纲要》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 月张卫国《四字语型及其应用》由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

1 月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词汇学论文汇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 月周光庆《古汉语词汇学简论》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3 月 1 日杰出的语言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丁声树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 80 岁。

3 月葛川垠《常用词语典故例释》由黄山书社出版。

4 月李行健、曹聪孙、云景魁主编《新词新语词典》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4 月胡竹安《水浒词典》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

5 月刘广和《熟语浅说》由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

5 月孙维张《汉语熟语学》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

5 月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

5 月周国光《同义词》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5 月潘竞翰《反义词》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5 月曹宝麟《多义词》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5 月张紫文《同形词》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6 月沈伯俊、谭良嘯《三国演义辞典》由巴蜀出版社出版。

6 月温端政主编《中国俗语大辞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7 月温端政主编《古今俗语集成》(全六卷)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7 月温端政《汉语谚语小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7 月李法白、刘镜芙《水浒语词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8 月刘洁修《汉语成语考释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 月《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9 月潘允中《汉语词汇史概论》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9 月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9 月朱瑞《成语与佛教》由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

9 月冯志纯、周行健主编《新编汉语多功能词典》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10 月张双棣《〈吕氏春秋〉词汇研究》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10 月刘振铎主编《中华实用词典》由东北朝鲜民族教育出版社出版。

11 月〔日〕长泽规矩也《明清俗语辞书集成》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2 月蒋绍愚《古汉语词汇学简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2 月周光庆《古汉语词汇纲要》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2 月 20 日著名理论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岑麒祥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 86 岁。

1990 年

1 月冯其庸、李希凡《红楼梦大辞典》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1 月孟守介等《汉语谚语词典》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 月 20 日汉语水平考试(HSK)通过专家鉴定。

3 月王力《汉语词汇史》(《王力文集》卷十一)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4 月徐世荣《北京土语辞典》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5 月王璞《唐宋笔记语辞汇释》由中华书局出版。

5 月吕永修、赖兴华《现代汉语异读词词典》由兵器工业出版社出版。

6 月刘源等《现代汉语常用词词频词典》由宇航出版社出版。

7 月郭良夫《词汇与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 月张清常《胡同及其他》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

8 月许嘉璐《传统语言学词典》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8 月岑麒祥《汉语外来语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 月许德楠《实用词汇学》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9 月贾采珠《北京话儿化词典》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10 月徐烈炯《语义学》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10 月王德春主编《汉语国俗词典》由河海大学出版社出版。

11 月李开《现代词典学教程》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1 月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1 月郭在贻等《敦煌变文集校议》由岳麓书社出版。

11 月周宏溟《汉语惯用语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2 月王同亿主编《语言大典》由三环出版社出版。

12 月蔡镜浩《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1991 年

1 月朱一玄等《〈聊斋志异〉辞典》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3 月陈炳超《辞书编纂学概论》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3 月王德新《新编歇后语大全》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3 月陈海洋主编《中国语言学大辞典》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3 月白维国《金瓶梅词典》由中华书局出版。

4 月史有为《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

5 月刘玉凯、乔云霞《中国俗成语》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6 月闵家骥等《汉语新词新义词典》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8 月周荐《同义词语的研究》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8 月 27 日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张寿康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 66 岁。

9 月曹聪孙《中国俗语典》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10 月王锬、曾明德《诗词曲语辞集释》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10 月武占坤、马国凡《汉语熟语大词典》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11月16日著名语言学家、复旦大学教授张世禄先生在上海逝世，享年89岁。

11月耿文辉《中华谚语大辞典》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11月李庆军《谚语分类词典》由黄山书社出版。

12月李行健《语文学习论集》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12月蒋冀骋《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1992 年

1月中国语文杂志社《词语评改千例》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1月〔日〕香坂顺一著、〔日〕职田译《〈水浒〉词汇研究（虚词部分）》由文津出版社出版。

2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主办的《语言文字应用》创刊。

3月高文达主编《近代汉语词典》由知识出版社出版。

3月李申《〈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由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

3月程湘清主编《隋唐五代汉语研究》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3月程湘清主编《魏晋南北朝汉语研究》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4月许威汉《汉语词汇学引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5月程湘清主编《宋元明汉语研究》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5月黄建华主编《英俄德法西日——语文词典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5月吴士勋、王东明《宋元明清百部小说语词大词典》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6月任继昉《汉语语源学》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7月19日著名语言学家、古文字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朱德熙先生在美国病逝，享年72岁。

7月于永玉等主编《现代汉语造词词典》由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

7月张永言主编《世说新语辞典》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8月苏新春《汉语词义学》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8月中国标准技术开发公司编著《海峡两岸词语对释》由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

8月张绍麒《语词符号结构探索》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9月程湘清主编《先秦汉语研究》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10月27日至29日中国辞书学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

10 月《辞书编纂经验荟萃》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10 月于根元主编《1991 汉语新词典》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

10 月《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10 月王捷、徐建华、刁玉明《中国俗语》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1 月贾彦德《汉语语义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1 月杨祖希、徐庆凯主编《辞书学辞典》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12 月张善文《周易辞典》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2 月刘叔新、周荐《同义词语和反义词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2 月葛本仪主编《实用中国语言学词典》由青岛出版社出版。

1993 年

3 月杨牧主编《中国工具书大辞典》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4 月《语言学百科辞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5 月张万起《世说新语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5 月向熹《简明汉语史》(中编)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5 月郭熙主编《汉语新语汇词典》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5 月李行健、曹聪孙、云景魁主编《新词新语词典(增订本)》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5 月 29 日至 31 日首届全国现代汉语词汇学术讨论会在南开大学举行。

7 月[香港]《词库建设通讯》创刊。

7 月李达仁等主编《汉语新词语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7 月李行健主编《中国语言学年鉴(1992)》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9 月 28 日中国辞书学会所属的两个专业委员会——语文词典专业委员会和词典编纂出版专业委员会在北京成立。

9 月于根元主编《1992 汉语新词语》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

9 月王贵元、叶桂刚主编《诗词曲小说语词大典》由群言出版社出版。

10 月张清常《语言学论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0 月倪宝元主编《汉语成语九用词典》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11 月尹小林《汉语数目词辞典》由中华书局出版。

11 月刘叔新《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刘叔新自选集》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11 月王力《汉语词汇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2 月方一新、王云路《中古汉语读本》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

12 月刘叔新《语义学和词汇学问题新探》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4 年

1 月 23 日 著名词汇学家、古文字学家、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孙常叙先生在长春病逝，享年 86 岁。

1 月朱广祁《当代港台用语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1 月许威汉、陈秋祥《汉字古今义比较》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 月曹聪孙《齐夫定律和语言的“熵”——普通语言学论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2 月宋长庚、赵玉秋主编《词汇》由华龄出版社出版。

3 月 6 日至 7 日 由台湾中华语文研习所与《思与言》杂志社主办的两岸汉语语汇文字学术研讨会在台北市举行。

3 月张玉金《甲骨文虚词词典》由中华书局出版。

3 月曲彦斌主编《中国秘语行话词典》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4 月梁晓虹《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

5 月温端政、沈慧云、高增德《中国歇后语辞典》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6 月苏新春《文化的结晶——词义》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

6 月徐宗才、应俊玲《俗语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 月王立廷《词汇丛稿》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8 月周荐《词语的意义和结构》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9 月陈光磊《汉语词法论》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9 月蒋礼鸿主编《敦煌文献语言词典》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10 月高守纲《古代汉语词义通论》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10 月赵克勤《古代汉语词汇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1 月李行健主编《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11 月于根元主编《现代汉语新词词典》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

12 月刘一玲主编《1993 汉语新词语》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

12 月卢卓群《语法语汇问题论集》由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12 月石安石《语义研究》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12 月张志毅、张庆云《词和词典》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12 月韩根东主编《多功能义类成语大辞典》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

1995 年

1 月 14 日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周祖谟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 81 岁。

1 月潘庆云《中华隐语大全》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4 月曲彦斌主编《中国隐语行话大辞典》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5 月黄金贵《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5 月黎良军《汉语词汇语义学论稿》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5 月张振德、宋子然主编《〈世说新语〉语言研究》由巴蜀书社出版。

5 月 9 日著名语言学家、训诂学家、杭州大学教授蒋礼鸿先生在杭州病逝，享年 79 岁。

6 月《词汇学新研究——首届全国现代汉语词汇学术讨论会选集》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7 月唐枢主编《中华成语熟语辞海》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7 月王艾录《汉语理据词典》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

7 月庄泽义《省港民间俗语》由和平图书·海峰出版社出版。

8 月常敬宇《汉语词汇与文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8 月李行健主编《中国语言学年鉴（1994）》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8 月周荐著、刘叔新审订《汉语词汇研究史纲》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8 月周培兴《汉语惯用语新解》由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

8 月欧绍华编、钟业枢审校《常见通假字字典》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9 月韩陈其《汉语借代义词典》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9 月周世烈《同形词词典》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9 月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10 月曾子凡《广州话·普通话语词对比研究》由香港普通话研习社出版。

11 月周定一主编《红楼梦语言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2 月 25 日至 28 日首届全国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12 月高歌东、张志清《汉语惯用语大辞典》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12 月苏新春《当代中国词汇学》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1996 年

1 月陈立中《阴阳五行与汉语词汇学》由岳麓书社出版。

1 月符淮青《词义的分析和描写》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2 月罗正坚《汉语词义引申导论》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3 月曲彦斌主编《俚语隐语行话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4 月 1 日至 4 日第二届全国现代汉语词汇学术讨论会在烟台师范学院举行。

5 月 20 日至 24 日中国辞书学会首届语文辞书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

5 月金路《中国俗语》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6 月杨振兰《现代汉语词彩学》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7 月《现代汉语词典》第 3 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7 月杨琳《汉语词汇与华夏文化》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7 月王魁京、那须雅之《现代汉语缩略语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 月许嘉璐、王福祥、刘润清主编《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8 月周振甫主编《文心雕龙辞典》由中华书局出版。

8 月王宁《训诂学原理》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9 月高增良《〈红楼梦〉四字格辞典》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出版。

10 月陈章太、李行健主编《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10 月马文熙、张归璧等《古汉语知识详解辞典》由中华书局出版。

10 月王德春主编《新惯用语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11 月温端政主编《汉语常用语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11 月周殿龙、李长仁《汉语词汇学史》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

12 月符淮青《汉语词汇学史》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12 月张金泉、许建平《敦煌音义汇考》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12 月 24 日历时三年半之久，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中国社会科

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联合起诉王同亿和海南出版社侵犯著作权、专有出版权案，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被告王同亿、海南出版社立即停止侵权，停止《新现汉》、《大现汉》的出版发行，在《光明日报》上刊登向原告赔礼道歉的声明，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1997 年

2 月潘攀《〈金瓶梅〉语言研究》由武汉出版社出版。

3 月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3 月许威汉《语林探胜》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4 月李新建等著、蒋绍愚审订《成语和谚语》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4 月李行健《语文学习新论》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5 月 20 日著名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张志公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 79 岁。

5 月黄征、张涌泉校注《敦煌变文校注》由中华书局出版。

5 月高歌东、张志清《红楼梦成语辞典》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5 月刘中富《汉语行业语研究》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7 月 25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王同亿和海南出版社侵犯《现代汉语词典》著作权、专有出版权案做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7 月冯胜利《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7 月张清常《北京街巷名称史话》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出版。

8 月苏新春《词义文化的钩沉探赜》由广州出版社出版。

9 月葛本仪主编《汉语词汇论》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9 月〔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

10 月詹人凤《现代汉语语义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0 月崔希亮《汉语熟语与中国人文世界》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出版。

11 月颜洽茂《佛教语言阐释——中古佛经词汇研究》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11 月刘坚、江蓝生主编《近代汉语断代语言词典系列》中江蓝生、

曹广顺《唐五代语言词典》，袁宾等《宋语言词典》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12 月杨宝忠《古代汉语词语考证》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12 月刘兰英、赵桂藩、姜林森、施宝义《中国古代名言隽语大辞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2 月 19 日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石安石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 65 岁。

1998 年

1 月 11 日著名语言学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张清常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 83 岁。

1 月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1 月吴友富主编《国俗语义研究》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2 月王立廷、沈基松、张小平《缩略语》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3 月高小方《中国语言文字学史料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4 月 9 日杰出的语言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吕叔湘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 94 岁。

5 月刘中富《秘密语》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6 月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6 月李如龙《汉语地名学论稿》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6 月周荐《词汇学问题》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6 月谭汝为《词语修辞与文化》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8 月周日健、王小莘主编《〈颜氏家训〉词汇语法研究》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8 月陈健民《普通话常用口语词和句》由香港普通话研习社出版。

9 月 11 日至 14 日首届中青年辞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在石家庄举行。

9 月李崇兴等《元语言词典》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10 月许伟建《上古汉语词典》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10 月姚汉铭《新词语·社会·文化》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10 月岳国均主编《元明清文学方言俗语辞典》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9 年

1 月王艾录《汉语相似造词语义类释》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1 月王宁、邹晓丽主编《词汇应用通则》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1 月 14 日至 16 日亚洲辞书学会第一届年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行。

1 月于根元主编《实用语文规范知识小词典》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3 月 22 日中国语文网站测试版和中国语文邮件组建立。

4 月徐国庆《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5 月张永言《语文学论集（增补本）》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5 月徐宗才《俗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5 月林杏光《词汇语义和计算语言学》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7 月戴鑫、宋立民、康锐、李会龙、席云玲《中华别称类编》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8 月 1 日至 3 日首届汉语词源学研讨会在东北师范大学（长春）举行。

8 月 9 日由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织实施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工作正式启动。

8 月王云路《六朝诗歌语词研究》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11 月李梵《词语春秋》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

12 月毛远明《左传词汇研究》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2 月李临定《现代汉语疑难词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000 年

1 月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古今汉语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 月钟敬文主编《语海》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 月史锡尧《常用词语漫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 月温端政、周荐《二十世纪的汉语俗语研究》由书海出版社出版。

1 月史有为《汉语外来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 月吴再《词谏——〈现代汉语词典〉评析与补白》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1 月张绍麒《汉语流俗词源研究》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1 月《语海》编辑委员会编《语海》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2 月江蓝生《近代汉语探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 月谷正羲《歇后语趣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2 月卞成林《汉语工程词论》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3 月张能甫《郑玄注释语言词汇研究》由巴蜀出版社出版。

3 月殷寄明《语源学概论》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3 月许威汉《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由书海出版社出版。

3 月中国辞书学会学术委员会编《中国辞书学文集》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5 月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5 月张联荣《古汉语词义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6 月孙玉文《汉语变调构词研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6 月武占坤《中华谚语研究》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7 月陈建民《汉语新词语与社会生活》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7 月陈原《新词语》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7 月冯志伟《术语浅说》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7 月江蓝生《古代白话说略》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7 月凌远征《现代汉语缩略语》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7 月鲁启华《谚语新谈》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7 月许威汉、金甲《词汇与写作》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7 月周荐《汉语词汇新讲》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7 月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成语规范词典》由长春出版社出版。

7 月朱广祁等《港台用语与普通话新词手册》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8 月蒋绍愚《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 月顾之川《明代汉语词汇研究》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9 月周行健、余惠邦、杨兴发主编《现代汉语规范用法大词典》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9 月王占馥《境况语义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0 月苏宝荣《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0 月 25 日至 29 日全国第三届现代汉语词汇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举行。

11 月徐时仪《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附录二 20 世纪中国词汇学家简介

陆志韦（1894—1970）别号陆保琦，浙江吴兴人，1913 年东吴大学毕业，1915 年赴美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4 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大学、东南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52 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又任学部委员。在汉语音韵学、语法学上有重要建树。主要著作有《古音说略》、《诗韵谱》、《证广韵五十一声类》等。词汇学方面，著有《北京话单音词汇》、《汉语构词法》（合著）等。《汉语构词法》全面、细致地分析了汉语词汇的构成规律和特点，把汉语构词法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郑奠（1896—1968）字石君，浙江诸暨人。192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生前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致力于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化、词典编纂和汉语词汇史的研究，重要论著有《现代汉语词汇规范问题》、《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合著）、《汉语词汇史随笔》、《现代汉语中的日语词汇》等。合编《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1926 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7 年赴法国留学，获博士学位，1932 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教授。1954 年调北京大学任教授，学部委员。治学广博，在古代汉语、现代汉语、音韵学、语法学、词汇学各个领域都有重要建树，多有开创，为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词汇学著作主要有《汉语词汇史》。所著专著 40 多种，论文近 200 篇，集为《王力文集》20 卷。

张世禄（1902—1991）字福崇，浙江浦江人。1926 年毕业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新中国成立前曾在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广泛研究古汉语音韵、文字、训诂，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和普通语言学。主要著作有《中国音韵学史》、《语言学原理》、《广韵研究》、《音韵学》、《中国古音学》、《语音学纲要》、《张世禄语言

学论文集》等。词汇学著作有《词汇讲话》、《普通话词汇》等。

潘允中(1906—1996)字尹如,号韬庵,广东兴宁人。中山大学教授。长期致力于汉语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汉语语法史概要》、《汉语词汇史概要》、《古汉语基础知识》(合著)等。

孙常叙(1908—1994)又名孙晓野。吉林人。曾师从罗振玉、高亨研习古文字学。东北师范大学教授。致力于汉语词汇和古文字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汉语词汇》、《文字学》、《古汉语文字语言词汇》等。《汉语词汇》以汉语词汇的共时研究为主,参以历时研究,纵横交错,力求全面观察汉语词汇,构拟研究汉语词汇的新体系。作者还提出词汇学的新范畴——造词法,为词的理据和内部形式分析奠定了基础。该书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全面研究汉语词汇的专著,具有拓荒的性质。

高名凯(1911—1965)福建平潭人。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哲学系,1936年赴法留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燕京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学部委员。长期从事语言理论、现代汉语语法、词汇的教学研究工作,有重要建树。主要著作有《汉语语法论》、《普通语言学》、《语法理论》、《语言与思维》、《语言论》等。重要译著有《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著)等。词汇学方面,同刘正琰合著《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最有分量的研究外来词的著作。

周祖谟(1914—1995),字燕孙,北京人。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辅仁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治学广博,在音韵学、训诂学中论著尤丰,主要著作有《问学集》、《语言文史论集》、《唐五代韵书集存》,又完成《广韵校本》、《方言校笺》、《释名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等书。词汇学著作主要有《汉语词汇讲话》,是第一部系统和全面论述现代汉语词汇的著作,为后来现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蒋礼鸿(1916—1995)字云从,浙江嘉兴人。1938年之江文理学院国文系毕业。杭州大学教授。长期从事文字训诂、白话词汇研究。主要著作有《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义府续貂》、《商君书锥指》、《淮南子校证》、《古汉语通论》(合著)、《任怀斋文集》等。

张寿康(1925—1992)北京人。1946年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生前为北京师范学院教授。主要研究现代汉语语法、修辞和文章学。主

要论著有《文章学导论》、《关于汉语构词法》、《说结构》、《构词法和构形法》等。

武占坤（1926— ）笔名戈戈、武占昆，吉林农安人。1955 年东北师范大学现代汉语研究生班毕业。河北大学中文系教授。长期从事现代汉语教学研究工作，尤致力于现代汉语词汇和熟语学的研究，主要著作有《现代汉语词汇概要》（合著）、《谚语》（合著）等，又主编《现代汉语》、《汉语熟语大辞典》等。

张永言（1927— ）四川成都人。1950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教育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致力于训诂学、汉语史、词汇学、汉藏语的研究。主要著作有《词汇学简论》、《训诂学简论》、《语文学论集》等。

孙良明（1927— ）河南安阳人。1952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山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长期从事现代汉语词汇学、语法学研究，词汇学论著尤多。重要论著有《词的多义性跟词义演变的关系和区别》、《同义词的性质和范围》、《汉语词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汉语构词法中的几个理论问题》、《词义和释义》等。

许威汉（1927— ）浙江平阳人。1949 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长期从事训诂学、汉语词汇学和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训诂学导论》、《古汉语概述》、《汉语词汇学引论》、《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等。

洪成玉（1928— ）笔名夏硕，浙江桐庐人。1961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致力于古汉语语法、词汇研究，主要著作有《古汉语词义分析》、《古汉语同义词辨析》等。

张静（1929— ）河北乐亭人。1953 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郑州大学教授、河南师范大学（新乡）教授。致力于现代汉语语法、词汇的研究。主要著作有《词汇教学讲话》、《汉语语法问题》、《语法比较》、《古今汉语比较语法》（合著）等，又主编《新编现代汉语》。

王勤（1929— ）吉林长春人。1955 年东北师范大学现代汉语研究生班毕业。湘潭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现代汉语教学、研究工作，尤致力于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主要著作有：同武占坤合写《现代汉语词汇》、《现代汉语词汇概要》，同他人合编《分类汉语成语词典》，以及《谚语歇后语概论》、《北京语音常识》、《修辞说略》等。

许德楠（1932— ）北京人，1955 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现代汉语教学和研究，主要论著有《实用词

汇学》、《词语的文化内涵与信息性的若干关系》、《现代汉语语法》(合著)等。

马国凡(1932—)原名马国藩,辽宁绥中人。1955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研究生班。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长期致力于汉语熟语学、汉语词汇学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成语简论》、《谚语、惯用语》、《成语》、《歇后语》(合著)、《惯用语》(合著)、《谚语》(合著)等。

葛本仪(1933—)山东潍坊人。195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山东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词汇学研究,兼及语法学、语用学以及信息处理研究等。主要著作有《现代汉语词汇》、《汉语词汇研究》,主编教材《语言学概论》、《新教学语法概论》,又主持完成了《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三万词语集》、《现代汉语三万词微机处理系统》、《当代汉语流通频度词典》等。

王德春(1933—)江苏南京人。1954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长期从事语言学、语义学和修辞学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词汇学研究》、《现代语言学研究》、《语言学通论》等。主编《汉语修辞词典》、《汉语国俗词典》。

温端政(1933—),浙江平阳人,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主要从事汉语方言、熟语研究。主要词汇学论著有《谚语》、《歇后语》、《太原方言词汇》、《二十世纪汉语俗语学》(合著)等。主编《中国俗语大词典》、《古今俗语集成》等。

王镜(1933—),四川成都人。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贵州民族学院教授。致力于近代汉语语词研究,主要著作有《诗词曲语辞例释》、《唐宋笔记语辞汇释》等。

赵克勤(1934—)湖北武汉人。195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商务印书馆编审。致力于古代汉语、词汇学、修辞学和词典学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古汉语词汇问题》、《古汉语词汇概要》、《古代汉语词汇学》、《古汉语修辞简论》等。

刘叔新(1934—)广东惠州人。195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南开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现代汉语词汇、语法、词典学、语言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词汇的知识和运用》(合著)、论文集《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汉语描写词汇学》、《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刘叔新自选集》、《语义学和词汇学问题新探》,主编《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等。《汉语描写词汇学》对现代汉语词汇的许多重要方面

作了具有开拓性质的描写和探讨，方法比较新颖，常有前人未发之论，为作者数十年潜心词汇研究的总结性成果，是对现代汉语词汇现象进行静态描写的第一部著作。

李行健（1935— ）四川遂宁人。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致力于汉语词汇、方言、辞书编纂等方面的研究，主要著作有《词语的知识和运用》、《语文学习论集》等，主编《中华成语大词典》、《新词新语词典》、《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等。

符淮青（1936— ），海南文昌市人。195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长期从事汉语词汇学、语义学、词典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重点转入汉语词汇学、词典学、语义学研究。20多年来，撰写专著五部，合编著作两部。发表论文40多篇。主要著作有《现代汉语词汇》、《词义的分析与描写》、《汉语词汇学史》等。在词汇研究方面，符淮青尤以词义分析见长。早出的《现代汉语词汇》系统地探讨了汉语合成词中词义和组成它的语素义的关系，对词典学、词汇教学有广泛的影响。后出的《词义的分析与描写》综合作者十多年来在词义分析研究方面的成果，对词义的表现形式、词义分析方法、词汇体系等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提出了分析词义的“词义成分—模式”方法。

孙维张（1936— ），辽宁海城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词汇学、语义学和语言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汉语熟语学》、《社会语言学》、《语言学概论》（合著）等，参与编写《汉语成语小词典》、《现代汉语虚词例释》等，主编《汉语熟语大全》。

程湘清（1937— ）山东成武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员，主要论著有《先秦双音词研究》、《〈世说新语〉复音词研究》、《〈论衡〉联合式双音词的语义构成》等，主编《先秦汉语研究》、《两汉汉语研究》、《魏晋南北朝汉语研究》、《隋唐汉语研究》、《宋元明汉语研究》。

张志毅（1937— ）辽宁本溪人。1963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语言专业，同年考取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现任烟台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长期致力于汉语词汇学、语义学、词典学、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和教学。主张只有受多种哲学流派的熏陶，才能脱去“匠”气，生发“师”魂，产生“大家”；只有站在本学科国内外多级学术史的高峰，才不至于扮演

悲剧角色；只有把视野扩展到国内外多个层面，才能从学术平原追踪到高峰，而高峰才是创新的起点。只有研究汉语与印欧语历时类型学，才能认清汉语的独特的历时规律及共时规则。把编语文性辞书当作研究词汇学、语义学的田野调查，再把理论渗透到辞书编纂当中。1958年以来，在国内外发表论著80多项，主要著作有《简明同义词词典》、《词和词典》、《词汇语义学》等。

郭在贻（1939—1989）山东邹县人。1961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杭州大学教授。致力于训诂学、近代汉语语词研究。主要著作有《训诂学丛稿》、《唐代白话诗释词》、《敦煌变文集校议》（合编）、《训诂学》等。

蒋绍愚（1940— ），浙江高阳人。196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北京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词汇史、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主要著作有《古汉语词汇讲话》（合著）、《唐诗语言研究》、《古汉语词汇纲要》、《蒋绍愚自选集》、《近代汉语研究概论》、《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等。译著有《中国语历史文法》（合译）等。

晁继周（1941— ），北京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词典编纂、汉语词汇研究工作。参加《现代含义词典的修订》、《汉语小词典》、《现代汉语词典补编》的编写工作，主持编写《红楼梦辞典》，合作编写《汉语新词词典》、《中学语文词典》、《汉语方言常用词词典》等。发表《略论规范型词典的特点》、《曹雪芹与高鹗语言的比较》、《〈现代汉语词典〉修订述略》等多篇论文，撰写有《二十世纪的现代汉语词汇学》。

苏宝荣（1945— ），北京人。1982年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毕业，河北师范大学教授。长期从事古汉语词汇词义、词典学和《说文解字》研究，主要论著有《〈说文解字〉释注》、《文字的多源性与字典本义的说解》、《古汉语词义简论》（合著）、《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等。

苏新春（1953— ），江西南昌人。1985年华南师范大学汉语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获山东大学文字博士学位。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长期致力于汉语词汇词义、文化语言学和词典学的研究，主要论著有《文化的结晶——词义》、《当代中国词汇学》、《汉语词义学》、《汉字语言功能论》、《汉字文化引论》等。

周荐（1957— ），天津市人。1988年南开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研

究生毕业后获日本关西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词汇学、词典学和语义学的研究，也涉及语法学、修辞学和应用语言学等方面。主要论著有《同义词语的研究》、《同义词语和反义词语》（合著）、《汉语词汇研究史纲》、《二十世纪的汉语俗语研究》（合著）、《汉语词汇新讲》。论文集有《词语的意义和结构》、《词汇学问题》等。主编有《“文化大革命”词语辞典》。

附录三 20 世纪重要词汇学著作简介

《汉语词汇》

孙常叙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56.12

全书 38.7 万字，内有“词”、“词汇和基本词汇”、“词汇音变”三部分，下分 8 篇 33 章。在第一部分“词”中，论述了汉语词的性质、结构、词义和造词法；在第二部分“词汇和基本词汇”中，论述了现代汉语词汇的性质及其与古汉语词汇的关系，同音词、多义词、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等几种关系，分别说明了汉语方言词汇、专业词汇、同行语词汇和外来语词汇，阐述了基本词汇的性质、现代汉语基本词汇以及汉语基本词汇的累积、传承和发展；在第三部分“词汇音变”中，论述了汉语词的造词音变和说话音变。《汉语词汇》阐论内容广博、材料丰赡，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全面地研究汉语词汇的专著，带有拓荒的性质；它论述了汉语词汇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和一般规律，为汉语词汇学勾勒出了一个大致轮廓，所论问题也大都成为了后来的汉语词汇学的研究内容。

《现代汉语词义讲话》

崔复爰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57.12

全书分“词义概述”、“词义演变”、“多义词”、“同音词”、“同形词”、“同义词”、“反义词”、“偏义词”八章。本书以现代汉语词义为研究对象。作者对词义发展的分析比较细致，把词义的演变分为词义的扩大、缩小、转变等类。作者对偏义词的说明是一般词汇学著作少有的，对同义词的分析也较为细致，提出了一些判断标准。

《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

高名凯、刘正琰 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8.2

全书 15.2 万字，分“什么是外来词”、“汉语外来词的历史同溯”、“现代汉语的外来词”、“现代汉语外来词与汉族文化发展的趋势”、“现代汉语的外来词的创造方式”、“现代汉语外来词的规范化问题”六章。本书是为促进现代汉语词汇规范而写作的。作者指出，外来词的合理处

理是词汇规范化重要问题之一，作者用普通语言学的理论来了解现代汉语的外来词，同时以之充实普通语言学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作者查阅五十多种辞书、几十种专门论著，收集考证了外来词 1 500 余条，在此基础上写成此书。本书是汉语外来词研究方面有重要影响的著作。

《汉语史稿》(下)

王 力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8.6

全书论述汉语词汇的发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词汇史专著。1983~1984 年王力在《汉语史稿》(下)的基础上修订补充写成《汉语词汇史》，编入《王力文集》第十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本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用新的语言学理论说明汉语词汇发展历史的著作，在汉语词汇的构成、各类词汇的来源发展、词义的发展和演变等方面有许多具体、新鲜的分析，有广泛的影响。

《汉语词汇讲话》

周祖谟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9.8

本书是“语文学习丛书”中的一本，先连载于 1955 年 4 期~1957 年 10 期的《语文学习》，后经作者修订，出版单行本。全书 7.4 万字，分“词和词汇”，“词义”，“同音词、同义词和反义词”，“现代汉语的词汇和词汇的变化”，“汉语词汇规范化问题”五讲，其中关于现代汉语普通话词汇的构成、汉语构词的特点、词义的辨析、词义的发展以及用词的规范问题等，都有精当的分析和说明。该书虽然篇幅不大，但既介绍了基本理论，又注意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词汇学著作。

《现代汉语词汇》

王 勤、武占坤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9.7

全书 27.7 万字，分“词”、“词汇”、“基本词汇”、“现代汉语词汇的来源”“现代汉语的构词法”、“词义”、“词与词间的几种关系”、“成语”、“词典和蓄词”九章。《现代汉语词汇》除在同音词、多义词等不少问题的探讨上提出了较好的意见外，更可贵的是，把现代汉语词汇的使用和规范问题提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予以充分的重视。书中用一定的篇幅专门谈了正确蓄词和反对滥构词等问题，这对于人们正确地使用现代汉语词汇具有指导意义。

《怎样使用词语》

李行健、刘叔新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5.8

全书 10 万字，分八章阐述了作者对现代汉语词汇、词和词义、同

义词和近义词、反义词以及成语等熟语的认识，也谈了词语如何使用得好和词语的规范问题。该书在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划分上，在成语、惯用语、歇后语、谚语的分析上的观点出自作者的研究所得，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古汉语词汇讲话》

何九盈、蒋绍愚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0.10

全书 9.8 万字，分“绪论”、“词汇的历史发展”、“词的构成”、“词的书写形式”、“词的本义”、“词的引申义”、“同义词”、“反义词”、“同源词”、“固定词组和特殊词汇”、“怎样确定句中的词义”、“怎样掌握古汉语词汇”十二章。本书为讲解古汉语词汇的基本知识而写，材料丰富，说理清晰，有不少新鲜独到的见解，是同类著作中出版较早的一本。

《词汇学简论》

张永言 武汉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2.9

全书 10.1 万字，分“序论”、“作为语言单位的词”、“词的意义”、“词汇体系中词的类别”、“同义词、反义词、同音词”、“熟语”六章。本书是“文化大革命”后出版的第一部系统简明的词汇学著作。该书在写作时既参考了苏联学者的一些著述，又充分运用了作者本人在训诂学研究领域的多年积累，有较完整的理论架构，也有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正如严学窘为它所写的序言中所说，《词汇学简论》“适合作为普通词汇学的入学向导，对汉语词汇的研究也富有指导意义”。该书立足于汉语词汇学的问题研究普通词汇学，把选择性吸收和批判性继承结合起来，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在用新的科学观点方法研究和继承我国训诂学的丰富遗产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现代汉语词汇概要》

武占坤、王 勤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3.7

全书 37.7 万字，分“词汇概说”、“词的形式和内容”、“构词法”、“词与词的几种联系”、“几种词汇类型”、“熟语”、“简称、数词缩语、偶发词语”、“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演变”、“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化”、“词典”十章。与 24 年前的《现代汉语词汇》相比，所用的材料更丰富，所讨论、涉及的问题也更广泛。《现代汉语词汇概要》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出版的一部篇幅较大、所谈问题比较广泛的现代汉语词汇学著作，当时在向广大语文爱好者普及现代汉语词汇知识方面，有

着他书无可代替的作用。

《现代汉语词汇》

符淮青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3

全书 17.5 万字，分“绪论”、“词和词义”、“词的概括性”、“多义词和同音词”、“词义的发展”、“同义词、反义词、上下位词”、“现代汉语词汇的构成”、“成语、谚语、俗语、歇后语”、“词义和构成词的语素义的关系”、“词典”十章。作者在词义的说明分析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对词典中所用的词的释义方式作了系统的归纳分析，对进一步认识词的释义规律有重要作用。本书是 80 年代中叶的一部有新见和特色的现代汉语词汇学著作。

《汉语词汇研究》

葛本仪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5.9

全书 11.6 万字，分“词、词素、词汇”、“造词和构词”、“词义”、“词汇的发展”四章。作者的这部著作比她本人于 60 年代所写的《现代汉语词汇》在篇幅上有所扩大，但所论述的内容仍主要限于词，词之外的词汇单位少有涉及。在现代汉语的词的确立上，作者提出了 10 项标准。作者探讨了造词和造词法，构词和构词法，讨论了什么是词义及词义类聚和演变发展问题，也分析了词汇发展的原因和概况。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6.6

全书 240 万字，对 200 万字的现代汉语综合语料（分四类：报刊政论、科普书刊、生活口语、文学作品）进行了统计分析。主要内容有：按音序排列的频率词表；使用度最高的前 8 000 词词表；频率最高的前 8 000 词词表；使用度较低的词表（除使用度最高的前 8 000 词外，其余的词全部列入此表）；报刊政论的前 4 000 高频词词表；科普书刊的前 4 000 高频词词表；生活口语的前 4 000 高频词词表；文学作品的前 4 000 高频词词表；分布最广的词语频率表；汉字频率表；汉字构词能力分析；词长统计，不同词长的词的数量及其覆盖面等。为语文教学、语言研究、中文信息处理、机器翻译等学科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古汉语词汇概要》

赵克勤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4

全书分“绪论”、“单音词”、“复音词（上）”、“复音词（下）”、

“词义”、“词义的演变和发展”、“同义词”、“反义词”、“同音词、同形词和多音词”、“通假字”、“古今字”“古书材料及训诂学研究成果的运用”、“古汉语词汇研究与古汉语字、词典的编纂”十三章。该书全面地说明了古汉语词汇的知识，材料丰富，总结了作者多年研究的心得。

《现代汉语三千常用词表》

何克抗、李大魁主编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8

全书约 13 万字，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推广处为推广普通话、为编写课本及读物提供参考而编写。本词表所收录的 3 000 常用词按降频顺序排列每个词都列出词长、累计词长、频数、累计频数、频率、累计频率、方差等统计项目。

《汉语词汇史纲要》

史存直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1

全书 12 万字，是作者《汉语史纲要》系列著作中的一本。分“基本词汇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发展和词汇的新陈代谢”、“词义的演变”、“构词法的发展”、“汉语中的借词和译词”五章，附录汉语史纲要总论。本书阐述的问题基本与王力的《汉语史稿》（下）相同，只是第二章分期分阶段说明了汉语词汇随社会发展的不同情况。本书虽然篇幅不大，但提供的语言材料相当丰富，有很多细致中肯的分析。

《熟语浅析》

刘广和 北京 中国物资出版社 1989.5

全书 12.5 万字，分“惯用语”、“成语”、“谚语”、“歇后语”、“熟语的运用”五章。该书在参考了前贤和时贤的大量成果的基础上写成，作者介绍了他人的成说，也说明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该书是汉语词汇研究中较早出版的以熟语为专门对象进行研究的两部专著之一。

《汉语熟语学》

孙维张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9.5

全书分“熟语和熟语学”、“熟语的特点”、“熟语的分类”、“成语”、“惯用语”、“歇后语”、“谚语和格言”、“熟语的形成和发展”八部分。作者研究熟语数十年，搜集了丰富的材料，有充实的理论基础，对各类熟语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分类标准和体系。该书是汉语词汇研究中较早出版的以熟语为专门对象进行研究的两部专著之一，使熟语研究进入新的高度。

《汉语词汇史概要》

潘允中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9

全书分“汉语词汇史概说”，“汉语构词法的发展”，“汉语基本词汇的发展”，“同义词的发展变化”，“词义的历史发展规律”，“汉语古今借词和译词的来源（上）”，“汉语古今借词和译词的来源（下）”，“汉语成语、典故的形成和发展”八章。该书贯通古今，分析深入详尽。

《〈吕氏春秋〉词汇研究》

张双棣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9.10

本书论述了《吕氏春秋》一书的基本词汇、多义词、同义词、反义词、同源词、复音词、词类及活用等问题。作者对《吕氏春秋》一书的词汇作了穷尽性的统计分析。本书为专书性汉语词汇专著。

《古汉语词汇纲要》

蒋绍愚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12

全书分“训诂学、语义学、词汇学”，“词和词义”，“词义的发展和变化”，“同义词”，“反义词”，“词汇和语音的关系”，“词汇和文字的关系”，“词汇和语法的关系”，“关于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汉语的词汇系统及其发展变化”十章。该书力图在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中把传统训诂学的成果和现代语义学理论结合起来。由于应用现代语义学的义位、义素、词汇场等理论分析词义、词汇现象，在宏观方面，把词汇词义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在微观方面，能在铺陈材料时，从新的角度做出分析，令人耳目一新。

《汉语词汇史》（《王力文集》卷十一）

王 力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0.3

本书是作者晚年修订写成的，材料丰富，论证充分。全书十二章，论述了社会发展与词汇发展的关系，词义的演变，同源字，滋生词，成语和典故，汉语借词和译词的发展状况，汉语对日语、朝鲜语、古汉越语今越南语的影响等问题。

《现代汉语常用词词频词典》

刘源等 北京 宇航出版社 1990.6

本书是从3亿字的原始语料中抽样2500万汉字后的词频统计结果。共收录47016个词条（含多音字或词）：单音节词5416个，双音节词31333个，三音节词5129个，四音节词4566个，五音节词382个，六音节词144个，七音节词46个。为语文教学、语言研究、中文信息处理、机器翻译等学科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汉语描写词汇学》

刘叔新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11

全书 29.4 万字，分“导论”、“词汇的构成单位（上）”、“词汇的构成单位（中）”、“词汇的构成单位（下）”、“词和固定语的形式”、“词和固定语的意义”、“各种词汇单位类集”、“词汇的范围”、“结构组织（上）”、“结构组织（中）”、“结构组织（下）”、“现代汉语词汇的体系性”十二章。所论问题广泛，角度新颖，对问题探讨深入。对词语间的结构组织关系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和开掘，展示了由多种词语结构组织所构成的现代汉语词汇体系。作者不像一般研究者那样在研究词汇体系时用语法代词汇或用逻辑代语义，而用词语间的结构组织关联去建构词汇体系，这一方法在词汇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对现代汉语词汇现象的剖析相当深刻，对现代汉语词汇的描写完备而成系统，成就超过了此前的许多著作，令人耳目一新。本书也是对现代汉语词汇现象进行静态描写的第一部著作。

《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

史有为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4

本书是“文化语言学丛书”之一，全书 22.5 万字，分“外来词，文化交流的结晶”，“外来词，古四裔文化的浸染”，“外来词，入主中原各族的遗音”，“外来词，域外宗教传播的见证”，“外来词，科学文化的冲击与再冲击”，“外来词，汉文化欢迎你”六章。本书按照上古、中古至近代的脉络，分别介绍了国内一些少数民族、西域异族、北方民族的文化习俗，印梵佛教文化，后来的西方文明以及日语的“回归”语词等对汉文化的影响、渗透和融合。每一章先对有关历史背景进行概说，然后逐词进行考释，书后附词语索引。本书既可作为文化简史研读，也可当作汉语外来词语源文化的小型工具书使用。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蒋冀骋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1.12

全书 21 万字，分“近代汉语词汇的来源”、“近代汉语构词法研究”、“近代汉语词义研究”、“近代汉语词汇与语音诸要素的关系”、“近代汉语词汇与社会文化生活”、“近代汉语语源研究”、“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近代汉语词义考释方法”、“俗语研究”、“敦煌文书校理方法研究”十章。本书运用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理论与考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研究了近代汉语词汇，从音韵、语法和词汇三方面论证了近代汉语的上

限,讨论了近代汉语词汇的来源和构词法,探讨了近代汉语的词义,本书还考察了一些近代汉语词语的语源,特别是俗语源。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关于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理论专著。

《汉语词义学》

苏新春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2.8

全书 40 万字,分“结构篇”、“人文篇”、“方法篇”、“史论篇”四篇 20 章。本书是关于汉语词义理论的一部研究著作。系统论述了汉语词义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历史和现实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建构并详细阐述了汉语词义学的学科体系和主要内容。它根据语言是以语义为主、语形为辅,结构性与文化性相结合的表达系统的观点,对词义这个语言中最基本也最活跃的因素,分别从语言结构意义和语言文化意义两个角度入手,在“结构篇”、“人文篇”中剖析了词义的种种成分、特性、演变、系统结构、词义与词形、词义与词的单位等问题。在“方法篇”中系统阐释了词义研究的种种方法和原则。在“史论篇”对 2 000 多年汉语词义研究史进行了概括性的评述。本书在具体论述中引证了大量的生动语言事实,反映了当代汉语词义研究的最新成果。

《刘叔新自选集》

刘叔新 郑州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3.11

该论文集是“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中的一本,全书 22.8 万字,主要收录了作者 1980~1992 年十余年间陆续发表的有代表性的 18 篇论文,内容涉及一般语言理论、词汇学理论、语义学理论、汉语语义研究、汉语语法学、汉语方言学和词典学等领域,其中以词汇学论文居多,如《论词的单位的确定》、《复合词结构的词汇性》、《固定语及其类别》等。

《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

梁晓虹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4

全书 18.8 万字,分两编,上编论述汉译佛典中的佛教语词的构造,分为音译词、合璧词、意译词、佛化汉词、佛教成语五种方式,它们都是汉译佛典语词的重要结构形式。下编论述了汉译佛典中佛教词语的创造带来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性转折。本书视角独特,论述深入。

《词语的意义和结构》

周 荐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4.8

本论文集是作者的第一本个人专题性论文集,收录了作者 1995 年以前十余年间陆续发表的词汇学论文 16 篇及书评 1 篇,16.8 万字。论

文集所收的论文有些讨论的是词语的意义内容问题，有些讨论的是词语的结构汇聚问题。在词汇研究中注重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说理透彻，研究深入。

《词和词典》

张志毅、张庆云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4.12

本论文集收录了作者词汇学、词典学方面的论文 27 篇，全书 26 万字。所收论文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作者研究了 30 多年的传统课题，即同义词、反义词及其词典编纂法；另一类是近十年研究的新课题，如泛称词和特称词，词的理据，词源观念，词的屈折变化的简化，词的格形态的简化等。

《汉语词汇语义学论稿》

黎良军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5

全书 19.8 万字，分“词义的性质和汉语词汇语义学”、“词的认定”、“词义体系”、“词义关系”、“词语的理据”、“词义变化和词汇消长”、“合成词的语义结构”、“词义考释和文字考校”、“汉语的传统语义理论”九章。各章又分别列出若干小节。此外还有三个附录。作者尝试建立语义学的概念，把功能词纳入词汇语义学范围；尝试建立词义的层级系统和词义成分系统，强调状貌义、摹声义的非命名性质，强调经验义成分和情绪义成分的重要性；尝试分析汉语合成词的语义结构类型，论述口语词和书面词的对应与差别，而且把对本字的考求和词语的纵的语义关系的一部分也包括进来。作者把点与面、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结合起来，善于吸收西方的符号学、系统论等研究方法，用系统论的整体性、相关性、层次性、动态性和结构性来规范词义体系，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汉语词汇语义学。

《汉语词汇研究史纲》

周 荐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5.8

全书 19.8 万字，包括绪论和正文的四个部分，共五部分。绪论部分是总论。该书把汉语词汇研究史分为萌芽时期（“五四”前后—40 年代末）、草创和初步发展时期（50 年代初—60 年代中叶）、停滞时期（60 年代中叶—70 年代下半叶）、走向繁荣时期（70 年代末—90 年代），正文第一、二、三、四部分分别考察了这四个时期的词汇研究状况，每一个时期又再分出具有不同发展特点的更细的分期。该书在每一个大的分期的论述之后都有一个“小结”，概括各个时期词汇研究史突出的特

点成就等。书中还对一些重要的词汇学著作加以介绍,评述其得失影响。该书是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史方面的第一部著作,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该书资料翔实宏富,对词汇研究的发展状况作了全面、细致的论述,几乎触及了百年来词汇研究的每个方面。

《当代中国词汇学》

苏新春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12

“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中的一本,全书 18 万字,分“汉语词汇现代研究的历史进程”、“汉语词汇当代研究的词义与人文趋势”、“当代中国词汇学的语言观”、“当代中国词汇学的词汇组织观”、“当代中国词汇学的方法论”、“古代词汇研究传统的人文阐释”六章。本书的主旨是利用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来构建当代中国文化词汇学。由于汉语文化词汇学尚处于发展阶段,缺乏充分的研究实践作基础,也没有成熟的理论可借鉴,作者只是探索性地讨论了当代中国文化词汇学的语言观、词汇组织观和方法论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试图以此构建一个完整的当代中国文化词汇学的理论框架。本书是对汉语词汇学进行理论探索的著作,是汉语文化词汇学的开拓性论著。

《词义的分析 and 描写》

符淮青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6.1

全书 24.7 万字,分“词义”、“词义的类型”、“概念义的分析”、“表动作行为的词意义的分析”、“表名物的词意义的分析”、“表性状的词意义的分析”、“词义的单位”、“词义的模糊性问题”、“词群”、“语素和词的结合能力”共十章。为了总结和探索词义分析、描写的理论和方法,作者从 1981 年起在北京大学汉语言专业开设“词义分析”课,本书就是在历次讲课所用讲稿的基础上加工修改写成的。本书在语言学的范围内讨论词义的分析 and 描写,分析深入,阐论精辟。

《汉语词汇学史》

符淮青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4

全书 24 万字,分“先秦文献中的词汇学内容”、“汉代至清代训诂学中的词汇学内容”、“‘五四’至新中国成立前汉语词汇学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汉语词汇学的建立与发展(上)”、“新中国成立后汉语词汇学的建立与发展(下)”、“汉语熟语学”六章。以现代汉语词汇学、古代汉语词汇学、熟语学的论著为主要评述对象,并联系词典编纂的成果,论述汉语词汇学的建立和发展。作者按时间顺序把

整个词汇学史划分成先秦、汉代至清代、“五四”至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共四段；熟语因其特殊性，单章介绍。附录收列 216 种有代表性的汉语词汇学论著。全书纵贯古今，脉络清晰，材料宏富，评述精到。

《现代汉语词彩学》

杨振兰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6.6

全书 26 万字，分“绪论”、“感情色彩”、“形象色彩”、“风格色彩”、“词的时代色彩”、“外来色彩”、“民族色彩”、“地方色彩”、“色彩意义的语用分析”九章。作者认为，“词的意义内容应该包括三个部分，即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和色彩意义……语言中的每一个词的静态色彩义在不同的语境中，都可能产生不同的变化，从而形成为动态色彩义”。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理论观点，书中对词的色彩意义，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论述和分析。本书是我国第一本较为系统地探讨词的色彩意义的专著。

《汉语词汇论》

葛本仪主编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9

全书 25 万字。该书是在《汉语词汇研究》一书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内容主要有三部分：词汇问题、词义问题和词汇应用问题。该书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在词汇研究领域进行了一定的开拓，如工程词问题，就从适应中文信息处理的要求出发，对工程词的性质作了全面界定，对汉语工程词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分析了各类工程词在言语中的作用等，并提出了建立汉语工程词汇学的构想。

《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

[意] 马西尼著 黄河清译 北京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7.9

全书 38 万字，原名为《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及向国语的进化：1840—1898》，译者改为现名。全书分两章九节，第一章“1840 年至 1898 年的语言和历史”，分“十九世纪初中国的语言状况”、“与西方接触中的语言问题”、“翻译先驱：林则徐、魏源和徐继畲”、“从广州到北京、上海”、“汉语对日语词汇的影响”、“来自日本的影响”、“新国语的诞生”七节；第二章“一些词汇现象”，分“从单音节语言发展到多音节语言”、“借词和新词”二节。本书的研究重点是研究大量借词、译词、新词的引进与创造对现代汉语词汇形成的影响。该书资料丰富，研究深入细致，填补了 19 世纪汉语新词研究的空白，对汉语词源研究尤

其是现代汉语词汇形成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词汇学问题》

周 荐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8.6

本论文集是作者的第二本论文集，收录了作者 1995—1998 年前后陆续发表的词汇学论文 19 篇、综述 2 篇及书评 2 篇，全书 20.6 万字。作者在研究中注重结合词典，尤其是《现代汉语词典》，运用统计方法，进行定量的词汇研究，分析透彻，令人信服，如《异名同实词语研究》和《三字格的结构分析》两文。所收论文还涉及词义分析、熟语研究、异形词、外来词、词典学等诸多方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

徐国庆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4

全书分三编九章，“第一编本体论”分“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现代汉语词汇层”两章；“第二编构成论”分“最小的词汇成分——语素”、“词汇系统的主体成分——词”、“特殊的词汇成分——熟语”、“专名”四章；“第三编动态论”分“词的增生与衰变”、“词的分化与合并”、“词语的缩略和羡余”三章。作者认为汉语词汇系统研究有三个平面：要素平面、聚合平面、层级平面。词汇体系的这三个平面各有特点，不能混淆，给词汇学开辟了研究词汇体系性质的三个视角，只有全面观察，才能正确认识词汇的系统性。

《汉语外来词》

史有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1

全书约 16 万字，分“外来词和语言的外来影响”、“外来词的历时概述”、“外来词的性质与功用”、“外来词的类型”、“外来词的走向与规范”、“外来词研究概况”六章。该书为“汉语知识丛书”中的一本，反映了近年外来词研究的最新进展。

《二十世纪的汉语俗语研究》

温端政、周 荐 太原 书海出版社 2000.1

全书 30 万字，分两编九章。上编“关于汉语俗语的理论研究”，分“关于谚语的研究”、“关于歇后语的研究”、“关于惯用语的研究”、“关于俗成语的研究”、“关于俗语的性质和范围的研究”五章；下编“俗语的收集整理和俗语辞书的编纂”，分“俗语的收集整理和综合性的俗语辞书的编纂”、“谚语的收集整理和谚语辞书的编纂”、“歇后语的收集整理和歇后语辞书的编纂”、“惯用语的收集整理和惯用语辞书的编纂”四

章。附录中还有“20 世纪港台地区学者研究汉语俗语概况”、“20 世纪外国学者研究汉语俗语概况”、“20 世纪汉语俗语研究论著和辞书索引”三方面内容。该书为“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中的一本，全书对 20 世纪的汉语俗语研究作了详尽的探讨和全面的总结。

《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

许威汉 太原 书海出版社 2000.3

全书 46 万字，分两编十一章，上编“20 世纪汉语词汇学大观”，分“20 世纪词汇学的历史前奏”、“20 世纪汉语词汇学的起步”、“20 世纪汉语词汇学的进展（一）”、“20 世纪汉语词汇学的进展（二）”四章；下编“20 世纪汉语词汇学问题的具体探讨”，分“‘五四’前（1900— ）的初步探讨”、“‘五四’后（1920— ）的初步探讨”、“新中国成立后（1950— ）的具体探讨（一）”、“新中国成立后（1960— ）的具体探讨（二）”、“‘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弹与中衰（1966— ）”、“‘文化大革命’后的新步伐（1978— ）”、“新时期的拓展与深化（1990 年前后— ）”五章。该书为“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中的一本，全书对百年来汉语词汇研究作了全面的总结，以史带论，史论结合，资料丰富。

《明代汉语词汇研究》

顾之川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9

全书 27.5 万字，分“绪论”、“明代白话文献”、“明代汉语词汇的构成（上）”、“明代汉语词汇的构成（中）”、“明代汉语词汇的构成（下）”、“明代汉语的新词新义”、“明代汉语词义的类聚关系”、“明代汉语构词法”八章。该书从宏观角度对明代汉语词汇进行研究，比较全面地描写出明代汉语词汇的总体面貌，为断代性汉语词汇专著。

《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

徐时仪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11

全书 43.5 万字，分“绪论”、“古白话词汇的重要语料文献概貌”、“古白话词汇的来源和特点”、“古白话词汇研究史”、“构词法的研究”、“专类词语研究的状况”、“古白话词语专题研究概况”、“语源考探与常用词演变”、“词义的发展和词义系统”、“古白话词典的编纂”、“古白话词语研究的方法和释例”、“古白话词语研究的反思和趋势”十二章。该书较为详尽、全面地论述了古白话词语的研究历史和现状。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 符淮青. 汉语词汇学史.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
- 龚千炎. 中国语法学史稿.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87
- 何九盈.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 何九盈. 中国语言学史研究刍议. 《语言科学》创刊号, 2002
- 侯新华. 建国后的汉语词汇体系研究述评. 高校社科信息, 1997 (2)
- 江蓝生. 开拓新世纪的中国语言学. 中国语文, 1999 (5)
- 蒋绍愚. 20 世纪的古汉语词汇研究. 见: 林焘主编. 20 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语言学.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2
- 蒋绍愚. 汉语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9b (2)
- 蒋绍愚. 近代汉语研究概述. 古汉语研究, 1990 (2)
- 蒋绍愚. 近代汉语研究概况.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 蒋绍愚. 近十年间近代汉语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古汉语研究》1998 (4)
- 李 日, 郭春香. 试论章士钊《中等国文典》对汉语语法学的贡献. 古汉语研究. 2002 (2)
- 李行健主编. 中国语言学年鉴 (1992).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2
- 李行健主编. 中国语言学年鉴 (1993).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3
- 李行健主编. 中国语言学年鉴 (1994).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4
- 林连通, 顾士熙主编. 中国语言学年鉴 (1994—1997).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2
- 林玉山. 汉语语法学史.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3
- 林裕文. 回顾与展望. 中国语文, 1982 (4)
- 刘 坚主编.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刘 坚, 曹广顺. 建国以来近代汉语研究综述. 语文建设, 1989 (6)
- 陆俭明. 十多年来现代汉语研究管见.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9 (2)
- 陆俭明. 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 陆俭明. 新中国语言学 50 年. 当代语言学, 1999 (4)

- 吕叔湘. 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 中国语文, 1981 (1)
- 邵敬敏. 汉语语言学评论集.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3
- 邵敬敏、方经民. 中国理论语言学史.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 史有为. 新时期中国语言学的对应. 汉语学习, 1989 (2)
- 史有为. 外来词研究之回顾与思考. 语文建设, 1992 (11)
- 孙良明. 中国古代语法学探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王 力. 中国语言学史.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 温端政, 周 荐. 二十世纪的汉语俗语研究. 太原: 书海出版社, 2000
- 文 炼. 我对 40 年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些看法. 语文建设, 1989 (1)
- 徐通锵. 语言研究的发展和五年来的《语文研究》. 中国语文, 1985 (6)
- 徐通锵, 叶蜚声. “五四”以来汉语语法研究述评. 中国语文, 1979 (3)
- 许嘉璐. 面对新世纪的我国语言学. 中国语文, 1999 (5)
- 许嘉璐, 王福祥, 刘润清主编. 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6
- 许威汉. 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 太原: 书海出版社, 2000
- 严 修. 二十世纪的古汉语研究. 太原: 书海出版社, 2001
- 姚汉铭. 新时期新词语研究述评. 语文建设, 1993 (4)
- 张志毅. 语言研究的创新论. 见: 张后尘主编. 来自首届中国外语教授沙龙的报告.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增订本) 1950—1980.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1991—1995).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中国语文》编辑部. 汉语研究四十年. 中国语文, 1989 (5)
- 周 荐. 同义词语的研究.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
- 周 荐. 汉语词汇研究史纲.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5

周 荐. 近二十年来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概说. 理论与现代化, 1997 (12)

朱一之, 王正刚.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现状和回顾.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87

后 记

记得是 2000 年的暑假过后，当时还是我的同事的邢欣教授突然打电话到舍下对家父说，她在一次会议上见到了邢福义先生，邢先生请她转告我，他打算编纂一套对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的方方面面进行总结的书，词汇那部分想让我来负责。当时我正远在日本执教，一个月后才收到家父通过邮局寄来的信。得知消息后我马上给邢先生写信，感谢先生对我的器重和信任，同时也表示自己的水平和能力有限，难担此重任。2001 年年初，刘叔新先生又突然给我写信，说邢福义先生有信给他，希望他推荐一个人出任“20 世纪中国语言学”之一的《20 世纪中国词汇学》的主编，正式启动这部书的编写工作。刘先生信上说，他考虑了好几天，最终还是觉得由我来做这件事比较合适。刘先生还说，邢先生请他推荐主编人选，其实还是希望他推荐我来担起这副担子。刘先生知道我在 2002 年初彻底结束在日本的教学工作之前不打算再回国探亲了，但他要求我为了这部书的编纂，一定要在收到他的信之后立刻回国一趟接受这一任务。接到刘先生的信后，我即刻订了回国的机票，并最终赶在大年廿九那天回到天津。编写人员，刘先生早在给我的信上为我指定了他的四位学生，其余的几位则是我回到国内后延请的。人员的问题落实好，我即拟出写作大纲、编纂原则和计划，并征询了邢福义先生、刘叔新先生和各位编写者的意见。正月里召开了第一次编务会，会上请大家对我拟写的写作大纲、编纂原则和计划作了讨论，又把编写任务做了分派，约定好 2001 年暑假时大家把初稿或至少是详细提纲写出并寄给我看，之后我就回日本继续我的教学工作了。2001 年暑假时由于不放心编写的进度，我又一次回国，并在天津和北京分别请两地的编写者召开了第二次编务会。除刘叔新先生指定的四位先生中的第一位尚未动笔外，其他先生均已按计划开始了工作。那位尚未动笔的先生，在我给他打长途电话时，他也表示资料已收齐，一定马上动手。2002 年春天，我正式结束日本的工作回国，半年前没动笔的那位先生仍只字未写，其他先生却都已完成或基本完成了任务。虽然我和刘叔新先生都反复给那

位先生打电话，希望他能践诺，完成他自己那份工作，但都毫无结果。无奈何，刘叔新先生只好让我另请别人来做这一工作。《20 世纪中国词汇学》的交稿时间本为 2002 年末或 2003 年初，因为此一变故，不得不推迟了大半年。

各位编写者交来的初稿，水平是不低的，也基本上是按照我当时所拟的原则和大纲编写的。每位初稿，我都细细地读了两遍以上，在充分尊重原作者的原则下，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初稿退还给各位后，大家都以非常诚恳而积极的态度，基本上按照我的要求做了修改。尤其是修改这部稿子时正赶上 SARS 疫情流行，社会上不少人谈“非典”而色变，但现在的编委会中却没有一人因此而退缩，都按时完成了任务。这令我极为感动。我与本书现在的各位编委或为学术界的朋友，或曾为先后同学，或为师生，大家没有任何感情上的阻隔，精诚合作，坦诚相待。书稿完成后，大家普遍感到，在这个气氛温馨、感情融洽的研究集体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不计名利，切磋学术，是最为难得的。通过一本书的编写，弄清了一些问题，结交了一些朋友，非常值得。书纂成了，友情却不会中断。请允许我向这些比我年轻的朋友，尤其是 2002 年甚至 2003 年才不得不急如星火地被我请来参加工作的朋友们道一声“谢谢”。在本书中大家分担的各个章节的情况如下：

绪 论 周 荐（南开大学文学院教师）

第一章 王吉辉（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教师）

第二章 杨爱芬（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第三章 杨世铁（安徽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

第四章 谢永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第五章 张铁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人员）

第六章 谢永芳

第七章 李红印（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教师）

第八章 王瑞华（南开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高 颖（南开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附录一 周 荐、王瑞华

附录二 李红印

附录三 张铁文

20 世纪已经成为了过去，21 世纪的第三个年头也已时间过半。汉语词汇学在过去的世纪里如火如荼地进行了将近百年，有初始期对问题

的探索和困惑，有发展期唇剑舌枪的争辩和问题辩明后的明豁，更有成熟期对研究方法的探讨和期待。编委会的成员中，我算是最年长的，也是 50 年代下半叶才出生的。许多事件未及亲历，我们只能从学者们的大量著述中寻找他们当年的研究踪迹，理清脉络，分辨事实，加以总结。汉语词汇学史类的著作此前已出版了多部，如符淮青先生的《汉语词汇学史》、许威汉先生的《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以及拙著《汉语词汇研究史纲》。现在我们再纂此书，而且要在上述诸书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和本书各位编委都期望：这是一部平实而可信的书稿，能够把 20 世纪汉语词汇学的基本面貌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这是一部重在检讨和总结 20 世纪词汇研究方法得失的书稿，促使汉语词汇研究早日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研究方法，早日走出理论的低谷；这是一部具有一定前瞻性的书稿，能够使后之来者鉴往而知来，在新的世纪里使汉语词汇研究取得更大的突破性的成果。当然，在读者诸君自己读过本书得出结论之前，这些还都是我们这些编写者个人的期望而已。倘若读者读过之后所得出的结论与我们自己的期望相去不太遥远，那么我们才会感到良心稍安，才觉得稍稍对得起在 20 世纪仙逝的前辈学者们的艰辛探索，对得起本套丛书主编邢福义先生的重托和学界同仁们的厚望，也才对得起今天的和未来的无数青年学者了。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李宁晓先生和刘叔新先生的指导和帮助，南开大学博士生曲丽玮同学帮助做了细致的校对工作，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周 荐

2003 年 6 月 26 日初稿，

2007 年 11 月 26 日完稿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词汇的构成	(4)
第一节 词汇单位问题	(4)
第二节 现代汉语词汇构成的研究	(5)
第三节 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词汇构成的研究	(46)
本章小结	(55)
第二章 词汇的形式和意义	(63)
第一节 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形式和意义的研究	(63)
第二节 对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词汇形式和意义的研究	(95)
本章小结	(108)
第三章 构词法和造词法	(110)
第一节 构词法和造词法概念的提出	(111)
第二节 现代汉语的构词法和造词法	(115)
第三节 古代汉语的构词法和造词法	(140)
第四节 构词法和造词法的理论探讨	(150)
第五节 关于“词缀”	(159)
本章小结	(173)
第四章 词汇系统研究	(181)
第一节 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研究	(181)
第二节 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词汇系统研究	(218)
本章小结	(223)
第五章 熟 语	(228)
第一节 对现代汉语熟语的研究	(228)

第二节 对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熟语的研究	(259)
本章小结	(261)
第六章 词汇学史研究	(265)
第一节 概观——主要论文著作目录	(265)
第二节 《汉语词汇研究史纲》	(276)
第三节 《汉语词汇学史》	(278)
第四节 《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	(280)
第五节 《中国当代词汇学》第一、第二章	(283)
本章小结	(285)
第七章 汉语词汇学研究方法	(286)
第一节 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方法的研究	(286)
第二节 对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方法的研究	(317)
本章小结	(331)
第八章 词汇应用与词汇规范化	(335)
第一节 对现代汉语词库的研究	(335)
第二节 对现代汉语语料库的研究	(346)
第三节 对现代汉语词汇应用的研究	(361)
第四节 对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化的研究	(372)
本章小结	(383)
附录一 20 世纪汉语词汇研究大事记	(386)
附录二 20 世纪中国词汇学家简介	(409)
附录三 20 世纪重要词汇学著作简介	(416)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429)
后 记	(432)